冷战国际史研究文库

冷战的转型

中苏同盟建立与远东格局变化

沈志华 著

九州出版社
JIUZHOUPRESS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历史研究的价值就在于寻求真相


ISBN 978-7-5108-1504-1

9 787510 815041 >

定价：58.00元

冷战国际史研究文库

沈志华 著

冷战的转型

中苏同盟建立与远东格局变化

九州出版社 JIUZHOUPRESS |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冷战的转型 / 沈志华著. --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7

（沈志华冷战史文集）

ISBN 978-7-5108-1504-1

Ⅰ. ①冷… Ⅱ. ①沈… Ⅲ. ①冷战－国际关系史－文集 Ⅳ. ①D819-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06922号

冷战的转型

作　　者	沈志华　著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出 版 人	徐尚定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 (100037)
发行电话	(010)68992190/2/3/5/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6 开
印　　张	21.75
字　　数	377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8-1504-1
定　　价	58.00 元

编者说明

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追寻当下诸多问题的历史根源，是历史研究者的重要使命之一。冷战持续了近半个世纪，不仅主导了战后世界的政治格局，影响到许多国家的发展方向，甚至对当前一系列国际纠纷和冲突还在发挥着潜移默化的作用。正因为如此，在冷战结束后的国际学界掀起了“冷战国际史”研究的热潮。

作为中国“冷战国际史”这一新兴学科的创建者之一，沈志华教授为该学科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自费从俄国和美国收集了大量宝贵的第一手档案文献，并无偿地提供给国内外学者使用，从而为该学科的长足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而他本人，更是与这些档案朝夕相处，潜心研究，近二十年来主编了多部档案文献集，发表了大量的学术论文和专著。这些成果，在很大程度上改写了中国乃至国际史学界对中苏关系、朝鲜战争等重大历史过程和历史事件的叙述。

为此，我社把沈志华教授1994年以来发表的部分论文，根据“冷战的起源”、“冷战的转型”、“冷战在亚洲”、“冷战中的盟友”、“冷战的再转型”五大主题编辑为五册，以飨读者。除了对冷战史这个广泛领域中许多不同事件或过程的描述，这些论文集也收入了沈教授对同一论题在不同年代的研究成果，虽然有些内容显得重复，但更多的是对历史过程表述的细微变化，甚至是完全不同的结论。这恰恰显示出随着档案文献不断解密和公布而反映出来的冷战史研究发展和变化的历程。对于年轻一代的研究者，了解这一历程可能更为重要。同时，在每一册中，作为附录，我们还挑选了沈教授整理、编辑的部分国外档案文献，相信对学者的研究会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九州出版社

目 录

附录

中苏结盟与苏联对新疆政策的变化（1944—1950）

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的时候，中苏缔结了友好同盟条约。几年以后，中国政权发生更迭，而同盟关系则又上了一层楼。在此期间，中苏双边关系中的新疆问题始终处于一种十分微妙的地位，苏联对新疆的政策也有一个复杂的变化过程。本文拟对这一过程进行讨论，并提出一些新的看法。

民国以来，新疆长期处于中央政府实际控制之外，军阀割据，内乱频仍。30年代中期，苏联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通过全面援助和支持盛世才政权，排除以往英、日在新疆的影响，而把新疆纳入自己势力范围的。不过，当时国际形势风紧云急，世界大战一触即发，苏联处于日、德反共同盟势力的东西夹击之中，迫切需要中国拖住日本，稳定东方战线。所以，尽管盛世才有心使新疆脱离中央政府，投靠苏联，斯大林却还无意承认一个独立的新疆政权，以免由此刺激中国。[①] 而中国面对日本咄咄逼人的进攻态势，也十分需要得到苏联的援助和支持，不愿为一个鞭长莫及的地方与苏联形成对抗。于是，保持新疆的相对独立，即成为斯大林和蒋介石都可以接受的现状。

不久以后，国际局势骤变，苏德战争爆发。在苏联初战失利的情况下，盛世才见风使舵，转而投靠蒋介石，并采取种种措施迫使苏联的军事和经济势力全部撤出了新疆。[②] 当1942年底蒋介石颇为自豪地宣称：新疆归顺中央，是"国民政府自成

① 详见秦孝仪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二）》，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1981年，第408–409页；Allen S. Whiting and Sheng Shih-ts'ai, *Sinkiang: Pawn or Pivot?* Michigan: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1958, pp.63, 200-208。

② Whiting and Sheng, *Sinkiang: Pawn or Pivot?* pp.243-254；John W. Garver, *Chinese Soviet Relations, 1937-1945: The Diplomacy of Chinese Nationalis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165-174。厉声：《新疆对苏（俄）贸易史》，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92–497页。

立以来最大之成功”[①] 的时候，中苏两国关系降到了自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以来的最低点。

然而，就在苏联势力被迫撤出新疆之际，欧洲战场的局势已经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到 1944 年夏季，苏联不仅能够正式提出在远东参加对日作战的政治条件，而且还完全有时间和精力策划如何对新疆卷土重来了。

一、三区革命：苏联策动和支持的民族起义

1944 年初春，中蒙在新疆与外蒙交界的阿尔泰地区发生冲突。[②] 对于苏联重新染指新疆的企图，蒋介石的态度十分强硬。他一方面调兵遣将，摆开了不惜一战的架势，一方面不断向罗斯福告斯大林的状，试图对苏施加外交压力。[③] 但是，美国对阿尔泰冲突和蒋介石的申诉反应极为冷漠。罗斯福先是在 4 月 8 日建议中国政府“冻结”新疆事件，到战后再解决，继而在 4 月 10 日劝告蒋介石对苏联要忍耐，要顾全大局，后来甚至禁止中国再扩大反苏宣传。[④] 罗斯福所说的大局非常清楚，即为了最后在亚洲战胜日本，中苏必须联合，共同对敌；为了战后远东秩序的稳定，必须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而这是需要莫斯科认可的。中国不得不考虑美国的意见。4 月 19 日，蒋介石批准了一项缓解中苏在新疆的紧张关系的计划，决定先严令新疆当局力避任何边界冲突，再寻机将盛世才调离新疆，以取得苏联的好感。[⑤]

不久，美国副总统华莱士访问苏联和中国，以推动中苏接触。王世杰受蒋介石委托于 6 月 16 日专程到迪化迎接华莱士，并叮嘱盛世才不得在华莱士面前公开攻击苏联。6 月 24 日华莱士离开重庆时，蒋介石托宋美龄致函罗斯福，答应美国倘有任何改进中苏关系的办法，中国必全力以赴。[⑥]

---

① 古屋奎二:《蒋总统秘录》第 13 册，中文版，台北:《中央日报》社，1977 年，第 64 页。转引自李嘉谷:《盛世才与新疆》，中国中俄关系史研究会编:《战后中苏关系走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 年。

② 外蒙古当时已完全在苏联的控制之下，所谓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独立只是表面上的，其经济、军事和政治均由苏联垄断，除与个别国家有关系外，蒙古甚至基本没有外交。

③ 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二）》，第 460–461 页；Garver, *Chinese Soviet Relations*, pp.199-200。

④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FRUS)*, 1944, Vol.6, *China*, Washington, D. C.: GPO, 1967, pp.773, 785, 798, 800-803.

⑤ 王世杰:《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 4 册，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 年，第 288–292 页。

⑥ 王世杰:《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 4 册，第 332–333、338–343 页。

然而，此时解决中苏双边关系的主动权掌握在苏联手中。在这场未来的外交较量中，无论是实力地位还是国际影响，苏联都具有明显的优势。虽然从国际环境考虑，苏联也感到有必要改善苏中双边关系，但两国之间在处理战后关系方面，毕竟存在着需要通过外交途径加以解决的重大利害冲突。因此，在盟国之间酝酿中苏双方进行建立友好同盟关系的直接谈判时，苏联的策略是，一方面向蒋介石做出某种友好的表示，特别是表明苏联对中共的不支持立场，一方面则不断加紧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以便在谈判桌上能够取得预想的收获。

5 月中旬苏联大使潘友新向蒋介石做出明确保证：共产国际解散后，苏联不再援助外国共产党。苏联政府现在不给，将来也不会给中国共产党任何援助。[①]9 月 8 日，罗斯福的私人代表纳尔逊和赫尔利大使告诉蒋介石，莫斯科对华空气现已好转。莫洛托夫对美国人说：苏联愿意见到中国强盛和统一，中共并非共产党，苏联也无意支持中共。[②]

与此同时，斯大林显然认为需要让蒋介石切实体会一下苏联的力量和决心。1944 年 6—7 月，苏联从成都、西安和兰州撤走了最后一批大约 60 名苏联军事顾问。同时，苏联的报刊也增加了批评中国民族主义倾向的评论和报道。7 月间，苏联还向美国表示，苏联政府不愿在敦巴顿橡树园会议上与中国一起讨论未来的联合国组织问题，而建议单独举行两个三国会议。更为严重的是，10 月 11 日苏联接受位于外蒙古西北边界的图瓦人民共和国加入苏联，成为俄罗斯联邦的图瓦自治州。关于唐努图瓦地区的问题，蒋介石在开罗会议期间曾特意向罗斯福提起，认为应在战后同蒙古问题一道与苏联谈判解决。[③]现在，苏联竟如此轻而易举地吞并了这片 17 万平方公里曾属于中国的土地，这无疑是斯大林向蒋介石发出的一个警告信号。然而，与上述一切相比，真正使中国的领土和主权受到威胁，并使蒋介石政府感到震惊的，是苏联在新疆采取的策动和支持少数民族武装暴动的行动。这就是新疆历史上著名的伊宁事变，或称三区革命。

早在苏联势力退出新疆的时候，莫斯科就开始策划一次以少数民族反抗汉族统治为特征的武装行动了，并为此进行了充分的思想准备、组织准备和军事准备。

在思想方面，苏联的方针有一个转变的过程。据当时在塔城地区任副专员和政府秘书长的哈吉耶夫说，苏新关系破裂以后，苏联曾一度试图在新疆少数民族地区

① *FRUS,* 1944, Vol.6, pp.793, 504-505.

② 王世杰：《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 4 册，第 395–396 页。

③ Garver, *Chinese Soviet Relations*, pp.204, 207-209, 197-198.

推行共产主义措施，指望通过宣传共产主义鼓动人们反对盛世才和国民党统治，但是由于少数民族都不接受这些宣传而没有成功。以后，苏联才改为利用当地民族的反汉情绪和宗教信仰，特别是泛突厥主义，来达到控制新疆的目的。[①]苏联在北疆大规模号召少数民族起来反对汉族政府的压迫是从1943年开始的，那时，塔什干出版的《东方真理》和阿拉木图出版的《哈萨克国土》等维文、哈文报刊，已经大量运进新疆，这些报刊不断发表声援和支持新疆少数民族斗争的文章。1944年夏季，在迪化、塔城和伊犁经常发现有"新疆解放"等地下组织散发的传单，而这些印刷精美的传单显然不可能是在新疆印制的。在这些传单中，传播最广、效果颇大的是一种专门对伊斯兰教民的传单，该传单介绍了在莫斯科召开的伊斯兰教人民大会，并直接号召伊斯兰教徒团结在苏联周围以争取民族的幸福和解放。[②]

在组织方面，苏联积极帮助新疆少数民族建立各种秘密团体。苏新关系破裂初期，后来成为三区革命主要领导人的阿巴索夫等人在伊宁成立了"马列主义学习小组"，其中就有苏联驻伊宁领事馆的共产国际情报员瓦西里·瓦西里诺维奇参加。[③]苏联军官还直接出面领导反抗组织，如1943年在阿拉木图成立的"新疆突厥民族解放委员会"，就是曾经帮助盛世才剿灭马仲英和张培元的红军将领叶夫西爱夫组织的，该委员会的任务主要是联络伊犁民族上层，组织武装暴动。[④]当时在新疆最大、最有影响的地下组织"伊宁解放组织"，也是在苏联驻伊宁领事馆的支持和帮助下，于1944年4月9日成立的。与苏联在新疆的政治鼓动和思想宣传相一致，该组织的主要领导力量是以艾力汗·吐烈为首的宗教、大牧主等民族上层人士。[⑤]这种组织结构，决定了三区革命初期的政治走向。

在军事方面，苏联的主要作用是大量向新疆少数民族反抗组织提供武器，在苏联境内为武装暴动培训军事干部，并派军事顾问参与对新疆游击活动的领导和组织。早在1943年驻守哈密的红八团撤退回国，经过伊犁边卡时，便将该部队的武器悉数藏匿于民间，以为日后采取武装行动所用。[⑥]1943年10月，在苏联接受军事训练达两年之久的达列力汗回到阿山地区进行游击活动时，苏联应其要求，派出

① 笔者1998年8月31日与新疆学者徐玉圻、高朝明、杜瀚、周清霖的座谈记录。

② 朱培民：《1943年至1949年苏联对新疆政策的演变》，《中共党史研究》1990年增刊，第87页。

③ 朱培民：《1943年至1949年苏联对新疆政策的演变》，第88页。

④ 张大军：《新疆风暴七十年》第11册，台北：兰溪出版有限公司，1970年，第6521页。

⑤ 新疆三区革命史编纂委员会：《新疆三区革命大事记》，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6–8页。

⑥ 张大军：《新疆风暴七十年》第11册，第6521页。

了12人顾问团，随同他经外蒙古到达青河。1944年4月上旬，蒙古人民共和国领导人乔巴山以视察边境为名来到新疆青河县，会见了反抗组织首领乌斯满，并给他派来了一批军事顾问，运来了武器弹药。在乌斯满和达列力汗发动阿山暴动过程中，他们不断从外蒙古方面得到大批武器。[①] 苏联还为新疆少数民族培养了大批军事干部和指挥人员。当时，苏联在阿拉木图和安集延建立了两个军事训练基地，专门训练逃亡到苏联的新疆少数民族反抗人士。阿拉木图基地负责正规战训练，而安集延基地负责游击战训练。[②] 三区革命的主要军事领导人伊斯哈克伯克在1942年初逃往苏联后，就在苏联的支持下，将聚集在那里的200余名逃亡者组织起来，编为两个大队，进行政治和军事训练，并在苏联筹建了蒲犁解放组织和蒲犁游击队。[③]

1944年10月30日，鉴于在伊宁发动武装暴动的条件已经成熟，“伊宁解放组织”便派遣阿巴索夫去苏联，洽谈购买军火事宜，并很快组建了一支近百人的游击队。11月4日，“伊宁解放组织”根据苏联驻伊宁领事馆的建议，趁伊宁驻军的主力部队已调往巩哈县的机会，秘密发动和武装群众，同时派人与巩哈游击队取得联系。11月6日，阿巴索夫偕同苏联军官亚历山得洛夫率领一支全副武装的队伍从苏联经霍尔果斯口岸潜入伊宁，会同“伊宁解放组织”组成了以亚历山得洛夫为首的军事指挥部，并决定在11月7日举行全城暴动。[④]

暴动开始以后，苏联军人立即投入了战斗。随着战事的展开，又不断有增援部队自苏联入境。11月12日，由苏联军官波里诺夫率领一支现代化装备的俄罗斯族部队入境参加作战。11月16日，伊斯哈克伯克和苏联军官斯坎德尔率一营骑兵，越过国境攻打艾林巴克。到1945年1月初，苏联又在其境内中亚地区各穆斯林民族中组织了一支部队。这支部队进入新疆后，一部分去果子沟阻击迪化政府的增援军队，一部分参加了攻打艾林巴克的战斗。鉴于大量苏联军官和军事人员进入新疆，为了协调关系，协助指挥，1944年11月下旬，苏联派出了以柯兹洛夫为团长的军事顾问团和以斯特潘诺维奇为团长的内务部顾问团（代号分别为“一号房子”

---

① 新疆三区革命史编纂委员会：《新疆三区革命大事记》，第9、11-12、13页；朱培民：《1943年至1949年苏联对新疆政策的演变》，第88-80页；阿勒泰地区纪念三区革命烈士殉难四十周年活动筹备领导小组编印：《达列力汗烈士纪念文集》，1989年，第41页。

② 笔者1998年8月30日采访陈锡华记录。陈锡华是新疆共产主义者同盟及民主革命党创始人之一，并在邓力群到新疆后为他做俄语翻译。

③ 朱培民：《1943年至1949年苏联对新疆政策的演变》，第89页。

④ 新疆三区革命史编纂委员会：《新疆三区革命大事记》，第28-32页。

和“二号房子”）来到伊宁。不久，苏联又派出一批苏联军事教官，在霍尔果斯口岸举办军官培训班。每期 3 个月，先后举行了 3 期。毕业的学员分配到各游击队担任军事指挥员。①

此外，在新疆的苏联侨民也纷纷参与了三区革命。作为伊宁事变先声的 1944 年 8 月的“巩哈暴动”，就是苏联侨民帕提斯·莫斯里莫夫等人利用在苏联境内换取的武器，组织游击队发动的。②另据 1945 年 11 月苏联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管理总局的调查报告说，绝大多数旅居新疆的俄罗斯侨民“怀有对自己祖国的爱国主义感情”，正在积极投入武装起义。③

显然，曾在伊宁工作的中共代表彭国安的结论是可信的：“伊犁的局面确实是靠苏联军队打出来的。”④

二、新疆独立：与中国结盟谈判的外交筹码

伊宁暴动发生后，新疆当局马上意识到问题的关键在苏联。1944 年 11 月 11 日，新疆军政首脑朱绍良和吴忠信联名致电蒋介石：以目前情势而言，对苏外交如无彻底调整办法，则如伊犁事件，自必层出不穷，新疆前途亦将日趋恶化。蒋介石在 11 月 25 日的回电中也感到问题严重，他一方面进行军事部署，一方面指示新疆当局立即就地与苏方进行交涉，只要能够保全领土和主权，可以在经济合作方面尽量迁就。伊宁失守以后，1945 年 2 月 19 日吴忠信致电蒋介石称，如此下去，新疆恐怕将成为第二个东北，只有通过外交渠道的有效疏解，才能收拾目前局面。⑤

事态的发展表明，吴忠信对新疆势必大乱的形势估计是准确的，蒋介石对领土和主权的担心也不是无的放矢。因为，伊宁事变的最初目标就是要把新疆从中国的版图中分离出去。苏联驻伊宁领事在暴动的第二天就派人与“伊宁解放组织”领导人热合木江联系，商议成立“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并就政府成员名单进行了讨论。11 月 12 日，“伊宁解放组织”即宣布成立“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由艾

① 新疆三区革命史编纂委员会：《新疆三区革命大事记》，第 39、44、46、57 页。朱培民：《1943 年至 1949 年苏联对新疆政策的演变》，第 89–90 页。

② 新疆三区革命史编纂委员会：《新疆三区革命大事记》，第 15–16、18 页。

③ ГАРФ（俄罗斯国家档案馆），ф.9401, оп.2, д.105, л.240.

④ 1979 年 3 月 4 日彭国安同志谈三区革命情况。转引自朱培民：《1943 年至 1949 年苏联对新疆政策的演变》，第 90 页。

⑤ 新疆三区革命史编纂委员会：《新疆三区革命大事记》，第 34、43–44、64 页。

力汗·吐烈担任“临时政府”主席，定国旗为绿底中镶黄色星月旗。1945年1月5日，“临时政府”委员会第4次会议通过的政府宣言明确宣布“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脱离中国而独立。[①]

然而，在新疆建立一个独立的国家，并不是苏联对华政策的真实目标，也不是苏联策动和支持三区革命的根本目的。在伊宁事变中，如果说三区的少数民族上层人物真正把新疆的独立作为了这次革命的最终目的，那么莫斯科不过是利用新疆地区的民族矛盾作为实现苏联在华利益的一个手段。

无论从内部还是外部环境来看，苏联都不可能要求和实现把新疆从中国分离出去的目标。就苏联国内情况而言，与新疆接壤的主要是以少数民族为主的加盟共和国，如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这些共和国的主体民族与新疆的少数民族在种族上、宗教上，乃至血缘上，都有着密切的联系。苏联国内在战后仍然存在着需要解决的民族矛盾，可以想象，如果苏联支持在这些共和国的边疆站立起一个独立的民族国家，会对本国的少数民族产生如何强烈的负面影响。既然新疆的少数民族可以脱离中国而独立，那么苏联的同类民族就不会提出同样的要求吗？[②]就苏联的国际环境而言，与中国的关系既受制于对付苏联在远东的宿敌日本的需要，又不得不考虑美国在亚洲的利益和政策。无论如何，从国际形势发展的大趋势以及处理战后世界格局的总体原则出发，苏联需要的是同中国保持友好和盟国关系，而绝不是为新疆问题与中国对立，甚至兵戎相见。

当然，战后成为世界强国的苏联对大而弱的中国不是没有所图的，不过，这里有一个利益限度的问题。从历史上看，俄国的在华利益涉及到与中国接壤的三个地区，即东北、蒙古和新疆。早在19世纪末，俄国就为了在太平洋寻找不冻港和出海口而与日本激烈争夺对中国东北的控制权，而为了保证西伯利亚铁路动脉的安全，则致力于在蒙古地区建立一个广阔的缓冲国。斯大林正是依据俄国在远东的传统外交战略，确定了苏联战后对华政策目标：在东部，以夺取中东铁路和恢复对旅顺口的控制，建立从苏联内地通向太平洋的出海口为目标；在中部，以策动外蒙古

---

① 朱培民：《1943年至1949年苏联对新疆政策的演变》，第90–91页；新疆三区革命史编纂委员会：《新疆三区革命大事记》，第35、52页。

② 谈到“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阿巴索夫曾经对陈锡华说过，他在苏联境内接受训练时，一位当地的负责人讲，苏联的少数民族希望在新疆有一个维吾尔斯坦，因为这样他们自己也可以在苏联抬头了。见笔者1998年8月31日采访陈锡华记录。

脱离中国，建立苏联卵翼下的独立国家为目标。[①] 显然，面对战后中国国际地位的上升和美国对亚洲事务的干预，苏联实现上述两个目标已非易事，如果再搞出一个新疆独立的事件，势必影响全局。因此，苏联对中国西部的目标是满足于保持苏联的军事和经济影响，促成一个在莫斯科控制之下，或至少是亲近苏联的新疆地方政权。从现实的角度看，在新疆实现这样的目标比较容易，且不会引人注目。

在这方面，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的分析是比较准确的，尽管中国提供的情报极力渲染新疆局势的严重性和危险倾向，但他在 1945 年 3 月 9 日致美国国务卿斯退丁纽斯的电报中认为，苏联“虽然不一定反对在新疆出现自治局面，但是莫斯科的宗旨是始终要对当地政府的政策方向施加压倒一切的影响，尤其要左右新疆的全部对外联系。直接目的可能是要保持对地方当局活动幕后的控制权，而不公开承担任何行政责任。”因此，对于新疆来说，在最近一个时期，“主权问题将处于次要地位”。[②] 斯大林在雅尔塔会议上，以及在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谈判中的表现，充分说明了苏联对新疆问题的真实考虑；说明了苏联策动新疆事变和支持成立一个独立国家的举措，不过是为实现其在华根本利益而施展的手段罢了。

正当三区革命如火如荼开展的时候，美英苏三国首脑在雅尔塔举行了关于战后安排的重要会议。鉴于对德战争即将胜利结束，而且这次美苏首脑接触是斯大林正式提出苏联在远东地区全面要求的最后机会，因此可以认为，这次会议的结果反映了苏联在华利益的最根本的要求。在 2 月 8 日斯大林与罗斯福的会晤和 2 月 11 日关于远东协定的讨论中，根据苏联的要求，苏美英三国领袖一致通过了苏联加入远东作战的条件：维持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现状，大连作为商港的国际化并保证苏联的优越权益，苏联租用旅顺港作为军事基地，由苏联和中国共同经营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但保证苏联的优越权益和中国在满洲的主权。最后，苏联表示准备同中国国民政府签订友好同盟协定。

在这里，斯大林只字未提新疆问题绝不是偶然的，也不是一时疏忽，这恰恰反映了在苏联对华政策所追求的主要目标和根本利益当中，新疆问题只是莫斯科随时准备打出的一张外交牌。所此，苏联一方面希望美国向蒋介石施加压力，迫使中国

---

① 关于笔者对战后苏联远东政策的分析详见沈志华：《朝鲜战争揭秘》（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5 年）第二章“这里是被冷战遗忘的角落？——分析战后朝鲜及远东局势的变化”；沈志华：《斯大林、毛泽东与韩战》（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8 年）第二章“重温远东梦——苏联的远东政策与中苏同盟的起源”。

② *FRUS,* 1945, Vol.7, *The Far East, China,* Washington, D. C.: GPO, 1969, pp.995-997.

政府接受这些要求，[①]一方面试图把新疆问题作为筹码，通过中苏直接谈判实现这些设想。

为了使中国能够接受雅尔塔协定，苏联开始注意改善与中国的关系，并且在解决新疆问题上加快了与中国的接触。自潘友新被召回国后，空位近一年之久的驻华大使之职终于有了新的人选。1945 年 4 月，新任驻华大使彼得洛夫在赴任途中专程在新疆停留，听取了驻迪化总领事的情况汇报。4 月 13 日，当蒋经国携带蒋介石的亲笔信抵达迪化时，苏联驻迪化总领事馆的负责人会见了他，双方就苏联与新疆关系问题交换了看法。[②]特别是在旧金山会议上，苏联明显地对中国表现出友好姿态。4 月 15 日和 26 日，出席会议的宋子文连续电告蒋介石，莫洛托夫对中国代表团的态度变得越来越好。6 月 13 日，奉命去莫斯科了解罗斯福去世后斯大林对中国问题的立场是否有所改变的霍普金斯回到华盛顿后，立即与宋子文举行了一次重要会晤。霍普金斯十分明确地向宋子文转达了斯大林关于中国问题的立场："中国，包括共产党在内，在目前还没有一个能统治全国的领导人，由于苏联不愿与一个分裂的中国谈判，斯大林准备支持蒋介石总统及其政府。而且苏联无意侵犯中国在新疆或其他任何地方的主权。苏联将主动邀请中国代表进驻满洲，与苏军合作组织当地的政府。关于中国共产党，苏联认为这是中国内部的事务，与苏联无关。"[③]

莫斯科在中苏谈判之前作出的这种友好姿态，当然是为了诱使中国在即将开始的谈判中接受苏联的条件。在处理与中国结成同盟关系的问题上，斯大林始终把苏联对外蒙古和东北的要求作为不可更改的目标，而把新疆及对待中共的态度问题作为谈判的筹码。中苏同盟条约的谈判，大体上就是按照苏联设计的轨迹展开的。[④]

7 月 2 日，中苏正式谈判一开始便陷入了僵局，症结主要出在外蒙古问题上。[⑤]中国代表团到达莫斯科之前，宋子文并没有把蒙古问题作为会谈中的主要讨论内

---

① 详见沈志华：《苏联出兵中国东北：目标和结果》，《历史研究》1994 年第 5 期。

② 新疆三区革命史编纂委员会：《新疆三区革命大事记》，第 71、73 页。

③ 梁敬錞：《1945 年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内幕》，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国外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研究译文集》第 1 集，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 年，第 226 页。

④ 以往的研究已经注意到 1945 年苏联对新疆转变（见朱培民：《1943 年至 1949 年苏联对新疆政策的演变》，第 91 页；薛衔天提交 1997 年 10 月"冷战与中苏关系"国际学术讨论会的论文《试析战后苏联对中国新疆战略》），但都认为这种变化发生在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以后，并以此作为"苏联对新疆战略和策略的转折点"或标志。而笔者的看法则相反，认为苏联出于对远东国际形势的考虑，恰恰是为了促成中苏条约的签订而改变了对新疆的策略，即策划三区革命、支持新疆独立和主张和平谈判都是莫斯科实现其对华政策目标的外交筹码。

⑤ 详见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二）》，第 576–590 页。

容，因为苏联要求的是在外蒙古“维持现状”，中国对此的理解就是仍然保留中国的宗主权。[①] 因此，斯大林在会谈中提出的外蒙古独立问题使宋子文感到十分意外。在第三轮谈判中，双方在外蒙古独立的问题上争论激烈，甚至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②] 面对苏联的强硬立场和美国政府在谈判初期采取的妥协和不干预态度，地位软弱的中国不得不退而求其次了。7月6日至8日，蒋介石在与王世杰等人商议后，连续给宋子文发出4封电报，表明了中国让步的界限：如果苏联能保证中国在东北和新疆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保证不再支持中共和新疆暴动，则中国政府将在抗战胜利后自动提出通过公民投票方式解决外蒙古独立问题的建议，同时，中国同意大连成为自由港，东北的铁路干线和旅顺港由中苏共同使用，但管理权归中国所有。[③]

这个消息正中斯大林下怀。于是，在7月9日的第四次谈判中出现了转机。斯大林对宋子文提出的新建议做出了回答：关于东北，苏联愿意尊重中国对满洲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但坚持旅顺港须由苏方管理）；关于新疆，苏联同意“禁止私运军火，堵截边境”，同意协助平息暴乱，并认为中国政府在必要时使用武力是适宜的；关于中共，苏联认为中国政府要求军令、政令统一，极为允当，并表示此后援助中国的一切武器及其他物资，均以中央政府为唯一对象，不向中共供应武器。[④]

这样，在斯大林离开莫斯科参加波茨坦会议之前，中苏双方在重大问题上已达成了一致意见。尽管在中国与外蒙古的边界划分，以及旅顺港的管理等一些细节问题上还有分歧，但蒋介石对新疆问题的担忧似乎是解除了。1945年7月17日，蒋介石命朱绍良、吴忠信着手准备在10月间收复伊犁的事宜。[⑤]

三、和平谈判：莫斯科施加影响的缓和手段

然而，就在中苏政府代表团忙于就中苏同盟条约进行谈判的时候，新疆发生了一场更大的风暴。“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的民族军按预定计划，于7月下旬发动了全线进攻。到9月初，民族军在北线占领了塔城和阿山地区，在南线越过天山冰

---

① 见王世杰：《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5册，第49、77–79页。

② 详见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二）》，第598–604页。

③ 王世杰：《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5册，第117–118页；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二）》，第593–596、605页。

④ 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二）》，第609–620页。

⑤ 新疆三区革命史编纂委员会：《新疆三区革命大事记》，第85页。

大坂，并在南疆开展了广泛的游击战，而在中线则攻陷了精河和乌苏，直达玛纳斯河西岸，距乌鲁木齐只有 140 多公里。面对如此局面，朱绍良、吴忠信走投无路，心急如焚，急电重庆政府说：事态严重，前途不测，只有一死殉国！①

然而，蒋介石却另有考虑。1945 年 8 月 15 日《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正式签字②以后，蒋介石的注意力主要在东北的接收问题上，认为苏联在新疆问题上的首要目的是以此干扰中国政府接收东北，至于"助长哈匪多占地盘"，实现其"侵新之野心"，"尚在其次"。故决定对新疆问题不可以武力解决，"即使沦陷，只可暂时忍耐"，外交和宣传也作低调处理，同时积极准备在新疆进行政治和宗教改革。他一方面表示允许边疆民族自治，一方面派张治中赴新疆考察，提出解决问题的报告。③

如前所说，新疆果真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对苏联实为一种潜在的威胁。因此，当苏联在华的根本利益已经得到《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保证以后，苏联便决定出面调解新疆冲突，阻止新疆独立。这对莫斯科来说可谓一举三得：一则在世界舆论面前表现出苏联的和平形象及遵守中苏条约的姿态，二则可以免除新疆独立给苏联本身带来的后顾之忧，三则通过充当调解人巩固和加强苏联对新疆的影响和控制。斯大林何乐而不为？

于是，苏联政府在 9 月 6 日即向中国政府表示：只要让各民族参加新疆省政府，特务工作放宽些，新疆问题是可以解决的。9 月 14 日，苏联代总领事叶谢也夫会见前来迪化的张治中时也建议，新疆冲突最好设法和平解决，并表示愿意帮助从中疏通和联系。张治中遂电告蒋介石，建议请驻苏大使傅秉常直接向苏联政府提出和平解决新疆问题，并请苏联方面出来调停。④9 月 15 日，出席伦敦外长会议的王世杰与莫洛托夫谈话，请苏联调查最近的新疆事件。莫洛托夫友好地表示，此事

① 详见曹达诺夫・扎伊尔：《五军的革命历程》，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9 年，第 27–55 页；张治中：《张治中回忆录》，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5 年，第 418 页。

② 由于准备条约文本拖延了时间，签字仪式是 15 日 6 时举行的。但日本接受投降的电文于凌晨 2 时已送达莫斯科，苏联为掩人耳目宣布中苏条约于 14 日签订。见王世杰：《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 5 册，第 151–153 页。

③ 秦孝仪总编纂：《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五，下册，台北：中正文教基金会出版，2002 年，第 831 页。转引自薛衔天编：《中苏国家关系史料汇编（1945–1949）》，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年，第 439 页；新疆三区革命史编纂委员会：《新疆三区革命大事记》，第 98–99 页；张治中：《张治中回忆录》，第 418 页。

④ 新疆三区革命史编纂委员会：《新疆三区革命大事记》，第 103 页；张治中：《张治中回忆录》，第 419–420 页。

件只是“过渡现象”，请不必放在心上。[1] 同一天，彼得洛夫即向中国外交部表示，苏联准备对新疆事件进行调解，并于第二天送来了正式备忘录。中国政府立即答复，希望“事变分子代表”来迪化与张治中洽商，请苏联伊犁领事代为通知。[2]

作为调解人，苏联领事馆始终掌握着整个和平谈判的进程和节奏。和谈伊始遇到的障碍即是苏联领事排除的。三区谈判代表于 10 月初来到迪化时，都佩戴着“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的证章，并声称他们是代表“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来和中国政府代表谈判的，届时将出示证明文件，中国政府代表也须交验相应证件。对此，张治中坚决反对，并拒绝与其见面。最后，经张治中亲自与叶谢也夫交涉，确定由苏联方面从中斡旋。在叶谢也夫的劝告下，伊犁代表才放弃了原先的主张，使谈判得以启动。[3]

在谈判桌外，苏联各部门也积极予以配合。1945 年 10 月 15 日，内务人民委员贝利亚给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和米高扬的报告说，乌斯满与伊犁起义者协同配合“从中国人手中解放了阿尔泰地区”后，无意承认“东土耳其斯坦政府”，想使阿尔泰成为独立国家，并说这是乔巴山在 1944 年就允诺的，他只接受乔巴山的指示。鉴于目前正在举行和平谈判，贝利亚建议，请乔巴山给乌斯满下达指示：“停止积极反对中国的武装活动，转入防御，协助伊犁起义者谈判，和平解决与中国的冲突。”[4]

和谈期间，张治中经常与苏联领事馆保持接触。凡有新的提案，首先征询苏联方面的意见，并请苏联领事人员从中斡旋和疏解，如此才使谈判得以进行下去。特别是当谈判陷入僵局时，苏联领事馆起了重要作用。例如，三区代表第三次来到迪化后，节外生枝地提出了撤销政治警察、事变后调来的政府军队撤出新疆、新疆警察由回教徒充任等三项新要求。对此，张治中态度强硬，表示没有任何商量余地。最后还是经请苏联领事出面进行说服，三区代表才同意暂时把这些要求搁置下来。1946 年 1 月 2 日，和平条款及附文（一）签字。[5]

此期，甚至斯大林本人也对新疆和平谈判起了推动作用。为了促进战后中苏关系中诸多问题的解决，蒋介石于 1945 年底派蒋经国访问莫斯科。正如苏联外交部

---

① 王世杰：《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 5 册，第 175 页。

② 详见薛衔天：《中苏国家关系史料汇编（1945–1949）》，第 439–440 页；张治中：《张治中回忆录》，第 418–419 页。

③ 张治中：《张治中回忆录》，第 422–423 页。

④ ГАРФ, ф.9401, оп.2, д.104, л.62-63.

⑤ 张治中：《张治中回忆录》，第 429–441 页。

事先对蒋经国来访目的估计的那样，在 12 月 30 日的谈话中，蒋经国要求斯大林对新疆谈判代表施加影响。蒋经国说，新疆问题已经基本达成协议，但现在三区代表又提出了新的要求，希望苏联政府出面调停。斯大林表示，苏联政府将尽力而为，并十分有把握地说，三区方面“不会拒绝苏联政府的调停”。[①] 果然，1946 年 4 月初第二阶段谈判一开始，三区代表便轻易放弃了前次谈判搁置的三条补充要求。当谈判在新疆民族军整编后的数量和驻地问题上历时两个月而争执不下时，也是苏联新任总领事萨维利耶夫和副总领事叶谢也夫出面，多次与双方接触，居间调解。到 6 月 6 日，附文（二）终于正式签字，和平解决伊宁事变的工作全部告成。[②]

不过，莫斯科放弃对新疆建立独立国家的支持，并非从根本上改变了对新疆的政策，而只是在国际格局和中苏关系发生变化的新形势下，调整了策略和方法。通过在幕后导演和平谈判，苏联进一步加强了对新疆的控制和影响。

四、武装割据：苏联对新疆三区的全面控制

和平条款的签字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新疆问题。1947 年 2 月 25 日迪化发生了民族冲突的流血事件。与此同时，国共谈判破裂，国民党在各地采取了强硬的高压政策，新疆的各种矛盾日益激化，各地武装冲突再次出现。以至张治中不得不把省主席的位置让给民族人士麦斯武德，参加联合省政府的三区代表也陆续回到伊宁。新疆形成了三区武装割据，与地方当局对峙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苏联已无法实现通过维持联合政府及和平局面来保证对新疆进行控制的策略，便暂时把目标转向以加强对三区的控制为主，静观全局变化。

苏联控制三区的一个重要手段是大量发展苏联侨民，甚至鼓励新疆少数民族加入苏联国籍。

在俄国十月革命以后，以及全盘集体化和驱逐富农时代，有大批俄国人自中亚流入新疆。中国当地政府向这批苏侨发放了公民证，承认其归化中国，称作归化族。就在和谈开始后不久，1945 年 10 月 29 日，布尔加宁等人受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托，提交了政治局“关于接收旅居满洲的俄罗斯人为苏联公民”的决定草案，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关于恢复旅居满洲的原俄罗斯帝国国民以及失去苏联国

---

① 洛佐夫斯基致斯大林、莫洛托夫，1945 年 12 月 29 日。斯大林与蒋经国谈话记录，1945 年 12 月 30 日。转引自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1996, №4, с.106, 118。

② 张治中：《张治中回忆录》，第 446–453 页。

籍人员为苏联公民”的命令草案，及审查程序、申请书、居住证样式等相应材料。1945 年 11 月 10 日，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发布了这项命令。几天以后，М. И. 加里宁再次签署主席团命令，宣布关于满洲俄侨的命令也适用于新疆和上海。[①]1946 年 2 月 1 日，苏联驻迪化总领事馆发出布告称，奉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命令，凡以前失去或被取消俄国和苏联国籍者及其子女，均可恢复苏联国籍；在中国境内的原白俄侨民，均有恢复苏联国籍的权利。文告张贴后，前往登记者络绎不绝。不久，苏联又延长入籍登记日期，特别是策动哈萨克、维吾尔和塔塔尔人加入苏籍，并许诺对加入苏籍者每月发给布匹一丈六尺，津贴若干元，并可免费看苏联电影。[②]

1946 年 11 月，在伊犁、塔城和阿山分别成立了苏侨协会。苏联驻伊宁领事达巴申声称，苏联将通过苏侨协会向苏侨和新疆人民提供帮助。苏侨协会完全在苏联领事馆的控制之下，他们经常向领事馆请示工作，并汇报情况和提供情报。苏侨协会还有自己的报纸和旗帜，在三区享有特权，被人称为“国中之国”。[③] 这里值得注意的现象是，此期苏侨人数迅速增长，而且新发展的侨民，大多数并非原俄罗斯人，而是新疆的少数民族。1945 年 11 月，据苏联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管理局关于旅居新疆俄罗斯侨民的调查报告说，当时在新疆省居住的俄侨有 2.5 万人。[④] 据中国档案记载的苏联领事馆发放的护照号码统计，1946 年发展苏侨 2000 人，1947 年即增加了 13000 人，1948—1949 年更猛增了 40000 人。[⑤] 到新疆解放前夕，据苏联驻伊犁领事对邓力群所言，当地的苏侨及其家属已发展至 6.5 万户，共 20 余万人。[⑥] 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苏侨人数如此剧增，显然是因为有大量当地居民取得了苏联国籍，除非发生了一次令人瞩目的民族迁徙，但历史上没有这样的记载。

此外，苏联还训练了一批亲苏的华侨，并将他们送回国内。1947 年 10 月 1 日，国民党迪化情报组报称：莫斯科、塔什干等地现有华侨 1600 余人请领护照回国。苏方对申请回国的华侨，有的拖延两三年不发护照，但如果华侨能接受格伯乌训练，并充当苏联间谍，则准许其搭乘苏联飞机来新疆。[⑦]

---

① ГАРФ, ф.9401, оп.2, д.105, л.50-58, 238.

② 薛衔天：《中苏国家关系史料汇编（1945-1949 年）》，第 478–480 页。

③ 新疆三区革命史编纂委员会：《新疆三区革命大事记》，第 202 页；笔者 1998 年 8 月 31 日采访陈锡华记录。

④ ГАРФ, ф.9401, оп.2, д.105, л.240.

⑤ 黄金明给新疆自治区人委外办的调查报告，1962 年 10 月 10 日。伊犁州档案馆，全宗 11，目录 1，卷号 114，第 139 页。

⑥ 笔者 1998 年 8 月 31 日采访陈锡华记录；10 月 13 日采访邓力群记录。

⑦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馆，全宗 1，目录 2，卷号 35，第 67 页。

如果说苏联在侨民问题上的做法是为了加强其控制新疆的社会基础，那么苏联此时更重视的则是在三区领导机构中肃清不忠实和不可靠分子，提拔和扶植亲苏人物主持政务。和平条款签订以后，苏联本来已经把苏联顾问团、军事指挥人员，以及在三区政府中任职的苏籍官员和顾问撤回国内，到 1947 年 8 月底，应三区方面的要求，苏联又重新派顾问团秘密来到伊宁，代号为“阿合买提江·哈斯木第二办公室”。同时还派出 500 多格伯乌秘密特工潜入伊犁，加强对三区人事和局势的控制。①

作为三区革命初期的头面人物，艾力汗·吐烈具有强烈的独立倾向。当初为了鼓动新疆起事，苏联利用了吐烈在民众中的宗教影响，支持他推翻新疆的汉人政府。但是吐烈在骨子里是反苏反共的，特别是苏联的策略改变以后，其反苏情绪更为严重。吐烈不满当时在伊犁政府和军队中任副职的苏联人掌握实权，抗议苏联人在边境收购被盗的新疆农牧民的牲畜，反对苏联在新疆大量发展苏侨，以及过多地干预三区政府的事务。最令苏联头痛的是，吐烈坚决反对和平解决伊宁事件。在和谈前夕，吐烈先后在塔城和承化主持召开了“临时政府”委员会流动会议，宣布塔城专区和阿山专区为“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和平条款即将签字时，吐烈又极力反对苏联顾问停止军事进攻的命令，力主继续进军，趁势解放全疆，甚至在伊宁召开大会，宣布将“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改为正式政府。② 对于这样的人，苏联当然不能容忍。于是在联合省政府正式成立前夕，苏联驻伊犁领事馆强行将艾力汗·吐烈等民族上层人物秘密押解出境，送往阿拉木图。③

苏联选中取代吐烈的人物是阿合买提江。据 1949 年 8 月苏联驻伊犁领事阿里斯托夫向邓力群介绍，阿合买提江是联共（布）党员，是苏联派来搞情报工作的，完全可以信任。在三区革命爆发时，阿合买提江只是一个报纸编辑，并不是当地的主要人物。后来苏联感到吐烈不可靠，才提拔阿合买提江在“临时政府”中担任办公室秘书、军事厅军事科长等职。和平谈判前夕，“临时政府”通过 103 号决议，增补阿合买提江为“临时政府”委员。在谈判期间，张治中发现，阿合买提江虽

① 新疆三区革命史编纂委员会：《新疆三区革命大事记》，第 171、247 页；张大军：《新疆风暴七十年》，第 12 册，第 7093 页。

② 新疆三区革命史编纂委员会：《新疆三区革命大事记》，第 91、101、112、134 页；张大军：《新疆风暴七十年》，第 11 册，第 6784–6785 页。

③ 笔者 1998 年 8 月 31 日与新疆学者徐玉圻、高朝明、杜瀚、周清霖的座谈记录；10 月 13 日采访邓力群记录。

然只有32岁，是三区代表中最年轻的，但却是和平谈判三区方面的实际负责人。[①]此后，阿合买提江便成为三区的首要领导人。

最能说明此期苏联强化对三区控制的，是苏联绝对排斥各种外来势力渗透到三区，甚至包括中共的力量。在当时三区的领导人中，与中共和汉族革命者接触的主要人物是阿巴索夫，而这位三区革命初期的主要领导人后来却为此受到苏联的冷落和压制。

自从盛世才实行反苏反共政策、将陈潭秋等中共干部逮捕下狱以后，中共在新疆有组织的力量已经不复存在。1944年11月，李泰玉、陈锡华等进步青年组织了“新疆共产主义者同盟”，试图与中共取得联系。1946年和谈期间，他们借同学关系找到三区代表阿巴索夫，并通过阿巴索夫参加国民大会的机会，请他与南京的中共代表联系。12月5日晚，阿巴索夫秘密前往中共驻南京办事处，见到董必武，详细汇报了新疆和三区的情况。当晚，董必武即将所谈内容电告中共中央。12月6日中共中央复电，建议由阿巴索夫带中共代表及电台一道返回新疆，以便建立与延安的联系。阿巴索夫回到迪化后即召集李泰玉等人开会，传达了中共中央的指示。由于中央代表彭国安的电台功率太小，无法与延安取得联系，经过讨论，决定把阿巴索夫秘密建立的人民革命党与新疆共产主义者同盟联合成一个统一的党，并按照中共党章的原则起草了章程。根据董必武关于在新疆的组织不要过早打出共产主义旗帜的指示，该党取名为“民主革命党”，阿巴索夫任主席，李泰玉、艾斯海提任副主席。1947年夏天，由于迪化形势紧迫，民主革命党领导成员及中共中央代表随同阿巴索夫撤退到伊犁。[②]

当时，所有这些与中共和汉族革命者的联系，阿巴索夫都是背着苏联人做的，也不敢告诉阿合买提江。到伊犁后，民主革命党又发展了100多人，主要是那里的干部和知识分子，但仍是秘密组织。阿巴索夫一再要求党员保密，绝对不能让苏联人知道。后来，苏联领事馆还是听到了有关民主革命党的消息。1948年5月，苏联领事委托阿合买提江找阿巴索夫和赛福鼎谈话，对他们提出警告，并勒令其停止活动，销毁一切文件。此后，阿巴索夫便被苏联人冷落了。协调三区统一行动的

---

① 笔者1998年8月30日采访陈锡华的记录；10月13日采访邓力群记录；新疆三区革命史编纂委员会：《新疆三区革命大事记》，第118–119页；张大军：《新疆风暴七十年》第12册，第7093页；张治中：《张治中回忆录》，第449页。

② 李泰玉：《为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而献身》，徐玉圻：《毛泽东与新疆三区革命》，新疆三区革命史编纂委员会编：《纪念新疆三区革命文集》，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04–105页、115–117页；1998年8月31日笔者采访陈锡华记录。

“新疆保证和平民主同盟”成立时，阿巴索夫作为三区的主要领导人之一，连组织委员（相当于中央常委）都没有选上。另据邓力群回忆，当时苏联领事对李泰玉也极为不满。总之，苏联绝对不允许外人插手三区事务。[①]

当然，苏联并没有满足于对三区的控制，而是密切注视着局势的变化，随时准备恢复在整个新疆的影响。苏联驻迪化副领事乌里马索夫于1947年8月15日召集苏籍人士谈话时说:“勿以目前迪化市现状而灰心，不久我们苏联即可占领全新疆。”伊犁苏侨会主任吴国林（又名马力牙奴夫）也经常对苏侨讲：苏联对苏侨甚为关怀，你们前途已露曙光，一切困难即将过去。[②]

这样的时机终于来了。1948年，中国革命迅猛发展，国内局势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在这种情况下，苏联改变了对华策略，开始积极参与中国事务。当时国民党政府因关内战事紧急，已无暇顾及新疆，主持西北政务的张治中则力主撤换在新疆采取强硬政策的军政首脑宋希濂和麦斯武德，缓和与苏联的关系。苏联也希望趁此机会与新疆地方政府改善关系。1948年6月，苏联新任驻华大使罗申表示，中苏双方应先停止有碍睦邻友好的宣传，以促进新疆和平。10月10日，阿合买提江与外交部代表刘泽荣会晤，表示三区绝无脱离中国之意，愿以和平方式解决一切问题，并建议张治中今后谈新疆问题时，应特别注意外交关系。[③]莫斯科的意图很明确，即通过改善与地方当局的关系，走出三区，重新控制整个新疆。

五、议结新盟：保证苏联在新疆的特殊利益

正在苏联试图与新疆地方当局恢复友好合作关系的时候，又出现了两个新情况，迫使苏联再次调整对新疆的政策。

一个情况是，到1949年初，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斯大林遂派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专程到西柏坡与中共领导人会谈，详细地了解了中共的政策和主张，而后决定了支持中共夺取全国政权的战略。毛泽东则派刘少奇秘密访问莫斯科，商议新中国与苏联结盟的具体事宜，并公开宣布了未来新中国向苏联“一边倒”的外交方针。[④]

---

① 笔者1998年8月31日采访陈锡华记录；10月13日采访邓力群记录。

②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馆，全宗1，目录2，卷号35，第37、89–90页。

③ 新疆三区革命史编纂委员会:《新疆三区革命大事记》，第272–273、282页。

④ 详见沈志华:《毛泽东、斯大林与韩战》第三章“走向莫斯科——中苏同盟的基础条件和目标”。

另一个情况是，美国开始插手新疆事务，试图与当地反动力量勾结，加强美国在那里的影响。1948 年 6 月，在美国驻迪化副领事马克南策划组织下，成立了以乌斯满为首的反共反苏反三区革命委员会。[①]1948 年 10 月间，新疆省主席麦斯武德、政府秘书长艾沙与美国驻迪化总领事包懋勋秘密商议，为了保证新疆不落入中共或三区手中，应成立“泛土耳其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求得独立。美国率先予以承认，再由美国出面游说中东各国承认，并迅速建立外交关系，造成既成事实。1949 年 5 月，包懋勋进一步确定了新疆独立的具体方案，同时策动坚决反共的新二师师长叶成掌握新疆军权，还积极与马步芳、尧乐博斯和乌斯满等地方反动势力联络，妄图全面控制新疆。[②]

这时的新疆，国民党政权大势已去，美国企图乘虚而入，而莫斯科碍于国际舆论又不便公开干预。在这种情况下，帮助新盟友中共迅速接管新疆，显然是保证苏联利益的最佳方案。为此，莫斯科立即采取了积极措施。[③]

当时，在毛泽东进军全国的棋盘上，新疆尚未列入战略进攻的主要方向。1949 年 5 月 23 日，中央军委在关于各野战军进军部署的电报中指示，年底以前占领兰州、宁夏和青海，1950 年春“开始经营新疆”。6 月 26 日，毛泽东又致电指挥西北作战的彭德怀，如进展顺利，可于“明年春季或夏季占领新疆”。7 月 20 日彭德怀报告，已消灭胡宗南 5 万余人，计划“明春夏入新疆”。[④]然而，斯大林对这样的安排很不放心。对美国势力渗透新疆的忧虑，使苏联不得不向中共提出及早进军新疆的迫切要求。根据俄国档案文献记载，在 6 月 27 日，即刘少奇到达莫斯科后中苏两党举行的第一次会谈中，斯大林就提出，“不应当拖延占领新疆的时间。因为拖延会引起英国人对新疆事务的干涉。”斯大林认为中共过高估计了马步芳的骑兵部队，并表示愿意提供 40 架歼击机，帮助中共军队迅速入疆。[⑤]

毛泽东非常重视斯大林的建议，立即要刘少奇通知斯大林，中共同意尽快占领

---

① 新疆三区革命史编纂委员会：《新疆三区革命大事记》，第 273 页。

② 魏锡熙：《我在新疆和平解放前后的种种活动》，《新疆文史资料选辑》第 22 辑，第 135、138–139 页。

③ 前面所引朱培民的文章比较详细地讲述了苏联如何帮助加快实现新疆和平解放的，本文除补充一些新的材料外，着重要说明斯大林此举的背景和初衷。

④ 毛泽东：《毛泽东军事文集》第 5 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年，第 591–592 页、625、645 页。

⑤ 斯大林与中共代表团的会谈纪要，1949 年 6 月 27 日，АПРФ（俄罗斯总统档案馆），ф.45, оп.1, д.328, л.1-7。根据中共中央代表团政治秘书邓力群的回忆，斯大林当时的说法是：英、美，特别是美国，在策划搞“土耳其斯坦共和国”。徐则浩访问邓力群记录，1993 年 7 月 23 日。笔者在此感谢徐则浩先生提供的经邓力群校正并签字的访问记录。

新疆，并希望刘少奇在莫斯科具体解决苏联提供空军援助和空运部队的问题。[①]此后，毛泽东于7月23日给彭德怀发去电报说，苏联“极盼早占新疆，彼可给以种种援助，包括几十架飞机助战”，建议彭德怀“冬季即占领迪化，不必等到明春”。[②]接着，毛泽东又致电斯大林说，中共“同意派邓力群去新疆，其任务是在那里建立和北平的无线电联络”，并通告他，如果战事进展顺利，今冬就有可能占领迪化，为此，正在考虑步行进军新疆的问题。[③]8月4日毛泽东进一步通知刘少奇、王稼祥：彭德怀报告，“8月底或9月初可能占领兰州，那时即可准备进取新疆”。[④]

进疆的任务迅速提前，而中共对新疆的具体情况却一无所知。根据邓力群的回忆和“力群电台”发出的电报看，为了让中共力量尽早占领新疆，苏联的确做了许多工作，提供了很大帮助。作为中共中央联络员，邓力群先后在联共（布）中央联络部和苏联驻伊犁领事馆人员的陪同下，于8月14日秘密到达伊宁。此前，驻伊宁的苏联顾问团已全部撤回国内，苏联驻伊宁领事阿里斯托夫接待了邓力群一行，并安排与三区领导人进行了会晤，他们表示“将尽一切力量”帮助邓完成任务。阿里斯托夫也表示“愿以同志关系”和邓“经常往来互相交换意见”。[⑤]

此期苏联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特别体现在和平解放新疆的问题上。尽管早在1949年4月张治中等国民党和谈代表决定留在北平之时，毛泽东已经考虑“用和平方法解决西北问题”了，[⑥]但中共当时既不了解三区的具体情况，与新疆当局也没有任何接触。而苏联方面在7月底8月初已经通过与陶峙岳、包尔汉的接触，了解到新疆当局有举行和平起义的意愿。8月中旬苏联总领事萨维利耶夫即对陶峙岳等人表态说：中国将于9月组成新政府，苏联即将予以承认，希望新疆方面及时主动转变。“局势已进入必须转变的阶段，不能有所犹豫了。”[⑦]这无疑对促进新疆的和平起义产生了作用。

---

① 刘少奇致斯大林的信，1949年7月6日，АПРФ, ф.45, оп.1, д.328, л.51-55。

② 毛泽东：《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第644页。

③ 毛泽东给刘少奇并转交斯大林的电报，1949年7月25日，АПРФ, ф.45, оп.1, д.328, л.134-140。

④ 毛泽东致刘少奇、王稼祥电，1949年8月4日。载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党史工作委员会、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政治部编：《新疆和平解放》，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46页。

⑤ 邓力群致中央电，1949年8月17日，8月23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馆，全宗14，目录3，卷号64，第100、46页。

⑥ 毛泽东致彭德怀电，1949年4月28日。毛泽东：《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第564页。

⑦ 张治中：《张治中回忆录》，第589页；陶峙岳：《陶峙岳自述》，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99页。转引自朱培民：《1943年至1949年苏联对新疆政策的演变》，第95页。

8月26日兰州解放，人民解放军日夜兼程，继续西进，迫使新疆军政首脑下决心举行和平起义。经过与新疆当局的联系，苏联副总领事叶谢也夫于9月2日亲往伊宁，并连续两次会见邓力群。叶谢也夫说，和平解放新疆的形势已经完全成熟，苏联保证国民党方面将无条件接受中共的和平条款，希望中共方面抓住时机，果断行事，立即设法开始谈判。叶谢也夫还几次建议邓力群迅速到迪化，直接与新疆当局接触，并表示苏联方面负责从中介绍，同时保证中共代表的绝对安全。经与叶谢也夫商议并报中共中央批准后，邓力群于9月15日秘密到达迪化，在苏联领事的大力协助下，与陶峙岳、包尔汉进行了正式谈判。不久，新疆国民党当局便通电宣布起义。①

当然，斯大林建议并帮助中共迅速占领新疆，也有为苏联利益考虑的一面。通过米高扬访华和刘少奇访苏，斯大林已经知道未来新中国的领导人在蒙古和东北问题上是有所考虑的。因此，莫斯科把新疆作为礼物奉献给新盟友，无非是希望毛泽东接受在外蒙古和东北问题上的既成事实。② 同时，这样做的结果也使斯大林在新疆问题上有了发言权，从而巩固和加强苏联在新疆的影响及特殊地位。惟其如此，苏联才一再坚持中国应把新疆的省会确定在伊犁。新疆和平解放后，苏联领事馆就曾向邓力群建议，新疆的省会应由迪化迁移到伊犁，其理由主要有两条：在政治上，伊犁是三区革命的策源地，民主干部大多集中在那里；在经济上，伊犁是苏新贸易的重要通道，而新疆经济的改善主要靠的是苏新贸易的发展。尽管邓力群表示兹事体大，个人不能表示意见，苏联方面还是坚持要他转告中共中央。全国解放以后，苏联驻新疆总领事又在一次欢迎来自北京的代表团的宴会上，公开提出这一建议。③

新疆对于苏联的特殊意义，在中苏最高领导人关于新的中苏同盟条约的谈判中也有明显体现。1949年底，毛泽东亲自前往莫斯科，经过一番艰苦的较量，终于迫使斯大林同意重新签订中苏同盟条约。④ 不过，引人注意的是，当周恩来率领庞

① 邓力群致中央电，1949年9月2日、3日；9月11日、13日、16日、19日、21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馆，全宗14，目录3，卷号64，第91–95；54–63页。另见邓力群：《新疆往事回忆》，载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党史工作委员会、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政治部编：《新疆和平解放》，第349–350页。

② 详见沈志华：《毛泽东、斯大林与韩战》第三章。

③ 邓力群致中央电，1949年10月4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馆，全宗14，目录3，卷号63，第6–7页；笔者1998年10月13日采访邓力群记录。

④ 关于这一看法，详见沈志华、冈察洛夫：《〈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愿望和结果——根据俄国解密的档案材料》，《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2、3期。

大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到达莫斯科时，由赛福鼎、邓力群等人组成的新疆省代表团已经先期抵达苏联，陪同的还有驻伊犁领事阿里斯托夫和地质考察团团长斯图德尼科夫。中苏两国政府进行外交谈判，同时还单独要一个省组团参加，这只能说明苏联对新疆是有特殊要求的。果然，在中苏双方确定了同盟条约的基本原则后，斯大林在谈到贸易条约时，似乎是漫不经心地问："我们是同新疆、满洲和其他省签订单独的条约还是同中央签订统一的条约？"斯大林知道新疆代表团就在莫斯科，当然是希望与新疆单独签约。毛泽东的回答是：同新疆的条约必须以中央政府的名义签，但同时可以和新疆有单独的协定。[①] 至于当时在毛泽东的心目中，条约和协定有什么不同的含义，现在不得而知。不过，在后来关于苏新贸易和在新疆开办两个中苏合股公司的谈判中，中国方面均以外交部副部长伍修权为首席代表，议定书也均由中央政府统一签署，只有文化协定是新疆代表团自己谈的。[②]

中苏谈判的结果，总的来说是苏联做出了重大让步，条约大体上是按照中方的意见签署的。[③] 为了保障苏联在东北和新疆的特殊利益，斯大林采取了最后的补救措施。在中苏谈判即将结束时，2 月 10 日莫洛托夫送来一个《补充协定》草案，其中规定在苏联远东地区和各中亚共和国领土上以及在中国的满洲和新疆境内不得向外国人提供租让，并不允许有第三国的资本或公民参与经营活动。对此，中方没有提出原则性的修改意见。为了安抚莫斯科，周恩来甚至还提出，中国准备采取经济措施，逐步减少外国公司和组织在东北和新疆境内从事的经济活动。[④] 虽然说苏联的这个要求确有干涉中国内政之嫌，但其目的无非是消除西方势力对新疆和东北的渗透，而这在当时对中国并没有什么坏处。在新疆和平解放前夕，除苏联以外，各国驻新疆的领事馆均已自行关闭，中国方面为此所做的只是要求阿富汗、巴基斯坦等国侨民限期放弃双重国籍。[⑤] 不过，《补充协定》的签订也清楚地表明，斯大林希望在中国政权更迭以后仍然保持苏联在新疆的特殊地位。

纵观 1944—1950 年苏联对新疆的政策趋向，时而与地方当局结好，时而同少

---

① 斯大林与毛泽东会谈记录，1950 年 1 月 22 日，АПРФ, ф.45, оп.1, д.329, л.29-38。

② 笔者 1998 年 8 月 31 日采访陈锡华记录；10 月 13 日采访邓力群记录。

③ 详见沈志华、冈察洛夫：《〈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愿望和结果》一文。

④ 维辛斯基致斯大林，1950 年 2 月 12 日，АВПРФ（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ф.07, оп.23а, п.18, д.234, л.64-69。这个材料说明以往人们认为中方坚决反对《补充协定》的看法是缺乏根据的。参见裴坚章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49-1956）》，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 年，第 25 页；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修订本），李海文整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 年，第 446 页。

⑤ 笔者 1998 年 10 月 13 日采访邓力群记录。

数民族联合；时而支持独立，时而强调自治；时而主张强硬，时而倾向缓和，但其目标始终是在中苏走向同盟关系的大前提下，从政治和经济上确保苏联在新疆的优越地位和特殊影响。尽管在对华政策中，新疆对于苏联的重要性排在外蒙和东北之后，但是，苏联对新疆的控制和影响仍然是不容忽视的，而这种影响直到新中国成立 10 年以后才陆续消除。

发表于《近代史研究》1999 年第 3 期

求之不易的会面：中苏两党领导人之间的试探与沟通

——关于中苏同盟建立之背景和基础的再讨论之一

关于中苏同盟建立的问题，是冷战国际史研究中的重大课题。其意义在于，1947 年冷战格局的形成固然是战后世界历史上值得注意的问题，但那毕竟还只是欧洲的事情。而 1950 年中苏同盟条约签订，则把冷战引向了亚洲，由于社会主义阵营在欧亚大陆连成了一片，以美苏为首的两大阵营的对抗便从大西洋扩展到西太平洋沿岸——冷战从此具有了全球意义。

近十几年来，由于俄国和中国档案的解密，关于同盟建立本身，即中苏同盟条约签订的过程及其内涵的研究，已经十分深入。虽然存在不同看法，但就史实而言，所存疑团已大体解开。[①]然而，关于这一同盟得以建立的背景和基础的研究，还显得比较粗浅。二十年来中国和西方学者一直在研究中共“一边倒”的政策，并

---

① 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可参见：沈志华、冈察洛夫：《〈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愿望和结果——根据俄国解密的档案材料》，《中共党史研究》1998 年第 2 期，第 39–60 页，第 3 期，第 46–70 页；杨奎松：《中苏国家利益与民族感情的最初碰撞——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为背景》，《历史研究》2001 年第 6 期，第 103–119 页；迪特·海因茨希：《中苏走向同盟的艰难历程》，张文武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 年；沈志华：《中苏条约谈判中的利益冲突及其解决》，《历史研究》2001 年第 2 期，第 39–55 页；沈志华：《关于中苏条约谈判研究中的几个争议问题——再谈冷战史研究中史料的解读与利用》，《史学月刊》2004 年第 8 期，第 57–68 页。笔者在最后一篇文章中列举了几个尚待继续研究的问题。

对其形成的历史背景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讨论。[①] 这里存在的问题主要是，由于资料的缺乏，上述研究基本上都是从中国政策或中美关系的角度，而没有或很少从中苏关系的角度进行探讨。即使涉及中苏关系，也都是比较粗略和笼统的描述。就研究对象而言，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陷。1995 年以来，俄国学者齐赫文斯基和列多夫斯基利用他们在俄国的特殊地位，发表了一些有关的档案文献。[②] 这本来是一个极好的从中苏关系角度切入问题的机会，但是，由于俄国文献披露的某些情况与中共以往实行的政策有出入，从而有些档案的真实性在中国受到许多人的质疑，这多少

① 在这方面比较有见地的论著，中国学者有资中筠:《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和发展(1945–1950)》，重庆：重庆出版社，1987 年；陶文钊:《美国对华政策与新中国“一边倒”决策》，《党的文献》1990 年第 5 期，第 80–86 页；牛军:《中苏同盟的起源》，《中国社会科学》1996 年第 2 期，第 183–184 页；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 年；刘建平:《毛泽东的美国观与新中国“一边倒”国际战略的形成》，《中国社会科学》1999 年第 5 期，第 155–171 页；牛军:《1945–1949 年的美苏国共关系》，《历史研究》2002 年第 2 期，第 84–103 页；章百家:《中共对外政策和新中国外交史研究的起步与发展》，《当代中国史研究》2002 年第 5 期，第 88–100 页；孔寒冰:《并非一方选择的结果——论新中国初期“一边倒”外交政策的产生》，《俄罗斯研究》2003 年第 3 期，第 81–87 页。西方学者有 John Carver, Michael Sheng, Odd Arne Westad, and Chen Jian, “Rethinking the Lost Chance in China”, in *Diplomatic History*, Vol.21 (Winter 1997), pp.71-115; Fredrick C. Teiwes, “The Establishment and Consolidation of the New Regime, 1949-1947”, in Roderick MacFarquhar, *The Politics of China:the Eras of Mao and Deng*,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5-86; Chen Jian, *Mao's China and the Cold War*, Chapel Hill &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1; John Carver, “The Opportunity Costs of Mao's Foreign Policy Choices”, in *the China Journal*, No.49, January 2003, pp.127-136; Chen Jian, “How to Pursue a Critical History of Mao's Foreign Policy”, in *the China Journal*, No.49, January 2003, pp.137-142。关于西方学者争论问题的介绍，详见陶季邑:《近年来西方学术界对新中国“一边倒”政策的研究述评》，《当代中国史研究》2005 年第 2 期，第 55–58 页。

② *Тихвинский С. Л.* Переписка И. В. Сталина с Мао Цзэдуном в январе 1949г.//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1994, №4-5, с.132-140; *Ледовский А. М.* Секретная миссия А. И. Микояна в Китай (январь-февраль 1949г.)//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1995, №2, с.96-111, №3, с.94-105; *Ледовский* Визит в Москву делегации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Китая в июне-августе 1949г.//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1996, №4, с.66-83, №5, с.84-94; Две телеграммы из переписки Мао Цзэдуна с И. В. Сталиным.//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2000, №6, с.117-122; Ещё раз о телеграмме Мао Цзэдуна И. В. Сталину от 30 ноября 1947г.//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2001г., №5, с.119-122.

妨碍了研究者对问题的继续讨论。[①]

当然，俄国学者当时披露的这批文件数量有限，未成系统，且引用和发表时常带有主观色彩，也是人们难以全面和深入展开研究的一个原因。[②] 这一情况在2005年有了很大改变。这一年，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编辑出版了《二十世纪俄中关系：文献与资料》第5卷（共2册），公布的是1946年至1950年初的苏联历史档案。再加上该书第4卷第2册（2000年出版）公布的1945年的档案，这三本档案集公布的1945—1950年中苏关系档案资料共815件之多，此外还有作为附录的几十个文件。[③] 其中有关中苏领导人接触的50份最新文件已译成英文在美国发表。[④] 在这方面，中国档案文献的公布也有了很大进展。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和中央档案馆于2005年和2008年分别出版了刘少奇（1949—1952年）和周恩来（1949—1950年）的文稿，其中涉及中苏关系的文献约400余件。[⑤] 另外，中国外交部档案的开放——其中涉及中苏关系的档案最多，也为学者提供了新的机会。在此基础上，研究者可以也完全应该从中苏关系变化的角度对中苏同盟建立的背景、基础和

---

① 例如，列多夫斯基关于米高扬秘密访华的文章发表后，因米高扬在报告中说中共曾提出掌握政权后将把民主党派赶下政治舞台的说法，与中共当时的实际做法及中共在党内文件中表述的对待资产阶级党派的立场完全不同，便有人撰文对此提出质疑，甚至直接否认俄国档案的真实性。见薛衔天、王晶：《关于米高扬访问西柏坡问题——评〈米高扬访华秘密使命〉》，《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3期；田松年：《与民主党派长期合作是中国共产党坚定不移的基本政策》，《党的文献》1999年第5期；沈正乐：《“米高扬报告”中关于毛泽东的一个重要思想质疑》，《中共党史研究》1999年第6期；张士义：《米高扬“报告”质疑》，《当代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1期。在笔者看来，毛泽东1947年11月30日电报说要像苏联一样实行一党制，只是在试探斯大林的态度。因为一直没有得到答复，在1948年3月30日的电报中毛泽东又说，其他党派将来参加中共组建的中央政府“是必要的和有益的”。斯大林在11月30日电报的那句话旁边划上双重竖线，说明他很注意这个说法，但他并没有答复毛泽东。直到毛泽东4个月后再来电改变了说法，斯大林才回电，对11月30日电说法表示怀疑，而完全赞同3月30日的主张。见1947年12月10日库兹涅佐夫给斯大林的报告，АПРФ, ф.45, оп.1, д.330, л.13-17//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2000, №6, с.118-120；1948年3月30日毛泽东致斯大林电，4月20日斯大林致毛泽东电，АПРФ, ф.45, оп.1, п.330, л.18-28, АПРФ, ф.39, оп.1, д.31, л.28-29, Т6331, №296, с.398-403, 411-412。

② 笔者依据当时的资料对毛泽东访苏问题的论述（沈志华：《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一章），就有诸多纰漏。

③ *Ледовский, Мировицкая Р. А.* (сост.)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XX веке,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Том IV,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1937-1945гг., Москва: Памятники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мысли, 2000; *Ледовский, Мировицкая, Мясников В. С.* (сост.)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XX веке,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Том V,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1946-февраль 1950, Москва: Памятники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мысли, 2005.

④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 Issues 16, Winter 2007/2008, pp.113-177.

⑤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1–4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1–3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

条件进行更加深入的讨论。

中苏同盟建立的首要条件就是中苏两党特别是其领导者之间的接触、了解和沟通，从这一点出发，笔者把同盟建立的过程分为三个步骤，第一步是1949年2月米高扬访问西柏坡，第二步是同年6—8月刘少奇访问莫斯科，第三步是1949年12月至1950年2月毛泽东和周恩来对苏联的访问。本文拟分两部分，依据最新的俄国和中国档案文献，首先讨论中苏两党领导人第一次接触的背景和由来，然后讨论米高扬访华、刘少奇访苏和毛泽东宣布向苏联"一边倒"的过程，从而说明中苏同盟得以建立的政治基础。

一、中共领导人转向莫斯科的背景和思考

确如以往研究者所认同的那样，在对日战争接近尾声的时候，毛泽东认为战后中国和中共所能指望得到的大国援助不是来自苏联，而是来自美国。在1944年夏天与美军赴延安观察组的接触中，毛泽东反复表达了这样的看法和意愿。7月23日第一次与美国外交官谢伟思见面时，毛泽东就不无用意地一再表示：中国共产党人"首先是中国人"。[①]一个月后，在8月23日的长谈中，毛泽东多次询问谢伟思美国对中共的看法和政策，并主动说，"俄国人在战争中遭受了巨大损失，将忙于他们自己的重建工作。我们不指望俄国人帮助。"还说，"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不过是主张民主和社会改革"，"甚至最保守的美国实业家在我们的纲领中也找不到任何值得反对的东西"。毛泽东在谈话中还多次强调，中共必须得到美国的帮助，必须与美国合作；对于美国来说，中共比国民党更容易合作；中共欢迎美国的民主制度，绝不会冒险采取反对美国的政策。当时，毛泽东并不避讳与美国人的接触，甚至事前将这种意向通知了莫斯科。在毛泽东看来，美苏本身的合作态势使得苏联"不会反对美国在中国的利益"，况且苏联与国民党的关系不好，因此"美国和中国共产党之间的合作对有关各方都将是有利和令人满意的"。[②]1945年3月谢伟思再次访问延安，毛泽东显示的决心就更大了，他又一次谈到中共与美国的长期关系，并坚

① 约翰·斯图尔特·谢伟思：《美国对华政策（1944–1945）："美亚文件"和美中关系史上的若干问题》，王益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196页；*FRUS,* 1944, Vol.6, p.608。

② 谢伟思与毛泽东的谈话，《党史通讯》1983年第20–21期，第5–12页；谢伟思：《美国对华政策（1944–1945）》，第218–229页。关于毛泽东向苏联通报的情况，见*Димитров Г.* Дневник (9 марта 1933-6 феврари 1949), София: Св. Климент Охридски, 1997, с.416-417。中译文见季米特洛夫：《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马细谱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88–290页。

持认为："美国不仅是帮助中国发展经济的唯一最合适的国家，而且也是完全有能力参与中国经济建设的唯一国家"；"共产党将继续寻求美国的友谊和谅解，因为它为中国的战后重建所需要"。[①]

然而，美国的态度令中共感到失望。1944年10月，中国战区指挥官史迪威将军因与蒋介石不和，被华盛顿解除职务，愤怒的史迪威甚至拒绝接受中国授予他的勋章。[②] 史迪威与蒋介石的主要矛盾之一就是对待中共军队的立场不同。[③] 而美国新任驻华大使赫尔利完全站在蒋介石一边，不仅否决了使馆年轻官员们提出的一系列主张美国支持中共，并保持与中共联系的政策性建议，而且将谢伟思调回国内。[④] 此后，中共曾一度把希望寄托在苏联方面。1945年4月中共召开七大时，毛泽东宣布："苏联，毫无问题是朋友，是中国人民最好的朋友。"[⑤] 中共对苏军占领东北寄予很大希望。毛泽东在1945年11月19日和20日连续给派往沈阳工作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彭真发去两封电报，指示他"请求我们的朋友，让他们尽可能地拖延国民党军队进入满洲的时间"。在谈到苏联军队延期撤出的时候，毛泽东指出：这样做"对我们有利，因为在一个月的时间里我们正在进发的部队和干部就完全能够赶到满洲"。[⑥]

不料，苏联进军中国东北后，在国共之间左右摇摆，只是在困难和需要的时候才支持和帮助共产党，这引起了毛泽东对苏共的不满和疑虑。[⑦] 在这种情况下，当赫尔利辞职、马歇尔作为美国总统的特使来华调停国共内战时，中共再次燃起了对美国的希望。1946年1月30日周恩来向马歇尔转达了毛泽东的口信。毛认为马歇

---

① 谢伟思与毛泽东的谈话，《党史通讯》，第14–18、19–22页；谢伟思：《美国对华政策（1944–1945）》，第229–230、231–232页。

② 约瑟夫·W.史迪威：《史迪威日记》，黄加林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第300页。

③ 参见巴巴拉·塔奇曼：《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万里新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年，第493–518页。

④ 详见约瑟夫·埃谢里克：《在中国失掉的机会——美国前驻华外交官约翰·S·谢伟思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报告》，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第270–317页；谢伟思：《美国对华政策（1944–1945）》，第1–4页。尽管谢伟思在1945年4月躲过了一劫，但1950年3月终于在麦卡锡主义的阴影中被捕入狱。关于这批年轻的职业外交官，包括约翰·谢伟思、约翰·戴维斯和约翰·文森特、雷蒙德·卢登等人，以及迪克西使团团长包瑞德上校的详细情况，还可参见伊·卡恩：《中国通——美国一代外交官的悲剧》，陈亮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0年。

⑤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320页。

⑥ Архив МО СССР（苏联国防部档案馆），ф.210, оп.3173, д.144, л.227-228，转引自 *Агеенко К. П.* Военная помощь СССР в освободительной борьбе китайского народа, Москва: Вопниздат, 1975, с.99。

⑦ 笔者对这一问题的最新研究详见沈志华：《斯大林与中国内战的起源（1945–1946）》，《社会科学战线》2008年第10期，第115–131页。

尔对停火问题的处理是公平的，中共愿意同美国在公平的基础上进行合作。周恩来说，中共的长远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但现在还没有条件这样做。在现阶段，中国将走民主和科学的道路，向美国学习农业改造和工业化，以建立一个独立、自由和富强的中国。周恩来还告诉马歇尔，当有传闻说毛泽东要去莫斯科休养时，毛认为这一传闻很可笑。毛说，如果他身体不好，他宁愿去美国，在那里可以学到许多东西。[①]不过，同 1945 年相比，此时中共对美国的态度更具策略性的意义，其基本的立场是“中立美国”，“逼美压蒋”。因而，当马歇尔不得不放弃调停回国后，中共感觉到美国已经彻底转变到“扶蒋反共”的立场，并最终采取了敌视美国的态度。[②]放弃了对美国的幻想，又无法取得苏联的支持，[③]面对愈演愈烈的内战局面，中共不得不破釜沉舟，走上了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

到 1947 年，中国局势和国际格局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在中国，国共内战的局面出现了根本性的转变。1947 年初国民党对共产党进行了全面进攻，甚至一度占领了延安，但仅半年之后，中共便渡过了难关，并在军事上开始转守为攻。到年底，中共军队已经在战场上取得了明显优势。[④]在 1947 年 12 月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指出，“从现在起到明年一年内，国内形势还会有很大的变化，有利于我们的变化。中国革命已经进入高潮，将来还会更加高涨。”在这种情况下，中共要把战争“不间断地进行下去”，并准备反对蒋介石的和谈阴谋。对于国外的援助（当然是指苏联的援助），中共历来的方针是不能依赖，但不是不要。[⑤]1948 年 9 月 13 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到中国未来的发展时说，“关于完成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的准备，苏联是会帮助我们的，首先帮助我们发展经济”，

---

① 章文晋：《周恩来和马歇尔在 1946 年》，《中华英烈》1988 年第 2 期，第 13 页。章当时任周恩来的秘书兼翻译。

② 关于中共在马歇尔调停时期的立场和政策分析，中国学者已有非常深入和到位的研究，详见章百家：《周恩来与马歇尔使命》，《近代史研究》1997 年第 4 期，第 184–213 页；牛军：《论马歇尔调处时期国共两党的对美政策》，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划时代的历史转折——“1949 年的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 年，第 139–157 页。

③ 苏联红军撤离中国后，毛泽东告诫在东北指挥作战的林彪，内战既开，应“全靠自力更生”。又嘱咐即将赴苏联治病的罗荣桓：“东北斗争主要靠自力更生”，勿向苏方提出“过高与过多要求”；而“关内应完全靠自力更生”，不能向苏方提“任何要求”。1946 年 6 月 25 日毛泽东致林彪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 4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年，第 134–135 页；1946 年 7 月 30 日中共中央致罗荣桓电，转引自金冲及：《毛泽东传（1893–1949）》，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 年，第 772 页。

④ 关于 1947 年中国局势变化的过程，金冲及先生有非常全面和深入的论述。见金冲及：《转折年代——中国的 1947 年》，北京：三联书店，2002 年。

⑤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 4 卷，第 329–330 页。

因为中国“在经济上完成民族独立，还要一二十年时间”。[①] 所以，无论当前的革命斗争还是未来的社会发展，中共都需要苏联的帮助。

在国际上，从杜鲁门宣言的发表，马歇尔计划的提出，直到共产党、工人党情报局的建立，美苏双方先后放弃了战后大国合作的政策，冷战终于在欧洲爆发。斯大林构造了以莫斯科为中心的社会主义阵营，就是要团结世界上一切革命力量来对抗美国和西方阵营。中共及其武装当然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不过，在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决定与美国分庭抗礼，但斯大林最初的战略是外线防御、内线进攻，即对美国和西方采取保守和防御的策略，而集中力量对阵营内部进行整肃，统一思想和步调，以稳定与西方抗衡的阵脚。斯大林拒绝正在领导国内武装斗争的希腊共产党参加共产党情报局，日丹诺夫在情报局会议上关于国际形势的著名报告对如火如荼的中国革命斗争轻描淡写，特别是斯大林因铁托在巴尔干联盟和援助希腊问题上的鲁莽行动而最终决定将南共开除出情报局，这一切都表明苏联的冷战战略不具进攻性，且希望避免和推迟与美国的直接冲突。[②] 正是在这样复杂和多变的背景下，出现了中苏两党领导人都感到需要相互接触却又未能及时会面的矛盾现象。

二、毛泽东急于取得莫斯科的理解和支持

关于毛泽东与斯大林会面的问题最初是如何提出的，中俄两国当事人有不同的说法。师哲回忆说，斯大林听信了西方通讯社消息，以为中共在内战中“损兵折将，溃不成军”，甚至贺龙、江青都已被俘。于是决定派飞机接毛泽东等主要领导人去苏联避难。[③] 列多夫斯基则认为，毛泽东访问莫斯科的问题最初是由中方在1947年初提出来的，但原因也是中共“在所有的战线上都遭到了严重失败”，中共中央总部延安也被敌人占领，“为了避免全军覆灭，毛泽东非常需要苏联给以更积极、更广泛的帮助”。[④] 列多夫斯基和其他俄国学者在后来的研究中转向了师哲的

---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46页。

② 笔者关于这一论点的详细论述见沈志华：《斯大林的“联合政府”政策及其结局》，《俄罗斯研究》2007年第5期，第71–77页，第6期，第77–85页；沈志华：《共产党情报局的建立及其目标——兼论冷战形成的概念界定》，《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3期，第172–187页；沈志华：《对1948年苏南冲突起源的历史考察》，《历史研究》1999年第4期，第5–26页。

③ 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李海文整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第345–346页。

④ *Ледовский* Переговоры И. В. Сталина с Мао Цзэдуном в декабре 1949г.-феврале 1950г., Новые архивные документы.//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1997, №1, с.23.

说法，即毛泽东访苏是斯大林主动提出的，其目的就是要他到苏联去“政治避难”。[①] 然而，这些说法很值得怀疑。当时莫斯科与延安和南京的电报联系非常频繁，斯大林随时都可以通过在中共中央的联络员和驻华使馆了解中国局势，根本不可能相信西方报纸的传言。考虑到后文将要提到斯大林屡次推迟毛泽东访苏日期的情况，也很难想象斯大林会在这个“危机”的时候引火烧身。至于毛泽东为避免“全军覆灭”而向苏联求救的说法，更是无稽之谈。中共对国民党的全面进攻早有准备，并做了周密部署，撤出延安也是主动做出的策略性安排，又何必要去莫斯科搬救兵。况且，毛泽东和斯大林都应该明白，如果中共真的到了这种地步，苏联是不会插手的，即使给予援助也是于事无补。

目前看到的档案文献尚无法对这一问题做出具体判断，不过，笔者倾向于认为，当时中苏双方都有实现领导人直接会面的愿望。中共无疑是需要苏联援助和支持的，其根本原因应该是担心中国局势的变化引起美国的干预。当中共感到胜利在望的时候，不会不考虑可能阻碍这一前途的各种因素，而其中最有可能帮助蒋介石起死回生的就是美国的直接干涉，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唯一可以借助的当然是苏联的援助。[②] 而以毛泽东的性格来说，只有在取得一定优势的情况他才会请求帮助。如前所述，1944 年毛对美国的态度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在四平保卫战中，毛泽东要求林彪拼死奋战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做给斯大林看的，以求得莫斯科的援助。[③] 而要取得苏联的支持和援助，首先必须得让斯大林了解和信任自己。因此，毛泽东需要亲自去莫斯科。斯大林当然也需要了解毛泽东和中共，特别是在欧洲已经分裂为两大阵营的时候，亚洲的局势是莫斯科不得不考虑的重大问题。1948 年 5 月，当斯大林收到毛泽东一封请求援助的电报后，对即将去中国修复东北铁路的交通部副部长科瓦廖夫说：“我们当然要给予新中国一切可能的援助。如果社会主义在中国胜利，我们的一些国家也将走上这一条道路，那就可以认为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有了保障，我们就不会受到任何偶然事件的威胁。因此，为了援助中国共产党人，我们不能吝惜力量和金钱。”[④] 不过，斯大林的顾虑要多一些，因为苏联的目标

---

①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XX веке, Том V, Книга 2, с.522.

② 1947 年 12 月 25 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很能反映出他的这种考虑：“美国直接出兵帮蒋介石打内战的可能性很小，但也不能说完全没有，美国人只是怕苏联也出兵，否则对我们来个不宣而战他们是不在乎的。战争的时间还要准备四五年，也可能还要长一些。”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 4 卷，第 328–339 页。

③ 详见杨奎松：《一九四六年国共四平之战及其幕后》，《历史研究》2004 年第 4 期，第 132–152 页。

④ *Ковалев И. В.* Диалог Сталина с Мао Цзэдуном//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1992, №1, с.79.

是既要保证东方战线的安全，又不能与美国发生直接的冲突。无论如何，斯大林在1947年6月第一次表示同意毛泽东访问莫斯科。

6月15日，在毛泽东身边的苏共中央[①]联络员捷列宾接到莫斯科来电："请转告毛泽东，联共（布）中央认为，关于他前来莫斯科的事情不可走漏任何风声。如果毛泽东认为这样做是必要的，那么，我们认为最好取道哈尔滨前来。如果需要，我们可以派飞机前往。"[②]得此消息后，中共中央立即开始准备，命令迅速在山西的临县、兴县和岚县等地设法修整或新建一个简易机场，以便迎接苏方的飞机。[③]然而，未等机场修好，7月1日，捷列宾又接到另一封电报："您有关毛泽东事宜和有关前线形势的报告已收到。鉴于目前进行的战役，毛泽东离开可能会对战事带来不利影响。我们认为暂时推迟毛泽东的来访是适宜的。"[④]斯大林这样说当然是一种托辞，恐怕还是担心毛泽东访苏会走漏风声，这很可能也与马歇尔计划有关——此时莫洛托夫正领着一支庞大的代表团，在巴黎参加有关援助项目的会谈。不过，似乎是明白毛泽东的用意，7月14日斯大林作为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签署了一项决议，要求各部和主管部门于1947年11月1日前向外贸部提供一批出口计划外的工业品、设备和原材料。这批准备提供给东北民主联军的物资包括汽车400辆、各种功率的电动机60台、军用整流器2000台、不同用途的电话机3200台、军用电缆5万米、棉布1万米，以及电台、收发报机、药品和医疗设备等，其中大量物资是减少了苏联国内的供货计划而转为出口的。7月21日，苏联部长会议又作出一项准备在1949年向东北民主政府提供出口物资的决议，其中包括3000辆运输汽车、1500吨航空汽油、2.38万吨车用汽油、1443台电动机等。[⑤]这些援助未必能满足毛泽东的要求，但多少也表示了苏联的意向。

两个月后，9月1日，毛泽东通过捷列宾向斯大林转交了一份电报，其中报告说，至1947年6月，中共已歼灭敌军112万人，这一胜利"为彻底粉碎敌人的力

① 此时直到1952年十九大，苏共的正式名称应为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简称联共（布）。为叙述方便，本文在一般情况下使用"苏共"一词。

② 1947年6月15日库兹涅佐夫致捷列宾电，АПРФ, ф.39, оп.1, д.31, л.23,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XX веке, Том V, Книга 1, с.327。库兹涅佐夫时任苏联国防部情报总局局长，捷列宾是阿尔洛夫的化名，其公开身份是毛泽东的医生。

③ 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第345页。

④ 1947年7月1日库兹涅佐夫致捷列宾电，АПРФ, ф.39, оп.1, д.31, л.24,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XX веке, Том V, Книга 1, с.333。

⑤ 1947年7月14日、21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团决议和附件，АПРФ, ф.45, оп.1, д.330, л.1-4,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XX веке, Том V, Книга 1, с.341-344。

量和夺取胜利奠定了基础”。[①]11月30日毛泽东在另一封电报中说：7月至10月，人民解放军又消灭了国民党正规军38.5个旅，包括非正规军在内共歼灭敌军45.2万人，并俘虏了53名将军。“我军已将主动权掌握到自己的手中。人民解放军以50个旅40万人挺进到黄河和长江之间的地区。我军在这个区域赢得了当地居民的拥戴。”[②]12月，毛泽东又给斯大林发了一封电报，强调中国形势将发生根本变化，革命战争已经转入反攻阶段，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③]这一连串的捷报显然打动了斯大林，看起来是需要尽快与毛泽东见面谈谈了。

12月16日，莫斯科通知捷列宾，关于毛泽东访问事宜请转告他，“苏联政府欢迎毛泽东前来苏联访问”，并会保证他与国内的通讯联络。[④]以苏联政府而不是苏共中央的名义邀请毛泽东，说明斯大林很看重这次会面。第二天捷列宾回电说，他早上7点30分向毛泽东本人转告了电报的内容。毛听后“十分满意”，并当即说：“很好，现在我可以在那里呆上3个月、半年。”毛说，他54岁了，早就想去苏联，几乎所有的领导人都已经去过那里，如周恩来、任弼时、彭德怀、叶剑英、王明等。至于动身的日期，毛泽东认为，解放军占领平绥路后就可以出发了，现在要击溃蒋介石，不能让他有喘息的机会。捷列宾还报告说，毛在谈话时显得“十分活跃，非常满意”。[⑤]

1948年3月15日毛泽东向斯大林报告说，中共将在东北开展大规模战役，以攻占沈阳和长春，在华北则已经形成了以石家庄为中心的新解放区。在军事上，中共军队已发展到249万人，并计划平均每个月歼灭国民党正规军8个旅，或一年100个旅，这样，“在5年或稍长一点的时间里（从1946年7月算起），全歼国民党军队的可能性是存在的”。[⑥]在如此乐观的情绪下，毛泽东决定提前动身。4月22日，周恩来和任弼时通知捷列宾，毛泽东准备5月初前往莫斯科，随行的只有

① 1947年9月29日库兹涅佐夫给斯大林的报告，АПРФ, ф.45, оп.1, д.330, л.5-9,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XX веке, Том V, Книга 1, с.364-367。档案集原文标注的馆藏页码为3–9，笔者对比前后的档案文件，怀疑此处有笔误，故做此改动。

② 1947年12月10日库兹涅佐夫给斯大林的报告，АПРФ, ф.45, оп.1, д.330, л.13-17//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2000, №6, с.118-120。

③ 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第351页。

④ 1947年12月16日库兹涅佐夫致捷列宾电，АВПРФ, ф.39, оп.1, д.31, л.25,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XX веке, Том V, Книга 1, с.378。

⑤ 1947年12月17日捷列宾致库兹涅佐夫电，АВПРФ, ф.39, оп.1, д.31, л.26,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XX веке, Том V, Книга 1, с.378。

⑥ 1948年3月30日库兹涅佐夫给斯大林的报告，АПРФ, ф.45, оп.1, п.330, л.18-28,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XX веке, Том V, Книга 1, с.398-403。

江青、他的女儿和翻译师哲。捷列宾要求莫斯科迅速给予答复。[①] 未等斯大林回电，4 月 26 日，毛泽东又亲自致电斯大林，详细说明了他的安排，即 5 月初从河北阜平出发，7 月初或中旬到达哈尔滨，然后从哈尔滨到莫斯科。毛泽东还打算带任弼时、陈云及两名秘书、几个密码译员和无线电报务员同往。毛说："我想就政治、军事、经济及其他重要问题，广泛听取联共（布）中央同志的建议和指导；另外，如果您同意的话，我们计划在苏联实地考察有关军事、经济、政府及政党的问题。"毛泽东还提出，希望能"到东欧和东南欧国家走一走，考察那里人民阵线的工作和其他工作"。此行大约 1—3 个月。毛最后说，如果这一计划不被接受，他将只身前往。[②] 如果说 1947 年毛泽东还没有做好出访苏联的准备，那么这一次他可是急切地要见到斯大林了。

4 月 29 日斯大林亲自复电毛泽东："您 4 月 26 日的来信已收到，同意您来苏联的计划。您想带谁来，您认为需要带几个人来都可以。"[③] 但没过几天，5 月 10 日斯大林又发电报给毛泽东，以战局发展和安全为由，建议推迟动身日期。不过，斯大林客气地说："如果您决定不延迟动身日期，请您通知我们，在您的旅途中我们是否能协助一下。我们把我们的飞机派给您，这样做，您认为是否合适。如果同意，请告诉我们，何时把飞机派到何处。"同日，毛泽东复电接受了延期访问的建议，但他提出的理由是：自己近来身体不好，不宜乘坐飞机。[④] 斯大林的犹豫，很可能与莫斯科得到的有关美国在华动向的分析有关。在苏共中央联络部 1948 年 1 月 23 日准备的有关中国局势的报告中，特别分析了魏德迈使团来华后美国对蒋介石进行军事援助的情况，以及美蒋"援华协定"和"海军协定"的内容。报告认为，"考虑到蒋介石政权将要垮台这个事实，并确信他已经没有能力完成美国统帅部的军事计划，美国不仅把一切事情的实际管理权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尤其是给国民党军队提供军事装备的事务，而且还准备了自己的侵略中国的武装力量。"报告的结论是：

---

① 1948 年 4 月 22 日捷列宾致莫斯科电，АПРФ, ф.39, оп.1, д.31, л.27,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XX веке, Том V, Книга 1, с.412-413。

② 1948 年 4 月 26 日毛泽东致斯大林电，APRF, f.39, op.1, d.31, pp.45-46, in Westad (ed.), *Brothers in Arms: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Sino-Soviet Alliance (1945-1963)*,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299-300。俄国文献在注释中提到了这个文件（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XX веке, Том V, Книга 2, с.521-522），但所说电报日期是 4 月 16 日。根据电报内容判断，俄国文献所标日期有误。

③ 1948 年 4 月 29 日斯大林致毛泽东电，АПРФ, ф.39, оп.1, д.31, л.32,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XX веке, Том V, Книга 1, с.417。

④ 1948 年 5 月 10 日斯大林致毛泽东电，5 月 10 日毛泽东致斯大林电，АПРФ, ф.39, оп.1, д.31, л.33, 34,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XX веке, Том V, Книга 1, с.419, 421。

美国“正在中国准备武装侵略行动”，英国也在策划“某种暂不明朗”的行动。[①] 后来斯大林是否掌握了进一步的情报，不得而知，但在此时担心苏联接待毛泽东会刺激美国，则是很可能的。

7 月 4 日，毛泽东通知斯大林，两个月来他的健康状况已经好转，故决定最近几日动身前往苏联，同行的有 20 人。毛泽东希望苏联派两架飞机到石家庄或大连附近来接他，然后经哈尔滨去莫斯科。7 月 14 日斯大林让捷列宾转告毛泽东：由于粮食收购工作已经开始，苏联领导人自 8 月起分赴各地，要在那里一直工作到 11 月。为了有可能和所有的领导同志会面，联共（布）中央委员会请毛泽东把来莫斯科的行程改到 11 月底。[②] 同日，毛泽东让捷列宾转交了回电，同意把访苏日期推迟到 10 月底 11 月初。这次毛泽东没有完全听从斯大林的安排，表明他已经很不高兴了。据捷列宾 7 月 17 日的报告，毛泽东对于再次推迟行程感到意外，并对斯大林提出的理由颇不以为然。为这次出行，毛泽东已经做好一切准备，不仅整理了大量的资料和地图，甚至连手提箱都收拾好了，还特意买了皮鞋，缝制了厚呢大衣。回电发出后毛又对捷列宾说，他深信必须现在出访。[③]

斯大林决意把毛泽东的行程推迟 4 个月，当然不是为了收麦子。根据目前掌握的资料看，斯大林改变主意恐怕还是与美国有关。一方面，1948 年 6 月封锁柏林而导致的危机正处在关键时刻，莫斯科的注意力自然被吸引到欧洲。[④] 另一方面，斯大林也在密切观察美国对华政策的变化。4 月 2 日，苏联新任驻华大使 Н. В. 罗申提交了对中国国内局势的报告，其中谈到，在中共武装力量的打击下，“国民党政权已经不稳固，但是还没有达到灭顶之灾的地步”。蒋介石担心中共军队进一步向内地渗透，已准备撤离首都，并与美国人一起在华南建立根据地。值得注意的

① 《关于九国共产党会议之后中国的局势》（1948 年 1 月 23 日），РЦХИДНИ（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和研究中心），ф.17, оп.128, д.1173, л.1-37，沈志华、李丹慧收集和整理：《中苏关系：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第 19 卷，存华东师范大学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未刊，第 40–77 页。

② 1948 年 7 月 4 日毛泽东致斯大林电，7 月 14 日斯大林致捷列宾电，АПРФ, ф.39, оп.1, д.31, л.35-36, 37,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XX веке, Том V, Книга 1, с.445-446, 447。

③ 1948 年 7 月 14 日捷列宾致斯大林电，7 月 17 日捷列宾致库兹涅佐夫电，АПРФ, ф.39, оп.1, д.31, л.38, 39-40,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XX веке, Том V, Книга 1, с.447-448, 448-449。时隔多年，毛泽东对此依然耿耿于怀。据毛的警卫员叶子龙回忆，1948 年春毛曾兴奋地说：“太阳出来了，我要与斯大林同志谈谈东方日出的问题。”结果，毛泽东未能成行。在 1949 年 12 月赴莫斯科途中，毛在专列上又对叶子龙谈到太阳：这个太阳在延安没看到，在西柏坡也没看到呢！叶子龙：《叶子龙回忆录》，温卫东整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 年，第 172–173 页。

④ 关于柏林危机的研究参见 *Наринский М. М.* Берлинский кризис 1948-1949гг., Новые документы из российских архивов.//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1995, №3, с.16-29。

是，面临危机，美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挽救和加强蒋介石政权，其基本目的是挫败和消灭民主力量，奴役中国，把中国变成反苏的军事基地。[①]5 月 10 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指示驻华使馆，与反政府人士接触必须“依据 1945 年签订的苏中条约和不干涉中国内政的原则”；密切注意美国人在华活动，揭露美国援助蒋介石的资料和事实。[②]6 月中旬，苏联还推迟了中国解放区一批工人和工会干部到苏联学习的日期。[③]

两个星期后，7 月 28 日，迫不及待的毛泽东再次对苏共中央联络员说，在 1947 年，他本来并不急于去莫斯科，但现在 1948 年形势变了，他想快点到莫斯科去。还说，他在莫斯科有许多事情要谈，还要寻求苏联的建议和帮助。毛泽东列举了有关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几个方面的问题，最后强调说，在所有这些问题上“必须谈妥，以便使我们的政策方针与苏联保持完全一致”。[④] 但斯大林迟迟没有答复。9 月 28 日，毛泽东在给莫斯科的电报中又一次表示：有许多问题需要亲自向联共（布）中央和斯大林汇报，并真心地希望给予指示。[⑤]10 月 17 日斯大林答复，同意毛泽东前来。不过，会面的时间还是安排在 11 月底。[⑥] 这无疑伤害了毛泽东的自尊心，或许是为了找回面子，毛泽东提出，现在陆路和水路都不行了，莫斯科必须派飞机来，而且最合适的时间是 11 月中旬。捷列宾还报告说，“在最近的半个月里，每逢遇见，在方便的场合，毛泽东就再三强调，他必须出发，他已准备好出发，他将准时到达。”斯大林不好再推托，只得同意 11 月中旬将派两架飞机来接毛泽东一行。[⑦]

然而，11 月中旬莫斯科的飞机并没有到来。这次毛泽东真有些受不住了，便主动提出了延期。11 月 21 日，毛泽东声称因“偶有微恙”和战事紧迫，他决定 12

---

① 1948 年 4 月 2 日罗申致马立克电，АВПРФ, ф.018, оп.10, п.24, д.21, л.9-10，沈志华、李丹慧收集和整理：《中苏关系：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第 6 卷，第 1245–1250 页。

② 1948 年 5 月 10 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给苏联驻华使馆的指示，АПРФ, ф.3, оп.65, д.1, л.362,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XX веке, Том V, Книга 1, с.419-421。

③ 1948 年 6 月 17 日维辛斯基致库兹涅佐夫函，АВПРФ, ф.0100, оп.41, п.277, д.48, л.9,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XX веке, Том V, Книга 1, с.437。

④ 1948 年 7 月 28 日捷列宾致库兹涅佐夫电，АПРФ, ф.39, оп.1, д.31, л.41,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XX веке, Том V, Книга 1, с.451-452。

⑤ 1948 年 9 月 28 日毛泽东致莫斯科电，АПРФ, ф.39, оп.1, д.31, л.42,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XX веке, Том V, Книга 1, с.463。

⑥ 1948 年 10 月 17 日斯大林致捷列宾电，АПРФ, ф.39, оп.1, д.31, л.43,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XX веке, Том V, Книга 1, с.468。

⑦ 1948 年 10 月 17 日捷列宾致库兹涅佐夫电，10 月 21 日库兹涅佐夫致捷列宾电，АПРФ, ф.39, оп.1, д.31, л.44-45, 46,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XX веке, Том V, Книга 1, с.468-469, 472。

月再动身去莫斯科。对此，斯大林表示理解，并说随时准备派飞机去接他。[①] 到12月底，毛泽东又通知莫斯科说，平津战役和淮海战役正在进行，而且中共中央最近准备召开一次会议，待会议结束他再去莫斯科。随后，毛泽东向斯大林通报了淮海战役和平津战役顺利进展的情况，且不无得意地说，“目前形势的发展比9月初我们在中央会议上预计的要快得多”，到1949年底就可以基本上推翻国民党的政权。[②] 斯大林在1949年1月6日的复电中回避了访苏的问题。或许是感觉到斯大林的不快，毛泽东立即向捷列宾解释说，中央会议还要开3—4天，之后准备1月20日去莫斯科，并于2月底回国。两天后毛泽东直接致电斯大林说，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已经结束，要求苏联10天后派两架四引擎飞机直接来石家庄接他，而且希望最好在清晨到达，因为这样安全一些。[③]1月10日，毛泽东又向莫斯科发出一封电报，一方面报告说，解放军主力部队春季休整，夏季南下，“最迟7月底或8月初，150万解放军正规军将横渡长江”；一方面再次表达了急于前往苏联的愿望：“我们期待您派飞机来接我们去莫斯科。现在我们急需前往您处”，向联共（布）中央汇报工作，“并听取您对中国革命一系列重要问题的指示”。[④]

就在这时，又发生了一件事，再次妨碍了毛泽东的莫斯科之行。

三、斯大林有意调停国共和谈与毛的激烈反应

1949年1月8日，国民党面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陈兵长江的危急局势，要求美国、英国、法国和苏联出面调停国共关系，实现和谈，以便争取时间，卷土重来。[⑤] 毛泽东的既定方针是“必须将革命进行到底”，“准备召开政治协商会议，

---

① 1948年11月21毛泽东致斯大林电，11月22日斯大林致毛泽东电，АПРФ, ф.39, оп.1, д.31, л.47, 48,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XX веке, Том V, Книга 1, с.482, 482-483。

② 1948年12月20日毛泽东致斯大林电，АПРФ, ф.39, оп.1, д.31, л.49-52,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XX веке, Том V, Книга 1, с.495-497。

③ 1949年1月6日斯大林致毛泽东电，1月10日捷列宾致库兹涅佐夫电，1月9日毛泽东致斯大林电，АПРФ, ф.39, оп.1, д.36, л.53, 54-58, 59,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XX веке, Том V, Книга 2, с.7, 11-14, 10-11。

④ 1949年1月10日毛泽东致斯大林电，АПРФ, ф.39, оп.1, д.31, л.60-62,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XX веке, Том V, Книга 2, с.14-15。

⑤ 希望和谈是国民党方面的一致意见，但主张“运用外交使美苏英法对中国和平取得谅解并予以支持”，是李宗仁的主意，而蒋介石以为，外交部照会美英法苏四国政府，表明力主结束内战，“希其从旁协助；但不要求其斡旋或调解，以免干涉我国内政。”见李宗仁呈蒋中正建议书，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革命文献－国共和谈，台北：“国史馆”，典藏号002-020400-030-001；秦孝仪总编纂：《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七，下册，台北：中正文教基金会出版，1978年，第224页。

成立中央政府”。[①] 至于和谈，中共的主张是，和平谈判一定要进行，但不是同国民党政府谈判，而只是分别同有实力的地方政府和部队代表谈判，同他们或者是谈判停战，或者是谈判起义的条件，例如在北平同傅作义的谈判。通过在中共中央的联络员，斯大林对中共的立场是非常清楚的。[②] 然而，莫斯科还是明确表示了希望出面调停国共内战的想法。

俄国著名的汉学家齐赫文斯基在 1994 年公布了有关斯大林与毛泽东就苏联调停国共和谈的档案文献，并由此提出，以往认为斯大林有意调停国共和谈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③] 后来，俄国学者普遍认为，斯大林在 1949 年初根本就没有企图阻止中国革命的深入发展，也没有要促使国共和谈的意图。[④] 这些老一辈俄国学者为苏共立场辩护的初衷可以理解，不过，这里并非在讨论是非问题。其实，斯大林从苏共的立场出发考虑中国问题，主张谨慎从事，尽量避免引起美国干涉，也不是没有道理，但这里的根本问题是首先要把史实搞清楚。

斯大林要参与调停国共内战的想法早已有之。对苏联的安全和经济利益来说，只要中共能够在整个东北取得政权，就已经满足莫斯科的要求了，若再对华北和西北有所控制，当然更好。正是在这个范围内，苏联对中共的援助是比较及时的和慷慨的，因为这毕竟与苏联的利益有着直接关系。[⑤] 如果中共的势力范围继续扩大，则很可能招致美国的干预。那样，莫斯科就会处于一种两难境地：或者眼看着中共在美蒋的合力打击下败退，而使苏联失去东方的安全屏障，或者全力援助中共，而不惜与美国在远东大陆发生直接冲突。所以，最好的选择当然是促使国共停止内战，以保住既得利益而不冒任何风险。

罗申自 1948 年 2 月回到中国并升任大使后，不断为改善中苏关系和调停内战与国民党高级官员接触。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致国务卿的电报说，罗申在 1 月作

---

① 1949 年 1 月 6 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记录，转引自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第 908 页。

② 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第 370 页；1949 年 1 月 10 日捷列宾致库兹涅佐夫电，АПРФ, ф.39, оп.1, д.31, л.54-58,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XX веке, Том V, Книга 2, с.11-14。

③ 见 *Тихвинский* Переписка И. В. Сталина с Мао Цзэдуном в январе 1949г., с.132-140。以下有关斯大林与毛泽东讨论和谈问题的电报均引于此，不再注明。这些电报的中译文参见《斯大林研究》1995 年第 4 期，第 275–286 页。

④ 如见 *Рахманин О. Б.* Взаимоотношения И. В. Сталина и Мао Цзэдуна глазами очевидца//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1998, №1, с.87-88;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XX веке, Том V, Книга 2, с.530-532。

⑤ 有关情况参见沈志华：《对中苏同盟经济背景的历史考察——中苏经济关系研究之一（1948–1949）》，《党的文献》2001 年第 2 期，第 53–64 页。

为武官回国述职之前，就提出了苏联在中国进行调停的问题。国民党情报人员截获的一份莫斯科给南京苏联大使馆的电报说，要“努力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做出某种安排”，并表示苏联有可能出面进行调停。因此，罗申在向张治中辞行时表示苏联愿意安排与共产党的和平谈判。不久，罗申返回中国，并升任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认为：这“可能意味着苏联准备进行调停”，因为“这种调解是与苏联的基本目标相一致的”。“我们觉得，这也许是可取的办法，如果中国政府确信它在满洲的军事地位已没有指望的话”。美国大使还倾向于认为，“从中国政府的立场看，苏联的调解在很久以前就是必要的，甚至是值得向往的；从美国的立场看，任何苏联介入中国形势的打算都是有目的的，这是不言而喻的。当然，我们可以预见，苏联调解可能造成的形势也许对我们有利。”①

1948 年 6 月，罗申向国民党国防部官员提议举行防止中苏之间出现“冷战”的会谈。他建议共同努力以寻求中苏在有关对日和约中的共同立场；他承诺将不干涉中国的内部事务，增加对国民党的商业贷款，设立能使双方受惠的共同开发经济的项目。罗申说，只要中国人采纳他的建议，中苏关系中的尖锐问题将很容易得到解决，否则，苏联可能被迫沿中苏边界建立“缓冲区”，以保卫苏联国家的安全利益。②11 月 10 日，据司徒雷登报告，张治中受蒋介石委托与苏联大使谈判和解方案，结果不尽如人意，但还在继续。监察院副院长刘峙也在同苏联使馆接触，讨论和谈问题。12 月 1 日司徒雷登致电国务卿称：“时局的发展非常有可能出现停战，并恢复和谈。据未证实的消息，苏联大使到时将在国民党控制华南、共产党控制华北以及美国承认俄国在满洲的权利的条件下出面调停。”③

俄国档案显示，苏联大使在 1948 年 12 月与其他国家驻华使节接触时，不断询问美国继续援蒋的可能性和具体内容。④看来，莫斯科对此是有所担心的。与此同时，苏联驻华使馆三秘马卢欣 12 月 27 日提交的备忘录认为，“从杜鲁门总统的整个对华政策看，停止给蒋介石政权提供援助不是意外之事”。为此，美国正在策划

---

① Stuart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February 24, 26, March 8, 1948, in *FRUS*, 1948,Vol.7,*The Far East:China*, 1973, pp.112, 117-118, 133-136.

② 1948 年 6 月国防部第二厅致外交部情报抄件，“中华民国外交部”档案库，亚西司，112.1/002，改善中苏邦交，第 60–63 页。

③ Stuart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November 10, December 1, 1948, in *FRUS*, 1948, Vol.7, pp.558-560, 627.

④ 1948 年 12 月 9 日罗申与英国大使史蒂文森会谈备忘录，12 月 29 日罗申与印度武官托卡尔会谈备忘录，АВПРФ, ф.0100, оп.41, п.276, д.19, л.82-84, 80-81;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XX веке, Том V, Книга 1, с.488-489, 494-495。

组建以李宗仁为首的联合政府，并“迫使共产党人在相互让步的原则下接受和平建议”，如果中共拒绝和谈并加入联合政府，就将帮了反动派的忙。此外，种种迹象表明，“美国人决心直接同共产党接触”。[①] 在如此情况下，斯大林考虑把控制中国局势和中共政策走向的主动权抓在莫斯科手中，是完全合乎情理的。

国民党关于和谈的呼吁和斯大林对此做出的反应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1949 年 1 月 8 日国民政府照会苏联，希望“苏联政府对加快进行和谈提出建议”，“如果苏联政府能从中调停，中国政府可以立即和中国共产党开始和谈”。[②] 同时接到照会的美、英、法三国尚未表明态度，斯大林却抢先采取了行动。1 月 10 日斯大林致电毛泽东，字里行间透露出莫斯科有意单独出面进行调停。斯大林首先指出：国民党“建议的用心乃是要宣告南京政府赞成停战，主张实现和平，而中国共产党若是断然拒绝与南京政府进行和平谈判，那就是主张将战争继续打下去”。有鉴于此，斯大林准备的答复是：“苏联政府过去赞成，现在仍然赞成在中国结束战争，实现和平，但在同意担当调停人之前，苏联政府希望了解另一方，即中国共产党方面是否同意接受苏联的调停。”接着，斯大林又为毛泽东准备一个对国民党征询意见时的答复：“中国共产党一贯主张中国和平，首先挑起中国内战的不是中国共产党，而是南京政府，所以应当由南京政府来对战争后果承担责任。中国共产党同意与国民党进行谈判，但是不能容许那些发动中国内战的战争罪犯参加谈判。中国共产党主张在没有任何外国调停人参加的情况下与国民党进行直接谈判。中国共产党尤其认为，那个派遣军队和舰只直接参与内战、反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外部大国不能充当调停人，因为这样的大国是不可能采取中立和客观的态度来结束中国的战争的。”斯大林认为，中共的“答复大体上应该如此”。最后，斯大林提出，毛泽东还得再推迟访苏的日期，“因为在此种情况下您的莫斯科之行会被敌人利用来败坏中国共产党的声誉，攻击中共是依附于莫斯科的附庸力量”。[③]

可以看出，斯大林的主张实际上是：第一，为了避免承担战争责任，中共不应拒绝和谈；第二，绝不能让美国参与调停；第三，苏联愿意单独充当调停人；第四，推迟毛泽东访苏自然是为了给莫斯科当调停人创造条件。显然是担心毛泽东对

① 1948 年 12 月 27 日马卢欣关于美国在华政策的备忘录，АВПРФ, ф.100, оп.42, п.296, д.117, л.7-23。沈志华、李丹慧收集和整理：《中苏关系：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第 6 卷，第 1333–1343 页。

② 1949 年 1 月 8 日中国政府照会，АВПРФ, ф.0100, оп.36а, п.150, д.4, л.1-4,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XX веке, Том V, Книга 2, с.8-10。

③ 1949 年 1 月 10 日斯大林致毛泽东电，АПРФ, ф.39, оп.1, д.31, л.61,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XX веке, Том V, Книга 2, с.15-16。

电报中提出的答复方案不满，未等中共回电，斯大林1月11日又发电解释说："我们草拟的你们对国民党建议的答复方案，其意在于阻止和平谈判。十分明显，国民党不会在没有外国列强，尤其是美国充当调停人的情况下进行和平谈判。同样明显的是，国民党也不愿在没有蒋介石及其他战争罪犯参加的情况下进行谈判。因此，我们料想国民党会拒绝按照中共提出的条件举行谈判。其结局是，中共是赞成和谈的，因而不能指责它欲将内战继续下去。于是，国民党就成了破坏和谈的罪人。这样一来，国民党与美国的和谈花招会被戳穿，你们也可以将必胜的解放战争继续进行下去。"同时，为了表示对中共的信任，斯大林把"南京政府认为不宜公布"的给苏联的照会转给了毛泽东。[①]

果然不出所料，毛泽东对1月10日的电报极为不满，甚至感到愤慨。显然是看出了斯大林的言外之意，毛泽东在与捷列宾谈到这个问题时，态度十分强硬地"反对各种形式的调停，并反对中共参加任何谈判"。[②] 经过一天的考虑，在1月12日的长篇回电中，毛泽东直截了当地表示坚决反对外国调停和谈。毛首先为苏联政府起草了另一份答复南京政府的回电："苏联政府过去和现在一贯希望看到一个和平、民主、统一的中国。然而，通过什么途径去实现中国的和平、民主和统一，那是中国人民自己的事。苏联政府根据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原则，认为不能接受为中国内战双方进行调停的工作。"毛泽东认为，尽管美国"对参与结束中国内战的调停工作极感兴趣"，但是，"人民解放军在全国取得胜利已为期不远，国民党政权的覆灭也已成为定局，在这样的情况下，列强是否还愿意继续扶植南京政府，从而继续与人民解放军作对，看来都成为问题了"。相反，"如果苏联在给南京政府的复照中采取您1月10日来电中所陈述的立场，那么美国、英国和法国势必会认为它们也应当参与调停，国民党也就会找到诬蔑我们为好战分子的口实"。毛进一步解释说：中共"要求南京政府无条件投降"，"因为现在，由于中国的阶级力量对比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国际舆论也对南京政府不利，所以，今年夏季人民解放军当可渡过长江，进攻南京"。如此，"我们似乎没有必要再采用政治上迂回的办法了。在目前的局势下再用这种迂回的办法只会是弊多利少"。毛希望，"苏联如果从国际关系的全局利益考虑，在复照中能够采取我们提出的立场，则我们真诚希望您

① 1949年1月11日斯大林致毛泽东电，АПРФ, ф.39, оп.1, д.31, л.62, 63-64,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XX веке, Том V, Книга 2, с.16-18。

② 1949年1月13日捷列宾致库兹涅佐夫电，АПРФ, ф.39, оп.1, д.31, л.68,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XX веке, Том V, Книга 2, с.20。

能接受我们的建议。您若能这样做，那将是对我们的巨大支持”。[①]

1月12日，莫洛托夫接见了南京政府驻苏大使傅秉常，一方面表示苏联政府正在研究中方的建议，一方面探寻美、英、法的态度。[②]而在南京的罗申因为迟迟没有接到莫斯科的指示，托辞身体有病，回避了与南京外交部及其他三国大使的会晤，也没有出席司徒雷登倡议召开的四国大使会议。[③]1月13日，司徒雷登受国务院委托，向南京政府递交了美国政府的正式答复，尽管表示将继续保持美中友谊，但美国政府拒绝参与调停。[④]同一天的美国报纸报道，美、英、法代表在南京举行会议，并作出决议：1. 中国的内战已进入到对中国政府的任何忠告都不会起作用的阶段；2. 西方大国最终不得不同意对中国的事件持旁观态度。[⑤]而此时，毛泽东和斯大林的讨论还在进行中。[⑥]

收到毛泽东的电报后，1月14日斯大林给毛泽东回了一封长电，再次详细解释了苏联建议的意图。显然是被毛泽东的坚定态度所触动，在这封电报中，斯大林不再提苏联充当调停人的事，而是完全按照11日电报的思路展开论述。电报建议中共从策略的角度答应和谈，但可以提出使国民党无法接受的条件。[⑦]同一天，斯大林接到了毛泽东对他11日续电的答复。毛泽东表示同意并接受苏联修正后的建议，并说已公布了与国民党举行和平谈判的八项条件。不过，毛泽东仍强调，双方形成一致意见的“基本方针”是“阻止与国民党的广泛谈判和将革命战争进行

---

① 1949年1月12日毛泽东致斯大林电，АПРФ, ф.39, оп.1, д.31, л.65-67,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XX веке, Том V, Книга 2, с.18-19。

② 1949年1月12日莫洛托夫与傅秉常会谈备忘录，АВПРФ, ф.06, оп.11, п.255, д.15, л.1-3,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XX веке, Том V, Книга 2, с.23-24。

③ *Ледовский* Секретная миссия А. И. Микояна в Китай (январь-февраль 1949г.), 1995, №3, с.94-95.

④ Stuart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January 14, 1949, in *FRUS*, 1949, Vol.8, *The Far East: China*, 1978, pp.47-48.

⑤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XX веке, Том V, Книга 2, с.532.

⑥ 由于西方先于苏联表明了拒绝调停的态度，这令莫斯科大为丢脸，并迁怒于中共。后来米高扬访问西柏坡谈起这件事时，坚持认为是中共有人泄密才让美国人抢了先机。毛泽东为此十分恼火。见*Ледовский* Секретная миссия А. И. Микояна в Китай (январь-февраль 1949г.), 1995, №3, с.95。其实，正如列多夫斯基指出的，司徒雷登此前就坚持认为苏联不可能参与调停（*FRUS*, 1948, Vol.8, 1973, p.25）。不过，司徒雷登没有想到的是，导致苏联采取这一立场的关键因素是毛泽东的态度。

⑦ 1949年1月14日斯大林致毛泽东电，АПРФ, ф.39, оп.1, д.31, л.69,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XX веке, Том V, Книга 2, с.21-22。

到底”。[①] 至此，斯大林认为，“我们在南京方面的和谈建议一事上，观点已达成一致”，“可以认为问题已经解决”。[②] 1 月 17 日，斯大林亲自修改了莫洛托夫送来的对中国政府的复函，声明苏联拒绝参与对国共和谈的调停，并于当天送电台广播。[③] 毛泽东似乎怒气未消，抑或是担心再有人提出和谈问题，在 1 月 19 日审阅中共中央关于外交问题的指示稿时，他特别加写了一句：“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项，不允许任何外国及联合国干涉中国内政。因为中国是独立国家，中国境内之事，应由中国人民及人民的政府自己解决。如有外国人提到外国政府调解中国内战等事，应完全拒绝之。” [④]

中苏领导人关于调停和谈一事的争议到此作罢。与此同时，毛泽东的访苏计划也被放弃了。在 14 日的电报中，斯大林再次提出暂缓毛泽东的莫斯科之行，“如果你们觉得需要，我们可以立即派一名政治局委员到你们的哈尔滨或其他地方就我们关心的问题进行商谈”。[⑤] 对此，17 日毛泽东答复，“我决定暂时推迟苏联之行”，并建议苏共中央的政治局委员可于 1 月底 2 月初到中共中央所在的西柏坡进行秘密访问。[⑥] 至此，讨论了一年半的毛泽东莫斯科之行终于结束了，中苏两党领导人的首次会见，不得不变换一种形式。

在中苏两党关系的历史上，曾多次出现中共在莫斯科的压力下被迫改变已定方针和政策的情况，如西安事变、皖南事变、重庆谈判等。[⑦] 然而，同以往的情况不同，这一次在调停和谈的问题上，是毛泽东的强硬态度迫使斯大林改变了初衷。个

---

① 1949 年 1 月 14 日毛泽东致斯大林电，АПРФ, ф.39, оп.1, д.31, л.73,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XX веке, Том V, Книга 2, с.23。为此，毛泽东在 1 月 15 日起草的中共中央致东北局的电报中指出，“我方提出之八个和平条件是针对蒋方五个条件的”，“双方的条件都是对方不能接受的，战争必须打到底”。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年，第 436 页。

② 1949 年 1 月 15 日斯大林致毛泽东电，АПРФ, ф.39, оп.1, д.31, л.74,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XX веке, Том V, Книга 2, с.25。

③ 1949 年 1 月 17 日莫洛托夫给斯大林的报告，АВПРФ, ф.06, оп.11, п.226, д.15, л.1-7,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XX веке, Том V, Книга 2, с.26-27。

④ 中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 年，第 78 页。

⑤ 1949 年 1 月 14 日斯大林致毛泽东电，АПРФ, ф.39, оп.1, д.31, л.69,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XX веке, Том V, Книга 2, с.21-22。

⑥ 1949 年 1 月 17 日毛泽东致斯大林电，АПРФ, ф.39, оп.1, д.31, л.75,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XX веке, Том V, Книга 2, с.29-30。

⑦ 关于西安事变和皖南事变情况的最新研究见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年，第 345、446–448 页。关于重庆谈判情况的最新研究见沈志华：《斯大林与中国内战的起源（1945–1946）》，第 115–131 页。

中原因，毛泽东的倔强个性的确起了作用，从前引众多电报的字里行间就可以看出，毛泽东虽然急于求见斯大林，以获取苏联的支持和帮助，但在许多细微之处的措辞上又表现出他并不是一个事事顺从莫斯科的人。对此，双方心里都是清楚的。尽管斯大林在1月14日的电报中宽容地告诉毛，“拒绝我们的建议绝不会影响我们之间的关系，我们永远是你们的朋友”，但他内心的感受很可能是另外一番滋味，这也难怪毛泽东后来屡次说斯大林把他看做是中国的铁托。不过，毛泽东敢于在涉及中国革命前途的原则问题上直接顶撞斯大林，主要并非性格使然，而是中共在内战中已经取得绝对优势并完全控制了中国局势的发展，莫斯科在考虑苏联的亚洲战略和远东安全问题时，不得不把中共的立场及对中共的政策作为首要因素。

1948年中国的局势还没有完全明朗化，特别是对美国的亚洲战略及对华政策还捉摸不定。而苏联在欧洲已经陷入了与西方严重对抗的泥淖，柏林危机的结果也使斯大林认识到双方实力的差距。在这种时候，莫斯科最不愿意看到的局面，就是美国认定苏联有意在亚洲破坏雅尔塔协议的框架，进而采取直接的武装干涉政策，使苏联陷入两面受敌的困境。所以，莫斯科既要支持和援助中共，又不能让美国人和国民党政府抓住把柄，而最理想的情况就是停止内战。这也是苏联不愿扩大对中共援助的范围和斯大林三番五次推迟毛泽东访苏的主要原因。到1949年初，中共已经取得了半壁江山，而中国革命对整个亚洲局势的发展则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斯大林对此极为关注。[①] 应该说，正是在1949年初和谈的问题上，表现了苏联对华方针的基本转变。2月20日广东省政府主席薛岳向罗申表达了希望和平的愿望，并征求他的意见。罗申明确表示：“和平调解中国内部冲突是中国人民自己的事。”第二天代总统李宗仁再次向罗申表示了强烈的要求和谈的愿望，但罗申则完全回避了这个问题。[②]

斯大林1月10日电报显然是按照1948年主张和谈的思路拟定的，而且很可能带有试探中共意图的想法，所以面对中共的优势地位和强硬立场，他很快就默不作声了。1949年初斯大林仍有意调停国共和谈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但与1948年不同，斯大林此时提出由苏联出面调停，主要担心的已经不是美国进行军事干预，而是考

① 莫洛托夫和维辛斯基在1949年初给科瓦廖夫的电报中指出，“从现在起，任何有关中国的事务都要直接与菲利波夫同志联系”。见 Sergei N. Goncharov, John W. Lewis, and Xue Litai, *Uncertain Partner: Stalin, Mao, and the Korean War*,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20。菲利波夫是斯大林的化名。

② 1949年2月20日罗申与薛岳会谈备忘录，2月21日罗申与李宗仁会谈备忘录，АВПРФ, ф.0100, оп.42, п.288, д.19, л.3-4, 9-11,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XX веке, Том V, Книга 2, с.100-101。

虑如果美国人出来调停，并对中共表示友好，则可能把中国未来的局势发展控制在自己手中。所以，斯大林这样做的目的也无意阻止中国革命的发展，而是要由莫斯科来把握局面。顺便说一句，关于斯大林是否阻止中共军队打过长江，提出所谓建立“南北朝”的问题，笔者倾向于认为，这不是苏联明确提出的政策，而是毛泽东的感受。鉴于直到 1949 年初苏联对国共和谈的态度，毛泽东的这个感受是有道理的。不过，当有关调停问题的讨论结束以后，斯大林的目标已经基本转向了支持中共，并力图把中国纳入社会主义阵营的范围。

要做到这一点，对斯大林来说还有一个重要的未知因素，即未来中共政权的性质、政治倾向及其与苏联的关系。中共夺取政权后是否会加入社会主义阵营并保证对苏联的忠诚，这是莫斯科在确定苏联全面改变对华政策之前迫切需要切实掌握的情况。斯大林派遣米高扬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身份对中共中央所在地西柏坡进行秘密访问，其主要目的就在于此。

发表于《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9 年第 1 期

从西柏坡到莫斯科：毛泽东宣布向苏联“一边倒”

——关于中苏同盟建立之背景和基础的再讨论之二

从 1947 年夏天到 1949 年初，经过一年半往来函电的沟通和试探，中苏两党领导人的直接会面终于实现了。[①] 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受斯大林委托秘密访问西柏坡，是苏共领导人第一次踏上中国的领土，也是莫斯科迈出的与未来新中国缔结同盟的第一步。4 个月后，刘少奇、高岗率中共中央代表团（名义上是东北人民政府贸易代表团）访问苏联，也是自毛泽东成为中共领袖和共产国际解散后，到苏联访问的第一批中共高层领导人，而这次访问的结果，直接导致了毛泽东公开宣布向苏联“一边倒”的建国方针。

关于这两次中苏两党领导人互访的情况，十几年前俄国透露了一些文献，但不够系统，而中方的史料只有当事人的回忆录。[②]2005 年以来，俄国和中国都大量公布或开放了相关的档案文献。[③] 尽管可以看出还有一些核心文献尚未解密，但总体来说，研究者根据这些史料可以对中苏领导人最初接触的过程和内容进行基本分析

---

① 详见沈志华：《求之不易的会面：中苏两党领导人之间的试探与沟通——关于中苏同盟建立之背景和基础的再讨论（之一）》，《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9 年第 1 期，第 1–13 页。

② 关于米高扬访华见 *Ледовский* Секретная миссия А. И. Микояна в Китай (январь-февраль 1949г.), 1995, №2, с.96-111, №3, с.94-105。关于刘少奇访苏见 *Ледовский* Визит в Москву делегации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Китая в июне-августе 1949г., 1996, №4, с.66-83, №5, с.84-94。中方的史料主要见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李海文整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 年。

③ *Ледовский, Мировицкая, Мясников* (сост.)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XX веке,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Том V,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1946-февраль 1950, Книга 2: 1949-февраль 1950гг., Москва: Памятники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мысли, 200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 1 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 年；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 1 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 年。在 2004 年开放的中国外交部档案中，也有几件与此相关的重要文件。

了，特别是由此可以解开以往一些令人误解或不解的疑团。

一、米高扬访问西柏坡的积极成果

米高扬（化名安德列耶夫）于1949年1月26日从莫斯科出发，30日到达西柏坡，同行的有苏共中央驻中共中央代表И. В.科瓦廖夫和一名中央机关工作人员Е. Ф.科瓦廖夫。[①] 根据目前公布的俄国档案文件，到2月8日离开中国，米高扬与中共领导人共进行了12次正式会谈，即1月30日、1月31日、2月3日、2月4日、2月5日（两次）和2月6日与毛泽东的会谈（刘、周、任、朱列席），2月1日（两次）与周恩来和朱德的会谈，2月2日与任弼时和朱德的会谈，2月3日与刘少奇和朱德的会谈，2月7日与中共中央领导人（毛未参加）的集体会谈。[②] 在这些会谈中，中共领导人详细而全面地介绍了中共的历史和中国的现状，以及在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等方面中共正在或即将实行的方针和政策。米高扬主要是听汇报，偶尔回答一些问题或插话，有时也根据斯大林的指示表明苏共在某些问题上的主张和立场。斯大林非常重视这次访问，米高扬在西柏坡期间，苏共中央政治局每天都开会研究和讨论米高扬的电报。会谈结束后，斯大林要求米高扬尽快赶回莫斯科，详细汇报各种情况。[③] 需要指出的是，1995年人们看到的米高扬关于中国之行的报告，是在中苏关系开始恶化的时候提交的，其中难免有片面和责难的倾向，研究者在利用这一文件时大多也过于关注中苏之间的分歧和矛盾。[④] 其实，仔细阅读这12份备忘录及以后几个月的大量往来电报就会发现，西柏坡会谈的主要成果是积极的，即使有一些意见不合，或者当时没有充分表露出来，或者中共立即就表示赞同莫斯科的看法，至少在表面上是这样。

---

① *Ледовский* Секретная миссия А. И. Микояна в Китай (январь-февраль 1949г.), 1995, №2, с.104。笔者1995年在西柏坡参观时得知，原中共中央所在地因50年代修水库已经淹没，现在人们瞻仰的地方是照原样复制的。

② 1949年1月30日至2月7日米高扬与中共领导人的谈话备忘录，АПРФ, ф.39, оп.1, д.39, л. 1-95,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с.33-93。以下所引西柏坡会谈内容均出自这些文件，不再出注。

③ 1960年9月22日米高扬给苏共中央主席团的报告，АПРФ, ф.3, оп.65, д.606, л.1-17//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1995, №2, с.109。遗憾的是俄国没有公布来自莫斯科的指示电，不过可以认为，米高扬讲话都是斯大林授意或同意的内容。

④ 米高扬报告列举的主要是他认为有问题的谈话内容，见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1995, №2, с.105-107。学者对此的反应见Sergei N. Goncharov, John W. Lewis, and Xue Litai, *Uncertain Partner: Stalin, Mao, and the Korean War*,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41-43；*Кулик Б. Т.*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й раскол: причины и последствия, Москва: ИДВ РАН, 2000, с.73-74；迪特·海因茨希：《中苏走向同盟的艰难历程》，张文武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年，第269页。

给人最明显的感觉是，中共领导人在谈话中反复地和明确地表现出亲苏的立场。毛泽东在2月3日和4日谈到中共的历史时，一再高度评价苏共对中共的领导、指导和帮助。他说，“中国共产党是在苏联十月革命直接影响和联共（布）的帮助下于1921年成立的”，“1924年前，列宁领导的苏联帮助了我们，列宁逝世后斯大林领导的苏联也给了我们帮助。在这一阶段斯大林写了许多关于中国的文章”，“1927年8月，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中国共产党才摆脱了机会主义的领导”。毛泽东还两次谈到1937年7月王稼祥从共产国际带回的纲领性指示完全适合中国的情况，帮助中共纠正了错误。关于苏共在思想观念上对中共的帮助，毛泽东特别列举了1946年2月斯大林关于军事历史问题的一封信，这封信指出，撤退也是一种斗争的合理形式。[①] 至于在中国内战时期，毛泽东指出，“从1947年起林彪经常向莫斯科要求这样或那样的援助”，“你们对满洲的军事援助占苏联对外援助的四分之一，这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如果没有苏联的援助，我们未必能取得今天的胜利”。鉴于苏共二十大以后毛泽东在多次讲话中指责斯大林在历史上对中国革命犯下诸多错误，他的上述表白是否反映了内心的真实感受，不得而知，但有一点很明显，毛泽东当时要让莫斯科明白，中共对苏共和斯大林本人是心存“感激之情”的。

在感谢之后，中共领导人反复强调要向苏共学习，并决心与苏共站在一起。毛泽东首先声明“我们大大落后于俄国，我们是幼稚的共产党人”，并几次坚持说自己是斯大林的学生。在谈到党的队伍建设、理论学习、工业管理、城市工作、青年和妇女工作、民族问题以及农村合作化运动时，毛泽东和刘少奇都一再说到苏联经验的重要性，表明了虚心学习的态度。为了显示对莫斯科的忠诚，在谈到南斯拉夫的问题时，毛泽东称铁托就是中国的张国焘，是叛徒；在谈到两党之间的联系问题时，毛泽东提出请苏共“在中共中央设立代表机构”，周恩来则表示“真希望苏联离中国共产党的距离近些”，因为“主要问题要在莫斯科解决”。毛泽东还指出，“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因此局部利益必须服从整体利益”，“中国应该站在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阵营一边”，“对我们来说中间道路是没有的”。为了说明这一点，尽管认识到中国的国情与苏联不同，中国的发展还处于非常落后的阶段，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要谨慎，还不能马上搞集体农庄等，但毛泽东和刘少奇都反复强调：中国要走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的发展方向是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五种

① 1946年2月23日斯大林给拉辛的信，见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斯大林文选（1934–1952）》，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455–461页。

经济成分中，“我们主张加强国家经济和合作社经济的成分”，而按其性质来说国家经济是社会主义的，合作经济是半社会主义的。“我们的目的是用加强经济中的计划成分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

尽管米高扬多次表示不同意中共那些过于谦虚的说法，并认为中国的革命具有历史意义，丰富了马克思主义，但对于中共反复表明的亲苏立场，斯大林显然是感到满意的。下面一个情况可以说明这一点。在2月3日谈到亚洲各国共产党之间的联合行动时，毛泽东建议在中国局势稳定后，应该尽快成立像欧洲共产党情报局那样的共产党亚洲国家局（Бюро компартий азиатских стран）。对此，米高扬当即提出，按照苏共中央的意见，中共不应参加现在的共产党情报局，而应建立以中共为首的共产党东亚国家局（Бюро компартий стран Восточной Азии）。最初可以由三个政党，即中国共产党、日本共产党和朝鲜共产党组成，以后逐步吸收其他政党。毛泽东随后问到，是否可以就成立情报局的问题与日本和朝鲜共产党进行联系，米高扬也当场表示同意。显然，斯大林此时已经考虑到要让中共成为亚洲革命的领导者。

除了对苏共表示感激、亲近和友好外，在涉及与苏联的关系问题时，中共领导人谈得最多的就是要求莫斯科给予援助。为此，他们讲述了中共所面临的困难。这些困难主要不是来自军事方面——毛泽东称，中国革命的军事阶段实际上已经结束，打败蒋介石只用缴获的武器就够了——而在于中共完全没有管理城市和发展经济的经验。刘少奇谈到了这样的情况：进入大城市的初期，中共按照在农村打土豪、分田地的做法，把资本家的企业分给了工人，结果工人们把企业全部拆光卖掉了；有的地方强迫企业主提高工人的工资，以至他们无法经营，不得不关闭店门，结果反而造成大量工人失业。毛泽东反复强调，中共十分缺乏懂得城市工作和经济工作的干部，为此，甚至不得不推迟对上海、南京、西安等大城市的进攻和占领。[①] 刘少奇和任弼时也多次谈到，中共不知道应该如何制止通货膨胀，如何对待外国企业，如何在盐业、烟草和酒类方面实行国家垄断，也不知道如何对四大家族和大买办的资产实行国有化，如何对外贸实行垄断。这给米高扬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在给斯大林的报告中写道：中共领导人对一般政治问题、党务问题、国际问题、农民问题和经济问题，都“非常内行，很有自信”，但是对经营管理问题却“知之不多”，

---

① 从这里可以看出，米高扬在1960年报告中所说，中共“对党组织中的无产阶级成分没有给予足够重视”，他们“避免夺取大城市而努力占领农村，如不想夺取上海”云云（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1995, №2, с.105），完全误解（或有意歪曲）了毛泽东的原意。

“对工业、运输业和银行的概念模糊”，对中国的企业和经济状况不了解，也不知道应该如何去做。总之，“他们处在闭塞的农村，脱离现实”。

正因为如此，会谈中，中共领导人特别强调在恢复经济和发展生产方面需要苏联给予大力帮助。在这方面，除了希望苏联提供保卫大城市的高射炮，发展经济的贷款（3 亿美元），制止通货膨胀的白银、纸张和油墨，以及其他物资援助外，主要就是需要苏联派来大批的顾问和专家。在 2 月 1 日的会谈中，周恩来强调：“我们想请求苏联给我们派来一些专家和提供制造武器的设备，并派遣一些顾问帮助我们训练部队、建立军事院校和组织包括军事工业在内的后勤工作。”2 月 2 日的会谈专门讨论了在发展工业方面中苏合作的问题。任弼时指出，在国民经济计划中，中共将把东北放到显著地位，力争把它变成国防基地。在东北工业开发上，希望得到苏联的援助。援助的方式可以是建立苏中联合企业、苏联提供贷款和向苏联提供租让企业。任弼时强调，东北工业开发需要高级技术专家，而在鞍山的冶金企业中现在不得不利用日本专家。因此，“我们请求苏联派遣不少于 500 名国民经济各个领域的专家到中国来”。在 2 月 3 日的会谈中，刘少奇说：“如果没有苏联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的帮助，在解放后的中国建立工业基础是不可想象的。这种帮助对我们将起决定性作用。我们考虑，可以采取以下几种形式：1. 提供社会主义经济改造的经验。2. 向我们提供相应的文献资料，为我们派来各种经济顾问和技术人员。3. 为我们提供资金。”“有了苏联的帮助，我们将更快地走向社会主义。”“我们想尽早知道苏联方面究竟能给予我们多大规模的援助，以便我们在制定国民经济计划时考虑这个问题。”毛泽东则在 2 月 4 日提出，“中国共产党需要联共（布）提供全面的援助。需要两方面的顾问，即经济方面和财政方面的顾问”。对于中共提出的要求和建议，米高扬在原则上表示同意。

会谈时另一个比较集中的话题是中共与美国的关系，在这方面，中共领导人的谈话比较谨慎。周恩来在 2 月 1 日的会谈中介绍了中共与美国关系的历史。周恩来说，中共与外界的联系是从 1944 年美军观察团到延安开始的，那时中共坚持了“禁止美国干涉我国内政的政策”。同样，马歇尔使华时中共也拒绝参加中美调停委员会。此后就中断了与美国的关系，即使与中间人有一些接触，也仅限于了解情况。接着，周恩来便大谈战后中共与美国的六次冲突，并总结说，“我们不会挑起事端，但如果美国反对我们，我们将给予坚决的回击。”周恩来没有全面地反映历史的真实情况，显然是担心引起斯大林的怀疑和不满。谈到与美国和西方国家关系的现实问题，毛泽东和周恩来介绍了中共的一些基本方针或做法，如原则上主张没

收外国的企业，尽管执行时会灵活一些；禁止外国人在中国境内使用电台；停止或限制外国通讯社、出版社和报纸杂志在中国的活动；对美国在解放区的领事馆采取排挤的方法，让他们自己感到困难而主动撤离，对其工作人员则视为侨民；切断美国在华军事基地与外界的联系，逼迫他们撤离，必要时可以使用武力。显然是考虑到苏联在东北的特殊利益，周恩来特别提到要把外国势力赶出东北，“在满洲和外国之间筑起一道铁壁铜墙”。至于苏联在中国的报刊，中共建议在名义上委托中国的民主人士办理，而苏联的领事机构也可以在实际上继续自己的活动。毛和周还提出了未来新中国政府与外国建交的问题，鉴于有消息说美英可能会承认中共政权，中共领导人考虑了两种方案，或者争取各国立即承认（希望苏联首先承认），或者不急于与各国建交，拖上一年半载。中共倾向第二个方案，并希望苏共对此提出建议。至于贸易问题，中共将首先与苏联和新民主主义国家做生意，只有多余的产品才卖给西方国家。对这些问题，米高扬没有发表什么意见，只是说到没收国外企业时，两次提出对日本、英国和法国的资产应该实行国有化，但对美国的财产“应当采取谨慎的政策”，在中国局势稳定以后，“根据形势和美国的态度再作决定”。或许，斯大林此时对这个问题还没有考虑成熟，不过有一点是确定的，即不能刺激美国。

会谈也涉及到中苏两国的利益问题，这主要反映在外蒙古、新疆和东北问题上。不过，双方对这些问题都只是试探性地表示了看法，而无意进行深入的讨论。

在 2 月 4 日的会谈中，当米高扬指出苏联主张在中国实行民族自治而不是民族独立的政策时，毛泽东显得很高兴，随即提出了外蒙古的问题。虽然米高扬已经表明苏联不支持外蒙古和内蒙古联合的建议，毛泽东仍坚持说，两年以后，当中共政权得到巩固时，外蒙古便可以与内蒙古合并，回到中国了。米高扬反驳说，外蒙古早已独立，而且得到了中国政府和苏联政府的承认。即使有朝一日外蒙与内蒙合并，也只能是一个独立的蒙古。这时，任弼时提醒说，内蒙古有 300 万人，而外蒙古只有 100 万人。不过，毛泽东则大笑起来，表示不再坚持自己的意见。外蒙古独立对苏联的确是一个非常有刺激性的问题。战后苏联对华政策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把外蒙古从中国分离出去，使其成为保障苏联安全的缓冲地带。所以，尽管毛泽东已经表示收回自己的意见，在 2 月 6 日的会谈中，米高扬仍然传达了斯大林的意见：外蒙古领导人热心于把整个蒙古联合起来，但苏联反对这个计划，因为其结果是中国将失去大片领土。斯大林在这里说的不完全是实话。外蒙古宣布独立后，1946 年 2 月在讨论苏蒙友好同盟条约问题时，蒙古领导人乔巴山确向斯大林表示

了要把内蒙古和兴安岭地区并入蒙古共和国的想法，斯大林担心这样做会引发与中国的战争，但答应乔巴山“可以悄悄地进行”宣传鼓动工作。[①] 现在，斯大林当然不会再考虑把内蒙古合并到外蒙古的问题，但是要让外蒙古回到中国，也是万万行不通的。[②]

新疆问题也是2月4日会谈中毛泽东主动提出的，但这一次未等毛泽东把话题展开，米高扬就抢先说：新疆伊犁发生的独立运动是中国政府采取的错误政策引发的。但是，“如果让新疆少数民族享有自治权，那可能会留下独立运动的土壤”。苏联“不想造成新疆的独立，也不觊觎新疆的领土”，我们认为新疆是中国的一部分。苏联只是要与新疆进行经济合作和贸易往来。这时，毛泽东插话说，白崇禧告诉他，伊犁暴动者使用的是苏式武器。米高扬立即说，对此事不清楚，但苏联没有支援过新疆的独立运动。随后，毛泽东谈了三层意思：中共准备给予新疆像内蒙古一样“完全的自治权”；对新疆丰富的资源特别是石油很感兴趣；建议在新疆修建铁路把中苏连接起来，这具有战略意义。最后，在2月6日谈话时毛泽东说，按计划“我们将在1951年进驻新疆”。毛泽东在这里又提出了一个对于苏联来说非常敏感的问题，而米高扬迫不及待的解释和辩白给人的感觉就是“此地无银三百两”。苏联对新疆的确是非常关注的，远的不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在华的12个驻外机构中有8个都在新疆，可见这一地区在莫斯科心目中的地位。[③]1944年11月爆发的伊犁事件，确实也与苏联背后的大力支持有密切关系——苏联不仅为起事者训练军队，而且提供了武器和军事顾问。不过，苏联“不想造成新疆的独立，也不觊觎新疆的领土”，倒是一句实话。否则，斯大林就不会为取得1945年中苏条约尽快签字而许诺帮助平息新疆事件——他确实也做到了。[④] 无论如何，毛泽东的几

---

① 1946年2月22日斯大林与乔巴山会谈记录，РЦХИДНИ, ф.17, оп.116, д.262, л.1-4。

② 乔巴山的继任者泽登巴尔曾告诉索尔兹伯里，“毛泽东掌握政权后首先采取的行动就是要求斯大林归还中国对外蒙古的宗主权。斯大林拒绝了这个要求，并加强了对这个与中国有1500英里边界线的战略地区的控制。” Harrison E. Salisbury, “Image and Reality in Indochina”, in *Foreign Affairs*, Vol.49, No.3, April 1971, pp.387-388。

③ *Тотров Ю*. Американская разведка в Китае, 1945-1956гг.//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2002, №2, с.116.

④ 详见沈志华：《中苏结盟与苏联对新疆政策的变化（1944–1950）》，《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3期，第213–227页；*Бармин В*. Синьцзян в истории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1937-1946гг.//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2000, №1, с.84-95。

句话对中共提前解决新疆问题还是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①]

在接下来谈到东北问题时，双方就没有那样直接了。在谈到废除蒋介石的卖国条约时，毛泽东说，他曾向民主党派领导人解释，有些具有爱国性质的条约不能废除，如关于中长铁路和旅顺港的苏中条约。米高扬要求说明这种说法的根据，毛进一步解释说，“苏联不是作为帝国主义的势力，而是作为社会主义力量来到中长铁路和旅顺港，目的是保卫共同的利益。”毛泽东还谈到，一位国民党立法院女委员曾声明，如果共产党能为中国从俄国人那里收回旅顺港，那将是一个伟大的事业。毛泽东嘲笑说，这个女人不懂得政治。米高扬当时对此未发表意见。接到斯大林的电报指示后，在2月6日的会谈中，米高扬指出，苏联认为“关于旅顺地区的条约是不平等条约”，“苏联政府决定废除这个条约”，等对日和约签订以后，苏联将从旅顺撤出军队。如果中共认为需要立即撤军，苏联也准备这样做。但是，米高扬接着指出，中长铁路主要是靠俄国的资金建成的，所以这个条约不是不平等条约。其中可能没有完全体现平等的原则，苏联准备就此问题与中国同志一起讨论解决。米高扬关于旅顺的讲话令中共领导人感到惊奇，他们异口同声地反对苏军立即撤离旅顺港，认为这样会“给美国提供可乘之机”，这个问题应该留待中国“可以管理自己”的时候再去研究。不过，毛泽东提出，“在确定中长铁路的财产归属问题上还有些小问题”，这可以让高岗和科瓦廖夫去研究，然后向中共和苏共报告。后来事情的发展表明，在这里，中苏双方都没有完全讲出心里话，至少中共领导人当时还没有意识到东北问题的复杂性。

总体说来，米高扬的访问促进了中苏两党领导人的相互了解和理解，并大大推进了苏联与中共政权关系的发展。

米高扬走后，毛泽东更加明确了中共必须向苏联靠拢的方针，并且多次在党内指出这一点。2月16日，中共中央作出决定，“对外贸易应由国家经营和管制”，并规定了各种具体办法。但在此决定下发之前，中共中央指示华北局和东北局：对外贸易的基本方针是优先考虑苏联及东欧各新民主国家的需要，“只有苏联及新民主国家不需要及不能供给的货物，我们才向各资本主义国家出口或进口”。指示还要求尽快与苏联的商业机构联系，将各项外贸政策告知他们。[②] 为了让全党重视与

① 还在刘少奇到达莫斯科之前，斯大林就建议毛泽东应“对新疆予以认真注意”，还说“占领新疆事不宜迟”。1949年6月18日斯大林致科瓦廖夫电，АПРФ, ф.45, оп.1, д.331, л.119,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с.148。

②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8册，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第138–142、136–137页。

苏联的关系，3 月 13 日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的总结报告中指出：“没有国际援助，任何国家的革命都不可能取得胜利”。“没有各国无产阶级，首先是苏联的援助”，中国革命胜利以后的巩固也是不可能的。“中苏关系是密切的兄弟关系，我们和苏联应该站在一条战线上，是盟友，只要一有机会就要公开发表文告说明这一点”。[①]看到“中苏关系今后会更加发展”，5 月 7 日中共中央指示东北局，“为了以后关系更密切，工作更合拍，误会更少”，需要对过去三年以来的中苏关系进行认真总结，并编成书面材料于 5 月底派专人送到中央。[②]毛泽东本人则进一步向斯大林表示了敬佩之意和感激之情，他在 5 月 12 日会见科瓦廖夫时说，中国革命的胜利“应该归功于国际革命运动，首先是苏联”，“归功于我们的老大哥联共（布），归功于联共（布）的缔造者列宁和斯大林”。[③]

档案文献显示，从 1949 年 2 月起，中共与苏联政府和苏共中央之间的联系更加密切。对于会谈中提到的问题，双方进一步交换意见或做出答复。笔者还注意到，中苏两党之间联系的方式在此时也发生了变化。过去只有捷列宾作为联络员转交来往电报，而现在科瓦廖夫作为苏共中央的代表，则直接与中共领导人讨论各项工作，这无疑更促进和便利了双方的沟通、理解。

为了配合中共在西柏坡会谈中提出的有关对外政策的一系列措施，2 月 16 日斯大林电告毛泽东：“鉴于我们与中国解放区的民主政权机构没有建立外交和领事关系，鉴于解放区民主政权机关要求所有外国领事馆在建立正常的外交和领事关系之前停止活动”，苏联政府已指示其在中国各地的领事：“在中国解放区停止一切正式的领事活动”；与当地民主政权机构保持“非正式关系的联系”，且必须在中方提出请求之后；在中国各解放区的苏联刊物交由经过领事挑选的中国公民办理，并应妥善办理登记手续，但实际的出版工作仍由苏联公民负责；塔斯社和苏联新闻局应停止向中国解放区的出版社、报刊和广播电台发送信息和文章，来自莫斯科的苏联消息均要转交给当地民主政权的相关机构，并由他们分送给中国的报社、出版社和广播电台；在中国解放区的苏联新闻记者应该停止自己的日常活动，而只能根据

---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 5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年，第 262 页。

② 1949 年 5 月 7 日中共中央致高岗、李富春电。凡未注明出处的档案，均为笔者个人收藏的民间史料。

③ 1949 年 5 月 17 日科瓦廖夫给斯大林的报告，АПРФ, ф.45, оп.1, д.331, л.50-51,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с.128-132。

莫斯科与民主政权达成的非正式协议写一些文章和通讯报道。[①]

中共进一步向莫斯科通报与西方特别是美国的关系，并征询苏共的意见。3月12日陈云向科瓦廖夫询问，中国能否与香港资本家进行贸易，以出口5万吨粮食换取必需的商品。陈云补充说，向香港出售粮食不会减少协议规定的给苏联的粮食供应量，而在香港采购的都是苏联不供应的商品。科瓦廖夫在报告中表示对此持反对意见。[②]4月13日科瓦廖夫又报告，毛泽东告知，最近美国政府想通过花旗银行给中共政权贷款1—3亿美元，还有10个美国商业公司发来电报，希望同中国进行贸易谈判。对此，中共均不予理睬。毛泽东还说，从和平谈判的进程看，国民党可能向共产党移交中央政权，因而中共中央认为应该改变过去一贯采用的与资本主义国家相互关系的观点，即在中共掌握了中央政权之后，“在个别情况下与他们进行实际联系，但法律上不履行外交关系手续”。毛声明，这还不是最后的决定。[③]

在4月19日和26日电报中，斯大林以十分宽容和理解的态度回答了上述问题：“我们认为，中国民主政府不必拒绝与某些资本主义国家，包括美国建立正式的关系，只要这些国家在军事上、经济上和政治上正式停止援助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斯大林强调，“这个条件非常重要”。此外，只要贷款和贸易的条件不会限制中国的主权和损害中国的民族工业，苏共中央认为“不宜拒绝外国贷款及与资本主义国家进行贸易活动”。至于同香港的贸易，斯大林请科瓦廖夫转告陈云，苏共“希望中共不要排斥民族资产阶级”，而应“鼓励民族资产阶级在国内外的贸易活动”。不过，买卖什么货物应该由中共来决定。[④]鉴于科瓦廖夫在19日的电报中说，中共领导人对渡江和南下作战持过于乐观的态度，斯大林在另一封长电中告诫中共，要警惕帝国主义采取从经济封锁到武力干涉的任何措施，特别是英美军队在后方登陆的危险性明显增加。因此，斯大林提出了三项建议：1. 中国人民解放军不要匆忙南下及进军边境地区，而要做认真准备。2. 从南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主力中抽出两支精锐部队，调往各口岸，补充那里的军队，以防备敌军的行动。3. 目前不

① 1949年2月16日斯大林致捷列宾电，АПРФ, ф.45, оп.1, д.330, л.129-130,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с.99。2月26日，西方记者称，苏联驻北平的总领馆停止了自己的活动。媒体注意到，苏联驻北平总领事齐赫文斯基没有参加预定的外国领事会议。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с.541。

② 1949年3月13日科瓦廖夫致莫洛托夫电，АПРФ, ф.45, оп.1, д.331, л.1-2,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с.104。

③ 1949年4月13日科瓦廖夫致斯大林的报告，АПРФ, ф.45, оп.1, д.331, л.15-21,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с.116-119。

④ 1949年4月19日、26日斯大林致科瓦廖夫电，АПРФ, ф.45, оп.1, д.331, л.24-25, 3,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с.120-121, 126。

要裁减中国人民解放军。[①]

此后，毛泽东还向科瓦廖夫通报了5月初中共代表和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在南京会谈的情况。毛泽东说，司徒雷登表示，美国人现在已经不再支持国民党政权了，以他为首的美国大使馆仍留在南京就是证明。关于在华的美国军队，只要人民解放军部队进入了青岛、上海，美国就将撤走陆军和海军。不过，为了保护美国人在上海的2亿美元财产，美国政府考虑要在上海保留一些军舰和部队。谈到未来的联合政府，司徒雷登希望尽量广泛地吸收民主人士的代表参加。司徒雷登说，联合政府成立并得到全国人民的支持后，会有许多国家与之建立外交关系。毛泽东对科瓦廖夫说，他不相信司徒雷登的话，至于美国等国家的大使没有离开南京，“我们对此不感兴趣，如果所有资本主义国家的大使馆都滚出中国，我们才高兴呐”。[②] 正如下面将要讲到的，中共当时与美国接触时的实际做法和态度要比毛泽东汇报的积极得多，他这样讲，当然是担心这件事会引起斯大林的疑虑。

通过不断地交流和沟通，到5月下旬至6月中旬，中苏之间已经在许多问题上形成了一致看法，如建立适应中国国情的经济领导核心和机制，加强海关和边防军建设，暂不削减军队人数，建立沿海防御阵地以防敌人在后方登陆，与苏联建交前不大规模宣传苏中友谊，加快成立中央人民政府的步伐，暂不成立东方共产党情报局，南下的部队不越出国境并暂不要求收回香港和九龙等等。[③]

西柏坡会谈后，苏联加快了向中共提供援助的步伐和力度。2月6日苏联部长会议作出决议，责成有关部门在10天之内将中长铁路所需要的汽车、汽车备件和器材以贷款供货的方式发送到中国；责成财政部从1949年度苏联部长会议准备金中给交通部拨付在东北的苏联工程技术人员所需经费578万卢布，其中412.5万卢布用于购买装备。同时，允许对外贸易部和国家银行再提供经费240.1万卢布；责成对外贸易部与中国东兴公司签订关于以商品供货方式清偿外汇支出和苏联外汇支出的协议；保留科瓦廖夫领导的满洲工作组全体人员出差期间在国内的职务及相关权利和待遇；允许科瓦廖夫根据在满洲完成的工作量确定固定的外汇工资标准，此工资标准也适用于其他在远东地区工作的专家；简化科瓦廖夫工作组人员出入境手

---

① *Ковалев* Диалог Сталина с Мао Цзэдуном, 1991, №6, с.86-87.

② 1949年5月23日科瓦廖夫致斯大林电，АПРФ, ф.45, оп.1, д.331, л.66-69,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с.132-134。

③ 1949年5月17日、23日科瓦廖夫致斯大林电，5月26日斯大林致科瓦廖夫电，6月14日科瓦廖夫致斯大林电，АПРФ, ф.45, оп.1, д.331, л.50-51, 66-69, 73-75, 101-111,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с.128-132, 132-134, 136-138, 141-147。

续，只需凭科瓦廖夫签字即可；责成远东军区司令马利诺夫斯基给予科瓦廖夫工作组提供通信工具、翻译、司机及医务人员和医疗器材；责成科瓦廖夫在一个月之内提出中国各生产领域和国民经济规划方面所需要的参考书和技术文献，以保证工作组专家、顾问的业务工作。[①]5月31日苏联部长会议还作出一项决议，决定租用5艘外国货轮（总载重5.5万吨）从黑海为中国北方地区运送石油产品。[②]6月16日又通过了帮助中国清除长江口的水雷的决议。[③]

这里有一个问题需要说明。有研究者认为此期斯大林似乎有意拖延给中国的贷款。[④]斯大林确实提出政府之间的贷款需要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批准，办理正式手续，但又指出这个手续也可以通过科瓦廖夫代办，而不必非要派正式代表团来苏联办理。[⑤]事实上，苏联政府确实采取了一些变通办法，为中共提供急需的贷款。如1949年3月为以郭沫若为首的中国解放区赴巴黎参加世界和平大会代表团提供100万卢布贷款（其中30万卢布以法国法郎支付）；[⑥]5月14日同意为出国工作的新华社记者拨款16万捷克克朗和5.3万英镑；同一天又决定为中共重要领导人到苏联治病提供200万卢布的贷款，[⑦]等等。

在寻求苏联援助方面，中共最迫切的就是要求苏联各方面的专家和顾问尽快到中国来。在4月9日与科瓦廖夫谈话中，毛泽东“急盼苏联专家尽快来到中国”，以便“编制一份合理使用贷款的计划，首先是恢复工业和铁路运输等重要部门的计

① 1949年2月6日苏联部长会议的命令，АПРФ, ф.3, оп.65, д.444, л.32-34,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с.88-89。

② 1949年6月17日库梅金给斯大林的报告，АПРФ, ф.3, оп.65, д.363, л.12,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с.147。

③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с.548.

④ Goncharov, Lewis, and Xue, *Uncertain Partner*, p.63.

⑤ 1949年4月19日斯大林致科瓦廖夫电，АПРФ, ф.45, оп.1, д.331, л.24-25,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с.120-121。

⑥ 1949年3月26日费德林给斯大林的报告，АВПРФ, ф.0100, оп.42, п.291, д.58, л.6-7; 1949年3月30日苏联部长会议决议，АПРФ, ф.3, оп.65, д.363, л.4,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с.108, 109。

⑦ 1949年5月14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АПРФ, ф.3, оп.65, д.363, л.6, 9,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с.127-128。从俄国档案看，此期间提出到苏联治病的有江青、林彪、刘亚楼等。见1949年4月28日周恩来致菲利波夫电，АПРФ, ф.45, оп.1, д.331, л.132，沈志华、李丹慧收集和整理：《中苏关系：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第19卷，华东师范大学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未刊，第97页；1949年5月12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Адибеков Г. М., Андерсон К. М., Роговая Л. А*. Политбюро ЦК РКП (б) - ВКП (б) Повестки дня заседаний 1919-1952, Каталог, Том III, 1940-1952, Москва: РОССПЭН, 2001, с.574；1949年5月25日雷斯科夫致斯大林函，АВПРФ, ф.100, оп.36, п.140, д.1, л.13-16, 20, 21,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с.135。这笔款项到7月21日已支付3万卢布。1949年7月21日贝斯特罗夫给费德林的报告，АВПРФ, ф.0100, оп.42, п.291, д.58, л.33,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с.169。

划"。谈到占领大城市的问题，毛泽东说，占领这些城市容易，但管理这些城市却很困难，尤其是上海，对于发电厂、自来水厂、大型企业及市内交通，中共都缺乏管理经验，因此担心"整个城市的生活瘫痪"。正是考虑到这一点，毛泽东说，"至今我们还没有下定决心占领上海"。最后，毛泽东请求苏共在占领上海之前派来一批"专门管理上海的专家"。[①]5月3日，毛泽东又致电斯大林，提出中共目前最重要的任务是解决经济建设问题，因此要求斯大林同意尽快向中共派遣苏联专家。[②]6月9日，毛泽东再次给斯大林发电说："我们在讨论了中央计划、财政、经济组织机构以后，已比较准确地确定了我们所需要的苏联专家的数量及其专长。"电报明确告诉斯大林，中国所需要的专家不少于600名，并准备在1949年和1950年上半年接受这些专家，把他们安置到各计划、财政、经济机关和工业企业中去。毛泽东又特别指出，第一批专家共258人，应于今年6—8月来华。电报还详细列表说明了拟聘600多名专家的所在专业。[③]6月11日毛泽东给斯大林的报告又提出要苏联派来国防工业的专家。[④]

越是临近全面地掌握政权，中共就越感到对国家的管理，特别是经济管理是个难题，也就越需要苏联提供帮助。另一方面，中共已经表明了自己的亲苏立场，却还不知道苏共将来对中共政权究竟采取何种方针，而这决定着大规模苏联援助是否能够到来。为此，毛泽东需要尽快派正式代表团访问苏联。

二、刘少奇访问莫斯科的重大收获

毛泽东最初考虑，在新政府成立后派任弼时和王稼祥率中共中央代表团访苏，时间在1949年的7月或8月。[⑤]5月上旬，因任弼时患高血压病，代表团改由刘少

---

① 1949年4月13日科瓦廖夫致斯大林电，АПРФ, ф.45, оп.1, д.331, л.15-21,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с.116-120。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年）》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496页。

③ 1949年6月9日毛泽东致斯大林电，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9-00192-01，第30–38页。这份重要的文件在俄国档案馆中始终没有找到。

④ 1949年6月14日科瓦廖夫致斯大林电，АПРФ, ф.45, оп.1, д.331, л.101-111,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с.141-147。

⑤ 1949年3月18日毛泽东致斯大林电，РГАСПИ（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ф.538, оп.1, д.331, л.5-7,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с.396-397。

奇、王稼祥和高岗组成。[①] 直到6月11日，毛泽东仍向莫斯科通报说，中共代表团要等8月人民政府成立后再访苏，以便正式签订贷款和专家的合同，同时能让苏联专家名正言顺地在华工作。[②] 刘少奇6月中旬赶到北京做出访的准备，以后情况有了变化，决定代表团在新政府成立前访苏，启程的日期是6月21日。[③] 目前没有证据说明这一变化的原因，但很可能是因为新政府成立的时间推迟，而中国又迫切需要苏联的贷款和专家，已经不能再等待了。

刘少奇等人6月26日到达莫斯科，8月14日离开苏联，期间高岗于7月30日先行回国。[④] 这次中共代表团出访的主要目的，其一是通过双方高级领导人的会晤，直接向斯大林表明中共在国内外重大问题上的立场，并听取苏共中央的意见；其二是了解苏共对中共的立场和态度；其三是寻求苏联的帮助和支援。在这一个半月的访问期间，根据目前掌握的档案文献和当事人的回忆，刘少奇与斯大林进行了4次正式会谈，其中6月27日和8月5日会谈在克里姆林宫斯大林办公室，6月11日会谈在克里姆林宫政治局会议室，7月27日会谈在孔策沃斯大林别墅举行。[⑤] 刘少奇还在7月5日和6日就访苏活动安排问题与科瓦廖夫，在7月23—25日之间就国内外贸易问题与米高扬，在7月30日就对外政策问题与外交部长维辛斯基

① 徐则浩：《王稼祥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年，第455页。海因茨希教授依据周恩来的一次谈话，确认本来毛泽东想自己率团访苏。但笔者在所有相关的文献中都没有找到丝毫的证据，所以，很可能周恩来对罗申讲的是客气话，并为提出毛泽东访苏的问题做铺垫。参见1949年11月10日罗申与周恩来谈话备忘录，АВПРФ, ф.0100, оп.42, п.288, д.19, л.81-85,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с.218-219；海因茨希：《中苏走向同盟的艰难历程》，第303页。

② 1949年6月14日科瓦廖夫致斯大林电，АПРФ, ф.45, оп.1, д.331, л.101-111,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с.141-147。

③ 徐则浩编著：《王稼祥年谱（1906–1974）》，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370–371页；金冲及主编：《刘少奇传》，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645–646页。

④ 金冲及主编：《刘少奇传》，第646、653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217、219–221页。如下文所说，这些时间的确定对于一些重大史实和重要文件的认定具有关键性的意义。

⑤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с.148-15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1册，第30–39、40–41页；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第404、410–415页；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Архив, 1996, №5-6, с.56, 58，中译文见沈志华执行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0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724、729页。师哲回忆说中苏工作会谈4–5次，也有著作称会谈5次（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第398页；裴坚章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49–1956）》，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第12页）。但根据中俄双方的档案文献，可以确定的正式会谈只有这4次。有可能人们把7月27日晚宴上的谈话也作为正式会谈了，因为这次谈话时间很长，而且有文字材料。还可参见海因茨希对这一问题的考证（海因茨希：《中苏走向同盟的艰难历程》，第305–306页）。

举行了正式会谈。[①] 通过这些会谈，中苏双方进一步加深了沟通和了解。此外，代表团的主要活动就是到苏联党和政府的各重要机构或企业参观，学习苏联的经验。[②] 苏联为此进行了周密安排，满足了中方的各项要求。[③]

的确，苏联为刘少奇的访问已经做好了充分准备，刚一见面，斯大林就为中共送上了一份大礼。在6月27日夜晚的第一次会谈中，斯大林几乎同意了此前中共提出的所有要求，甚至中方没有谈到的事情，斯大林也主动提出帮助解决。首先是贷款问题，鉴于中国新政府尚未成立，斯大林决定由苏共中央向中共中央提供3亿美元贷款，年利率1%，以设备、机器和各种类型的材料、商品的形式提供给中国，平均每年6000万美元，为期5年，分10年偿还。斯大林说，由两党签订贷款协议，这在历史上尚属首次。关于专家问题，斯大林说，苏联已经准备好在最近按照中方的要求派出第一批专家。专家的待遇只需按照中国优秀专家的高水平报酬标准提供，如果需要，差额部分将由苏联政府补足。如果苏联专家在中国有不良行为，交由苏方处理。斯大林强调，“我们不容许苏联专家对待中国专家和中国人民采取傲慢和轻视的态度”。至于中国急需的派往上海的专家，斯大林说，苏联已经挑选了15名专家，可以随时派去。斯大林主动提到了新疆问题，他认为中共不应当拖延占领新疆的时间，并表示苏联可以提供40架歼击机，帮助中共迅速地驱散和击溃拦在途中的敌骑兵部队。斯大林还建议，为了巩固国防，应当让汉族人向边境地区迁移，把汉族在新疆所占的人口比例从现在的5%提高到30%。关于海军建设，斯大林说，苏联准备帮助中国建立自己的舰队，首先可以帮助打捞沉船，还同意派遣一支分舰队去青岛港，以帮助中国巩固海防。对于中共提出的建立莫斯科与北平之间航线的请求，斯大林说，苏联已经准备好，现在就可以着手组建，还答应帮助中国建立飞机装配和修理工厂，向中国提供最新型的歼击机。[④] 最后，斯大林提出，苏联准备在所有中国需要的方面提供全面帮助，但为了使代表团能够广泛和公开地

---

①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с.163-164, 172-175；1949年7月22日、7月25日刘少奇给米高扬的信，АПРФ, ф.39, оп.6, д.38, л.166,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с.169, 170。刘少奇与米高扬会谈的材料没有看到，但刘少奇在22日信中提出了举行会谈的要求，而在25日信中提到了会谈的结果。

② 1949年7月6日刘少奇致斯大林信，АПРФ, ф.45, оп.1, д.328, л.51-55, *Ледовский* Визит в Москву делегации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Китая в июне-августе 1949г., 1996, №5, с.84-8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1册，第23–29页；1949年7月6日科瓦廖夫给斯大林的报告，АПРФ, ф.3, оп.65, д.363, л.20-23,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с.163-164。

③ 详见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第419–424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下卷，第218页。

④ 档案原件显示，斯大林在这里画了一个问号，并划掉了“最”字。

进行参观和开展各种活动，建议使用东北贸易代表团的名义。[①]

斯大林如此主动和慷慨的行为表明，苏共已基本确定了以中共政权为盟友的对华政策，至少要让毛泽东明白苏联是有此意向的。正如下文将要谈到的，斯大林的这一举动收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而刘少奇的访问也确实取得了令人瞩目的丰硕成果。

第一，通过这次访苏，中共领导人进一步得到了莫斯科的理解、信任和支持。刘少奇通过口头和书面的形式，详细介绍和解释了中共对内、对外政策，包括对苏关系的方针。这些汇报的内容，大部分都取得了斯大林的赞同和理解。在某些方面，斯大林还提出了一些建议和补充意见，如主张在谋求西方国家承认的问题上"最好不要急"；目前不要没收各帝国主义的在华经济企业，等一等再看；建议成立各省地方政府，以避免中央过分集权；应当要资本家与工人订立合同，以保障工人的利益；目前提出的共同纲领只是党的方针，应尽快着手准备国家宪法；尽早成立中央政府，以防敌人利用"无政府状态"捣乱等等。[②]

最让中共感到欣慰的，恐怕是斯大林多次对中共作出的高度评价，特别是对苏共过去指导中共工作中的某些做法表示道歉。[③]刘少奇在7月4日的报告中谈到中苏两党关系时写道："毛泽东同志与中共中央是这样认为的：即联共（布）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统帅部，而中共则只是一个方面军的司令部。局部利益应当服从世界利益，因此，我们中共服从联共（布）的决定，尽管共产国际已不存在，中共也没有参加欧洲共产党情报局。在某些问题上，如果中共与联共（布）出现分歧，中共在说明自己的意见后，准备服从并坚决执行联共（布）的决定。"尽管斯大林表示不同意中共服从联共（布）领导的提法，但对于中共真诚的态度，斯大林显然是颇有感触的。在7月27日的会谈中，斯大林主动谈到过去苏联在同中国共产党关系中存在的问题，其中主要是他在1945年要求毛泽东去重庆谈判的失误。他说：

---

① 1949年6月27日斯大林与中共代表团会谈纪要，АПРФ, ф.45, оп.1, д.329, л.1-7,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с.148-151。这个纪要是经斯大林审阅过的，并按照他的指示，由科瓦廖夫进行了补充和修改。

② 1949年7月4日刘少奇给斯大林的报告，АПРФ, ф.45, оп.1, д.328, л.11-50,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с.151-162；1949年7月18日刘少奇致中共中央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1册，第30–39页；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第405–409、419页。关于7月4日的报告，中国的档案也已经公布（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1册，第1–22页），内容与俄国档案完全一样。不过，在俄国的档案中有斯大林阅读时在文件上做的许多批注和划线，这些批注和着重线表明了斯大林对中共代表团所提问题的态度和倾向性意见。

③ 师哲回忆说，听过刘少奇回国后的汇报，"中央领导人对斯大林做的自我批评印象深刻，无不为之感动，受到鼓舞"。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第426页。

“由于不了解情况，我们过去曾经给中国的革命出了一些不好的主意，给你们的工作带来困难，干扰了你们。”斯大林对此表示歉意，并说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成熟的党，在政治、理论和国家建设各方面都取得迅速发展，祝愿中共站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前列。刘少奇说：“我们还是你们的学生。”斯大林毫不迟疑地表示，学生也可以超过先生，革命的中心将会从欧洲转移到东方，那时你们的历史责任就加重了。我们会落后的，你们会进步很快，也一定会超过先生，希望中苏两国无论什么时候都要讲团结。作为翻译的师哲感觉，斯大林是以深感内疚并抱有歉意的语气讲这番话的。①

第二，通过中苏两国进行国际分工的建议，斯大林表明了苏联赞同与新中国结成同盟关系的意向。斯大林主动提出，在国际革命运动中，中苏两家都应多承担些义务，而且应该有某种分工，就是说要分工合作。希望中国今后多担负些对殖民地、半殖民地附属国家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方面的帮助，因为中国革命本身和革命经验会对它们产生较大的影响，会被它们参考和吸取。……因此，为了国际革命的利益，咱们两家来个分工：你们多做东方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工作，在这方面多多发挥你们的作用和影响。我们对西方多承担些义务，多做些工作。斯大林还说，马克思和恩格斯逝世以后，西方的社会民主运动停滞了下来。革命中心由西方转移到了东方，而现在又转移到了中国和东亚。……你们应当履行对东亚各国革命所承担的责任。也许在马克思主义一般理论问题方面，我们苏联人比你们强一些。不过如果谈到把马克思主义原理运用到实践方面，你们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的经验。过去我们已经向你们学了许多东西。② 在中苏两党关系的历史上，出现这种亲密和融洽的现象，应该说还是第一次。

第三，刘少奇此行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希望苏联为中国经济和国防建设提供更多的援助，在这一点上，斯大林基本上满足了中国方面的要求，双方也签署了一些具体协定。

关于贷款协定。尽管中国急需贷款，但对于如何使用这笔贷款还没有具体计划。斯大林提出由双方组成一个共同委员会，确定使用贷款的货单。毛泽东要求把共同委员会设在中国，请苏联专家到中国来商定贷款的具体内容。贷款原则上

---

① 1949年7月27日刘少奇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电；裴坚章：《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49–1956）》，第13页；金冲及主编：《刘少奇传》下卷，第651–652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1册，第40–41页；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第414–415页。

② 1949年7月27日刘少奇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电；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第412页；*Ковалев* Диалог Сталина с Мао Цзэдуном, 1992, №1-3, с.78-79。

50%用于东北，其次是华北和西北的经济恢复。[①]7月11日双方商定，组成贷款协议起草委员会，协议由高岗以东北政府名义签字，以便于提交最高苏维埃批准，早日付款。[②]7月23日达成初步协议，7月26日中共中央对草案提出一些具体修改意见，确定协议应由中共中央与苏共中央签订，俟中国政府成立和中苏建交后，再以同样条件由两国政府签署。此外，删除购买苏联武器的内容，"使借款货单完全成为建设借款"。[③]贷款协定于7月30日由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和马林科夫（代表苏共中央）签字。[④]

关于专家协定。早在米高扬离开西柏坡后，1949年1月14日周恩来就曾致电陈云、林枫，提出应为聘请苏联专家商定一套待遇制度和合作办法，以便共同遵守。[⑤]出国前王稼祥又让邓力群准备了一份有关方针政策的文件。[⑥]但是，目前没有看到中方准备的这些材料。在8月5日夜晚中苏领导人的会谈中，斯大林重申了他6月27日关于苏联专家待遇的意见。据师哲回忆，斯大林再次强调苏方人员如果犯了错误，一律由苏方处理，还提出苏联专家家属的生活费用应由中方承担。[⑦]会谈后，双方讨论并商定了《关于苏联专家在中国工作条件的协定》。协定是以联共（布）中央和中共中央的名义签订的，其中规定：派到中国的600名苏联专家将以顾问的资格在中国各部门负责人领导下工作，期限一年，苏方负责人为科瓦廖夫；苏联专家的薪金依照中国同等职务和资格的中国专家所规定的标准，以中国货币支付，并保证提供中国专家所享有其他供应和补贴；苏联专家在华工作期间，中

① 1949年7月2日刘少奇等致朱德、周恩来电，7月4日毛泽东致刘少奇等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1册，第60–61页；金冲及主编：《刘少奇传》下卷，第647页。《刘少奇年谱（1898–1969）》（第220页）和《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第514页）均把毛泽东7月4日的电报说成是8月4日发出的，有误。

② 1949年7月18日刘少奇致中共中央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1册，第31页。

③ 金冲及主编：《刘少奇传》下卷，第651页。1949年7月26日中共中央致刘少奇等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1册，第175–177页。后来，贷款协议确是以两国政府名义正式签订的，但由于朝鲜战争爆发，这笔贷款还是主要用于购买武器了。参见沈志华：《对50年代苏联援华贷款的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3期，第83–93页。

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1册，第176页。《刘少奇年谱（1898–1969）》（第219页）和《刘少奇传》（第653页）都说该协议是"代表中国和苏联签订"的，不确。

⑤ 朱佳木主编：《陈云年谱（1905–1995）》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545–546页。

⑥ 徐则浩编著：《王稼祥年谱（1906–1974）》，第370页。

⑦ 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第415页。

方应无偿提供住房、家具及取暖设备。[①]8月9日，苏联部长会议开会讨论并作出了关于派遣苏联专家赴中国的决议。[②]同日，刘少奇将协定全文报请中央批准。8月10日，中共中央回电，同意照此签字。[③]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斯大林曾反复强调的如苏联专家犯有错误应由苏方处理的原则，在协定草案中不见了。按照毛泽东的建议，刘少奇致函斯大林说，希望让科瓦廖夫和已经确定的苏联专家同他一起回国，其余专家可于8月中下旬与王稼祥同行，并请求斯大林下达指示，加快专家出发前的准备工作。斯大林阅读信函时，特意在这段话下面划了着重线。[④]当刘少奇8月14日离开莫斯科时，有220名苏联高级经济干部和工程师与他同车而行。[⑤]

关于为中国建立大学。刘少奇在7月6日提出，希望苏联政府建立一所大学，专门为中国培养工业、贸易、财政、法律等方面的专家和干部，学员1000人，学制1—4年不等。[⑥]斯大林在7月11日的会谈中说：这是好事，有困难，但可以办。[⑦]7月25日，毛泽东去电表示：同意在莫斯科建立一所中国大学，经费应讲明由中国担负。[⑧]7月29日苏共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了这个问题。[⑨]或许是考虑到在首都设立一所中国人的大学过于招摇，苏方提出把学校设在哈萨克斯坦的阿尔马达（Алма-Ата，即阿拉木图）市。显然是感到不满，8月7日，刘少奇和王稼祥建议把这所大学改设在北平，请苏联派教授来中国讲课，毛泽东复电同意这个建议。[⑩]8

---

① 关于苏联专家在中国工作条件的协定（1949年8月），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9-00192-01，第9–10页。这是一份有关苏联专家待遇的极其重要的文件，其内容与后来毛泽东访苏后双方签订的正式协定差别很大。目前尚未看到相应的俄国档案。

②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с.547.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1册，第44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1册，第250页。

④ 1949年8月2日刘少奇致斯大林信，АПРФ, ф.3, оп.65, д.364, л.1-2//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1996, №5, с.93。

⑤ 1949年8月26日刘少奇致中共中央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1册，第45页。

⑥ 1949年7月6日刘少奇致斯大林信，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1册，第23–29页；1949年7月6日科瓦廖夫给斯大林的报告，АПРФ, ф.3, оп.65, д.363, л.20-23,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с.163-164。

⑦ 1949年7月18日刘少奇致中共中央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1册，第30–39页。

⑧ 1949年7月25日毛泽东致刘少奇电，АПРФ, ф.45, оп.1, д.328, л.137-140,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с.170-17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下卷，第219页。

⑨ Политбюро ЦК РКП (б) - ВКП (б) Повестки дня заседаний 1919-1952, с.591.

⑩ 1949年8月7日毛泽东致刘少奇、王稼祥电，金冲及主编：《刘少奇传》下卷，第653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下卷，第220页。

月 13 日，苏共中央外交委员会讨论并起草了有关这一问题的决议。[①] 随后，苏联教育学专家 П. И. 费森科和 В. Ф. 菲利波夫被派往中国帮助筹划学校的建立。这所学校就是著名的中国人民大学。[②] 此外，中国希望派一批经济管理干部去苏联进行短期学习的要求，也得到了满足。[③]

关于空军和海军建设。7 月 10 日，根据朱德建议，毛泽东指示周恩来：可考虑选派三四百人去苏联学习空军，同时购买 100 架左右飞机，组建一支空军攻击部队，准备 1950 年夏季夺取台湾。7 月 26 日，中央军委决定以第十四兵团司令部及直属部队和军委航空局组成空军领率机关，派刘亚楼等赴苏具体商谈购买飞机、聘请专家顾问和帮助开办航校等事宜。中央书记处电告刘少奇与苏方商谈。在 7 月 27 日的会谈中，苏方答应向中国出售雅克式战斗机 100—200 架、轰炸机 40—80 架及备份机件和重磅炸弹，也同意为中国培训飞行员，只是提议不必来苏联，航空学校可以设在中国。[④]8 月 6 日，中共中央致电刘少奇，因国民党飞机在长江一线轰炸造成严重损失，请苏联提前运来 360 门高射炮。[⑤] 经商谈，苏联军方于 8 月 9 日提出了一个组建高炮兵团的方案：以 3.7 厘米和 8.5 厘米高射炮各 180 门组成 10 个高炮团，一周后即可准备好；为训练中国炮手，苏联将派 22 名教练在炮兵上校或少将带领下，随中共代表团去中国。11 日中方回电，完全同意苏联方案，提出再订购 360 挺高射机枪。[⑥] 除了 6 月 27 日谈到的对海军的援助外，根据刘少奇的要求，斯大林在 11 日会谈中又答应在旅顺帮助建立一所海军学校，并帮助中国建

---

①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с.547-548.

② 关于中国人民大学创立的过程，详见 Douglas A. Stiffler, "Creating New China's First New-Style Regular University, 1949-50", in Jeremy Brown and Paul G. Pickowicz (eds.), *Dilemmas of Victory: The Early Year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288-308。

③ 1949 年 7 月 6 日刘少奇致斯大林信，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 1 册，第 26 页；1949 年 7 月 6 日科瓦廖夫给斯大林的报告，АПРФ, ф.3, оп.65, д.363, л.20-23,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с.163-164；1949 年 7 月 25 日毛泽东致刘少奇电，АПРФ, ф.45, оп.1, д.328, л.137-140,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с.170-171。

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第 529 页；吕黎平：《赴苏参与谈判援建空军的回忆》，《军事史林》1994 年第 1 期，第 25 页。

⑤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 1 册，第 236 页。

⑥ 1949 年 8 月 10 日刘少奇致中共中央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 1 册，第 47–48 页；金冲及主编：《刘少奇传》下卷，第 653 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下卷，第 221 页。

立起海岸防御体系。①

不久，苏联便履行了诺言。1949 年 9 月 19 日苏联部长会议责成武装力量部向解放军总部及军事学校派遣领导干部、顾问、教员、教官及服务人员共 915 人，其中空军 780 人，海军 86 人，炮兵 21 人，所有费用均由财政部从苏联部长会议准备金中支出。同时，向空军提供各种教学用飞机 334 架、装有指挥仪和测距仪的高射炮 360 门（8.5 厘米的 120 门，3.7 厘米的 240 门）、高射机枪 360 挺及炮弹，价值总额 2650 万美元。作为附件给军事顾问和教官的指令，要求他们服从中方的领导，尊重中国军人，不准收受各种额外的劳动报酬，不准享受协议书中没有规定的各种无偿物质服务等。②11 月 4 日，为保证中国航校和高射炮团组织筹备和正常展开工作，苏联部长会议作出决议，再向中国增派 97 名空军顾问、教官及军医等服务人员，供应 500 辆汽车、12 台拖拉机、6 架 У-2 型飞机、91 台航空发动机及其他辅助设备，价值 2800 万卢布。11 月 19 日苏联部长会议作出决议，向中国提供战斗机、教练机和运输机以及航空发动机、高射炮、机关枪等装备，总共为 1.258 亿卢布。以后两个月，部长会议又连续三次决议向中国提供伞降物资、机场装备、航空汽油等共计 1.663 亿卢布。③

关于新疆问题。对于斯大林的尽快占领新疆的建议，中国领导人非常重视。刘少奇在 7 月 4 日的报告中说，占领新疆的最大困难就是如何肃清通往新疆的道路和解决交通工具的问题。7 月 6 日又告诉斯大林，毛泽东同意苏联帮助解放新疆，并建议将苏联提供空军援助和空运部队的问题具体化。④斯大林 11 日答复，新疆没有飞机场，空运军队还无法办到，至于帮助扫清通往新疆的道路，苏联可派一个

---

① 1949 年 7 月 6 日刘少奇致斯大林信，АПРФ, ф.45, оп.1, д.328, л.51-55//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1996, №5, с.84-8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 1 册，第 23–29 页。1949 年 7 月 18 日刘少奇致中共中央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 1 册，第 35 页。

② 1949 年 9 月 19 日苏联部长会议决议及附件，АПРФ, ф.3, оп.65, д.418, л.413-422,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с.182-186；АВПРФ, ф.07, оп.23а, п.236, д.18, л.32-33, 126，转引自 *Кулик* Китайская Народная Республика в период становления (1949-1952гг.)//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1994, №6, с.75。

③ 1949 年 11 月 4 日苏联部长会议决议，АПРФ, ф.3, оп.65, д.418, л.34-38；1950 年 1 月 20 日梅尼希科夫给斯大林的报告，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с.212-214, 344-347。

④ 1949 年 7 月 4 日刘少奇给斯大林的报告，АПРФ, ф.45, оп.1, д.328, л.11-50,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с.151-162；1949 年 7 月 6 日刘少奇致斯大林信，АПРФ, ф.45, оп.1, д.328, л.51-55//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1996, №5, с.84-8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 1 册，第 26–27 页。

团四五十架飞机，很容易解决问题。[①]看来，斯大林此时对空运问题有些犹豫，不过答应派飞机助战已令中共感激。毛泽东于7月23日给彭德怀发去电报说，苏联“极盼早占新疆，彼可给以种种援助，包括几十架飞机助战”，建议彭德怀“冬季即占领迪化，不必等到明春”。[②]7月25日，毛泽东向刘少奇通报说，秋季占领兰州、西宁等地后，即可准备进取新疆，并指示代表团的政治秘书邓力群尽快赶到伊宁，“在那里建立与北平的无线电联系”。[③]刘少奇向马林科夫通报了这一情况，并通过师哲（卡尔斯基）与苏联商定了新疆与莫斯科之间进行无线电联系的呼号、波段和频率，因为“新疆与莫斯科之间的联系在最初阶段是极其必要的，借此新疆才可以与北平建立联系”。第一次无线电联系的时间定于8月14日晨。[④]在苏联驻伊宁领事阿里斯托夫的帮助下，邓力群在新疆建立了与北平及莫斯科的电讯联系，并结识和拜访了三区的领导人。后来，中共对新疆问题采取和平方式解决，“力群电台”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⑤]由于新疆的和平解放，苏联空军没有用上，反而是空运在帮助解放军迅速入疆时发挥了重要作用。1949年11月5日，第6军军直机关及下属第17师（炮兵除外）共计12446人，还有武器装备125734吨，就是租用苏联航空公司的45架Л-2型运输机，分别从酒泉运送到哈密和从哈密运送到迪化的。[⑥]不过，对于中方提出的修建一条从苏联经新疆连接中国内地的铁路的建议，斯大林认为线路太长，可以先考虑铺设石油管道。作为替代方案，他主张可以修建经外蒙古库伦至张家口的铁路。[⑦]

---

① 1949年7月18日刘少奇致中共中央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1册，第34–35页。

② 毛泽东：《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644页。

③ 1949年7月25日毛泽东致刘少奇电，АПРФ, ф.45, оп.1, д.328, л.137-140,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с.170-171。

④ 1949年8月刘少奇致马林科夫信（俄文），卡尔斯基致米克拉舍夫斯基信（俄文），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9-00004-03，第10页；109-00004-04，第11–14页。

⑤ 关于邓力群在新疆的活动以及苏联在解放新疆中所起作用的详细情况，见邓力群：《“力群电台”收发的电报选编》，《中共党史资料》1990年第36期，第1–38页；邓力群：《新疆和平解放前后——中苏关系之一页》，《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5期，第143–150页。另参见朱培民：《新疆和平解放始末》，《中共党史资料》第三十二辑，第188–211页；沈志华：《中苏结盟与苏联对新疆政策的变化(1944–1950)》，《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3期，第213–227页。

⑥ 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党史工作委员会、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政治部编：《新疆和平解放》，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30、33–36页；2001年6–9月笔者采访王亚志记录。王亚志时任中央军委作战部参谋。

⑦ 1949年7月18日刘少奇致中共中央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1册，第35页。几个月后，中苏签订了修建这条铁路的协定。

当然，这次访问也有一些问题未能得到解决，其中主要是如何处理 1945 年的中苏条约和帮助中共解放台湾的问题。

关于中苏条约问题。这主要是指中长铁路、旅顺和大连问题，恰恰在这些问题上，反映出中苏之间的利益冲突。[①] 米高扬走后，中共显然对这个问题有了进一步考虑。访苏代表团出发前，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与刘少奇、王稼祥进行了长时间谈话，其中谈到新中国建立后如何处理原中苏条约问题时，毛泽东说“可以谈谈看”。[②] 对此，中共采取了试探的做法。在中共中央 7 月 4 日递交斯大林的书面报告中，关于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处理，先是说“准备加以承认和继承”，但接着在谈到具体处理方式时又说，中方考虑有三种：1. 中国政府宣布条约继续有效，不加任何修改；2. 重新签订新约，对原有文字和内容有所增减；3. 通过政府代表换文，暂时维持原状，以后再说。斯大林在前面那句话下面划了着重线，并写道：“对。”而对于中方提出的三种形式，斯大林的批示是：“等毛泽东到莫斯科后再决定这个问题。”在 7 月 11 日会谈中，斯大林向刘少奇表明了这个意见。[③] 其中关于中长铁路和旅顺港的问题，因为双方在西柏坡均已表态，这次就没有涉及。不过，在刘少奇来莫斯科之前，斯大林从科瓦廖夫那里了解到：在谈到有关长春铁路的问题时，尽管高岗和陈云表面上都坚持认为条约是平等的和令人满意的，但“中国人暗中想要全面控制铁路，实际上他们正在尽力从苏联人手中夺取这条铁路的管理权”。[④] 斯大林显然认为还是将问题搁置起来要好一些。

但是，在西柏坡没有谈到的大连问题上，双方还是交换了意见。其一，中方希望能够开放大连港，以利于同日本和香港做生意，还询问是否可以允许美国和英国的商船进出，为此，中方甚至愿意把条约期限从 30 年延长至 60 年。其二，中方希望在大连和东北确定统一的货币，以减少外汇负担，恢复大连的工业。[⑤] 对第一个

---

① 苏联外交官贾丕才回忆说：“斯大林对毛泽东不信任的最主要原因之一是旅顺、大连和长春铁路问题。” Goncharov, Lewis, and Xue, *Uncertain Partner*, p.67。

② 徐则浩：《王稼祥传》，第 456 页。

③ 1949 年 7 月 4 日刘少奇给斯大林的报告，АПРФ, ф.45, оп.1, д.328, л.11-50,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с.151-162；1949 年 7 月 18 日刘少奇致中共中央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 1 册，第 33–34 页。

④ *Ковалев* Диалог Сталина с Мао Цзэдуном, 1992, №1-3, с.86；有关文件可参考科瓦廖夫的私人档案，见 Goncharov, Lewis, and Xue, *Uncertain Partner*, p.63。

⑤ 1949 年 7 月 6 日刘少奇致斯大林信，АПРФ, ф.45, оп.1, д.328, л.51-55//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1996, №5, с.8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 1 册，第 27 页；1949 年 7 月 6 日科瓦廖夫致斯大林的报告，АПРФ, ф.3, оп.65, д.363, л.20-23,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с.163-164。

问题，7 月 11 日斯大林明确答复："在各国未承认中国政府、对日和约未订立以前，大连港口应为中苏两国所利用。"实际上是回绝了中方的请求。对第二个问题，鉴于苏联内部有不同意见，斯大林提出让东北与大连苏联占领当局"商量解决"，原则上"大连政权应与东北政权统一"。①

还有一个与中苏条约有关的就是蒙古问题，尽管知道斯大林的明确态度，但刘少奇在书面报告中还是借"民主党派及学生和工人"之口反映了一些中国的看法，而作为中共的表态，报告的措辞也是有所保留的："蒙古人民要求独立，根据民族自决的原则，我们应该承认蒙古独立，但如果蒙古人民共和国愿意与中国联合，我们自然欢迎。这只有蒙古人民才有权力决定。"② 在会谈中，双方都没有提及这个问题。显然，此时中苏都致力于友好和结盟，宁愿把利益矛盾的问题拖到以后解决。

莫斯科会谈中另一个隐含的分歧是解放台湾问题。毛泽东在 7 月 25 日要刘少奇转给斯大林的电报中，明确地提出希望苏联在解放台湾的问题上给予直接的军事援助。电报说攻占台湾的军事行动预计在 1950 年下半年开始，此前必须建立空军部队和海军舰队。除了要求苏联为中国提供飞机和训练飞行员外，毛泽东还试探性地提出请苏联空军和海军专家及飞行员参加攻占台湾的军事行动。③ 刘少奇是否或怎样向斯大林转达了这些话，目前看到的档案文献无法证实。不过，斯大林在 7 月 11 日的会谈中反复强调的基本思想是：我们不怕战争，反对战争，尽一切努力

① 1949 年 7 月 18 日刘少奇致中共中央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 1 册，第 35 页。1945 年 8 月苏联占领旅大地区后，市面上流通的货币有朝鲜币、伪满币、日本币、苏联红军券等。1948 年 11 月进行了第二次币制改革，经苏联占领当局批准，关东公署发出通告，由关东银行将流通中的苏联红军券及一切旧币全部收回，统一发行由苏联印刷的关东币。东北币是由东北银行在战争期间发行的地方流通券，1949 年 4 月开始在旅大地区流通。1949 年 3 月 12 日陈云向苏方提出了东北货币统一的问题，苏联代表科瓦廖夫及苏联财政部和外交部都表示反对，认为解决这个问题还为时过早。经与苏联当局协商，1950 年 6 月 16 日东北银行奉命接管了关东银行，改为东北银行大连分行。由此，用东北币统一了东北全境的货币。1951 年 3 月 20 日，根据周恩来签署的《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令》，"决定收回东北银行和内蒙古人民银行所发行的地方流通券"，以全国统一的人民币为法定货币单位。见 1949 年 3 月 13 日科瓦廖夫致莫洛托夫电，АПРФ, ф.45, оп.1, д.331, л.1-2；3 月 22 日斯克沃尔佐夫致维辛斯基的信，兹韦列夫致莫洛托夫的信，АВПРФ, ф.0100, оп.42, п.291, д.59, л.4, 5-6,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с.104-107；1948 年 12 月 2 日关东公署关于币改工作总结，大连市档案馆，2/1/228，第 21–31 页。参见陈文登编著：《旅大特殊时期老票证（1945–1955）》，大连：大连出版社，2007 年，第 1–14 页。大连市史志办公室编：《大连市志：金融志·保险志》，大连：大连海事大学出版社，2004 年，第 72–78 页。

② 1949 年 7 月 4 日刘少奇给斯大林的报告，АПРФ, ф.45, оп.1, д.328, л.11-50,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с.151-162。着重号是笔者加的。

③ 1949 年 7 月 25 日毛泽东致刘少奇电，АПРФ, ф.45, оп.1, д.328, л.137-140,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с.170-171。

制止战争；和平是最重要的，要争取和平多几年。[①] 科瓦廖夫回忆说，斯大林还指出，苏联从军事上支援进攻台湾，将意味着同美国空军和海军发生冲突，从而为他们发动新的世界大战提供借口。此外，苏联在战争中已经承受了无法估量的损失，俄国人民不会答应参与这场冲突。在 7 月 27 日的会谈中，斯大林重复了这些看法。会谈结束时，刘少奇宣布撤回请求援助的要求，表示这个问题已经过去了。[②] 从斯大林的一贯做法看，他采取这样的态度是很可能的，也是可以理解的。在斯大林看来，苏联帮助中国建立空军和海军就是援助了，解放台湾是中共自己的事情。[③]

综合上述情况可以看出，中苏之间满足对方要求的限度取决于他们对国际问题观察的一致性，以及他们对这种合作是否符合各自长远目标的认识。由于中国与苏联在意识形态方面有共同的认识基础，在国际斗争中有一致的战略考虑，因此结成同盟关系是符合双方的长远利益的。从这一基点出发，毛泽东和斯大林都努力寻求在重大问题上达成谅解，而在有争议的问题上采取暂时搁置或退让的方针。这就是莫斯科会谈得以成功的原因。由此可以认为，刘少奇访苏以后，中苏战略合作的构架已经形成。[④] 也正是在这样判断的基础上，毛泽东公开宣布了向苏联“一边倒”的外交方针和建国方针。

三、毛泽东宣布中共中央的既定方针

1949 年 7 月 1 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毛泽东在文中宣布了中共中央的既定方针——向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倒”。[⑤] 毛泽东在 3 月七届二中全会所说的“发表文告”说明与苏联关系的那个“机会”终于到了。那么，毛泽东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宣布“一边倒”？这一举动的结果又如何呢？

---

① 1949 年 7 月 18 日刘少奇致中共中央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 1 册，第 36–37 页。参见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第 406–407 页。

② *Ковалев* Диалог Сталина с Мао Цзэдуном, 1991, №6, с.88.

③ 在 1949 年 10 月进攻金门战役失利后，毛泽东访苏时明确提出要苏联派志愿空军或秘密部队帮助攻占台湾。斯大林则表示，可以提供武器装备和军事顾问，但苏联的空军和海军都不能直接参与作战。以后，中共就没有再提这个问题，而是不断催促苏联提供空军和海军装备。详见沈志华：《把断裂的历史链条连接起来》，《党的文献》2008 年第 4 期，第 59–68 页。至于苏联态度的转变及其原因，详见沈志华：《中共进攻台湾战役的决策变化及其制约因素（1949–1950）》，《社会科学研究》2009 年第 3 期。

④ Chen Jian, The Sino-Soviet Alliance and China's Entry into the Korean War, *Working Paper*, 1992, No.2,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p.15.

⑤ 《人民日报》1949 年 7 月 1 日，第 1 版；毛泽东：《毛泽东选集》合订一卷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 年，第 1477 页。

过去研究者受当事人对刘少奇访苏时间记忆错误的误导，认为毛泽东此举是向斯大林示好，为莫斯科会谈铺路。现在，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一边倒"宣言是6月27日会谈的直接结果。[①]如前所述，毛泽东早在一年多以前就确定了倒向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的方针，对此，他不仅在党内反复宣传，而且一直渴望让斯大林明白这一点。尽管他访问莫斯科的愿望没有实现，但米高扬访华总算让苏联对中共的立场有了全面而深刻的了解。但是斯大林究竟是什么立场，毛泽东还没有把握。在这个问题上，莫斯科从来没有一个明确的和完整的说明，[②]苏共与中共接触时的谨慎表现更让毛泽东心里没底。在他向全党保证"一定要到来"的国际援助尚未到来的时候，毛泽东宣布一个表明未来新中国将与苏联结盟的方针，不仅对党内和国人没有说服力，甚至连他自己也缺乏信心。斯大林在6月27日会谈中的表现终于让毛泽东看到了光明，6月28日下午，毛接到了刘少奇关于会谈情况的报告。[③]这正是他期待已久的结果，于是，发表文告的"机会"也就到来了。当然，毛泽东在斯大林刚刚以实际行动表明了苏共的立场后就迫不及待地发表宣言，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目的，就是巩固刘少奇访苏的成果，进一步加强中苏结盟的趋势。为此，毛泽东必须让生性多疑的斯大林放下心来支持和援助中共，而在这方面，最敏感的就是中共正在与美国大使司徒雷登频繁接触的情况。

早在1948年底苏联驻华使馆就报告说，种种迹象表明，"美国人决心直接同共产党接触"。[④]1949年3月10日，司徒雷登请求国务院授权他不仅以外交官的名义，而且以久居中国的老朋友的身份，与中共高层接触，以便消除他们对美国的误会，并希望能对中共有所影响。4月6日艾奇逊回电，授权司徒继续留在南京，寻机与中共接触。[⑤]国民政府迁移广州时，4月12日和22日，国务院决定听取司徒的建议，美国使馆不迁走，而是留下来收集情报、保护侨民，并与中共当局建立联系。[⑥]中央情报局则更明确地表示了倾向性意见：观察几个月或一年后便应承认中国新政

---

① 详见沈志华:《冷战史新研究与档案文献的收集和利用》,《历史研究》2003年第1期，第140–150页。

② 仔细查阅米高扬访华期间的12个报告可以看出，毛泽东几次要求苏共表明对中共的立场和看法，均未有结果。虽然在一些具体问题上表示赞同或支持中共的做法，但米高扬始终没有全面阐述苏共对中共的方针。

③ 金冲及主编:《刘少奇传》下卷，第647页。

④ 1948年12月27日马卢欣关于美国在华政策的备忘录，АВПРФ, ф.100, оп.42, п.296, д.117, л.7-23，沈志华、李丹慧收集和整理:《中苏关系：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第6卷，第1333–1343页。

⑤ Stuart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March 10, 1949; 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Stuart, April 6, 1949, in *FRUS*, 1949, Vol.8, pp.173-177, 230-231.

⑥ 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Stuart, April 12, 22, 1949, in *FRUS*, 1949, Vol.8, pp.677-678, 682-683.

府。[①] 毛泽东向来敌友分明，中共既确定了走苏联的道路，在冷战的格局中，自然是要坚持反美立场的，何况美国一直在支持他的宿敌蒋介石。不过，从策略上讲，毛泽东并没有采取一种僵硬的立场。从处理华德事件的过程就可以看出，中共在对美关系上始终是灵活的和留有余地的。[②] 在攻占上海前夕，毛泽东提出，如果美英能断绝与国民党的关系，可以考虑同他们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③] 于是，便有了黄华与司徒互访的情节。[④]

5 月 7 日，黄华与司徒的秘书、燕京大学的同学傅泾波第一次见面，提出在承认中国问题上，美国应表现主动，并接受了傅泾波的建议，答应见“老校长”司徒雷登。[⑤]5 月 10 日毛泽东致电南京市委，同意黄华与司徒见面，“以侦察美国政府的意向为目的”。电报叮嘱说，应申明谈话是非正式的，如司徒态度友善，“黄华亦应取适当的友善态度，但不要表示过分热情”，如美表示愿意与中共办交涉，不要拒绝。[⑥]5 月 13 日黄华拜访司徒，近两个小时的谈话，按照司徒的描述，是“友好而不拘礼节的”。当黄华介绍了中共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原则后，司徒说，共产党目前还没有政府；国际惯例是任何得到本国人民明确支持，并有能力和愿意履行国际义务的政府都可以得到承认。对于黄华提出的美军撤离青岛基地的要求，司徒答应转达，并说，美国已停止援助蒋介石，不愿参与中国内战。但司徒回避了与国民党政府断交的问题。[⑦] 对于上述接触的情况，中共及时向苏联进行了通报。在与傅泾波会见前（5 月 4 日），以及两次与美方接触后（5 月 10 日和 15 日），黄华都把中共的想法和会见的情况告诉了留在南京的苏联参赞列多夫斯基。毛泽东则在 5 月

---

① ORE 45-49, Probable Developments in China, 16 June 1949, CIA Research Reports China, Reel-1-0277, pp.27-48.

② 详见杨奎松：《华德事件与新中国对美政策的确定》，《历史研究》1994 年第 5 期，第 104–118 页。

③ 中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 年，第 83 页。

④ 关于这个问题，过去已有很多研究，但看法不一。况且，有关中共的立场和态度，研究者依据的主要是美国人的转述和当事人的回忆。最近，《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的出版，弥补了这一缺憾。

⑤ Stuart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May 11, 1949, in *FRUS,* 1949, Vol.8, pp.741-742；黄华：《亲历与见闻——黄华回忆录》，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 年，第 80 页。司徒雷登在日记中记载的这次会见是在 5 月 6 日，这应该是指美国时间。司徒雷登：《司徒雷登日记：美国调停国共争执期间前后》，陈礼颂译，傅泾波校，香港：香港文史出版社，1982 年，第 66 页。

⑥ 中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第 87–88 页。

⑦ Stuart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May 14, 1949, in *FRUS,* 1949, Vol.8, pp.745-747；黄华：《亲历与见闻》，第 81 页；列多夫斯基：《1949 年在南京与黄华的三次谈话》，陈鹤编译，《中共党史资料》2005 年第 4 期，第 187 页。司徒和黄华对这次谈话的记述略有不同。

22日向科瓦廖夫介绍了与美国接触的整个情况，并特别说明中共对美国不感兴趣。[①] 斯大林表示同意毛泽东的立场，并感谢中共通报的情况。[②]

毛泽东在党内和对苏共的讲话中，多次表示对美国是否承认中共政权既不抱希望，也不感兴趣。这是他的真实想法，至于让美国人感觉到他很看重这一问题，那只是一种策略。毛泽东担心的是在胜利的最后关头美国会采取某种行动，使中国革命功亏一篑。占领上海的第二天，5月28日，毛泽东以中央军委的名义下发的一封电报指出，"近日各帝国主义国家有联合干涉革命的某些迹象"，故应"预筹对策"。[③] 保持与司徒接触，让美国人心中燃起对中共的某种期望，就是毛泽东进行的心理战。因此，在得到莫斯科的认可后，中美接触进一步加强了。

与司徒会见后，黄华又见过两次傅泾波。傅转达司徒的话说，他对上次谈话是负责任的，美国舰队已于5月21日撤离青岛。6月3日，黄华还以南京市军管会外事处长的名义会见了留在南京的所有外交官，宣布了中共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原则及其他具体政策。会场气氛十分活泼。[④]6月6日，黄华再约司徒和傅泾波在外事处会晤。关于中美关系，双方重复了上次谈话的内容，给司徒留下的两个明确印象是，中共急于想让美国政府抛弃国民政府，想让美国在承认新政权方面表现出主动。司徒感到，黄华的态度"十分友好"。[⑤]

6月8日傅泾波再见黄华称，与司徒雷登研究后认为：关于中美关系，"美国现在很难作出正式表示，此需司徒返美后努力；但司徒需要知道中央更高级方面的意见，回去讲话才有力量"。因此，司徒表示有意在回国前见到周恩来。[⑥] 得到报告后，中共中央非常谨慎，决定通过非官方渠道处理这件事，便让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去信邀请司徒访问北平。6月14日，周恩来以中央名义复电南京市委：司徒

---

① 列多夫斯基：《1949年在南京与黄华的三次谈话》，第182–187页；1949年5月23日科瓦廖夫致斯大林电，АПРФ, ф.45, оп.1, д.331, л.66-69,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с.132-134。

② 1949年5月26日斯大林致科瓦廖夫电，АПРФ, ф.45, оп.1, д.331, л.73-75,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с.136-138。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第510–511页。

④ 黄华：《亲历与见闻》，第82页。

⑤ Stuart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June 8, 1949, in *FRUS*, 1949, Vol.8, pp.752-753；黄华：《亲历与见闻》，第82–83页。

⑥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1册，第21页；黄华：《亲历与见闻》，第83页。司徒雷登日记没有提到这次会见，不过，他在6月8日致国务卿电中所提回国后再重返中国，以便说服中国采取独立的民族主义政策，抵制亲苏路线等意见，与傅讲的意思相符，只是没有提到要见周的情节。见 Stuart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June 8, 1949, in *FRUS*, 1949, Vol.8, p.754。后面的情节也说明，司徒不想让华盛顿知道他在这个问题上的主动姿态。

雷登及其秘书傅泾波如再要求来北平，可同意其"在返美前至燕京大学一行"。至于是否与周恩来见面，"待其到北平后再定"。[①]

6月18日南京市委报告：傅泾波往见黄华称，"司徒雷登最近得到美国国务院指令，赞成其与中共联络，并希望司徒雷登返回美国两个月后，暂时以私人身份（解除大使职务）回北平，将来承认中国新政权时，重新任命其为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离开中国期间，以美国大使馆参事周维陆与中共方面继续保持联系。"由于司徒雷登没有提到返回美国前要去北平之事，电报特别请示，是否需要暗示司徒雷登，"使他主动提出去北平要求"。[②]6月21日，周恩来答复：陆志韦已"去信暗示司徒，如请求来平，可能得到中共许可。他如不再提，我们暂时不必表示，以观其变"。但毛泽东在这里又特意加了一句："待他返美前约十天左右，可表示如他欲去平，可获允许并可望与当局晤谈。"[③]显然，此时毛泽东还不愿放弃这条线索。

6月24日，司徒接到陈铭枢从北京来电，说他已见到毛泽东和周恩来，"非常顺利"。[④]据黄华回忆，他后来从周恩来处得知，6月初司徒获悉陈铭枢和罗隆基等民主人士将赴北平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便请陈铭枢向中共中央转达他想见中共领导人的意愿。他还对罗隆基说，如果新中国采取中间态度，不完全亲苏，美国可以一次借给新政府50亿美元，这接近印度15年所得的贷款。陈铭枢向毛泽东和周恩来转达了司徒的要求后，在给司徒的信中转达了毛泽东的答复："政治上必须严肃，经济上可以做生意。"但罗隆基到北京后，未向毛转达司徒雷登的口信，只是在许多年后才告诉周恩来。[⑤]《司徒雷登日记》6月26日（美国时间）记载：周裕康从北平回来，说毛泽东称，会像老朋友一样欢迎司徒雷登。司徒写道："显然，黄华已把我打算北上的愿望报告上去了。"同日，司徒还接到陆志伟6月16日发出的信，也提到北平之行。[⑥]这时，双方的态度还是积极的。

---

① 黄华：《亲历与见闻》，第83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1册，第21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1册，第21–22页。黄华的回忆没有提到18日的会见，在《司徒雷登日记：美国调停国共争执期间前后》（第73–74页）中，6月17日（美国时间）这一天记的是："华府传来关于我回国等消息。……傅往见黄华。"但是，在6月30日给国务卿的电报中，谈到他受邀去北平的背景时，司徒称：6月18日，黄华主动提出要安排他去北平，而傅没有表态。见 Stuart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June 30, 1949, in *FRUS,* 1949, Vol.8, p.766。笔者判断，司徒雷登因不愿承担责任而没有对国务院讲实情。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1册，第19页。

④ 司徒雷登：《司徒雷登日记》，第74页。

⑤ 黄华：《亲历与见闻》，第84–85页。

⑥ 司徒雷登：《司徒雷登日记》，第75页。

6月27日，傅泾波携陆志韦的信拜访黄华，信中说周恩来曾告陆志韦，毛泽东已宣布司徒雷登希望访问北平燕京大学之意。中共希望司徒将燕京之行与交谈贸易及国际问题分开。傅泾波称："陆来函很突然，使司徒颇感惊异迷惑，不知用意所在。"又称：司徒雷登现因美国国会不久休会，时间迫促，亟须回国，加以国会内部意见庞杂，恐不能去燕京大学，有意请傅泾波及黄华二人去北平。黄华当即指出：司徒雷登本人月初曾表示欲北访燕京，而中共中央是否同意，尚未获得指示。如司徒希望北上，愿去电问明情况。傅表示同意，但试图要中共方面主动邀请司徒北上，并允许其乘留在南京的美机去北平。[①]6月28日，经报告周恩来并获得指示后，黄华再度拜访司徒，告知中共中央"同意准许司徒去燕京一行，彼希望与当局晤面事亦有可能"。司徒雷登说，因国会即将休会，时间上恐来不及，同时国会内部派别复杂，此时去北平很容易引起评论，增加不便。他决定将此事报告国务卿艾奇逊，由艾奇逊决定他有无必要去北平。黄华表示，是否去北平，由司徒自己考虑决定。[②]当司徒北上进入到实质性操作阶段的时候，双方都明显地希望对方表现出主动。

6月30日，司徒致电国务卿，告知6月28日黄华来访的情况，并分析了北上的利弊，请"国务院考虑和决定"。[③]但此时中共的态度已经改变。同一天，周恩来电告南京市委和华东局：责成黄华严格按照28日中央的说法答复司徒雷登，并特别叮嘱说，司徒雷登北上燕京及与中共当局会面两事"均为司徒所提出，绝非我方邀请，此点必须说明，不能丝毫含糊，给以宣传借口"。电报还说，司徒雷登北上只能乘火车，不许乘美机，如他"借口不乘美机即无法赶回华盛顿，可置之不理"。电报最后表明，"我们对美帝亦绝无改变其政策的幻想"。[④]显然，这时中共对于司徒是否北上已经不感兴趣，特别是不想让美方以此制造舆论，说中共有意与美国发展关系。与此同时，美国当局也不愿走出冒险的一步。7月1日，艾奇逊电告司徒，最高层指示他不得访问北京。[⑤]第二天，傅泾波向黄华通报了这一情况。[⑥]

---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1册，第22–23页；黄华：《亲历与见闻》，第83页；司徒雷登：《司徒雷登日记》，第76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1册，第23页；黄华：《亲历与见闻》，第83–84页；司徒雷登：《司徒雷登日记》，第76页。

③ Stuart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June 30, 1949, in *FRUS,* 1949, Vol.8, pp.766-767.

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1册，第20页。

⑤ Stuart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June 30, 1949, in *FRUS,* 1949, Vol.8, p.769.

⑥ 黄华：《亲历与见闻》，第84页。

中共高层与美方的接触到此告一段落，这一停顿竟长达22年。[①]

中共并没有向莫斯科隐瞒与美国继续接触的情况，特别是列多夫斯基在6月11日会面时说过“莫斯科很关心这个问题”以后。几乎每次与傅泾波和司徒见面的情况，黄华都向苏联参赞进行了通报。不过，从列多夫斯基的札记看，黄华努力要让莫斯科相信，司徒与中共高层的会见，是美国方面主动提出的，并且表现积极。而中共则认为，这样做有利于了解美国的情况，并让美国人对改善中美关系寄予希望。值得注意的是，黄华对列多夫斯基说，他曾拒收司徒雷登给毛泽东的一封信，而这个情节在司徒雷登的报告和黄华的回忆录中都没有提及。此外，艾奇逊7月1日否定司徒雷登北平之行的情况，黄华见到列多夫斯基时也只字未提。[②]很明显，一旦司徒成行，中共希望莫斯科理解，这是美方积极促成的，而对于中共来说，这只是一个策略。为了表明中共的反美立场，《人民日报》在6月19日公布了刚刚破获的美国间谍案，24日又刊登了一篇批判英美外交为“特务外交”的文章。[③]6月25日，中共中央致电东北局，要求尽力寻找能够指控美沈阳领事馆参与间谍活动的人证、物证，并考虑在间谍案宣判后，以同样理由驱逐美领馆的全体人员。[④]

斯大林在6月27日明确表示了苏共对中共的立场后，毛泽东更坚定了倒向苏联的信心，同时也更担心与美国的接触会引起斯大林的误解和疑心——6月30日的电报充分反映了这种心态。[⑤]于是，在同一天，毛泽东决定公开发表“一边倒”的声明。也是在这一天，毛泽东正式批准禁止美国新闻处在中国的活动，并对美国

① 关于美国学者长时间争论的一个问题，即战后美国是否由于政策把握不当而失去了与中共发展关系的机会，笔者认为这一机会只是出现在1944年夏到1945年春，到马歇尔使华时也还有一线希望，然而到1949年，美国已经没有任何机会了。原因就在于斯大林抢先确定了与中共结盟的政策，而毛泽东也已经决心向苏联“一边倒”了。近期美国学界关于这一问题的不同看法，参见John Carver, “The Opportunity Costs of Mao’s Foreign Policy Choices”, in *the China Journal*, No.49, January 2003, pp.128-130；Chen Jian, “How to Pursue a Critical History of Mao’s Foreign Policy”, in *the China Journal*, No.49, January 2003, pp.140-141。

② 列多夫斯基：《南京札记》，未公开的手稿，第47、47、52、54页。转引自海因茨希：《中苏走向同盟的艰难历程》，第419–421、423页。

③ 《人民日报》1949年6月19日，第1版；6月24日，第4版。

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1册，第30–33页。

⑤ 非常巧合的是，6月30日这一天，苏联驻华使馆呈递了一份关于《美英反动派指望民主中国出现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备忘录，其中写道：从最近发表的文章的内容看，美英宣传非常注意选择一些能够刺激中国人尤其是中共党员民族感情的题目，其主要目的是在民主中国和苏联之间、中共和联共（布）之间制造敌对关系。1949年6月30日苏联使馆关于美英在华动向的备忘录摘要，АВПРФ, ф.100, оп.42, п.296, д.117, л.29-36，沈志华、李丹慧收集和整理：《中苏关系：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第6卷，第1437页。

驻沈阳总领事华德等一干人进行公开审判。[①] 接着，在美国对华政策白皮书发表后，毛泽东在一个月内连续发表了五篇批判美国政策的评论文章。[②] 斯大林对毛泽东发表的宣言非常满意。中共中央在 7 月 4 日的报告中解释说，“我们的政策就是要向苏联一边倒，如果不与苏联一起站在反帝国主义的阵营，而企图走中间路线，那是错误的。”在有关外交方面的问题“我们希望获得斯大林同志及联共（布）中央的指示”一句话旁，斯大林划了着重线，并批注：“好。”[③] 很快，7 月 6 日的《真理报》在头版位置全文刊登了毛泽东的这篇文章，并且出版了单行本，《新时代》杂志还发表了署名文章《毛泽东论中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进行详尽介绍。[④]

中苏双方在西柏坡明确了意识形态方面的一致性，在莫斯科则进一步明确了各项方针政策的一致性，至此中苏同盟的政治基础已经确立。然而，作为同盟关系，这里还存在一个重大漏洞和隐患，即国家利益问题。不错，中苏结成同盟的意愿首先是出于对各自政权的安全和稳定的考虑，在这方面他们是完全一致的，但国家利益还涉及主权、尊严、经济等各方面的问题，而在这些问题上，由于历史的原因，双方将要面临的分歧和冲突是十分明显的。对此，斯大林和毛泽东都非常清楚，双方在涉及国家和民族利益方面缺乏协调和一致，同盟也是不会稳定的。这些问题必须解决，而且只有在最高层面解决，这就是毛泽东访问莫斯科的目的和任务了。

发表于《中共党史研究》2009 年第 4 期

① 杨奎松：《华德事件与新中国对美政策的确定》，第 117 页。

②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合订一卷本，第 1187–1520 页。

③ 1949 年 7 月 4 日刘少奇给斯大林的报告，АПРФ, ф.45, оп.1, д.328, л.47,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с.160。

④ 《人民日报》1949 年 7 月 9 日、31 日，第 1 版；Goncharov, Lewis, and Xue, *Uncertain Partner*, p.64。

对中苏同盟经济背景的历史考察

——中苏经济关系研究之一（1948—1949）

中苏同盟的建立、变动及其结果，无疑是现代社会主义历史及冷战国际历史中最值得关注的重大事件，也是历史学家最为注重的研究课题之一，其原因在于中苏关系的发展变化，在某种程度上，不仅决定了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命运，而且影响了东西方两大阵营近半个世纪冷战对峙的结局。随着冷战的结束，国际学界对这一课题的研究出现了某种质的飞跃。一方面，80年代后期中国伴随改革开放不断公布有关的历史档案资料，特别是苏联解体后俄国档案的大规模解密，[①]使学者们第一次获得了通过双边档案利用的方式研究中苏关系的机会；另一方面，冷战的结束拉开了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的距离，各国研究者得以在观念上突破冷战环境及其思维定式的束缚，从客观的角度考察中苏关系变动的全过程，从而取得了不少令人信服的成果。

不过，总体说来，各国学者以往关于中苏同盟的研究大多注重于从政治、军事和外交的角度进行考察，而对于中苏之间经济关系的发展，及其在中苏同盟关系中

① 参见笔者在《俄国档案文献：保管、解密和利用》（《历史研究》1998年第5期）一文中的详细介绍。

的作用、影响和结果，研究者却较少论及。[①] 笔者拟利用中苏双方的档案文献及相关口述史料，对中苏同盟形成的经济背景进行历史考察。

历史资料表明，在新中国成立以前，中共与苏联的经济关系主要体现在苏联对中共在东北及部分华北地区政权的经济技术援助，以及双方在涉及中长铁路产权和开发东北资源方面的矛盾。大体说来，这种经济关系是单向性的，是援助方与受援方的关系，这一点毋庸讳言；同样不容置疑的是，在这种简单的经济关系中，隐含着一种可能导致双方利害冲突的摩擦，而这正是新的中苏同盟条约必须予以解决的核心问题，同时也构成了中苏之间军事和政治同盟的经济基础。

一、苏联在远东的战略目标

战后苏联对华方针取决于两个因素，即苏联在远东的战略目标和苏美在亚洲的战略关系。当时斯大林对远东的战略考虑主要有两点，即把蒙古从中国的版图中独立出来，形成广阔的安全地带；恢复沙皇俄国在中国东北的势力范围，以确保苏联在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冻港。为了保证实现上述权益，苏联在对华政策方面采取了与美国合作的方针，即承认蒋介石在中国的领袖地位，并劝说中共服从国民党政府的统一领导。为此，斯大林先是与美国取得默契，对中国政府两面夹击，软硬兼施，在苏联红军大举进入中国东北之后，迫使蒋介石签订了城下之盟：《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后则同时从中国、朝鲜和伊朗撤军，以取信于美国和国际舆论，并维护在雅尔塔体系范围内得到保证的实际权益。[②]

1945 年 8 月 14 日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以及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和大连的协定有效期为 30 年，其内容基本上保证了苏联在远东的一切权益：中

① 笔者所见专门研究中苏经济关系的有 20 多年前苏联学者的著作：*Филатов Л. В.* Научно-техническо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между СССР и КНР (1949-1966)// Информационный Бюллетень, 1975, №65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Сладковский М. И.* История торгово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СССР с Китаем (1917-1974), Москва, 1977；*Борисов О.*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и маньчжурская революционная база (1945-1949), 2-е доп,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Мысль, 1977。较新的研究成果则有 Deborah Kaple, *Dream of a Red Factory: The Legacy of High Stalinism in Chin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以及笔者参加 1996 年 1 月香港“冷战与亚洲”国际学术讨论时看到的两篇论文，即 Deborah Kaple, Soviet Assistance and Civilian Cooperation in China；Zhang Shuguang, The Collapse of Sino-Soviet Economic Cooperation, 1950-60: A Cultural Explanation。中国学者在当代中国经济史的论著中对苏联援华问题多有提及，但对中苏经济关系的专门研究还很少见到。

② 详见沈志华：《苏联出兵中国东北：目标和结果》，《历史研究》1994 年第 5 期；沈志华、张盛发：《从大国合作到集团对抗——论战后苏联对外政策的转变》，《东欧中亚研究》1996 年第 6 期。

长铁路归中苏两国共同所有和共同经营；中长铁路局设局长一人，由苏方派员担任；宣布大连为自由港，港口主任由苏方派员担任；经大连港和中长铁路为苏联运输的进出口货物均免除关税，而经该港为中国其他各地运输的进出口货物则需缴纳进出口税；旅顺口作为仅供中苏两国共同使用的海军基地；该基地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由苏方派任；旅顺市主要民事行政人员的任免应征得苏联军事指挥当局的同意，等等。[①] 实际上，能够控制中国长春铁路和旅顺、大连港，苏联在远东实现其政治和经济权益的基本目标已经达到，至于意识形态方面的考虑，充其量不过是斯大林在处理与国民党政府关系时的一个政治砝码。而苏联红军在东北对中共是支持还是限制，完全依苏联在中国与蒋介石以及在国际上与美国打交道时的需要来决定。直到 1949 年以前，在中国国民党与共产党的生死斗争中，苏联纵横捭阖，左右逢源，其对华政策的基本目标就是在雅尔塔体系的范围内保证实现上述权益。[②] 以至当时身在内战前线的陈云、高岗和张闻天都认识到，苏联在东北的政策是为“保持远东和世界和平”的目的服务的，中共在东北必须作长期斗争的准备，“竭力避免把一切希望寄托在苏联的援助上”。[③]

在莫斯科看来，苏联在撤军之前可以直接凭借百万大军占据东北的军事优势保证其在远东的战略利益，其后则只能依靠中共的力量来牵制国民党政府的对苏政策以及美国在华势力的发展。所以，东北苏军撤退前曾一再向中共东北局谈及“北满甚为重要，绝不能允许国民党接收整个长春路与矿区”。[④] 苏联代表还建议中共可以在中长路“放手大打”，并表示支持中共军队在苏联撤军后夺取长春、哈尔滨和齐齐哈尔。[⑤] 苏军占领当局甚至同意将中长路以外地区直接交给中共军队接管。[⑥] 在南满，如沈阳、抚顺、吉林、四平、安东、本溪、辽阳等大部分城市和地区，苏

① 有关文件参见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 3 册，北京：三联书店，1962 年，第 1327–1338 页。有关这次中苏谈判的详细过程，过去只有台湾方面公布的材料。1997 年 10 月在北京召开了一次“冷战与中苏关系”国际学术讨论会，美国威尔逊国际学者研究中心向大会提交了一批共 200 多页的综合档案文献，其中包括大量美国和俄国保存的关于中苏谈判的原始文件。

② 笔者对此期苏联对华政策的详细论述见沈志华：《毛泽东、斯大林与韩战》（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8 年）第二章“重温远东梦：苏联的远东政策与中苏同盟的起源”。

③ 陈云：《对满洲工作的几点意见》，1945 年 11 月 30 日，《陈云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年，第 221–224 页。

④ 1946 年 3 月 18 日东北局致中共中央电。

⑤ 1946 年 3 月 18 日中共中央致东北局电，3 月 26 日中共中央致中共驻重庆代表团电，4 月 3 日彭真致李、黄并告中央电。

⑥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6 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 年，第 90 页。

联则采取突然撤退的做法，以便中共军队可以乘虚而入。[①] 此外，苏联还给中共军队留下了大量缴获的日本关东军的武器装备，这主要是外贝加尔方面军和远东第一方面军提供的3700门大炮、迫击炮、掷弹筒，600辆坦克，861架飞机，约12000挺机枪，680座各种类型的弹药库，以及松花江舰队的船只。[②]

不过，苏联虽然希望中共在东北地区发挥作用，但就整个对华政策而言，此时斯大林的基本方针还是与美国合作。即使在拒绝马歇尔计划并挑起柏林危机以后，尽管苏联在欧洲与美国进行对抗，但在亚洲仍需要继续保持一种相对缓和的局面。莫斯科一方面要通过加强中共的力量起到对美蒋的牵制作用，一方面又希望在亚洲维持雅尔塔体系，保持与国民党政府的关系正常化，从而保证中苏条约已经承认的苏联在中国东北的政治和经济权益。因此，苏联在抨击美国干涉中国内政的同时，又表示“在远东问题上愿意实行和美国共同的政策”。[③] 这一政策的核心是在国共之间进行调和，并特别强调应由苏联出面参与和谈，以加强莫斯科在解决中国问题时的地位。[④] 正是估计到这种状况，毛泽东在1946年4月就提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思想，即美苏两国之间寻求妥协并不要求各国人民在自己的国内斗争中跟着实行妥协，相反，各国人民可以而且必须同本国的反动派进行坚决的斗争，而美苏妥协的实现只能是各国人民斗争的结果。[⑤] 因此，苏联红军撤离中国后，毛泽东告诫在东北指挥作战的林彪，内战既开，应“全靠自力更生”。又嘱咐即将赴苏联治病的罗荣桓：“东北斗争主要靠自力更生”，勿向苏方提出“过高与过多要求”；而“关内应完全靠自力更生”，不能向苏方提“任何要求”。[⑥]

到1948年，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在欧洲，一方面斯大林通过组建共产党情

---

① 杨奎松：《中间地带的革命》，北京：中共中央党史出版社，1992年，第429–430页；科夫通·斯坦科维奇：《沈阳卫戍司令》，载《中俄关系问题》第28期，1990年10月，第43页。

② 见 *Борисов*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и маньчжурская революционная база (1945-1949), 2-е доп, с.185。

③ 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斯大林文选（1934–1952）》下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487页。

④ 关于此期苏联进行调和的材料参见肯尼斯·雷、约翰·布鲁尔编：《被遗忘的大使：司徒雷登驻华报告》，中文版，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60–168页，以及 Brian Murray, Stalin, the Cold War, and the Division of China: A Multi-Archival Mystery,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Working Paper*, 1995, No.12。

⑤ 毛泽东为此而写的一篇短文《关于目前国际形势的几点估计》后来收入了《毛泽东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年，第1184–1185页），但当时这个重要文件只是在少数人中传阅，直到1947年底召开中央12月全会，才在党内传达。见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433页。

⑥ 1946年6月25日毛泽东致林彪电，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34–135页；1946年7月30日中共中央致罗荣桓电，转引自金冲及：《毛泽东传（1893–1949）》，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772页。

报局和整治南斯拉夫共产党，构造了以莫斯科为中心的社会主义阵营，从而稳定了与西方抗衡的阵脚。[①] 另一方面，面对美国和西方国家的强硬立场，斯大林在解决柏林危机的过程中采取了忍让和退缩的立场，对双方整体实力的认识迫使苏联放弃了与美国公开冲突的做法。[②] 与此同时，中国革命的发展则出现了令斯大林欣喜的局面。

还在 1947 年 12 月中央会议期间，毛泽东就给斯大林发了一份电报，强调中国形势将发生根本变化，革命战争已经转入反攻阶段，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③] 以后不久，苏联新任驻华大使罗申报告，中共军队在内战中“一直掌握着主动权”，国民党军队损失了 130 万兵力和 37 个整编师的武器装备，国民党的统治已经动摇。“摆在民主力量面前的任务是：顽强奋战，消灭蒋介石武装力量，推翻蒋介石反动政权。”据中共领导人的乐观估计，战争再进行一年半至两年即可结束。报告还说，蒋介石奉行亲美反苏的外交政策，而美国则试图通过援蒋消灭民主力量，把中国变成反苏的军事基地。[④]

形势的变化把莫斯科的注意力转向了中国。1948 年 4 月苏联外交部起草了给驻华大使的政治指示，其要点是：一、“对中国政府的政策应当是有节制的”，对政府人士“不要表现出特别的积极性”，只强调不干涉中国内部事务的政策。二、认真研究并通报中国政府在外交、军事和内政方面采取的各种措施及种种变化。三、密切注视政府机构和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及其政治目的。四、十分认真地研究美国对华政策，特别是援蒋反苏的举动并揭露之。五、“重视与民主、进步人士交往和会晤，同时要保持谨慎的态度”。六、确保苏联在华利益。七、利用各种渠道和方式加强对苏友好的宣传。[⑤]

尽管此时苏联的政策还是谨慎的，其立场在表面上也是中立的，但中国局势发展的明显结果是，苏联在东北经济利益的保证不得不越来越倚重于中共了。因此，由于中共在苏联对华政策中地位的变化，苏联决定对其予以大力支持和援助。据美国学者布莱恩·默里在台湾发现的档案文件，1948 年 3 月 14 日斯大林在政治局特别会议上指出，“寻找两个阵营和解的办法已属枉然”，“冲突不可避免的时期将要

① 详见沈志华：《对 1948 年苏南冲突起源的历史考察》，《历史研究》1999 年第 5 期。

② 关于柏林危机的最新研究成果见 *Наринский* Берлинский Кризис, 1948-1949гг., Новые документы из Российских Архивов。

③ 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 年，第 351 页。

④ 1948 年 4 月 2 日罗申致马立克电，АВПРФ, ф.018, оп.10, п.24, д.21, л.9-10。

⑤ 1948 年 4 月外交部给驻华大使的政治指示（草稿），АВПРФ, ф.018, оп.10, п.24, д.21, л.11-14。

来临”。因此，苏联除了应迅速增强国家的军事和经济实力，以准备应付任何不测事件外，同时“应当有力地支持已经走上了民族解放运动道路”的人民的斗争，因为“民族解放运动将引起资本主义的世界性危机”。斯大林特别提到“中国解放运动的例子是令人鼓舞的”，“虽然美国向国民党提供了大量援助，但是在胜利的共产党军队的有力打击下，整个中国正在动摇。中国反动派已连遭失败。受新生活感召的中国人民正在给那些投靠外国资本的压迫者以毫不留情的打击。人民解放军顺利地解放了新的城镇和地区。经过磨难和斗争，中国人民正在建造一个新的反帝、民主的中国。我们的工作就是利用一切可能的手段帮助我们的中国同志，直到他们能彻底打败所有的敌人，与苏联友好相处，并开始一种新的幸福生活。”①

为了便于同中共开展经济关系，苏联在华外交人员曾多次询问中共东北局有无组织东北民主政府的意图及参加政府的人选。1948 年 4 月 25 日苏联驻哈尔滨新任总领事马里宁约见高岗，以个人名义建议中共应争取成立全解放区的政府。马里宁表示，对于解放区政府，不管其他国家承认与否，一切民主国家和苏联都可以承认，以便向中共提供援助，尽管苏联与蒋介石政府尚未断绝外交关系，但也可以经过其他民主国家进行援助。②不久，斯大林召见了即将带领技术人员去东北帮助中共修复铁路的科瓦廖夫，并对他说：我们当然要给予新中国一切可能的援助。如果社会主义在中国胜利，其他一些国家也将走上这条道路，那就可以认为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有了保障，我们就不会受到任何偶然事件的威胁。因此，“为了援助中国共产党人，我们不能吝惜力量和金钱。”③

二、苏联对中共的经济援助

苏联对中共的经济援助是从与中共地方政权的贸易往来开始的。

苏联与中共之间最初的贸易中心在哈尔滨市，1946 年 4 月 28 日苏军撤离时将这座黑龙江省的中心城市交给了中共，随后中共北满分局、东北局和民主联军总部便移驻哈尔滨，并在这里建立了地方自治政权（东北行政委员会）。应该说，中共政权在延安和其他关内解放区的建立还只是积累了治理农村和发动农民的经验，只

---

① 见 Brian Murray, Stalin, the Cold War, and the Division of China: A Multi-Archival Mystery。据默里考察，这是当时国民党政府驻布鲁塞尔使馆人员从一名莫斯科信使那里获得的苏联秘密文件，尽管尚未在俄国档案中找到相应的俄文原件，但默里倾向于认为这些文件是真实的。

② 1948 年 4 月 25 日高岗致毛泽东、刘少奇电。

③ *Ковалев* Диалог Сталина с Мао Цзэдуном.//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1992г., №1-3, с.77.

有在稳固地占据了哈尔滨这样的大城市之后，中共才开始真正尝试建立全社会意义上的国家统治，并着手组织社会经济活动。另一方面，在国民党军队全面进攻和中共中央被迫撤离延安的情况下，北满根据地就成为中国革命的战略基地和解放战争通向全国胜利的起点。为此，中共政权首先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是迅速改变长期战争造成的物质匮乏和经济衰败的局面，稳定社会，恢复生产，保障供给。而要解决这些问题，东北局认为首要的和最主要的出路就是开展对苏贸易。①

当时苏联在哈尔滨设有总领事馆和商务代表处的分支机构，中长铁路苏方管理局，苏联远东对外运输管理局和粮食出口联合公司的分支机构，以及主要股份为苏联对外贸易联合公司的秋林股份公司的管理委员会和下属企业，从而得以在各方面，尤其是经济方面向中共政权提供帮助。1946 年 12 月 21 日，应中共的要求，苏联对外贸易部代表斯拉德科夫斯基与东北行政委员会在伏罗希洛夫斯克进行了初次贸易谈判，并签署了贸易合同。为了保证货物运输，1947 年 4 月，苏联远东对外运输管理局在松花江上开辟了一条航线，苏联阿穆尔河运轮船公司则拨出一批拖船和大驳船，在中国松花江的港口与苏联的港口——哈巴罗夫斯克、布拉格维申斯克和共青城之间开始了定期的货运航线。于是，苏联贸易机构与东北民主政权的商务往来迅速开展起来，其贸易总额（辽东地区除外）1947 年即达 9300 万卢布，1948 年增长到 15100 万卢布，1949 年更增长到 20500 万卢布。② 中共地方政权以粮食（后来又有煤炭）向苏联换取的军需物资、民用产品和工业原材料，解决了战争供给、民众生活、稳定物价和发展生产等一系列问题。③ 特别是到 1949 年，中方进口工农业生产资料的比重明显增加，④ 从而为东北地区国民经济的全面恢复奠定了基础。

不过，还需要指出的是，帮助归帮助，生意归生意，在此期双方贸易往来中，苏方在经济利益上是颇有计较的。如苏方要求进口煤炭的含灰量不得超过 15—

① 东北贸易总公司：《1947 年第一季度对外贸易工作总结与第二季度对外贸易意见》，辽宁档案馆东北财政委员会档案，卷号 5065，第 1–4 页。转引自孟宪章主编：《中苏贸易史资料》，北京：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1991 年，第 532 页。

② 见 *Борисов*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и маньчжурская революционная база (1945-1949), 2-е доп, с.187。

③ 东北贸易总公司：《1947 年第一季度对外贸易工作总结与第二季度对外贸易意见》，第 4 页。转引自孟宪章主编：《中苏贸易史资料》，第 535 页。关于中苏贸易谈判的最初情况，参见王首道：《东北解放区人民政权的建立及财政经济工作》，载陈沂主编：《辽沈决战》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年，第 368 页。王首道时任东北行政委员会财经办事处主任。

④ 1947 年进口物资中生产资料占 7%，1948 年上升为 14%，1949 年则高达 61%。东北商业局：《东北解放区三年来对外贸易总结》，转引自云章、晓春：《试谈解放战争时期东北根据地的对外贸易》，《社会科学战线》1990 年第 3 期，第 239 页。

18%，但因中方口岸没有化验设备，只得听任苏方对抚顺、辽源、鹤岗等地优质煤按20%扣除灰分。1949年中方出口106万吨煤，仅此一项即损失434亿元。再有，苏方进口货物因名称不对、规格不清或包装不善而造成的损失少则2%，多则高达7%，但由于中共缺乏经验和专家，此类损失完全由中方独自承担。[①]

苏联对中共提供经济援助的另一个集中地区是包括大连、旅顺和金县在内的苏联军管区。1945年8月22日苏军根据中苏条约接管了辽东半岛的旅大地区，在这一地区，除外交方面不便让中共插手，以及铁路和两个港口直接由苏方管理外，地方政权和主要经济部门的实际权力完全交由中共掌握。中共不仅建立了各级党的组织，以半隐蔽方式开展工作，而且在与国民党军作战时以此为部队的休整基地和庇护所。因此，旅大地区实际上也成为中共支援前方作战的重要军需物资供应基地。在解放战争期间，旅大地区为前线供应了30万套军服、236.5万双军鞋、50余万发炮弹、80余万枚引信、450吨无烟火药、1200门迫击炮和各种兵工生产设备，以及其他大量军需产品。[②] 自然，这些贡献也离不开苏联的援助。为了解决辽东半岛的居民生活问题和巩固地方政权，苏联军事当局向中共移交了大连钢铁厂、大连化工厂、大连纺织厂、金州纺织厂和几个机械厂，并在苏联外贸组织的帮助下成立了4个苏中合营公司。其中辽东盐业股份公司仅1948年就生产了16万吨食盐、300万盒各种罐头、300万条麻袋，公司年总产值达到350亿元（东北币）。远东电业股份公司在恢复电站、电网、电话和通信线路方面给予了巨大帮助，同时也生产日用品，该公司1948年总产值达250亿元。这两个公司成立两年后转交中方。船业公司和石油公司则以来料加工方式为苏联修造拖船和生产燃油，既解决了当地的就业问题，也为中共培养了大批专业技术人才。此外，苏联外贸机构还通过海运以及经北朝鲜港口中转的方式，从海参崴直接向大连港提供粮食、植物油、糖、罐头、糖果点心等食品。[③]

新中国建立前夕苏联对中共经济援助的最大项目应属帮助东北民主政权修复东北铁路网的工程了。战争使得东北地区大约6000公里的铁路遭到摧毁和破坏，而日军撤退时又沿1500公里的铁路线炸毁了大量车站、机车库、桥梁、信号装置、

① 云章、晓春：《试谈解放战争时期东北根据地的对外贸易》，第241–242页。

② 见中共吉林省委党史研究室、吉林省东北抗日联军研究基金会：《韩光党史工作文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33–39、133–139页；笔者1996年5月对韩光的采访记录。韩光时任中共大连市委书记。

③ *Борисов*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и маньчжурская революционная база (1945-1949), 2-е доп, c.190-193；中共吉林省委党史研究室、吉林省东北抗日联军研究基金会：《韩光党史工作文集》，第335–340页。

供水设施等。苏军在占领期间，修复了中长铁路的东线和西线。苏军撤离后，在中长铁路苏方管理局局长茹拉夫廖夫领导下，苏方铁路员工继续铁路的修复工作。1946年底，苏联又派来了大约100名工程师、技术员以及其他专业人员。到1947年春天，北满根据地的整个铁路主干线已经修复通车。[①] 1948年3月，经过人民解放军强大的冬季攻势，除沈阳、长春、锦州等几座孤城外，东北全境已在中共掌握之中。在这种形势下，大量调动部队围歼守敌，进而入关南下，以及迅速恢复东北经济，为解放全国建立巩固的后方，都迫切需要全面修复东北铁路网。于是，中共直接向莫斯科提出了这一要求。苏联政府很快商定，派交通部副部长科瓦廖夫为全权代表，赶赴东北组织落实有关恢复东北铁路运行的措施。这一决定5月13日经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团讨论通过，5月15日由斯大林签字批准。[②]

1948年6月，科瓦廖夫率领一个由50名工程师、52名技师、220名技术人员和熟练工人组成的铁路专家小组抵达东北，还带来了必需的技术设备，包括修复车、起重机和其他机械设备，以及金属构件、铁轨、桥桩、钢梁等材料。修复工作在工程师多罗宁的领导下顺利展开。[③] 在此期间，苏联政府对于中共政权修复铁路的工作是全力支持、有求必应的。11月间，交通部报告，中共请求把已经解放的中长铁路南段（石河—辽阳）的机车和车厢送大连机车车辆厂修理，同时再拨200节旅客车厢和10套给水机组供民主政权使用；外交部报告，中共请求向满洲派200名苏联铁路员工，具体帮助组织已修复铁路的运营工作。对于这些要求，苏方均立即答应满足。[④] 到12月上旬，科瓦廖夫小组的任务基本完成，科瓦廖夫回莫斯科复命并欣然向斯大林报告：遵照您1948年5月17日的指示，派往满洲的苏联铁路专家小组组织并领导了最重要的铁路线的修复工作，其中包括吉林—长春，哈尔滨—长春，四平街—通辽—义县—锦州，梅河口—奉天—鞍山，锦州—山海关路段。这一时期，共修复大、中型桥梁62座，其中东北中部的大型桥梁都进行了大修：在哈尔滨至长春方向有松花江大桥970米，饮马河大桥320米，伊通河大桥200米；在吉林至长春方向有吉林市附近的松花江大桥420米，饮马河大桥190米。至此，从中苏边境的满洲里和绥芬河至旅顺和大连已经全线通车。报告强调了上述铁路线及时修复对中国革命的重大意义：保障了人民解放军的迅速调动，首先是在

---

① *Борисов*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и маньчжурская революционная база (1945-1949), 2-е доп, с.193.

② 1948年9月10日苏联交通部给莫洛托夫的报告，АВПРФ, ф.06, оп.10, п.53, д.739, л.1。

③ *Борисов*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и маньчжурская революционная база (1945-1949), 2-е доп, с.196.

④ 1948年11月18日佐林给莫洛托夫的报告，11月23日葛罗米柯给莫洛托夫的报告，АВПРФ, ф.06, оп.10, п.53, д.739, л.2, 3。

长春市集结重兵，然后又在义县和锦州城下集结。歼灭这些城市的被围之敌后，人民解放军部队又沿新恢复的铁路线调至新立屯、奉天和梅河口，从而有力地促进了全歼满洲国民党军。此外，苏联专家还帮助中共成立了铁道兵部队（4个旅3万余人），培训各类技术专家4600多人；建立了修复工作必需的材料供给机关和保障基地、桥梁基地，以及专门的军事仓库。除帮助修复铁路外，应毛泽东本人和东北局的请求，科瓦廖夫小组拟定了交通部、铁路管理局和机务段的结构和编成，还对东北公路、大路和水陆交通状况进行了调查，并拟定了修复和整顿交通的决议草案。①

此后，为了保证东北铁路的正常运营，苏联部长会议又应中共的要求通过一项命令：一、批准中长铁路苏方管理局：(1) 从中长铁路大连段储备中抽1500节货运车厢，130节客运车厢和50台机车给满洲民主政权；(2) 在1949年5月1日之前，按照同满洲民主政权签订的协议，利用大连机车车辆修理厂现有的日本半成品和原材料为满洲铁路建造1000节货运车厢；(3) 在大连中长路工厂按照协议规定为满洲铁路的机车和车辆，信号装置和通讯仪器，以及道岔设备进行大修、中修；(4) 从大连军管区调派修复车专家队和必要物资，参加军管区以外中长路路段的修复工作。二、批准苏联交通部：(1) 从苏联远东铁路抽调86台机车和1000节车厢交与满洲铁路北段；(2) 增派170名苏联铁路技术人员交中长路苏方管理局指挥，帮助组织中长路南段的运营，时间为一年。三、前项所指人员出差的全部费用500万卢布，在中长铁路运营收入中报销。四、责成茹拉夫廖夫保证沿满洲铁路向大连运送所有物资。②

所有这些措施，对于东北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同时需要指出的是，苏联的大力援助亦有其对自身经济利益的考虑。中共东北政权的巩固，特别是中长路全线通车，对保证苏联控制旅顺军港和大连市、发展苏联远东地区经济具有同样重要的作用，因此斯大林对此表现得极为大方。不过，就全国情况来讲，苏联还要顾及到与国民党政权的关系，尤其是可能由此引起的与美国在远东利益的冲突。因而，对于中共进一步要求帮助恢复东北经济和全面提供经济援助的问题，莫斯科就要慎重考虑了。

---

① 1948年12月16日科瓦廖夫给斯大林的报告，АВПРФ, ф.06, оп.10, п.52, д.734, л.8；*Борисов*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и маньчжурская революционная база (1945-1949), 2-е доп, с.198。

② 1948年12月16日贝舍夫和葛罗米柯给莫洛托夫的报告及苏联部长会议命令草案，АВПРФ, ф.06, оп.10, п.53, д.738。

三、苏联援助中共的制约因素

当东北全境解放指日可待时，中共便开始筹划经济恢复和未来建设的工作。

1948年9月8日，林彪直接给斯大林写了一封信，要求苏联帮助制定在东北地区恢复国民经济的计划。林彪首先通报了解放战争顺利进展及解放区开始经济建设的情况，并对科瓦廖夫专家组的工作表示衷心感谢，随后讲述了在恢复经济方面遇到的种种困难。林彪报告，中共准备至少用两年的时间完成东北地区经济恢复的工作，为此需要制定一个全面计划，而中共缺少有经验的技术干部。林彪请求斯大林派来至少100名各部门的专家，“全面研究我们的经济，并与我们共同制定统一的主要工业部门的恢复和运营计划”。信中列举了14个方面所需专家的具体人数。该信经马里宁转给莫洛托夫，10月6日，莫洛托夫向斯大林报告说，经研究认为，“不宜向中国东北派这么大数量的专家小组”。莫洛托夫等人的意见是：一、令中央书记处负责准备派10名各个部门的苏联专家，具体部门将同林彪协商确定，同时把相应人选方案提交中央政治局批准。二、苏联人员不应以顾问的名义，而应以专家的身份派到哈尔滨。三、任命一名非常有党政和经济工作经验的同志为哈尔滨领事，此人应同派往哈尔滨的苏联专家和林彪进行联系。四、以后向中国东北派苏联专家的问题，应等毛泽东来苏联时再行商议。征得斯大林同意后，莫洛托夫于10月16日将答复发往哈尔滨。[①]

莫洛托夫的建议显然是考虑到在中国局势尚未明朗化之前，避免因树大招风而给苏联造成外交上的被动。但莫斯科的答复的确无法满足中共的需要，于是科瓦廖夫带着中共的要求回国后，又一次向斯大林提出了报告。科瓦廖夫明确指出：由于缺少应有的专家，在制定国民经济计划和财政计划上苏联未能给中共以全面帮助，为此毛泽东、林彪、高岗和陈云再次要求向斯大林报告，中共急需以下几方面的援助：一、派各种工业和财政计划专家来中国。二、修复满洲以外，首先是山海关—天津、天津—北平、天津—济南、济南—徐州段的铁路。恢复满洲境内的给水系统、抽水设施和车站。三、恢复奉天和满洲境内其他的军工厂并组织生产。尽快恢复抚顺煤矿及鞍山和本溪钢铁厂的生产，完成吉林大型水电站建设并开始供电。四、在哈尔滨、长春、奉天和吉林建立学院、中等技术学校和军事学校，培养中国

---

① 1948年9月12日哈尔滨总领事馆致莫洛托夫电，10月6日莫洛托夫给斯大林的报告，10月17日波采罗夫给联共（布）中央的报告，АВПРФ, ф.06, оп.10, п.53, д.738, л.6-11, 2-5。

干部。五、派出军队组织和训练及后勤建设方面的顾问。鉴于中共东北局特别要求应强调急需派来专家一项，科瓦廖夫提出，至少应派 500 名计划专家、工程师和各种其他工业专家。科瓦廖夫还建议，应在苏联部长会议下成立特别小组或委员会，其任务是：一、研究同帮助民主中国恢复和发展工业和交通有关的问题；制订苏联有关各机构和部门统一的实际措施及计划，为苏联部长会议准备相应的提案。二、研究中共的经济状况和原料来源，以及设备、材料和信贷方面的需求。三、领导苏联专家的工作，帮助组织培训地方干部。[①] 与此同时，葛罗米柯也向莫洛托夫报告，对于林彪信中请求往满洲派 100 名苏联专家帮助制定经济计划的要求，“应当给予某种程度的满足”。此外，对于高岗提出的其他要求，如额外提供铁路设备和物资，为满洲纺织工业提供 2 万吨棉花，保证鸭绿江上已交朝鲜的电站也为满洲所用等，以及科瓦廖夫报告中转述的要求，葛罗米柯认为均应该满足或给予重视。故而，葛罗米柯建议，除保证东北铁路运营的措施已经制定等待批准外，应该委托贝舍夫、科瓦廖夫和他本人把中共的请求整理成文件，并拟定中央对这些请求的决议草案。[②]

对于中共要求迅速修复华北铁路的要求，苏联立即答复同意。根据科瓦廖夫的建议，苏联部长会议决定，将苏联铁路专家小组在华停留期限从原定的 1949 年 1 月 1 日延长至 4 月 1 日。[③] 至于其他要求，特别是派出大量专家的问题，科瓦廖夫等人研究后于 1949 年 1 月 5 日向斯大林呈送了一份报告。报告详细列举了中共根据恢复和发展东北经济计划而提出的请求苏联提供专家、设备和物资援助的具体要求，其中包括各类专家 533 名，以及所需设备、仪器和材料的细目。报告认为，“由于计划和申请是中国同志拟定的，没有吸收专家（铁路运输除外）参加，也没对工业的真正情况进行调查”，因此，除铁路设备和材料外，最好暂时先不要讨论中共的计划和申请，而是派出一个苏联专家组到东北进行实地考察。报告为联共（布）中央起草了有关决定：责成苏联部长会议全权代表负责援助中国民主政权恢复工业和铁路运输并组织工业生产等项有关事宜，在一个月的时间里带专家小组对东北冶金、军工、煤炭、电力、机械制造和化学等部门的情况进行调查，并为苏联部长会议提出有关恢复和组织生产的紧急方案。报告还提出了赴东北进行考察的

① 1948 年 12 月 16 日科瓦廖夫给斯大林的报告，АВПРФ, ф.06, оп.10, п.52, д.734, л.8-9。

② 1948 年 12 月 17 日葛罗米柯给莫洛托夫的报告，АВПРФ, ф.06, оп.10, п.53, д.738, л.16-17。

③ 1948 年 12 月 20 日科瓦廖夫给莫洛托夫的报告，12 月 25 日莫洛托夫给斯大林的报告，АВПРФ, ф.06, оп.10, п.52, д.734, л.5；п.53, д.738, л.19-20。

100人专家小组名单。[①]

采取这样慎重的做法，如果说专家们是从经济措施可行性角度出发的，那么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则有更深层的政治考虑。在此之前，苏联对中共的一切援助，在形式上都是秘密进行的，斯大林显然不愿与援助国民党的美国公开唱对台戏。到1949年初，中共已经取得了中国半壁江山，而中国革命对整个亚洲局势的发展则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斯大林对此极为关注，同时也表现得更加谨慎。[②]斯大林并未像马里宁说过的那样，正式承认中共的地方民主政权，他认为在国民党政府仍然存在的情况下，苏联在外交上需要保持与蒋介石的正常关系。为此，1949年2月斯大林借口“中国解放区民主政权机关要求所有外国领事馆在未建立正常外交和领事关系前停止自己的活动”，通知毛泽东：苏联已下令“停止领事馆的一切正式活动，并视领事馆的所有工作人员为非官方人员”，而“与地方民主政权机关只保持非官方的关系”。[③]同样，斯大林最初考虑由苏联单独充当调停人促成国共和谈，也反映出莫斯科担心美国出面会导致中国局势复杂化的谨慎心理。[④]此外，在对华政策转变的决策方面，斯大林还有一个未知因素，即未来中共政权的性质、政治倾向及其与苏联的关系。中共夺取政权后是否会加入社会主义阵营并保证对苏联的忠诚，这是莫斯科在确定苏联全面改变对华政策之前迫切需要切实掌握的情况，于是便有了米高扬作为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身份对中共中央所在地西柏坡的秘密访问。

通过1949年1月底至2月初米高扬与中共领导人进行的广泛接触和深入谈话，莫斯科了解到：中共取得全国政权已经势在必行；新中国将实行人民民主专政，逐步走向社会主义；中共感谢苏联的援助，并愿意接受苏共的领导。会谈中，中共领导人特别强调在恢复经济和发展生产方面需要苏联给予大力帮助，并决定派专门代

---

① 1949年1月5日科瓦廖夫给斯大林的报告，АВПРФ, ф.06, оп.11, п.15, д.231, л.3-10。

② 莫洛托夫和维辛斯基在1949年初给科瓦廖夫的电报中指出，“从现在起，任何有关中国的事务都要直接与菲利波夫同志联系”。见 Sergei N. Goncharov, John W. Lewis, and Xue Litai, *Uncertain Partner: Stalin, Mao, and the Korean War*,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20。菲利波夫是斯大林的化名。

③ 1949年2月16日斯大林致毛泽东电，АПРФ, ф.45, оп.1, д.300, л.129-130。转引自 *Тихвинский С.* Путь Китая к объединению и независимости, 1898-1949, Москва, 1996, с.460。

④ 关于毛泽东与斯大林在国共和谈问题上争论的俄国档案见 *Тихвинский* Переписка И. В. Сталина с Мао Цзэдуном в январе 1949г.。研究者对此有不同看法，笔者的观点详见沈志华：《毛泽东、斯大林与韩战》，第107–113页。

表团赴苏解决贷款和经济援助的问题。[①] 米高扬访问的结果使斯大林对中共已经心中有数，看来扩大和加强对中共的援助可以成为现实政策了。1949 年 4 月在科瓦廖夫小组的直接参与下，中共起草了一项关于苏联对华经济援助的规模和形式的初步协议。[②] 5 月 3 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提出中共目前最重要的任务是解决经济建设问题，因此要求斯大林同意向中共派遣苏联专家。[③] 同时，毛泽东也更加明确了中共必须向苏联靠拢的方针。中共中央 2 月 16 日指示华北局和东北局：对外贸易的基本方针"应该是凡苏联及东欧各新民主国家所需要的货物，我们当尽量向苏联及新民主国家出口，凡是苏联及新民主国家能供给我们的货物，我们当尽量从苏联及新民主国家进口，只有苏联及新民主国家不需要及不能供给的货物，我们才向各资本主义国家出口或进口"。[④] 3 月 13 日毛泽东又在七届二中全会的总结报告中指出："中苏关系是密切的兄弟关系，我们和苏联应该站在一条战线上，是盟友，只要一有机会就要公开发表文告说明这一点。"[⑤] 果然，当刘少奇率中共中央代表团到达莫斯科以后，毛泽东发表了"一边倒"的著名宣言。此时，中共的立场和中国的形势都已经完全明朗化，斯大林也作出了他的最后决定。

刘少奇对苏联的访问非常成功，斯大林几乎答应了中共代表团提出的军事和经济援助的所有要求。[⑥] 专家问题也终于得到了解决，在第六次会谈时，斯大林答应了中方的要求，同意分期分批向中国派遣 200 多名各方面的经济技术专家。8 月 2 日，刘少奇又特意致函斯大林，要求让科瓦廖夫和已经确定的苏联专家同他一起走，并请求斯大林下令加快前往中国的苏联专家的准备工作。斯大林阅读信函时，特意在这段话下面划了着重线。[⑦] 8 月 25 日刘少奇回国时，已有 220 名苏联高级

---

① 详见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第 375–386 页；*Ледовский* Секретная миссия А. И. Микояна в Китай, 1995, №2, 3。

② 科瓦廖夫未公布的回忆录，见 Goncharov, Lewis, and Xue, *Uncertain Partner*, p.63。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年，第 496 页。

④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8 册，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 年，第 136–137 页。

⑤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 5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年，第 262 页。

⑥ 详见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第 404–414 页和列多夫斯基发表的有关俄国档案文献：*Ледовский* Визит в Москву делегации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Китая в июне-августе 1949г., 1996, №4, 5（中译文见《中共党史资料》1998 年第 2 期）。

⑦ 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第 415 页；1949 年 8 月 2 日刘少奇致斯大林信，АПРФ, ф.3, оп.65, д.364, л.1-2。

经济干部和工程师同车到达沈阳。[①] 同时，苏联也进一步加大了对中共经济援助的力度。据俄国档案记载，苏联部长会议9月19日作出决议，向中共提供除缴获的日本武器外最大的一次军事援助，总价值达2650万美元，其中包括334架飞机和360门高射炮。此后苏联政府又多次作出决议，向中国提供了3150万美元的武器装备和其他技术装备。[②]

然而，政治方面制约因素的消除并不等于苏联就可以确定对未来新中国的全面政策了，莫斯科加强对中共的经济援助也不表明双方在经济利益上就完全一致了。实际上，毛泽东和斯大林心里都很清楚，他们之间还有一个双方均未言明的问题，即在中苏结成军事政治同盟时如何处理1945年的中苏同盟条约，而恰恰这一点，反映了中苏之间在经济利益方面存在的历史矛盾。

四、中苏在经济利益上的矛盾

现在看来，1945年中国政府被迫接受的中苏条约显然属于不平等条约。撇开蒙古问题不说，单就苏联把已经卖给满洲国的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作为其战利品与中国合营，又强行租用旅顺港和实际占有大连市而言，已使中国主权和经济利益受到侵害，当时国民对苏联的反感与此不无关系。[③] 中共对此也有同感，虽没有明说，但确是心存芥蒂，并且在经济方面与苏方的接触中时有表现。

随着东北地区中共政权的建立和发展，在中长铁路产权归属和东北资源开发方面，中苏之间对未来经济利益的不同考虑逐步显露出来。苏联对经营中长铁路极为

① 1949年8月26日刘少奇致中共中央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1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45页。关于此时来华专家的数字，在苏联和俄国学者的论著中都说是250人，见 *Филатов* Научно-техническо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между СССР и КНР (1949-1966), с.7；*Ковалев* Диалог Сталина с Мао Цзэдуном.//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1991, №6, с.83。多出的30人，恐怕是把专家的随行工作人员也计算在内了。而师哲的回忆，即与刘少奇同车到沈阳的专家只有80人（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第425页），则显然有误。此外，据陈兼研究的结果，苏联还同意向中国派遣878名空军专家和90名海军专家。见 Chen Jian, *China's Road to the Korean War: The Making of the Sino-American Confrontat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4, p.77。

② *Кулик* Китайская Народная Республика в период становления (1949-1952гг.), с.75.

③ 1949年9月4日《长江日报》发表了熊复的一篇短文《认识苏联》，其中反映了当时中国国民对苏联的看法，如"外蒙古受苏联控制"，"东北是苏联的势力范围"，"苏联对旅顺大连有领土野心"，"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是不平等条约"，等等。见熊复：《熊复文集》第2卷，北京：红旗出版社，1993年，第18–19页。

关注，因为它不仅具有战略意义，而且颇有经济价值。[①] 但由于苏军撤退和东北内战的爆发，中苏共同经营中长路的工作实际并未开展。在国民党统治区的铁路南线长期处于瘫痪状态，设备屡遭盗窃和破坏，大部分苏联员工被召回国。[②] 即使在中共控制下的铁路北线，中苏双方也常有摩擦。据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馆报告，中共当局把这一地区中长路及其附属企业的管理抓在自己手中，不遵守中苏条约关于中长路的协定，将苏方行政机构排挤出对铁路的管理，并大批解雇在中长路机构及企业中工作的苏联公民，而且时有暴行发生。为此，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馆曾多次与林彪和高岗进行交涉。[③]

中共控制了整个东北以后，包括中长路全线在内的东北铁路实质上是由中方单独实行管理的，铁路财政也完全由中方支配，而苏方员工只是处于顾问和咨询的地位。[④] 显然，毛泽东对 1945 年中苏条约是不满意的，也没有理睬关于中长路由中苏共同占有和经营的协定。苏联方面对此颇为担心，这突出表现在 1948 年底苏联外贸部给米高扬的报告中。斯拉德科夫斯基在报告里针对一封关于中长路和苏中合资企业问题给马林科夫的信发表了长篇议论。显然是出于为管理中长铁路准备干部队伍的考虑，他首先对中长路培训东方学干部的情况表示不满，建议在远东及中央的几所高等工业学校中设置研究中国和朝鲜政治经济的课程，扩大莫斯科东方学院的远东各系（首先是中国系和朝鲜系），恢复符拉迪沃斯托克的东方学研究所。斯拉德科夫斯基特别提出了中长路的法律地位问题，即“如何看待苏联铁路管理机构在中长路的存在；我们继续不参加对铁路的管理和经营是否妥当”。报告指出，由于中长路理事会和管理局的国民党代表逃离满洲，而苏方绝大部分铁路员工已经回国，致使苏方已停止参与对铁路的管理，目前整个铁路完全由中方民主政府（东北铁路局）管理。苏方继续推迟参与铁路管理可能导致的后果是，中国人将独自经营这份“苏中共同财产”，苏联不仅从铁路运营中得不到任何利益，而且“将来中国人（甚至包括民主政府的人）认为自己有了本事，会反对我们参与管理”。有鉴于此，报告建议尽快解决苏联实际参与铁路管理的问题。报告还认为，恢复苏方在中

---

① 据苏联交通部计算，仅南线路段在战前一年的利润就有 1.63 亿卢布。见 1950 年 1 月 19 日贝舍夫给莫洛托夫的报告，АВПРФ, ф.07, оп.23а, п.248, д.20, л.17-19。

② 1946 年 12 月 2 日彼得罗夫与甘乃光谈话记录，АВПРФ, ф.0100, оп.40а, п.264, д.21, л.7-9。

③ 1947 年 4 月 8 日雷斯科夫给高岗的信，5 月 7 日哈尔滨总领事馆给林彪的信，АВПРФ, ф.0100, оп.40а, п.269, д.69, л.133-135, 140-144。转引自 *Ледовский* На 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ой работе в Китае в 1942-1952гг.//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1993, №6, с.130-131。

④ 1950 年 1 月科瓦廖夫给斯大林的报告，见 Goncharov, Lewis, and Xue, *Uncertain Partner*, pp.247-248。

长路的租赁地和企业股权将为苏联带来很大利益，由于中长路问题尚未谈妥，目前应由某个苏联组织或者秋林公司获得上述原俄国业主的权利。报告最后建议，成立专门从事满洲问题的科研机构，广泛收集和研究有关满洲的经济资料；设置领导中长路工作的专门机构，加强对满洲苏联企业和合营企业的统一领导。①

实际上，在中长路及所属企业的管理和东北资源的利用问题上，中共的处境十分尴尬。既要依赖苏联的资金和技术保障铁路运营和经济发展，又担心中国的主权和经济利益受到侵害，中共的矛盾心理和立场是可以想见的。同斯大林亲自处理所有与中国有关的问题一样，毛泽东对涉及与苏联经济关系的问题也极为重视。1948年5月，毛泽东要求东北局，以后对苏联"凡有借有还的协定"尽可能多签订，但在此之外的要求，"则必须遵守自力更生不依赖外援之原则，非万不得已不要轻易提出要求"。毛泽东还特别强调，"一切商业性协定的详细内容及经营和偿还情形"，必须"事前请示，事后报告"。②

当然，对于通过中苏合营方式迅速恢复工矿企业生产，从而推动经济发展，中共采取了积极的态度，如瓦房店和复州煤矿的开采。③但涉及到产权归属问题，中共的处理则十分谨慎。例如，1948年8月10日东北局报告，中长路苏方局长最近提出，海拉尔以东莫格图河畔发现褐煤炭层，确定其藏量约700万至1500万吨。苏方要求将上述地区及采矿权移交中长路管辖，归其开采。东北局的意见是，某些重工业矿产与苏方合作共同开发是需要的，但不划入中长路所辖范围，不扩大中苏条约上所规定的权利，而另外订立地方性的合作协定，且不对外宣布而实际进行。中共中央回电表示同意，希望东北局与苏联负责方面协商解决。④同样，1948年2月苏联人提出，在黑龙江等沿两国边界的航道，由苏方负责修建灯塔，其所有权属苏联。中共以所有权问题"用什么形式出现值得考虑"为由，把事情拖了下来。一年以后，苏方再次通知，莫斯科来电要求解决这一问题。3月7日李富春答复，仍要苏方说清所有权问题。⑤3月10日毛泽东在与此相关的另一个问题上则明确答复莫斯科，关于在黑龙江上设置界标事，同意苏方派技术人员来，但费用由中方负担，而界标属于中方所有。⑥5月14日，苏方又转告维辛斯基的

① 1948年12月31日斯拉德科夫斯基给米高扬的报告，АВПРФ, ф.0100, оп.42а, п.301, д.1, л.3-6。

② 1948年5月28日毛泽东致林罗陈并东北局电。

③ 1948年10月18日东北局致中共中央电，10月21日中共中央致东北局电。

④ 1948年8月10日东北局致中共中央电，8月17日中共中央致东北局电。

⑤ 1949年3月5日高岗、陈云致中共中央电，3月7日李富春致高岗、陈云电。

⑥ *Ковалев* Диалог Сталина с Мао Цзэдуном, 1991, №6, с.87.

请求，为了保证航行安全，苏联政府将派飞机和轮船沿黑龙江和松花江巡查航线。对此，中共中央 20 日复电说，黑龙江为两国边界，同意苏联飞机和轮船巡查，但松花江是中国内河，是否应由中国轮船装备火炮，并雇请苏联专家，定期巡查较为妥当。①

东北解放以后，此类问题更加突出。1948 年 12 月 2 日东北局报告，在对苏经济关系上首先遇到了关于中长路财产的界定问题。根据中长路协定第一条规定，南满铁路的财产，除 1905 年以前俄国所置者外，均不属于中长路，而属于中国政府。苏军占领时，把日本人所置的南满铁路附属财产大部分挂上了中长路的牌子。国民党进占沈阳后，又将苏军所划许多中长路财产属 1905 年以后者，统统改为中国政府所有。到沈阳解放时，中长路苏方代表派人非正式口头通知陈云说，这些财产均属中长路，应由中长路接收。因事关重大，林彪和陈云商定采取暂拖一时的办法，告诉苏方目前统一实行军管，将来再说。此外，对东北重工业恢复是采取向苏方借款方式，还是中苏合资经营方式，对苏方以战利品拆迁的设备可否提出请求归还一部分等，中共在处理时均颇为犹豫。②

中长路财产的归属实际涉及到中共政权对 1945 年中苏条约及中长路协定的认可问题，而在斯大林心中，这是处理与新中国同盟关系中最为棘手的问题，也是苏联与中共经济关系中最为敏感的问题。所以，斯大林采取了拖延的策略，不仅米高扬访问西柏坡时对此避而不谈，即使在刘少奇访苏期间提出中共对处理这一问题的具体建议时，斯大林也未置可否。③

当然，总体说来，尽管存在着矛盾和摩擦，中共与苏联在经济领域的合作，以及苏联对中共的援助还是主导方面。无论如何，面对 40 年代末远东的国际政治格局，中苏必须结成同盟，而这一点从中国经济状况的现实来看，对新生的中共政权尤为重要。用刘少奇的话说就是，“苏联对中国人民的真诚友谊的帮助，是恢复和发展中国经济的有利条件之一。由于这样的原因，中国人民应该特别重视和珍贵〔惜〕对苏联人民的友谊与合作。”④ 当然，苏联同样需要中国。在苏美对抗的冷战格局中，苏联对远东乃至整个亚洲的战略目标的核心是与中国结成同盟，并以此为苏

① 1949 年 5 月 14 日高岗致中共中央电，5 月 20 日中共中央致高岗电。

② 1948 年 12 月 2 日东北局致中共中央电。

③ 1949 年 7 月 4 日刘少奇给联共（布）中央和斯大林的报告，АПРФ, ф.45, оп.1, д.328, л.11-50。

④ 1949 年 10 月 5 日刘少奇在中苏友好协会总会成立大会上的报告，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 1 册，第 72 页。

联安全的东方屏障，这是斯大林会见毛泽东要达到的根本目的，也是与中国外交谈判的底线。同时，苏联还需要维护其在中国东北的既得利益。双方是否能够达到各自的目的，就要看中苏同盟条约谈判的结果了。

发表于《党的文献》2001年第2期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愿望和结果[①]

——根据俄国解密的档案材料

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和周恩来先后亲赴莫斯科，与斯大林和其他苏联领导人进行了长达两三个月的协商、谈判，终于签订了替代1945年中苏条约的新的条约和协定，从而将中国与苏联的战略同盟关系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这无疑是新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最重大的外交活动。

然而，迄今为止，中国尚未公布有关这次外交谈判的档案文献。只是到80年代后期，才开始有一些关于中苏条约谈判的电报、信函，以及当事人的回忆录公布于世，使我们得以对这次中苏谈判的过程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但是，我们仍然无法依据现有的文献和材料，肯定地、明确地回答下述问题：对于签订这样一个新的同盟条约，中苏双方各自的立场、方针和设想究竟是怎样的？在他们的协商和谈判中到底存在哪些分歧和争论？签约双方作出了如何的让步才形成了最后的一致意见？总之，缺乏对于中苏谈判过程进行具体的和详细的考察，我们就很难正确地判断中苏签订新约的最终结果是否符合他们最初的愿望，也就很难准确地理解在这个新条约基础上形成的中苏同盟的历史地位。

不久前，我们在俄国解密的档案中发现了一批关于这次中苏条约谈判的历史文献，共有70多件，其中包括毛泽东与斯大林的会谈记录，毛泽东、周恩来与苏联其他领导人的会谈和谈判纪要，中苏双方各自拟定的有关条约或协定的最初文本和

---

① 本文为我与谢尔盖·冈察洛夫合著。冈察洛夫原是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中苏关系问题专家，后调任俄罗斯驻华大使馆首席参赞。去年夏天，冈察洛夫向我提供了一批关于1950年中苏条约谈判的俄国档案文件，并提出合写一篇论文，我欣然从命。后来，冈察洛夫奉召回国，出任外交部第一远东司副司长。临行时商定论文由我执笔，完稿后两人再找机会进行讨论和修改，但此后一直未能与他取得联系。显然，本文的文责由我来负，而署名理应有我们两人。

历次修改稿，以及苏联有关部门和专家呈报的对于条约、协定的建议和意见。当然，这还不是全部文件，但经过对这些文件的整理和研究以后，我们认为，把俄国的解密档案与中国发表的有关文献和回忆录结合起来，已经可以对1950年中苏条约谈判的主要内容及其过程做出比较清楚的描述。① 这是我们首先要做的工作，也是本文预期达到的目的。

一、中苏条约的历史背景

所谓1950年的中苏条约，是相对1945年8月14日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以及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大连的协定而言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斯大林确定了战后苏联在远东的两个战略目标：把外蒙古从中国的版图中独立出来，形成广阔的安全地带；恢复沙皇俄国在中国东北的势力范围，以确保苏联在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冻港。苏联的这一要求通过1945年2月8日斯大林与罗斯福会晤以及雅尔塔协定得到了美国方面的保证。为了迫使中国政府接受苏联的条件，美国和苏联两面夹击，软硬兼施。在苏联军队已经大举进入中国东北之后，蒋介石终于被迫同意签订了这个城下之盟。②

这个有效期为30年的条约及相应协定充分保证了苏联在远东的一切权益：已经在1935年卖给伪满洲国的中长铁路重归中苏两国共同所有和共同经营；中长铁路局设局长一人，由苏方派员担任；宣布大连为自由港，港口主任由苏方派员担任；经大连港和中长铁路为苏联运输的进出口货物均免除关税，而经该港为中国其他各地运输的进出口货物则需缴纳进出口税；旅顺口作为仅供中苏两国共同使用的海军基地；该基地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由苏方派任；旅顺市主要民事行政人员的任免应征得苏联军事指挥当局的同意，等等。③ 直到1949年以前，在中国国民党与共产党的生死斗争中，苏联纵横捭阖，左右逢源，其对华政策的基本目标就是在雅尔

① 关于这个问题，联邦德国苏联东欧研究所的迪特·海因茨希教授有比较深入的研究，他的专著《苏联与共产主义中国（1945–1950）》即将在德国出版，其中一章专门论述了中苏条约谈判问题。

② 对于这一观点的详细论述见沈志华：《苏联出兵中国东北：目标和结果》，《历史研究》1994年第5期。有关这次中苏谈判的详细过程，过去只有台湾方面公布的材料。最近在北京召开了一次“冷战与中苏关系”国际学术讨论会，美国威尔逊国际学者研究中心向大会提交了一批共200多页的综合档案文献，其中包括大量美国和俄国保存的关于中苏谈判的原始文件。目前正在对这批文献进行翻译和整理，不久即将发表。

③ 有关文件参见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3册，北京：三联书店，1962年，第1327–1338页。

塔体系的范围内保证实现上述权益。

中国革命的胜利发展从根本上改变了远东的格局，也迫使苏联重新调整对华政策，为了在冷战的国际环境中加强与美国对抗的实力，斯大林无疑需要新中国加盟苏联的东方集团。即将取得全国政权的中国共产党，从意识形态、安全利益，以及未来国家的经济建设等各方面考虑，显然也要求与苏联保持密切的联盟关系。在这一点上，斯大林与毛泽东有着目标一致的共同愿望。然而，如何以法律条文的形式实现这一愿望，中苏之间却有不同的设想。斯大林希望与新中国结盟的方式和表现形式不致破坏雅尔塔体系及损害苏联在中国东北的既得利益，而毛泽东考虑的则是如何树立新中国独立自主的外交形象，如何以中苏新型关系的表现形式为榜样废除旧中国的一切不平等条约。这一分歧集中反映在是否需要签订一个新的中苏同盟条约的问题上。

中苏双方最早接触到这个问题是在 1949 年初米高扬秘密访问西柏坡期间。不过，双方开始都采取了慎重的和试探性的方针，而且是从具体问题谈起的。据俄国的档案文献，关于旅顺海军基地的问题，毛泽东通过中国民主人士之口向米高扬提出，“革命政府在中国掌权后，苏联再在旅顺口保留军事基地就没有意义了”。但毛泽东还表示，中国的共产党人“主张保留这个军事基地”，“待到中国十分强盛，有能力抵御日本侵略了，那时苏联本身也就不再需要旅顺的基地了”。毛泽东用这种委婉的说法，表明了对于旅顺口中国应该收回而目前暂不收回的立场。斯大林得到米高扬关于中国对这个问题立场的报告后，在 1949 年 2 月 5 日致毛泽东的电报中写道：“中国共产党人掌握政权后，形势就根本改变了。苏联政府已经决定，一旦同日本签订和约，而且美国也从日本撤军，苏联就取消这个不平等条约，并从旅顺撤军。然而，如果中国共产党认为苏联军队立即撤出旅顺地区为宜，那么苏联准备满足中国共产党的愿望。”对此，毛泽东和中共其他领导人立即表示，不能马上撤退苏联军队和撤销旅顺口基地。毛泽东还说，中国人民感谢苏联的这个条约。当我们强大起来时你们再离开中国，到那时我们再签订类似苏波条约那样的中苏互助条约。不过，米高扬对此的感觉是，“他有自己的策略考虑，但他没有明说”。[①]

斯大林特别关心中国长春铁路问题。据随同米高扬到西柏坡的科瓦廖夫回忆，在会谈期间，斯大林“不止一次以无线电报向我询问，中国同志对中长铁路条约的

① *Ледовский* Секретная миссия А. И. Микояна в Китай (январь-февраль 1949г.), 1995, №2, с.106; №3, с.101.

真正态度如何，他们是否认为中长铁路条约是真正平等的条约"。[1]米高扬在会谈时则坦率地告诉中共领导人，苏联不认为有关中长铁路的协定是不平等的，"因为这条铁路主要是由俄国出资建成的"，"可能在这个条约里，平等的原则并未得到充分的体现，但我们准备与中国同志友好地讨论并解决这个问题"。对此，毛泽东做了一番令人费解的含糊回答，最后表示同意让高岗和科瓦廖夫共同研究并汇报这个问题。[2]

这时，双方都还没有直接谈到中苏条约本身的问题。但至迟到1949年4月，中共领导人已经在考虑如何处理旧中国签订的对外条约问题了。周恩来在一次报告中向中国民主人士谈到：过去的"对外条约有的废除，有的则要加以修改，有的还可以保持"。[3]这里谈到"要加以修改"或"可以保持"的条约，显然是考虑到了1945年的中苏条约。

1949年6月至8月，刘少奇率中共中央代表团秘密访问莫斯科时，则直接提出了如何处理中苏条约的问题。在给斯大林的书面报告中，刘少奇表示新中国政府愿意继承现有的中苏条约，但同时又提出，在苏联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时，需要对这个条约加以处理。刘少奇列出了三种处理方式：（1）由中国新政府宣布全部承认这个条约继续有效，不加任何修改。（2）根据原来条约的精神，由两国政府代表重新签订一个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3）由两国政府代表换文，暂时维持这个条约的原状，但准备在适当时机重新加以签订。斯大林在该报告上批道："等毛泽东到莫斯科后再决定这个问题。"[4]

看来，当时中、苏双方领导人都还摸不透对方的本意。

新中国成立以后，解决中苏之间的同盟条约问题已经成为中国领导人开展外交活动和形成外交决策的当务之急。因此，毛泽东在外交问题上首要考虑的就是直接与斯大林进行会谈，而且明确地向斯大林透露，会谈的目的是要签订一个新的中苏条约。

1949年11月8日，在致莫斯科的电报中，毛泽东表达了出访苏联的愿望，还特别说明在访问期间要提出中苏条约问题。电报又补充说，如果要签订条约，周恩

---

① *Ковалев* Диалог Сталина с Мао Цзэдуном, 1992, №1-3, с.86.

② АПРФ, ф.39, оп.1, д.39, л.78-79//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1995, №3, с.101.

③ 周恩来：《关于和平谈判问题的报告》，1949年4月17日。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周恩来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321页。

④ 刘少奇致联共（布）中央和斯大林，1949年7月4日，АПРФ, ф.45, оп.1, д.328, л.11-50。

来将前往莫斯科签字。[①]11月9日，中共中央给中国驻苏大使王稼祥的电报也说明了同样的目的。[②]在此期间，身为联共（布）中央驻中共中央代表的科瓦廖夫也向斯大林报告说：毛泽东曾经告诉他，打算出访三个月，第一个月在苏联，与斯大林会谈，要签署新的中苏条约，第二个月访问东欧，第三个月在苏联南方养病。因此，中国人希望斯大林将中苏条约的事情放在日程安排的前面。[③]

毛泽东去莫斯科的目的，一是要与苏联结成同盟，二是要以一个新条约的形式表现这种同盟关系。这一点是清楚的。[④]然而，毛泽东似乎感觉到了斯大林的意图，所以对于这次莫斯科之行是否能够签订新的中苏条约没有任何把握。出发前，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与刘少奇和中国驻苏大使王稼祥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在谈到去莫斯科如何处理原中苏条约的问题时，毛泽东只是说"可以谈谈看"。[⑤]后来的事实证明，毛泽东的感觉是正确的。

二、是否需要签订一个新的条约

毛泽东于1949年12月16日到达莫斯科，六个小时之后便与斯大林举行了正式会谈。根据俄国档案中的会议记录，这两位领导人的第一次对话便在中苏条约的问题上发生了分歧。当毛泽东谈到刘少奇访苏后中共中央研究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问题时，斯大林立即接过来说："这个问题可以讨论和解决。"但他强调，"苏中之间是根据雅尔塔协定缔结这个条约的"，所以苏联领导人"决定暂时不改动这个条约的任何条款，因为哪怕改动一条，都可能给美国和英国提出修改条约中涉及千岛群岛、南库页岛等等条款的问题提供法律上的借口"。斯大林的设想是要"寻求一种可行的办法，在形式上保留，而在实际上修改现行条约"。这就明确表示了苏联不准备签订一个新条约的立场。对此，毛泽东只得表示可以保留"中国长春铁路和旅顺的现状"，"眼下不必修改条约"。但同时指出，"在中国讨论条约时，我们没有考虑到美国和英国在雅尔塔协定中的立场。我们应该按如何对共同的事业有利来

① АВПРФ, ф.0100, оп.42, п.19, д.328, л.81-85//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1994, №6, с.76.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第131页。

③ *Ковалев* Диалог Сталина с Мао Цзэдуном, 1992, №1-3, с.88-89.

④ 过去认为，中苏莫斯科会谈初期出现不愉快的原因是斯大林不了解毛泽东的意图，或双方产生了误会，现在看来似乎是没有道理的。

⑤ 徐则浩：《王稼祥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年，第456页。

行事。这个问题必须考虑周到。”毛泽东接着又提出，“是否需要周恩来前来莫斯科解决条约问题”。对此，斯大林显然不高兴地回答说：“这个问题您必须自己决定。可能需要周来解决其他一些问题。”①

毛泽东在12月18日给刘少奇的电报中讲述了他对这次会谈结果的理解，即苏联认为“不宜改变原有中苏条约的合法性”，苏联租用旅顺口30年“在形式上不能改变”，但可以发表一个声明表示苏联同意从那里撤军。电报中还讲到一段俄国档案没有记录的内容：尽管毛泽东提出中国的社会舆论认为原条约已经失去了意义，斯大林的答复仍是：对原条约的修改，大约要到两年以后。斯大林还坚持不要周恩来去莫斯科。于是，毛泽东请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条约的问题并提出意见。②

12月21日，刘少奇、周恩来、朱德联名致电毛泽东说，政治局会议的意见是如果“只准备就旅顺驻兵问题及对一般政治问题发表一个声明，则恩来同志去莫似无必要”。③显然，在中国方面看来，这次中苏最高领导人会谈能否签订新的中苏条约及有关协定，实无把握。

毛泽东对第一次会谈的结果很不满意。按照科瓦廖夫的观察，那几天毛泽东“闷闷不乐地呆在别墅里”，“情绪不好，心神不安”。为了进一步表明中国方面的态度，他于12月22日邀请科瓦廖夫去谈话，并要求把谈话记录转给斯大林。根据谈话记录，毛泽东提出下一次会见希望安排在12月23日或24日，并向斯大林提交了下一步谈判的两种方案。第一种方案是解决中苏条约、贷款协定、贸易协定、航空协定等问题，其中包括缅甸承认中国的问题。按照这个方案，需要周恩来前来莫斯科履行协议签字手续。第二种方案是对第一方案中的各种问题从多方面进行磋商，但暂不履行相应的签字手续。这样，周恩来就不必马上来莫斯科。毛泽东在交谈中不止一次地强调，所有这些问题均由斯大林定夺。④毛泽东对此抱有极大希望，他在第二天凌晨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谈到：“已与斯大林约好23或24日谈一次。在这次谈话后可以确定方针电告你们。”⑤

然而，在12月24日举行的第二次会谈中，主要是谈越南、日本、印度等一些

---

① 斯大林与毛泽东会谈记录，1949年12月16日，АПРФ, ф.45, оп.1, д.239, л.9-17。

② 裴坚章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49–1956）》，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第18页。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235页。

④ *Ковалев* Диалог Сталина с Мао Цзэдуном, 1992, №1-3, с.89.

⑤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第197页。

亚洲兄弟党的事情，斯大林根本没提中苏条约的问题，毛泽东对此大失所望。[①] 这一次毛泽东真的动了气，他后来曾向苏联大使尤金谈起当时的情况："关于签订条约的问题当时对我们来说事关重大，将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今后发展的前景"。"我在同斯大林第一次会谈时就提议签订条约，但是斯大林却避而不答。我在第二次会谈时又重提这一问题"，斯大林还是找借口拒绝了。"后来斯大林避而不见我。我曾给他的住所打过电话，但得到的答复是斯大林不在家，建议我去见米高扬。"毛泽东说，"这种做法使我很生气，我决定呆在别墅里，什么也不干"。毛泽东还拒绝了科瓦廖夫和费德林关于去苏联全国游览的建议，而宁可"在别墅里睡大觉"。[②]

根据汪东兴的日记，12 月 25 日中午斯大林曾来电问候毛泽东，26 日和 27 日毛泽东与其他苏联领导人继续进行过会谈，此后直到 1950 年 1 月 1 日前，毛泽东与苏联领导人没有任何接触。[③] 莫斯科的空气显得凝重而紧张，看来，斯大林和毛泽东都在等待对方做出让步。

1950 年元旦这一天，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奉外交部长维辛斯基之命拜访了毛泽东。毛泽东向他声明，因身体不适，"准备完全静养一周，彻底恢复正常的睡眠"。毛泽东还强调，他"不想参观工厂，不想作报告，也不想发表公开演讲"，并且取消了在苏联各地旅行的计划。最后，毛泽东提出"想提前一个月，即在 1 月底离开莫斯科回国"。在谈话中，毛泽东还向苏联方面透露了一个消息：最近几天，"收到北京的报告，说缅甸和印度政府表示他们愿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政府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是，只要缅甸和印度政府接受中国政府的条件，"他们可以派代表到北京进行谈判"。毛泽东还告诉罗申："不久英国和其他英联邦国家也将在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问题上采取明显步骤。"[④]

毛泽东并非是无意地谈到这两个问题的，而是在以一种东方式的外交语言向斯大林表示不满和提出警告。

首先，毛泽东不是真的要休息养病和提前回国。尽管他在私下表示了这种意见，但在第二天，即 1 月 2 日，毛泽东就以答塔斯社记者问的形式，公开向外界声明他来莫斯科的目的首先是要解决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等问题，并表示逗留苏联的时

① 见裴坚章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49–1956）》，第 18 页。可惜的是，在目前中俄两国公布的档案中均未见到关于这次会谈的文献资料。

② *Юдин П.* Мао Цзэдун о китайской политике Коминтерна и Сталина. //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1994, №5, с.105-106.

③ 汪东兴：《汪东兴日记》，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年，第 165–170 页。

④ 罗申与毛泽东会谈纪要，1950 年 1 月 1 日，АВПРФ, ф.0100, оп.43, п.10, д.302, л.1-4。

间，“部分地取决于解决中华人民共和国利益的各项问题所需的时间”。毛泽东还说，“打算访问苏联的几个地方和城市”。

这无疑是在向斯大林表明要签订新条约的决心。

其次，英国和缅甸也不是最近几天才提出承认中国的问题的。早在1949年12月16日周恩来主持政务院会议时就透露，“英国政府倾向于承认我国”。而12月18日周恩来已复电缅甸外交部长，同意在缅甸政府与国民党残余力量断绝关系的基础上，建立中缅外交关系。[①] 毛泽东选择这个时候向苏联传递这些信息，显然是在外界传闻毛泽东在莫斯科被“软禁”、中苏关系出现紧张状态的背景下向斯大林施加压力。无论如何，当中苏谈判陷入僵局时，中国与其他国家，特别是西方国家的关系出现转机，对苏联无疑是一个刺激。[②]

总之，到1月2日，中苏条约谈判的僵持局面开始打破了，做出让步的是斯大林。1月2日晚8时，莫洛托夫和米高扬来到毛泽东下榻的别墅，特地询问他对签订中苏条约等事项的意见。毛泽东讲了三个方案：(1) 签订新的中苏条约；(2) 由两国通讯社发表一个简单公报，说明两国对旧的中苏条约交换了意见，而实际上把这个问题拖下来；(3) 签订一个声明，内容是讲两国关系的要点。莫洛托夫马上表示同意第一方案。毛泽东又追问：“是否以新条约代替旧条约？”莫洛托夫明确回答：“是的。”毛泽东当即说出了他的安排：“我的电报1月3日到北京，恩来准备5天，1月9日从北京动身，坐火车11天，1月19日到莫斯科，1月20日至月底约10天时间谈判及签订各项条约，2月初我和周一道回国。”[③] 根据汪东兴的日记，1月3日这一天，毛泽东“精神特别好”，“有说有笑”。[④]

笼罩在莫斯科上空的乌云终于散开了。

三、苏方精心准备的条约及有关文件草案

中苏之间签订一个新的条约以代替1945年条约的问题，在原则上似乎是解决了。然而，在签订一个什么样的新条约这个具体问题上，中苏谈判又出现了分歧和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18页。

② 毛泽东本人后来谈到这个问题时说过：“斯大林的立场发生变化，也许是印度人和英国人帮了我们的忙。”*Юдин* Мао Цзэдун о китайской политике Коминтерна и Сталина, с.106。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第212页。

④ 汪东兴：《汪东兴日记》，第173页。

争论。这时，中苏谈判双方各自的方针发生了一种戏剧性的变化。此前，苏联坚持条约的形式不能改变，即保留旧的中苏条约，而对实际内容可以进行修改。但在确定废除 1945 年的条约以后，苏方最初提出的新条约却完全沿袭了旧条约的内容。相反，中国以前同意保留 1945 年条约的实际内容，而在形式上必须以新条约取而代之。但在确定要签订一个新条约以后，中方最初提出的涉及双方实际利益的协定文本却与旧条约的内容大相径庭。

毛泽东 1 月 6 日与维辛斯基和 1 月 9 日与科瓦廖夫谈话时，强调的仍然是“签订一个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对双方都是有利的”，同时表示在具体签约时，会考虑苏联与雅尔塔协议的关系；中国政府“将依据包括蒋介石与资本主义国家签订的条约在内的一切现存条约为起点，重新进行谈判”。[①] 毛泽东对条约和有关协定的具体内容似乎还没有充分考虑，而作为中方谈判主角的周恩来则正在准备赶赴莫斯科。与此同时，苏联方面对条约及有关文件草案的准备工作已经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了。

1950 年 1 月 5 日，苏联外交部起草了名为“苏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的第一稿草案，除了在政治上保持友好同盟关系的条文外，该草案第七条明确指出：“缔约国双方承认，1945 年 8 月 14 日签订的中长铁路、大连和旅顺口协定继续有效。”[②] 显然，苏方最初的设想是签订一个新条约而同时保留 1945 年的三个协定。

1 月 9 日，苏联外交部条法司司长格利巴诺夫、远东司副司长费德林、驻华大使罗申等人联名呈报了他们起草的条约草案第二稿。其中第六条将“友好合作”改为“巩固和发展两国之间的经济文化联系”，第七条则改为：“缔约国双方声明，根据苏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规定，完全保留 1945 年 8 月 14 日签订的中苏大连港协定和 1945 年 8 月 14 日签订的旅顺口协定及其附件，并使其成为本条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③] 这里，苏联外交部排除了中长铁路问题，而把它转给交通部去解决。

基于斯大林曾答应中国在对日和约签订后苏联军队撤出旅顺海军基地，维辛斯基对草案的第二稿提出了修改意见。根据这一指示，格利巴诺夫等人于 1 月 10 日又提交了条约草案的第三稿，其中第六条增加了“彼此给予一切可能的经济援助”一句，第七条改为：“缔约国双方同意，目前在旅顺口和大连港的苏联军队自本条约生效之日起 2—3 年内撤出，1945 年 8 月 14 日签订的旅顺口和大连港协定在规

① 维辛斯基与毛泽东会谈纪要，1950 年 1 月 6 日，АВПРФ, ф.0100, оп.43, п.8, д.302, л.4-6。1950 年 1 月 9 日毛泽东与科瓦廖夫的谈话，见 Sergei N. Goncharov, John W. Lewis, and Xue Litai, *Uncertain Partner: Stalin, Mao, and the Korean War*,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247-248。

② АВПРФ, ф.07, оп.23а, п.18, д.235, л.12-15.

③ АВПРФ, ф.07, оп.23а, п.18, д.235, л.18-19.

定期满后应重新修订。”[①] 这里显然是有矛盾的，既然已决定苏军提前撤出，为什么该协定还要等到 20 多年后再重新修订？于是，外交部再次修改了草案，在第四稿中把第七条中重新修订旅顺口和大连港协定的日期提前到“签订对日和约以后”，而在第五稿中，则把苏军“撤出”改为“缩减或撤出”。[②]

1 月 16 日，维辛斯基将外交部最后的文本（第六稿）呈报给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莫洛托夫，其中第七条确定为：“缔约国双方同意，目前在旅顺口和大连港的苏联军队自本条约生效之日起 2—3 年的期限内全部撤回苏联境内，撤军将于 1950 年开始。缔约国双方还同意，中苏之间 1945 年 8 月 14 日签订的旅顺口和大连港协定，以及大连港协定议定书在签订对日和约后重新审议。”这一草案中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变化，即该文本将条约的名称由“友好合作互助条约”改为“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此后新的中苏条约便沿用了这个名称。[③] 鉴于前文提到的毛泽东在 12 月 16 日和 1 月 6 日的会谈中都曾使用了“友好同盟条约”的说法，显然，维辛斯基最后改变条约名称是注意到了中方这一说法。[④]

在此期间，苏联条约法律专家杜尔金涅夫斯基在致维辛斯基的备忘录中提出建议，“在同一问题上‘吸收’了以前条约相似内容的条约可以被认为具有并行效力。在这种情况下，不能认为以前的条约就一定失效了。但由于可能出现各种解释，所以，对保留与新条约不矛盾的一部分旧条约作补充说明是适宜的，这样的补充说明可以写在新条约的文本或签字议定书以及专门的照会中。”[⑤] 其意图当然是考虑如何保留旧条约的内容。或许正是采纳了专家的建议，维辛斯基还在同一天向莫洛托夫提交了《确认中国长春铁路协定有效的议定书》和相同内容的《声明》，特别说明“完全根据 1945 年 8 月 14 日在莫斯科签订的中国长春铁路协定中指明的期限确定该议定书的有效期”。同时以《补充条款》的方式声明：“本条约的缔结不承担苏中双方在以前条约中各自的债务。”[⑥] 显然，苏联外交部是要把中长铁路的问题与条约和旅顺、大连的问题区别开来。

1 月 19 日，苏联交通部提出了对于中长铁路和大连港协定的修改建议和草案

---

① АВПРФ, ф.07, оп.23а, п.18, д.235, л.20-25.

② АВПРФ, ф.07, оп.23а, п.18, д.235, л.26-29, 30-34.

③ АВПРФ, ф.07, оп.23а, п.18, д.235, л.1-7.

④ 师哲回忆说，是周恩来提出在 1945 年《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名称上加上“互助”二字的。见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修订本），李海文整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 年，第 448 页。

⑤ 杜尔金涅夫斯基致维辛斯基，1950 年 1 月 13 日，АВПРФ, ф.07, оп.23а, п.18, д.235, л.117-121。

⑥ АВПРФ, ф.07, оп.23а, п.18, д.235, л.5-7.

文本。交通部长贝舍夫在给莫洛托夫的报告中说明了他们的主要修改建议。

关于中长铁路协定：

一、重新规定中国长春铁路的资产组成。1945 年的协定没有把位于南线（哈尔滨—大连）上的工厂及其附属的由日本人建造和改建的企业列入铁路的资产组成，而新修订的条款应规定将上述这类企业，即确保铁路正常营运所必需的企业，列为苏联和中国共同拥有，而不论它们建立的时间。

二、规定由中苏双方人员轮流担任铁路局的理事长、监事长、局长和总稽核等职务及其副职，每三年轮换一次。而以前这些职务是固定由中苏双方人员分别担任的。

三、新增加的条款是，对中国长春铁路及其所属企业和机关所需的进口货物免征海关税、各种特别税及其他货运税。

四、将旧协定中国长春铁路应与中国的国营铁路一样向中国政府“缴纳税捐”一句改为“缴纳同样数额的税捐”。

关于大连港协定：

一、尽管大连港未被列入中长铁路的组成部分，但在原协定的第三条中已指明港口主任由中长铁路局局长从苏联人员中委派。

二、为了共同经营大连港和大连的工厂，建议组建一个中苏合营的远东海运公司，并将该公司苏联方面的领导权委托给苏联海军部。

贝舍夫在报告的最后特别说明了要把在 1945 年以前属南满铁路管辖的地段列为中长铁路资产组成是出于经济上的考虑。因为这段铁路“每年都能产生很大利润，1943 年其利润是 1.63 亿卢布”，“从 1946 年开始，在确保中国长春铁路正常营运时，它每年都可以得到上述数额的利润”。而目前“满洲地区工业的恢复和经济的发展，以及满洲与中国其他地区经济联系的扩大，正在引起货运量和旅客运输量的增长，特别是在南线即哈尔滨—大连的铁路线上”。[①]

1 月 21 日，葛罗米柯（外交部第一副部长）、贝舍夫、科瓦廖夫、罗申等六人向莫洛托夫、米高扬和维辛斯基呈上了委托他们起草的苏联部长会议关于中国长春铁路决议的草案和中长铁路两个议定书的草案。其要点是：

一、确定将外交部起草的重申 1945 年协定有效期的中长铁路协定的议定书草案作为苏中谈判的基础。

二、关于从 1950 年 2 月开始恢复对中长铁路实行共同经营和共同管理的事宜，

① 贝舍夫致莫洛托夫，1950 年 1 月 19 日，АВПРФ, ф.07, оп.23а, п.20, д.248, л.4-13。

必须与中国政府达成协议。

三、确认根据交通部的建议起草的关于中长铁路补充议定书所述各项条款，并且必须就有关条款的修改与中国政府达成协议。

四、在确定中长铁路的全部资产前，在与中国政府谈判时，应提出将铁路的固定资产列为苏联和中国共同所有的建议。为确定转为苏中共有的资产，批准成立苏中联合委员会的苏联代表团。（附“固定资产和转交苏中两国共同所有和共同经营的资产清单”。）

五、委托外交部维辛斯基和交通部贝舍夫，就上述两个议定书草案与中国政府进行谈判。

决议的落款是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斯大林和苏联部长会议办公厅主任巴马兹涅夫。[①]

看来，苏联方面认为中国接受条约草案不会有什么问题，因此把注意力集中在与苏联的远东战略利益有更直接关系的中长铁路问题上。

1月22日，莫洛托夫、米高扬、维辛斯基将专门委员会起草的关于中国问题的13个草案呈报斯大林，其中包括苏中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苏中关于旅顺口和大连港协定的议定书、苏中关于中长铁路协定的议定书、苏中贷款协定、关于成立苏中航运股份公司的议定书、关于在新疆成立苏中有色金属和稀有金属股份公司的议定书、关于在新疆成立苏中石油股份公司的议定书、关于苏中易货和支付的议定书、关于苏联与新疆贸易的议定书、关于苏联专家的费用支付条件的协议、苏联部长会议关于苏联机构和苏中合营股份公司共同管理的满洲和辽东半岛地区内不动产的决议、苏联部长会议关于派遣苏联专家和教师组到中国工作的决议。联共（布）中央立即批准了这些草案。[②]

苏方最后确定的中苏条约及关于中长铁路、旅顺口和大连的议定书草案与外交部和交通部呈报的草案没有原则上的变化，只是将条约第七条的内容单独列出，形成了《苏中关于旅顺口和大连港协定的议定书》。但这里有一个特别应当引起注意的问题：上述提交斯大林的13个草案几乎包括了中苏谈判可能涉及的所有问题，却惟独没有旅顺口、大连港协定和中长铁路协定本身。原因何在？显然，根据苏方的设想和愿望，这两个协定根本没有必要重新起草，因为原中长铁路协定继续有效，原旅顺口协定和大连港协定要等到与日本签订和平条约后再重新审议，而苏联

① 葛罗米柯等致莫洛托夫等，1950年1月21日，АВПРФ, ф.07, оп.23а, п.20, д.248, л.20-28。

② АВПРФ, ф.07, оп.23а, п.18, д.235, л.41-50.

提出的有关修改部分已经体现在两个协定的议定书草案中了。

我们来归纳一下苏联方面最后形成的草案：关于《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除了在原则上确定了中苏联盟的关系外，没有涉及双边实际利益的内容。关于中长铁路问题，与1945年的协定相比，不仅保留了原来的30年有效期，而且其修改部分除领导职务采取轮换制以外，其他如资产确定、免征海关税和货运税、缴纳铁路营业税等规定都是更有利于保障苏联利益的。关于旅顺口和大连问题，除规定苏联驻军应从1950年开始撤退，并在条约生效后2—3年内撤退完毕外，其余一切照旧，要等到对日和约签订后再行审议。

这就是中苏条约正式谈判开始之前苏联方面的全部设想和准备，而此时周恩来才刚刚到达莫斯科。

四、中苏外交谈判中的分歧和争论

1950年1月20日，周恩来率领庞大的中国政府代表团来到莫斯科，并于22日参加了斯大林与毛泽东的第三次正式会谈。

在这次会谈中，毛泽东与斯大林就几个原则问题达成了一致意见：第一，对中苏条约应当修改，重新签订。第二，宣布在签订对日和约以前旅顺口协定依然有效，此后苏军撤出旅顺。第三，把在法律上保留中长铁路协定有效的原则作为基础，而实际上进行适当的修改。第四，苏联放弃在大连港的权利，由中方决定大连的问题。第五，中方原主张中长铁路管理委员会主席和局长的职务由中方担任，后同意采取轮换制。第六，周恩来提出修改双方对中长铁路的投资比例，把中方的投资比例增加到51%，后同意从保障双方利益的角度再研究一下。此外，还讨论了贷款协定、新疆贸易等问题，并决定委托米高扬、维辛斯基、周恩来、李富春进行具体谈判。[①]

1月23日，中苏双方代表进行会谈，并首先讨论了苏方提出的草案。1月24日，毛泽东、周恩来等研究苏方的草案，并拟出了中方修改后的文本。[②]1月24日23时，由中国大使馆参赞戈宝权将中方修改后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草案递交给苏方谈判人员库尔久科夫。我们把双方的草案进行了仔细的对比后发现，中方的草案除调整了一下段落安排和增加了个别修饰词以外，从名称到内容，与苏方

---

① 斯大林与毛泽东会谈记录，1950年1月22日，АПРФ, ф.45, оп.1, д.329, л.29-38。

② 汪东兴:《汪东兴日记》，第194页。

的草案没有任何原则上的区别。[①] 这一点与中国方面有关回忆录和研究著作中的说法完全不同。以前都认为新的中苏条约的最初文本是周恩来起草的，或苏方按周恩来的意思起草的。[②] 现在看来，这种说法是缺乏依据的。总之，就条约本身而言，中苏双方没有什么分歧。尽管后来双方又有两次对条约文本的修改，但都是个别文字的改动或调整。[③] 对这一点并不难理解，因为条约所述的防止日本及其盟国的侵略、加强双边的协商与合作等内容，都是中苏双方的共同愿望和要求。真正涉及双方利害冲突的是在中长铁路、旅顺和大连等问题上。

经过双方接触以后，苏方在上述提交给中方的草案的基础上，又于 1 月 26 日提出了一个关于大连港协定的草案。其内容主要是：(1) 中国政府同意从大连港内划拨出一些码头和仓库转租给苏联；(2) 凡经大连港的苏联的进出口货物，或苏联为港口设施提供的材料和设备，均免征关税；(3) 大连的行政管理机关隶属中国，但港口主任和副主任的职务则由中苏两国人员轮换担任；(4) 在缔结对日和约前，大连港实行同旅顺海军基地一样的军事管制；(5) 该协定将在对日和约生效后重新审议。[④] 看来，苏方对于涉及实际利益的关键问题不仅考虑周全，而且不断加码。对此，中方的设想却完全不同。

经过两天的研究和讨论，1 月 26 日中方提出了由周恩来主持起草的《关于旅顺口、大连和中国长春铁路的协定》的草案。该草案首先在形式上与苏方草案不同，即将几个利益攸关的重大问题放在一个统一的协定中解决。这实际上等于否定了苏方关于在签署对日和约后再重新审议有关协定的意见，而是要求立即一揽子解决所有协定的重新审议问题。在内容上，双方设想的差距就更大了。关于旅顺口、大连港和中长铁路领导职务采取轮换制的问题，中方没有异议。针对斯大林与毛泽东会谈中本来已经确定的苏军在对日和约签订后撤出旅顺口的原则，中方草案增加了补充条件："由于某些原因阻碍了对日和约的签订，而本协定生效已超过三年期限且未再缔结相应的条约，则苏军将立即撤出旅顺口地区。"最要害的问题是中方提出了苏方草案完全不曾设想的问题，这主要是：第一，苏联放弃租用旅顺口作为

---

① АВПРФ, ф.07, оп.23а, п.18, д.235, л.38-40.

② 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修订本），第 448 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 23 页；裴坚章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49–1956)》，第 22 页。不过，伍修权的回忆录承认"条约最初文本是苏方起草的，没有原则变动"。伍修权：《回忆与怀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年，第 237 页。

③ 见 АПРФ, ф.3, оп.65, д.369, л.7-10；АВПРФ, ф.07, оп.23а, п.20, д.243, л.8-16。

④ 葛罗米柯致米高扬和维辛斯基，1950 年 1 月 26 日，АВПРФ, ф.07, оп.23а, п.20, д.248, л.35-37。

海军基地的权利，放弃在大连和中长铁路的一切权力和利益，同时声明将上述所有权利和义务归还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目前由苏联临时代管或租用的在大连和旅顺口地区的一切财产，均由中国政府接收。第三，对日和约签订或本协定生效三年后，苏联政府立即将中长铁路及其所属全部财产无偿地移交中国所有。[①]

除旅顺撤军问题外，中方的草案几乎完全推翻了苏方的原有设想。这是苏联方面感到非常意外的，以至收到周恩来的草案后，苏方进行了反复研究和修改。我们在俄国档案中发现了对中方这一草案的四份不同的修改稿，其中有两份删改之处非常多，特别是斯大林本人批阅的文本，几乎把中方草案的内容全部勾划掉了。不过，不知什么原因但显然是经过慎重的考虑之后，苏方于 1 月 28 日交给师哲的协定修改稿已经很接近中方的协定草案了。在苏方的这个协定草案中，没有提苏联放弃在旅顺、大连和中长铁路的一切权力和利益，并增加了由中国“偿还苏联自 1945 年以来用于旅顺口修复和建设工程的费用”的条款。除此以外，苏方接受了关于旅顺口的条款（不包括移交财产），也接受了大连的行政完全隶属中国管辖、立即由中国政府接收大连（不包括旅顺口）的一切财产的条款。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苏方还接受了在对日和约签订后或不迟于 1952 年末无偿地向中国移交中长铁路的权利及全部财产的条款。不过，苏方在同时提交的该协定的议定书中又增加了三条：对于苏联运入、调出旅顺口的物资和原料免征一切税收；上述物资和原料免受中国海关检查；苏联军队和军用物资可以沿中长铁路自由调运，其运费按中国军队调运的现行价格计算。[②]

1 月 31 日，中方又提出了根据苏方草案相应修改的关于旅顺口、大连和中长铁路协定及议定书草案。对于协定，中方几乎没做改动，但在议定书中，针对苏军沿中长铁路调运的问题，中方提出增加一项条款，即中国的军队和军用物资也可以自由地沿苏联境内的铁路调运。[③]就在这个问题上中苏双方在谈判中发生了争论。1 月 31 日至 2 月 2 日，米高扬、维辛斯基与周恩来连续进行了三天会谈，会谈涉及到中苏双方提出的所有问题。维辛斯基关于会谈情况给斯大林的报告显示，中苏双方对条约文本只做了一些文字修改，关于旅顺口、大连和中长铁路的协定，以及贷款、航空、贸易、派专家等协定也没有原则性的分歧，问题就出在关于旅顺口、大连和中长铁路协定的议定书上。对于中方提出的增加中国军队和军用物资沿苏联铁路调

① 维辛斯基致斯大林，1950 年 1 月 26 日，АВПРФ, ф.07, оп.23а, п.20, д.248, л.38-55。

② АВПРФ, ф.07, оп.23а, п.18, д.235, л.77-79.

③ АВПРФ, ф.07, оп.23а, п.20, д.243, л.18-23.

运的条款，苏方表示坚决反对。一方面，作为让步，苏方在修改议定书时根据中方的愿望对第一条做了改动，规定只有在远东地区出现反对苏联的战争威胁的情况下，才能沿中长铁路调动部队。但另一方面，苏方认为中国军队从满洲沿苏联铁路向新疆调动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和合理性，中方的建议实质上是对苏联建议的“反提案”，是“隐讳地反对苏联这一建议的一种特殊方式”，因此“没有任何必要，也绝对不会被接受”。周恩来对此做了详细的解释，说明中方提出这一条款是因为苏方首先提出了这个问题，并坚持必须在议定书中列入这一条款。米高扬随即指出，如果这样，那么就取消苏方的这一建议，而把议定书中已经缩短的中长铁路协定有效期再保留十年。显然，苏方是在以取消已经形成的谈判结果相要挟。周恩来无法再表示反对，但提出要向毛泽东报告。在第二天的会谈中，周恩来接受了苏方的条款，只是要求苏联口头承诺，在必要的情况下，中国可以沿西伯利亚大铁路调运军队。米高扬对此表示可以接受，但是再次对中方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表示惊讶。他气愤地说：“作为同盟者，苏联无偿地转让了巨额财产，包括中长铁路、大连、旅顺口以及在这些地区我们拥有的一切权利，而中国却连苏联在一条铁路上调动军队都不愿意同意。如果连这样的让步中方都不能做出，那我们还算什么同盟者呢？”[①]

至此，中苏谈判大局已定。2月5日，毛泽东致电刘少奇，将已经定稿的关于中长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和议定书，贷款协定和议定书，以及关于外蒙古独立和废除1945年中苏条约的照会等文件发回，要求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进行讨论并通过。[②] 以后几天，毛泽东和周恩来已经有时间在莫斯科参观工厂和集体农庄了。

五、一个双方都可以接受的结局

根据俄国档案材料，2月11日至13日，双方代表进入了一轮新的谈判，又举行了三次会谈。

2月10日，中国代表团收到莫洛托夫转交的一个新协定草案，其中规定在苏联远东地区和各中亚共和国的领土上以及在中国的满洲和新疆境内不得向外国人提供租让，并不允许有第三国的资本或这些国家的公民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参与的工业的、财政的、商业的及其他的企业、机关、公司和团体的经营活动。这就是所谓

① 维辛斯基致斯大林，1950年2月1日，2月2日，2月3日，АПРФ, ф.3, оп.65, д.369, л.11-21；АВПРФ, ф.07, оп.23а, п.18, д.234, л.29-56。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23–24页。

的《补充协定》。会谈中周恩来说，毛泽东同志同意这个协定的草案，只是在文字方面有几处不大的意见。比如，将“协议如下”改为“双方达成本补充协定”，将“租让”改为“租让权”。周恩来还提出，中国准备采取经济措施，逐步减少外国公司和组织在东北和新疆境内从事的经济活动。① 会谈还涉及有关条约和协定的签字和公布问题。周恩来要求签字仪式在 2 月 14 日 18 时举行，并提出贸易协定、航空协定，以及石油和有色金属股份公司的协定不能签字，因为关于这些协定的文本尚需进一步协商和明确。周恩来还说，他和毛泽东商议的意见是，即将在莫斯科签字的所有协定都应公开发表。这显然是针对《补充协定》而给苏方出的一个难题。维辛斯基表示这样的问题必须加以讨论，并答应向苏联政府汇报。②

2 月 14 日，刘少奇致电毛泽东，通知说中国政府和政协负责人会议同意就有关条约和协定签字。③ 当天晚上，斯大林和毛泽东出席了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中苏条约签字仪式。不久以后，中苏两国的报纸上刊登了有关的条约和协定。④ 众所周知，双方都没有公布有关的两个议定书和那个《补充协定》。

中苏同盟关系的建立，在政治和军事上对于中苏双方无疑都是有利的，但是从经济和外交的角度观察，中苏两国各自的理解就有所不同了。应该说，2 月 14 日正式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及相关文件，在总体上讲还是符合中国的愿望的，这一举措为新中国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开启了大门。尽管有些条款尚有不尽如人意之处，但中国在 1945 年失去的主权和利益在不久的将来就可以完全收回了。而对于斯大林来说，这意味着苏联在战后通过雅尔塔协定和中苏条约实现的远东战略目标——太平洋出海口和不冻港，至迟到 1952 年底将不复存在。或许正是因为如此，为了尽可能地弥补这一损失，斯大林才要坚持签订秘密的《补充协定》，其目的无非是要通过消除美国、英国和日本势力在这两个与苏联接壤地区的渗透和影响，保证苏联在亚洲的经济利益和安全利益。

发表于《中共党史研究》1998 年第 2、3 期（本文第二作者谢尔盖·冈察洛夫）

① 这一记录显然与以前在中国流行的一些说法不同。中国有材料说，毛泽东开始不肯签署这个协定，只是在斯大林的一再坚持下，“为了照顾中苏团结的大局，只好让步”。参见裴坚章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49–1956）》，第 25 页；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修订本），第 446 页。

② 维辛斯基致斯大林，1950 年 2 月 12 日；罗申与周恩来会谈纪要，2 月 12 日；维辛斯基日记，2 月 13 日，АВПРФ, ф.07, оп.23а, п.18, д.234, л.64-76。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下卷，第 243 页。

④ 正式发表的文本见齐世荣主编：《当代世界史资料选辑》第一分册，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 年，第 518–523 页。

中苏条约谈判中的利益冲突及其解决

1949年12月至1950年2月，毛泽东和周恩来先后来到莫斯科，与斯大林及其他苏联领导人进行了长时间的协商和谈判，终于签订了替代1945年中苏条约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和有关协定，从而将中国与苏联的战略同盟关系以法律形式确定下来。这无疑是新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最重大的外交活动，也是中苏关系史上最值得研究的历史事件之一。

然而，由于相关档案文献的缺乏，以往研究者依据现有的材料，无法肯定和明确地回答下述问题：对于签订这样一个新的同盟条约，中苏双方各自的立场、方针和设想究竟是怎样的？在他们的协商和谈判中到底存在哪些分歧和争论？签约双方是谁做出了让步才形成了最后的一致意见？化解利益冲突的结果对苏联的远东政策发生了怎样的作用？甚至因当事人记忆上的模糊或错误，导致人们得出了一些与历史事实大相径庭的结论。

1997年，笔者在俄国的解密档案中发现了一批关于这次中苏条约谈判的历史文献，共有70多件，其中包括毛泽东与斯大林的会谈记录，毛泽东、周恩来与苏联其他领导人的会谈和谈判纪要，中苏双方各自拟定的有关条约和协定的最初文本及历次修改稿，以及苏联有关部门和专家呈报的对于条约、协定的建议和意见。[①] 尽管这还不是有关中苏条约谈判的全部档案文献，但对这些文件加以整理和研究，并与中国发表的有关文献和回忆录结合起来，已经可以对1950年中苏条约谈判的主要内容及其过程做出比较清楚的描述，从而在一个比较可靠的基础上正确地判断

① 其中大部分文献已经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苏联历史档案选编》课题组译成中文，发表在《中共党史资料》1998年总67辑和《党史研究资料》1998年第4期。

中苏同盟的历史地位，并回答上述几个问题。[①]

一、中苏关于同盟条约的不同设想

中国革命的胜利发展从根本上改变了远东的格局，也迫使苏联重新调整对华政策，为了在冷战的国际环境中加强与美国对抗的实力，斯大林无疑需要新中国加盟苏联的东方集团。即将取得全国政权的中国共产党，从意识形态、安全利益，以及未来国家的经济建设等各方面考虑，显然也要求与苏联保持密切的联盟关系。在这一点上，斯大林与毛泽东有着目标一致的共同愿望。然而，如何以法律条文的形式——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双方的利益冲突——实现这一愿望，中苏之间却有不同的设想。斯大林希望与新中国结盟的方式和表现形式不致破坏雅尔塔体系及损害苏联在中国东北的既得利益，而毛泽东考虑的则是如何树立新中国独立自主的外交形象，如何在中苏条约中保证中国的经济利益。这一分歧集中反映在是否需要签订一个新的中苏同盟条约的问题上。

中苏双方最早接触到这个问题是在 1949 年初米高扬秘密访问西柏坡期间。尽管这次会谈没有直接提出是否废除 1945 年中苏同盟条约的问题，而是从新疆、蒙古和东北一些具体问题谈起的，但恰恰是这些问题涉及到中苏之间的主权和利益分歧。

据俄国的档案文献，在西柏坡会谈中，苏联采取了当年与国民党政府谈判时同样的策略，即以在新疆问题上的让步来换取中国在蒙古和东北问题上保证苏联的利益。[②] 当毛泽东暗示苏联插手新疆问题时，米高扬立即表明苏联在新疆问题上没有任何要求和企图。而在毛泽东试探性地提出蒙古的统一时，米高扬则明确表示苏联不支持内外蒙古的统一，理由是如果蒙古实现统一，那将是内蒙古统一到外蒙古去。随后，斯大林又来电，表明了同样强硬的立场。毛泽东只得表示不再提出蒙古

---

① 在这方面首先做出贡献的是联邦德国苏联东欧研究所迪特·海因茨希教授，虽然笔者还无法阅读他的德文新著（Dieter Heinzig, Die Sowjetunion und das kommunistische China 1945-1950, Nomos Verlagsgesellschaft, Baden-Baden, 1998），但通过一起开会讨论，并看过陈之宏、陈兼为该书所写的书评（《历史研究》1999 年第 6 期）后，相信他的研究是相当成功的，尽管笔者有些观点与其不尽相同。笔者曾与俄国学者冈察洛夫合作《〈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愿望和结果——根据俄国解密的档案材料》（载《中共党史研究》1998 年第 2、3 期）一文，讲述了谈判的基本过程，本文将做进一步分析，并增加了新材料。

② 参见沈志华：《中苏结盟与苏联对新疆政策的变化（1944–1950）》，《近代史研究》1999 年第 3 期。

问题。关于东北问题，中苏双方都采取了后发制人的策略。谈到旅顺海军基地问题，毛泽东一方面通过中国民主人士之口向米高扬提出，“在革命政府掌握中国政权后，苏联再在旅顺口保留军事基地就没有意义了”，一方面又表示，中国的共产党人“主张保留这个军事基地”，“待到中国十分强盛，有能力抵御日本侵略了，那时苏联本身也就不再需要旅顺的基地了”。毛泽东用这种委婉的说法，表明了对于旅顺口中国应该收回而目前暂不收回的立场。斯大林很清楚，新中国没有海军，因此目前尚无力收回旅顺港，于是，在得到米高扬的报告后致电毛泽东说：“中国共产党人掌握政权后，形势就根本改变了。苏联政府已经决定，一旦同日本签订和约，而且美国也从日本撤军，苏联就取消这个不平等条约，并从旅顺撤军。然而，如果中国共产党认为苏联军队立即撤出旅顺地区为宜，那么苏联准备满足中国共产党的愿望。”对此，毛泽东和中共其他领导人立即表示，不能马上撤退苏联军队和撤销旅顺口基地。但毛泽东还是没有忘记补充一句：中国人民感谢苏联的这个条约，当我们强大起来时你们再离开中国，到那时我们再签订类似苏波条约那样的中苏互助条约。所以，米高扬当时的感觉是正确的：毛泽东“有自己的策略考虑，但他没有明说”。[①]

斯大林最为关心的是如何确定中国长春铁路的归属——如果说确立通向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冻港是苏联远东战略的核心，那么中长路则是这一战略的生命线，他十分担心毛泽东会提出 1945 年中长路协定的有效性问题。据随同米高扬来华的科瓦廖夫回忆，斯大林在会谈期间“不止一次以无线电报向我询问，中国同志对中长路协定的真正态度如何，他们是否认为中长路协定是真正平等的条约”。[②] 米高扬在会谈时则坦率地告诉中共领导人，苏联不认为有关中长路的协定是不平等的，“因为这条铁路主要是由俄国出资建成的”，“可能在这个条约里，平等的原则未能得到充分体现，但我们准备与中国同志友好地讨论并解决这个问题”。然而，在这个直接涉及中苏经济利益的问题上，中共领导人没有像前两个问题那样表示明确的态度。毛泽东含糊地回答米高扬说，在中长路产权归属问题上存在的一些摩擦，是可以就地解决的。但他接着又暗示将一些东北企业归属中长路是违背有关协定的：国民党军队掠夺了中长铁路及部分企业，随着人民解放军的开进，这些企业又归还给了中长路。不过老百姓传说，国民党是根据中苏条约占据这些企业的，而人民解

① *Ледовский* Секретная миссия А. И. Микояна в Китай (январь-февраль 1949г.), 1995, №2, с.106-107; №3, с.101.

② *Ковалев* Диалог Сталина с Мао Цзэдуном, 1991, №6, с.86.

放军把企业交给中长铁路，似乎是破坏了条约。为了留有余地，毛泽东最后还是同意了让高岗和科瓦廖夫共同研究这个问题并向中共和联共（布）中央汇报。[①] 然而，斯大林已经从科瓦廖夫那里了解到：高岗和陈云表面上都承认中长路协定是平等的和令人满意的，但“实际上中国人暗中想要全面控制铁路，他们正在尽力从苏联人手中夺取对这条铁路的管理权”。[②] 所以，在莫斯科看来，最好的办法还是先把问题搁置起来。

但是对于即将成立新政府的中共领导人来说，在这个问题上是不能等待的。至迟 1949 年 4 月，如何处理旧中国签订的对外条约问题已经提上了中共的议事日程。周恩来在一次报告中对民主人士谈到：过去的“对外条约有的废除，有的则要加以修改，有的还可以保持”。[③] 这里谈到“要加以修改”或“可以保持”的条约，显然是考虑到了 1945 年的中苏条约。对于新中国来说，最好的结果当然是以新约代替旧约，不过毛泽东此时还没有揣摩到斯大林的真实意图。刘少奇访苏出发前，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与刘少奇和王稼祥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当讲到去莫斯科如何处理原中苏条约的问题时，毛泽东只是说“可以谈谈看”。[④]

1949 年 6 月至 8 月，刘少奇在率中共中央代表团秘密访问莫斯科期间，按照事先的准备，向苏联提出了如何处理中苏条约的问题。在给斯大林的书面报告中，刘少奇表示新中国政府愿意继承现有的中苏条约，但同时又提出，在苏联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时，需要对这个条约加以处理。刘少奇举出了三种处理方式：(1) 由中国新政府宣布全部承认这个条约继续有效，不加任何修改。(2) 根据原来条约的精神，由两国政府代表重新签订一个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3) 由两国政府代表换文，暂时维持这个条约的原状，但准备在适当时机重新加以签订。此时，斯大林仍然没有急于回答中方提出的问题，他在刘少奇的报告上批道：“等毛泽东到莫斯科后再决定这个问题。”[⑤] 显然，中苏双方领导人都想摸到对方在即将开始的外交谈判中的底线。

---

① *Ледовский* Секретная миссия А. И. Микояна в Китай (январь-февраль 1949г.), 1995, №3, с.101.

② *Ковалев* Диалог Сталина с Мао Цзэдуном, 1991, №6, с.86; Sergei N. Goncharov, John W. Lewis, and Xue Litai, *Uncertain Partner: Stalin, Mao, and the Korean War*,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Chen Jian, *China's Road to the Korean War: The Making of the Sino-American Confrontat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4, p.63.

③ 周恩来：《关于和平谈判问题的报告》，1949 年 4 月 17 日。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周恩来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年，第 321 页。

④ 采访邓力群记录，转引自徐则浩：《王稼祥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 年，第 456 页。

⑤ 1949 年 7 月 4 日刘少奇给联共（布）中央和斯大林的报告，АПРФ, ф.45, оп.1, д.328, л.11-50。

新中国成立以后，解决中苏之间同盟条约的问题已经成为中国领导人开展外交活动和形成外交决策的当务之急，而且他们寄希望于以中苏新型关系的表现形式为榜样，废除旧中国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因此，毛泽东在外交问题上首要考虑的就是直接与斯大林进行会谈，而且明确地向斯大林透露，会谈的目的是要签订一个新的中苏条约。

1949 年 11 月 8 日，毛泽东致电莫斯科表达了出访苏联的愿望，还特别说明访问期间要提出中苏条约问题。电报又补充说，如果要签订条约，周恩来将前往莫斯科签字。[①] 11 月 9 日，中共中央给中国驻苏大使王稼祥的电报也说明了同样的目的。[②] 在此期间，身为联共（布）中央驻中共中央代表的科瓦廖夫也向斯大林报告说：毛泽东曾经告诉他，打算出访三个月，第一个月在苏联，与斯大林会谈，要签署新的中苏条约，第二个月访问东欧，第三个月在苏联南方养病。因此，中国人希望斯大林将中苏条约的事情放在日程安排的前面。[③] 看来，毛泽东去莫斯科一是要与苏联结成同盟，二是要以一个新条约的形式表现这种同盟关系。这一点是十分清楚的。[④] 但是，尽管毛泽东一再表明了访苏的目的，却一直没有得到明确答复，所以他仍然不知道斯大林的意图。否则，毛泽东也不会只身前往莫斯科了。

二、毛泽东坚持签订新的中苏条约

毛泽东于 1949 年 12 月 16 日到达莫斯科，六个小时之后便与斯大林举行了正式会谈。根据俄国档案中的会议记录，这两位领导人的第一次对话便在中苏条约的问题上发生了分歧。当毛泽东谈到刘少奇访苏后中共中央研究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问题时，斯大林立即打断他的话说，“这个问题可以讨论和解决”，但“苏中之间是根据雅尔塔协定缔结这个条约的”，所以苏联领导人“决定暂时不改动这个条约的任何条款，因为哪怕改动一条，都可能给美国和英国提出修改条约中涉及千岛群岛、南库页岛等等条款的问题提供法律上的借口”。斯大林的设想是要“寻求一种

① АВПРФ, ф.0100, оп.42а, п.288, д.19, л.81-85。转引自 *Кулик* Китайская Народная Республика в период становления (1949-1952гг.), с.75。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1 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 年，第 131 页。

③ *Ковалев* Диалог Сталина с Мао Цзэдуном, 1991, №6, с.88-89.

④ 在此之前，研究者大多根据师哲的回忆录认为，中苏莫斯科会谈初期出现不愉快的原因是斯大林不了解毛泽东的意图，或双方产生了误会。现在看来，这种说法似乎是没有道理的。至于有俄国学者称毛泽东访苏主要是为了养病的说法，更是大谬不然了。

可行的办法，在形式上保留，而在实际上修改现行条约”。这就明确表示了苏联不准备签订一个新条约的立场。对此，毛泽东不好直接反对，只得表示可以保留“中国长春铁路和旅顺的现状”，“眼下不必修改条约”。但同时指出，“在中国讨论条约时，我们没有考虑到美国和英国在雅尔塔协定中的立场。我们应该按如何对共同的事业有利来行事。这个问题必须考虑周到。”会谈即将结束时，毛泽东再次提出“是否需要周恩来前来莫斯科解决条约问题”。对此，斯大林显然很不高兴，他回答说：“这个问题您必须自己决定。可能需要周来解决其他一些问题。”[①]

在第一次对话中，斯大林先声夺人，提出了处理中苏条约问题的原则，而毛泽东却未能明确表达出中方的立场。在 12 月 18 日给刘少奇的电报中，毛泽东讲述了他对这次会谈结果的理解，即苏联认为“不宜改变原有中苏条约的合法性”，苏联租用旅顺口 30 年“在形式上不能改变”，但可以发表一个声明表示苏联同意从那里撤军。电报中还讲到一段俄国档案没有记录的内容：尽管毛泽东提出中国的社会舆论认为原条约已经失去了意义，斯大林仍然强调，对原条约的修改，大约要到两年以后，并坚持不要周恩来去莫斯科。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请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这一问题并提出处理意见。[②]

12 月 21 日，刘少奇、周恩来、朱德联名致电毛泽东说，政治局会议研究后的意见是，如果“只准备就旅顺驻兵问题及对一般政治问题发表一个声明，则恩来同志去莫似无必要”。[③] 显然，在北京的中国领导人此时意识到，通过这次中苏最高领导人会谈，已经不大可能按照中方的意图签订一个新的中苏条约了。

然而，毛泽东却没有放弃努力。他首先有意表现出对第一次会谈的结果很不满意。按照科瓦廖夫的观察，那几天毛泽东“闷闷不乐地呆在别墅里”，“情绪不好，心神不安”。为了进一步表明中国方面的态度，他于 12 月 22 日邀请科瓦廖夫去谈话，并要求把谈话记录转给斯大林。根据谈话记录，毛泽东提出下一次会见希望安排在 12 月 23 日或 24 日，并向斯大林提交了下一步谈判的两种方案。第一种方案是解决中苏条约、贷款协定、贸易协定、航空协定等问题，其中包括缅甸承认中国的问题。按照这个方案，需要周恩来前来莫斯科履行协议签字手续。第二种方案是对第一方案中的各种问题从多方面进行磋商，但暂不履行相应的签字手续。这样，

① 1949 年 12 月 16 日斯大林与毛泽东会谈记录，АПРФ, ф.45, оп.1, д.329, л.9-17。

② 裴坚章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49–1956）》，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 年，第 18 页。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 年，第 235 页。

周恩来就不必马上来莫斯科。毛泽东在交谈中不止一次地强调，所有这些问题均由斯大林定夺。[①] 毛泽东对第二次会谈仍抱有极大希望，他在第二天凌晨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谈到："已与斯大林约好 23 或 24 日谈一次。在这次谈话后可以确定方针电告你们。" [②]

然而，在 12 月 24 日举行的第二次会谈中，双方主要谈的是越南、日本、印度等一些亚洲兄弟党的事情，斯大林根本没提中苏条约的问题，毛泽东对此大失所望。[③] 这一次毛泽东真的动了气，他后来曾向苏联大使尤金谈起当时的情况："关于签订条约的问题当时对我们来说事关重大，将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今后发展的前景"。"我在同斯大林第一次会谈时就提议签订条约，但是斯大林却避而不答。我在第二次会谈时又重提这一问题"，斯大林还是找借口拒绝了。"后来斯大林避而不见我。我曾给他的住所打过电话，但得到的答复是斯大林不在家，建议我去见米高扬。" 毛泽东说，"这种做法使我很生气，我决定呆在别墅里，什么也不干。" 毛泽东还拒绝了科瓦廖夫和费德林关于去苏联全国游览的建议，而宁可"在别墅里睡大觉"。[④] 根据汪东兴的日记，12 月 25 日中午斯大林曾来电问候毛泽东，26 日和 27 日毛泽东与其他苏联领导人继续进行过会谈，此后直到 1950 年 1 月 1 日前的几天，毛泽东与苏联领导人没有任何接触，也没有任何公开的活动。[⑤] 莫斯科的空气显得凝重而紧张，斯大林在等待毛泽东转变立场，而毛泽东则在设法迫使斯大林做出让步。

1950 年元旦这一天，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奉外交部长维辛斯基之命拜访了毛泽东。毛泽东向他声明，因身体不适，"准备完全静养一周，彻底恢复正常的睡眠"。毛泽东还强调，他"不想参观工厂，不想作报告，也不想发表公开演讲"，并且取消了在苏联各地旅行的计划。最后，毛泽东提出"想提前一个月，即在 1 月底离开莫斯科回国"。在谈话中，毛泽东还向苏联方面透露了一个消息：最近几天，"收到北京的报告，说缅甸和印度政府表示他们愿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政府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是，只要缅甸和印度政府接受中国政府的条件，"他们可以派代表到北京进行谈判"。毛泽东还告诉罗申："不久英国和其他英联邦国家也将在承认

① *Ковалев* Диалог Сталина с Мао Цзэдуном, 1991, №6, с.89.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1 册，第 197 页。

③ 见裴坚章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49–1956）》，第 18 页。可惜的是，在目前中俄两国公布的档案中均未见到关于这次会谈的文献资料。

④ *Юдин* Мао Цзэдун о китайской политике Коминтерна и Сталина, с.105-106.

⑤ 汪东兴：《汪东兴日记》，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年，第 165–170 页。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问题上采取明显步骤。”①

毛泽东并非是无意中谈到这两个问题的，而是在以一种东方式的外交语言向斯大林表示不满和提出警告。

首先，毛泽东不是真的要休息养病和提前回国。尽管他在私下表示了这种意见，但在第二天，即 1 月 2 日，毛泽东就以答塔斯社记者问的形式，公开向外界声明他来莫斯科的目的首先是要解决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等问题，并表示逗留苏联的时间，“部分地取决于解决中华人民共和国利益的各项问题所需的时间”。毛泽东还说，“打算访问苏联的几个地方和城市”。② 这无疑是在向斯大林表明了签订新条约、捍卫新中国利益的决心。斯大林必须考虑到毛泽东的处境和可能做出的反应。③

其次，英国和缅甸也不是最近几天才提出承认中国的问题的。早在 1949 年 12 月 16 日周恩来主持政务院会议时就透露，“英国政府倾向于承认我国”。而 12 月 18 日周恩来已复电缅甸外交部长，同意在缅甸政府与国民党残余力量断绝关系的基础上，建立中缅外交关系。④ 毛泽东选择这个时候向苏联传递这些信息，显然是在外界传闻毛泽东在莫斯科被“软禁”、中苏关系出现紧张状态的背景下向斯大林施加压力。⑤ 无论如何，当中苏谈判陷入僵局时，中国与其他国家，特别是西方国家的关系出现转机，对斯大林无疑是一个震动，他感到这是中美关系缓和的先兆。⑥ 显然，考虑到国际关系可能发生的变动以及中美缓和对苏联在亚洲利益形成的威胁，斯大林也不会让毛泽东空手而回。⑦

这一招果然奏效。第二天中苏条约谈判的僵持局面便开始缓解，做出让步的是斯大林。1 月 2 日晚 8 时，莫洛托夫和米高扬来到毛泽东下榻的别墅，特地询问他对签订中苏条约等事项的意见。毛泽东讲了三个方案：(1) 签订新的中苏条约；(2)

---

① 1950 年 1 月 1 日罗申与毛泽东会谈纪要，АВПРФ, ф.0100, оп.43, п.10, д.302, л.1-4。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1 册，第 206 页。

③ 有学者根据对苏联当事人的采访指出，米高扬当时就是如此劝说斯大林接受中共要求的。见 Odd Arne Westad, *The Sino-Soviet Alliance and the United States: Wars, Policies, and Perceptions, 1950-1961*, Paper for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Hong Kong, 1996.1。

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 年，第 18 页。

⑤ 当斯大林同意与中国签订一个新条约后，毛泽东即指示中国外交部，对于英国建交要求的答复“应当拖一下”。这说明他当时提出这一问题确是别有用意的。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1 册，第 249 页。

⑥ Goncharov, Lewis, and Xue, *Uncertain Partner*, p.211.

⑦ 毛泽东本人后来谈到这个问题时说过：“斯大林的立场发生变化，也许是印度人和英国人帮了我们的忙。”见 *Юдин* Мао Цзэдун о китайской политике·Коминтерна и Сталина, с.106。

由两国通讯社发表一个简单公报，说明两国对旧的中苏条约交换了意见，而实际上把这个问题拖下来；(3) 签订一个声明，内容是讲两国关系的要点。莫洛托夫马上表示同意第一方案。毛泽东又追问："是否以新条约代替旧条约？" 莫洛托夫明确回答："是的。" 毛泽东当即说出了他的安排："我的电报 1 月 3 日到北京，恩来准备 5 天，1 月 9 日从北京动身，坐火车 11 天，1 月 19 日到莫斯科，1 月 20 日至月底约 10 天时间谈判及签订各项条约，2 月初我和周一道回国。"[①] 根据汪东兴的日记，1 月 3 日这一天，毛泽东"精神特别好"，"有说有笑"。[②]

笼罩在莫斯科上空的乌云终于散开了。

三、苏联对同盟条约的精心设计

中苏第一回合谈判确定签订一个新条约以代替 1945 年的条约，问题在原则上似乎得到了解决。然而，斯大林此时的让步不过是做了一篇表面文章，关键的问题在于签订一个什么样的新条约。在这个实质问题上，莫斯科精心设计了一系列条约草案，其目的是全面维护苏联在 1945 年条约中的既得利益。此前，斯大林坚持的原则是条约的形式不能改变，即必须保留旧的中苏条约，而对其实际内容可以进行修改。但在确定了废除 1945 年条约的原则以后，苏方最初提出的新条约的各种草案却完全沿袭了旧条约的内容。由此看来，斯大林所谓重新签订中苏条约将引起破坏雅尔塔体系的连锁反应的说法不过是一个借口，至多也只是表面层次的理由，其真实意图还在于维持苏联在远东的既得利益和既定目标。

毛泽东此时对条约和有关协定的具体内容似乎还没有认真考虑，他在 1 月 6 日与维辛斯基和 1 月 9 日与科瓦廖夫的谈话中，只是强调"签订一个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对双方都是有利的"，同时表示在具体签约时，会考虑苏联与雅尔塔协议的关系；中国政府"将依据包括蒋介石与资本主义国家签订的条约在内的一切现存条约为起点，重新进行谈判"。[③] 而作为中方谈判主角的周恩来则正在准备赶赴莫斯科的行装。然而，苏联方面对条约及有关协定草案的准备工作已经紧锣密鼓地开始了。

---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1 册，第 212 页。

② 汪东兴：《汪东兴日记》，第 173 页。

③ 1950 年 1 月 6 日维辛斯基与毛泽东会谈纪要，АВПРФ, ф.0100, оп.43, п.8, д.302, л.1-5。1950 年 1 月 9 日毛泽东与科瓦廖夫的谈话，见 Goncharov, Lewis, and Xue, *Uncertain Partner*, pp.247-248。

1950年1月5日，苏联外交部起草了名为“苏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的第一稿草案，除了在政治上保持友好同盟关系的条文外，该草案第七条明确指出：“缔约国双方承认，1945年8月14日签订的中长铁路、大连和旅顺口协定继续有效。”[①]显然，苏方最初的设想是在签订一个新条约的同时，继续保留1945年的三个协定。

1月9日，苏联外交部条法司司长格利巴诺夫、远东司副司长费德林、驻华大使罗申等人联名呈报了他们起草的条约草案第二稿。其中第六条将“加强两国之间的友好合作”改成比较具体的内容：“巩固和发展两国之间的经济文化联系”，第七条则改为：“缔约国双方声明，根据苏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规定，完全保留1945年8月14日签订的中苏大连港协定和1945年8月14日签订的旅顺口协定及其附件，并使其成为本条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②]这里，苏联外交部进一步明确和强调了1945年关于大连和旅顺协定的有效性，至于中长铁路问题，转由苏联交通部去专门处理。

基于斯大林以前曾答应中国在对日和约签订后苏联军队撤出旅顺海军基地，维辛斯基对草案的第二稿提出了修改意见。根据这一指示，格利巴诺夫等人于1月10日又提交了条约草案的第三稿，其中第六条增加了“彼此给予一切可能的经济援助”一句，第七条增加了以前斯大林提出过的说法，改为：“缔约国双方同意，目前在旅顺口和大连港的苏联军队自本条约生效之日起2—3年内撤出，1945年8月14日签订的旅顺口和大连港协定在规定期满后应重新修订。”[③]但这里有一个明显的漏洞：既然已确定苏军提前撤出，为什么该协定还要等到期满，即20多年后再重新修订？于是，为了解决这一矛盾，外交部再次修改了草案，在第四稿中把第七条中重新修订旅顺口和大连港协定的日期提前到“签订对日和约以后”，而在第五稿中，则把苏军“撤出”改为“缩减或撤出”。[④]

1月16日，维辛斯基将外交部最后确定的文本（第六稿）呈报给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莫洛托夫，其中第七条的写法是：“缔约国双方同意，目前在旅顺口和大连港的苏联军队自本条约生效之日起2—3年的期限内全部撤回苏联境内，撤军将于1950年开始。缔约国双方还同意，中苏之间1945年8月14日签订的旅顺口和大连港协定，以及大连港协定议定书在签订对日和约后重新审议。”这一草案

① АВПРФ, ф.07, оп.23а, п.18, д.235, л.12-15.
② АВПРФ, ф.07, оп.23а, п.18, д.235, л.18-19.
③ АВПРФ, ф.07, оп.23а, п.18, д.235, л.20-25.
④ АВПРФ, ф.07, оп.23а, п.18, д.235, л.26-29, 30-34.

中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变化，即该文本将条约的名称由“友好合作互助条约”改为“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此后新的中苏条约便沿用了这个名称。[①] 鉴于前文提到的毛泽东在 12 月 16 日和 1 月 6 日的会谈中都曾使用了“友好同盟条约”的说法，显然，维辛斯基在最后确定条约名称时注意到了中方的这一说法。[②]

为了在新条约中保留旧条约的部分内容，苏联需要从国际惯例和国际条约的有关理论中找到法律根据。苏联外交部条约法专家杜尔金涅夫斯基进行了这方面的工作，他在 1 月 13 日致维辛斯基的备忘录中指出，在“关于 1928 年 2 月 20 日条约的哈瓦那公约”和其他国际条约理论中，都没有谈到在旧条约失效的情况下，其内容被新条约所吸收的问题。但是在实践中不乏在旧条约没有被明确废除和取消的情况下其内容与新条约并行有效的例子。杜尔金涅夫斯基列举了道威斯和杨格计划，关于同贩卖妇女、儿童作斗争的公约，1890 年和 1906 年中英西藏协定，以及苏联先后与法国和南斯拉夫签订的友好互助条约等一系列实例，并提出了这样的建议，“在同一问题上‘吸收’了以前条约相似内容的条约可以被认为具有并行效力。在这种情况下，不能认为以前的条约就一定失效了。但由于可能出现各种解释，所以，对保留与新条约不矛盾的一部分旧条约作补充说明是适宜的，这样的补充说明可以写在新条约的文本或签字议定书以及专门的照会中。”[③] 外交部此举的意图主要是针对中长铁路和大连问题的。鉴于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下中国已经表示不会在近期收回旅顺港军事基地，因而苏联在远东的战略利益就主要体现在对中长铁路及其终点大连港的控制权上，所以，莫斯科极为重视有关中长铁路及大连港的协定，其方针就是将这一问题与条约本身（含旅顺问题）区别开而单独提出。

苏联外交部首先确定了处理中长铁路协定的原则。根据法律专家的建议，维辛斯基在 1 月 16 日向莫洛托夫提交了《确认中国长春铁路协定有效的议定书》和相同内容的《声明》草案，其中专门提出“完全根据 1945 年 8 月 14 日在莫斯科签订的中国长春铁路协定中指明的期限确定该议定书的有效期”。同时建议，在中苏条约签字时以《补充条款》的方式声明：“本条约的缔结不承担苏中双方在以前条约中各自的债务。”[④]

---

① АВПРФ, ф.07, оп.23а, п.18, д.235, л.1-4.

② 此时周恩来尚未到达莫斯科，更没有提交中方的条约草案。所以，师哲在回忆录中的说法，即周恩来提出在 1945 年《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名称上加上“互助”二字（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李海文整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 年，第 448 页），是值得怀疑的。

③ 1950 年 1 月 13 日杜尔金涅夫斯基致维辛斯基，АВПРФ, ф 07, оп.23а, п.18, д.235, л.117-121。

④ АВПРФ, ф.07, оп.23а, п.18, д.235, л.5-7.

接着，苏联交通部便提出了关于中长铁路及大连港协定的具体修改建议和草案文本。交通部长贝舍夫在1月19日给莫洛托夫的报告中说明了他们如下的修改建议。

关于中长铁路协定：

一、重新规定中国长春铁路的资产组成。1945年的协定没有把位于南线（哈尔滨—大连）上的工厂及其附属的由日本人建造和改建的企业列入铁路的资产组成，而新修订的条款应规定将上述这类企业，即确保铁路正常营运所必需的企业，列为苏联和中国共同拥有，而不论它们建立的时间。

二、规定由中苏双方人员轮流担任铁路局的理事长、监事长、局长和总稽核等职务及其副职，每三年轮换一次。而以前这些职务是固定由中苏双方人员分别担任的。

三、新增加的条款是，对中国长春铁路及其所属企业和机关所需的进口货物免征海关税、各种特别税及其他货运税。

四、将旧协定中国长春铁路应与中国的国营铁路一样向中国政府“缴纳税捐”一句改为“缴纳同样数额的税捐”。

关于大连港协定：

一、尽管大连港未被列入中长铁路的组成部分，但在原协定的第三条中已指明港口主任由中长铁路局局长从苏联人员中委派。

二、为了共同经营大连港和大连的工厂，建议组建一个中苏合营的远东海运公司，并将该公司苏联方面的领导权委托给苏联海军部。

贝舍夫在报告的结尾还特别说明，要把在1945年以前属南满铁路管辖的地段列为中长铁路资产组成是出于经济利益上的考虑。因为这段铁路“每年都能产生很大利润，1943年其利润是1.63亿卢布”，“从1946年开始，在确保中国长春铁路正常营运时，它每年都可以得到上述数额的利润”。而目前“满洲地区工业的恢复和经济的发展，以及满洲与中国其他地区经济联系的扩大，正在引起货运量和旅客运输量的增长，特别是在南线即哈尔滨—大连的铁路线上”。[①] 这就是说，保证对中长铁路的控制，对于苏联不仅有战略利益，而且还有直接的经济利益。

1月21日，葛罗米柯、贝舍夫、科瓦廖夫、罗申等六人向莫洛托夫、米高扬和维辛斯基呈上了委托他们起草的苏联部长会议关于中国长春铁路决议的草案和中

① 1950年1月19日贝舍夫致莫洛托夫，АВПРФ, ф.07, оп.23а, п.20, д.248, л.4-13。

长铁路两个议定书的草案。其要点是：

一、确定将外交部起草的重申1945年协定有效期的中长铁路协定的议定书草案作为苏中谈判的基础。

二、关于从1950年2月开始恢复对中长铁路实行共同经营和共同管理的事宜，必须与中国政府达成协议。

三、确认根据交通部的建议起草的关于中长铁路补充议定书所述各项条款，并且必须就有关条款的修改与中国政府达成协议。

四、在确定中长铁路的全部资产前，在与中国政府谈判时，应提出将铁路的固定资产列为苏联和中国共同所有的建议。为确定转为苏中共有的资产，批准成立苏中联合委员会的苏联代表团。

五、委托外交部维辛斯基和交通部贝舍夫就上述两个议定书草案与中国政府进行谈判。[①]

1月22日，莫洛托夫、米高扬、维辛斯基将各专门委员会起草的12个草案呈报斯大林，其中包括苏中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苏中关于旅顺口和大连港协定的议定书、苏中关于中长铁路协定的议定书、苏中关于苏联向中国提供贷款的协定、关于成立苏中航运股份公司的议定书、关于在新疆成立苏中有色金属和稀有金属股份公司的议定书、关于在新疆成立苏中石油股份公司的议定书、关于苏中易货和支付的议定书、关于苏联与新疆贸易的议定书、关于苏联专家的费用支付条件的协议、苏联部长会议关于苏联机构和苏中合营股份公司共同管理的满洲和辽东半岛地区内不动产的决议、苏联部长会议关于派遣苏联专家和教师组到中国工作的决议。联共（布）中央立即批准了这些草案。[②]

苏方最后确定的中苏条约及关于中长铁路、旅顺口和大连的议定书草案与外交部和交通部呈报的草案没有原则上的变化，只是将条约第七条的内容单独列出，形成了《苏中关于旅顺口和大连港协定的议定书》。但这里有一个特别应当引起注意的问题：上述提交斯大林的12个草案几乎包括了中苏谈判可能涉及的所有问题，却惟独没有旅顺口、大连港协定和中长铁路协定本身。原因何在？显然，根据苏方的设想和愿望，这两个协定根本没有必要重新起草，因为原中长铁路协定继续有效，原旅顺口协定和大连港协定要等到与日本签订和平条约后再重新审议，而苏联提出的有关修改部分已经体现在两个协定的议定书草案中了。况且，莫斯科也不愿

① АВПРФ, ф.07, оп.23а, п.20, д.248, л.20-28.

② АВПРФ, ф.07, оп.23а, п.18, д.235, л.41-50.

为中方代表提供讨论这三个协定具体内容的机会。

至此，苏联方面已经为中苏第二回合谈判准备好了所有的文件草案，其主要内容可以归纳为：关于《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除了在原则上确定了中苏联盟的关系外，没有涉及双边实际利益的内容。关于中长铁路问题，与 1945 年的协定相比，不仅保留了原来的 30 年有效期，而且其修改部分除领导职务采取轮换制以外，其他如资产确定、免征海关税和货运税、缴纳铁路营业税等规定都是更有利于保障苏联利益的。关于旅顺口和大连问题，除规定苏联驻军应从 1950 年开始撤退，并在条约生效后 2—3 年内撤退完毕外，其余一切照旧，要等到对日和约签订后再行审议。这是中苏条约正式谈判开始之前苏联方面的全部设想和期望，接下来就要看刚刚到达莫斯科的周恩来拿出的是什么方案了。

四、斯大林被迫做出的重大让步

中苏关于签订新条约谈判出现的戏剧性变化在于，同苏联改变其谈判方针一样，中国提出的条约方案也完全背离了谈判开始时本身提出的方针。中方原先提出在形式上必须以新条约取代 1945 年的条约，而在实际上可以保留旧条约的具体内容。但在确定了要签订一个新条约的原则以后，中方最初提出的协定文本却与旧条约的内容大相径庭。正是在涉及双方实际经济利益的谈判中，中苏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便暴露出来了。

1950 年 1 月 20 日，周恩来率领庞大的中国政府代表团来到莫斯科，并于 22 日参加了斯大林与毛泽东的第三次正式会谈。在这次会谈中，毛泽东与斯大林就几个原则问题达成了一致意见：第一，对中苏条约应当修改，重新签订。第二，宣布在签订对日和约以前旅顺口协定依然有效，此后苏军撤出旅顺。第三，把在法律上保留中长铁路协定有效的原则作为基础，而实际上进行适当的修改。第四，苏联放弃在大连港的权利，由中方决定大连的问题。第五，中方原主张中长铁路管理委员会主席和局长的职务由中方担任，后同意采取轮换制。第六，周恩来提出修改双方对中长铁路的投资比例，把中方的投资比例增加到 51%，后同意从保障双方利益的角度再研究一下。此外，还讨论了贷款协定、新疆贸易等问题，并决定委托米高扬、维辛斯基、周恩来、李富春进行具体谈判。[①]

---

① 1950 年 1 月 22 日斯大林与毛泽东会谈记录，АПРФ, ф.45, оп.1, д.329, л.29-38。

1月23日，中苏双方代表进行会谈，并首先讨论了苏方提出的条约草案。1月24日，毛泽东、周恩来等研究苏方的草案，并拟定了中方修改后的文本。[①] 1月24日23时，由中国大使馆参赞戈宝权将中方修改后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草案递交给苏方谈判人员库尔久科夫。把双方的草案进行仔细对比可以发现，中方的修订草案除调整了一下段落安排和增加了个别修饰词以外，从名称到内容，与苏方的草案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区别。[②] 这一点与中国方面有关回忆录和研究著作中的说法完全不同，按照以前中国方面的说法，1950年中苏条约的最初文本是周恩来起草的，或苏方按周恩来的意思起草的。[③] 现在看来，这种说法是缺乏依据的。[④]

无论如何，就条约本身而言，中苏双方没有什么分歧。尽管后来双方又有两次对条约文本的修改，但都是个别文字的改动或调整。[⑤] 对这一点并不难理解，因为条约所述的防止日本及其盟国的侵略、加强双边的协商与合作等内容，都是中苏双方的共同愿望和要求。真正涉及双方利害冲突的是在中长铁路、旅顺和大连等实际问题上。

经过双方接触以后，苏方在上述提交给中方的草案的基础上，于1月26日又提出了一个关于大连港协定的草案。其内容主要是：(1) 中国政府同意从大连港内划拨出一些码头和仓库转租给苏联；(2) 凡经大连港的苏联的进出口货物，或苏联为港口设施提供的材料和设备，均免征关税；(3) 大连的行政管理机关隶属中国，但港口主任和副主任的职务则由中苏两国人员轮换担任；(4) 在缔结对日和约前，大连港实行同旅顺海军基地一样的军事管制；(5) 该协定将在对日和约生效后重新审议。[⑥] 看来，苏方对于涉及实际利益的关键问题的确是有周密考虑的，他们在中方尚未提出对应方案之前提出超出原协定内容的要求，不外是为下一步谈判留出让步的余地。然而，莫斯科万万没有想到，中方却提出了与苏方设想根本不同的一套完整方案。

---

① 汪东兴：《汪东兴日记》，第194页。

② АВПРФ, ф.07, оп.23а, п.18, д.235, л.38-40.

③ 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第448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23页；裴坚章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49–1956）》，第22页。

④ 笔者后来了解到，这种说法的根据是周恩来当时曾有一封电报称条约是我方起草的。但笔者估计周这样说很可能是出于某种政治原因，不足为凭，而且目前也没有看到任何中方最初起草的文本。需要指出的是，中苏谈判的直接参加者、外交部副部长伍修权的回忆与俄国档案材料是吻合的，他承认“条约最初文本是苏方起草的，没有原则变动”。伍修权：《回忆与怀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237页。

⑤ АПРФ, ф.3, оп.65, д.369, л.7-10; АВПРФ, ф.07, оп.23а, п.18, д.234, л.8-15.

⑥ АВПРФ, ф.07, оп.23а, п.20, д.248, л.35-37.

经过两天的研究和讨论，1 月 26 日中方提出了由周恩来主持起草的《关于旅顺口、大连和中国长春铁路的协定》的草案。该草案首先在形式上与苏方草案不同，即将几个利益攸关的重大问题放在一个统一的协定中解决。这实际上等于否定了苏方关于在签署对日和约后再重新审议有关协定的意见，而是要求立即一揽子解决所有协定的重新审议问题。在内容上，双方设想的差距就更大了。关于旅顺口、大连港和中长铁路领导职务采取轮换制的问题，中方没有异议。针对斯大林与毛泽东会谈中本来已经确定的苏军在对日和约签订后撤出旅顺口的原则，中方草案增加了补充条件：如果“由于某些原因阻碍了对日和约的签订，而本协定生效已超过三年期限且未再缔结相应的条约，则苏军将立即撤出旅顺口地区”。最要害的问题是中方提出了苏方草案完全未曾想到的问题，这主要是：第一，苏联放弃租用旅顺口作为海军基地的权利，放弃在大连和中长铁路的一切权力和利益，同时声明将上述所有权利和义务归还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目前由苏联临时代管或租用的在大连和旅顺口地区的一切财产，均由中国政府接收。第三，对日和约签订或本协定生效三年后，苏联政府立即将中长铁路及其所属全部财产无偿地移交中国所有。[①]

除旅顺撤军问题外，中方的草案几乎完全推翻了苏方的原有设想。这是苏联方面感到非常意外的，以至收到周恩来的草案后，苏方进行了紧张研究和反复修改。笔者在俄国档案文献中发现了对中方这一草案的四份不同的修改稿，尽管字迹潦草，不易辨认，但可以看出是不同人分别修改的，而且删改之处非常多，特别是斯大林本人批阅的一份文本，几乎把中方草案的内容全部勾划掉了，其字里行间透露着斯大林的恼怒和愤慨。然而，在经过冷静商讨和慎重考虑之后，斯大林还是决定做出让步。苏方于 1 月 28 日交给师哲的协定修改稿已经很接近中方的草案文本了。在苏方的这个协定草案中，没有提苏联放弃在旅顺、大连和中长铁路的一切权力和利益的问题，并增加了由中国“偿还苏联自 1945 年以来用于旅顺口修复和建设工程的费用”的条款。除此以外，苏方接受了关于旅顺口的条款（不包括移交财产），也接受了大连的行政完全隶属中国管辖、立即由中国政府接收大连（不包括旅顺口）的一切财产的条款。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苏方还接受了在对日和约签订后或不迟于 1952 年末无偿地向中国移交中长铁路的权利及全部财产的条款。不过，苏方在同时提交的该协定的议定书中又增加了三条：对于苏联运入、调出旅顺口的物资和原料免征一切税收；上述物资和原料免受中国海关检查；苏联军队和军用物资可

① 1950 年 1 月 26 日维辛斯基致斯大林，АВПРФ, ф.07, оп.23а, п.20, д.248, л.38-55。

以沿中长铁路自由调运，其运费按中国军队调运的现行价格计算。[①]

1月31日，中方又提出了根据苏方草案相应修改的关于旅顺口、大连和中长铁路协定及议定书草案。对于协定本身，中方几乎没做改动，但在议定书中，针对苏军沿中长铁路调运的问题，中方提出增加一项条款，即中国的军队和军用物资也可以自由地沿苏联境内的铁路调运。[②] 对此，苏方不能再容忍了。于是，中苏双方在谈判中发生了激烈争论。

1月31日至2月2日，米高扬、维辛斯基与周恩来连续进行了三天会谈，会谈涉及到中苏双方提出的所有问题。维辛斯基关于会谈情况给斯大林的报告显示，中苏双方对条约文本只做了一些文字修改，关于旅顺口、大连和中长铁路的协定，以及贷款、航空、贸易、派专家等协定也没有原则性的分歧，争论发生在关于旅顺口、大连和中长铁路协定的议定书上。对于中方提出的增加中国军队和军用物资沿苏联铁路调运的条款，苏方表示坚决反对。一方面，作为让步，苏方在修改议定书时根据中方的愿望对第一条做了改动，规定只有在远东地区出现针对苏联的战争威胁的情况下，才能沿中长铁路调动部队。但另一方面，苏方认为中国军队从满洲沿苏联铁路向新疆调动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和合理性，中方的建议实质上是对苏联建议的“反提案”，是“隐讳地反对苏联这一建议的一种特殊方式”，因此“没有任何必要，也绝对不会被接受”。周恩来对此做了详细的解释，说明中方提出这一条款是因为苏方首先提出了这个问题，并坚持必须在议定书中列入这一条款。米高扬随即指出，如果这样，那么就取消苏方的这一建议，而把议定书中已经缩短的中长铁路协定有效期再保留十年。显然，苏方是在以取消已经形成的谈判结果相要挟。周恩来无法再表示反对，但提出要向毛泽东报告。在第二天的会谈中，周恩来接受了苏方的条款，只是要求苏联口头承诺，在必要的情况下，中国可以沿西伯利亚大铁路调运军队。米高扬对此表示可以接受，但是再次对中方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表示惊讶。他气愤地说：“作为同盟者，苏联无偿地转让了巨额财产，包括中长铁路、大连、旅顺口以及在这些地区我们拥有的一切权利，而中国却连苏联在一条铁路上调动军队都不愿意同意。如果连这样的让步中方都不能做出，那我们还算什么同盟者呢？”[③]

---

① АВПРФ, ф.07, оп.23а, п.20, д.248, л.74-79.

② АВПРФ, ф.07, оп.23а, п.18, д.234, л.17-22.

③ 1950年2月1日、2日、3日维辛斯基给斯大林的报告，АВПРФ, ф.07, оп.23а, п.18, д.234, л.8-13, 29-34, 50-55。

周恩来没有再发表不同意见，因为做出重大让步的的确是苏联方面。2 月 5 日，毛泽东致电刘少奇，将已经定稿的关于中长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和议定书，贷款协定和议定书，以及关于外蒙古独立和废除 1945 年中苏条约的照会等文件发回，要求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进行讨论并通过。[①] 现在，毛泽东和周恩来已经有时间和闲心在莫斯科参观工厂和集体农庄了。

根据俄国档案材料，2 月 11 日—13 日，双方代表进入了一轮新的谈判，又举行了三次会谈。2 月 10 日，中国代表团收到莫洛托夫转交的一个新协定草案，其中规定在苏联远东地区和各中亚共和国的领土上以及在中国的满洲和新疆境内不得向外国人提供租让，并不允许有第三国的资本或这些国家的公民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参与的工业的、财政的、商业的及其他的企业、机关、公司和团体的经营活动。这就是所谓的《补充协定》。会谈中周恩来说，毛泽东同志同意这个协定的草案，只是在文字方面有几处不大的意见。比如，将“协议如下”改为“双方达成本补充协定”，将“租让”改为“租让权”。周恩来还提出，中国准备采取经济措施，逐步减少外国公司和组织在东北和新疆境内从事的经济活动。[②] 会谈还涉及有关条约和协定的签字和公布问题。周恩来要求签字仪式在 2 月 14 日 18 时举行，并提出贸易协定、航空协定，以及石油和有色金属股份公司的协定不能签字，因为关于这些协定的文本尚需进一步协商和明确。周恩来还说，他和毛泽东商议的意见是，即将在莫斯科签字的所有协定都应公开发表。这显然是针对《补充协定》而给苏方出的一个难题。维辛斯基表示这样的问题必须加以讨论，并答应向苏联政府汇报。[③]

2 月 14 日，刘少奇致电毛泽东通知说，中国政府和政协负责人的联席会议同意就有关条约和协定签字。[④] 当天晚上，斯大林和毛泽东出席了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中苏条约签字仪式。不久以后，中苏两国的报纸上刊登了有关的条约和协定。[⑤] 当然，如众所周知的，双方都没有公布关于旅顺口、大连和中长铁路的议定书和那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 23–24 页。

② 《补充协定》原件及中方的修改意见参见 АВПРФ, ф.07, оп.23а, п.18, д.234, л.64-69。在这一问题上，俄国档案记录与以前在中国流行的一些说法又有所不同。中国有材料说，毛泽东开始不肯签署这个协定，只是在斯大林的一再坚持下，“为了照顾中苏团结的大局，只好让步”。参见裴坚章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49–1956）》，第 25 页；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第 446 页。

③ 1950 年 2 月 12 日维辛斯基给斯大林的报告，罗申与周恩来会谈纪要，2 月 13 日维辛斯基与周恩来会谈纪要，АВПРФ, ф.07, оп.23а, п.18, д.234, л.64-69, 70-74, 75-76。

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下卷，第 243 页。

⑤ 正式发表的中文文本见齐世荣主编：《当代世界史资料选辑》第一分册，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 年，第 518–523 页。

个《补充协定》。

至此，中苏结盟谈判中经济利益的冲突总算化解了，做出让步的实际上是苏联方面。这里，人们不禁要问，斯大林为什么会在涉及苏联远东战略利益的问题上做出如此重大的让步？

五、斯大林对中苏关系的深层考虑

中苏同盟关系的建立，在政治和军事上对于中苏双方无疑都是有利的，但是从经济和外交的角度观察，中苏两国各自的理解就有所不同了。应该说，2月14日正式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及相关文件，在总体上讲还是符合中国的愿望的，其结果保护了中国的主权和经济利益，也为新中国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开启了大门。尽管个别条款尚有不尽如人意之处，但中国在1945年失去的大部分东西在不久的将来就可以收回了。而对于斯大林来说，这意味着苏联在战后通过雅尔塔协定和中苏条约实现的远东战略目标——太平洋出海口和不冻港，至迟到1952年底将不复存在。难道斯大林真的愿意牺牲苏联多年来梦寐以求且来之不易的战略利益吗？[①] 苏联坚持要在军事方面使用中长铁路和签订秘密的《补充协定》，其目的当然是要以此为补救措施来保证苏联在亚洲的经济利益和安全利益。但仅仅如此，焉能弥补苏联在远东战略利益的损失？那么，斯大林能够在中长铁路和大连港问题上做出如此重大的让步，还有什么迫不得已的原因或深层的考虑？

第一，作为构成苏联在远东战略目标的两大要素之一，蒙古问题在中苏谈判中得到顺利解决，这使斯大林去掉了一块心病，但同时斯大林也明白，中方是以在蒙古问题上的让步作为解决中长铁路等问题的交换条件的。

尽管如前所述，毛泽东已经许诺不再提出蒙古统一的问题，但是在正式谈判中将如何处理这一问题，中国是否还要旧话重提，斯大林实无把握。因此苏联在这方面也是做好了充分准备的。根据外交部的要求，1月16日杜尔金涅夫斯基向维辛斯基报告说，已经为他准备好了1945年11月关于蒙古独立的全民投票议定书的文本，还在档案管理局和第一远东司找到了批准承认独立和准备互换外交代表的公报

---

① 斯大林曾经把苏联在对日作战中所获得的成果与沙皇俄国在日俄战争中的失败做了对比，他说：1904年的失败是俄国历史上的污点，为了清洗这个污点，“我们这些老一辈的人等待这一天，已经等了40年”。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斯大林文选（1934–1952）》下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438–439页。

和 1946 年 2 月 14 日中国外交部与蒙古代表苏伦扎布互换的照会书。[1] 然而，苏方准备的这些材料都没有用上。就在 1 月 26 日中方递交了关于中长路、旅顺和大连的议定书而使苏方大伤脑筋的时候，周恩来突然提出了蒙古问题。[2] 令斯大林感到意外的是，中方竟主动提出新政权承认蒙古于 1945 年宣布独立的既成事实，并建议以互换照会的方式解决这一使苏联感到棘手的问题。周恩来随后便向维辛斯基递交了中方起草的中苏关于蒙古问题的互换照会文本。照会全文如下：

根据今日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和中苏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和大连的协定，我仅以此声明，缔约的双方在如下事项中应达成理解：

一、由于上述条约和协定的签订，缔约的双方同意宣布：1945 年 8 月 14 日中苏之间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和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及其所有附件全部无效。

二、缔约国双方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独立地位，这一点因为 1945 年在外蒙古进行的证明其要求独立的公民投票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业已与之建立了外交关系而获得了充分保证。

在得到您，部长先生，对上述两点的确认后，本照会和您的答复将成为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组成部分。[3]

这时斯大林才明白了中方的真实意图，即顺利地解决蒙古问题是以废除 1945 年中苏条约及协定和所有附件为前提的，否则中苏同盟条约将无法成型。对此，斯大林不得不认真权衡利弊：如果鱼与熊掌不可兼得，苏联就必须在蒙古和东北两者之间做出选择。两天后，苏联原则上接受了中国的方案。

第二，在苏美之间已经形成冷战状态的国际政治格局中，将中国纳入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是斯大林控制和影响亚洲局势以对抗美国的战略安排，也是苏联与中国结成同盟关系的基本出发点。如果与政治和外交方面的战略目标比较起来，苏联在东北的经济利益自然要排在第二位了。

斯大林对毛泽东是不信任的，他一直担心中共会走铁托式的道路，特别是对新

① 1950 年 1 月 16 日杜尔金涅夫斯基致维辛斯基，АВПРФ, ф.07, оп.23а, д.235, л.123。

② 当周恩来突然提到蒙古问题时，斯大林不明所以，生怕在外蒙独立问题上再出枝节，神态十分紧张。见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第 450 页。

③ АВПРФ, ф.07, оп.23а, п.18, д.234, л.16.

中国与美国关系的发展耿耿于怀。[①] 而苏联掌握的情报充分表明，美国在千方百计离间中苏关系，并策动新中国摆脱苏联的控制和影响。作为中共情报部门负责人及当时毛泽东与苏联大使的联络人，李克农于1949年11月17日在苏联大使馆的一次谈话中指出，美国曾经有一个“把中共变成第二个铁托集团”的计划，目前美国间谍机构在华活动的首要任务就是“破坏中苏之间的友谊”，其宣传重点是“挑衅性地把中苏贸易说成是掠夺中国的粮食和自然资源”，攻击1945年的中苏条约是“不平等的和帝国主义性质的条约，其结果导致中国丧失了东北及在满洲的所有工业设备”。[②] 1950年1月17日苏联驻华使馆再次报告了美国挑拨中苏关系的计划。报告说，根据可靠情报，“现在美帝国主义在对华政策中非常重视中苏关系问题。美国把希望寄托在当它承认人民政府之后，就可以借助贸易使中国在经济上依附于它，然后再对中国施加政治影响。美国害怕中国参加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体系。”现在美国将通过英国承认中国的机会，试探与中国发展贸易关系的前景，并通过英国人获得所需情报，“作为将来同人民政府建立关系的桥梁”。[③] 几天后，苏联使馆又传来了美国人在关岛建立美中间谍学校的秘密情报。[④] 这些消息对斯大林无疑是一种极大的刺激。

特别是当艾奇逊1月12日关于中苏之间相互关系的公开讲演传到莫斯科后，斯大林更加焦急，他立即派莫洛托夫和维辛斯基去见毛泽东，转交了艾奇逊讲话的全文，希望中苏共同以相应的方式对此做出反应，并要求中国政府首先发表声明。[⑤] 至于毛泽东后来为什么坚持以新闻总署署长的名义发表声明尚不得而知，但斯大林对此大为不满并指责毛泽东打乱了原定步骤，却充分说明他对这一问题的重视程度。[⑥] 如果因为中苏之间经济利益的分歧而破坏了双方的政治关系，对于苏联的全球战略来说当然是得不偿失的。无论如何，斯大林都不会让美国人破坏苏联与

① 据齐赫文斯基后来说，斯大林一直怀疑，内战时期美国没有发动对中国的武装干涉是因为中共和美国政府之间有某种默契。见章百家：《新中国的外交方针》，《国史研究参考资料》1993年第2期，第59页。

② 1949年11月17日罗申与李克农谈话纪要，АВПРФ, ф.0100, оп.42, п.288, д.19, л.99-102。

③ АВПРФ, ф.0100, оп.43, п.315, д.142, л.53-54.

④ АВПРФ, ф.0100, оп.43, п.315, д.142, л.59.

⑤ 1950年1月17日莫洛托夫、维辛斯基与毛泽东会谈纪要，АВПРФ, ф.07, оп.23а, п.18, д.239, л.1-7。

⑥ 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第454–456页。1月17日谈话记录表明，师哲所说毛泽东没有以政府名义发表声明是出于“误会”，显然又是记忆的错误，因为谈话记录表明毛泽东特意问明“以政府名义”就是指外交部。

中国建立同盟关系的计划。[①]

第三，斯大林很可能还有一个更为精密和深远的考虑，使得他可以在同意中国的主张，放弃苏联在东北利益的情况下，仍然继续保持其在远东的战略目标。这一计划的核心就是改变对朝鲜半岛的政策，即从苏联一直坚持的以三八线为界的防守战略转变为一种在不损害美国利益的前提下的进攻性战略。

如果斯大林必须接受毛泽东缔结同盟条约的条件而又不想失去其在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冻港，如果斯大林必须寻求一种补救措施来保证或维持苏联在远东这一传统战略的实现，那么在莫斯科的地图上，只有控制朝鲜半岛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满足斯大林的愿望。事实是，就在周恩来提出《关于旅顺口、大连和中国长春铁路的协定》的一揽子解决东北问题的方案迫使莫斯科做出抉择时，美国国务卿的演讲和苏联驻平壤大使馆的一封电报引起了斯大林的关注，并为其提供了化解这一矛盾的机会和途径。1 月 12 日艾奇逊宣布美国在远东的军事防御线时排除了南朝鲜；1 月 19 日苏联驻朝大使什特科夫报告，金日成一再强烈要求面见斯大林商谈朝鲜的统一问题。[②] 对此，斯大林迟迟没有做出反应。因为苏联不愿看到在远东出现一场可能引发与美国直接冲突的战争，1949 年 9 月苏联领导人还专门为此作过决议。[③] 然而，就在 1 月 30 日，即收到中方草案两天以后，斯大林改变了主意。他亲自复电平壤，明确表示愿意同金日成直接进行商谈。[④] 斯大林完全可以预见到，在朝鲜半岛出现的武装冲突，无论其结局如何，都将保证苏联在远东设定的战略目标——获得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冻港。因为在战争胜利的情况下，苏联就会控制整个朝鲜半岛，仁川、釜山及其他南朝鲜的港口将替代旅顺口和大连港的作用。[⑤] 而艾奇逊的声明则使斯大林意识到苏联的举动并未危及美国的利益。即使战争失利，苏联仍然能够如愿以偿，因为东北亚的紧张局势会迫使中国要求苏联军队留驻旅顺、大连。同时，由于中苏双方商定，一旦出现战争局面，苏联军队有权使用中长铁路，

① 正如有些学者指出的，美国是“斯大林与毛泽东谈话中无形的第三者”。见 Goncharov, Lewis, and Xue, *Uncertain Partner*, p.104。

② 迪安·艾奇逊:《艾奇逊回忆录》，上海《国际问题资料》编辑组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 年，第 233 页；1950 年 1 月 19 日什特科夫致维辛斯基电，АВПРФ, ф.059а, оп.5а, п.3, д.11, л.87-91。

③ 1949 年 9 月 24 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АПРФ, ф.3, оп.65, д.776, л.33-38。

④ 1950 年 1 月 30 日斯大林致什特科夫电，АВПРФ, ф.059а, оп.5а, п.3, д.11, л.92。关于苏联转变对朝政策的详细过程，见沈志华:《朝鲜战争爆发的历史真相》，载《二十一世纪》2000 年 2 月号。

⑤ 南朝鲜的港口同旅顺、大连一样都在三八线以南，而为了把苏朝之间的铁路连接起来，双方在 1949 年 3 月已经确定修建克拉斯基诺至阿吾地仅 58 公里的铁路线。参见 1949 年 3 月 5 日斯大林与朝鲜政府代表团谈话记录，АПРФ, ф.45, оп.1, д.346, л.13-23。

这样，通向太平洋的铁路线自然也就继续在苏联的掌握之中了。

尽管目前尚无直接证据证明斯大林的上述设想和动机，[①] 但也不是没有历史根据的。早在 1945 年 6 月 29 日，苏联外交部第二远东司的报告就指出了朝鲜半岛的战略地位对于保障苏联远东地区安全的重要性。[②] 甚至在是年 9 月美苏已经确定以三八线为界划分双方在朝鲜半岛的势力范围以后，苏联外交部仍然向斯大林建议，一旦对朝鲜实行托管，“其三个战略地区釜山、济州和仁川必须控制在苏联军事指挥官手里”。“如果关于把朝鲜的这些战略地区给予苏联的建议遭到反对，那么可以提议苏联和中国共同控制这些战略地区。”外交部的另一份报告则提出，“在缔结四大国对朝鲜实行托管条件的协定时，按照联合国宪章第 82 款的规定，釜山、清津、济州岛和仁川必须规定为进行分配的战略地区。这些地区对于确保苏联与中华民国共同使用的旅顺海军基地的可靠海上交通和通道是非常重要的”，“它们必须处于由苏联政府实施的特殊的军事控制之下”。[③] 只是由于当时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已经基本实现了苏联在远东的战略目标，而后来美苏之间爆发冷战时，斯大林的注意力又首先集中在欧洲，苏联不愿意也没必要在朝鲜半岛与美国发生直接冲突。所以，斯大林放弃了对朝鲜南部战略目标的要求。直到毛泽东访苏之前，斯大林的本意还是维持原有的中苏条约。这样自然可以保证苏联在东北亚的既得利益，而没有必要在朝鲜再引发一场可能导致与美国发生冲突的危机。但是当斯大林感到苏联在远东的战略利益即将失去时，对朝鲜半岛战略目标的控制当然就提上了议事日程。[④]

对此还可以指出的间接证据是，在对外政策中使用“交换”势力范围的手法，在俄国历史上是有传统的。沙皇俄国在 1905 年日俄战争失败后调整了远东政策，为此曾策划外蒙古地区独立，并与日本达成妥协，推行了一个“用朝鲜‘交换’蒙

---

① 顺便说一句，就斯大林的处事惯例和苏联外交政策的决策程序而言，很可能就没有这方面的直接证据，即使苏联有文件公开说明其改变对朝政策的动机，也无法确定那白纸黑字就是斯大林的真实想法。

② 1945 年 6 月 29 日茹可夫和扎布罗金关于朝鲜问题的报告，АВПРФ, ф.0430, оп.2, п.18, д.5, л.1-7。

③ АВПРФ, ф.0431I, оп.1, п.52, д.8, л.40-43, 44-45，转引自 Kathryn Weathersby, *Soviet Aims in Korea and the Outbreak of the Korean War, 1945-1950: New Evidence from the Russian Archives*,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Working Paper*, 1993, No.8, pp.9-11。

④ 当然，这里还有一个如何估计美国对朝鲜半岛军事冲突的反应问题。笔者对这方面的论述，详见沈志华：《毛泽东、斯大林与韩战》（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8 年）第四章。

古”的计划。[①] 斯大林利用与西方交换势力范围或被占领国领土来保证苏联国家安全利益的做法也不是没有先例可循。不仅战时斯大林与丘吉尔在巴尔干问题上的交易是众所周知的一例，而且就在朝鲜半岛，斯大林也曾进行过同样的尝试。当美苏之间讨论三八线的划分问题时，斯大林就试图以美国对朝鲜半岛南部领土的占领来交换苏联对三八线以北日本本土部分领土的占领。尽管由于麦克阿瑟的强硬立场，苏联的计划未能实现，但斯大林以交换势力范围来实现其对外战略目标的手段和意图却是显而易见的。[②]

总之，斯大林在解决与毛泽东结盟中的经济利益冲突时，对苏联在远东的战略方针是有缜密的通盘考虑的。而如此设想和计划的结果是，苏联既可以通过军事和政治同盟使中国加入莫斯科的东方集团，又能够保证其在远东的战略权益。

通过对中苏外交谈判进程的分析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中苏同盟条约的签订虽然在形式上保证了北京与莫斯科之间的盟友关系，但实际上毛泽东与斯大林之间的猜疑和不满反而加强了。苏联被迫做出的让步和牺牲固然使斯大林心中充满怨气，而毛泽东尽管对《补充协定》没有提出反对意见，但后来他常把东北和新疆称为苏联的两个“殖民地”或势力范围的说法，也表明他当时接受这个协定并非心甘情愿。所以，中苏同盟从一开始就笼罩在一种不祥的阴影中。只是由于朝鲜战争的爆发，特别是中国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依然决定出兵帮助朝鲜，才加强了中苏之间的同盟关系，巩固和发展了中苏同盟的经济基础。

发表于《历史研究》2001 年第 2 期

---

① 列宁语，见列宁：《列宁全集》第 54 卷，中文第 2 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年，第 777 页。

② 详见沈志华：《朝鲜战争揭秘》（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5 年）第二章第一节“三八线的划定其及作用”。

关于中苏条约谈判研究中的几个争议问题

——再谈冷战史研究中史料的解读与利用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中国、俄国及东欧国家历史档案的大量解密与公布，利用多国文献资料及口述史料对冷战时期一些人物或事件进行比较、分析和综合考察，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需的。注重档案文献的发掘和利用已经成为当前国际学界冷战史研究的一个突出特点。正是在此基础上，现代史，特别是现代国际关系史研究领域，才出现了一派生机勃勃、欣欣向荣的景象。尽管如此，对一些重要史实的理解和判断，在研究者之间仍然存在着分歧和争议。一般说来，在对历史人物或事件进行总体评价和做出全面结论时出现异议，意识形态往往起了主导作用。而对具体史实的不同认知，虽然也有文化差异的背景，但更多的原因在于可资利用的史料不够充分，以及对已有史料的片面理解或轻易采信。例如，对于1950年中苏条约谈判过程及其结果的研究就存在这样的问题。

1949年12月至1950年2月，毛泽东和周恩来先后赴苏，与斯大林等苏联领导人进行了艰苦的谈判，终于如愿以偿地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及《中苏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等一系列文件。对于冷战史，特别是中苏关系史，这无疑是最重大的事件之一，从而引起不少研究者的关注。[①] 近10年

---

① 相关的论著可以参见：Sergei N. Goncharov, John W. Lewis, and Xue Litai, *Uncertain Partner: Stalin, Mao, and the Korean War*,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Ледовский* Переговоры И. В. Сталина с Мао Цзэдуном в декабре 1949г.-феврале 1950г.；沈志华、冈察洛夫：《〈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愿望和结果——根据俄国解密的档案材料》，《中央党史研究》1998年第2、3期；沈志华：《中苏条约谈判中的利益冲突及其解决》，《历史研究》2001年第2期；杨奎松：《中苏国家利益与民族感情的最初碰撞——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为背景》，《历史研究》2001年第6期；迪特·海因茨希：《中苏走向同盟的艰难历程》，张文武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年；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

来，随着新史料的不断涌现，人们对中苏条约谈判的基本过程已经有了大体一致的了解和认识，如在毛泽东到达莫斯科之前，斯大林已经了解到其访苏的主要目的；斯大林起初想维持1945年的旧条约，而毛泽东却坚持要签订一个新条约；双方在谈判过程中曾发生激烈争执，后来是苏方做出了重大让步等等。但是，在以往的研究论著中，对一些重要史实的描述仍然存在着差异，甚至是完全相反的判断，其结果可能影响到研究者对中苏双方立场和心态的理解。笔者拟根据目前中俄双方披露的档案文献及当事人的回忆，分析几个有争议的问题，以期推动有关课题研究的继续深入和档案文献的进一步开放。

一、毛泽东答塔斯社记者问是如何出笼的？

1949年12月16日毛泽东与斯大林进行了第一次会谈，双方对于如何签订中苏同盟条约持有不同的立场。此后一段时间，特别是24—30日之间，斯大林和毛泽东都期待对方做出让步。1950年1月2日，《真理报》在头版重要位置刊登了毛泽东答塔斯社记者问。[①]研究者普遍认为，这标志着斯大林已经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中苏将签订一个新的同盟条约。然而，这个"答记者问"的办法究竟是谁提出的，其文本又是谁起草的，却有完全不同的说法。

作为翻译人员随同毛泽东访苏的师哲回忆说：

当时凑巧遇到一件没有预料到的事：英国通讯社造谣说，斯大林把毛泽东软禁起来了。消息传出后，苏方倒有些着慌。……大家为此很着急。稼祥足智多谋，不愧为"智囊"。他提出以毛主席答塔斯社记者问的形式，在报上公布主席到苏联的目的。1950年1月1日，毛主席决定发表这个《答记者问》，1月2日见报。[②]

作为保卫人员随同毛泽东访苏的汪东兴在日记中记载：

（1949年12月30日）下午二时许，王稼祥到毛主席处说："现在各国驻苏大

① 几乎所有谈到这一点的中文著作都说《答记者问》发表在头版头条，看来很少有人真正查阅《真理报》，别人这样说，也就跟着说。实际上打开《真理报》一看就知道，该消息发表在头版二条。

② 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李海文整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第438–439页。

使、新闻界人士正在打听毛主席的行踪，纷纷议论说毛主席不知去向了。”毛泽东听罢哈哈大笑说：“毛泽东正在莫斯科某地休息，怎么不知去向了？”王稼祥大使说：“有一个星期报纸上未见报道你的活动了。”毛主席说：“近来确实外事不多。”

（1950年1月1日）下午，莫洛托夫、米高扬来到毛主席住所谈及安排毛主席一行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参观的具体事宜。这时，有消息说英国通讯社造谣：斯大林把毛泽东软禁起来了。对此，苏方有些着慌。……大家为此都很着急。王稼祥大使提出让主席以答塔斯社记者问的形式，在报上公布主席访问苏联的情况。这个建议得到了大家的赞许。[①]

有人为时任中国驻苏大使的王稼祥写了年谱，其中记载：

（1月1日）鉴于英国通讯社造谣说斯大林把毛泽东软禁起来了，王稼祥向毛泽东提议，以答塔斯社记者问的形式在报上公布访问苏联的情况，进行辟谣。[②]

德国学者海因茨希在其专著中转引了俄国学者列多夫斯基未公开的手稿《毛泽东1949年12月至1950年2月对苏联的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联之间关系的开始》中提供的一份俄国档案文件，即1950年1月2日苏共中央驻中共中央的代表科瓦廖夫给斯大林的关于1月1日与毛泽东谈话的纪要，书中说：

《答塔斯社记者问》的文本是科瓦廖夫1月1日受斯大林委托交给毛泽东的，虽然是草稿的形式，但斯大林已在上面签了字。毛泽东阅后说：答记者问的形式和内容都很好；他没有什么需要说明和补充。关于《答塔斯社记者问》中提及的旅行计划，如过去已表示过的那样，他希望访问列宁格勒，并提出在1月22日或25日以前留在莫斯科。在此期间，他愿与斯大林会晤几次，以便商谈答记者问中提到的问题以及其他问题。[③]

最新的一个材料是《毛泽东传》引用的1963年2月23日毛泽东同苏联大使契尔沃年科谈话记录：

① 汪东兴：《汪东兴日记》，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169、171–172页。
② 徐则浩编著：《王稼祥年谱（1906–1974）》，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389页。
③ 海因茨希：《中苏走向同盟的艰难历程》，第504页。

据毛泽东后来说，这个答记者问是由苏方起草的。他说，他为斯大林始终不肯签约而向科瓦廖夫和费德林发了一次火。“个把礼拜后，斯大林同志改变观点了。他起草了一个谈话稿。记者问，中国国内军事情况怎么样？我答，进行得很顺利，蒋介石残余没有多少了。然后记者又问，你在这里打算还呆多久？这是他写的。我说：还等候一个时期再走，等着签订中苏条约。他给我看，我说好，可以发表。”①

笔者还可以补充在俄国档案中发现的另一个毛泽东本人的类似说法——苏联大使尤金记录了 1956 年 3 月 31 日毛泽东对他谈话的内容：

毛泽东继续说，过了一段时间，有人交给我一份将要发表的我答记者问的草稿，斯大林已经在上面签了字。这个文件报道说在莫斯科正在进行有关缔结中苏条约的谈判。这已经是向前迈出的重大的一步。毛泽东说，可能是印度人和英国人在改变斯大林的立场上帮了我们，他们于 1950 年 1 月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这以后，开始了有马林科夫、莫洛托夫、米高扬、布尔加宁、卡冈诺维奇、贝利亚参加的谈判。②

或许是此前看到过这些材料，中国学者杨奎松在其论文中断定：“在进一步得悉英国也有加快与新中国建交步伐的消息之后，斯大林终于发现，对苏联来说，争取毛泽东和新中国的友谊，远比过分担心美英的反应更为实际。于是，他在 1950 年 1 月 1 日主动起草了一份以毛泽东名义答记者问的新闻稿。在这份稿件中，斯大林出人意外地写上了准备解决现有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以及贷款、通商等各项问题的内容。当毛泽东看到这一文字稿时又惊又喜，毫无犹豫地表示同意以他的名义发表这篇答记者问。”③

其实，这个引起争议的《答记者问》很简单，只有三个问题，其中涉及到毛泽

① 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 41 页。

② 1956 年 3 月 31 日毛泽东与尤金谈话纪要，ЦХСД（当代文献保管中心，1992 年改名为俄罗斯国家当代史档案馆，РГАНИ），ф.5, оп.30, д.163, л.88-89//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1994, №5, с.106。马斯特尼在研究中曾提到这次谈话，但他认为这个说法与毛泽东在莫斯科发出的电报中的说法不同，当时毛说举行答记者问是他自己的主意。见 Vojtech Mastny, *The Cold War and Soviet Insecurity: The Stalin Years*, New York,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89。

③ 杨奎松：《中苏国家利益与民族感情的最初碰撞》，第 109–110 页。杨文中没有提供其史料根据。

东访苏的内容如下：

记者问：毛泽东先生，您在苏联将逗留多久？

答：我打算住几个星期。我逗留苏联时间的长短，部分地决定于解决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利益的各项问题所需要的时间。

问：您所在考虑的是哪些问题，可否见告？

答：在这些问题当中，首先是现有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问题，苏联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贷款问题，贵我两国贸易和贸易协定问题，以及其他问题。

此外，我还打算访问苏联的几个地方和城市，以便更加了解苏维埃国家的经济与文化建设。①

实际情况究竟如何，现在来分析一下这些材料和判断。

首先是答记者问这个方式的提出。根据中方诸多当事人提供的回忆材料可以断定，答塔斯社记者问的这个主意是王稼祥建议的，而不是斯大林主动提出的。科瓦廖夫的报告以及毛泽东本人后来的说法，从字面上看都无法否定这个结论，充其量只能证明答记者问的文本是斯大林起草的或经斯大林签字后送给毛泽东的。至于师哲所说在报纸上发表这一消息的决定是由毛泽东作出的，这在逻辑上讲不通。在《真理报》上发表文章的决定权当然属于苏联人。所以，上述材料提到，答记者问的文本是经斯大林签字后交给毛泽东的，大抵还是合乎情理的。这就是说，建议是中方提出的，而最后决定是苏方作的。这个结论应该是可以成立的。此外还可以断定，就中方提出这种方式本身而言，其目的最初仅仅是为了“辟谣”，并非是针对中苏条约的形式和内容的。后来，这种方式推动了中苏谈判的进展，是因为答记者问的内容。

那么，答记者问的文本是谁起草的？提出中苏条约这个问题，是毛泽东想施加压力的手段，还是斯大林主动做出的让步？这里有三种可能性，一是中方提出建议的同时起草了文本，交苏方认可（斯大林签字）后发表的；二是中方提出建议后，苏方提出问题而由中方作答，再经斯大林批准发表的；三是接到中方建议后，苏方（斯大林）起草了全部问答（草稿）并送中方认可后发表的。按照科瓦廖夫和毛泽东的说法是第三种情况，即答记者问的最初文本是斯大林起草的，研究者似乎也都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第206页。

接受了这种说法。但是，在笔者看来，这里还是存在几处疑点。

第一，仅从 1956 年 3 月 31 日毛泽东谈话看，还没有充分根据断定文本就是斯大林起草的，因为看毛泽东谈话的字面意思，也有另外一种可能性，即斯大林是在中方送去的草稿上签的字。

第二，毛泽东 1963 年 2 月 23 日谈话说得很明确：是斯大林“起草了一个谈话稿”。不过，此时中苏关系正处于紧张状态，毛泽东讲话的真实性受到怀疑，苏联使馆认为毛泽东是有意显示中共对苏联一贯的友好态度，从而把中苏分裂的责任推给苏联。就在与毛泽东的这次谈话后不久，契尔沃年科向苏共中央提交了一份关于中国国内情况的报告，其中讲到：“中共领导人的策略之一，就是在自己的党和人民面前以及世界舆论面前造成一种假象，似乎他们有主动精神。中国宣传中的以下说法就是为这一策略服务的：似乎是中共提出了停止公开论战、举行苏中两党双边会谈和召开兄弟党会议的建议。也许，毛泽东 1963 年 2 月 23 日与苏联大使的谈话、对这次谈话的报道以及发表苏共中央 2 月 21 日信和中共中央 3 月 9 日信，也主要是为这一策略服务的。中共领导人想以此表明，他们不仅对‘现代修正主义分子’进行‘有原则的’批评，而且也采取了‘建设性的’步骤，以‘挽救’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和统一。”[①] 的确，毛泽东有时讲话言不由衷，这种情况下面还会提到。所以，仅凭他的一句话，还难以作出肯定的结论。

第三，关于科瓦廖夫的报告，引用者没有提供原始档案的文本，因此科瓦廖夫报告全部的和具体的内容究竟如何，尚不得而知。况且，这里还有一个辗转翻译（由俄文到德文再到中文）后译文是否准确的问题。此外，首任苏联驻华大使罗申是上午拜会毛泽东且在那里吃过午饭后离开的。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声称，因身体不适“准备完全静养一周，彻底恢复正常的睡眠”，强调他“不想参观工厂，不想作报告，也不想发表公开演讲”，并且取消了在苏联各地旅行的计划。会谈中，毛泽东还提出要“提前一个月，即在 1 月底离开莫斯科回国”，关于缅甸、印度以及英国和其他英联邦国家将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消息，毛泽东也是这时有意透露给苏联人的。[②] 显然，毛泽东这是在向斯大林表露他的不满，并施加压力迫其让步。而照汪东兴日记记载，当天下午，莫洛托夫、米高扬就来到毛主席住所谈及安排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参观的具体事宜，这说明此时双方已经就发表答记者问事达成一

① 1963 年 5 月 17 日契尔沃年科给苏斯洛夫的报告，笔者保存的俄国档案复印件，编号 SD09903。

② 1950 年 1 月 1 日毛泽东与罗申谈话纪要，АВПРФ, ф.0100, оп.43, п.302, д.10, л.1-4。

致意见。最迟到1月2日凌晨3时，毛泽东已经发电给刘少奇说："本（二）日发表我和塔斯社记者谈话，请嘱乔木、陈克寒注意照塔斯社稿译发为要。"[①] 看来，如果确有1月1日毛泽东与科瓦廖夫的谈话，那么一定是发生在罗申走后和莫洛托夫到来之前，而就目前披露的史料来看，1月1日下午到晚上在毛泽东住所和克里姆林宫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还很难说清，其中变数甚多。

第四，就毛泽东的性格而言，他是否会老老实实地按照斯大林起草的文本发表讲话，很值得怀疑。几天后发生的一件事可以佐证：本来中苏双方商量好，同时以外交部的名义在各自报纸上发表声明，驳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挑拨中苏关系的讲话。结果毛泽东却偏偏自作主张以新闻署长的名义发表了声明，从而引起斯大林的极大不满。[②]

结论只能是：如果要确定答记者问的作者及起草过程，还需要发掘更多的文献证据。首先是把科瓦廖夫与毛泽东谈话的时间、地点和全部内容搞清楚，而最关键的是要在档案中（无论是中国还是俄国）找到《答记者问》草稿的文本。如此，事情就一目了然了。与此不同的是，关于《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起草过程，由于俄国档案中的各种文本已经问世，就比较能够说清楚了。

二、《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最初是谁起草的？

到目前为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草案的最初文本究竟是中方起草的还是苏方起草的，也有完全相反的说法。

首先按中方相关史料出版的时间顺序，将各种说法陈列如下，以便对比。

中国最早披露有关档案文献的是1987年11月出版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其中发表了1950年1月25日毛泽东致刘少奇电：

（一）周、李等一行廿日到此。廿一日，我们十二人参加列宁纪念会。廿二日，我们连师哲共六人与斯大林等同志会商，决定各项原则问题及工作进行方法。廿三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第207页。

② 至于毛泽东为什么有意忽视1月17日双方达成的一致意见，海因茨希断定不是因为毛泽东要贬低此事的意义，理由是中国的声明发表在《人民日报》的第1版，而苏联的声明是登在《真理报》的第2版。此外，《人民日报》在第1版全文发表了维辛斯基的声明，而《真理报》只是把胡乔木的对记者谈话摘要刊登在第4版。他认为，毛泽东这样做"也许是对莫洛托夫和维辛斯基那种好为人师的态度表示反感"。海因茨希：《中苏走向同盟的艰难历程》，第527页。

日，周王李三人与苏米高扬维辛斯基罗申三人会谈几个具体问题。廿四日，经我们起草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草案送交维辛斯基。现正在起草第二个文件，即关于旅顺大连中长路协定，大约今日可以完成草案，并已决定在三天内准备好第三个文件，即中苏易货协定。总之，工作是颇为顺利的。（二）兹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草案发上。请中央加以讨论，并以意见电告。请勿外传。[①]

1991年5月出版了伍修权的回忆录，作为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司长，伍修权是随同周恩来到达莫斯科的，并参加了谈判的全过程。他回忆说：

条约最初的文本是由苏联草拟并提出的，同后来通过并公布的条约虽无原则上的变动，但是在文字上却做了很大的修改。这一工作是周总理直接领导和亲自动手进行的。他将条约的草稿交给代表团和大使馆的同志们，组织发动大家对条约草案进行逐条、逐句、逐字地研究斟酌和修改。……条约草案中有一段原来是：缔约国一方一旦受到第三国的侵略，另一方“得以”援助。周总理觉得还不够肯定，没有表明条约应有的作用，经过再三考虑，将“得以”二字改为“即尽其全力”给予援助，这就更肯定明确了。[②]

1991年12月师哲的回忆录出版，其中谈到：

在协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时，周总理强调：“友好同盟”的具体内容自然就包括互助合作在内了，而后者也应该是条约的具体内容。苏联方面对周总理的解释很感兴趣，也相当重视，因此把这次会谈情况向斯大林作了汇报。以后，周总理的这个意思在条约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

开始，苏方按周总理的基本思想和大体内容，写了一个草案给我方看。

周总理看后说：“不对，我说的很多，内容没有全包括进去，要修改。”当即把王稼祥、陈伯达叫来商量，同时向毛主席作了汇报。毛主席说：“我们自己重搞一个吧。”

于是，周总理花了整整两天多时间草拟了条约文本，我把它译成俄文交给苏方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第251–252页。编者在文中加了一条注释说：这个条约草案是在毛泽东主持下由周恩来起草的。

② 伍修权：《回忆与怀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237–238页。

修改。苏方没有改动多少，表示满意。看来，这是出乎他们意料的，他们没有想到我方会提出内容这么充实的条约。所以说，条约文本实际上是我方起草的。[1]

据 1993 年出版的《汪东兴日记》记载：

（1 月 23 日）双方小班子开始会谈。

苏方首先拿出一份"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草案，这个条约是以一九四五年八月国民党政府代表王世杰和苏联政府在莫斯科签订的条约为基础草拟的。

周总理向毛主席汇报了此情况，毛主席说："把我们起草的条约马上译成俄文交给苏方，他们拿的那个草案对我们无效。"

（1 月 24 日）毛主席、周总理、王稼祥、陈伯达、李富春同志在毛泽东处开会讨论充实条约内容。毛主席提议边讨论边译成俄文。伍修权、师哲、戈宝权、徐介藩在毛主席住所的一层用最快的速度将他们讨论的文本译成俄文并打印出来。

当天，我们把起草好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草案）"送交苏方维辛斯基。

（1 月 27 日）中苏代表会谈"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草案）"，由于中方准备的草案文稿内容充实，使苏方代表感到意外，会谈以此为基点进行讨论。[2]

中国官方研究著作最先谈到这个问题的是由外交部编写并于 1994 年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49—1956）》，书中称："根据斯大林与毛泽东商定的关于新条约的基本精神，在苏方的提议下，由中方周恩来主持起草新条约的文本。为了区别于旧约，新约以旧约的名称为基础，加上'互助'两字，即《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新约的宗旨和条文比之旧约做了重大的修改与补充。……苏方同意中方的草案本。"[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并于 1997 年出版的《周恩来年谱（1949—1976）》写到，1 月 24 日周恩来"拟出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草案，并在条约名称上增加'互助'二字。经毛泽东同意后，将所拟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草案）》送交维

① 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第 448 页。

② 汪东兴：《汪东兴日记》，第 194–196 页。

③ 裴坚章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49–1956）》，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 年，第 22 页。未注明资料来源。

辛斯基”。[①]

一年后出版了还是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周恩来传》，其中引用了1950年2月8日周恩来致刘少奇并中央政治局电：“从23日起，在毛主席指导下，便先谈条约及各项具体协定。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是我们起草的，第一次电告即为该草案。苏方对该草案无原则修改，除文字修改外，较重要的是第二条改为从积极方面规定争取尽速缔结和约，第三条加上不参加反对对方的任何行动或措施，原第五、六两条合为一条。故对此条约无任何争论，即作成定案，已见第二次电告。”该书还写到，《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和《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都由周恩来经过仔细研究后执笔，经济贷款协定是苏方起草的。在具体商谈过程中，对这三个文件草案都没有做原则性的修改，文字上的更动也不多。[②]

最近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和出版的《毛泽东传（1949—1976）》再次断定：“在协商新条约的时候，苏方最初按照中方的基本思想和大体内容写了一个草案。中方认为有许多重要内容没有写进去，提出修改。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重新写了一个草案，交给苏方。苏方对这个草案没有提出原则性的修改，双方没有任何争论，即成定案。为了在名称上区别于旧的条约，中方提出新约可在旧约名称的基础上加‘互助’二字，名为‘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苏方也接受了。”[③]

综上所述，除伍修权回忆说条约最初文本是苏方起草的，中方没有做原则性修改外，目前中国的回忆材料和官方研究论著一致认为条约草案是中方提供的（或按苏方提议或否定苏方草案后），条约名称也是中方提议的，而苏方大体接受了中方意见，其基本文献依据就是1950年1月25日毛泽东的电报和2月8日周恩来的电报。

完全相反的结论是一些研究者依据最新发现的俄国档案文献作出的。[④]1997年前后，笔者陆续收集到一批关于这次中苏条约谈判的俄国解密档案文献，共有80多件，其中包括毛泽东、周恩来与斯大林及其他苏联领导人的会谈记录和谈判纪要，中苏双方各自拟定的有关条约和协定的最初文本及历次修改稿，以及苏联有关部门和专家呈报的对于条约、协定的建议和意见。笔者对这些文件进行了整理和研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23页。

② 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994、997页。

③ 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47页。未注明资料来源。

④ 参见沈志华、冈察洛夫：《〈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愿望和结果》；沈志华：《中苏条约谈判中的利益冲突及其解决》；海因茨希：《中苏走向同盟的艰难历程》，第591–598页。

究，并将原件扫描后保存在北京大学现代史料研究中心，同时在学术刊物上发表了大部分中译文。[①] 遗憾的是，这批重要的史料并未得到中国学者的重视和利用，[②] 这就难怪此后发表的研究论著依然因循旧说，甚至根本没有理会已经出现的最新史料。

中苏达成签订新约的一致意见后，毛泽东开始布置周恩来访苏及其他准备工作。此时，根据俄国档案文献，斯大林则组织了一个起草委员会，并立即投入了条约及各项协定的起草工作。就《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而言，在提交中国代表团之前，苏方共修改了七稿，1 月 22 日得到苏共中央批准，并于 1 月 23 日双方会谈时交给中方；中方研究后做了一些文字性修改，于 24 日退还苏方，苏方基本没有再改动；此后双方又交换过一次文本（均未改动），并加以确认。现在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有三个：1. 新条约的名称是由何方在何时提出的；2. 苏方提交给中方的文本是否保留了旧约的基本内容，以至中方必须重搞一个；3. 中方修改后退回的条约草案与苏方提供的文本究竟有没有“原则性”区别。

第一个问题。1950 年 1 月 5 日，苏联外交部起草了条约第一稿草案，取名为“苏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ДОГОВОР О ДРУЖБЕ，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Е И ВЗАИМНОЙ ПОМОЩИ МЕЖДУ СССР И КНР）。[③] 值得注意的是，战后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之间签订的双边条约大都是以此命名的，如苏蒙、苏罗、苏匈、苏保等条约。[④] 此外，笔者在刚刚开放的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还看到了保加利亚与南斯拉夫之间的条约，名称也完全相同。[⑤] 看来，这是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当时通行的做法。苏方以后的各修改稿均延续使用了这一名称。但是，到 1 月 16 日外交部长维辛斯基将条约文本（第六稿）呈报给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莫洛托夫时，条约名称已经改为“苏中友好同盟互助条约”（ДОГОВОР О ДРУЖБЕ，СОЮЗЕ И ВЗАИМНОЙ ПОМОЩИ МЕЖДУ СССР И КНР）了，[⑥] 而这时周恩来还在开往莫斯科的火车上。1 月 22 日向斯大林报送并得到苏共中央批准后交给中方的文本（第七稿）使用的

① 见《党史研究资料》1998 年第 4 期，《中共党史资料》总 67 辑。

② 笔者所见，只有杨奎松在其《中苏国家利益与民族感情的最初碰撞》中使用了这些材料。

③ АВПРФ, ф.07, оп.23а, п.18, д.235, л.13-14.

④ 安·葛罗米柯、鲍·波诺马廖夫主编：《苏联对外政策史（1945–1980）》下卷，韩正文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 年，第 710–711 页。

⑤ 保加利亚与南斯拉夫友好合作互助条约，1947 年 11 月 27 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9-00063-02。

⑥ АВПРФ, ф.07, оп.23а, п.18, д.235, л.3-6.

也是这个名称。[①] 显然，条约名称不可能是按照周恩来的意见修改的。应该注意的倒是，苏方在最后确定条约名称时，很可能是考虑到了毛泽东曾经使用过的提法。据俄国档案记载，提到中苏将要签订的条约时，毛泽东在 1949 年 12 月 16 日与斯大林会谈时说"刘少奇回国后，中共中央讨论了中苏之间的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问题"（ДОГОВОР О ДРУЖБЕ，СОЮЗЕ И ВЗАИМОПОМОЩИ），在 1950 年 1 月 6 日与维辛斯基会谈时则提到"中苏之间缔结新的友好同盟条约是符合双方利益的"（ДОГОВОР О ДРУЖБЕ И СОЮЗЕ）。[②] 引起苏方注意的应该是毛泽东两次都提到了"同盟"的概念，而苏联外交部前几个文本所取的名称中没有"同盟"一词，显然是一个重大的疏忽——因为这比 1945 年的条约退了一步。但无论如何，条约名称中"互助"一词不是周恩来后来加进去的。

第二个问题。苏方最初的设想是签订一个新条约而同时保留 1945 年条约中的三个协定，因此外交部起草的第一个草案在第七条明确指出："缔约国双方承认，1945 年 8 月 14 日签订的中长铁路、大连和旅顺口协定继续有效。"[③] 不过，经过几次修改，到 1 月 16 日的第六稿时，关于这个问题的表述已经改为："缔约国双方同意，目前在旅顺口和大连港的苏联军队自本条约生效之日起 2—3 年的期限内全部撤回苏联境内，撤军将于 1950 年开始。缔约国双方还同意，中苏之间 1945 年 8 月 14 日签订的旅顺口和大连港协定，以及大连港协定议定书在签订对日和约后重新审议。"[④] 而在最后提交给中方的第七稿中，已经没有任何地方再提到旅顺口和大连港的协定了——所有协定和议定书将单独成文。[⑤] 显然，就新条约本身而言，只是一个纯政治性宣言，而与 1945 年那个包括具体协定在内的条约已经完全不同了。根据俄国档案文献，在中苏谈判期间引起激烈争论的主要是关于旅顺、大连和中长路的协定，以及苏联要求无偿使用中长路、确定卢布与人民币之间汇率和苏联专家在华工作待遇的问题。[⑥] 从苏联收集的中国社会对中苏条约结果的反应看，人们的不满主要也是集中在一些具体问题上，而对条约本身没有提出疑义。例如，有些人认为，"延期归还旅顺、大连和中长铁路同缔约双方相互尊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

① АВПРФ, ф.07, оп.23а, п.18, д.235, л.42-50.

② АПРФ, ф.45, оп.1, д.329, л.9-17; АВПРФ, ф.0100, оп.43, п.302, д.8, л.1-5.

③ АВПРФ, ф.07, оп.23а, п.18, д.235, л.13-14.

④ АВПРФ, ф.07, оп.23а, п.18, д.235, л.3-6.

⑤ АВПРФ, ф.07, оп.23а, п.18, д.235, л.42-50.

⑥ 笔者有关论述详见沈志华：《中苏条约谈判中的利益冲突及其解决》；沈志华：《中苏同盟的经济背景：1948–1953》，香港：香港中文大学香港亚太研究中心出版，2000 年；沈志华：《苏联专家在中国（1948–1960）》，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3 年，第二章第一节。

及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是相矛盾的”，“有关1952年年底归还旅顺和中长铁路的条款只不过是国际共产主义的一种宣传，因为过2—3年之后还不知道国际形势会有什么变化”。关于蒙古独立的问题，部分民主人士说，“这是涉及到民族感情的问题，会给人留下不悦的感觉。部分归国华侨甚至怀疑西藏和新疆会不会以蒙古方式宣布独立。”还有人认为，贷款3亿美元的数额太少，利息太高（许多人错把1%当成了10%），等等。[①]从以上材料来看，说中方对这个条约草案十分不满而又重新起草了一个草案，恐怕是搞错了。

第三个问题。中方的确对苏联草案进行了修改，并于1月24日23时由中国驻苏使馆参赞戈宝权将修改后的草案交给苏方谈判人员库尔久科夫。笔者看到的中方草案是经克鲁季科夫、费得林、库尔久科夫翻译的俄文文本，把双方的草案进行仔细对比可以发现，中方的修订草案虽然有多处改动，但除调整一下段落安排和增加个别修饰词以外，从名称到内容，与苏方的草案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区别。[②]顺便说一句，关于缔约国一方受到军事进攻时另一方给予援助的问题，在苏方第一稿（1月5日）中的提法是“相互给予一切可能的，其中包括军事的援助”（оказывать друг другу всяческую, в том числе и военную помощь），第二稿（1月9日）已经改为“尽其所能立即给予处于战争状态的一方以军事和其他援助”（немедленно окажет вовлеченной в военные действия договаривающейся стороне военную и другую помощь всеми имеющимися в распоряжении средствами），以后各稿，包括中方的修改稿（只是把原来在第二条的这个内容合并到第一条去了），都延续了这一提法。因此，“尽其所能”一词为中方修改时所加的说法，也是靠不住的。[③]

还有一个情况可以推断条约最初是苏方起草的。2月14日中苏条约公布后，英国外交部政策司立即进行了分析，认为这与苏联和东欧各国的条约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如第一款写上了旨在防止日本及其盟国发动进攻的内容，如果把日本换成德国，则与苏罗条约一模一样。条约第三款申明，任何一方不得与他国结盟反对另一国，这与苏捷条约的第五款很相似。条约第五款的内容是关于经济和文化的，这几乎与苏捷条约的第四款完全一样。2月16日美国驻苏大使馆给国务院的报告也认为，除了第二款外，中苏条约与1948年苏联同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匈牙利的友

① 1950年3月20日苏共中央情报部关于中国对中苏条约反应的报告，SD11416。

② АВПРФ, ф.07, оп.23а, п.18, д.235, л.42-50; л.38-40.

③ 有些西方学者也接受了周恩来在条约中增加了“尽其所能”一词的说法，甚至对此做出了他们想象中的理由（Goncharov, Lewis, and Xue, *Uncertain Partner*, p.118），究其原因，恐怕就在于那时有关条约草案的俄国档案文献尚未披露。

好条约十分相似。[①] 显然，匆匆赶到莫斯科的周恩来是起草不出这样的文本的。[②]

那么，中国当事人的回忆或说法为什么会与俄国档案反映的情况完全相反呢？这里有两方面的原因。

从师哲和汪东兴的回忆看，他们显然是把条约与协定混淆在一起了。1945 年的中苏条约包含了有关旅顺、大连和中长路三个协定，[③] 而 1950 年苏联起草的条约，如前所说，在提交中方时已经删除了有关旅顺、大连和中长路的所有内容，另外分别搞了三个协定。中方代表团对这些协定很有意见，因而重新起草了一个协定（把有关这三项内容融为一体）。实际上，引起双方争议的是这个协定，而非条约本身。[④] 当时在中方代表团里，师哲担任翻译，汪东兴担任警卫，都没有直接参与条约和协定的起草，出现记忆混乱情有可原。而伍修权直接参与了谈判和起草文件，所以，他的回忆是比较可靠的——苏方提供了最初的条约文本，中方做了多处改动，但没有原则性的分歧意见。

从毛泽东和周恩来的电报看，说中方提供条约草案后，苏方基本没有改动，这也是实情，因为后来公布的条约就是这个文本。[⑤] 但是，毛泽东和周恩来在电报中只谈了事情的后半部分，而隐瞒了前半部分，即中方提供的草案实际上是以苏方的文本为基础的，并且没有做原则性修改。毛泽东和周恩来之所以这样做，恐怕是迫于当时的国际环境和国内情势。中共 1949 年 6 月宣布向苏联“一边倒”的政策后，在中国社会，特别是知识分子中引起不少非议。[⑥] 在毛泽东访苏前的一次会议上，一些民主党派领导人坚决反对这次出访，他们认为，按照中国传统，一向是外夷前来朝拜中国皇帝，而不是相反，还有人担心此行会使中国同西方的关系复杂化，从而失去这些国家可能提供的经济援助。[⑦] 这无疑是一种压力，迫使毛泽东要认真考

---

① 爱德温·马丁：《抉择与分歧：英美对共产党在中国胜利的反应》，姜中才等译，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 年，第 128–129 页。

② 周恩来 1 月 10 日离开北京，1 月 20 日到达莫斯科。期间，1 月 18 日与毛泽东通电话，毛泽东详细说明了会谈和活动的情况，以及对于条约内容的考虑。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 21、22 页；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 44–45 页。

③ 参见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 3 册，北京：三联书店，1962 年，第 1327–1338 页。

④ 详见沈志华、冈察洛夫：《〈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愿望和结果》。

⑤ 正式发表的文本见齐世荣主编：《当代世界史资料选辑》第一分册，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 年，第 518–523 页。

⑥ 详见张济顺：《中国知识分子的美国观（1943–1953）》，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 年，第 185–186 页。

⑦ *Ковалев* Диалог Сталина с Мао Цзэдуном, 1992, №1, с.88.

虑这次访问是否能达到预期的结果。[①] 毛泽东到达莫斯科后，这种压力仍在继续增加。据中共中央调查部给苏共中央的通报，国内很多人对斯大林没有亲自到车站迎接毛泽东表示惊讶和不满，因为在世界大战初期斯大林曾到火车站迎接日本外相。还有人认为，毛泽东亲自去苏联“有损于国家威信”，中国好像是苏联的一个“仆从国”。[②] 在中苏条约及有关协定公布以后，正如 1950 年 1 月 25 日美国驻上海领事马康卫给国务院发出的电报所说，社会上仍然到处流传着“夸大莫斯科要求毛泽东做出让步的谣言”。[③] 甚至苏联方面也收集到许多类似的情报，1950 年 3 月 20 日苏共中央情报部报告：在毛泽东访问莫斯科期间，“帝国主义国家的发言人和国民党特务分子广泛展开活动，千方百计地散布流言蜚语”。中苏条约公布后，敌对势力“又开始进行挑拨性的宣传，制造所谓的条约的‘秘密条文’、‘苏联吞并新疆和满洲’、‘中国向苏联输送士兵和粮食’、‘中国向苏联派遣 20 万名士兵和几百名飞行员去受训，以便在世界大战时使用’等等”。“类似的谣言在那些落后的居民中间广泛流传着。”[④] 试想，在如此背景下，一旦外界知道中苏新约是苏联事先起草好的而中方并没有做任何重要修改，将会给毛泽东和中共的形象带来多么巨大的损害。或许正是考虑到这种情况，毛泽东才在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特意强调：对中苏条约的问题要“保守机密”，“不许乱说乱动”。[⑤]

三、毛泽东对《补充协定》及合股公司持何种态度?

在有关中苏条约谈判研究中的另一个争议问题涉及到《补充协定》及四个中苏合股公司。在很多人的印象里，这两个问题的实质是表现出苏联的大国主义倾向以及对中国主权的干涉。

首先，对人们产生影响的是当事人的回忆。师哲回忆说，在 1 月 22 日中苏领导人会谈时，“斯大林还提出不允许第三国居民进入和在中国东北、新疆地区居留的问题。由于这个问题提得突然，谈话有些冷场。周总理随即反问道：‘东北住有

---

① 不少中共领导人对毛泽东访苏的结果不抱什么希望。在中国工作的意大利共产党员斯巴诺·维利尤曾向苏联使馆报告说，他在一次与薄一波的谈话中对毛泽东即将开始的莫斯科之行表示高兴，而薄一波却“严肃地指出，关于这次出行，他没看到有特别值得高兴的地方”。1949 年 12 月 13 日谢巴耶夫与斯巴诺谈话备忘录，АВПРФ, ф.100, оп.43, п.312, д.126, л.5-17。

② 1950 年 1 月 1 日中共中央调查部第 50 号通报，АВПРФ, ф.100, оп.43, п.305, д.32, л.1-6。

③ GR59, Decimal File1950-54, Folder661.93/1-2550, Box2949, The National Archives of USA.

④ 1950 年 3 月 20 日苏共中央情报部关于中国对中苏条约反应的报告，SD11416。

⑤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1 册，第 217 页。

很多朝鲜民族的居民，他们算不算第三国公民？更不用说外来的蒙古人了。’斯大林对这一反问措手不及，一时哑口无言。后来知道他们的本意是禁止美、日、英等帝国主义国家的人进入东北活动。在这个问题上出现不愉快的气氛，是因为苏方提出这个问题，干涉了我国的内政。”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不仅表现于此”，还表现在几个股份公司和两国互设领事馆的问题上，这“可以说苏方承袭了沙皇政府的老政策”。[①] 汪东兴回忆说，2 月 8 日毛泽东曾对他说过：“斯大林、罗斯福、丘吉尔在雅尔塔开会搞了个《雅尔塔协定》，他们对中国的新疆、东北很感兴趣，都想在世界上划分出自己的势力范围。”“在我们双方内部讨论时，他们说东北、新疆不许第三国人进入，我们说东北还有二十万朝鲜人，有的还没有加入中国籍，怎么办？他们又答不出来，他们还是想按《雅尔塔协定》办事。”[②] 作为当事人，苏联外交部官员卡皮察在 1992 年接受采访时说：斯大林想在满洲和新疆完全排除美国人的存在。补充协定的问题就是他首先提出来的。开始，斯大林希望协定有个更大的范围，但是最后范围被缩小，并且他允许条件是相互的。毛泽东对这个文件极其不满意。[③]

其次，对这个问题谈得更多，影响也更大的是毛泽东本人。尤金曾向莫斯科报告了 1956 年 3 月 31 日毛泽东同他谈话的内容：毛泽东告诉他，“在谈判时，按照斯大林的提议，他们试图让中长铁路归苏联独家拥有，但结果通过了共同经营的中长铁路的决定，此外，中国向苏联提供旅顺港海军基地，在中国开设四个合营公司。毛泽东说，按照斯大林的提议，满洲和新疆实际上变成了苏联的势力范围。斯大林坚持要求，这两个地区只允许中国人和苏联公民居住。其他外国的代表，包括长期居住在这两个地区的捷克人、波兰人和英国人，应该从那里迁移出去。斯大林唯一避而不谈的是朝鲜人，他们在东北有 150 万人。斯大林的这种贪婪令我们不能理解。”“这是一种很不光彩的做法，它鲜明地反映出斯大林对中国共产党的不信任和怀疑。”[④]1957 年 11 月毛泽东在莫斯科对哥穆尔卡谈到这个问题时说：中苏条约谈判期间，“我们也做了让步，同意中苏两国共同管理中长路，在新疆开了三个中

---

① 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第 446、447 页。师哲的记忆至少在日期上有误，因为 1 月 22 日的谈话记录中根本没有这些内容（АПРФ, ф.45, оп.1, д.329, л.29-38）。有人考证说这次谈话是在 2 月 10 日前进行的（海因茨希：《中苏走向同盟的艰难历程》，第 600 页），但这个说法也令人怀疑，因为如下文所述，苏方是在 2 月 10 日才向中方送交这个新协定草案的。

② 汪东兴：《汪东兴日记》，第 202 页。

③ Goncharov, Lewis, and Xue, *Uncertain Partner*, p.123.

④ ЦХСД, ф.5, оп.30, д.163, л.88-89//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1994, №5, с.105-106.

苏合营公司，把旅大给苏联做海军基地，他们可以驻军。斯大林还特别关照，不许外国人到东北和新疆。这些我们当时都忍下来，当时也没办法改变。”[①]1958 年 7 月 22 日毛泽东同尤金谈话时又提到：中苏条约谈判时，“在斯大林的压力下，搞了东北、新疆两处势力范围，四个合营企业。”[②] 以后，毛泽东的类似说法还有很多。[③]

最后，许多研究著作也都采用了大致相同的说法。由中国外交部人员编写并于 1988 年出版的《当代中国外交》提到，苏方企图把四个合营公司变成独立于中国主权之外的经济实体。[④]1994 年外交部编写的另一本书《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49—1956）》的说法是：在谈判期间，2 月 6 日发生了国民党集团的飞机袭击上海的事件，中方要求苏联提供空军保护。斯大林答应给予支援，但提出苏中要签订一个秘密协定。斯大林的目的无非是想在中国的东北和新疆搞两个势力范围。毛泽东不肯签订这个文件，但考虑到当时美、英等国都是敌视中国的西方国家，为照顾中苏团结的大局，只好让步，同意把它作为条约的《补充协定》。至此，斯大林表示要把东北的敌伪财产和北京的苏联财产由中方接收，苏联向中国提供空中保护。这就是周恩来后来所说的，两个势力范围交换两个东西。[⑤] 甚至很多西方学者也同意这种看法，如海因茨希在其专门讨论中苏条约谈判的著作中就认为，“这一协定是强加于中方的，它很可能导致中共领导人最为沉重和最不能忘怀的恼怒”，因为它“使人看到殖民思想的回潮，使人感到羞辱”。[⑥] 尽管也有学者根据新材料提出了不同看法，[⑦] 但直到最近出版的中国官方著作中，仍然坚持同样的说法。[⑧]

可以看出，上述说法的根据都是当事人后来的回忆，毛泽东所反复强调的，实际上也是他在 50 年代中期以后的感受。很多研究者的判断都是受此影响的。那么，当时发生的真实情况究竟如何呢？

对于中苏双方协商并签署这个《补充协定》的过程，档案文献中是有详细记载的。

---

① 吴冷西：《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 年，第 146–147 页。

② 中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 年，第 323 页。

③ 参见 Goncharov, Lewis, and Xue, *Uncertain Partner*, p.122。

④ 韩念龙主编：《当代中国外交》，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年，第 31 页。

⑤ 裴坚章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49–1956）》，第 25 页。未注明资料来源。

⑥ 海因茨希：《中苏走向同盟的艰难历程》，第 599 页。

⑦ 见沈志华、冈察洛夫：《〈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愿望和结果》；杨奎松：《中苏国家利益与民族感情的最初碰撞》。

⑧ 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 49 页。

维辛斯基在当时的一份报告中写到：

2月11日米高扬同志和我会见了周恩来。

周恩来告知，2月10日中国代表团收到了莫洛托夫转交的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在苏联远东地区和各中亚共和国的领土上以及在中国的满洲和新疆境内不得向外国人提供租让的协定草案。

毛泽东同志同意这个协定草案。只是在文字方面有以下几处不大的意见。比如，从汉语的角度来看，这个草案的标题必须这样表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关于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补充协定"。

协议草案第一段的结尾俄文是："协议如下"。按照中文必须写成："双方达成本补充协定"。

协议草案第二段俄文是："将不向外国人提供租让"。按照中文必须写成："将不向外国人提供租让权"。

我们回答，由于这些修改并没有使草案的意义和实质发生变化，大概不会遭到反对。①

作为附件，维辛斯基提交了中方的修改稿，并注明"划着重线的部分是周恩来修改的"，即"双方达成本补充协定"（договорились о настоящем дополнительном соглашении）和"租让权"（права на концессии）这两句。②

2月12日晨4时，罗申受葛罗米柯委托与周恩来进行了会晤，关于这次会晤的备忘录记载：

周恩来请我向苏联外交部长报告下列事情：

在关于不允许各外国公司和团体在满洲和新疆境内从事活动的协定中没有指明，应怎样对待目前在满洲和新疆境内的外国小商人以及在新疆南部的外国牧民（印度、巴基斯坦）。周恩来说："我们认为，我们将逐步采取旨在使在满洲和新疆的商人缩减经营活动的各种措施来排挤满洲和新疆的外国商人，可疑分子要迁移，被发现搞间谍活动的人要逮捕，对于其他人要利用税收和地方政权的其他措施进行斗争。新疆南部的牧民比较难对付，对这一类人我们要逐渐驱出。我请求苏方的代

① 1950年2月12日维辛斯基给斯大林的报告，АВПРФ, ф.07, оп.23а, п.18, д.234, л.64-69。

② АВПРФ, ф.07, оп.23а, п.18, д.235, л.135.

表考虑这个问题，并在与我们会面时谈谈自己对这一问题的意见。”[1]

上述文件表明，毛泽东在看到这个新协定后，并没有提出不同意见，只是将名称确定为“补充协定”，周恩来所做的两处修改也仅仅是文字性的。不仅如此，中方甚至进一步提出了如何执行这个协定的具体方法和措施。显然，对于斯大林提出的这个建议，毛泽东当时认为是有利于中共新政权对新疆这样边远地区的控制的。[2]

为了证明毛泽东当时对《补充协定》的不满，海因茨希还提出一条论据：由于斯大林和毛泽东都意识到这个协定“实际上具有不光彩传统的‘不平等条约’的性质”，所以他们“达成一致意见，保守协定的秘密”。[3]但笔者看到的档案文献提供的却是完全相反的证据。

在2月12日凌晨4时与罗申会晤时，周恩来提出，2月14日18时是签署文件最合适的日期。在这一时间签署已经准备好的文件，中方就可以在14日将简短的公报和文件等用无线电话通知北京，2月15日所有的中国报纸都能刊登出来。[4]周恩来在这里所说的“已经准备好的文件”，应该是包括《补充协定》在内的。

2月13日与维辛斯基会谈时，周恩来更明确地表达了中方的这个意见。据俄国档案记载：

周恩来说，根据他同毛泽东商议的意见，即将在莫斯科签字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联之间的所有协议都应公开发表。同时，周恩来补充说，贸易协定、航空线协定，以及在新疆加工石油和有色金属的协定不能签字，因为这些协定的文本有些尚需进一步协商和明确。

周恩来表示，即将在莫斯科签字的协定的中文本已寄给北京并将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汇报。而在签字的协定中有什么不能公布的，必须向政务院成员做专门的解释。周恩来强调说，按照我们的意见，公布所有签字的协定，无论是对中苏两国，还是对其他民主国家都是有利的，因为这可以更加提高他们在全世界的威信。

---

① 1950年2月12日罗申与周恩来的会谈备忘录，АВПРФ, ф.07, оп.23а, п.18, д.234, л.70-74。

② 1998年10月笔者曾就这个问题询问过当时在新疆工作的邓力群，据他讲，那时新疆刚刚解放，由于有很多印度人、巴基斯坦人和英美残余势力活动，麻烦不少。《补充协定》签字后，当局借此清理了大批外籍人员。

③ 海因茨希：《中苏走向同盟的艰难历程》，第602页。作者没有注明资料来源。

④ 1950年2月12日罗申与周恩来会谈备忘录，АВПРФ, ф.07, оп.23а, п.18, д.234, л.70-74。

我（指维辛斯基——引者）对周恩来说，尽管他表述的意见相当明确，然而双方并未就公布所有的协定和其他文件达成协议，公布这些文件或其他一些文件的问题必须加以讨论，这个问题我将向苏联政府汇报。我会立即将苏联政府的决定通知周恩来。①

这个情况进一步表明，在中国领导人看来，签署和公布包括《补充协定》在内的这些文件，根本谈不上是"屈辱"，是给苏联提供了"殖民地"，反而是中国求之不得的事情。但考虑到苏方对公布文件的不同意见，周恩来在当晚给北京的电报中称："苏方提议若干文件签字而不公布，我们则主张全部公布，究如何，待今晚决定电告。因此，今晚如已开过政府政协座谈会，则须补行声明，公布日期未定，暂勿外泄。如尚未开，最好改在明（14 日）晚开，以便确定是否全部公布后再做处理。"② 就在周恩来发出这封电报后不久，苏联方面送来了最后答复——《补充协定》不能公布。鉴于 2 月 14 日是条约签字的日期，且中方已经准备好了庆祝社论《中苏友好合作的新时代》，毛泽东于 14 日凌晨 5 时向北京发出了"限即刻到"的紧急电报。电报要求删除社论中一切涉及《补充协定》以及其他尚无法签字的协定的内容和文字，其中也包括对《补充协定》进行解释的一句话："补充协定乃是为了保障两国国防利益的一切必要措施，这项措施对于中苏两国说来都是有利的。"毛泽东还说明，进行这些删除的目的只是为了使"中苏双方所发表的条约及协定内容完全一致"。③

斯大林提出第三国势力不得进入东北和新疆的问题，确实有为苏联安全利益考虑的自私目的，加上苏联的远东和中亚两个地区作为陪衬，也只是为了使协定在形式上看来平等一些，因为早在战前苏联就已经在这两个地区清除异己势力了。④ 不过，这里要强调的是，毛泽东当时并不是从这个角度看问题的。

至于股份公司的问题，更不能说是苏联强加给中国的。苏联对于在中国开办合营股份公司的事的确很有兴趣，早在 1939 年 9 月苏联就与国民党政府共同组建了以哈密—阿拉木图为定期航线的中苏航空公司（有效期 10 年），1949 年又提出

---

① 1950 年 2 月 13 日维辛斯基与周恩来会谈备忘录，АВПРФ, ф.07, оп.23а, п.18, д.234, л.75-76。

② 周恩来致少奇同志并杨、李、乔木，1950 年 2 月 13 日。转引自杨奎松：《中苏国家利益与民族感情的最初碰撞》，第 115 页。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1 册，第 262–263 页。

④ 有关当时苏联移民的材料在俄国档案中已有详细披露，部分文件可参见沈志华执行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 12 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年。

要签订新疆金属和石油股份公司的协定。[1]到1950年初周恩来率代表团到达莫斯科之前，苏方已经起草了苏中航运股份公司、苏新金属公司、苏新石油公司的议定书及管理东北地区苏中合营股份公司的决议，正如周恩来所说，“苏联对经济合作颇感兴趣”。[2]这些都是事实，说明苏联从其经济利益出发，急于建立几个中苏合股公司。但同时必须看到，新中国领导人对于合股公司的事情同样是积极的。早在1949年2月米高扬秘密访问西柏坡时，中共中央书记任弼时就提到了苏中经济联合体和租让企业的问题。[3]1950年1月2日，刘少奇又致电正在莫斯科访问的毛泽东说：主政西北地区的彭德怀带来了苏联与国民党政府关于在新疆设立金属和石油两股份公司的协定草案，要求中央人民政府与苏联政府亦签订大体相同的协定草案，“以便利用苏联资本，开发新疆富源，发展新疆生产”。刘少奇认为此事可行，只是经营期限应从45年缩短为20或25年为宜，还提出不只在新疆，在中国其他地方也可能合办这种企业。刘少奇与在京领导人商议后建议毛泽东亲自向苏联提出这一要求。[4]应该说，中苏合办股份公司是双方的共同要求，也是对双方都有利的。关于新疆两个合股公司的协定草案，3月8日中共中央很顺利地就批准了，按毛泽东的话说，“只做了一些不大的技术性改动”。[5]

显然，关于股份公司问题，中共领导人当时的着眼点仅在于促进中国的经济发展，而没有估计到这会引起不良的社会后果。不过，毛泽东事后对这个问题改变了态度则很可能是考虑到了民众的情绪。当中苏关于新疆石油和有色金属两个合股公司协定的消息发布以后，不仅西方国家的报纸纷纷指责中苏石油和金属两公司协定是“苏联吞并新疆的行动”，是最卑劣的“经济帝国主义”行为，[6]而且在北京的学生当中也“引起了极大的波动”，他们“怀疑这两项协定是否要损害中国主权。许多青年团员提出质问，要求解释。甚至有骂苏联侵略、人民政府卖国者。并有要求

---

① 详见瞿韶华主编：《航空史料——中华民国交通史料（三）》，台北：“国史馆”，1991年，第358–363、377–384页；Donald Gillin and Ramon Myers (ed.), *Last Chance in Manchuria: The Diary of Chang Kia-ngau*,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Ледовский* На 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ой работе в Китае в 1942-1952гг., с.112.

② 1950年1月22日联共（布）中央关于中苏谈判的决议及附件，АВПРФ, ф.07, оп.23а, п.18, д.235, л.41-45；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下卷，第997页。

③ *Ледовский* Секретная миссия А. И. Микояна в Китай (январь-февраль 1949г.), 1995, №3, с.99-100.

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1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219–220页。

⑤ 1950年3月9日谢巴耶夫与毛泽东的会谈备忘录，АВПРФ, ф.0100, оп.43, п.302, д.10, л.84-85。

⑥ 新华社编：《内部参考》，1950年4月1日。

退团和向人民政府请愿者”。[①] 西方的指责自有其政治目的，而国内学生的骚动则是一种狭隘民族主义情绪的流露，现在看来，也是对利用外资等现代经济运行方式缺乏了解的表现。实际上，问题并不在于股份公司的形式，而要看协定的内容是否公平互利。中苏股份公司主要是指 1950 年 3 月 27 日签订协定的中苏金属公司、中苏石油公司和中苏民航公司，以及 1951 年 7 月 28 日签订协定的中苏造船公司。[②] 根据协定，中苏双方股份各占 50%，公司领导职务也是双方按期轮换，股份公司赢利的 20% 应作为税款交给中国政府，而苏联有权出口的 50% 产品还应向中国海关交纳关税。对比国民党政府时期的中长铁路协定、中苏航空公司协定以及苏联提出的中苏金属和石油公司的条款，在公司实际管理权和交纳关税等方面，有了很大改进。[③] 尽管从现在的观点看，苏联坚持平分股权和较长的期限 [④] 显然是出于对自身经济利益的考虑，但并没有损害中国主权的意图和表现。据参加股份公司谈判并担任文字翻译的伍修权回忆，会谈中双方都强调了真诚合作、平等互利以及平权合股的原则，“我国保持独立而不依赖，苏联尽力帮助而不剥削”。[⑤] 正因为如此，中苏双方当时才会一致决定公布有关股份公司的协定。

总之，毛泽东对《补充协定》和股份公司表示强烈不满，并反复向苏联人重提旧事，都是苏共二十大开始批评斯大林以后的事情。[⑥] 毛泽东的情绪的确能影响很多人，就连苏联外交部在 1959 年 9 月的一个报告中都承认，《补充协定》和建立苏中联合股份公司是“不利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最高权力和最高利益”的“消极因

① 中央关于中苏签订两合股公司协定后应注意反革命分子活动的指示，1950 年 3 月，福建省档案馆，全宗 101，目录 5，卷宗 5，第 5–6 页。正是了解到中国人的这种情绪，赫鲁晓夫在 1954 年 10 月访华前决定苏联退出四个合股公司。АВПРФ, ф.0100, оп.47, п.383, д.40, л.4-5, 10-19。

② 上述协定见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1949–1952）》基本建设投资和建筑业卷，北京：中国城市经济社会出版社，1989 年，第 88–97 页；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1949–1952）》工商体制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年，第 790–794 页。

③ 参见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 3 册，第 1331–1333 页；薛衔天编：《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45–1949）》，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 年，第 390–394、404–405、412–427 页。

④ 石油、金属公司 30 年，造船公司 25 年，民航公司 10 年，均超过中方最初设想的合作年限。

⑤ 伍修权：《回忆与怀念》，第 247–248 页。

⑥ 由于毛泽东多次向苏联表示不满，1954 年 10 月赫鲁晓夫访华时提出了将合股公司的苏方股份转让给中国的建议，并向中国领导人流露了苏方可以考虑放弃《补充协定》的想法。1956 年 5 月 10 日，苏联政府正式照会中国政府，认为该《补充协定》已不符合苏中之间现有的友好关系精神，建议加以废除。5 月 29 日，中国复照表示同意。参见沈志华：《赫鲁晓夫与苏联归还旅顺基地》，《党史研究资料》2002 年第 9 期；裴坚章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49–1956）》，第 39 页。

素”。[①] 所以，当事人的回忆和学者的判断受到毛泽东后来这些说法的影响就不足为奇了。

最后，谈到冷战史研究中的史料运用问题，笔者想要强调的是：第一，对口述史料（包括回忆录、采访录）的利用必须慎重，由于敌对双方浓厚的意识形态背景，这一点在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尤其显得重要。而欲弥补口述史料的舛误，最好的办法是找到相应的档案文献，以便鉴别和相互印证；第二，鉴于上述同样的原因，在冷战史研究中，目前国际学界强调的是利用双边或多边档案，如此才有比较，才易于辨别；第三，历史研究既不能离开档案，也不能迷信档案，因为研究者看到的档案文献的内容，都是文献的作者希望人们接受的其本人当时的看法，而这未必就是事实。所以，积极寻找档案文献固然不可忽视，但更重要的工作是研究和解读已经获得的档案文献；第四，由于新史料的不断出现，人们对于过去的认识是不断深化的，研究者的描述也是逐步接近历史本来面目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历史（研究）没有终点。

发表于《史学月刊》2004 年第 8 期

① 1959 年 9 月 15 日齐米亚宁关于中国状况和苏中关系给外交部的报告，转引自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 Issues6-7, Winter 1995/1996, p.178。

中苏同盟条约后期谈判的情况及结果

1950 年 2 月 14 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标志着新中国正式加入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然而，中苏之间历经两个月的外交谈判并非一帆风顺。随着俄国和中国相关档案的解密，学者们对这一历史过程的研究也不断深入。[①] 除前期毛泽东与斯大林之间的外交试探，中苏同盟条约谈判本身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 12 月 16 日毛泽东到达莫斯科至年底，其结果，斯大林不得不做出让步，同意废除 1945 年的条约而重新签约；第二阶段大致从 1 月初苏方开始准备条约及各种协定草案至 1 月底周恩来与米高扬就条约和主要协定达成一致意见，其结果是斯大林再次做出让步，不得不同意中方关于中国长春铁路、大连港和旅顺港协定的方案。由于美国分裂中苏策略的公开表露以及中国领导人毫不退让的强硬态度，苏联被迫接受了中国的主张，这大概是斯大林和所有苏联外交官都始料未及的。第三阶段的谈判，除“补充协定”外，主要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离开莫斯科之后进行，虽然初步接触此前已经在下层官员中开始。

在直到 4 月才结束的第三阶段谈判中，为了弥补损失，苏联方面采取了两项措施，一是提出了要签订一个补充协定，一是在具体协定的谈判中斤斤计较，迫使中

① 比较突出的研究成果见迪特·海因茨希：《中苏走向同盟的艰难历程》，张文武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 年。杨奎松：《20 世纪三个中苏条约形成经过之回顾与比较》，《俄罗斯研究》2001 年第 3 期，第 16–20 页；杨奎松：《中苏国家利益与民族感情的最初碰撞——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为背景》，《历史研究》2001 年第 6 期，第 103–119 页。笔者的研究见沈志华、冈察洛夫：《〈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愿望和结果——根据俄国解密的档案材料》，《中共党史研究》1998 年第 2 期，第 39–43 页，第 3 期，第 46–70 页；沈志华：《中苏条约谈判中的利益冲突及其解决》，《历史研究》2001 年第 2 期，第 39–55 页；沈志华：《关于中苏条约谈判研究中的几个争议问题——再谈冷战史研究中史料的解读与利用》，《史学月刊》2004 年第 8 期，第 57–68 页。

方接受了苏方的条款。后者主要体现在几个股份公司协定、专家协定和贸易协定中确定人民币和卢布汇率等问题上。关于中苏条约谈判前两个阶段的情况，学者已经进行了较多的研究和讨论，而关于后期谈判的情况，人们还缺乏了解。[①] 本文依据目前可以看到的中俄双方的史料，对第三阶段谈判的主要问题进行梳理，以使人们了解中苏条约谈判的全貌，并准确地把握其意义。

一、关于苏军使用中长路问题

1950 年 1 月 28 日苏方交给师哲的关于中长路、旅顺和大连协定的修改稿已经很接近中方的草案文本了。不过，为了弥补损失，苏方在同时提交的该协定的议定书中又增加了三条：对于苏联运入、调出旅顺口的物资和原料免征一切税收；上述物资和原料免受中国海关检查；苏联军队和军用物资可以沿中长铁路自由调运，其运费按中国军队调运的现行价格计算。[②]

1 月 31 日，中方又提出了根据苏方草案相应修改的关于旅顺口、大连和中长铁路协定及议定书草案。对于协定本身，中方几乎没做改动，但在议定书中，针对苏军沿中长铁路调运的问题，中方提出增加一项条款，即中国的军队和军用物资也可以自由地沿苏联境内的铁路调运。[③] 中国提此要求，显然是考虑到外交对等问题，而苏方对此却感到无法再容忍了。

1 月 31 日至 2 月 2 日，米高扬、维辛斯基与周恩来连续进行了三天会谈，会谈涉及到中苏双方提出的所有问题。维辛斯基关于会谈情况给斯大林的报告显示，中苏双方在议定书有关苏联军队使用中长铁路的问题上发生了激烈争执。对于中方提出的增加中国军队和军用物资沿苏联铁路调运的条款，苏方表示坚决反对。一方面，作为让步，苏方在修改议定书时根据中方的愿望对第一条做了改动，规定只有在远东地区出现针对苏联的战争威胁的情况下，才能沿中长铁路调动部队。但另一方面，苏方认为中国军队从满洲沿苏联铁路向新疆调动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和合理

① 对中苏谈判过程进行最为详尽研究的当属德国学者海因茨希的专著《中苏走向同盟的艰难历程》，但其中很多结论笔者不能认同。

② 苏方对中方的旅顺口、大连和中长铁路协定及议定书修改后的定稿，1950 年 1 月 28 日，АВПРФ, ф.07, оп.23а, п.248, д.20, л.74-79。根据中国文献，1 月 27 日周恩来与米高扬曾就大连问题进行了协商。苏联进一步了解了中方的意图。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 2 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 年，第 56–57 页。

③ 中方针对苏方关于旅顺口、大连和中长铁路协定及议定书修改稿提出的文本，1950 年 1 月 31 日，АВПРФ, ф.07, оп.23а, п.234, д.18, л.17-22。

性，中方的建议实质上是对苏联建议的“反提案”，是“隐讳地反对苏联这一建议的一种特殊方式”，因此“没有任何必要，也绝对不会被接受”。周恩来对此做了详细的解释，说明中方提出这一条款是因为苏方首先提出了这个问题，并坚持必须在议定书中列入这一条款。米高扬随即指出，如果这样，那么就取消苏方的这一建议，而把议定书中已经缩短的中长铁路协定有效期再保留十年。显然，苏方是在以取消已经形成的谈判结果相要挟。周恩来无法再表示反对，但提出要向毛泽东报告。在第二天的会谈中，周恩来接受了苏方的条款，只是要求苏联口头承诺，在必要的情况下，中国可以沿西伯利亚铁路调运军队。米高扬对此表示可以接受，但是再次对中方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表示惊讶。他气愤地说:“作为同盟者，苏联无偿地转让了巨额财产，包括中长铁路、大连、旅顺口以及在这些地区我们拥有的一切权利，而中国却连苏联在一条铁路上调动军队都不愿意同意。如果连这样的让步中方都不能做出，那我们还算什么同盟者呢？”[①]

周恩来没有再发表不同意见，不仅如此，在中长路的产权界定方面，中方也采取了妥协方针。关于中长路的产权界定，周恩来在莫斯科时并未完全谈妥，商定由科瓦廖夫与高岗在东北具体协商，再上报决定。不过，中方提出，对于1905年以后日本满铁会社开发的产业，虽在1945年曾确认为中长路产权范围内，但后来国民政府已经收回，如现在新政府“全部承认，将难于向人民解释”。苏联表示可以重新审定。离开莫斯科的前一天（2月16日)，周恩来在给高岗的电报中指示：应该看到，把某些产业并入中长路，有利其发展，故可以考虑“采取妥协办法，拨出一部归入中长路产业”。[②]

二、关于补充协定

对于这个问题，毛泽东在苏共二十大以后曾多次在党内会议或会见苏联大使和外国领导人时指出，这一协定是在斯大林的压力下签订的，是苏联在东北、新疆搞

---

① 维辛斯基给斯大林的报告，1950年2月1日、2日、3日，АВПРФ, ф.07, оп.23а, п.234, д.18, л.8-13, 29-34, 50-55。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2册，第110–111页。

的两处势力范围。这说明斯大林很贪婪，而且对中共不信任。[①] 因此，在很多人的印象中，补充协定表现出苏联的大国主义倾向以及对中国主权的干涉，毛泽东本来不肯签订这个文件，是为了照顾中苏团结大局，被迫做出让步的。[②] 实际上，毛泽东所反复强调的，主要不是当时的情况，而是他几年之后的感受。可以看出，毛的说法对当事人写回忆录和研究者做出判断都产生了深刻影响。但是，从实际情况看，这些说法都有些言过其实。

据汪东兴日记记载，2 月 8 日毛泽东对他说："斯大林、罗斯福、丘吉尔在雅尔塔开会搞了个《雅尔塔协定》，他们对中国的新疆、东北很感兴趣，都想在世界上划分出自己的势力范围。""在我们双方内部讨论时，他们说东北、新疆不许第三国人进入，我们说东北还有二十万朝鲜人，有的还没有加入中国籍，怎么办？他们又答不出来，他们还是想按《雅尔塔协定》办事。"[③] 另一位苏联当事人贾丕才在 1992 年接受采访时说：斯大林想在满洲和新疆完全排除美国人的存在，于是提出了补充协定的问题。开始，斯大林希望协定有个更大的范围，但是最后范围被缩小，并且允许条件是对等的。毛泽东对这个文件很不满意。[④] 由于没有看到这次会谈的文献，研究者目前还无法了解这一问题提出和前期商讨的全面情况。不过，从当事人的记载和回忆可以初步判断：1. 考虑到毛泽东在 2 月 5 日电报中认为中苏条约的基本问题已经谈妥，这个问题应该是苏联人在 2 月 6 日或 7 日的谈判中提出的。[⑤] 2. 斯大林的主要目的是防止美国势力进入东北和新疆。这完全符合苏联战后在东亚的战略意图，特别是在已经确定中国即将收回苏联在东北的一切特权之后。

---

① 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1958 年 3 月，转引自费正清、麦克法夸尔主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王建朗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年，第 287–288 页；*Кулик* Китайская Народная Республика в период становления (1949-1952гг.), 1994, №5, c.105-106；吴冷西：《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 年，第 146–147 页；中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 年，第 323 页。另参见 Sergei N. Goncharov, John W. Lewis, and Xue Litai, *Uncertain Partner: Stalin, Mao, and the Korean War*,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122。

② 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李海文整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 年，第 446 页；裴坚章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49–1956）》，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 年，第 25 页；海因茨希：《中苏走向同盟的艰难历程》，第 599 页；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 年，第 49 页。

③ 汪东兴：《汪东兴日记》，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年，第 202 页。

④ Goncharov, Lewis, and Xue, *Uncertain Partner*, p.123.

⑤ 毛泽东致刘少奇电，1950 年 2 月 5 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 2 册，第 68–69 页。师哲回忆说，这个问题是在 1 月 22 日的会谈中提出的（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第 446 页）。但查阅当天的谈话记录（俄国档案），根本没有这些内容（АПРФ, ф.45, оп.1, д.329, л.29-38）。

3. 毛泽东对此感到不满，主要是认为苏联还是在按雅尔塔协定办事。4. 为了让中国人能够接受这项提议，苏联加上了对等的条件。

于是，2 月 10 日，中国代表团收到莫洛托夫转交的一个新协定草案，其中规定在苏联远东地区和各中亚共和国的领土上以及在中国的满洲和新疆境内不得向外国人提供租让。2 月 11 日，周恩来与米高扬和维辛斯基举行会谈。周恩来告知，毛泽东同意这个协定草案，只是在文字方面有以下几处不大的意见。第一，这个草案的标题应改为关于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补充协定”；第二，“协议如下”一句，按照中文应写成：“双方达成本补充协定”；第三，“将不向外国人提供租让”一句，按照中文应写成：“将不向外国人提供租让权”。苏方认为，这些修改并没有改变草案本意，表示接受。作为附件，维辛斯基提交了中方的修改稿，并注明“划着重线的部分是周恩来修改的”，即“双方达成本补充协定”（договорились о настоящем дополнительном соглашении）和“租让权”（права на концессии）这两句。[①]

2 月 12 日晨 4 时，苏联大使罗申受葛罗米柯委托与周恩来进行了会晤。谈到补充协定，周恩来请罗申转告苏联外交部长：在协定中没有指明，应怎样对待目前在满洲和新疆境内的外国小商人以及在新疆南部的外国牧民（印度、巴基斯坦）。周恩来说：“我们认为，我们将逐步采取旨在使在满洲和新疆的商人缩减经营活动的各种措施来排挤满洲和新疆的外国商人，可疑分子要迁移，被发现搞间谍活动的人要逮捕，对于其他人要利用税收和地方政权的其他措施进行斗争。新疆南部的牧民比较难对付，对这一类人我们要逐渐驱出。我请求苏方的代表考虑这个问题，并在与我们会面时谈谈自己对这一问题的意见。”[②] 随后，2 月 14 日，双方签署了这个《补充协定》。[③]

上述史料表明，尽管开始对苏联人提出这个问题有些不满，但毛泽东在看到协定草案后，并没有提出不同意见，只是将名称确定为“补充协定”，周恩来所做的两处修改也仅仅是文字性的。不但如此，中方甚至进一步提出了如何执行这个协定

① 维辛斯基给斯大林的报告（含附件），1950 年 2 月 12 日，АВПРФ, ф.07, оп.23а, п.234, д.18, л.64-69。

② 罗申与周恩来的会谈备忘录，1950 年 2 月 12 日，АВПРФ, ф.07, оп.23а, п.234, д.18, л.70-74。

③ 这个补充协定的全文（АПРФ, ф.45, оп.1, д.334, л.53），首次发表在俄国档案文集中，见 *Ледовский*, *Мировицкая*, *Мясников* (сост.)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XX веке,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Т. V, К. 2, Москва: Памятники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мысли, 2005, с.290-293。中国的文本最近也已经发表，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 2 册，第 78–79 页。

的具体方法和措施。显然，对于斯大林提出的这个建议，毛泽东当时认为是有利于中共新政权对新疆这样边远地区的控制的。[①]接下来的两次会谈内容也表明，中方当时并没有认为这个补充协定有侵犯中国主权的含义。有学者认为，由于斯大林和毛泽东都意识到这个协定"实际上具有不光彩传统的'不平等条约'的性质"，所以他们"达成一致意见，保守协定的秘密"。[②]但档案文献提供的却是完全相反的证据。

在2月12日凌晨4时与罗申会晤时，周恩来提出，2月14日18时是签署文件最合适的日期。在这一时间签署已经准备好的文件，中方就可以在14日将简短的公报和文件等用无线电话通知北京，2月15日所有的中国报纸都能刊登出来。[③]周恩来在这里所说的"已经准备好的文件"，当然包括《补充协定》在内。2月13日与维辛斯基会谈时，周恩来更明确地表达了中方的这个意见。周恩来说，根据他同毛泽东商议的意见，即将在莫斯科签字的中苏之间的所有协议都应公开发表。贸易协定、航空线协定，以及在新疆加工石油和有色金属的协定尚不能签字，因为这些协定的文本还需要进一步协商和明确。周恩来表示，即将在莫斯科签字的协定的中文本已寄给北京并将向政务院汇报。而在签字的协定中有什么不能公布的，必须向政务院成员做专门的解释。周恩来强调说，按照中方的意见，公布所有签字的协定，无论是对中苏两国，还是对其他民主国家都是有利的，因为这可以更加提高它们在全世界的威信。维辛斯基说，双方并未就公布所有的协定和其他文件达成协议，对此还必须加以讨论，他向苏联政府汇报后，会立即将苏联政府的决定通知中方。[④]

这个情况进一步表明，在中国领导人看来，签署和公布包括《补充协定》在内的这些文件，根本谈不上是"屈辱"，是给苏联提供了"殖民地"，反而是有利于表明中国革命立场的事情。但考虑到苏方对公布文件的不同意见，周恩来在当日17时给北京的电报中称："苏方提议若干文件签字不公布，我们则主张全部公布，究如何，待今晚决定电告。因此，今晚如已开过政府政协座谈会，则须补行声明，公布日期未定，暂勿外泄。如尚未开，最好改在明（14日）晚开，以便确定是否全

① 1998年10月笔者曾就这个问题询问过当时在新疆工作的邓力群，据他讲，那时新疆刚刚解放，由于有很多印度人、巴基斯坦人和英美残余势力活动，麻烦不少。《补充协定》签字后，当局借此清理了大批外籍人员。

② 海因茨希：《中苏走向同盟的艰难历程》，第602页。作者没有注明资料来源。

③ 罗申与周恩来会谈备忘录，1950年2月12日，АВПРФ, ф.07, оп.23а, п.234, д.18, л.70-74。

④ 维辛斯基与周恩来会谈备忘录，1950年2月13日，АВПРФ, ф.07, оп.23а, п.234, д.18, л.75-76。

部公布后再做处理。”[①] 就在周恩来发出这封电报后不久，苏联方面送来了最后答复——《补充协定》不能公布。鉴于中方已经准备好了庆祝社论《中苏友好合作的新时代》，毛泽东于 14 日凌晨 5 时向北京发出了“限即刻到”的紧急电报。电报要求删除社论中一切涉及《补充协定》以及其他尚无法签字的协定的内容和文字，其中也包括对《补充协定》进行解释的一句话：“补充协定乃是为了保障两国国防利益的一切必要措施，这项措施对于中苏两国说来都是有利的。”毛泽东还说明，进行这些删除的目的只是为了使“中苏双方所发表的条约及协定内容完全一致”。[②] 一个小时后，周恩来又致电刘少奇等告知，已同苏联政府商定，莫斯科时间 14 日 19 时 30 分（北京时间 24 时 30 分）在克里姆林宫签字，但发表的文件，除公报外，只有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及贷款协定。显然是因苏方的提醒，周恩来还特意叮嘱刘少奇，“尤其是关于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补充协定，暂勿向任何人提及”。[③]

斯大林提出第三国势力不得进入东北和新疆的问题，确实是出于苏联安全和经济利益的单方面考虑，在协定中加上苏联的远东和中亚两个地区作为陪衬，也只是为了使协定在形式上看来平等一些，因为这个问题对苏方并不存在——早在战前苏联就已经在这两个地区清除异己势力了。[④] 不过，这里要强调的是，毛泽东虽然对苏联提出问题的方式不满，但认为这种做法对保障中国国防还是一项有利措施，所以当时并没有表示反对。

三、关于股份公司问题

这在当时是一个极为引人注目，甚至引起社会波动的问题。关于石油、有色金属和航空合股公司协定的消息发布以后，立即引起台湾和西方的注意。蒋介石的“外交部长”叶公超指责中共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协定，美英则认为协定是中共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 2 册，第 73 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1 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 年，第 262–263 页。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 2 册，第 74–76 页。

④ 有关当时苏联移民的材料在俄国档案中已有详细披露，部分文件可参见沈志华执行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年）第 12 卷的相关专题。

"让步的结果"，是"苏联吞并新疆的行动"，是"最卑劣的经济帝国主义"。[①]与此同时，在北京的学生当中也"引起了极大的波动"，他们"怀疑这两项协定是否要损害中国主权。许多青年团员提出质问，要求解释。甚至有骂苏联侵略、人民政府卖国者"。有人要求退团，还有人提出向人民政府请愿。以至中共中央不得不紧急布置各单位做解释工作。[②]正是因为有这样一个背景，后来毛泽东多次谈到这些合股公司是在斯大林的压力下搞起来的。[③]其结果，给后人留下的印象，似乎开办合股公司是苏联强加给中国的，甚至有人认为苏联企图把四个合营公司变成独立于中国主权之外的经济实体。[④]这种说法也不符合历史事实。[⑤]

中苏股份公司主要是指根据 1950 年 3 月 27 日协定成立的中苏金属公司、石油公司和航空公司，以及根据 1951 年 7 月 28 日协定成立的中苏造船公司。从这些股份公司建立的过程看，不能说只是苏联对此感兴趣，而是双方都有需要，甚至中方更为积极。

航空公司的问题比较简单。1939 年 9 月 9 日苏联与国民党政府就共同组建了以哈密—阿拉木图为定期航线的中苏航空公司（有效期 10 年）。在合同即将期满时，1948 年 7—10 月，在中方的建议下，苏联与国民政府商定于 1949 年 2 月谈判续约问题。[⑥]后来时局变化对国民党不利，很多立法委员及交通部官员对苏联坚持要将航线延至兰州的企图颇有非议，认为这条航线每每被苏联人利用搞情报工作，且对中国没有经济意义。因此，谈判开始后，外交部和交通部官员对签约均无兴

---

① 新华社编：《内部参考》1950 年 4 月 1 日，第 1–5 页。《内部参考》1949 年创刊，当时只供中共高级干部阅读，现已成为史料，在一些海外图书馆即可看到，笔者就是在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查阅的相关资料。

② 中央关于中苏签订两合股公司协定后应注意反革命分子活动的指示，1950 年 3 月，福建省档案馆，101/5/5；中央关于向群众解释中苏合办股份公司问题的电报，1950 年 3 月 30 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 1 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 年，第 615–617 页。正是了解到中国人的这种情绪，赫鲁晓夫在 1954 年 10 月访华前决定苏联退出四个合股公司。详见沈志华：《苏联专家在中国》（修订版），北京：新华出版社，2009 年，第 132–141 页。

③ 罗申与毛泽东谈话记录，1956 年 3 月 31 日，АВПРФ, ф.0100, оп.49, п.401, д.9, л.87-98；吴冷西：《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第 146–147 页；中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第 323 页；Goncharov, Lewis, and Xue, *Uncertain Partner*, p.122。

④ 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第 447 页；韩念龙主编：《当代中国外交》，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年，第 31 页。

⑤ 葛罗米柯回忆说，中国不愿意在股份公司问题上与苏联合作，斯大林对此反应十分强烈，恐怕也属不实之词。见安·葛罗米柯：《永志不忘——葛罗米柯回忆录》下卷，伊吾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 年，第 164–165 页。

⑥ 罗申给王世杰的照会，1948 年 8 月 31 日，АВПРФ, ф.0100, оп.41, п.279, л.49（原文如此，疑馆藏号有误——笔者）；刘师舜致罗申函，1948 年 10 月 9 日，АВПРФ, ф.0100, оп.35а, п.150, д.4, л.113-114,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T. V, K. 1, c.460-461, 466-467。

趣，一直互相推诿，拖延不办。直到解放军占领南京后，国民政府想到在危急中保证西北地区的稳定，不得不对苏联让步，才对谈判积极起来。西北军政长官张治中确定的谈判底线是绝不能将航线延至兰州，其余均可对苏方意见采取弹性态度。5月25日中苏双方在迪化草签了航空公司协定（5月31日换文），除有效期限确定为5年外，续约内容与1939年所签旧约一致，实际垄断权完全为苏方掌握。这是国民政府迁往台湾之前所签订的最后一个正式对外协定。[①]

关于金属和石油公司，早在1946年11月，即苏联帮助调解新疆伊宁事件时，张治中就向苏联驻乌鲁木齐总领事转达了中国政府希望恢复苏联与新疆之间贸易和经济合作的建议。在经济合作方面，中方建议在新疆组建一个合资股份公司，在双方权益均等的原则下进行锡、钨及石油的勘探和开采。规定公司的董事长由中方指派，而执行经理由苏方派人担任。苏联外贸部认为可以将这一建议作为谈判的基础，并于1947年4月将苏方的提案准备就绪。但是，苏联外交部认为此时进行谈判不合适。中国政府因新疆的经济困难，几番催促苏方就经济合作问题举行谈判。到1948年底，苏联外贸部认为不应再推迟谈判，以免错过良机。在经济合作方面，外贸部同意按照中方的提议，在权益均等的原则下组建苏中股份公司，但提出这个公司不仅在新疆全部地区拥有锡、钨等有色金属及石油的勘测和开采权，还要拥有勘测和开采稀有金属的权利。[②] 苏联外交部仍认为在目前中国的局势下开始谈判，"可能会被理解为在政治上支持南京政府"。[③] 最后，经苏联部长会议讨论决定，关于中苏在新疆地区进行经济合作的谈判于1949年1月24日在乌鲁木齐开始。苏联代表是驻乌鲁木齐总领事萨维利耶夫和商务代表伊夫琴科夫，中方的主要谈判人是外交部全权代表刘泽荣。然而，谈判进行得十分艰苦。从目前看到的俄国档案文献，最后一次关于协议草案的谈判是1949年6月8日。此前双方关于股份公司已经达成的协议内容为：期限25年；苏联人担任总经理，中国人担任总稽核长；石

① 参见林孝庭：《危局中的外交：中、苏两国有关新疆航空与贸易谈判初探（1948–1949）》，《近代中国》（台北）第157期，2004年6月，第114–116页；瞿韶华主编：《航空史料——中华民国交通史料（三）》，台北："国史馆"，1991年，第358–363、377–384页；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T. V, K. 2, c.529。

② 米高扬给斯大林的报告，1948年12月7日，АВПРФ, ф.0100, оп.41, п.278, д.58, л.8-11,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T. V, K. 1, c.486-488。

③ 费德林给葛罗米柯的报告，1948年12月17日，АВПРФ, ф.0100, оп.41, п.278, д.58, л.12,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T. V, K. 1, c.491。

油公司董事长由苏方任命，金属公司董事长由中方任命。[①] 此时，主持西北工作的张治中因和谈宣告破裂已决定留在北平，代理西北军政长官的青海省主席马步芳建议授权新疆省政府独自完成与苏方的谈判，并应采取弹性态度。6 月 25 日行政院长阎锡山指示马步芳及刘泽荣等人继续谈判，可以争取对新疆最为有利的“贸易通商”问题，先行与苏联政府达成协议。7 月 15 日重开谈判以后，鉴于中国局势危急，为了尽快达成协议，苏联一再表示让步，如同意对进出口货物品种加以限制、让中国政府保有金、银和白金的完全开采权、将和约期限从 50 年缩短为 45 年等。但 8 月中旬西北战事有了急剧变化，解放军相继攻占陇西、兰州，新疆的和平起义也在酝酿当中，加之蒋介石以其影响施加的压力，国民政府对于以中苏经贸协定换取西北稳定的可能性已不抱幻想。8 月 15 日，行政院决议无限期搁置中苏有关新疆经贸协定。[②]

中共占领新疆以后，同样面临着极大的经济问题，也同样希望苏联给予帮助。毛泽东在莫斯科接到了彭德怀 12 月 29 日从北京发出的电报。彭德怀讲述了新疆经济困难的局面，提出“必须借助苏联的帮助来解决”，“尽快建立新疆与苏联之间的正常贸易”。关于中苏石油公司和金属公司，彭德怀指出，张治中在新疆时已经起草了协议草案，为了发挥这两个公司的作用，他“非常希望”立即与苏联进行谈判。同时，彭还谈到，中苏航空公司的航线必须从哈密延长到兰州、西安和北京。[③] 几天后，新疆省负责人包尔汉和王震也致电周恩来，强调新疆地区的经济困难，希望尽快开始与苏联的贸易和经济往来。[④] 1950 年 1 月 2 日，刘少奇又致电毛泽东说：彭德怀带来了苏联与国民政府关于在新疆设立金属和石油两股份公司的协定草案，要求中央人民政府与苏联政府亦签订大体相同的协定草案，“以便利用苏联资本，开发新疆富源，发展新疆生产”。刘少奇认为此事可行，只是经营期限应从 45 年缩短为 20 或 25 年为宜，还提出不只在新疆，在中国其他地方也可能合

① 详细的谈判过程见 АВПРФ, ф.0100, оп.42, п.288, д.22, л.55-60, 63-64, 105-107, 93-94, 126-129,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T. V, K. 2, c.93-95, 97, 102-103, 114, 138-140。

② 林孝庭：《危局中的外交：中、苏两国有关新疆航空与贸易谈判初探（1948–1949）》，第 119–122 页。

③ 彭德怀给毛泽东的报告，1949 年 12 月 29 日，АПРФ, ф.45, оп.1, д.334, л.4-6,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T. V, K. 2, c.252-253。此前，中苏在乌鲁木齐已经就新疆贸易问题达成初步协议，按照苏联外交部的看法，这个草案与 1949 年 5 月 31 日苏联部长会议批准的交给刘泽荣的草案“几乎一模一样”。库尔久科夫致维辛斯基的报告，1949 年 12 月 24 日，АВПРФ, ф.0100, оп.42, п.290, д.48, л.55, 51-54,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T. V, K. 2, c.243-244。

④ 包尔汉和王震致周恩来电，1950 年 1 月 5 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馆，175/2/112。

办这种企业。刘少奇与在京领导人商议后建议毛泽东亲自向苏联提出这一要求。[①]

其实，苏联从其经济利益出发，也是急于要开展与新疆的经济合作。[②] 因此，在周恩来率代表团到达莫斯科之前，苏方已经起草了苏中航空公司、金属公司、石油公司的议定书及管理东北地区苏中合营股份公司的决议。[③] 正如周恩来所说，"苏联对经济合作颇感兴趣"。[④] 在中苏谈判期间，有关这三个股份公司的协商没有发生严重分歧。在毛泽东和周恩来回国前，刘亚楼与葛罗米柯已经就航空协定初步签字，石油和金属公司协定的原则也已经商妥，王稼祥和赛福鼎正在与苏方讨论细节。[⑤] 3 月 8 日，中共中央顺利地批准了三个合股公司的协定，按毛泽东的话说，"只做了一些不大的技术性改动"。[⑥] 从协定的具体内容看，原则上与苏联同国民党政府商定的草案没有什么区别，只是合作年限有所延长。[⑦] 根据协定，中苏双方股份各占 50%，在公司担任的领导职务定期轮换，股份公司赢利的 20% 应作为税款交给中国政府，而苏联有权出口的 50% 产品还应向中国海关交纳关税。[⑧] 对比国民党政府时期的中东铁路协定及其他股份公司协定或草案，在公司实际管理权和交纳关税等方面，均有了很大改进。而且还规定珍贵金属如黄金、银、铂等不在开采

---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 1 册，第 219–220 页。

② *Ледовский* На 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ой работе в Китае в 1942-1952гг., с.112.

③ 联共（布）中央关于中苏谈判的决议及附件，1950 年 1 月 22 日，АВПРФ, ф.07, оп.23а, п.235, д.18, л.41-45。

④ 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年，第 997 页。

⑤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 2 册，第 76、122–123 页。从目前可以看到的材料，在航空协定谈判中，中苏双方曾发生过一些不大的争执：中方希望公司按照流动资产纳税，苏方坚持只能按利润纳税，而且不得高于 20%。此外，中方要求协定中的中国城市名称应按中文的称谓来写，而不是按现有的国际称谓写，如沈阳（Mukden）、张家口（Kalgan）、伊宁（Kulja）、迪化（Urumchi）等。参见海因茨希：《中苏走向同盟的艰难历程》，第 648 页。

⑥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 2 册，第 143–144 页；谢巴耶夫与毛泽东的会谈备忘录，1950 年 3 月 9 日，АВПРФ, ф.0100, оп.43, п.302, д.10, л.84-85。

⑦ 石油、金属公司协定 30 年，航空公司协定 10 年。中苏造船股份公司原定也是经营 30 年，1951 年 6 月 2 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接受苏联外交部的建议，同意中国的意见，缩减为 25 年。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 82 号记录摘要，1951 年 6 月 2 日，РЦХИДНИ, ф.17, оп.3, д.1089, л.30。1950 年 5 月，双方又分别商定了三个股份公司的章程。详见 РЦХИДНИ, ф.17, оп.3, д.1081, л.31-32, 116-126, 127-138, 139-152。

⑧ 上述协定中文本见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1949–1952）》基本建设投资和建筑业卷，北京：中国城市经济社会出版社，1989 年，第 88–97 页；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1949–1952）》工商体制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年，第 790–794 页。俄文本见 РЦХИДНИ, ф.17, оп.3, д.1080, л.213-240。

范围内。[①] 当然，苏联方面坚持平分股权和较长的期限，显然是出于对自身经济利益的考虑，但并没有损害中国主权的意图和表现，而中方为了尽快签约，也只能让步。总体说来，据参加谈判并担任文字翻译的伍修权回忆，会谈中双方都强调了真诚合作、平等互利和平权合股的原则，“我国保持独立而不依赖，苏联尽力帮助而不剥削”。[②]

显然，关于股份公司问题，中共领导人当时的着眼点仅在于促进中国的经济发展，而没有估计到会引起不良的社会后果。西方的指责自有其政治目的，而国内学生的骚动则是一种狭隘民族主义情绪的流露，现在看来，也是对利用外资等现代经济运行方式缺乏了解的表现。实际上，问题并不在于股份公司的形式，而要看协定的内容是否公平互利。无论如何，这些股份公司的建立，在当时首先受益的是中国。

四、关于专家协定

聘请大批苏联专家来华工作，是中国当时最为迫切的要求。正是在这方面，由于苏联在有关东北权益的谈判中做出了重大让步，所以对专家的待遇和工作条件提出了新的要求。按照 1949 年 8 月刘少奇在莫斯科签订的协议，中国对来华工作的苏联专家只需支付等同于中国专家的工资。[③] 为此，刘少奇曾在中苏友好协会成立大会上对苏联的国际主义精神大加赞扬和宣传。[④] 然而 1950 年 1 月 28 日苏方被迫接受中方关于中长路、大连和旅顺港的协定方案后，对于专家协议的态度立即发生了重大转变。1 月 30 日，苏联部长会议作出的决议规定，中方必须为在华工作的苏联专家额外再支付一笔补偿金。[⑤]

在 2 月 11 日与维辛斯基和米高扬谈判时，周恩来表示，他对关于支付专家费用的协议草案第 4 条的含义不理解，该条款规定，中国政府应该每月支付给每个专家 2000—4000 卢布的补偿金。苏方解释说，这笔钱将用作对专家以前工作的企业

① 参见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 3 册，北京：三联书店，1962 年，第 1331–1333 页；薛衔天编：《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45–1949）》，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 年，第 390–394、404–405、412–427 页。

② 伍修权：《回忆与怀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年，第 247–248 页。

③ 苏共中央与中共中央关于苏联专家在中国之工作条件的协定（1949 年 8 月），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9-00192-01，第 9–10 页。

④ 刘少奇在中苏友好协会总会成立大会上的报告，1949 年 10 月 5 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 1 册，第 82–91 页。

⑤ 参见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第 73 号记录，1950 年 3 月 7 日，РЦХИДНИ, ф.17, оп.3, д.1080, л.41-42。

的补偿，并且要通过苏联政府来支付。周恩来又婉转地提出，“如果规定用美元支付，那么中国政府就不得不支付一大笔钱，而如果以实物结算，对中国政府来说就要容易些。”米高扬回答说，协议草案规定可以用实物，也可以用黄金、美元和英镑来支付。周恩来再问，这个协议是否包括了军事专家和教师等所有各类专家。维辛斯基做了肯定的答复。周恩来还提出，希望在协议中写明：“苏联专家在中国的出差期限是 2—3 年”。苏方对此解释说，协议草案中指明专家在中国的期限是 1 年，但还有一个可以延长期限的补充条款。最后，周恩来答应将把中方对这一草案的修改意见通知苏方。[①] 从这次谈判的对话中，可以了解到苏方新协议草案的基本内容：第一，斯大林与刘少奇会谈时曾许诺，中国政府只需支付苏联专家在华工作的薪金，而且其标准与中国同等人员的工资水平一致，现在则需要额外支付一笔相当数额的补偿金；第二，这项费用的支付，不仅是针对经济技术专家的，而且也包括军事顾问和教师在内，即中国政府应该为所有来华的专家和顾问支付一笔额外的费用；第三，这笔补偿费用可以用外汇或实物支付；第四，专家来华工作期限一般为 1 年，必要时可以延长。

显然，苏方提出的这个新条件与斯大林在 1949 年 8 月对刘少奇讲的已经大相径庭，并且使中方感到意外和难以接受。第二天，周恩来会见罗申时请他转告米高扬和维辛斯基，中方又仔细考虑了新协议的第 4 条以后——周特别指出这是与毛泽东本人协商过的——认为，“作为补偿企业损失而赔偿给苏联政府的每月为苏联专家支付的这 2000—4000 卢布，特别是如果规定这笔钱收取美元，对中国政府来说，将是非常难以接受的。”周恩来强调说，“这笔费用相当于每月 10000 至 18000 斤小米，而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和副主席每月只有 3400 斤小米，部长只有 2800 斤小米。”周恩来提出：“我们认为，如果采用供给各种食品和商品的方式作为补偿金，对于中方来说，比支付美元要轻松得多。我们认为，苏方会考虑这些情况的。此外，还要求告诉我们支付给每个专家的大体数字，这一数字包括以美元核算的金额，以及按照国际市场购买相应商品的卢布价格计算的各种食品的数量。”[②] 在理解这段话时有一个问题，即为什么在苏方已经说明补偿金可以用实物支付的情况下，周恩来还提出最好不支付美元的问题。从字面上看，协议草案规定可以用实物或外汇来支付补偿金，但苏方在谈判时强调这笔费用将通过苏联政府支付给相关的企业，实际用意还是要中方支付外汇，因为实物——特别是周恩来所说的“各种食品和商品的方

① 维辛斯基给斯大林的报告，1950 年 2 月 12 日，АВПРФ, ф.07, оп.23а, п.234, д.18, л.64-69。
② 罗申与周恩来会谈纪要，1950 年 2 月 12 日，АВПРФ, ф.07, оп.23а, п.234, д.18, л.70-74。

式”，显然是一般企业无法接受的，至少对于苏联政府来说是十分麻烦的。周恩来当然明白苏方的意图，所以一再强调要用实物支付，其本意就是婉转地表示：这笔补偿金数额太大，中国政府难以承受。然而，毛泽东和周恩来在莫斯科时未能解决这个问题。

毛泽东和周恩来回国后，李富春和王稼祥作为中方代表继续就专家工作条件协议与苏方进行谈判。谈判情况汇报以后，3 月 6 日周恩来通知中方代表，关于中苏专家协定的草案，除少数属文字的修改意见外，全部同意。同时强调了两点：补偿金确定为 1500—3000 卢布；补贴费应明确在中国付给专家本人，而不是偿付给苏联政府。① 这时，苏方的条件再次加码，又提出了随同军事顾问到中国的军士和士兵的工资支付问题。② 为此，联共（布）中央政治局 3 月 7 日作出了一个决议，其中规定：对于到中国出差的苏联军队的军士，比照苏联专家的工资条件，由中国政府按每人每月 1500 卢布的标准支付给苏联政府；中国政府除负担苏联士兵的全部生活费用外，还要补偿往返旅途中的开支及行李费用等。③ 这无疑又增加了谈判的难度。

3 月 8 日，王稼祥与葛罗米柯及第一远东司代理司长通金、副司长库尔久科夫和一等秘书克鲁季科夫继续举行会谈。话题转到苏联专家在中国工作条件的协定问题以后，王稼祥先谈了有关协议名称和文字表达方式等几个问题，接着再次对协议第 4 条提出疑问。王稼祥说，既然规定中国应每个月按每位专家 1500—3000 卢布支付给苏联政府补偿金，那么就必须确定，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建立支付这些资金的储备。葛罗米柯答复，支付的方式问题需要进行补充讨论。王稼祥接着指出，中方打算通过出售大豆的途径来建立苏联的货币储备，中国政府希望中国人民银行代表团在莫斯科逗留期间讨论这个建议。葛罗米柯推说，类似这样的建议是属于贸易谈判范围的。但王稼祥坚持说：周恩来在与米高扬谈到中国人民银行代表团来莫斯科的必要性时，指明了他们面临的三项任务：签订双方有关贷款结算的协定，解决贸易协定支付方面存在的问题，决定在中国工作的苏联专家费用的支付方式问题。中国人民银行的代表与苏联国家银行的代表目前只讨论了第一个问题。苏联国家银行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 2 册，第 147–148 页。

② 因工作需要，苏联军事顾问和专家来华时带有大批军士和士兵。如 1949 年 11 月苏联派来帮助中国筹建航校的 800 多人员中，不仅有校长、教员、工程师，还有许多机务人员，甚至打字员。见陈熙、李东流：《一切为了办好航校》，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空军·回忆史料》，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2 年，第 165 页。

③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第 73 号记录，1950 年 3 月 7 日，РЦХИДНИ, ф.17, оп.3, д.1080, л.41-42。

的代表们说，关于第三个问题，他们还没有接到通知。因此，王稼祥说明，他受政府的委托，请求给苏联国家银行的代表们下达指示，讨论苏联专家的支付问题，以及中方就这个问题的有关建议。葛罗米柯只得答应向政府汇报后再答复。大概是由于中方认为给专家来华工作规定1年的期限太短，王稼祥提出，中国政府希望苏联专家来华时能将其家属一同带来，以便他们更长久、更好地工作。为此，中方认为最好能将中国政府支付给苏联政府的那部分补偿金直接支付给在中国的多子女专家本人。葛罗米柯答复，对协议没有必要进行这样的修改，是否带家属到中国来，应由专家自己根据现有条件和本人收入情况决定。最后，王稼祥提出了关于军士和普通士兵工资支付的问题。对于葛罗米柯表达的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的意见，王稼祥立即表示反对：由于苏联顾问及其随员中军士的数量占大部分，这样，支付军士的费用就将是一笔很大的数目。而且，军士在苏联每月只能收入500—600卢布，其补偿金却与教师和技术专家同等，这很不相称。王稼祥强调，不应该把规定给其他专家的条件扩展到这部分军人身上，而且，“从目前中国的财政状况来看，1500卢布的标准太高了”。但葛罗米柯坚持说，“这个数字的确定考虑到了很多因素，而我们的立场又是以许多恰当的理由为基础提出来的。”双方为此争执不下，王稼祥最后表示，将向政府汇报决定。①

此后，中国代表又与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米高扬商谈，仍没有进展。3月16日李富春等致电毛泽东并中共中央，认为苏联提出的专家待遇和条件与刘少奇在莫斯科时所谈差距过大，特别是军士和低级军官也要比照专家的待遇和条件，无法接受。李富春等提议，专家和教授就照苏方提出的协定待遇，但军事人员待遇应另定协议，重新谈判，其中士官、尉官待遇应降低，补偿金则按其在苏联所得薪水的70%或80%，由中国政府支付。毛泽东看后，面告周恩来：“不必再争，即照所提办理。”② 3月19日，周恩来以中共中央名义电告李富春、王稼祥、伍修权：关于专家协定的条款，“不必再争，即照苏联政府所提条件办理，我们由此取得经验，加紧学习，谨慎工作，以便第二年精简专家，亦甚有利”。③

这时，苏联领导人也在考虑中方提出的要求。3月22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作出决议，对苏联部长会议1950年1月30日和3月7日的决议做了三条修改：

① 葛罗米柯与王稼祥会谈纪要，1950年3月8日，АВПРФ, ф.0100, оп.43, п.302, д.8, л.36-40。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2册，第153页。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29页。

其一，该协定“应适用于以前到华工作的全部苏联专家”；其二，将中国政府支付给苏联政府的在华苏联军士的补偿金减少到每人每月1000卢布；其三，接受中方对协定第3条的修改意见。[①] 此后，双方很快达成了协议。与1949年协定相比，增加的重要内容有：第3条，除支付专家的工资和补贴外，中国政府还要“向苏联方面偿付以下各项费用：专家及其家属在苏联与中国境内往返行路期间的旅费、薪金、伙食费及旅馆费，每人可携带80公斤以内的行李，专家在未被派遣前在苏联所得月薪为准的安置费，专家在中国工作时每年应得的以一个月薪金为准之休假补偿费，在中国各学校工作之苏联专家，每年应得的以两个月薪金为准之休假补偿费，则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以中国货币直接支付之”；第4条，中国政府应“交付苏联政府每个专家每月1500—3000卢布，以补偿苏联机关或企业由于派遣自己的专家出国而受到之损失”；第6条，在苏联专家患病时，3个月内不得停发薪金，超过3个月则由苏方派人替换。[②] 3月27日，苏联专家在华工作条件协定在莫斯科签字。[③] 显然是考虑到这个协定与刘少奇在中苏友好协会成立大会上宣布的内容有较大差别，关于专家协定的文本，双方一直没有公布。

5月30日苏联部长会议做出了第2264-883cc号“关于在华各机关、企业和组织工作的苏联军事和文职专家的薪金”的决议。[④] 10月25日双方又签署了关于对技术专家报酬条件的协定。其基本原则同3月27日的协定一样：中国应向苏联专家支付相当于中国专家工资水平的工资，另外再支付专家出差的补偿金，按每人

①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第73号记录摘录，1950年3月22日，РЦХИДНИ, ф.17, оп.3, д.1080, л.6。

② 关于苏联专家在中国工作条件的协定，1950年3月，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9-00192-01。海因茨希在其《中苏走向同盟的艰难历程》一书的附录（第702–703页）中也刊载了这份协定，但其中有一个重大差别，即第四条中国给苏联政府的补偿金不是1500–3000卢布，而是1500–2000卢布。笔者曾向译者张文武指出这一问题，张告知，德文原文即如此。笔者未找到俄文原件，不过根据相关的俄文资料（*Зазерская Т. Г.* Советские специалисты и формирование военно-промышленного комплекса Китая (1949-1960 годы),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НИИХ СПБГУ, 2000, с.43-45; *Филатов* Научно-техническо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между СССР и КНР (1949-1966)// Информационный Бюллетень, 1975, №65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с.8-9，可以断定是德文书写的错误。这一疏忽的严重性在于，如果按照补偿金1500–2000卢布这个数字，研究者将会对1957年12月苏联政府修改专家待遇的意图做出完全相反的判断。详见沈志华：《苏联专家在中国》（修订版），第170页。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2册，第152页。

④ 参见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第79号记录摘录，1950年12月13日，РЦХИДНИ, ф.17, оп.3, д.1086, л.176, 208。5月30日苏联部长会议决议的具体内容不详，估计增加的内容是关于此前双方一直没有确定的军事专家的待遇和条件问题。

每月1500—3000卢布计，以及给专家的生活补贴费等。[①] 鉴于大批设计专家来华工作，1951年4月18日，中苏又签订了有关苏联设计专家来华收集设计资料的《00348号合同》，条件同前。[②]

对于贫穷落后的新中国来说，聘请苏联专家的开支确是一个沉重的负担。直到1955年以前，苏联专家的一切费用，中国方面都是用贷款支付的。[③] 据1951—1955年对苏非贸易外汇收支计算表，仅付给苏联政府的行政顾问和专家费（即补偿金）一项开支：1951年为5604万卢布，1952年为4069万卢布，1953年为3260万卢布，1954年为3295万卢布，1955年为4912万卢布，合计21140万卢布。[④] 中国在军事顾问和专家方面的开支也不在少数，如付给苏联政府的补偿金一项，仅国防部系统专家1953年下半年费用及苏联内务部系统专家1953年全年费用就有984万卢布。[⑤] 目前尚未找到综合数字，但仅按这两项统计估算，中国到1955年支付的专家补偿金已超过2.2亿卢布，与中国首次向苏联贷款总共才12亿卢布的数字相比，这笔费用的确是惊人的。况且，这里还未计算支付给专家的工资和生活补贴费及其他开销。正是考虑到这一点，周恩来在专家协定签字后即提出了聘请苏联专家要实行“少而精”的原则。[⑥]

五、关于汇率问题

中苏谈判中争论最激烈，也是最令中方头疼的问题就是人民币与卢布的比价。因为这一问题涉及到几乎所有经济交往的成本，双方都是极为认真和谨慎的。关于这方面的谈判情况，目前尚未发现比较详细的档案文献，所以对很多具体情节无法说清。不过，苏联在这方面确实做了充分的准备。毛泽东刚刚离开莫斯科，1950

① 关于苏联专家派遣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担负技术援助之付款条件的协定，1950年10月25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9-00192-01；*Филатов* Научно-техническо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между СССР и КНР (1949-1966), c.8-9。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1949–1952)》工业卷，北京：中国物资出版社，1996年，第779页。

③ *Зазерская* Советские специалисты и формирование военно-промышленного комплекса Китая (1949-1960 годы), c.47. 从1955年开始，向苏联方面支付的专家费用被纳入了中苏贸易协定的范围。

④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1949–1952)》金融卷，北京：中国物价出版社，2000年，第917页。

⑤ 苏联使馆关于专家费用的照会，1954年3月24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9-10500-01。

⑥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2册，第309–310、462–463页。

年2月28日，苏联部长会议就宣布提高卢布与外币的兑换率，即取消1美元兑换5卢布30戈比的原有汇率，而改为1美元兑换4卢布。此举一下就把卢布的对外购买力提高了30%以上。[①] 这无疑大大增加了中苏贸易谈判中汇率问题的难度。直到3月8日双方还未达成协议，以至周恩来不得不指示中方谈判代表，将汇率问题暂且搁置。[②] 到3月20日，关于三个股份公司的协定已经谈妥，而双方汇率还未确定，周恩来建议，最好按照美元而不是卢布来计算股份公司的资本。[③] 根据中方代表伍修权的回忆，在经济谈判中最突出的分歧和争执就是如何确定两国货币的比价问题。苏方没有按照国际惯例，即根据双方主要商品售价算出各自的平衡指数及两者之间的差距，并以此确定汇率，而是将卢布的比值定得很高，而压低人民币的比值。中方代表很不满意，对此提出不同意见。但是，由于当时中国的地位处于劣势，在经济上有求于人，只好做出让步和妥协，在不平等的条件下确定了两国货币汇率。[④] 1950年4月19日中苏签订合同，确定卢布与人民币汇率为1卢布兑换9500元（东北地区为7500元）。[⑤] 此后，中方一直设法修改这一汇率。

1951年2月24日苏联大使报告：中国政府从1950年12月19日起连续4次降低美元汇率，即从1美元兑换30410元人民币（旧币）降到11890元，由于卢布与人民币的比值是按美元计算的，所以美元汇率的降低直接导致卢布兑换人民币汇率的下降，即从1卢布相当于人民币7500元降低到5720元。考虑到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人民币含金量虽尚未确定，但银行是按固定的官方价格收购黄金的，罗申估计，根据美元计算的卢布和人民币的汇率，比按黄金计算的汇率大约低20%。因此，罗申认为美元在中国的汇率降低自动导致卢布对人民币汇率的降低，是不正常的，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对苏联不利，特别是1951年苏中之间贸易结算和非贸易结算将进一步增长，情况会更加不利。苏联使馆建议，苏联财政部和国家银行应与中国进行谈判，以便确定按黄金价格计算卢布和人民币的比价。[⑥] 4月5日，苏联

---

① 参见《人民日报》1950年3月2日，第1版；4月21日，第5版。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2册，第143–144页。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2册，第144页。股份公司协定最后还是按照卢布计算双方资本的。

④ 伍修权：《回忆与怀念》，第246–247页。

⑤ 中财委关于统一对苏联及新民主主义国家卢布牌价的决定，1952年10月1日，《中共党史资料》2006年第4期，第17–19页。

⑥ 罗申给苏联外交部、财政部和国家银行的电报，1951年2月24日，沈志华、李丹慧收集和整理：《中苏关系：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第9卷，华东师范大学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未刊，第2067–2070页。

国家银行制定了一项关于卢布与人民币兑换率的文件。具体内容不详，但据时任驻美大使的多勃雷宁回忆，这个文件对中国比较有利。当外交部副部长佐林把这份文件呈送代理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审定时，葛罗米柯一方面出于谨慎，不便擅自做主，一方面以为汇率并非重大问题，不便打扰斯大林，遂将文件搁置起来。后来，中国政府和苏联使馆再次催促，佐林亦表示支持，于是，葛罗米柯未经请示斯大林，就批准了这一文件。斯大林得知此事后大为恼怒。4月30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作出决议，撤销4月5日国家银行的文件，并给予国家银行行长波波夫和财政部长兹韦列夫警告处分。此外，在私下里，佐林也受到了严厉的批评和警告，而葛罗米柯则被贬为驻英国大使。[①] 1951年4月3日，贸易部委托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代理的对苏贸易结汇合同仍确定汇率为1卢布兑换9500元，只是东北地区改为6842.10元。1952年10月1日，中财委决定，"对苏联及新民主主义国家无论贸易与非贸易之清算汇价一律统一按照6754元折1卢布之牌价"执行，其他清算价一律取消，不再使用。[②] 直到斯大林去世以后，情况才开始改变。[③]

六、中苏同盟的最终形成

存在利益冲突并不影响同盟的建立，虽然可能影响到同盟的稳定性。全面考察中苏条约签订的过程可以看出，中苏之间确实存在着明显的利益冲突，这主要反映在东北问题上。通过1945年的中苏条约，苏联取得了中长铁路的经营权、旅顺海军基地的租赁权和大连行政管理的实际控制权，从而实现了自沙皇时期俄国人就一直梦寐以求的远东战略，而这一战略的基点就是获取在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冻港。这涉及苏联的在亚洲的基本安全利益和重大经济利益，所以，斯大林从一开始就对此异常警惕，始终不愿松口。对于中共而言，如果不能废除1945年条约、收回东

①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1951年4月30日，РЦХИДНИ, ф.17, оп.3, д.1088, л.3；多勃雷宁：《信赖——多勃雷宁回忆录》，肖敏、王为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第21页。

② 贸易部委托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代理国营对外贸易公司对苏联及新民主主义各国之易货贸易人民币结汇合同，1951年4月3日；中财委关于统一对苏联及新民主主义国家卢布牌价的决定，1952年10月1日，第10–14、17–19页。

③ 从1953年8月开始，中苏货币汇率确定为1卢布兑换5000元人民币。1956年10月23日中苏签订非贸易协定，两国间的非贸易结算已趋向公平合理。为了补偿1956年以前由于双方比价不合理而造成的中方损失，苏方主动建议中苏双方从1951年至1955年期间的有关非贸易支付均按照1956年10月23日《中苏非贸易协定》规定办法进行结算，计算结果，给予中方补偿9910万卢布。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报告，1953年11月21日；曹菊如向李先念副总理、陈云副总理的报告，1957年7月4日，《中共党史资料》2006年第4期，第19–21、28–29页。

北的主权，那么就很难向党内说明苏联共产党的国际主义情操体现在哪里，更无法对国人解释中共采取向苏联“一边倒”的政策的合理性。所以，毛泽东千方百计也要逼迫斯大林做出让步。与此同时，中苏结成同盟对于毛泽东和斯大林来说都是既定方针，是必须实现的目标。中共政权的稳定，特别是在经济恢复和发展方面，离开苏联的帮助是很难实现的，而苏联的远东安全则有赖于中国的加盟。在这种态势下，美国的态度和方针将发挥关键性影响。如果美国对中共采取挤压和逼迫的政策，则中国只能屈服于苏联，如果美国对中共采取宽容和拉拢的政策，则中国自然可以对苏表示强硬。华盛顿选择了后者，所以斯大林不得不做出让步。①

前期谈判的结果，在中国看来，是收回了本该属于自己的主权和利益，而在苏联看来，则是做出了重大让步，这种让步导致的后果就是失去在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冻港，从而不得不放弃斯大林通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实现的远东战略的基点。为了弥补这一损失，苏联在后期谈判中要求签订补充协定，并改变了此前已经达成协议的专家协定，又在其他经济合作和贸易协定谈判中斤斤计较。不过，斯大林为此所采取的更大的举动不是在中苏谈判之中，而是在中苏谈判之外。为了保证苏联战后远东战略得以继续实施，斯大林试图在旅顺之外另行寻找一个出海口和不冻港，这个地点就选择在朝鲜半岛。于是，就在 1 月 28 日苏方表示接受中方关于中长铁路、大连和旅顺港的协定方案之后两天，斯大林决定邀请金日成到莫斯科，商谈金苦苦追求的军事计划。②

斯大林在中苏条约谈判之外作出的这一决定，为即将签字的中苏同盟条约蒙上了一层阴影。斯大林本来与毛泽东的立场是一致的：在苏联的帮助下，中共先解决台湾问题，再挥师北上援助金日成解决朝鲜问题。中苏条约基本内容确定后，斯大林却背着毛泽东，决定与北朝鲜先行商谈采取军事行动的问题。直到事情决定以后，5 月中旬毛泽东才得知这一情况。显然，此时斯大林早已将中苏同盟条约置于脑后。如果不是后来朝鲜战局出现逆转，毛泽东在极其危急和困难的情况下，力排众议，毅然决定派兵入朝，与美国军队作战，那么，墨迹未干的中苏同盟条约真的就形同一张废纸了。③ 正是毛泽东的这一决定，才巩固和发展了中苏同盟的政治基础，并使中苏之间的同盟关系成为事实。这就是历史上时常出现的因果转换的典型

① 笔者关于此期美国对华政策的论述见沈志华：《中共进攻台湾战役的决策变化及其制约因素（1949–1950）》，《社会科学研究》2009 年第 3 期，第 34–53 页。

② 详见沈志华：《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修订版），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7 年，第 129–158 页。

③ 详见沈志华：《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修订版），第 159–208 页。

实例：中苏同盟条约签订导致了朝鲜战争的爆发，而中国参与朝鲜战争则反过来巩固和加强了中苏同盟。

发表于《俄罗斯研究》2010 年第 1 期

朝鲜战争与美国对台政策的转变

1950年6月25日朝鲜爆发了战争，美国政府对此迅速做出反应。然而，令人感到奇怪的是，美国对于战争的第一次军事行动并不是针对朝鲜半岛的，而是针对中国的领土——台湾。换句话说，美国政府的第一反应是一方面保证美国人从朝鲜撤退，另一方面却命令第七舰队北上到台湾海峡。朝鲜半岛发生了战争，美国却把第七舰队派往台湾海峡，其中有什么因果关系？美国借朝鲜战争之机重新提出杜鲁门已经承认解决了的台湾地位问题，其目的究竟是什么？美国采取的这一军事行动反过来对朝鲜战争又产生了什么影响和后果？本文试图回答这些问题。

（一）

关于台湾问题，杜鲁门在6月27日的一项正式声明中是这样说的：

> 对朝鲜的攻击已无可怀疑地说明，共产主义已不限于使用颠覆手段来征服独立国家，现在要使用武装的侵犯与战争。它违抗了联合国安理会为了保持国际和平与安全而发出的命令。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部队的占领"福摩萨"，将直接威胁太平洋地区的安全，及在该地区执行合法与必要职务的美国部队。[①]

实际上，杜鲁门提出的理由，即阻止对台湾的进攻，以维护该地区和平，只是一个表面上的借口。美国在朝鲜战争爆发之前并不认为中国共产党的部队会很快发

① 哈里·杜鲁门：《杜鲁门回忆录：考验和希望的年代（1946–1953）》，李石译，北京：三联书店，1974年，第402页。

动对台湾的进攻；后来也承认，如果进攻发生，即使第七舰队进驻海峡，也无力阻止台湾的陷落。蒋介石“政府”败逃台湾后，美国曾认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会紧接着进攻台湾。但是到1950年6月中旬，美国情报部门对于中国人民解放军何时攻打台湾的问题已经有了新的估计。他们认为，1950年夏天采取行动可能已来不及，而秋天以后，台湾海峡的气候条件将不利于军事行动。这样，对台湾的进攻至少要拖到次年春天以后。[①] 同一时间，台湾国民党政权驻美国的代表顾维钧与杜勒斯的谈话也说明了这一点。顾维钧说，“国民政府”撤出舟山群岛后，实际上加强了在台湾的防御地位。至于“入侵”的可能日期，据来自台湾的报告，也许会发生在7月上旬。杜勒斯说，国务院接到的报告认为，共产党今年夏季不至于进攻台湾，除非他们肯定台湾人民不会抵抗“入侵”，反而欢迎共产党。如果共产党没有希望从台湾内部得到有效的策应，他们在年底或明年初以前就不会“入侵”台湾。[②]

美国政府在朝鲜战争爆发之初，便急急忙忙认定台湾已处在危急之中，并首先决定在台湾采取军事行动，目的在于掩盖它在战争爆发前已经开始转变的对华政策，同时为它参与朝鲜战争创造政治条件。而这一转变是有其历史和政治背景的，朝鲜战争的爆发不过是促使实现这一政策转变的机会。

美国统治集团内部在对华政策上一直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意见，特别是国民党在中国大陆败局已成定局之后，这种矛盾更加尖锐地反映在台湾问题上。以艾奇逊为首的国务院主张放弃蒋介石，从中国的纷乱中脱身出来，同时保留与中共新政权打交道的回旋余地。军界首脑和共和党则主张采取强硬的援蒋方针，甚至不惜使用军事力量保护台湾，以建立亚洲的反共基地。

早在1948年11月，国务院就要求参谋长联席会议对台湾在美国安全中的战略地位做出估计，同时，也征询了麦克阿瑟的意见。参谋长联席会议与麦克阿瑟的意见大致相同，都认为台湾对美国在西太平洋的安全有重要的战略地位。由李海海军上将11月24日签署的“关于台湾战略地位备忘录”认为：(1) 在中国大陆易手之后，美国即失去了利用中国其他地区作为军事基地的可能性，因而台湾和澎湖列岛的地位便更加重要，必要时可以用做战略空军行动的基地，并据以控制邻近的航道；(2) 如果台湾被敌人所控制，一旦发生战争，台湾将被利用来控制马来亚地区到日本的航道，并进而控制琉球及菲律宾；(3) 目前台湾是日本粮食和其他物资的主要来源地，如果切断这一供应来源，日本就会成为美国的负担而不是资产。因

① 资中筠、何迪编：《美台关系四十年（1949–1989）》，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1页。

② 顾维钧：《顾维钧回忆录》第7分册，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768页。

此，参谋长联席会议认为，“通过外交和经济手段，不让共产党统治台湾，从而保证其留在对美国友好的政府手中，是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的。”麦克阿瑟还进一步分析到，如果苏联利用了台湾，就会把美国在远东的整个防线打断。①

关于台湾地位的重要性，国务院与军方的看法是一致的，1949 年 1 月，国务院起草了“关于美国对台湾立场的报告”。该文件经杜鲁门 2 月 3 日批准，编为国家安全委员会第 37/1 号文件。文件的结论是，美国的基本目标是不让台湾和澎湖列岛落入共产党手中，为此，“目前最实际的办法是在我们对此不公开承担单方面义务和施加单方面压力的条件下，把这些岛屿同中国大陆隔离开”。文件还提议可以利用台湾的自治运动。②

杜鲁门对问题的考虑似乎更全面，他要参谋长联席会议研究一下，在外交和经济手段不能保证美国对台政策实行的情况下应采取什么措施。1949 年 2 月 10 日，参谋长联席会议提出一份报告。报告认为，目前在台湾承担任何军事义务都是不明智的举动。问题在于美国的军事力量使它无力在台湾地区投入大量部队。况且，台湾对美国在战略上的重要性，毕竟不如冰岛那样与美国的安全有直接关系。但是，参谋长联席会议又建议，可以在台湾部署少量军事力量以支持那里的政治行动，如停泊少量舰只以及建立必要的港口设施和通讯设施。③

国务院对军方的这个建议表示强烈反对。艾奇逊认为，既然美国并不打算在台湾大规模用兵，那么任何显示武力的做法都只能起到相反的作用。艾奇逊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的发言明确地表示不能依靠军事手段，而只能依靠政治手段来达到把台湾从中国大陆分离出去的目标：

我们试图鼓励台湾的分离主义，就必然会遇到目前席卷中国大陆的潜在的收复失地的威胁。正当我们谋求利用（中国）向苏联收复其在满洲和新疆的失地这一现实问题时，我们特别要避免出现一个美国制造的收复失地的怪影。公开表示美国在台湾有利可图，从而破坏美国在中国正在形成的新地位，这样的代价是我们付不起的。我们考虑的主要问题在于，如果要使我们当前的政策在台湾有任何成功的希望，我们就必须把使该岛脱离大陆控制的想法谨慎地掩盖起来。

① *FRUS,* 1949, Vol.9, pp.261-263.
② *FRUS,* 1949, Vol.9, pp.273-274.
③ *FRUS,* 1949, Vol.9, pp.284-286.

因此，艾奇逊竭力反对美国在台湾显示任何武力，并要求政府各部门必须“克制对台湾表现出热心”。[①]

尽管当时国务院的意见占了上风，如艾奇逊后来回忆时所说，“从 1948 年 10 月到 1950 年 6 月 25 日朝鲜战争爆发，这个政策——即不使用美国军队来保卫福摩萨——从来没有动摇过”。[②] 但是，这只是表明美国在这段时期执行这一政策的事实，并不说明美国对台湾问题的政策制定没有争论和摇摆。当蒋介石从大陆撤往台湾，并且加强了对台湾的控制之后，美国设想的把台湾与大陆分离的方案看来难以实现。特别是艾奇逊秘密派往台湾考察的利文斯通·麦钱特汇报了台湾之行的印象之后，[③] 国务院已了解到，只要蒋介石还能控制台湾，那么所谓“台湾独立”或对台湾实行托管等方式，都是行不通的。[④] 于是，问题的焦点就转变为：为了美国的战略安全，是否应该重新介入中国内战，支持和援助蒋介石政权的问题。

美国虽然早已确定了对中国局势采取观望的态度，但在外交上则持十分谨慎的态度。国务院在 1949 年 7 月曾通知司徒雷登，只要国民党政权继续呆在大陆并且是中国唯一的政府，美国就继续保持同它的外交关系。[⑤] 随着 10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和 12 月 8 日蒋介石政权迁至台湾，国务院所提出的两个条件都不复存在了。形势逼迫美国政府必须对与蒋介石政权的关系问题和对台湾的政策问题明确表态。[⑥] 据当时中央情报局的估计，如果没有美国军队的干预，台湾“大约将会在 1950 年底置于中国共产党的控制之下”。[⑦] 就是说，美国或者是以武力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台湾，或者是放弃对台湾国民党政权的支持和援助。

国防部的意见是通过有限的军事援助使蒋介石政权再拖一个时期，看情况发展而定。1949 年 12 月 23 日参谋长联席会议提交国家安全委员会一份备忘录。备忘录指出，为反共的国民党在台湾的“政府”制定一项适当的“指导得当、监督严密”的军事援助计划，将符合美国的安全利益。基于这一点，参谋长联席会议建议

---

① *FRUS,* 1949, Vol.9, pp.294-296.

② 艾奇逊：《艾奇逊回忆录》，上海《国际问题资料》编辑组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 年，第 225 页。

③ 关于麦钱特之行，参见 *FRUS,* 1949, Vol.9, pp.300-341。

④ 1949 年 11 月 2 日，艾奇逊与杜勒斯共同制定了一份有关远东政策的决定，讲到台湾问题时，否定了美国以武力或通过托管方式取得对台湾控制的方案。见 *FRUS,* 1949, Vol.9, p.161。

⑤ *FRUS,* 1949, Vol.8, p.696.

⑥ 还在 11 月 15 日临时代办罗伯特·斯特朗在给国务院的电报中就提出：“尽管在大陆应让大使馆继续存在并保持接触，但另一个政府很可能继续存在下去，国务院需要就与海岛政府的关系问题作出新的决定。”见 *FRUS,* 1949, Vol.8, pp.593-594。

⑦ *FRUS,* 1949, Vol.9, p.393.

立即派员调查保住台湾所需要的军事援助的性质和程度。①

然而，国务院的主张却就是要为完全放弃台湾做准备。就在参谋长联席会议提出上述备忘录的同一天，国务院发出了一份秘密文件，题为“政策情报提纲：台湾”。其用意是在台湾陷入中共政权手里时——这一情况很有可能马上出现，尽量缩小其意义和不良影响。文件指出，应该利用一切宣传材料来避免如下的错误看法，即保持台湾便能拯救中国“政府”；美国对该岛怀有特殊兴趣或野心，或在台湾保有任何军事基地；该岛的丧失将严重损害美国的或其他反对共产主义的国家的利益；美国无论如何都有责任或义务采取行动以拯救台湾。文件称，台湾的失落“已在普遍意料之中”，“那里的军民状况在国民党统治下已经恶化，因此，出现这种结果是合乎情理的”。②

这份文件充分表明了国务院的主张，即弃台湾于不顾。但是，这份文件送到麦克阿瑟的东京总部时，被放进了发布新闻的文件箱里。据顾维钧猜测，文件是麦克阿瑟有意透露出去的，目的在于激起舆论反对国务院。③ 当文件内容透露之后，在国会引起了强烈不满。诺兰、塔夫脱和史密斯等共和党议员，以及前总统胡佛纷纷发表激烈的批评意见。诺兰竭力主张不要承认新中国，继续支持蒋介石，并建议派军事代表团去台访问。塔夫脱公然主张要出动海军保护台湾，并认为只需要少量的援助和极小的代价就能制止共产主义进一步的扩张。史密斯则公然要求美国在联合国托管的形式下占领台湾，理由是目前从技术上说，台湾还是日本的一部分。而这些意见又被新中国政府指责为美国即将占领台湾。④ 这样，对台湾问题的两种立场已经暴露在公众面前，而使得美国决策层必须在这两种方案中做出选择，并且需要公开表态。

12 月 29 日，以艾奇逊、腊斯克、巴特沃斯及麦钱特为一方的国务院与以布莱德雷、柯林斯、诺斯塔德为一方的参谋长联席会议就台湾问题进行直接交锋。参谋长联席会议为备忘录辩解说，从军事角度看，国民党在台湾的地位比过去稳固，因此只需要相对低廉的费用，台湾便可以支撑得比美国预想的要久。这样，美国就可以对中国加强其自身政权的努力施加影响，因为只要共产党仍须与台湾抗争或解放

---

① *FRUS,* 1949, Vol.9, pp.460-461.

② 人民出版社编：《中美关系：文件和资料选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年，第 227–229 页；*FRUS,* 1949, Vol.9, pp.460。

③ 顾维钧：《顾维钧回忆录》第 7 分册，第 561 页。

④ John W. Spanier, *The Truman-MacArthur controversy and The Korean War,*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9, pp.56-58；艾奇逊：《艾奇逊回忆录》，第 226–227 页。

台湾，他们就不会向东南亚实行扩张。因此，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张，按其需要增加给台湾的军事援助并派遣军事顾问驻台。艾奇逊强烈反对这些意见。国务院认为：(1) 必须承认，“共产党人事实上已控制了中国，中国被共产党人征服的原因主要不是在于武力，而是在于国民党自身的崩溃和共产党利用了中国长期孕育的土地革命。我们必须面对这一现实，即中国并没有抵抗共产主义的基础。”(2) 防止共产主义蔓延到东南亚国家的方法是帮助该地区的国家建立内部安全局面，帮助他们发展经济和哪怕只是有限地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是第四点计划的基本精神。(3) 即使按照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建议，增加对国民党的军事援助，无非是使台湾推迟一年陷落，但为此付出的代价是美国的威信在公开失败中再次丧失，同时还会激起中国人民的仇恨情绪，并使苏联有借口在联合国控告美国与腐败的国民党沆瀣一气。而台湾对于美国的安全防务并无战略意义，因此不值得付出这样的代价。(4) 中国不受苏联支配是美国“在华的一项重要资产”，美国不应“以自己代替苏联作为中国的帝国主义威胁”。中国共产党人确实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把苏联当做唯一的伟大盟友。但是，“我们的眼光要放远些，要从 6 年到 12 年而不要从 6 个月到 12 个月来看问题”。布莱德雷没有更多的理由，只说军方是从军事角度以及对国会通过的共同防御援助法案的考虑出发的，既然军事应该服从政治，他问艾奇逊是否按政治办法去做。艾奇逊明确回答：是的，除非能提出根据说明台湾的战略重要性使得非照备忘录的意见办不可。①

结果，杜鲁门总统支持了国务院的意见。12 月 30 日通过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第 48/2 号文件“美国在亚洲的地位”中规定，“美国应当通过适当的政治、心理和经济手段利用中共和苏联之间，以及中国斯大林主义者和其他分子之间的分歧，同时谨慎地避免给人以干涉的印象。”至于台湾，其“重要性并不足以采取军事行动”。“美国应尽一切努力以加强美国在菲律宾、琉球群岛和日本的总体地位”。②

这样，为台湾提供军事援助和采取军事行动的建议再次被美国政府否决。与此同时，国务院也做了让步，即放宽了与国民党政权保持“外交关系”的条件：如果美国政府接到“国民政府迁都”台北的正式通知，并且其“外交部长”叶公超不再以部长身份滞留香港。③

---

① *FRUS,* 1949, Vol.9, pp.463-467.

② 总统秘书档案，第 20 盒。转引自华庆昭：《从雅尔塔到板门店——美国与中、苏、英：1945–1953》，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年，第 183 页；爱德温·马丁：《抉择与分歧：英美对共产党在中国胜利的反应》，姜中才等译，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 年，第 111–112 页。

③ *FRUS,* 1949, Vol.8, p.719.

随后，为了稳定国会和舆论，杜鲁门和艾奇逊分别发表了声明和公开演讲，宣布将台湾排除在美国的远东防御线之外。就杜鲁门个人来讲，他不像罗斯福那样对蒋介石充满热情和希望，反而对国民党抱着一种厌恶和轻视的态度。因此，在台湾问题上，杜鲁门一直比较倾向国务院的意见。不过，对于军方和国会的态度，杜鲁门也不能不有所考虑。就在 1 月 5 日声明发表的前一天，他带着这份由国务院起草的文件去征求约翰逊和布莱德雷的意见。他们都表示反对发表这个声明，约翰逊的意见尤其强烈。最后，尽管在艾奇逊的说服下发表了这份声明，但杜鲁门还是听从布莱德雷的意见做了两处修改：把“无意将台湾同中国分开”这句话删掉；在美国“无意在台……建立军事基地”这句话之前加上了“在目前”的字样。[①] 看起来，一旦情况有变，美国改变对台政策是有基础的，而且事先埋下了伏笔。

（二）

尽管从杜鲁门和艾奇逊的公开声明发表到朝鲜战争爆发之前，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再没有就台湾问题进行过任何值得一提的讨论，但是军方和国会中的反对意见依然存在，军方甚至有自行其是之嫌。就在艾奇逊 1 月 12 日演说后不久，参谋长联席会议即决定将过去制定的一旦发生战争时不让台湾落入苏联手中的“紧急作战计划”的有效期延长到 1951 年底。[②] 以后，随着共和党在国会的煽动，中美关系因北京军营事件而激化，《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以及麦卡锡事件的发生，国务院在对台政策问题上受到越来越猛烈的攻击，艾奇逊则首当其冲，成为攻击的目标。

1950 年 4 月以后，台湾形势愈加紧张。4 月 27 日海南岛解放，5 月 16 日国民党军队撤离舟山群岛，台湾当局惶惶不可终日，美国对台湾的命运也更加关注。国务院按原定政策准备撤离台湾。5 月 17 日斯特朗从台北报告说：“我和使馆的人员都认为，台湾的命运已经注定，共产党可能在 6 月 15 日至 7 月底之间发动进攻。”斯特朗建议减少美国官方人员，警告所有美国公民迅速离开台湾，转移精密仪器等。他告诉国务院，他将“在 6 月 15 日之前，把所有必须转交给英国领事馆的文

① 见资中筠、何迪编：《美台关系四十年（1949–1989）》，第 44–45 页。也有人认为，“在目前”这几个字是杜鲁门本人加进去的。见华庆昭：《从雅尔塔到板门店》，第 184 页。

② Dorothy Borg and Waldo Heinriches (eds.), *Uncertain Years: Chinese American Relations, 1947-50*,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0, pp.85-86.

件准备好”，并“确定出内部和外部的撤离单位”。5月26日，国务院给斯特朗回电，同意他关于“尽早和逐步”采取有关措施以便为撤离计划的实施奠定基础的建议，并授权他秘密地与英国方面“进行完全必要的筹划”，以防万一。[①]与此同时，美国驻台湾总领事馆在5月24日已经劝告美国公民，除非他们在那里还有非办不可的事情，否则还是离开该岛为好。[②]

军方的态度却是截然相反的。4月间，参谋长联席会议对东南亚的战略形势提出看法，其中对中国在美国的亚洲战略地位中的重要性的提法比以前加强了，鼓吹美国应采取“果断的”、“持续的”措施以“减少来自共产党中国的压力”，并且认为，“有证据说明中国国民党的军队有所振兴并增强了效能”。[③]

在国防部里，从4月至6月朝鲜战争爆发前夕，不断有人提出各种意见书，支持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意见，主张推翻杜鲁门1月5日声明的政策，尽一切力量“保住”台湾。理由是情况有了新的变化，“苏联已经安全接管了共产党中国”。建议书提出：美国的短期目标是尽量维持台湾的抵抗力量，最好超过18个月，以争取时间加强菲律宾和印尼的防务；长期目标是“永久”不让共产党得到台湾，为此要采取有深远意义的步骤，把一个“非共产党统治的台湾”与它的“非共产党邻国”联合起来，最后形成一个“非苏维埃的中国”。建议立即采取的步骤有：向台湾增派高、中级军官，立即用“援华法案”的余款为台湾购置舰只和军火，美国海军作战舰艇公开访问台湾，国务院应发表声明，解释美国政策转变的原因，并增加在台湾的“外交”代表。实现长期目标的措施包括：美国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组织军事调查团调查台湾的防务需要，设法让蒋介石下台而支持其后继者并给以充分的经济和军事援助，使日本、菲律宾或者加上越南与这个“台湾民主政府”缔结安全条约，训练反共游击队并派入中国大陆等等。[④]

国防部长约翰逊显然是支持这些意见的。5月25日，即战争爆发前一个月，约翰逊向杜鲁门提交了一份备忘录。这是一个有关美国转变对台政策的非常重要的文件。据布莱德雷回忆，其内容是：

---

① *FRUS,* 1950, Vol.6, *East Asia and the Pacific*, Washington, D. C.: GPO, 1976, pp.340-345.

② 彼德·卡尔沃科雷西编著:《国际事务概览（1949–1950）》，王希荣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年，第454页。

③ 美国国家档案馆档案，RG59，793.00/5-350。转引自资中筠、何迪编:《美台关系四十年（1949–1989）》，第45页。

④ 美国国家档案馆档案，RG330，CD6-4-6。转引自资中筠、何迪编:《美台关系四十年（1949–1989）》，第45–46页。

国家安全委员会1949年12月29日决定采取不援助中国国民党防守台湾的进一步行动。从那时以来，情况的变化已经发展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至国防部感到有责任请求您再次提出这一问题，供进一步研究和斟酌。年初以来，海南岛和上海附近沿海的岛屿已落入共产党手中；共产党中国同俄国签订了一项军事条约；在过去的数天中，朝鲜形势变得十分严重。虽然台湾并非是美军的一个重要基地，但一旦它被敌对国家占领，将会严重影响我们在日本、冲绳和菲律宾的地位。该岛上有许多现成的机场，从那里起飞的敌机完全可以接近我们的基地和交通线，这样就使这些机场加倍地发挥作用。例如，我们现有的战斗机的航程仅能够在冲绳和菲律宾之间活动。如果为避开来自台湾的干扰，必须要绕一个圈子，而这一迂回行动是不可行的或极其危险的。国防部12月曾建议命令远东战区总司令麦克阿瑟向台湾派出一个调查组，以掌握关于如何才能防止台湾落入敌对国家手中的第一手材料。我再次建议您采取这一行动，参谋长联席会议和麦克阿瑟将军对此也表示赞同。①

6月9日，约翰逊甚至要求参谋长联席会议考虑出动美国军队阻止对台湾的进攻这样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② 与此同时，刚刚出任国务院顾问的杜勒斯也提出了改变对台政策的问题。作为共和党外交政策的主要发言人杜勒斯进入国务院，肯定给艾奇逊带来了不少麻烦。5月18日，杜勒斯向国务院提交了一份备忘录。备忘录认为，由于共产党控制了中国，而中国又与苏联结盟，世界上力量均衡的局面已被打破，并且朝着有利于苏联而不利于美国的方向倾斜。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美国的行为仍表现出允许那些未确定地区，即美洲和北大西洋条约国以外的地区，落入苏联之手的倾向，那么，在类似日本、菲律宾、印度尼西亚这样具有丰富自然资源的地区，美国就将遇到一系列重大的灾难，甚至中东石油地区也将处于危机之中。为了防止这种灾难发生，美国应该迅速采取一种能够显示我们信心和决心的全新与强硬的立场。杜勒斯认为，在台湾采取这一立场是最有利的，他说："如果美国宣布要使台湾保持中立，既不容许它被共产党占领，也不容许它被用做对抗中国大陆的军事基地，那么，我们就一定能够使这一决策坚持下去，除非苏联发动公开的战

① 克莱·布莱尔整理：《将军百战归——布雷德利自传》，廉怡之译，北京：军事译文出版社，1985年，第690页。

② Borg and Heinriches (eds.), *Uncertain Years*, p.89.

争。”[①]

杜勒斯在国务院里也找到了他的支持者，这就是负责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迪安·腊斯克。腊斯克赞同杜勒斯的意见，经过商议，他先后在5月30日和6月9日向艾奇逊提出两份建议书，基本上重复了杜勒斯的意见。建议书甚至提出了一些具体方案，如告诉蒋介石，台湾的陷落是不可避免的，美国不准备助其守住台湾，然后动员蒋退出政治活动，同意让联合国对台湾实行托管，并由联合国派小组对台湾情况调查后向联大提出报告，在此基础上实现台湾军事中立化和“自决”原则；为保证军事中立化，美国派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水域，宣称防止台湾海峡双方发生军事行动；照会英、苏及联合国，说明中国人之间在台湾即将发生的冲突将涉及国际和平问题，应由联合国及对日和约有关国家共同解决。杜勒斯还决定在访问日本期间将这些建议通知蒋介石。[②]

这样，艾奇逊的主张不仅在外部受到国防部、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反对，而且在国务院内部也由于杜勒斯和腊斯克联手而受到排斥。与此同时，艾奇逊还受到国会共和党议员的指责，特别是麦卡锡主义兴起后，国务院实行的对华政策被认为是“失去中国”的主要原因。看来，艾奇逊出于摆脱这一困境的政治原因，是不得不放弃自己的意见了。

就在这时，以反共著称的麦克阿瑟又向杜鲁门和艾奇逊的台湾政策开了一枪，提出了“保台意见书”。6月14日麦克阿瑟起草了这份给参谋长联席会议的绝密备忘录。6月24日，即战争爆发前一天，麦克阿瑟把这份备忘录交给了来东京访问的约翰逊和布莱德雷。布莱德雷回忆说，这份文件使用“不沉的航空母舰”这样的比喻，强调并重申了台湾一旦落入共产党手中对美国远东战线造成的威胁。麦克阿瑟极力主张美国应主动采取措施防止台湾被共产主义政权所统治。他无法提出为防止台湾“失陷”而应采取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的具体措施，但强烈要求政府应批准参谋长联席会议1949年12月23日和1950年5月4日向台湾派一个调查组的建议。布莱德雷认为，“在援台问题上，这一文件比参谋长联席会议以往的文件提出的论据更为有力。”于是，约翰逊和布莱德雷一致决定，这份文件应呈交总统，并以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名义提出建议，美国应改变不插手台湾的政策，并要根据调

① *FRUS*, 1950, Vol.1,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Foreign Economic Policy*, Washington, D. C.: GPO, 1977, pp.314-316.

② *FRUS*, 1950, Vol.6, pp.348-351.

查组的建议，向国民党提供援助。[①] 这就是说，在朝鲜战争爆发前夕，美国已经倾向于改变对台政策，甚至也有了可供选择的具体建议。

约翰逊和布莱德雷带着麦克阿瑟的备忘录返回华盛顿时，正赶上朝鲜战争爆发，杜鲁门召开第一次布莱尔大厦会议。于是，在会议晚餐前的讨论中，约翰逊和布莱德雷首先发言，不谈朝鲜战局，却大谈台湾的重要战略地位，布莱德雷当场宣读了麦克阿瑟的“保台意见书”。布莱德雷甚至提出，军方认为台湾比朝鲜更重要，“在朝鲜的进攻可能是一次佯动，目的是转移我们对共产党急迫进攻台湾这一事实的注意力。在过去的数周中，中共在台湾对面集结了约20万军队。如果共产党果真要从远东把仗打下去，我们就必须刻不容缓地保卫台湾。在朝鲜我们可以依赖韩国军队，或至少我们是这样认为的。但台湾几乎是赤手空拳，是唾手可得的熟果”。[②]

就是在这次会议上，就是在这样的情势下，艾奇逊提出了派第七舰队进驻台湾的建议，而这一建议实际上就是以军方的台湾战略地位已变得十分重要的论点为前提，以杜勒斯—腊斯克的建议为具体方案。

了解了这样一个历史过程，对美国政府在朝鲜战争爆发之际，首先改变了对台政策，从而在实质上介入了中国内战这一现象，就不会感到意外和奇怪了。

（三）

美国对台政策的改变以朝鲜爆发了战争为理由和借口，其结果，又反过来对朝鲜战争的复杂化和扩大化产生了重大影响。

其一，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的直接结果是把美国与蒋介石集团紧紧地绑在了一起——这本来是杜鲁门政府最不愿意看到的结果，从而使朝鲜战争的局势进一步复杂化。

艾奇逊在建议使用第七舰队的同时，特别强调了美国不应与蒋介石保持密切的联系，台湾的地位问题可由联合国来确定。[③] 国务院随后又发给其外交和领事官员一份秘密传阅的电报解释说，关于第七舰队北上的决定，“只是为了保持太平洋地

---

① 布莱尔整理：《将军百战归》，第687页。在此之前，麦克阿瑟还与去东京的杜勒斯讨论了他的备忘录，并提出亲自去台湾进行这项调查。麦克阿瑟的备忘录见 *FRUS*, 1950, Vol.6, pp.366-367。

② 布莱尔整理：《将军百战归》，第691页。

③ *FRUS*, 1950, Vol.7, *Korea*, Washington, D. C.: GPO, 1976, p.158.

区的和平而采取的一项紧急防卫措施，我们对有关中国政府的政治问题不存在什么偏见"。[①] 艾奇逊的本意可能是想维持朝鲜战争前美国处理台湾问题的曾经设想过的一个方针：首先抛弃蒋介石，然后在可能的情况下，通过实现台湾自治或"独立"，使其纳入美国的战略防御范围。但是，美国出动海军阻止对台湾的进攻，其实际结果是保护了摇摇欲坠的蒋介石政权，巩固和加强了国民党对台湾地区的统治。

早在 1948 年 11 月，当时的台湾省主席魏道明就与美国秘密接触，表示愿意在美国的支持下，说服蒋介石不来台湾，从而可以实现台湾的自治。[②] 在 12 月 27 日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代理国务卿洛维特也提到"台湾中国人"找到了国务院和中央情报局，要在台湾建立另外一个国家，商讨正在进行中。洛维特说："台湾的价值并不在于蒋介石 10 年后的重返（大陆），而在于把未来寄托于跟日本合并成一个不受中共影响的政府。鉴于当前的困难情况，此事应当秘密进行。"[③]

尽管 1949 年 1 月蒋介石撤掉了魏道明，改派其亲信陈诚为台湾省主席，并把巨额黄金、外汇和大批军火运至台湾，但美国仍未放弃支持"台湾独立"的政策。2 月 3 日形成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第 37/2 号文件指出，"美国应设法发展和支持一个当地的非共产党控制的中国政权，它至少可以向这些岛屿提供一个多少有点正直的政府"。美国还应"在一切地方运用影响以劝阻大陆人涌入"，并"跟台湾本地领袖人物保持谨慎的联系"，以便在将来"利用台湾自治运动"。[④]

随后，国务院便派驻南京领事利文斯通·麦特钱秘密去台湾活动。艾奇逊指示他应广泛接触台湾各阶层人士，并向陈诚表明，如果能做到限制大陆国民党人士去台，吸收台湾人参政，"美国可以答应给予经济援助"。但麦特钱到台湾后发现陈诚是蒋介石的亲信，不能依靠，"而台湾一些主张独立的团体目前又各自为政，政治上无知，组织上一塌糊涂"，也不能依靠。[⑤]

后来，国务院远东司司长巴特沃斯和国务院政策设计室主任乔治·凯南又相继提出了由联合国监督下的公民投票来决定台湾的归属或立即实行对台湾的国际托管

① *FRUS,* 1950, Vol.6, pp.367-368.

② 资中筠、何迪编：《美台关系四十年（1949–1989）》，第 28 页。

③ 总统秘书档案，第 220 盒，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卷。转引自华庆昭：《从雅尔塔到板门店》，第 161–162 页。

④ 总统秘书档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文件，第 37/2 号。转引自华庆昭：《从雅尔塔到板门店》，第 166 页。

⑤ *FRUS,* 1949, Vol.9, pp.289, 303.

的方案，以此达到分离台湾，把蒋介石和共产党都弃于台湾之外的目的。①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美国分离台湾的难度增大，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有人开始鼓吹“台湾地位未定”论。共和党参议员亚历山大·史密斯到处宣传在对日和约签订之前，台湾“在技术上还是日本帝国的一部分”，美国作为占领国就有权对它承担某种保护义务。② 麦克阿瑟在 12 月的一次秘密谈话中也声称，在法律上台湾仍是日本的一部分，在对日和约签订之前，国民党的“政府”不过是为同盟国代管台湾。他还说，雅尔塔协议以来的情况已经发生了如此的变化，以至于没有义务“把台湾交给中国国民政府”；相反，应把它建成一个“独立的自治国家”。③ 正是这种“台湾地位未定”的理论，成为杜鲁门 6 月 27 日声明中干涉中国内政的法律借口。

然而，蒋介石坚决地并且一贯地排除任何把台湾同中国大陆分离的可能性。国民党凭借着几十万军队和大量黄金、外汇，从军事上和经济上牢牢掌握着对台湾的控制权。以致司徒雷登叹道：“委员长不点头，台湾不可能有任何变化。”④ 不过，国民党政权驻联合国“代表”蒋廷黻和驻美国“大使”顾维钧都认识到，“美国正在设法把台湾问题暂时冻结起来，从而排除对台湾的地位问题作出任何决定的可能性，这是有利于国民政府的。”“如果我们坚持台湾毫无疑义是中国领土的说法，美国力图防止台湾落入敌人之手的主张就会站不住脚。美国的说法是，台湾的地位还没有明确，或者说是尚未定案（这是杜勒斯的原话），因为如果把台湾看做是被盟军占领的日本领土，则美国对这个岛屿的安全问题，就可以有发言权，就负有责任。”应该说，他们的理解是十分准确的。顾维钧和蒋廷黻还遵从杜勒斯的意见，一再给台湾去电，劝请台北“勿再激烈反对并攻击美国的主张”。⑤

蒋介石深谋远虑，既要维护中国的领土不被分离出去，以便有朝一日恢复其世界大国领袖的地位，又要死死拉住美国，利用美国对台湾战略地位的关注，争取尽可能多的军援，以巩固在台湾的统治，伺机反攻大陆。因此，1949 年 11 月 1 日，由“外交部长”叶公超给蒋廷黻发了一份专电，传达了蒋介石和“行政院”的

---

① 详见 Borg and Heinriches (eds.), *Uncertain Years*, p.27；*FRUS*, 1949, Vol.9, p.357。

② William W. Stueck, *The Road to Confrontatio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toward China and Korea, 1947-1950*, Chappell Hill: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81, p.139.

③ 总统秘书档案，第 177 盒。转引自资中筠、何迪编：《美台关系四十年（1949–1989）》，第 59 页。

④ *FRUS*, 1949, Vol.9, p.300.

⑤ 顾维钧：《顾维钧回忆录》第 8 分册，北京：中华书局，1989 年，第 148–149 页。

指示。该指示一方面明确指出："为了维护我国的政治地位，我们仍应坚持台湾是我国领土的一部分。"另一方面也表现出某种灵活性，"眼前我们可以支持美国的建议，即请求联合国大会作出决议，维持台湾现状，并禁止任何方面使用武力。我们可以把它作为一项权宜之计，予以接受。"[①]

蒋介石采取的灵活态度和权宜之计，加强了美国军方介入台湾问题的建议的地位，以及实现这种建议的可能性。自然，也就加强了台湾取得更多的美国军事援助的地位和可能性。实际上，蒋介石与美国军方的接触与合作正是在这种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还在朝鲜战争爆发之前，美国军方就开始和蒋介石谈判派国民党军队开赴南朝鲜的问题。据顾维钧回忆，1970 年冬原国民党将领何世礼曾同他谈起此事。朝鲜战争前夕，麦克阿瑟派前美国太平洋舰队的柯克海军上将去台湾，要求蒋介石派军队前往南朝鲜，以抵抗北朝鲜可能发起的进攻。蒋介石认为时机到来，可以借此向美国多要一些服装、武器和给养。但柯克将军拒不答应，谈判纠缠于许多细节问题，迟迟未果。据何世礼说，蒋介石从内心是急于想派军队去朝鲜，这不仅是要借此抬高国民党军队的身价，也是为了讨好美国，以求得更广泛的援助和支持。正是因为如此，朝鲜战争刚刚爆发，蒋介石便立即提出派军队赴南朝鲜作战。在这一要求被美国政府拒绝后，蒋介石又派顾维钧和何世礼再三去向麦克阿瑟请战。无奈麦克阿瑟已无权做主。不久，蒋介石又提出派 1.5 万名志愿军去南朝鲜参战，并完全归麦克阿瑟指挥。这一建议仍被麦克阿瑟以加强台湾本身的防务为理由加以婉言拒绝。[②]

尽管美国政府出于种种考虑，不愿让蒋介石的军队卷入朝鲜战争，但是既然美国政府已经迈出了第一步，美蒋关系也就朝着这一改变了的方向迅速发展下去，以至这个沉重的包袱在美国身上压了整整 22 年。

其二，美国对台政策的改变，引起中国政府和人民的极大愤慨，使得本来有希望进一步发展的美国与新中国的关系彻底中断。同时，这也是后来中国作出出兵朝鲜决策的心理因素形成的客观条件。

朝鲜战争真正刺激中国的，不是战争爆发本身的消息，而是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的消息。据师哲回忆，6 月 26 日清晨毛泽东对他说，从外国报纸上知道了战争爆发的消息，但毛泽东只是表示对北朝鲜事先不打招呼表示不满，并没有其他明

① 顾维钧：《顾维钧回忆录》第 8 分册，第 151–152 页。
② 顾维钧：《顾维钧回忆录》第 8 分册，第 80–81、94 页。

确的反应。[①] 当时，中国政府也没有立即对朝鲜问题公开表示态度。而6月27日杜鲁门第七舰队调动的声明一发表，毛泽东第二天便在中央政府第八次会议上发表讲话，严厉指责美国政府干涉中国内政。显然，美国政府出尔反尔的做法激怒了刚刚掌握政权的中国共产党人。毛泽东郑重声明:“中国人民早已声明，全世界各国的事务应由各国人民自己来管，亚洲的事务应由亚洲人民自己来管，而不应由美国来管。美国对亚洲的侵略，只能引起亚洲人民广泛的和坚持的反抗。杜鲁门在今年一月五日还声明说美国不干涉台湾，现在他自己证明了那是假的，并且同时撕毁了美国关于不干涉中国内政的一切国际协议。”[②]

美国政府派军舰游弋于台湾海峡，直接的后果是阻止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台湾，为蒋介石集团承担了防御义务。尽管从20年代以来，国共两党有过两次合作的经历，但实则两党之间积怨甚深，水火不容。第一次合作，国民党只是利用共产党的群众基础和宣传工作，同时也由于共产国际的指导错误以及中国共产党的认识偏差和缺乏经验，致使蒋介石篡夺国民党领导权后，背叛人民，绞杀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人结下血海深仇。第二次合作，是迫于日本帝国主义大兵入境，国家和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也由于国际形势变化，美苏等国际势力的压力，国民党不得不暂时中止剿共灭共的目标。战争刚刚结束，国民党便再次举起屠刀，妄图一举消灭共产党。经过四年火与血的较量，中国共产党终于取得了全国政权，而国民党则败逃台湾一隅。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完成全国解放和统一大业只差这最后一击了，而对于国民党来说，则对“兵败国破”之辱耿耿于怀，时刻不忘反攻大陆。美国政府在这种时刻再次插手国共之间，袒护国民党，自然引起中国新政府的极大愤慨。同时，美国政府关于台湾尚属日本领土，其地位还有待商议的说法，也极大地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这样，本来尚有可能取得一些进展的中美关系，就熄灭了最后一线希望之光。其后，美国又跨过三八线，直逼鸭绿江，不能不使新中国感到有遭到南北夹击的危险。因此可以认为，美国第七舰队驶入台湾海峡是为中国出兵抗美援朝，以至朝鲜战争变为中美之战奠定的第一块基石。

另一方面，美国派军舰进驻台湾海峡，的确使中国人民解放军对台湾的进攻受阻。然而，新中国不得不放弃攻打台湾的方针计划，其客观上的结果是中国大量的军队得以从东南沿海抽调至东北。也就是说，这种状况的结果，为大规模中国军队

① 李海文:《中共中央究竟何时决定志愿军出国作战?》,《党的文献》1993年第5期，第85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第423页。

入朝作战创造了一种客观条件。后来的情况发展也正是如此。如果没有美国干预台湾问题，那么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东南沿海举行渡海战役的同时，很少有可能再在东北边陲集结大军，入朝作战。因此，第七舰队阻止了中国军队进攻台湾，却使得麦克阿瑟面对几十万入朝作战的中国军队，这是美国政府决策时始料不及的，而中美关系从此进入漫长的冷冻时期，更是与美国政府的初衷背道而驰的。

其三，美国彻底改变对台政策的另一个客观结果是促成了美国政府作出干涉朝鲜半岛冲突的决策。关于第七舰队进驻台湾的问题，尽管在朝鲜战争爆发前已经有人议论，但作为建议正式向政府提出的却是一向反对援助台湾的艾奇逊。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其实，艾奇逊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提出台湾问题的真实目的还在于解决朝鲜问题。换句话说，艾奇逊是为促使军方在朝鲜问题与国务院达成妥协，而以提出第七舰队进驻台湾作为交换条件的。

国务院的一贯观点是放弃蒋介石以及对台湾的援助，但在朝鲜问题上则采取较为强硬的态度。如反对过早从朝鲜半岛撤军，一再提出增加对韩国的经济和军事援助等。相反，美国军方比较重视台湾问题，主张增强军援以保住台湾，但对韩国则抱着冷淡态度，所做应急计划都是一旦发生战争即从朝鲜半岛撤退。国务院与国会反对派和军方曾经有过一次妥协，即在 1950 年初国会为提供军事援助拨款问题进行讨论时，国务院为给韩国争取拨款，不得不同意把台湾列入援助对象。[①] 这次，艾奇逊在朝鲜战火已经燃起的危急时刻，迅速改变对台态度，除了受到政治压力之外，更深刻的含义是换取军方和国会反对派在朝鲜问题上与国务院的主张保持一致。

实际上艾奇逊未必指望第七舰队能够真正发挥建议中所说的那种军事作用。美国第七舰队当时有 1 艘航空母舰、1 艘重巡洋舰、1 艘轻巡洋舰、12 艘驱逐舰及辅助舰只，其时军事责任的范围在整个东亚地区。其中以日本佐世保为基地进入台湾海峡的只有 2 艘巡洋舰、6 艘驱逐舰和 1 艘运输舰。同时，这些舰只还要担负朝鲜战争中的作战任务。以这样的军事力量完全负责台湾地区的安全，显然是不够的。艾奇逊在 1951 年 5 月参议院关于远东军事形势的听证会上也承认：由于舰队承担着在朝鲜作战的任务，因此无力阻止中国共产党人夺取台湾。但是，部署一支微小的军事力量具有象征意义。诚如美国外交史学家福斯特·弗·杜勒斯所说："在台湾周围划定的这条防御线对于使那些长期鼓吹这种防御屏障的共和党人缄默不语，是

① 参见卡尔沃科雷西编著：《国际事务概览（1949–1950）》，第 608–609 页。

必不可少的。”而且，派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这项决定是“争取两党支持干预朝鲜的一个决定性因素”。[1]

因此可以认为，美国转变对台政策是其转变对朝鲜政策的前奏，是国务院促进政府对朝鲜政策转变的政治手段。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争取两党对外政策一致，迅速采取全面卷入朝鲜战争的前提。

发表于《当代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4期[2]

① 江南：《蒋经国传》，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4年，第249页；约瑟夫·格登：《朝鲜战争——未透露的内情》，于滨等译，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第172页。

② 编辑部刊登时将标题改为“50年代初美国改变对台湾政策的经过及其后果”，并做了删节，此处按原文刊出。

中共进攻台湾战役的决策变化及其制约因素
（1949—1950）

1949—1950 年中共策划的进攻台湾战役，就其本质而言，是中国内战的延续。而在历经 4 年的国共军事角力后，台湾及金门、马祖等沿海岛屿是中共唯一没有攻占的地区，研究者对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一直很感兴趣。① 不过，由于档案文献的短缺，有关这一问题的讨论，或者出现了判断的偏差，或者只涉及某一方面，至今没有一个对中共进攻台湾战役决策全过程的描述。在一般人的印象中，是朝鲜战争的爆发，特别是美国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最终阻断了中共对台湾的军事行动。按照过去很多学者的说法，就是北朝鲜的军事行动挽救了台湾和蒋介石政权。然而，面对中国、俄国和美国大量新的解密档案，应该指出，这种说法存在着简单化与片面化之嫌。

本文拟在此前研究的基础上，利用 2004 年以来公布的最新档案文献，即俄国有关中苏关系的解密文件、美国中央情报局对华情报评估以及中国（大陆）最近出

---

① 比较集中讨论这一问题的论文有 Jon W. Huebner, "The Abortive Liberation of Taiwan", in *China Quarterly,* No.110, June 1987, pp.256-275；周军：《新中国初期人民解放军未能遂行台湾战役计划原因初探》，《中共党史研究》1991 年第 1 期；He Di, "The Last Campaign to Unify China: The CCP's Immaterialized Plan to Liberate Taiwan, 1949-1950", in *Chinese Historians,* No.5, Spring 1992, pp.1-16；青石：《金日成阻止了毛泽东进攻台湾的计划》，《明报月刊》1994 年 7 月号；沈志华：《50 年代初美国对台政策的酝酿和武装侵占台湾的决策过程》，《当代中国史研究》1995 年第 5 期，第 24–36 页；胡哲峰：《粟裕与攻台作战的准备》，《军事历史》1997 年第 5 期，第 38–42 页；陈东林：《1949 年毛泽东为何未能下令进攻台湾》，《国史研究参阅资料》第 60 期，2001 年 12 月，第 1–27 页；王善中：《新中国成立之初为什么未能解放台湾？》，《党史研究资料》2002 年第 10 期，第 1–8 页。

版的《粟裕年谱》、《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等[①]，考察1949—1950年中共进攻台湾计划从提出到放弃的整个决策过程，并分析导致其决策变化的主要因素。同时，进一步深入探讨在国际局势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杜鲁门政府如何转变了对台湾的政策。[②]

一、中共攻台的最初设想与渡海作战失利

1949年初，当中共已经取得中国半壁江山的时候，斯大林一方面担心人民解放军继续南进可能引起美国的干预，一方面希望把中共控制在莫斯科手中，因此有意出面在国共之间进行调停。[③]毛泽东按照自己的既定方针，指挥百万大军打过长江以后，斯大林的忧虑和担心进一步增加。5月26日斯大林致电毛泽东，要中共注意美国的动向。考虑到中共军队继续南下，接近东南亚边界会引起西方列强的激烈反应，特别是美国和英国在中国北方港口登陆的“危险性相当严重”，斯大林建议毛泽东：不必急于准备向南进军至印度支那、缅甸、印度边境；从人民解放军主力中挑选两支优秀部队，调往天津和青岛，预防敌人部队登陆；暂时不要缩减人民解放军部队的人数。[④]毛泽东当然明白斯大林的意图，6月11日他向斯大林报告，已经按照苏联的要求进行了部署和下达了命令。毛说：“根据时间和兵力的计算，今年冬季还可以再占领八个省：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四川、甘肃、宁夏、青海。剩下的只有新疆、西康（四川省的西部）、台湾和海南岛，这些地方考虑到明年再夺取。”天津、青岛、上海的防守都已得到加强。至于台湾问题，毛泽东轻描

① 俄国档案主要见 *Ледовский*, *Мировицкая*, *Мясников* (сост.)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XX веке,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Том V,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1946-февраль 1950, Книга 2: 1949-февраль 1950гг.（二十世纪俄中关系史：文献与资料）。美国情报评估档案见：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 (ed.), *Tracking the Dragon: National Intelligence Estimates on China During the Era of Mao, 1948-1976*, Washington: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2004；沈志华、杨奎松主编：《美国对华情报解密档案（1948–1976）》1–8卷，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9年。中国近年出版的史料主要有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1–3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和《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1–4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编：《粟裕年谱》（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以及再版的《叶飞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7年）等。

② 笔者感谢在“新中国建国史”国际研讨会上刘晓原等同行对本文提出的修改意见。

③ 参见沈志华：《求之不易的会面：中苏两党领导人之间的试探与沟通——关于中苏同盟建立之背景和基础的再讨论（之一）》，《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第1–13页。

④ 1949年5月26日斯大林致毛泽东电，АПРФ, ф.45, оп.1, д.331, л.73-75,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с.136-138。

淡写地告诉斯大林：第三野战军有15个军，60万人。其部署的情况是：三个军于6月下半月将撤出上海，准备在8月或9月占领福建省。以后这支军队将在福建省执行驻防勤务，重点放在福州。“台湾孤立在海上，那里有7万多人的敌军残余。目前暂不考虑占领它，这个问题可能到明年解决。”①

但是，对于毛泽东来说，解放台湾是他彻底消灭蒋介石集团，完成国家统一大业的宿愿。所以，他实际上是有另外一番考虑的。当中共军队计划向福建推进的时候，毛泽东就开始想到攻占台湾的问题了。5月23日，进攻上海的战役尚未结束，毛便为中央军委拟电告南下的第三野战军：“你们应当迅速准备提早入闽，争取于六七两月内占领福州、泉州、漳州及其他要点，并准备相机夺取厦门。入闽部队只待上海解决，即可出动。”② 指挥入闽的第十兵团司令员叶飞提出休整一个月再进军福建，毛泽东6月2日复电，“同意以叶飞三个军入闽”，但仍希望“行动时间如能提早至本月下旬更好”。③6月13日，第三野战军副司令员粟裕致电中央军委和华东局，提出第十兵团因部队准备来不及，建议向福建进军延至6月25日开始行动。这时，毛泽东才透露，及早进军福建的目的就是要准备解决台湾问题。中央军委在6月14日的复电中，一方面表示同意十兵团行动日期，并认为“如果准备工作尚未做好，延至7月上旬亦可”；另一方面则指出：“请开始注意研究夺取台湾的问题。台湾是否有可能在较快的时间内夺取，用什么方法去夺取，有何办法分化台湾敌军，争取其一部分站在我们方面实行里应外合，请着手研究，并以初步意见电告。”④6月21日，毛泽东又指示华东局：目前几个月内有四件大工作：（一）经营以上海为中心的新占城市广大地区；（二）占领福建及厦门；（三）帮助二野西进；（四）准备占领台湾。对台湾要积极进行策反工作，准备内应条件，希望夏秋两季完成各项准备，冬季占领台湾。⑤ 看来，毛泽东当时对进攻台湾的问题考虑过于简单，甚

① 1949年6月14日科瓦廖夫致斯大林电，АПРФ, ф.45, оп.1, д.331, л.101-111,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с.141-147。

② 毛泽东：《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519页。

③ 叶飞：《叶飞回忆录》，第452页；毛泽东：《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第607页。

④ 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编：《粟裕年谱》，第471页。

⑤ 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编：《粟裕年谱》，第471–472页；中国军事博物馆编著：《毛泽东军事活动纪事（1893–1976）》，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第811–812页。

至以为1949年底就可能占领台湾。[①]

进攻台湾与国共其他战场较量的最大区别就是要跨海作战，对于大陆作战，中共在兵力及士气方面具有明显优势，但是跨海作战主要依靠海军和空军的支持，在这方面，优势则完全掌握在国民党军队手中。根据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报告，到1949年10月，国民党海军拥有150多艘舰船，其中包括美国制造的护卫驱逐舰，兵力3万人。因与空军协同作战成功地实施了封锁和巡逻任务，“最近几个月海军的士气有所改观”。空军约有1000架飞机，其中军用飞机500架（轻型轰炸机、战斗机、侦察机、双引擎运输机和教练机），兵力8.5万至10万人，其中约1300名飞行员。除一个轻型轰炸机中队和两个战斗机中队外，国民党空军全部集结于台湾。“自南京和上海陷落后，空军的战斗力有一定的提高。”[②]

此时，中共的海空军均在初创阶段，实力很弱。1949年4月渡江战役开始时，中共依靠起义的国民党海军第二舰队和第五巡防队建立了第一支海军部队，共有25艘护卫船、炮艇。直到内战结束，海军总共拥有兵力4000余人，各种舰船183艘（含商船），但“性能落后，陈旧不堪”。稍具规模的军舰，如重庆号巡洋舰、长治号护卫舰以及“安东”舰、“永绥”舰等，均被国民党飞机炸沉或被迫自沉。仅1950年1月25日一次空袭，即有“常州”号、“万寿花”号等26艘舰船被炸伤炸沉。中共海军成立一周年之际，虽建立了三支舰队，但能够作战的只有8艘护卫舰、8艘炮舰和16艘登陆舰、登陆艇、江防舰和炮艇等。[③]中共的空军正式成立于1949年10月25日，时有飞机159架，其中可以使用的战斗机、袭击机33架，轰炸机10架，运输机13架，侦察机2架，通讯机7架，教练机39架。空军兵力不足3000人，其中飞行员202人。[④]

中共军事领导人当然了解国共在海空军方面的实力差距，粟裕在7月2日的一封电令中指出：“为完成攻占台湾任务，必须迅速加强海军。”[⑤]毛泽东在7月10日

---

① 关于1949年冬占领台湾的想法，从目前的资料看，毛泽东只对粟裕讲过这一次。粟裕在12月17日召开的三野干部会上曾说“原来预定今年打台湾的”（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编：《粟裕年谱》，第489页），显然就是根据毛的6月21日电报。在其他场合，毛说的都是1950年夏季或下半年进攻台湾。很可能，毛泽东当时还没有考虑好这个问题，但他占领台湾的急切心情，由此可见一斑。

② ORE 76-49, Oct. 19, 1949, CIA Research Reports China, Reel-1, pp.316-325.

③ 杨国宇主编：《当代中国海军》，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26、58–61页；张爱萍：《忆创建人民海军》，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海军回忆史料》，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9年，第1–8页。据中情局的估计，起义或被俘获的国民党舰船（包括3艘护卫驱逐舰），“大部分不能航行”。ORE 76-49, Oct. 19, 1949, CIA Research Reports China, Reel-1, pp.316-325。

④ 王定烈主编：《当代中国空军》，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37–40页。

⑤ 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编：《粟裕年谱》，第473页。

致信周恩来说，据朱德建议，可考虑选三四百人去苏联学习空军，同时购买飞机100架左右，连同现有的空军组成一支攻击部队，掩护渡海，准备明年夏季夺取台湾。同时须考虑在闽、浙两省建立飞机隐蔽库。7月26日，中共中央军委决定以第十四兵团司令部及直属部队和军委航空局组成空军领导机关，并决定派刘亚楼等赴苏具体商谈购买飞机、聘请专家顾问和帮助开办航校等事宜。① 看来，毛泽东确定的攻台时间是1950年夏季。而面对国民党军队的海空优势，中共欲迅速提高海空军作战能力，完成攻占台湾的任务，只能寄希望于莫斯科。

1949年2月初，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秘密访问中共中央所在地西柏坡，通过与中共领导人多达12次的会谈，莫斯科已经充分了解到中共的亲苏立场和主张。斯大林对此非常满意，决定尽量满足中共的要求。② 因此，在刘少奇6—8月访问莫斯科期间，斯大林答应在各方面向中共提供援助。关于海军和空军的建设，斯大林在6月27日第一次会谈时便主动提出，苏联准备帮助中国建立自己的舰队，首先可以帮助打捞沉船，还同意派遣一支分舰队去青岛港，以帮助中国巩固海防。对于中共提出的建立莫斯科与北平之间航线的请求，斯大林说，苏联已经准备好，现在就可以着手组建，还答应帮助中国建立飞机装配和修理工厂，向中国提供最新型的歼击机。③ 根据刘少奇的要求，斯大林在11日会谈中又答应在旅顺帮助建立一所海军学校，并帮助中国建立起海岸防御体系。④

在此情况下，中共向苏共通报了攻打台湾的大体计划。刘少奇在7月4日给斯大林的书面报告中透露，中共将在1950年进攻台湾，“因有部分国民党军队做内应，台湾可能提早占领”。⑤7月25日，毛泽东在给刘少奇并转斯大林的电报中讲得更加明确：“第三野战军将只在两个地方，即在福建省和台湾开展军事行动。福建省的军

---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年）》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529页。

② 关于西柏坡会谈的详细情况，见沈志华：《从西柏坡到莫斯科：毛泽东宣布向苏联“一边倒”——关于中苏同盟建立之背景和基础的再讨论（之二）》，《中共党史研究》2009年第4期。

③ 1949年6月27日斯大林与中共代表团会谈纪要，АПРФ, ф.45, оп.1, д.329, л.1-7,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с.148-151。这个纪要是经斯大林审阅过的，并按照他的指示，由科瓦廖夫进行了补充和修改。档案原件显示，斯大林修改会谈纪要时在这里划了一个问号，并划掉了“最”字。

④ 1949年7月6日刘少奇致斯大林信，АПРФ, ф.45, оп.1, д.328, л.51-55//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1996, №5, с.84-8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1册，第26–27页。1949年7月18日刘少奇致中共中央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1册，第35页。

⑤ 1949年7月4日刘少奇给联共（布）中央和斯大林的报告，АПРФ, ф.45, оп.1, д.328, л.11-50,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с.151-162。

事行动将于今年10月结束，而攻占台湾的军事行动要在我们建立了空军部队后才能进行，这也许要在明年的下半年才有可能。”电报还讲述了攻占台湾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在上海，自封锁之日起，严重的困难日益加强。所以，为了粉碎这种封锁，必须占领台湾，但是没有空军是不可能占领台湾的。我们希望你和斯大林同志就这一问题交换意见，苏联能否在这方面帮助我们，即在六个月至一年的期限内，在莫斯科为我们培养1000名飞行员和300名机场勤务工作人员。此外，苏联能否卖给我们100—200架歼击机、40—80架轰炸机，它们将用于攻占台湾的军事行动。在建立海军舰队方面，我们也请求苏联帮助我们。我们设想到明年的下半年，即在我军进攻台湾期间，除西藏外，中国大陆的所有领土都将被我们占领。”[①]

在7月27日的会谈中，苏方答应向中国出售雅克式战斗机100—200架、轰炸机40—80架及备份机件和重磅炸弹，也同意为中国培训飞行员，只是提议不必来苏联，航空学校可以设在中国。[②]8月6日，中共中央致电刘少奇，因国民党飞机在长江一线轰炸造成严重损失，请苏联提前运来360门高射炮。[③]经商谈，苏联军方于8月9日提出了一个组建高炮兵团的方案：以3.7厘米和8.5厘米高射炮各180门组成10个高炮团，一周后即可准备好；为训练中国炮手，苏联将派22名教练在炮兵上校或少将带领下，随中共代表团去中国。11日中方回电，完全同意苏联方案，提出再订购360挺高射机枪。[④]8月18日，在莫斯科负责商谈空军筹建工作的刘亚楼致电中共中央军委，建议为攻打台湾应建立伞兵部队，并向苏联定购运输机和降落伞，聘请苏联顾问和教员。周恩来回电表示同意，嘱他与苏方商谈。[⑤]

除了请求苏联帮助建立海空军外，中共还试图请苏联空军和海军协助攻打台湾。在7月25日的电报中，毛泽东很婉转地提出：“欧洲和世界其他地区的反帝运动有可能大步前进，在美国和英国也有可能会爆发经济危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利用苏联的援助来攻占台湾（即除了请求苏联帮助我们培训飞行员和卖给我们

---

① 1949年7月25日毛泽东给刘少奇并转交斯大林电，АПРФ, ф.45, оп.1, д.328, л.137-140,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с.170-171。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年）》下卷，第541页；吕黎平：《赴苏参与谈判援建空军的回忆》，《军事史林》1994年第1期，第25页。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1册，第236页。

④ 1949年8月10日刘少奇致中共中央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1册，第47–48页；金冲及主编：《刘少奇传》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653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221页。

⑤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1册，第279–280页。

飞机外，也许还不得不请求苏联给我们派苏联空军和海军的专家及飞行员，参加军事行动），这会不会给美苏关系带来损害？请你向斯大林同志报告这一切，以便他来斟酌我们的计划，是否可以将其付诸实施？”[①]关于苏联对这个问题的态度，笔者没有看到直接的文献证据，但时任苏共中央常驻中共中央代表科瓦廖夫的回忆提供了一些情况。根据科瓦廖夫保存的私人档案文件，在刘少奇离开北平前，毛泽东就曾致电斯大林，要求苏联对台湾登陆作战给予直接的空中和海上支援。但没有得到明确的答复。科瓦廖夫回忆说，当刘少奇在莫斯科重新提出这个问题时，斯大林当即表示拒绝。他告诉中国人，由于战争，苏联已经承受了无法估量的损失。从西部边界到伏尔加河的这片国土已成废墟。苏联在军事方面援助攻打台湾意味着将与美国空军和海军发生冲突，并为美国发动新的世界大战造成口实。苏联没有任何理由再冒这个风险。斯大林说："如果我们领导人这样做，俄国人民不会理解我们。不但如此，由于我们对战时和战后的困难和灾难估计不足，以及轻率地采取行动，他们还可能把我们赶走。"斯大林建议把这件事提交联共（布）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可以请高级军事领导人和一些部长参加。在 7 月 27 日的会议上，斯大林重复了他的看法。在发言结束时，刘少奇宣布撤回请求苏联直接提供海空军援助的要求，表示这个问题已经过去。[②]

很可能，这种情况使得毛泽东在确定攻台的时间上有所犹豫。7 月 30 日，粟裕致电毛泽东，为迅速完成攻占台湾的准备，建议华东海军暂缓迁往青岛，并提出："依各方情况及条件，估计攻台时机以四野攻广州之同时发起为有利，果如是，则时间已很迫促，但目前海军情况及攻台准备之困难如此，实难完成攻台任务。"[③]8 月 2 日毛泽东回电，同意华东海军留下归他指挥攻打台湾，并说："你们积极准备攻台湾是正确的。必须从各方面准备攻台，打破干部中的畏难心理。"毛还指出，对国民党军队的策反工作十分重要，需积极准备，中央方面正在同时准备空军。至于攻台的时间，"如有台湾国民党海陆空三方面大量可靠内应，则可以早日举行，否则必须推迟到我们空海两军（特别是空军）条件充分具备之时，故具体时间问题

① 1949 年 7 月 25 日毛泽东给刘少奇并转交斯大林的电报，АПРФ, ф.45, оп.1, д.328, л.137-140,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с.170-171。

② *Ковалев* Диалог Сталина с Мао Цзэдуном, 1991, №6, с.88; Sergei N. Goncharov, John W. Lewis, and Xue Litai, *Uncertain Partner: Stalin, Mao, and the Korean War*,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69-70.

③ 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编：《粟裕年谱》，第 475 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 年）》下卷，第 541 页。

目前不能确定。”[①]

显然，斯大林坚持了他在中国内战中的一贯立场，即不向中共提供直接的军事援助。但与此同时，莫斯科加快了帮助中共空军和海军建设的步伐。1949年9月19日苏联部长会议责成武装力量部向解放军总部及军事学校派遣领导干部、顾问、教员、教官及服务人员共915人，其中空军780人，海军86人，炮兵21人，所有费用均由财政部从苏联部长会议准备金中支出。同时，向空军提供各种教学用飞机334架、装有指挥仪和测距仪的高射炮360门（8.5厘米的120门，3.7厘米的240门）、高射机枪360挺及炮弹，价值总额2650万美元。[②]11月4日，为保证中国航校和高射炮团组织筹备和正常展开工作，苏联部长会议作出决议，再向中国增派97名空军顾问、教官及军医等服务人员，供应500辆汽车、12台拖拉机、6架У-2型飞机、91台航空发动机及其他辅助设备，价值2800万卢布。11月19日，苏联部长会议又决定向中国提供战斗机、教练机和运输机以及航空发动机、高射炮、机关枪等装备，总共为1.258亿卢布。以后两个月，部长会议又连续三次决议向中国提供伞降物资、机场装备、航空汽油等共计1.663亿卢布。[③]

然而，就在中共积极准备台湾战役的时候，福建沿海岛屿作战失利，改变了中共的计划。问题首先出在金门。9月26日，三野第十兵团在福建泉州召开作战会议，研究攻取金门、厦门两岛的作战方案。会上就“金厦同取”、“先金后厦”、“先厦后金”三个方案进行讨论，决定金厦同时攻取，由第二十八军担任攻取金门任务，第二十九军、第三十一军担任攻取厦门任务。10月7日电告粟裕：“决于本月中旬（内定13日）同时发起攻歼金厦两岛。”粟裕11日复电，同意作战部署，但提出以两个师攻金门是否完全有把握的问题。第十兵团12日决定将同时攻取厦金两岛改为先取厦门再攻金门。10月15日，解放军发起厦门战斗，于10月17日攻克厦门和鼓浪屿，歼敌2.7万人。[④]厦门得手后，负责攻占金门的二十八军在军

---

① 1949年8月2日军委致粟裕并告华东局电。参见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编：《粟裕年谱》，第475页。

② 1949年9月19日苏联部长会议决议及附件，АПРФ, ф.3, оп.65, д.418, л.413-422,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с.182-186; АВПРФ, ф.07, оп.23а, п.236, д.18, л.32-33, 126，转引自*Кулик* Китайская Народная Республика в период становления (1949-1952гг.)//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1994, №6, с.75。

③ 1949年11月4日苏联部长会议决议，АПРФ, ф.3, оп.65, д.418, л.34-38；1950年1月20日梅尼希科夫给斯大林的报告，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с.212-214, 344-347。梅尼希科夫时任苏联对外贸易部部长。

④ 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编：《粟裕年谱》，第478–479页。厦门战斗情况详见叶飞：《叶飞回忆录》，第465–471页。

长、政委均病休的情况下，于24日晚发起攻击。因准备渡海船只不够，第一次只运送了三个团（二十八军两个团，二十九军一个团）登陆。占领了古宁头滩涂阵地后，登陆部队在缺乏统一指挥的情况下，没有派兵固守，等待后援，即深入追击败退的守军。此时，撤离潮汕的胡琏兵团接蒋介石命令增援金门，刚刚上岛，飞机、军舰、坦克齐上阵；而中共运送部队的船只全部被敌机炸毁，后援部队无法到达。经过三天激战，登陆金门的近万名官兵全军覆没，被俘者3700余人。守军伤1982人，亡1269人，总计3251人。[①]此役大大鼓舞了国民党的士气，据说蒋介石闻讯后激动地流下了眼泪，蒋经国则在10月26日的日记中称之为“转败为胜、反攻复国”的转折点。[②]

蒋家对这次战斗意义的估计显然有些过分，但对于中共来讲，金门之战确是国共内战以来的最惨痛的失败。10月29日，毛泽东批转了《关于攻击金门岛失利的教训》的通报，要求“各兵团及各军负责同志，引起严重注意”，并写下批语：“当此整个解放战争结束之期已不在远的时候，各级领导干部主要是军以上领导干部中容易发生轻敌思想及急躁情绪，必须以金门岛事件引为深戒。对于尚在作战的兵团进行教育，务必力戒轻敌急躁。稳步地有计划地歼灭残敌，解放全国，是为至要。”[③]除了急躁轻敌、准备不足等问题，叶飞从军事角度总结的最主要的教训就是整个战役没有空军和海军的配合。“空中没有掩护，海上没有支援”，只靠木船作战，又无渡海经验，是导致作战失利的重要原因。[④]

然而，空海军的建立并非一日之功。尽管一再强调要有充分准备，几天之后，中共军队再次在渡海战斗中受挫。11月1日，三野向中央军委报告了定海作战方案，确定的方针是“力戒轻敌骄傲，弱敌当做强敌打，充分的战前准备”，要求“集中兵力、火力，求得一举成功”。11月3日，在第七兵团造成对定海的战役包围态势下，第二十一军六十一师首先发起进攻舟山群岛的登步岛战役。结果，由

① 叶飞：《叶飞回忆录》，第472–478页；田兴柱：《“金门战役——古宁头大捷”五十周年纪念专辑》，台北，1999年，第105–108页。战役经过参见丛乐天、邢志远主编：《回顾金门登陆战》，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国民党方面的记述，详见“国史馆”史料处编：《金门古宁头、舟山登步岛之战史料初辑》，台北：“国史馆”印行，1979年，第50–84页；“国史馆”史料处编：《金门古宁头、舟山登步岛之战史料续辑》，台北：“国史馆”印行，1982年，第17–309页。关于中共登陆部队被俘人数，国民党方面各种材料说法不一，笔者以为田著的考证较为可靠。

② 刘亚洲：《金门战役检讨》，《国情传真》，№2004-14；“国史馆”史料处编：《金门古宁头、舟山登步岛之战史料初辑》，第48页。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第100–101页。

④ 叶飞：《叶飞回忆录》，第479页。

于风向、潮汐变化，后续部队不能及时赶到，而敌方援军源源不断，并有海空军支援。登岛部队激战三昼夜，在守备部队的顽强反击下，伤亡 1488 人，歼敌 3200 人，最后被迫撤离该岛。[①] 这一战役，再次引起毛泽东的注意，他在 11 月 14 日给粟裕的电报中指出："舟山群岛共有敌军五万人，并有颇强的战斗力，你们以两个半军进行攻击是否足够？鉴于金门岛及最近定海附近某岛作战的失利，你们须严重注视对定海作战的兵力部署，准备情况及攻击时机等项问题。如果准备未周，宁可推迟时间。提议你们派一要员直赴定海附近巡视检查一次。"[②]

这两次渡海作战的失利，使中共领导人意识到，攻取台湾绝非易事。于是，进攻台湾的战役不得不分为两步走，首先必须夺取沿海岛屿，如海南岛、舟山群岛和金门岛等，然后才谈得上进攻台湾。11 月下旬，粟裕进一步总结了金门、登步两战教训，分析敌我态势，研究新的战法，认为蒋介石有困守沿海岛屿甚至以台湾兵力增强舟山、金门诸岛的企图，故而提出：应首先"尽歼沿海诸岛的蒋军，以造成攻台的更有利条件"，但蒋军占有海空军优势，我军还不懂得对有海陆空直接配合而凭岛固守之敌的战法。因此，解放舟山群岛的条件尚未成熟，建议推迟至明年 1 月或 2 月。至于攻打台湾，粟裕提出在进行军事准备的同时，必须加强政治工作，大力开展争取、分化、动摇、瓦解和宣传工作，并放宽策反对象的范围，把战犯也包括进来。[③] 如此，进攻台湾的时间也只能推迟。在 11 月 15 日与苏联大使罗申会谈时，周恩来还充满信心地说：1950 年春季做好台湾登陆战役的准备，夏天实施登陆。到 12 月 5 日通报情况时，周便改口说：明年 2 月以后，人民解放军的任务就是解放西藏、海南岛和台湾。解决西藏和海南岛问题都不是很费力，但是进攻台湾的战役将十分艰巨。只有在充分准备好登陆部队、海军舰队和空军部队后，才能发动进攻。"战役的日期，看来将安排在 1950 年 9—10 月间。"[④] 粟裕在 12 月 17 日召开的三野师以上干部会议上也说，关于进攻台湾，"现在要求一切战备工作于明

---

① 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编：《粟裕年谱》，第 484–485 页；吴新华：《回顾登步岛之战》，《百年潮》2004 年第 3 期，第 9–15 页。国民党方面对登步岛战役的记述见"国史馆"史料处编：《金门古宁头、舟山登步岛之战史料初辑》，第 344–352 页；"国史馆"史料处编：《金门古宁头、舟山登步岛之战史料续辑》，第 374–439 页。据台湾方面资料，中共登岛部队伤亡 3740 人（一说 3360 人），被俘 279 人；蒋军守岛部队伤亡 2825 人。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1 册，第 137 页。

③ 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编：《粟裕年谱》，第 487–488 页。12 月 5 日，毛泽东回电同意粟裕关于舟山群岛战役的时间安排。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1 册，第 179 页。

④ 1949 年 11 月 15 日、12 月 5 日罗申与周恩来会谈备忘录，АВПРФ, ф.07, оп.22, п.36, д.220, л.57-66; АВПРФ, ф.100, оп.36а, п.150, д.4, л.86-87,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с.220-224, 226。

年2月底前准备好，或者春季准备好。如果政治情况变化也可能提前，或者海空军没有准备好，也可能推迟”。[①] 刘少奇1950年1月11日给毛泽东的电报说：“关于舟山、台湾、金门、海南岛作战的材料都转给你了。根据粟裕报告，如果没有空军的协助以及若干必要的海军协助，要进行渡海的两栖作战，是不可能的，近日海南岛及金门的报告也证明此点；参谋部近日正在研究这些问题，研究完毕后，即将材料带来莫斯科。大概这些作战都不能性急，都还要有相当长时间的准备。”[②]

为了尽早实现消灭蒋介石、统一全国的愿望，毛泽东再次想到请苏联在攻打台湾时提供直接帮助，而毛泽东没有想到的是，他莫斯科之行的结果，却导致了美国对台政策的大转弯。

二、中苏缔结联盟与美国对台政策的转变

1949年12月16日毛泽东抵达莫斯科，并于当天晚上与斯大林举行了会谈。在谈到建立海军的问题时，毛泽东并非无意地顺便提到：“国民党人在台湾岛上建立了海军基地和空军基地。我们没有海军和空军，使人民解放军难以占领台湾。鉴于这一点，我们的一些将领主张呼吁苏联援助，即苏联可以派遣志愿飞行员或秘密部队，以便尽快拿下台湾。”毛泽东说这番话是经过认真考虑的。鉴于斯大林在与刘少奇会谈时表明了苏联不愿因援助中国解放台湾而与美国发生公开冲突的态度，毛泽东才提出这种既可避免苏联公开出面，又能在实际上得到苏联援助的办法。对此，斯大林谨慎地回答：“援助形式需要进行周密考虑”，“主要的问题是不给美国人提供干预的借口”。接着又说，苏联可以提供“参谋和教官”，“其他问题我们要仔细考虑”。斯大林还提到可以利用空降部队及在岛上组织起义的办法。[③] 显然，斯大林仍然不同意让苏联军事力量直接参与攻打台湾的战役，不过，继续帮助中国尽快建立海空军，则是莫斯科无法推脱的责任。

访苏期间，毛泽东在想方设法与斯大林周旋，处理中苏同盟条约问题的同时，十分关注攻占沿海岛屿和准备进攻台湾的进展情况。12月18日，即到达莫斯科的第三天，毛泽东即致电林彪，详细讨论攻打海南岛的问题。毛说：“渡海作战，完

---

① 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编：《粟裕年谱》，第489–490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1册，第313页。

③ 1949年12月16日斯大林与毛泽东会谈记录，АПРФ, ф.45, оп.1, д.329, л.9-17,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с.229-233。

全与过去我军所有作战的经验不相同，即必须注意潮水与风向，必须集中能一次运载至少一个军（四五万人）的全部兵力，携带三天以上粮食，于敌前登陆，建立稳固滩头阵地，随即独力攻进而不要依靠后援。”毛还特别叮嘱要吸取金门作战失利的教训，要林彪“向粟裕调查渡海作战的全部经验，以免重蹈金门覆辙”。[①]1950年1月10日，毛泽东又就海南岛作战问题致电中共中央转林彪，指示如准备不及，不要勉强，“争取于春夏两季内解决海南岛问题”；“只要能一次运两万人登陆，又有军级指挥机构随同登陆（金门岛是三个不同建制的团又无一个统一的指挥官，由三个团长各自为战），就能建立立足点，以待后续部队的继进”；加紧在敌军内部“进行秘密的策反工作”，“如能得到这个条件，则渡海问题就容易很多了”。[②]1月11日，毛泽东致粟裕电，要求详细报告以下情况：“（一）你们对舟山群岛之敌有无办法进行策反工作，你们是否进行了此项工作，结果如何？（二）你们对舟山群岛进攻的准备工作做到了什么程度，船只的准备是否增加了？（三）叶飞对金门岛进攻的准备工作如何，何时可以攻金门岛？（四）你何时可到北京与聂荣臻刘亚楼同志会商？”[③]未等收到汇报，毛泽东就迫不及待地要科瓦廖夫转告斯大林，“过三五天将完成制定冲破封锁上海战役和占领台湾岛的规划”，并由刘亚楼带来莫斯科。毛还要求斯大林同意在华苏联军事顾问和武官一同来莫斯科会商。[④]2月4日，毛泽东又嘱咐粟裕，加强对起义的伞兵第三团的政治训练，“我们需要以这批伞兵做基础训练一个伞兵部队，作为台湾登陆作战之用。”[⑤]

此时，华东军区确在积极进行准备。1950年1月，三野前敌委员会提出了年内六大任务，其中首要任务就是“解放台湾及肃清东南沿海岛屿的残敌”。随后，召开师以上政工会议，要求部队的各种工作以台湾作战为中心。同月17日，肖劲光就任海军司令，受命伊始的第一项任务就是在粟裕领导下配合三野准备渡海作战，攻占台湾。[⑥]为保守秘密和不误战机，2月25日陈毅要求中央授权华东局和三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第190–191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第22–229页。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第230页。

④ 1950年1月12日科瓦廖夫给斯大林的报告，АПРФ, ф.3, оп.65, д.364, л.73,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c.261。

⑤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第256页。关于国民党伞兵第三团起义的经过，见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空军回忆史料》，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第128–139页。

⑥ 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编：《粟裕年谱》，第493页；周军：《新中国初期人民解放军未能遂行台湾战役计划原因初探》，第67页；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海军回忆史料》，第16–21页。

野自行处理作战物资和经费调动。刘少奇第二天即答复，同意由华东局全权处理华东地区的作战物资和经费。[①]

中共在明知海空军实力不如国民党，而苏联又不肯给予直接军事支援的情况下，仍积极备战，计划首先解决沿海岛屿问题，再进一步攻占台湾，其考虑的主要因素之一是美国对台湾的消极态度。就在杜鲁门发表台湾问题声明的同一天，即1月5日举行的军事会议上，粟裕提出：美国不可能派军队保护国民党。他强调，从外交上说，美国已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因此如果人民解放军进攻台湾，它没有理由进行干预。从政治上说，华盛顿的政策制定者如果介入中国内战的最后一次战役，就难以同英、菲、日等盟国取得一致的意见。粟裕认为，美国至少需要5年的时间才能动员起足够的军队在远东发动一场重大的军事冲突，他们不会派军队到台湾，但可能会提供飞机、大炮和坦克。在1月27日的会议上，粟裕更坚信了这一看法。[②]粟裕的这个判断是准确的。

毛泽东访问莫斯科的消息，引起了美国的极大关注。在中国内战的最后关头，美国采取了消极观望的态度，不仅陆续撤走了在青岛和上海的军事力量，而且同意司徒雷登大使留在南京与中共接触，直到1949年底，美国对华政策仍然处于“等待尘埃落定”的摇摆之中。关于台湾问题，早在1949年3月，中央情报局就认为，假使美国无所作为，台湾最终将处于中国共产党的控制之下。[③]到10月，则进一步指出：“没有美国的军事占领和控制，台湾将如同中国其他地区一样，很可能在1950年底为中共所控制。”[④]这种态势迫使美国必须做出选择，或者继续观望，放弃台湾，或者出面干预，控制台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美国政府曾倾向于不让台湾被共产党军队所占有。在10月初通过的题为“美国关于福摩萨的立场”的国家安全委员会NSC37/8号文件中，华盛顿决策层考虑到国民党政权拥有超过1亿美元的黄金、白银和外汇储备，以及大量囤积的军用物资，认为蒋介石亟需的不是经济和军事援助。“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对台湾进一步予以援助的项目将完全可能是，使国民党领导层坚信，美国决心阻止共产党夺取台湾。”显然，华盛顿高层已明确流露出排除中共政权掌控台湾的意图，只不过杜鲁门政府尚未确定如何阻挠中共攻占台湾的具体措施。该文件只是提出，为了鼓舞国民党军队坚守台湾的信心

---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1册，第536–537页。

② Chen Jian, *China's Road to the Korean War: The Making of the Sino-American Confrontat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4, p.102.

③ ORE 39-49, March 14, 1949, CIA Research Reports China, Reel-1, pp.250-254.

④ ORE 76-49, October 19, 1949, CIA Research Reports China, Reel-1, pp.316-325.

和士气，即使目前他们尚不亟需援助，也要对其提供援助，“美国完全有必要不仅使蒋介石大元帅，而且使中美民众看清这种立场”。[①]12 月 8 日国民党“政府”迁台以后，美国对中国问题做出明确表态便成为迫在眉睫的事情了。鉴于台湾在军事上的战略地位，美国曾设想利用岛内的自治运动来达到由美国控制台湾的目的。[②]当蒋介石从大陆撤往台湾，并且加强了对台湾的控制之后，美国设想的把台湾与大陆分离的方案看来难以实现。特别是国务卿艾奇逊秘密派往台湾考察的麦钱特汇报了台湾之行的印象后，国务院已了解到，只要蒋介石还能控制台湾，那么所谓“台湾独立”或对台湾实行托管等方式，都是行不通的。在麦钱特看来，考虑到这位最高统帅对当地政治的铁的掌控，无法实施政变。蒋介石、国民党人和台湾的命运似乎是不可分开的。1949 年 11 月 2 日，杜勒斯等人制定了一份有关远东政策的文件，否定了美国以武力或托管方式控制台湾的方案。[③]于是，问题的焦点就转变为：为了美国的战略利益，是否应该介入中国内战，支持和援助蒋介石政权。这一点，由于毛泽东作为新中国最高领导人已经前往莫斯科而显得尤为迫切。

国防部的意见是通过有限的军事援助使蒋介石政权再拖一个时期，看情况发展而定。1949 年 12 月 23 日参谋长联席会议向国家安全委员会提交的一份备忘录（NSC37/9 号文件）指出，为国民党在台湾的反共“政府”制定一项适当的“指导得当、监督严密”的军事援助计划，是符合美国安全利益的。基于这一点，参联会建议立即派员调查保住台湾所需要的军事援助的性质和程度。同一天，国务院也发出一份关于台湾的政策宣传指示。这份秘密文件认为，应该利用一切宣传材料来避免如下的错误看法，即保持台湾便能拯救“中国政府”；美国对该岛怀有特殊兴趣或野心，想在台湾保有任何军事基地；该岛的丧失将严重损害美国的或其他反共的

① NSC37/8, The Posi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With Respect to Formosa, October 6, 1949, *Digital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s (DNSA)*, Presidential Directives, PD00110。事实上，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专门针对台湾问题而出台的 NSC37 号系列文件，已经清楚地表明杜鲁门政府企图把台湾从中国分离出去的打算，只是没有确立具体的决策。从 1948 年 12 月 1 日开始，直至决定向台湾海峡出兵时，在大约一年半的时间内，美国一共制定了从 NSC37 到 NSC37/10 的 11 份文件，明显表现出对台湾问题的关切，其中有几份文件均直接以“福摩萨在战略上的重要性”为标题，而几乎所有文件讨论的都是如何避免使台湾落入中共的掌控之中。（见 NSC37-NSC37/10, *DNSA*, Presidential Directives, PD00102-PD00112。）

② NSC37/1, The Posi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With Respect to Formosa, January 19, 1949, *DNSA*, Presidential Directives, PD00103.

③ Memorandum by Mr. Charlton Ogburn, Jr., of the Bureau of Far Eastern Affairs, November 2, 1949, in *FRUS,* 1949, Vol.9, pp.160-162。此前，麦钱特在 5 月 24 日的备忘录中也提出了同样的意见。见 Memorandum by Mr. Livingston T. Merchant to the Director of the Office of Far Eastern Affairs (Butterworth), May 24, 1949, in *FRUS,* 1949, Vol.9, pp.337-341。

国家的利益；美国无论如何都有责任或义务采取行动以拯救台湾。[1]此后，在致艾奇逊的一份备忘录中，副国务卿巴特沃斯提出，针对国民党政权要求增加援助且希望美国直接卷入中国内战的做法，国务院需要十分慎重。因为一旦蒋介石失败、台湾被共产党占领，那么对美国而言，后果将非常严重，例如美国在亚洲的声誉会受到损害，将丧失对远东的主动权等等。[2]这里，巴特沃斯的意见很明确，即不主张再同国民党政权纠缠在一起了。显然，国务院在为最终放弃台湾做舆论和政策上的准备。

12月29日，参谋长联席会议与国务院直接对话，阐述12月23日各自制定的文件所表述的立场。辩论中，参联会认为，从军事角度看，国民党在台湾的地位比过去稳固，因此只需要相对低廉的费用，台湾便可以支撑得比美国预想的要久。这样，美国就可以对中国加强其自身政权的努力施加影响，因为只要共产党仍须与台湾抗争或夺取台湾，他们就不会向东南亚实行扩张。因此，参联会主张，按其需要增加给台湾的军事援助，并派遣军事顾问驻台。艾奇逊强烈反对这些意见。国务院认为：(1) 必须承认，"共产党人事实上已控制了中国，中国被共产党人征服的原因主要不是在于武力，而是在于国民党自身的崩溃和共产党利用了中国长期孕育的土地革命"。(2) 防止共产主义蔓延到东南亚国家的方法是帮助该地区的国家建立内部安全局面，帮助他们发展经济和哪怕只是有限地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3) 即使按照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建议，增加对国民党的军事援助，无非是使台湾推迟一年陷落，但为此付出的代价是美国的威信在公开失败中再次降低，同时还会激起中国人民的仇恨情绪，并使苏联有借口在联合国控告美国与腐败的国民党沆瀣一气。而台湾对于美国的安全防务并无战略意义，因此不值得付出这样的代价。(4) 中国不受苏联支配是美国"在华的一项重要资产"，美国不应"以自己代替苏联作为对中国的帝国主义威胁"。中国共产党人确实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把苏联当做唯一的伟大盟友。但是，"我们的眼光要放远些，要从6年到12年而不要从6个月到12个月来看问题"。苏联想把中国北方的几个省分离出去的前景本身就包含了"中苏

① NSC37/9, Possible United States Military Action toward Taiwan Not Involving Major Military Forces, December 27, 1949, *DNSA*, Presidential Directives, PD00111。参见人民出版社编：《中美关系：文件和资料选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年，第227–230页。

② Memorandum by the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for Far Eastern Affairs (Butterworth)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December 28, 1949, in *FRUS,* 1949, Vol.9, pp.461-463.

之间必然爆发冲突的种子”。[①] 显然，军人只是从军事角度看问题，而国务院则要求从政治角度看问题。

争论的结果，杜鲁门总统支持了国务院的意见。12 月 30 日通过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第 48/2 号文件“美国关于亚洲的立场”中规定，“美国应当通过适当的政治、心理和经济手段利用中共和苏联之间，以及中国斯大林主义者和其他分子之间的分歧，同时谨慎地避免给人以干涉的印象。”至于台湾，其“重要性并不足以采取军事行动”。“美国应尽一切努力以加强它在菲律宾、琉球群岛和日本的总体地位。”[②] 毋庸置疑，这份文件确立的政策就是不准备干涉中国内战、不动用军队阻挠中共解放台湾。

在 1950 年 1 月 5 日和 12 日，杜鲁门和艾奇逊分别发表了声明和公开演讲，宣布将台湾排除在美国的远东防御线之外。[③] 就杜鲁门个人来讲，他不像罗斯福那样对蒋介石充满热情和希望，反而对国民党抱着一种厌恶和轻视的态度。因此，在台湾问题上，杜鲁门一直比较倾向国务院的意见。与此同时，对于军方和国会的态度，杜鲁门也不能不有所顾忌。就在 1 月 5 日声明发表的前一天，他带着这份由国务院起草的文件去征求国防部长约翰逊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的意见。他们都表示反对发表这个声明，约翰逊的意见尤其强烈。最后，尽管在艾奇逊的说服下发表了这份声明，但杜鲁门还是听从布莱德雷的意见做了两处修改：把“无意将台湾同中国分开”这句话删掉；在美国“无意在台……建立军事基地”这句话之前加上了“现在”的字样。[④] 这分明表示，美国宣布的这个政策是有条件的。看起来，一旦情况有变，美国改变对台政策是有基础的，而且已事先埋下伏笔。

远在莫斯科的斯大林非常清楚，美国领导人纷纷公开发表声明，目的就是要在中苏之间插入楔子，防止两国缔结联盟。所以，斯大林在莫斯科频频向毛泽东表示友好，不仅指示苏联驻联合国的代表退出安理会，甚至被迫接受了中方关于中苏条

---

①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by the Secretary of State, December 29, 1949, in *FRUS,* 1949, Vol.9, pp.463-467.

② Reel 2, NSC 48/2: The Position of the U. S. with Respect to Asia, December 30, 1949, in Paul Kesaris (ed.), *Documents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1947-1977 (microform)*, Washington: University Publications of America, 1980, pp.111-119.

③ 见世界知识出版社编：《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二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60 年，第 10–14、19–34 页。

④ 见世界知识出版社编：《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二辑，第 10 页；资中筠：《中美关系中台湾问题之由来》，资中筠、何迪编：《美台关系四十年（1949–1989）》，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年，第 44–45 页。也有研究者认为那几处重要修改是杜鲁门本人做出的。见华庆昭：《从雅尔塔到板门店——美国与中、苏、英：1945–1953》，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年，第 184 页。

约有关协定的草案。[①]同样，毛泽东为了表明与苏联友好、一致的政治立场，也做出了一系列敌视美国的举动，如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驳斥艾奇逊的宣言、征用包括美国在内的外国在华军营及处理美国经济合作署在华物资等。[②]2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字并公开发表。中苏既已成为同盟，艾奇逊主张的政治基础即告消失。中苏条约发表后，蒋介石即敏感地预言："美国远东军事不能不重新部署"。[③]尽管美国国务院依旧按照原来的方针部署在台湾的工作，然而，一项新的政策已经开始酝酿并逐渐成熟起来。

1950年4月以后，台湾形势愈加紧张。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4月占领海南岛，5月占领舟山群岛，国民党当局惶惶不可终日，美国对台湾的命运也更加关注了。在艾奇逊的主持下，国务院继续按原定政策准备撤离台湾的工作。5月17日斯特朗代办从台北报告说："我和使馆的人员都认为，台湾的命运已经注定，共产党可能在6月15日至7月底之间发动进攻。"斯特朗建议，应减少在台美国官方人员，警告所有美国公民迅速离开台湾，转移精密仪器等。斯特朗还告诉国务院，他将"在6月15日之前，把所有必须转交给英国领事馆的文件准备好"，并"确定出内部和外部的撤离单位"。5月26日，国务院给斯特朗回电，同意他关于"尽早和逐步"采取有关措施以便为撤离计划的实施奠定基础的建议，并授权他秘密地与英国方面"进行完全必要的筹划"，以防万一。[④]但是，中苏同盟条约的签订，毕竟使艾奇逊的对台政策感受到压力和攻击。[⑤]

军方从一开始就没有理会政治家们对台湾的态度，甚至有自行其是之嫌。在1950年1月杜鲁门宣言和艾奇逊的演说发表后，参谋长联席会议仍决定将过去制定的一旦发生战争不让台湾落入苏联手中的"紧急作战计划"的有效期延长到1951年底。[⑥]中苏同盟条约公布以后，美国军人的立场更加强硬，特别是1950年

① 详见沈志华：《中苏条约谈判中的利益冲突及其解决》，《历史研究》2001年第2期，第39–55页。

② 关于征用美国等国家在华兵营及处理美国经济合作署留沪物资的最新中国文献，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1册，第322–323、330–334、354–355页。

③ 蒋介石日记，1950年2月18日，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University of Stanford。

④ The Charge in China (Strong)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May 17, 1950, in *FRUS*, 1950, Vol.6, pp.340-345.

⑤ 详见 Gordon H. Chang, *Friends and Enemies: The United States, China, and the Soviet Union, 1948-1972*,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p.74；资中筠、何迪编：《美台关系四十年(1949–1989)》，第50–51页。

⑥ Dorothy Borg and Waldo Heinriches (eds.), *Uncertain Years: Chinese American Relations, 1947-50*,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0, pp.85-86.

4月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NSC68）的提出，使白宫刚刚确定的对台政策的根基开始发生动摇。

NSC68号文件的直接背景是美国对苏联成功地进行了第一次核试验的反应。[①]国家安全委员会于1950年1月31日向杜鲁门提出报告，其中建议：总统应指示国务卿和国防部长，考虑到苏联研制裂变炸弹和热核武器能力的可能性，重新审查美国在和平和战争时期的目标以及这些目标在美国战略计划中的影响。[②]然而，杜鲁门收到4月7日国家安全委员会执行秘书送来的NSC68号文件的最初文本时，并没有立即批准。他在4月12日的批复中表示，赞同其基本观点，但对文件要求大量增加国防预算（其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由6—7%提高到20%）提出质疑。杜鲁门指示国家安全委员会进一步考虑所提的行动纲要，特别是增加军费的问题。[③]于是，国家安全委员会成立了一个有政府各部门参加的特别委员会，其主要任务是对NSC68号文件的计划框架及其实施细节进行分析。[④]为此，特委会连续召开了一系列会议，讨论如何修改和落实NSC68号文件问题。委员会对1954年苏联发动战争的可能性、美国为此需要进行动员的程度、重点应放在制止战争还是准备应付战争等问题上有不同意见，特别是在国防预算问题上的看法难以统一。[⑤]在5月12日特委会的第四次会议上，大家一致同意，在相关部门的计划和评估最后提交之前，特委会不会作出关于NSC68号文件经济方面的结论。[⑥]至此，关于NSC68号文件的讨论似乎搁浅了。直到朝鲜战争爆发，NSC68号文件再次进入白宫的议事日程，在杜鲁门的催促下，9月21日，特委会完成了NSC68/1号文件，包括基本文件和附件在内长达138页。[⑦]以后又经过反复讨论和修改，最终在12月14日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七十五次会议上，杜鲁门与国安会成员讨论并通过了NSC68/4号

① 关于苏联早期核计划和核试验的研究，见 David Holloway, *Stalin and the Bomb: The Soviet Union and Atomic Energy (1939-1956)*, New Haven,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4；*Михайлов В. Н. (гла. ред.)* Создание первой советской ядерной бомбы, Москва: Энергоатомиздат, 1995。

② Report by the Special Committee of the National Secretary Council to the President, January 31, 1950, in *FRUS*, 1950, Vol.1, pp.513-523.

③ The President to the Executive Secretary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Lay), April 12, 1950, in *FRUS*, 1950, Vol.1, pp.234-235.

④ Memorandum by the Executive Secretary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Lay) to the Ad Hoc Committee on NSC68, April 28, 1950, in *FRUS*, 1950, Vol.1, pp.293-294.

⑤ 讨论的详细情况参见 *FRUS*, 1950, Vol.1, pp.297-312。

⑥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by the Executive Secretary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Lay), May 12, 1950, in *FRUS*, 1950, Vol.1, pp.312-313.

⑦ NSC68/1: United States Objectives and Programs for National Security, September 21, 1950, *DNSA*, Presidential Directives, PD00178, 00179.

文件。①

尽管朝鲜战争无疑可以被看做是NSC68号文件的催生婆，但该文件并非是在朝鲜战争爆发后才发挥作用的。恰恰相反，除了军费问题，NSC68号文件提出的基本原则和理念得到了总统、军方和国务院多数人的赞同，并且对美国改变对台湾的政策产生了重要的、决定性的影响。与战后初期凯南提出的有选择、有重点地保卫美国利益的遏制理论不同，在界定了冷战条件下美国的国家根本利益，描述了来自苏联和“共产主义阵营”对这些利益现实的和潜在的威胁后，NSC68号文件提出了“全面、无差别遏制”的概念，即在全世界范围内对任何威胁到美国安全利益的地区进行包括政治、经济和军事的综合遏制，并以此作为美国长期的战略选择。该文件不仅在手段上大大加重了遏制政策的军事化色彩，而且在地理上把遏制的范围扩大到整个欧亚大陆。文件认为，“共产党在中国的成功，加上南亚、东南亚其他地区的政治经济形势，为苏联进一步入侵这个麻烦地区提供了跳板”和“扩张的很好机会”，“远东局势进一步恶化的凶兆已经出现”。无论如何，“苏联控制欧亚大陆的潜力，在战略上和政治上都不能为美国所接受”，美国必须制止苏联的扩张，担负起保卫自由世界的任务。文件甚至断定，苏联很可能在美苏对抗中的所谓“松软地带”采取军事冒险行动。面对苏联的战略扩张态势，美国必须全面遏制，因为“自由阵营的任何一处失守，都将意味着自由阵营的全线受挫”。② 正如马里兰大学张曙光教授指出的，无论文件出笼的操作背景如何，NSC68号文件的形成，实际上体现的是美国一个新的战略思考和设计体系的建构过程。③

正是“全面遏制”这一基本原则和理念，构成了美国重新确定对华和对台政策的理论和思维基础。④ 从逻辑上讲，这种在对国际局势进行重新分析基础上确定的美国总体安全战略，自然会影响到关于对台湾政策的考虑。如果说1949年底杜鲁

① NSC68/4: United States Objectives and Programs for National Security, December 14, 1950, *DNSA*, Presidential Directives, PD00167.

② NSC68, Note by the Executive Secretary to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on United States Objectives and Programs for National Security, April 14, 1950, in *FRUS*, 1950, Vol.1, pp.237-292。有关NSC68文件的全面分析，见周桂银：《美国全球遏制战略：NSC68决策分析》，沈宗美主编：《理解与沟通：中美文化研究论文集》，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74–102页；Ernest R. May (ed.), *American Cold War Strategy: Interpreting NSC 68,* Boston, New York: Bedford Books of St. Martin's Press, 1993；张曙光：《美国遏制战略与冷战起源再探》，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83–247页。

③ 张曙光：《美国遏制战略与冷战起源再探》，第116、142页。

④ 应当指出，以往对于NSC68号文件的研究，也都注意到美国的全球战略改变及其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影响，只是并未深入探讨美国对台政策变化与NSC68号文件之间的逻辑关系。如见 Gordon H. Chang, *Friends and Enemies*, pp.69-70。

门政府以 NSC48/2 号文件为核心确定的对台政策，其理论基础在于“有选择、有重点”的遏制战略——艾奇逊试图分离中苏的策略正是这一战略的体现，那么，当美国的战略思维已经开始向“全面遏制”转变的时候，共产党统治的中国大陆必然成为华盛顿关注的对象，特别是新中国统制势力从大陆向海上的扩展，更是美国无法容忍的。新中国与苏联结成同盟，使共产主义的势力已经在欧亚大陆连成一片，其结果无疑令美国进一步感受到苏联的威胁，从而大大加强 NSC68 所主张的“全面遏制”战略的政治基础；反过来，美国新的冷战战略的形成，也必然要求改变对中国，其中特别是对台湾的立场，因为很明显，遏制中国就是遏制苏联，阻挠中共解放台湾，已经成为防止台湾成为苏联远东战略势力一部分的重要一环。

中苏同盟条约签订后，美国明显加强了对中国动向的监视。驻亚洲的情报机构不断报告，苏联空军的飞机已经进入中国沿海机场，中共军队在东南沿海“屯兵百万”准备攻打台湾；“鉴于苏联对中共的广泛援助，国民党政府成功防御台湾的可能性很小”；中国加强了对印度支那抗法斗争的全面支援，东南亚各国在共产党和亲共势力的煽动下已经“动荡不安”。所有这些迹象都表明，美国在亚洲的利益正在受到苏联“利用中共”发起的“新的、有力的挑战”。[①] 面对美苏全面对抗的态势，杜鲁门也开始经常性地与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及各军部参谋长会面。总统对军事战略的密切关注，为华盛顿战略决策的改变注入了新的动力。国务卿和军方首脑也定期到参联会的作战指挥室参与敌情分析和对策研究。[②]

4 月间，参谋长联席会议对东南亚的战略形势提出看法，其中加强了对中国在美国亚洲战略地位中的重要性的提法，鼓吹美国应采取“果断的”、“持续的”措施以“减少来自共产党中国的压力”，并且认为，“有证据说明中国国民党的军队有所振兴并增强了效能”。[③] 在国防部里，从 4 月至 6 月，不断有人提出各种意见书，支持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意见，主张推翻杜鲁门 1 月 5 日声明的政策，尽一切力量保住台湾。理由是情况有了新的变化，“苏联已经安全接管了共产党中国”。有建议书提出：美国的短期目标是尽量维持台湾的抵抗力量，最好超过 18 个月，以争取时

① Memorandum by the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for Far Eastern Affairs (Rusk)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April 26, 1950, in *FRUS*, 1950, Vol.6, pp.333-335; CIA, Recent Activities of Soviet Military Personnel in China, 21 April 1950, Items 84-87, Fiche 19, ORE 19-50, pp.1-6, National Archives.

② Melvyn P. Leffler, *A Preponderance of Power: National Security, the Truman Administration, and the Cold War*,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363-364.

③ 美国国家档案馆档案，RG59, 793.00/5-350，转引自资中筠、何迪编：《美台关系四十年（1949–1989）》，第 45 页。

间加强菲律宾和印尼的防务；长期目标是“永远”不让共产党得到台湾，为此要采取有深远意义的步骤，把一个“非共产党统治的台湾”与它的“非共产党邻国”联合起来，最后形成一个“非苏维埃的中国”。建议立即采取的步骤有：向台湾增派高、中级军官，立即用“援华法案”的余款为台湾购置舰只和军火，美国海军作战舰艇公开访问台湾，国务院应发表声明，解释美国政策转变的原因，并增加在台湾的“外交”代表。实现长期目标的措施包括：美国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组织军事调查团调查台湾的防务需要，设法让蒋介石下台而支持其后继者并给以充分的经济和军事援助，使日本、菲律宾或者加上越南与这个“台湾民主政府”缔结安全条约，训练反共游击队并派入中国大陆等等。①5月20日美国远东战区总司令麦克阿瑟告诉参谋长联席会议，如果台湾被中国共产党控制，就等于落入苏联之手，那么美国在整个太平洋周边的防线将面临崩溃。他把台湾比做“处于苏联战略理想位置上的一艘不沉的航空母舰”。布莱德雷认为这个看法很重要，要求“呈送总统亲览”。②

国防部长约翰逊显然是支持这些意见的。5月25日约翰逊向杜鲁门提交了一份备忘录。这是一个有关美国转变对台政策的非常重要的文件。据布莱德雷回忆，其内容是：“国家安全委员会1949年12月29日决定采取不援助中国国民党防守台湾的进一步行动。从那时以来，情况的变化已经发展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至国防部感到有责任请求您再次提出这一问题，供进一步研究和斟酌。年初以来，海南岛和上海附近的沿海岛屿已落入共产党手中；共产党中国同俄国签订了一项军事条约；在过去的数天中，朝鲜形势变得十分严重。虽然台湾并非美军的重要基地，但一旦它被敌对国家占领，将会严重影响我们在日本、冲绳和菲律宾的地位。台湾岛上有许多现成的机场，从那里起飞的敌机完全可以接近我们的基地和交通线。国防部12月曾建议命令麦克阿瑟向台湾派出一个调查组，以掌握关于如何防止台湾落入敌对国家手中的第一手材料。我再次建议您采取这一行动，参谋长联席会议和麦克阿瑟将军对此也表示赞同。”③6月9日，约翰逊甚至要求参谋长联席会议考虑出动

---

① 美国国家档案馆档案，RG330, CD6-4-6，转引自资中筠、何迪编：《美台关系四十年(1949–1989)》，第45–46页。

② MacArthur to Department of the Army, C 56410, May 20, 1950, Formosa folder, box 2, RG 6, MacArthur Papers; Bradley to Johnson, May 31, 1950, CCS 381, Formosa (11-8-48), *JCS Records*, RG 218, National Archives.

③ 克莱·布莱尔整理：《将军百战归——布雷德利自传》，廉怡之译，北京：军事译文出版社，1985年，第690页。

美国军队阻止对台湾的进攻这样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①]

与此同时，刚刚出任国务院特别顾问的杜勒斯也提出了改变对台政策的问题。5月18日，杜勒斯向国务院提交了一份备忘录，其中提出了使台湾和台湾海峡“中立化”的预案。备忘录认为，由于共产党控制了中国，而中国又与苏联结盟，世界力量均衡的局面已被打破，并且朝着有利于苏联而不利于美国的方向倾斜。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美国的行为仍表现出允许那些未确定地区，即美洲和北大西洋公约国以外的地区，落入苏联之手的倾向，那么，在类似日本、菲律宾、印度尼西亚这样具有丰富自然资源的地区，美国就将遇到一系列重大的灾难，甚至中东石油地区也将处于危机之中。为了防止这种灾难发生，美国应该迅速采取一种能够显示我们信心和决心的全新和强硬的立场。但与军方一再坚持的“武力保台”建议不同，杜勒斯主张台湾的地位应在对日和约中确定，此前美国“有义务”、“有必要”派遣海军舰队在台湾海峡巡弋，“如果美国宣布要使台湾保持中立，既不容许它被共产党占领，也不容许它被用做对抗中国大陆的军事基地，那么，我们就一定能够使这一决策坚持下去，除非苏联发动公开的战争。”助理国务卿腊斯克和艾奇逊都接受了这个“动用美国海军使台湾海峡中立化”的方案。[②]

事实上，在杜勒斯提出转变对台政策的建议之前，在国务院极力主张支持台湾免遭共产党进攻的正是负责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迪安·腊斯克。他在1950年4—6月之间采取了一系列行动，促使美国加快转变对台政策的步伐，并且与军方的举措互为呼应。早在4月中旬，腊斯克便通过援引中央情报局的对华情报评估报告，企图影响国务卿的对台政策。在致艾奇逊的一份备忘录中，他提醒国务卿注意中情局4月10日的情报评估备忘录：虽然中共在1950年底之前具备占领台湾的能力，且很可能会这么做，但是最新的情报表明，国民党的状况已经得到某些改善，因而不能完全肯定预料的事情一定就会发生。关于这一点，腊斯克特意强调中情局情报评估的结论：尽管台湾完全有可能在1950年底之前被中共军队所攻占，但是也不

① Borg and Heinriches (eds.), *Uncertain Years*, p.89.

② Memorandum by Dulles, Consultant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May 18, 1950, in *FRUS,* 1950, Vol.1, pp.314-316; Extract From a Draft Memorandum by the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for Far Eastern Affairs (Rusk)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May 30, 1950, in *FRUS,* 1950, Vol.6, pp.349-351.

能排除国民党政权将会在该岛存在更长一段时间的可能性。[①]

紧接着在4月26日，腊斯克再向艾奇逊递交一份备忘录，要求国务卿关注美国外交人员从香港和台北发回的建议：美国应当采取措施援助国民党政府，保住其剩余的军队，以便分散中共在东南亚的军事力量，从而赢得时间增强在东南亚的防御，因为可以预见在中共攻占台湾之后，将会对东南亚施加全部的压力，美国若想保住越南—泰国—缅甸一线将会付出重大代价，而且实现该目标也将变得更加困难。[②] 此外，他还于5月25日前往五角大楼，在国防部军事援助局局长办公室与助理国防部长詹姆斯·伯恩斯以及该局局长莱曼·莱姆尼策共同举行了一次国务院—国防部联席会议，专门讨论台湾问题。经会商，他们一致认为，美国应当在现存政策范围内采取一切措施向台湾的国民党"政府"提供军事援助，其中国务院应当授权并使台湾的国民党"政府"获得在美国购买军事设备的出口许可证，国防部要尽其所能，保证提供给国民党"政府"的装备是防守台湾所必需的物资，同时这两部门还确认，美国现有政策允许强化秘密行动，以支持台湾抵抗中共的进攻，并且国务院要请求总统发放用于此项行动所需的资金。[③]

这之后不到一个星期，5月30日，腊斯克又和国务院的一些高级官员开会讨论如何制定对台湾的新政策。与会者全都同意，腊斯克应当与国务卿会谈，协商拟定一个计划，要求蒋介石接受联合国对台湾的托管，而且在实现台湾托管之前，由美国海军保护台湾不遭受中共军队的进攻。[④] 翌日，腊斯克便提交了一份关于东亚

---

① Memorandum by the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for Far Eastern Affairs (Rusk)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April 17, 1950, in *FRUS,* 1950, Vol.6, p.330。似乎有意要配合军方和国务院"鹰派"人物对台湾的计划，中情局在3月16日虽然警告说，中苏同盟条约的秘密条款规定，"如果美国正式出兵援助并保卫台湾，那么苏联将立即参战"，但是，"如果美国只派志愿军或日本军队或对台湾给予经济和军事援助，那么该条款将不适用于这些情况。"（见NLT 85-20, CIA Memorandum, Official Use, March 16, 1950, *DDRS*, Document Number: CK3100251082。）此后，除腊斯克向国务卿报告的情报评估外，在5月11日，中情局声称，从1月直到4月中旬，国民党人的士气似乎变得高涨起来；其对大陆予以空中攻击的有效性、持续进行海上封锁、在海南及其他近海岛屿击退共产党小规模的进攻，以及几支国民党"突击队"对大陆的突袭，都表明国民党的军事能力已得到改善。（见 Intelligence Memorandum No.292, May 11, 1950, *DDRS*, Document Number: CK3100429683。）这无疑为军方和腊斯克等人提出的援助蒋介石政权的要求增加了一些砝码。

② Memorandum by the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for Far Eastern Affairs (Rusk)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April 26, 1950, in *FRUS,* 1950, Vol.6, pp.333-335.

③ Memorandum by the Special Assistant to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 for Foreign Military Affairs and Assistance (Burns) to the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for Far Eastern Affairs (Rusk), 29 May 1950, in *FRUS,* 1950, Vol.6, pp.346-347.

④ Memorandum by the Deputy Special Assistant for Intelligence (Howe) to Mr. W. Park Armstrong, Special Assistant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for Intelligence and Research, 31 May, 1950, in *FRUS,* 1950, Vol.6, pp.347-349.

新政策的详细报告，融入了前一段时间频频开会所获得的相关意见。腊斯克认为，中苏条约的签订证明美国1月份宣布的台湾政策已经失败，现在必须采取新政策，即美国用武力保护台湾，使台湾中立化。关于台湾，腊斯克制定的纲领是，首先让蒋介石“退休”，然后对台湾实行托管，继而派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腊斯克甚至拟写了一篇演讲稿以备总统发表，其内容与朝鲜战争爆发后杜鲁门6月27日的声明十分接近。① 显然，腊斯克的所有行动都指向一个目的：干涉中国内战，阻挠中国人民解放军攻占台湾。为了确保实现该目的，腊斯克甚至于6月初向艾奇逊提议，在联合国成立一个专门委员会来研究台湾问题，并向安理会提交可供选择的解决方案：在此期间，安理会将向国共两党呼吁在台湾和大陆之间停止战事。美国只是在当前政策许可的范围内支援国民党政权。如果苏联否决创建该委员会，或者，如果共产党军队试图挫败联合国的倡议或进攻相邻的国家，那么，美国将考虑采取军事措施。②

可以看出，艾奇逊对台政策的主张不仅在外部受到国防部、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反对，而且在国务院内部也由于杜勒斯和腊斯克联手而受到排斥。与此同时，艾奇逊还受到国会共和党议员的指责，特别是麦卡锡主义兴起后，国务院的对华政策被认为是“失去中国”的主要原因。③6月1日，受到来自各方面压力的艾奇逊不得不致函约翰逊，表示同意军方向台湾的国民党军队提供援助。得到了国务院的首肯，约翰逊立即命令国防部有关部门，除喷气式飞机及中型和重型坦克外，在国防部可以使用的资金范围内，可以满足台湾方面“以后可能提出的任何要求”。④

毋庸置疑，到6月上旬，美国对台政策的转变已渐成趋势，以至6月12日杜勒斯就告诉蒋介石在华盛顿的代表顾维钧：国务院对台湾的态度近来有所好转，他认为存在着重新考虑对台湾提供军援的可能性。⑤ 就在这时，以反共著称的麦克阿瑟又向艾奇逊的台湾政策开了一枪。6月14日麦克阿瑟在一份给参谋长联席会议

---

① Memorandum by the Deputy Special Assistant for Intelligence (Howe) to Mr. W. Park Armstrong, Special Assistant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for Intelligence and Research, in *FRUS,* 1950, Vol.6, pp.348-351; Rusk's report of May 31, 1950, *Department of State Records*, RG 59, National Archives.

② Robert D. Accinelli, *Crisis and Commitment: United States Policy toward Taiwan, 1950-1955,*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96, p.23.

③ 详见华庆昭：《从雅尔塔到板门店》，第243页；资中筠、何迪编：《美台关系四十年（1949–1989）》，第48页。

④ 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 (Johnson), June 1, 1950, in *FRUS,* 1950, Vol.6, pp.351-352.

⑤ 顾维钧：《顾维钧回忆录》第7分册，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764–765页。

的备忘录中说，台湾是美国从阿留申群岛至菲律宾的远东防线中极为重要的一环。如果发生战争，美国能否守住防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台湾是否在友好或中立政权手中。麦克阿瑟再次将台湾比做不沉的航空母舰，认为台湾的归属问题应重新考虑，台湾的最终命运取决于美国，美国应采取断然措施，不让台湾落入共产党手中。麦克阿瑟把这份被称做“保台意见书”的备忘录交给了来东京访问的约翰逊和布莱德雷，并与他们进行了讨论。布莱德雷认为，“在援台问题上，这一文件比参谋长联席会议以往的文件提出的论据更为有力。”于是，约翰逊和布莱德雷一致决定，这份文件应呈交总统，并以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名义提出建议，美国应改变不插手台湾的政策，向国民党提供援助。6 月 24 日，即朝鲜战争爆发前一天，约翰逊和布莱德雷带着这份“保台意见书”离开东京回国。[①] 临行前，约翰逊甚至向蒋介石的私人代表表示了对台湾实行军援的“恳切”态度和决心。[②]

更有甚者，在白宫讨论之前，美国对台湾的新政策已见诸报端，传言“对台政策正在转变”。[③]6 月 25 日《纽约先驱论坛报》的一则消息透露：据盟军最高统帅部的意见，如果美国对台湾问题采取坚决立场，“将有 90% 的把握阻止共产党对该岛的侵略，因为中国人自己并没有准备与美国的军事力量发生冲突”。如果美国发表一个措辞强硬的公开声明，指出台湾的归属必须等待对日和约签订后才能确定，并向台湾派遣军事代表团，提供军事援助，“共产党人可能甚至不敢发动对台湾的攻击”。报道还说：有官员认为，只要出现一艘航空母舰，“就必然会使共产党人在未来很长时间内不敢发动对台湾的攻击”。[④]

综上所述，中苏同盟条约签订以后，特别是到 6 月，美国对台湾的政策已经完全转向，甚至还提出了可供选择的具体建议。一旦合适的机会和条件出现，新的方针和政策就会应运而生。这个机会和条件可能是毛泽东攻打台湾，可能是金日成进攻南朝鲜，也可能是中共军队越过边界支援越共对法作战。实际情况是，6 月 25 日爆发了朝鲜战争。

---

① MacArthur Memorandum on Formosa, June 14, 1950, in *FRUS*, 1950, Vol.7, pp.161-165；布莱尔整理：《将军百战归》，第 687 页。其实，在国民党政权败逃台湾后，杜鲁门政府一直没有停止通过各种方式对台湾予以援助。根据其国家安全委员会题为“协调美国对远东地区的援助项目”的 NSC61/1 号文件，1950 年美国对台湾的援助拨款数额为 1.04 亿美元。（见 NSC61/1, Coordination of U. S. Aid Programs for Far Eastern Areas, May 16, 1950, *DNSA*, Presidential Directives, PD00164。）

② 蒋介石日记，1950 年 6 月 24 日，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University of Stanford。

③ 瞿韶华主编：《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50 年）》，台北：“国史馆”，1994 年，第 876–877 页。

④ 引自伍修权 11 月 28 日在联大安理会的演说，见人民出版社编：《中美关系：文件和资料选编》，第 46–47 页。

三、策划朝鲜战争与苏联对华援助的限度

自朝鲜半岛1948年分裂为两个相互对立的国家以后，南北双方都试图通过武力实现民族的统一。不过，美国和苏联当时都无意在亚洲出现双方直接冲突的局面，因此，对他们的代理人均采取了限制和压抑的措施。[①] 然而，1950年1月底，莫斯科突然改变了主意。

面对毛泽东的坚决态度和美国试图分裂中苏的阴谋，斯大林被迫于1月28日接受了中方提出的关于中长铁路、大连和旅顺港协定草案。其结果，意味着斯大林谋划多年的以太平洋出海口和不冻港为核心的战后苏联远东战略，不到两年后就将失去其存在的基础。为了保证苏联在亚洲的战略利益，以朝鲜半岛南部的港口取代旅顺港，1月30日，斯大林作出了一个重大决定：同意金日成对朝鲜南方采取军事行动，并召他来莫斯科密谈。在4月10—25日的秘密会谈中，斯大林与金日成详细讨论并最终批准了发动战争的计划。[②] 莫斯科的决定不仅改变了朝鲜半岛的命运，也对中共进攻台湾的计划产生了重要影响。

此前，为了阻止北朝鲜挑起武装冲突，苏联一直限制对金日成的武器供应。现在情况不一样了，苏联的武器装备开始大规模地运往朝鲜半岛。2月7日，金日成提出再组建3个步兵师，以便把军队总数增加到10个师，并要求把苏联政府将于1951年提供的贷款用于1950年，为计划组建的3个步兵师购买苏联装备。对此，莫斯科立即答复，完全满足金日成的要求。[③] 同时，为了加强朝鲜人民军的组织和指挥能力，莫斯科还任命瓦西里耶夫中将为朝鲜人民军军事总顾问，以替代自苏联从朝鲜撤军后兼任这一职务的苏联大使什特科夫。[④] 此后，苏联便开始大规模向朝鲜提供武器装备。3月9日，朝鲜照会苏联，“为了给人民军补充装备、弹药和技术器材并加强人民军，请苏联政府于1950年按照以前提交苏联政府的申请单向朝鲜提供1.2—1.3亿卢布的军事技术装备”，朝鲜则相应地保证向苏联提供价值1.33亿卢布的黄金、白银和钼精矿。随后，金日成提供了所需武器装备的详细清单，其

① 详见沈志华：《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修订版）（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一章第二节。

② 沈志华：《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修订版）第三章。

③ 1950年2月7日什特科夫致维辛斯基电，2月9日维辛斯基致什特科夫电，АПРФ, ф.45, оп.1, д.346, л.74-75, 76。

④ 1950年2月23日什特科夫致华西列夫斯基电，АВПРФ, ф.059а, оп.5а, п.11, д.4, л.148。

中包括45毫米反坦克炮144门、76毫米加农炮36门、76毫米高炮72门、CY-76自行火炮68门、82毫米迫击炮267门、120毫米迫击炮54门、122毫米榴弹炮36门以及大量的弹药和军用器材。[①]莫斯科答复，同意朝鲜提前使用1951年的贷款购置武器装备。斯大林还亲自致电金日成，对于“朝鲜人民军所需装备、弹药和技术器材”，苏联政府决定“完全满足您的这一请求”。[②]5月，苏联又答应立即向朝鲜运送汽油15000吨。[③]总之，俄国档案文献显示，斯大林对北朝鲜的军事援助是有求必应。与此同时，对于已经答应向中国提供的武器装备却迟迟不能交货。

3月2日，周恩来代毛泽东起草的一封电报称：关于海军和空军在苏联的装备订货，均分两年交付，空军新增加的两队轰炸机和一队驱逐机的订货则推迟至1951年1月交货。[④]3月22日周恩来致电苏联国防部长布尔加宁，感谢苏联政府准备按照军事订货单向中国提供空军和海军所需的顾问人员及器材。周告知，中方打算在1950年内购入绝大部分的海军和空军器材，“因为只有大部分器材都在本〈年〉度到达中国，才能使台湾战役的准备来得及”。周还谈到，中方决定将各航校预定于4月毕业的84名飞行员“立即编成航空部队，并准备参加定海作战”，故要求苏方将此前定购的60架驱逐机和24架轰炸机及全部弹药提前交付，于5月1日前运至满洲里。[⑤]这两个文件表明，此时中共已决定将攻占台湾推迟到1951年。与此同时，毛泽东也在考虑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途径。3月11日毛致电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张治中指出：“先生现正从事之工作极为重要，尚希刻意经营，借收成效。”[⑥]

到3月底，中共确定了“先打定海、再打金门的方针”。[⑦]此后，周恩来更加抓紧催要苏联的装备。在4月13日给布尔加宁的两封电报中，周恩来再次强调所有军事订货务必保证按时交付，所请军事顾问亦请同时派来。为了说明事情紧急，周恩来明确告诉苏联政府，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已经预定在1950年发动

① 1950年3月9日、3月16日什特科夫致维辛斯基电，АВПРФ, ф.059а, оп.5а, п.11, д.4, л.149-150; АПРФ, ф.45, оп.1, д.346, л.133-140。

② 1950年3月9日维辛斯基致什特科夫电，3月18日斯大林致什特科夫电，АПРФ, ф.45, оп.1, д.346, л.141, 142。

③ 1950年5月30日什特科夫致维辛斯基电，5月31日葛罗米柯致什特科夫电，沈志华收集和整理：《关于朝鲜战争的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第4卷，华东师范大学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存，第610–613、614页。

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2册，第137–138页。

⑤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2册，第207–208页。

⑥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第271页。

⑦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第282页。

两次战役，即6月夺取舟山群岛，8月夺取金门岛。除上电所说84架飞机可推迟至5月中以前交付外，周要求1950年12月再交付312架飞机，1951年2月再交付190架飞机。周恩来还通报说，为了参加对台湾作战，中国决定在1951年春夏组建鱼雷快艇队、扫雷艇队、护航舰队、水鱼雷航空团和三个海岸炮团。周一再强调，“上面所列举的这些东西，为进行登陆作战所十分需要”；由于中国的海军力量薄弱，推迟了解放沿海诸岛的战役；“台湾战役要求我们需有强大和很好的海军舰队，方能有把握渡过海峡，保证数十万军队的登陆和保障海上运输的安全”，因此，要求所有订货“在我们所要求的时间内取得之”。[①]4月14日周恩来电称，空军订货还要增加。至此，中国要求苏联提供的空军和海军订货1950年共8800万美元，1951年4500万美元，加上新增货单，约为1亿美元。[②]这些武器装备，将用于1950年夏季的舟山群岛战役、金门战役和1951年夏季以后的台湾战役。

5月6日，周恩来致电驻苏大使王稼祥，要求其催促苏方履约。为了尽快建立空军，中国需要大量的军事顾问。2月15日毛泽东致函斯大林，请派205名军事顾问，其中164名为航校教官，41名为空军陆战师顾问。2月21日毛泽东又致函斯大林，要求增加12名空军司令部所需顾问和气象专家。然而，这批已经苏联军事部审查过的顾问却迟迟不来中国。此外，2月11日毛泽东为航校训练定购的一批弹药，直到射击训练时间临近，仍未见到货。周恩来“等得着急”，指令王稼祥“催其迅速发来，否则将耽误教育计划完成，影响作战”。显然是因为苏方对不断增加的订货表示疑问，周恩来在电报中解释说：在最近送去的新订货单中，“第一方案所需弹药，是准备定海战役用的，第二方案所需弹药是准备金门战役用的，第三方案所需弹药是准备台湾战役用的，因此并不重复。”[③]

到5月中旬，预定的定海战役即将开始，而海空军的订货还未到来。5月13日周恩来再次致电布尔加宁：为夺取舟山群岛，陆军的准备工作可于6月中全部完毕，而“空军及海军的准备工作，则完全依据于向苏联定购的空、海军器材何时到达为转移”。考虑到8月雨季和台风将至，且武器装备到货后试验和练习尚需时日，战役的发动时间最迟不能晚于7月中旬，所以，周恩来要求所有订货和聘请的顾问应“加速起运和派出，并使其能在本年5月底以前到达上海地区”，“否则仍然不可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2册，第299–300、301–302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2册，第307页。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2册，第375–376页。

能开始战役行动”。[①] 所幸的是，5 月 13 日，驻守舟山群岛的国民党军队开始主动撤退，19 日解放军占领了舟山群岛。[②] 然而，定海不战而胜的结局并未使中共领导人感到高兴和宽心，此时他们大概已经隐约猜测到莫斯科一再推迟交付海军和空军订货的原因。

中苏在朝鲜问题上的立场本来是一致的，所以斯大林在没有同金日成商谈及确定要采取军事行动之前，并不想让毛泽东事前得知这一情况。在通知金日成来莫斯科商议的电报发出后不久，2 月 2 日，斯大林又向什特科夫发出了一个补充指示：“向金日成同志解释，在目前情况下，他想和我讨论的这个问题应该始终是机密的。不应该把它告诉其他任何北朝鲜领导人和中国同志。”[③] 不过，当他与金日成确定了将发动一场战争后，就无论如何不能瞒着毛泽东了，不仅要将情况向北京通报，而且还必须征得毛泽东的同意。5 月 3 日，斯大林先向毛透露了一点消息：“朝鲜同志来过我们这里。同他们会谈的结果，将于日内向您专门通报。”[④] 但斯大林并没有再向毛通报，而是催促金日成去北京说明情况。5 月 13 日，金日成秘密来到北京，声称斯大林已经同意了他解放朝鲜南方的军事计划。毛泽东对此表示怀疑，因为在他访问莫斯科期间，斯大林并没有提出不同看法。于是，谈判中断，周恩来连夜召见苏联大使，请莫斯科对此事予以确认。[⑤] 第二天，斯大林回电说，由于国际形势发生变化，他已经同意了金日成的计划，但如果中国不同意，这个问题可以重新讨论，最后的决定必须由中国和朝鲜自己作出。[⑥] 接到斯大林的电报后，毛泽东只得表示同意莫斯科和平壤的共同意见。毛说，他本来想让朝鲜人在中共占领了台湾以后再进攻南方，以便给予朝鲜充分的援助。但既然金日成决定现在就进攻，而这又是中朝共同的事业，那么他表示同意，并愿意提供帮助。毛泽东建议朝鲜人民军要速战速决，不要贪图占领大城市，而要集中力量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如果美国人参战，中国将会派自己的军队帮助朝鲜，而且现在就可以向中朝边境调去军队。金

---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 2 册，第 303–304 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 年，第 39 页；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编：《粟裕年谱》，第 496 页。

③ АПРФ, ф.45, оп.1, д.347, л.12, *Торкунов А. В.* Загадочная война: корейский конфликт 1950-1953 годов, Москва: Российская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2000, с.56.

④ 1950 年 5 月 3 日斯大林致罗申电，АПРФ, ф.45, оп.1, д.331, л.54。

⑤ 1950 年 5 月 12 日什特科夫致维辛斯基电，АВПРФ, ф.059а, оп.5а, п.11, д.3, л.100-103；5 月 13 日罗申致莫斯科电，沈志华收集和整理：《关于朝鲜战争的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第 4 卷，第 572–573 页。

⑥ 1950 年 5 月 14 日斯大林致毛泽东电，АПРФ, ф.45, оп.1, д.331, л.55。

日成认为，美国人在远东并未做好战争准备，既然他们没有干涉中国的内战，也就不会在朝鲜采取行动。金日成对中国的建议表示感谢，但没有接受，并一再保证朝鲜人民军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解决朝鲜问题。[①]

得知朝鲜即将发生战事的情况后，毛泽东明显加快了攻打台湾的准备工作。5月17日，第三野战军前敌委员会下达了《保证攻台作战胜利的几个意见》，确定部队转入渡海登陆作战准备。海军和空军部队也全力进行人员培训、部队组建和装备购置工作。根据华东军区颁发的训练大纲：1950年7月至1951年3月，各军兵种部队分别训练；1951年4月至5月，进行陆海空协同登陆进攻合练，然后三军协同解放台湾。[②] 周恩来则继续催促苏联尽快交付早已答应的供货。5月23日周电告中国驻苏使馆，"我们预定新组成的一个驱逐团一个轰炸团，本月底集中南京开始整训，另一个驱逐团集中徐州，请通知苏方轰炸机经齐齐哈尔、哈尔滨、沈阳、徐州飞到南京。"又说：请催促苏方迅速将航校使用的教育用品和参考材料送来，这些东西，去年8月间华西列夫斯基元帅曾当面答应亚楼，今年2月间布尔加宁又曾当面答应我，但至今仍未送来，而航空学校急于使用。[③]

此时，不仅莫斯科的援助迟迟不能到来，中共一直寄予期望的对国民党军队进行策反或在台湾组织暴动的计划也彻底失败了。在台湾担负策反和组织暴动任务的是1946年4月成立的隶属于华东局的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5月13日，"国民政府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蒋经国宣布，中共在台湾的秘密组织已全部瘫痪。这一过程大致分为三个阶段："国防部"保密局1949年9月破获了中共台湾省委主办的《光明报》及基隆市工委案，11月在高雄破获了中共台湾南部工委案，1950年1月开始侦破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案。至5月，省委书记蔡孝乾及组织部长、宣传部长和武装部长等人悉数被捕。蔡孝乾等人被捕后很快变节，宣告台湾省工委及全省党组织解散，并登报号召党员自首。至此，除省委机关被破坏外，基隆、台北、台中、台南、高雄等地的工委亦均被摧毁，各地支部及小组被破坏者达80余个。[④]

---

① 1950年5月14日罗申致斯大林电，РГАСПИ, ф.558, оп.11, д.334, л.56//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2005, №5, с.94-95；1950年5月15日罗申致斯大林电，АВПРФ, Хронология основных событий кануна и начального периода корейской войны (январь 1949-октябрь 1950 гг.), с.30-31；1950年5月16日罗申致斯大林电，АПРФ, ф.45, оп.1, д.331, л.60-61, *Торкунов* Загадочная война, с.69-70。另见Goncharov, Lewis, and Xue, *Uncertain Partner*, p.145。

②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抗美援朝战争史》第1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61页。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2册，第415–416页。

④ 瞿韶华主编：《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50年）》，第471–479页。

这一消息犹如雪上加霜，攻占台湾只能依靠中共自身的军事力量了。

6月上旬，粟裕在北京参加中共七届三中全会期间，向中央汇报了攻台作战的基本设想。考虑到台湾战役的重要性，他建议中央军委直接指挥攻台作战。毛泽东出于对粟裕的信任，明确指示：攻台战役，仍由粟裕负责指挥。[①] 随着国民党军队从海南岛和舟山群岛的撤退，台湾的防守兵力增强，解放军准备攻台的兵力也不断有所加强。从最初的8个军，增加到1949年底的12个军，至1950年6月，已增至16个军。[②]6月23日，粟裕向毛泽东报告了攻台作战准备情况和作战方案，并提出：除酌量给海军补充一些必要的舰船外，请统筹建造大量渡海运输舰艇，并将华东、华南、华北（包括东北）现有船只，分别编为3个运输舰队，平时担任运输任务，战时用于渡海作战；为补助海军不足和发挥陆军威力，应加强海军航空队，为空降兵配备足够的运输机；造500门无坐力炮，以补助海军炮火之不足；请军委将全军战车及战防炮统一集中训练，以对付敌人坦克的反击；建议伞兵部队扩编到25万人。鉴于"攻台作战关系太大"，粟裕再次请求军委直接主持或请刘伯承、林彪其中一人主持攻台战役。[③]

在中共积极准备攻打台湾战役的同时，金日成也在加紧进攻南方的战役，而且在莫斯科的大力帮助下，其进展更快。[④] 就在粟裕拿出台湾战役的作战方案后两天，朝鲜战争爆发了。战争就像一剂强心针，催动了白宫的全身细胞。布莱德雷于6月26日向杜鲁门提出："韩国、日本、琉球、台湾、菲律宾和东南亚，都是同一个问题的不同部分"，它们的地位"相互依赖"，美国"急需一个互相配合的全面的远东政策"。[⑤] 于是，在决定直接干预朝鲜战争的同时，几天前设想的援助台湾计划也得到了实施。6月27日杜鲁门一纸宣言抛出了"台湾地位未定"论，而美国海军

---

① 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编：《粟裕年谱》，第497页。

② 胡哲峰：《粟裕与攻台作战的准备》，第39–40页；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编：《粟裕年谱》，第497页。

③ 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编：《粟裕年谱》，第498页。

④ 金日成还将原定7月发起进攻的时间改为6月，并得到斯大林同意。1950年5月30日什特科夫致维辛斯基电，5月31日葛罗米柯致什特科夫电，沈志华收集和整理：《关于朝鲜战争的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第4卷，第610–613、614页。

⑤ CCS 381, Formosa (11-8-48), sec.3, JCS Records, RG 218, in Michael Schaller, *The American Occupation of Japan: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in Asi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nc, 1985, pp.283-284.

第七舰队则借机进驻台湾海峡。[①] 或许"中立台海"的表述说明，杜鲁门个人此时还没有下决心真正去保卫台湾。[②] 不过在中共领导人看来，美国的对华政策已经出现了根本转变。[③]

美国的举动彻底中断了中共解放台湾的战役，尽管美国国务院的报告仍认为中共具有攻占台湾的能力，并且可能提前采取行动。[④]7 月初中共中央决定组成东北边防军，并调粟裕出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⑤] 主帅调离，无疑说明台湾战役已退出中共领导人的议事日程。7 月中旬粟裕向攻台作战部队传达了中央指示，推迟进攻台湾。[⑥]7 月 18 日，毛泽东批准了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关于将原驻南京的六个空军团调往东北部署的报告。[⑦]8 月 11 日，经中共中央批准，第三野战军前敌委员会建制撤销。[⑧]8 月 26 日周恩来在东北边防军准备工作会议上宣布："推迟解放台湾。"[⑨] 此后，"解放台湾"就只是一句鼓动人心的宣传口号了。[⑩]

简短的结论

通过对中共进攻台湾战役决策过程的考察可以看出，中共关于台湾战役的设想前后发生了三次变化。最初的想法比较简单，没有看到远距离跨海作战与陆地作战的区别，1949 年夏天的计划是一年后攻占台湾，毛泽东甚至一度考虑在 1949 年冬季占领台湾；金门、登步岛作战的失利，令中共领导人对渡海作战有了新的认识，于是在 1949 年底决定分两步走，先解决沿海诸岛问题，同时为攻台做准备，进攻时间推迟到 1950 年 9—10 月；1950 年 3—4 月确定的计划是，金门战役推迟到 8

---

① 人民出版社编：《中美关系：文件和资料选编》，第 234–235 页。6 月 28 日上午 11 时，第七舰队 2 艘巡洋舰、6 艘驱逐舰和 1 艘运输舰驶入台湾海峡，并开始巡弋。见瞿韶华主编：《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50 年）》，第 914–915 页。

② 7 月 26 日讨论朝鲜局势时杜鲁门宣称，我们不会给蒋介石"一文钱"。见 *FRUS,* 1950, Vol.7, pp.178-183。

③ 1950 年 6 月 28 日周恩来的声明，见《人民日报》1950 年 6 月 29 日，第 1 版。

④ IM 312, July 26, 1950, DDRS, CK3100047045-3100047062.

⑤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 3 册，第 34–35 页。

⑥ 胡哲峰：《粟裕与攻台作战的准备》，第 42 页。

⑦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 3 册，第 64–65 页。

⑧ 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编：《粟裕年谱》，第 500 页。

⑨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 69–70 页。1950 年 11 月，毛泽东下令解除进攻金门的任务。见叶飞：《叶飞回忆录》，第 485 页。

⑩ 9 月 29 日毛泽东指示胡乔木，以后不要再提何时解放台湾了。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1 册，第 536 页。

月开始，而攻打台湾则延至1951年夏。至于攻占台湾的方式，除了积极进行军事准备外，依照内战中的经验，中共在很大程度上寄希望于在国民党军队内部进行策反工作，同时，也考虑利用空降兵在岛内发动起义。不过，最基本的问题还是如何加强自身的海空军力量。

通对攻台决策过程的考察还可以看出，影响和改变中共决策的主要有三个因素，即国民党军队的抵抗能力、苏联对中共进攻台湾的援助力度以及美国对援助蒋介石防守台湾的政策取向。

国共内战胜败如何，最基本的问题当然是双方军事实力的对比。台湾战役不同于内战中其他战役，其特点在于必须远距离跨海作战，所以海空军的力量如何具有决定性意义。在这方面，中共处于明显劣势。尽管到1950年6月中共已经在福建集结了16个军的兵力，但海空军的准备仍显不足。别的不讲，仅运输部队和装备的船只，就是一道难以逾越的关卡。粟裕在1950年1月的报告中指出，按攻台作战50万人和装备总重13.54万吨计算，需要船只76万吨，即千吨以上船只575艘，第一梯队如以6万人计，另需登陆艇2000只。如此大量的船只在短期内是难以解决的。事实上，直到朝鲜战争爆发时，攻台运输船的问题仍未得到解决。[①]还有毛泽东曾给予很大希望的空降兵部队，虽于1950年2月订购了降落伞300具，苏联又派来41名顾问，4月开始筹备，但直到9月17日才正式成立。[②]正是考虑到这些因素，粟裕在6月23日曾提出："攻台作战如无绝对把握，不仅不应轻易发起，而且宁愿再推迟一些时间。"[③]显然，如果没有苏联的大力援助，中共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是不可能取得海空军优势的。

莫斯科的态度十分明确，苏联不会直接协助中共攻占台湾，但可以在加强海空军实力方面提供援助。这种援助在1949年下半年力度很大，如果确实按照双方商定的计划执行，中共军队在1950年的海空军实力将得到大大加强。但是，1950年初中苏条约谈判的结果影响了斯大林对中共的援助进度。一方面是毛泽东坚持收回苏联在东北的特权，引起斯大林对中共的不满和疑虑，一方面是为了维持战后苏联在远东的战略利益，斯大林决定同意北朝鲜先采取军事行动，其结果是莫斯科大大减缓和压缩了对中共的军事援助。所以，中苏同盟条约的签订，虽然在战略上对中国的安全和中共政权的巩固起到了保障作用，但是也在很大程度上限制和阻碍了中

---

① 胡哲峰：《粟裕与攻台作战的准备》，第40页。

②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空军回忆史料》，第236–244页。

③ 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编：《粟裕年谱》，第498页。

共攻打台湾战役的进程。

然而，中苏同盟条约更大的影响是迫使美国改变了对华政策。如果美国继续坚持 1949 年底形成的放弃台湾的政策，中共在苏联的帮助下还是有可能迅速提高军事实力，完成其攻占台湾计划的。白宫内部关于对台政策的争论表明，美国关注的核心问题是中国是否会与苏联结盟而成为莫斯科的附庸，中苏同盟的建立使美国人抛弃了一切幻想，剩下的只有一条路，即支持蒋介石，保护台湾不被中共攻占。1950 年 4 月出笼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第 68 号文件，特别是其中提出的"全面遏制"的新的冷战理念和战略，则为美国改变对台政策确立了政治和理论基础。至 6 月中旬，美国对台新政策在军方和国务院"鹰派"的鼓噪下已经呼之欲出。朝鲜战争的爆发不过是为白宫宣布其几乎已经确定的"台湾地位未定"论和直接出面干预中国内战提供了机会和借口。如此看来，朝鲜战争便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即使金日成没有发动对南朝鲜的进攻，只要中共打响台湾或金门战役，美国同样会宣布其新政策，而绝不会让中共的军队控制台湾海峡。所以，真正阻止中共占领台湾的不是朝鲜战争和第七舰队，而是中苏同盟条约。

应该说，如果没有朝鲜战争，中共攻占金门的战役是完全可能成功的。其一，蒋幕僚中主张放弃金门、固守台湾者大有人在；国民党金门区专门研究小组认为金门"兵力益形单薄"，"防戍任务难钜"，而中共如集中进金，在海军方面"即有压倒之优势"，空军方面则因地利"已占先制"；金门士气不振，人心浮动，谣言四起，守军主将胡琏多有怨言，无心恋战，认为"十八军已成离群孤雁，精神远不如前"。[①] 特别是蒋介石本人，甚至在朝鲜战争爆发后，仍一度坚持主张放弃金门，撤守台湾。[②] 其二，粟裕认真吸取教训，精心制定作战计划，他所担心的是金门守军如海南、舟山一样突然撤离，遂命令部队"如发现敌确有撤退行动，则应适时发起攻击，以期截歼敌人一部或大部"；"如敌人尚无撤退意图"，则不应轻易发起攻击，"争取在我有计划的攻击下，歼灭敌人于金门"。其作战方案仍以陆军（4 个军）独立进攻金门，组织机帆船、火力船护航，争取于年底完成作战任务。[③] 其三，

① 详见 1950 年 4 月 16 日潘国华给蒋介石的报告，5 月 27 日金门区研究小组会议记录，6 月 6 日胡琏致陈诚信，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特交文件·军事，台北："国史馆"，100: 2CKSP; 100: 3CKSP。

② 秦孝仪总编纂：《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九，台北：中正文教基金会出版，2002 年，第 195–199 页。直到 7 月 14 日，蒋介石仍认为"金门部队之撤防应即实施"。蒋介石日记，1950 年 7 月 14 日，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University of Stanford。

③ 胡哲峰：《粟裕与攻台作战的准备》，第 41 页。

金门的行政区划属福建省而非台湾省，美国欲用兵干预缺乏法理基础，出师无名，且在军事上亦不占优势。故杜鲁门 6 月 27 日的声明只提到台湾，而没有涉及沿海岛屿。美国第七舰队预定的作战计划，也不包括金门等沿海岛屿在内。[①]

然而，中共要通过武力攻占台湾却绝无可能。面对国民党军队的海空优势，中共若不与苏联结盟，则在短期内无力攻台，若为得到苏联援助而与莫斯科结盟，则必然引起美国的政策转变，而使蒋介石得到来自华盛顿的更大援助。由此看来，在中苏关系、苏美关系、美台关系相互交错和影响的冷战格局中，武力攻占台湾对中共来说是一个无法解开的死结。

发表于《社会科学研究》2009 年第 3 期

① “国防部”致蒋中正，1950 年 9 月，第七舰队为阻止台湾澎湖被侵作战计划大纲，蒋中正“总统”特交档案，台北：“国史馆”，002-080106-048-002，第 2–10 页。

无奈的选择：中苏同盟建立的曲折历程（1944—1950）

与中苏同盟如何走向破裂一样，在冷战国际史和中苏关系史研究中，中苏同盟的形成也是各国学者之间讨论最多、分歧最大的问题之一。关于中苏何时开始结成同盟，牛军认为，1945 年 10 月苏联开始全力支持中共夺取东北，并与中共形成一种战略关系，这是战后双方关系发展的一个转折点。[①] 文安立提出，苏联人于 1946 年 4 月同意让中共接管东北各城市是中共与苏联关系的一个重大转折点。[②] 盛慕真则认为，中苏结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之前数十年中，中共与莫斯科关系的逻辑延伸”。[③] 柯伟林赞同这一说法，并指出中苏联盟在某种程度上是预先注定的，是由苏联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地位，特别是作为中共监护人的地位所决定的。[④] 关于中苏结盟的原因，很多学者都强调意识形态是主导因素，认为中共和苏联拥有共同的政治信仰是两者走到一起的最主要原因，作为对立因素存在的美国也起了很大的反面推动作用。[⑤] 至于斯大林与中共政权得以建立的关系，多数学者都认为苏联的援助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俄国学者认定，中共对国民党的胜利只

---

① 牛军：《论中苏同盟的起源》，《中国社会科学》1996 年第 2 期，第 183–185 页。

② 文安立著：《冷战与革命——苏美冲突与中国内战的起源》，陈之宏、陈兼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年，第 195–196 页。

③ Michael Sheng, *Battling Western Imperialism: Mao, Stalin, and the United Stat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7, p.186.

④ William C. Kirby, “China’s Internationalization in the Early People’s Republic: Dreams of a Socialist World Economy”, in *the China Quarterly*, No.188, December 2006, p.890.

⑤ 比较突出的看法参见如下论著：Michael Sheng, *Battling Western Imperialism: Mao, Stalin, and the United States*；Chen Jian, *Mao’s China and the Cold War*, Chapel Hill &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1；Lorenz M. Luthi, *The Sino-Soviet Split: Cold War in the Communist World*, Princeton and Oxfor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文安立：《冷战与革命——苏美冲突与中国内战的起源》；杨奎松：《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研究（外交）》，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9 年。

是由于苏联的援助才有可能。[①] 也有学者对此持否定意见，认为苏联战后对华政策是从自身角度出发的，没有考虑中共的利益，中共之所以能从当时复杂艰辛的局势中闯出来，主要依靠的是自身的力量和智慧。[②]

究竟应该如何评判苏联战后对华政策的目标及其转换？莫斯科对中共何时、何地持何种立场和态度？对于中共政权的建立和巩固，斯大林究竟起到了什么作用？毛泽东对苏共的态度是如何转变的？中共在中苏结盟的过程中的主要追求是什么？要讨论这些问题，首先必须对中苏同盟起源的历史事实有一个基本的认定和认同。关于 1944—1950 年中苏同盟建立的曲折而复杂的历史过程，笔者近些年通过梳理中俄双方档案文献和口述史料，分专题进行了详细描述。本文则着重讨论这一历史过程中的逻辑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对中苏同盟起源所涉及的一些基本问题做出总体评述。

一、毛泽东和斯大林最初都没想把对方作为盟友

苏联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是战后苏联共产党与中国共产党关系的延续，而苏共对中共的立场，又是战后苏联对华政策的组成部分。就夺取全国政权而言，中共胜利的起点在抗日战争的末期，那时，中国是一个苏联与之接壤却无法纳入其势力范围的大国。在战争期间（特别是 1941 年以后），盟国对中国的支持和援助主要来自美国，也是罗斯福在开罗给蒋介石戴上了一顶“四强首脑”之一的桂冠。[③] 因此，战后中美关系的发展前景是令人鼓舞的，甚至在中国共产党看来，美国也是可以寄予希望的国际力量。

以往的研究结论大体认为，虽然中共始终处于莫斯科的领导和帮助之下，但 20 世纪 30—40 年代斯大林与毛泽东的关系则比较紧张。近年，旅美俄国学者潘佐夫利用最新披露的共产国际档案所进行的研究指出，斯大林与毛泽东的关系整体说

---

① *Борисов*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и маньчжурская революционная база 1945-1949,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Мысль, 1977; *Ледовский* Переговоры И. В. Сталина с Мао Цзэдуном в декабре 1949г.- феврале 1950г., Новые архивные документы, с.23-47.

② 参见迪特·海因茨希：《中苏走向同盟的艰难历程》，张文武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 年；Michael H. Hunt, *The Genesis of Chinese Communist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6；James Reardon-Anderson, *Yenan and the Great Powers: The Origins of Chinese Communists Foreign Policy (1944-1946)*,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0。

③ 关于战时中苏关系的研究，参见罗志刚：《中苏外交关系研究（1931-1945）》，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 年；沈志华主编：《中苏关系史纲》，北京：新华出版社，2007 年，第 59–80 页；薛衔天、金东吉：《民国时期中苏关系史（中）》，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 年。

来并不像人们普遍认为的那样紧张：30年代初毛泽东在中共地位的上升“应该归功于莫斯科，而首先应归功于斯大林”，后来毛泽东所批判和斗争的中共党内莫斯科派领导人都是斯大林“已不再信任”甚至准备审判的人。[①] 这些史事都是经过考证的，其结论也是可信的。但作者进一步认为，中共领导人“在意识形态上以及在很多政策上都一成不变地依赖莫斯科”，毛泽东是斯大林的“忠实信徒”，并且是靠斯大林的支持才战胜蒋介石的。[②] 这种看法就很难令人信服了。

在对日战争时期如何处理国共关系方面，毛泽东与斯大林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不同主张。例如1936年西安事变爆发时，中共出于对联蒋抗日的方针缺乏信心，曾一度采取了借机除掉蒋介石的策略，主张把蒋交付人民审判，重组“革命的国防政府”。只是在看到了莫斯科公开表明的反对立场后，中共中央才改变了主张。[③] 再如皖南事变发生后，1941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决定“在政治上军事上迅即准备作全面大反攻”。[④] 1月15日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和军事总顾问崔可夫接见中共驻重庆代表周恩来和叶剑英，得知中共军队已经做好进攻准备后，潘友新立即指出：“目前中国共产党主要的敌人依然是日本人。如果中共将发动积极地针对国民党部队的军事行动，只会进一步扩大中国的内战”，“你们当前的首要任务乃是竭尽全力来保全国共两党的合作关系”。尽管同意对国民党发起政治攻势，但强调“不应当直接点蒋介石的名字”，更不能直接“指责他便是皖南事件阴谋的组织者”。[⑤] 显然是受到苏联立场的影响，毛泽东在出席当天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便改变了说法，只提发动全国性政治反攻，并指出左派提出与国民党大打的政策不能实行。[⑥] 从本质上讲，国共两党水火不容，而斯大林出于对苏联东线安全的考虑却必须支持国民政府，要求“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在这方面，苏共与中共之间的分歧

---

① 参见*Панцов А. В.* Как Сталин помог Мао Цзэдуну стать вождем//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2006, №2, с.75-87；A. V. Pantsov, “How Stalin Helped Mao Zedong Become the Leader: New Archival Documents on Moscow’s Role in the Rise of Mao”, in *Issues & Studies*, 41, No.3 (September 2005), pp.181-207。

② *Панцов* Как Сталин помог Мао Цзэдуну стать вождем, с.84-85.

③ 中共中央书记处致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电，1936年12月12、14日；中共中央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中央通电，1936年12月18日。转引自沈志华主编：《中苏关系史纲》，第57页。关于西安事变中苏联与中共关系的研究，详见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谜》，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

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年）》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255–256页。

⑤ 潘友新与周恩来、叶剑英会谈记录，1941年1月15日，АВПРФ, ф.0100, оп.25, п.200, д.8, л.28-29。

⑥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年）》下卷，第256页。

和矛盾是不可避免的。不过，中共当时毕竟还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而且其发展壮大也离不开苏联的支持和帮助，因此对莫斯科只能言听计从。在这两次重大事件中，都是中共中央已经作出决定后，又不得不改变初衷，毛泽东此时对斯大林的感受可想而知。这也就难怪毛泽东在考虑中共未来的发展时，首先会想到争取美国人的帮助。

毛泽东曾认为，战后中国所能指望得到的大国援助不是来自苏联，而是来自美国。因此，在他最初为中共选择国际联合对象时，曾对美国寄予希望。在 1944 年夏天与美军赴延安观察组的接触中，毛泽东反复表达了这样的看法和意愿。[①] 7 月 23 日第一次与美国外交官谢伟思见面，毛泽东就不无用意地一再表示：中国共产党人“首先是中国人”。[②] 一个月后，在 8 月 23 日的长谈中，毛泽东多次询问谢伟思美国对中共的看法和政策，并主动说，“俄国人在战争中遭受了巨大损失，将忙于他们自己的重建工作。我们不指望俄国人帮助。”还说，“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不过是主张民主和社会改革”，“甚至最保守的美国实业家在我们的纲领中也找不到任何值得反对的东西”。毛泽东还多次强调，中共必须得到美国的帮助，必须与美国合作；对于美国来说，中共比国民党更容易合作；中共欢迎美国的民主制度，绝不会冒险采取反对美国的政策。[③] 当时，毛泽东并不避讳与美国人的接触，甚至事前将这种意向通知了莫斯科。在毛泽东看来，美苏本身的合作态势使得苏联“不会反对美国在中国的利益”，况且苏联与国民党的关系不好，因此“美国和中共之间的合作对有关各方都将是有利和令人满意的”。[④] 1945 年 3 月谢伟思再次访问延安，毛泽东显示的决心就更大了，他又一次谈到中共与美国的长期关系，并坚持认为：“美国不仅是帮助中国发展经济的唯一最合适的国家，而且也是完全有能力参与中国经济建设的唯一国家”；“共产党将继续寻求美国的友谊和谅解，因为它为中国的战后

① 关于美军观察组活动的详细情况参阅：卡萝尔·卡特著：《延安使命：美军观察组延安 963 天》，陈发兵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 年，第 23–210 页；袁武振：《抗战后期中外记者团和美军观察组访问延安始末》，《中共党史资料》第 69 辑，1999 年 3 月，第 106–123 页；王炳南：《中美会谈九年回顾》，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 年，第 35–36 页。

② 约翰·斯图尔特·谢伟思：《美国对华政策（1944–1945）：“美亚文件”和美中关系史上的若干问题》，王益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年，第 196 页。

③ Memorandum by the Second Secretary of Embassy in China (Service) of a Conversation with Mao Tse-tung, August 23, 1944, in *FRUS,* 1944, Vol.6, pp.604-614；谢伟思：《美国对华政策（1944–1945）》，第 218–229 页。

④ 关于毛泽东向苏联通报的情况，见 *Димитров* Дневник (9 марта 1933-6 феврари 1949), София: Св. Климент Охридски, с.416-417。

重建所需要”。[①] 当时，另一篇美国专家福尔曼发自中国的报告还引用了毛泽东这样一段话：“我们不会遵循苏俄的共产主义社会和政治模式。我们认为，我们可以做的与林肯在国内战争时期做的事情更具相似性：解放奴隶。”[②]

另一方面，有学者利用蒋介石日记的新材料证明：在抗战后期，美国与蒋的关系颇为紧张。“尽管彼此在战略上互有需要，甚至是别无选择的需要，但双方的信任却严重流失。”[③] 不能说毛泽东没有从中看到可乘之机。在美国驻华外交官和军人中，确有一批人同情并支持中共。尽管他们的出发点是维护美国的利益，防范苏联在亚洲的扩张，但看到在充斥着独裁、腐败的国民党统治下竟然还有像中共这样一支追求民主、办事清廉的欣欣向荣的政治力量，这些美国人感到欣慰也是可以理解的。然而，美国政府的态度却令毛泽东感到失望。1944 年 10 月 18 日，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因与蒋介石不和，被华盛顿解除职务，愤怒的史迪威甚至拒绝接受中国授予他的勋章。[④] 而史迪威与蒋介石的主要矛盾之一就是对待中共军队的立场不同。[⑤] 史迪威事件是预示中共对美关系前景黯淡的第一个信号。跟着，11 月 1 日支持与延安接触的美国驻华大使高斯被迫辞职。[⑥] 接替他的新任大使赫尔利则完全站在蒋介石一边，不仅否决了使馆年轻官员们提出的一系列主张美国支持中共的政策性建议，而且不久后便将谢伟思调回国内。[⑦] 毛泽东对此感到遗憾、失望和愤怒。于是，中共不得不把目光转回到莫斯科。1945 年 4 月中共召开七大时，毛泽东颇有些无奈地宣布：“苏联，毫无问题是朋友，是中国人民最好的朋友。”[⑧]

①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by the Second Secretary of Embassy in China (Service), March 13, 1945, in *FRUS*, 1945, Vol.7, pp.273-278；谢伟思与毛泽东的谈话，《党史通讯》1983 年第 20–21 期，第 14–18、19–22 页；谢伟思：《美国对华政策（1944–1945）》，第 229–230、231–232 页。

② 转引自 *Бажанов Е. П.*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уроки прошлого и современность//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1989, №2, с.7。

③ 王建朗：《信任的流失：从蒋介石日记看抗战后期的中美关系》，《近代史研究》2009 年第 3 期，第 49–62 页。

④ 约瑟夫・W. 史迪威：《史迪威日记》，黄加林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 年，第 300 页；卡特：《延安使命：美军观察组延安 963 天》，第 154–159 页。

⑤ 参见巴巴拉・塔奇曼：《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万里新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 年，第 493–518 页。

⑥ 卡特：《延安使命：美军观察组延安 963 天》，第 166–168 页。

⑦ 详见约瑟夫・埃谢里克：《在中国失掉的机会——美国前驻华外交官约翰・S・谢伟思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报告》，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 年，第 270–317 页；谢伟思：《美国对华政策（1944–1945）》，第 1–4 页。尽管谢伟思在 1945 年 4 月躲过了一劫，但 1950 年 3 月终于在麦卡锡主义的阴影中被捕入狱。关于这批年轻的职业外交官，包括约翰・谢伟思、约翰・戴维斯和约翰・文森特、雷蒙德・卢登等人，以及迪克西使团团长包瑞德上校的详细情况，还可参见伊・卡恩：《中国通——美国一代外交官的悲剧》，陈亮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0 年。

⑧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 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年，第 320 页。

然而，斯大林此时在中国选择的合作伙伴并不是共产党，而是国民党。战后苏联对华方针取决于两个因素，即苏联在远东的战略目标和苏美在亚洲的战略关系。当时斯大林对远东的战略考虑主要有两点，即把蒙古从中国的版图中分离出来，形成广阔的安全地带；恢复沙皇俄国在中国东北的势力范围，以确保苏联在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冻港。为了保证实现上述权益，苏联在对华政策方面采取了与美国合作的方针，即承认蒋介石在中国的领袖地位，并劝说中共服从国民政府的统一领导。1945 年 6 月《布尔什维克》杂志发表的一篇评论员文章称：战后中国必须有一个"由战时所有民主党派、团体和组织所加强的国家民主阵线；只有这样……中国才能成为一支强大的、独立的和民主的力量"。[①] 这个公开发表的言论实际上反映了斯大林多次与美国人谈话时表达的立场，也就是他在战后提倡的"联合政府"政策。[②] 在 4—5 月间两次与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的谈话中，斯大林称蒋介石是"无私的"，是"爱国者"，但应在政治上对中共让步，以求得军令的统一。斯大林和莫洛托夫还表示，不能认为中国共产党人是真正的共产党人，苏联从来没有，今后也不会帮助中共。同美国一样，莫斯科也希望看到一个在蒋介石统治下的民主和统一的中国。[③] 为此，斯大林先是与美国取得默契，对中国政府两面夹击，软硬兼施，迫使蒋介石签订了城下之盟——《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而后则同时从中国、朝鲜和伊朗撤军，以取信于美国和国际舆论，并维护在雅尔塔体系内得到保证的实际权益。当然，与此同时，只要苏联的上述目标受阻，斯大林也常想到利用中共的力量牵制美蒋。

中共当时似乎并不清楚斯大林的主张。毛泽东在中共七大的最后报告中指出，"国际无产阶级长期不援助我们"，因为"没有国际援助"，就要"学会自力更生"。

① 转引自 Chares Mclane, *Soviet Policy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s, 1931-1946*,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58, p.182。

② 笔者关于"联合政府"政策的研究，见沈志华：《斯大林的"联合政府"政策及其结局》，《俄罗斯研究》2007 年第 5 期，第 71–77 页；第 6 期，第 77–85 页。

③ The Chargé in the Soviet Union (Kennan)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April 17, 1945, in *FRUS*, 1945, Vol.7, pp.338-340；彼得罗夫与赫尔利谈话备忘录，1945 年 5 月 10 日，АВПРФ, ф.0100, оп.33, п.244, д.14, л.120-125, *Ледовский, Мировицкая* (сост.)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XX веке,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Том IV, Книга 2, Москва: ПИМ, 2000, с.37-40。

不过，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毛泽东还是相信“国际无产阶级的援助一定要来的”。[①] 所以，尽管早在6月就听说了有关中苏条约的内容，中共并不相信苏联会“承认蒋介石是中国唯一的领袖”。[②] 然而，斯大林的所作所为终于使毛泽东明白，中共的目标和利益与莫斯科并非完全一致。

二、苏联对华政策多变与中共东北政权的建立

对于延安来说，苏联出兵东北是一个突如其来的消息，更使毛泽东惊喜的是日本突然宣布无条件投降，这似乎为中共提供了一个与蒋家王朝争夺天下的天赐良机。毛泽东一度认为，中共的最佳选择可能是利用苏联出兵和日本投降造成的权力真空，控制广大的原日伪占领区，通过武力的较量夺取中国的半壁河山。8月中旬，中共中央不仅发出了夺取华东、华南地区进军令，指出“不怕爆发内战，而要以胜利的内战来制止内战和消灭内战”，而且宣布了江苏、安徽、浙江、湖北省主席和上海、南京市长人选名单。[③] 面对突变的形势，远在大后方的蒋介石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作为缓兵之计，就在中苏条约签字的当天，即8月14日，他电邀毛泽东赴重庆共商国是。20日蒋再次来电催促。但中共不为所动，继续抓紧进行部署，一方面命令晋绥和晋察冀部队配合苏军夺取华北各大中城市，一方面批准了华中局打算在上海发动武装起义的报告。[④]

在此关键时刻，斯大林又发出了不同声音。8月20或21日，莫斯科给中共中央发来电报说：中国不能打内战，否则中华民族就有被毁灭的危险，毛泽东应赴重

---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391–393页。关于苏联的援助，毛泽东在1945年8月13日讲话中称：在抗战期间，“解放区的人民和军队”，“毫无外援”。（毛泽东：《毛泽东选集》合订一卷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1124页。）但据季米特洛夫的日记，通过共产国际，苏联在1938年2月、1940年2月和1941年7月分三次向中共提供了180万美元的直接援助。见 *Димитров* Дневник (9 марта 1933-6 феврари 1949), София: Св. Климент Охридски, с.137, 190, 238-239。

② 斯克沃尔佐夫与王若飞会谈备忘录，1945年6月29日，АВПРФ, ф.0100, оп.33, п.244, д.14, л.99-103,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Т. IV, К. 2, с.68-71。

③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215、213–214、234–235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613页。

④ 毛泽东给程耿贺林的指示，1945年8月20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年）》下卷，第8–9页。

庆进行和谈。[①] 在斯大林看来，中共拒不和谈而坚持武装夺权的方针，必将导致远东局势的紧张，并破坏业已签订且为莫斯科得意的中苏条约及苏美共同构建的雅尔塔体系，从而给苏联在远东的安全和利益带来不堪设想的后果。因此，中共必须像战后法国和意大利共产党的做法一样，在蒋介石领导的“联合政府”的框架内寻求和平与稳定。尽管毛泽东再次执行了斯大林的命令，但他和蒋介石一样清楚，重庆谈判对于国共双方来说都是权宜之计，最后还是要通过武力决定胜负，而国共最初的较量就在苏军占领的东北。[②]

9 月中旬苏军指挥部与中共中央达成协议，苏军撤离中国前，国共军队均不得进入东北，已进入沈阳、长春、大连等地的中共部队须退出苏军占领地区。不过，苏军代表私下应允，只要中共军队不用八路军名义，不公开与苏军接洽，苏军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还提出希望中共派负责人前往东北，以便随时联系，协调行动。后来，由于担心美国渗透到苏联的势力范围，斯大林先是支持中共阻扰国民党军队接近和开进东北，继而又协助中共军队接管那里的中心城市和工业重地。然而，就在毛泽东决定以最快速度接收东北全部政权时，由于国际形势的压力，11 月中下旬莫斯科又改变了主意，不仅突然同意国民党军空运进入东北各大城市，命令中共军队立即全部撤离，而且告诫中共在重庆的代表，注意减少与苏联使馆和驻华机构的联系。在 12 月的莫斯科外长会议上，美苏决定同时从中国撤军。在此情形下，中共不得不像 1927 年大革命失败后那样再次转向农村发展革命根据地，同时也准备与国民党和解，进入“联合”政府。斯大林的目的只是保证苏联在东北的特殊权益，而中共则是在需要时可以利用的棋子。所以，当苏联与国民政府关于东

---

① 关于莫斯科的这封电报，首先是毛泽东在 1956 年 4 月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到的，内容如上述（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 5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 年，第 286 页）。据胡乔木回忆，在 1960 年 7 月的北戴河会议上周恩来说，电报已经不存在了，可能烧了，时间是 22 日或 23 日。刘少奇在会上又补充了一句：他们说我们的路线是错误路线，要重新考虑（刘中海、郑惠、程中原编：《回忆胡乔木》，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 年，第 401 页）。有关这个问题的俄国档案目前尚未解密，但季米特洛夫的日记证明，确有这样一封电报。根据日记，8 月 18 日季米特洛夫与卸任不久的驻华大使潘友新共同起草了致毛泽东的电报，意思是“因为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建议中国共产党人改变对蒋介石政府的路线”。第二天，莫洛托夫表示同意这个电文（*Димиитров* Дневник (9 марта 1933-6 феврари 1949), София: Св. Климент Охридски, с.493）。至于收到电报的日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 615 页）注明为“22 日前后”。考虑到该电报应在 19 日以后发出，而中共的战略方针 20 日如故，21 日开始改变，故笔者断定中共收到电报的时间应该在 20–21 日之间。另外，按照师哲的回忆，斯大林先后发来两封电报（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李海文整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 年，第 308 页），此事目前尚无法查证。

② 详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 615–616 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 4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年，第 1–3、15–17 页。

北经济合作的谈判陷入僵局，而苏军又不得不撤离的时候，莫斯科又再次打出了中共这张牌。苏军在1946年春撤退时给中共留下大批缴获的日军武器，并秘密安排中共接管长春、哈尔滨等大城市，还表示苏联目前受外交限制不能直接插足东北，希望中共全力坚持东北，使东北问题悬而不决，造成美蒋被动。但此时踌躇满志的蒋介石已经做好了大举进攻的准备，中共在东北的生存面临极大危机。[①]

由于对苏联在国共之间左右摇摆的做法感到不满和疑虑，当赫尔利辞职、马歇尔作为美国总统的特使来华调停国共内战时，中共再次燃起了对美国的希望。1946年1月30日周恩来向马歇尔转达了毛泽东的口信。毛认为马歇尔对停火问题的处理是公平的，中共愿意同美国在公平的基础上进行合作。周恩来说，中共的长远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但现在还没有条件这样做。在现阶段，中国将走民主和科学的道路，向美国学习农业改造和工业化，以建立一个独立、自由和富强的中国。周恩来还告诉马歇尔，当有传闻说毛泽东要去莫斯科休养时，毛认为这一说法很可笑。毛说，如果身体不好，他宁愿去美国，在那里可以学到许多东西。在给杜鲁门总统的电报中，马歇尔转述周恩来的话说，中共正在努力引进美国的政治体制。马歇尔认为，“中国共产党人具有民族主义的色彩，他们的许多成就都是在民族主义的基础上取得的。”[②]不过，同1944年相比，此时中共对美国的态度更具策略性的意义，其基本的立场是“中立美国”，“逼美压蒋”。因而，当马歇尔不得不放弃调停回国后，中共感觉到美国已经彻底转变到“扶蒋反共”的立场，并最终采取了敌视美国的态度。[③]放弃了对美国的幻想，又不能相信和依赖苏联的支持，面对愈演愈烈的内战局面，中共不得不破釜沉舟，走上了依靠自己的力量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④]

尽管苏军退出了中国东北，但是莫斯科对这一地区的关注丝毫没有减弱。战后

---

① 关于苏军占领东北时期对华政策左右摇摆的情况，详见沈志华：《斯大林与中国内战的起源（1945–1946）》，《社会科学战线》2008年第10期，第115–131页。

② 章文晋：《周恩来和马歇尔在1946年》，《中华英烈》1988年第2期，第13页；*FRUS*, 1946, Vol.9, *The Far East: China*, Washington, D. C.: GPO, 1972, pp.148-151。章当时任周恩来的秘书兼翻译。

③ 关于中共在马歇尔调停时期的立场和政策分析，中国学者已有非常深入和到位的研究，详见章百家：《周恩来与马歇尔使命》，《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4期，第184–213页；牛军：《论马歇尔调处时期国共两党的对美政策》，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划时代的历史转折——“1949年的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39–157页。

④ 苏联红军撤离中国后，毛泽东告诫在东北指挥作战的林彪，内战既开，应“全靠自力更生”。又嘱咐即将赴苏联治病的罗荣桓：“东北斗争主要靠自力更生”，勿向苏方提出“过高与过多要求”；而“关内应完全靠自力更生”，不能向苏方提“任何要求”。毛泽东致林彪电，1946年6月25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4卷，第134–135页；中共中央致罗荣桓电，1946年7月30日，转引自金冲及：《毛泽东传（1893–1949）》，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772页。

苏联在东亚的根本利益是与东北连在一起的，斯大林可以不管整个中国落入何人之手，但不能不考虑如何保证把东北控制在自己手中。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那么在很大程度上，苏联通向太平洋的出海口就会被切断，其占领旅大地区的意义也将大打折扣。所以，苏联必须控制东北，特别是中国长春铁路一线。而要达到这个目的，斯大林现在所能依靠的就只有中共的力量了。从苏联方面来讲，只要中共能够在东北站住脚，莫斯科的远东战略目标就能够实现。从中共方面来讲，建立了巩固的东北根据地，就是走向全面夺取政权的第一步。于是，这种相互需求的政治考量就构成了苏联从东北撤军后与中共关系的战略基础。

资料表明，在 1949 年之前，苏联对中共的援助体现在军事和经济两个方面，而以经济援助的方式为主，目的在于帮助中共取得对东北及部分华北地区的控制。军事援助主要通过两种方式：第一，苏军撤退时赠送或遗留下来的日本关东军的大量武器装备。[①] 第二，通过朝鲜供应或交换的武器装备和军事物资（以缴获的日军物资为主）。[②] 此外，由中共掌握的旅大地区各工厂在苏联占领当局默许和鼓励下生产的大批武器弹药，自然也可以算是苏联提供的间接援助。[③] 目前没有资料显示，此期中共曾得到过苏制的武器弹药。[④] 苏联对中共东北政权的经济援助就显得公开和积极得多，表现有三个方面：第一，通过贸易往来为中共提供工业品和生活用品。从 1946 年底至 1947 年底，苏联与中共政权（东北和华北部分地区）的贸易

---

① 关于这批武器的具体数量，俄国学者与中国学者以及中国学者之间存在不同看法。不过，这批武器对于内战初期中共抵住蒋军大举进攻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则是没有疑问的。详见 *Борисов*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и маньчжурская революционная база (1945-1949), с.138, 185；刘统：《解放战争中东北野战军武器来源探讨》，《党的文献》2000 年第 4 期，第 76–80 页；杨奎松：《关于解放战争中的苏联军事援助问题》，《近代史研究》2001 年第 1 期，第 285–306 页；本书编委会编：《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战史》，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8 年，第 130 页。

② 到 1947 年 6 月，运送给东北局的物资共 4 批约 800–1000 个车皮，1947 年下半年到 1948 年初，又有 52 万余吨。吴殿尧、宋霖：《朱理治传》，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 年，第 461 页；丁雪松等：《回忆东北解放战争期间东北局驻朝鲜办事处》，《中共党史资料》第 17 辑，1986 年 3 月，第 197–200、202–204 页。

③ 内战期间，旅大地区为前线供应了 30 万套军服、236.5 万双军鞋、50 余万发炮弹、80 余万枚引信、450 吨无烟火药、1200 门迫击炮和各种兵工生产设备，以及其他大量军需产品。见中共吉林省委党史研究室、吉林省东北抗日联军研究基金会：《韩光党史工作文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 年，第 33–39、133–139 页。

④ 这一点，也为当时美国的情报所证实。国务院关于支配中共军队规模主要因素的报告，1947 年 6 月 25 日；中央情报局关于苏联实现在华目的的报告，1947 年 9 月 15 日，沈志华、杨奎松主编：《美国对华情报解密档案（1948–1976 年）》第 2 卷，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9 年，第 232–238、239–247 页。

总额为3.2亿卢布，1948年则猛增至6.5亿卢布，翻了一番。[①] 第二，在旅大地区向中共移交了大批工厂，还帮助建立了4个合营公司，从而在很大程度上补充了对中共政权的物资供应。[②] 第三，派遣大批专家协助修复东北铁路网，帮助中共培训技术人员、建立铁道兵部队，并以贷款或易货方式为中共提供铁路物资8760万卢布。1948年底中长铁路全线通车。[③] 此外，战后苏联向中共提供的现金援助，目前看到的材料至少有1946年的5万美金。[④] 所有这些措施，对于中共在东北地区恢复经济、稳定社会乃至军事胜利和政权建立，都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

中共东北政权的建立和巩固完全符合苏联的战略和经济利益，特别是1948年中共在军事上取得优势之后，斯大林对东北地区的援助便更加公开和积极。[⑤] 新的中苏同盟的基础也由此开始建立。不过，当中共的胜利推到长江北岸并开始走向全国时，斯大林又遇到了一个难题，与中共关系的发展也因此面临障碍。

三、斯大林对中共“解放全中国”的担心

斯大林对中共东北政权的支持的确为未来的中苏同盟关系奠定了一块基石，但是如果中共的胜利仅限于长城以北或长江以北，如果苏联对中共的支持和帮助也以此为界限，那么在此基础上建立的中苏同盟就只具有地区意义，无论如何也不能与双方后来实现的联盟同日而语。毫无疑问，全面的中苏同盟的建立，是战后世界历史和冷战格局中最具影响力的事件之一。其认识基础在于，1947年冷战格局的形成毕竟还只是欧洲的事情，而1950年中苏同盟条约签订，则把冷战引向了亚洲，由于社会主义阵营在欧亚大陆连成了一片，以美苏为首的两大阵营的对抗便从大西洋扩展到太平洋——冷战从此具有了全球意义。

---

① 缅希科夫给斯大林的报告，1950年1月20日，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T. IV, K. 2, c.344-347。缅希科夫时任苏联对外贸易部部长。

② 详见中共吉林省委党史研究室、吉林省东北抗日联军研究基金会编：《韩光党史工作文集》；王佩平、孙宝运主编：《苏联红军在旅大》，大连：大连市史志办公室编印，1995年，未刊；笔者1996年5月采访韩光（时任中共大连市委书记）记录，2002年10月26日采访欧阳惠（时任驻旅大苏军指挥部机关报《实话报》中国部副部长）记录，2008年8月1日采访王伟（曾任大连港务局书记）记录。

③ 缅希科夫给斯大林的报告，1950年1月20日，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T. V, K. 2, c.344-347。详细情况见沈志华：《对中苏同盟经济背景的历史考察——中苏经济关系研究之一（1948–1949）》，《党的文献》2001年第2期，第53–64页。

④ 见周恩来亲笔签字的收条，1946年10月16日，沈志华、李丹慧收集和整理：《中苏关系：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第19卷，华东师范大学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未刊，第38页。

⑤ 1948年5月，斯大林在对即将去东北帮助中共修复铁路的科瓦廖夫讲了这番话。*Ковалев* Диалог Сталина с Мао Цзэдуном, 1992, №1, c.79。

斯大林对于中共夺取全国政权的态度，首先取决于苏联在中国所要实现的目标。无论从地缘和国力的角度出发，还是从安全和经济的目的着眼，如前所说，苏联对华政策基本的和首要的目标就是完全控制包括东北、内蒙和新疆在内的中国北部地区。经历了一番周折后，这一目标到 1948 年已经大体实现，并且没有给莫斯科带来任何风险和损失。此时，斯大林十分满意，但毛泽东则不会满足。如果中国的局势沿着有利于中共的势头不断发展，苏联继续支持和帮助中共就会遇到很大难题，并有可能付出尚难预料的代价，其风险在于：国民党得到了他们追求已久的来自美国的公开支持和援助，如此，莫斯科将不得不面对其无力承担且一直设法避免的在亚洲与美国人的冲突；中国共产党完全或部分地摆脱了莫斯科的控制，如此，斯大林就会遇到另一个让他感到头疼的亚洲的铁托；新的中国政府在经济上完全依赖苏联，如此，斯大林必然感到力不从心，尤其是在他刚刚把一系列东欧国家纳入莫斯科卵翼下的社会主义阵营之后。对于这些问题，美国人当年就有十分精到的分析。1947 年 9 月中央情报局在评估苏联对中国问题的立场时写道：“考察中国多年的演变以及上述苏联措施的特征，不难得出结论：苏联对华政策最有效的工具就是中共。中共在意识形态上赞同并倾向莫斯科，只要中共从事在中国争夺权力的斗争，它就将继续与苏联合作。”但是，“如果中国国民政府接受美国帮助以增强国民党进行内战的潜力，估计此时苏联将权衡可供选择的行动路线，更着重于苏联在满洲地位安全，而非中共军队在中国本土的地位或命运。只要国民政府看来无力重建对满洲的控制，可以料想苏联会继续避免针对该政府的公开行动。”[①] 国务院 1948 年 10 月的一份报告在确认满洲和新疆对于苏联的经济和安全意义后指出，“至于中国本土，克里姆林宫几乎将之视为一个庞大的救济院，它是要回避责任的。”对于苏联来说，“在可预见的未来的任何战争中，中国最好是一个虚弱的盟友，或者最差是一个无足轻重的敌人”。“中国的疆域实在过于辽阔，人口实在过于众多，以至于莫斯科不允许毛和他的同志最终控制整个中国，尤其是因为他们掌权部分上是靠高举民族主义的旗帜。只要有可能，克里姆林宫在这些方面就倾向于不去冒这种风险。”总之，苏联“对中国基本的担忧现在不是如何帮助中共去击溃敌对势力赢得内战，而是如何确保对他们及其合作者的完全和持久的控制”。[②]

---

① 中央情报局关于苏联实现在华目的的报告，1947 年 9 月 15 日，沈志华、杨奎松主编：《美国对华情报解密档案（1948–1976 年）》第 2 卷，第 239–247 页。

②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to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United States Policy toward China, October 13, 1948, NSC 34, DDRS, CK3100371087-CK3100371119.

斯大林确实是在这种心态下处理1948—1949年与中共的关系的。其实，毛泽东此时所顾虑的问题与斯大林几乎是一样的。随着军事上一步步接近最后胜利，蒋介石的幕后支持者是否会走上前台，对于中共的确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在毛泽东看来，国共单独较量，蒋介石已经是手下败将，但如果美国人公开站出来援助国民党，共产党是否能够取得最后的全面胜利，就很难讲了，而能够阻止美国干涉的力量只有苏联。此时中共未必需要莫斯科直接的军事援助，但战略上和外交上的支持是绝不可少的，正如毛泽东在1947年12月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上所说：对于苏联的援助，中共历来的方针是不能依赖，但不是不要。[①] 只要斯大林明确表示站在中共一边，就可以对美国的干涉行动起到震慑作用。[②] 另一方面，如果说在单纯的军事方面中共已基本不需要苏联的帮助，那么在已经取得和将要取得的新政权的巩固和建设方面，苏联的援助就是必不可少的。中共长期在野，并一直在农村活动，对于经济建设和城市管理几乎一无所知。毛泽东当然通晓“可马上得天下而不可马上治天下”的道理，他在1948年9月的政治局会议上谈到，未来中国的发展需要苏联的帮助，首先是经济上的帮助。[③] 这一点，从此后中共要求苏联派遣的技术和管理专家人数成倍增加就可以得到充分证明。[④]

然而，莫斯科却在犹豫和观望。尽管冷战已经在欧洲爆发，斯大林构造的以莫斯科为中心的社会主义阵营自然也把中共及其武装看做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但斯大林最初的设想战略是外线防御、内线进攻，即对美国和西方采取保守和防御的策略，而集中力量对阵营内部进行整肃，统一思想和步调，以稳定与西方抗衡的阵脚。斯大林拒绝正在领导国内武装斗争的希腊共产党参加共产党情报局，日丹诺夫在关于两个阵营分析的著名报告中对如火如荼的中国革命斗争轻描淡写，以及斯大林因铁托在巴尔干联盟和援助希腊问题上的鲁莽行动而最终决定将南共赶出教门，这一切都表明，苏联的冷战战略不具进攻性，且希望避免和推迟与美国的直接冲

---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4卷，第329–330页。

② 美国援蒋的困境确在于此。1948年5月中情局的报告分析说：苏联迄今没有公开向中共提供物资援助，并继续承认国民政府是中国的合法政府，但如果美国向国民政府提供援助，苏联就可能采取“引人注目的行动”。在美苏各自为国共提供支持的攀比上升的过程中，优势在苏联一方，而美苏在华发生直接冲突的可能性将大大增强。中情局关于中国的调查报告，1948年5月，沈志华、杨奎松主编：《美国对华情报解密档案（1948–1976年）》第2卷，第273–283页。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46页。

④ 参见沈志华：《对中苏同盟经济背景的历史考察》，第59–64页。

突，特别是在亚洲。[1]正是在这样复杂的国际背景下，斯大林对于如何处理与中共的关系产生了一种矛盾心理：既想详细了解、全面掌控，又不便直接接触、公开支持。

中共的目标却十分清楚：越是接近胜利的时候，毛泽东就越感到需要苏联这个盟友。从国家利益和民族主义出发，苏联此时的支持和帮助显然具有关键意义，从意识形态和国际主义考虑，中共期待已久的“国际援助”也应该到来了。为此，毛泽东必须把以往的怨气压在心中，而对斯大林表现出绝对谦恭和顺从。从1947年初开始直到1949年初，毛泽东三番五次请求亲自去莫斯科晋见斯大林，希望“就政治、军事、经济及其他重要问题，广泛听取联共（布）中央同志的建议和指导”，“以便使我们的政策方针与苏联保持完全一致”。面对斯大林的犹豫不决和一再推托，毛泽东虽然极为不满且小有发作，最终还是不得不忍气吞声，一再表明急于前往莫斯科接受苏共指导的迫切愿望。[2]

没料想，毛泽东等来的却是一个令他无法容忍的结果。1949年1月8日，面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陈兵长江的危急局势，国民党要求美、英、法和苏四国出面调停国共关系，实现和谈，以便争取时间，卷土重来。[3]毛泽东的既定方针是“必须将革命进行到底”，“准备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中央政府”。[4]至于和谈，中共的主张是，和平谈判一定要进行，但不是同国民党政府谈判，而只是分别同有实力的地方政府和部队代表谈判，同他们或者是谈判停战，或者是谈判起义的条件，例如在北平同傅作义的谈判。通过在中共中央的联络员，斯大林对中共的立场是非常清楚的。[5]然而，莫斯科还是明确表示了希望出面调停国共内战的想法。

1949年1月10日，斯大林电告毛泽东：国民政府希望苏联出面调停国共内战，

① 详细论证见沈志华：《共产党情报局的建立及其目标——兼论冷战形成的概念界定》，《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3期，第172–187页。

② 毛泽东一再求见斯大林而未果的详细过程，见沈志华：《求之不易的会面：中苏两党领导人之间的试探与沟通——关于中苏同盟建立之背景和基础的再讨论（之一）》，《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

③ 希望和谈是国民党方面的一致意见，但主张“运用外交使美苏英法对中国和平取得谅解并予以支持”，是李宗仁的主意，而蒋介石以为，外交部照会四国政府，表明力主结束内战，希望他们从旁协助，“但不要求其斡旋或调解，以免干涉我国内政”。见李宗仁呈蒋中正建议书，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革命文献–国共和谈，台北：“国史馆”，002-020400-030-001；秦孝仪总编纂：《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七，下册，台北：中正文教基金会出版，1978年，第224页。

④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记录，1949年1月6日，转引自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下卷，第908页。

⑤ 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第370页；捷列宾致库兹涅佐夫电，1949年1月10日，АПРФ, ф.39, оп.1, д.31, л.54-58,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Т. V, К. 2, с.11-14。

中共不应拒绝和谈，而苏共也有意接受这一建议，并需要先了解中共的意见。斯大林还为中共起草了一封回函，意思就是让中共表明态度：只接受苏联单独出面调停。毛泽东当时想的只是如何尽快夺取天下，万没想到苏联会如此盘算。接到电报后，再也无法按捺心中怒火的毛泽东于12日给斯大林的回电，直截了当地拒绝了苏联政府的建议，并指责苏共这样做将导致西方势力参与调停，也为国民党好战分子污蔑中共制造了口实。他甚至学斯大林的做法，也替苏联政府起草了一封回绝国民政府的信函。13日，毛泽东身边的苏共联络员向莫斯科报告：毛谈到这个问题时语气很尖锐，他反对各种形式的调停，并反对中共参加任何谈判。14日，毛泽东接到了日期标明为11日的斯大林来电，其中解释说，苏共的立场主要是不想让中共丢掉和平这面旗帜，中共只需提出令国民党无法接受的和谈条件，便可一举两得。如此，毛泽东才平静下来，斯大林也照会南京，表示拒绝调停。[①]

俄国学者大多认为，这些往来电报说明，斯大林根本就没有企图阻止中国革命的深入发展，以往传说斯大林有意调停国共和谈的看法是没有根据的。[②]这里的关键问题是如何解释斯大林1月11日的电报，俄国学者认为这是1月10日电报的"续电"，是对苏共立场的进一步解释。但仔细研读这些文件可以发现，这两封电报的意图完全不同，前者明显表示莫斯科希望单独出面调停和谈，后者则意在突出中共不应放弃和平的旗帜，而对调停之事闭口不谈。至于对11日电报真实日期的解释，有几种可能性：或者是斯大林看到毛泽东强硬的反对态度后，不得不改变说法，但为了给自己找一个台阶，有意将电报日期提前到11日；或者斯大林在发出10日电报后，担心遭到毛泽东的拒绝，随即发出了另一封意思相反的电报，但不知何故迟到了两天；或者毛泽东及时收到了11日电，但为了发泄心中的不满而有意推迟答复。[③]无论如何，把这一时期有关的档案文献联系起来看，斯大林最初确实有意出面调停国共和谈。

事实表明，早在1948年1月苏联驻华武官罗申就对南京表示苏联愿意安排国

① 以上往来电文见АПРФ, ф.39, оп.1, д.31, л.61-64,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Т. V, К. 2, с.15-25。

② *Тихвинский* Переписка И. В. Сталина с Мао Цзэдуном, в январе 1949г., с.132-140; *Рахманин* Взаимоотношения И. В. Сталина и Мао Цзэдуна глазами очевидца, с.87-88;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Т. V, К. 2, с.530-532.

③ 笔者期待着中共中央档案的开放，或许有助于解开这个历史谜团。

共和谈，直到年底，升任大使后的罗申还在为此活动。[①] 美国情报机构对这些情况也有明确记录。[②] 从苏联的处境考虑，斯大林在 1948 年希望国共和谈是可以理解的。此时中国的局势尚未完全明朗化，特别是对美国的亚洲战略及对华政策还捉摸不定。而苏联在欧洲已经陷入了与西方严重对抗的泥淖，柏林危机的结果也使斯大林认识到双方实力的差距。在这种时候，莫斯科最不愿意看到的局面，就是美国认定苏联有意在亚洲破坏雅尔塔协议的框架，进而采取直接的武装干涉政策，使苏联陷入两面受敌的困境。所以，莫斯科既要支持和援助中共，又不能让美国人和国民党政府抓住把柄，最好的选择当然是促使国共停止内战，以保住既得利益而不冒任何风险。俄国档案显示，直到 1948 年 12 月，苏联仍然对美国继续援蒋的可能性和具体内容非常关注。[③] 不过，此时莫斯科还有另外一个更大的担心，即失去对中共的控制。苏联驻华使馆 12 月 27 日提交的备忘录认为，"从杜鲁门总统的整个对华政策看，停止给蒋介石政权提供援助已不是意外之事。"同时，美国正在策划组建以李宗仁为首的联合政府，并"迫使共产党人在相互让步的原则下接受和平建议"。更值得注意的是，"美国人决心直接同共产党接触"。[④] 如果说苏联最初希望国共和谈是对美国军事干涉的担忧，那么到 1948 年的年底，这种疑虑已经转向美国的政治干预，特别是与中共建立起某种关系。毛泽东的强硬态度无疑更加深了斯大林的疑虑。[⑤]

应该说，斯大林来电的主要目的并不是要阻止中国革命的发展，而是要保证由莫斯科来把握局面。但是，与西安事变、皖南事变、重庆谈判时的情况不同，这一次是毛泽东迫使斯大林改变了初衷。毛泽东敢于在涉及中国革命前途的原则问题上

---

① Stuart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February 24, 26, March 8, 1948, in *FRUS*, 1948, Vol.7, pp.112, 117-118, 133-136；国防部第二厅致外交部情报抄件，1948 年 6 月，"中华民国外交部"档案馆，112.1/002，第 60–63 页；Stuart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November 10, December 1, 1948, in *FRUS*, 1948, Vol.7, pp.558-560, 627。

② 中央情报局关于中国和平谈判前景的报告，1948 年 7 月 12 日，沈志华、杨奎松主编：《美国对华情报解密档案（1948–1976 年）》第 2 卷，第 384–387 页。

③ 罗申与英国大使史蒂文森会谈备忘录，1948 年 12 月 9 日；罗申与印度武官托卡尔会谈备忘录，1948 年 12 月 29 日，АВПРФ, ф.0100, оп.41, п.276, д.19, л.82-84, 80-81,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T. V, K. 1, с.488-489, 494-495。

④ 马卢欣关于美国在华政策的备忘录，1948 年 12 月 27 日，АВПРФ, ф.0100, оп.42, п.296, д.117, л.7-23。

⑤ 1949 年 2 月美国记者安娜·斯特朗在莫斯科以帝国主义间谍的罪名被捕，她在《明天的中国》一书中把毛描述为亚洲的圣人，把《新民主主义论》称为亚洲的圣经。（国务院情报研究所关于毛泽东作为领袖和理论家的研究报告，1949 年 12 月 22 日，沈志华、杨奎松主编：《美国对华情报解密档案（1948–1976 年）》第 2 卷，第 560–568 页。）可以认为，斯大林这样做很可能就是在给毛泽东施加压力，至少客观效果如此。

直接顶撞斯大林，主要并非性格使然，而是因为中共在内战中已经取得绝对优势并完全可以控制中国局势的发展，而莫斯科在考虑苏联的亚洲战略和远东安全问题时，不得不把中共的立场及对中共的政策作为首要因素。此外，得知美英等国决定不参与调停，继续对中国采取观望态度，也减轻了苏联的担忧。所以，面对中共的强势地位和强硬立场，斯大林很快就改变了说法。[①]

无论如何，到1949年初中国问题开始进入莫斯科的议事日程了。笔者对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每年数百个讨论的问题及作出的决议进行粗略统计发现，其中直接涉及中国或中共的议题，1945—1948年每年只有4—5个，最多时也没超过7个，而1949年便陡然增加到70个，1950年更多达132个（不算朝鲜战争）。[②]这充分表明中国此时在苏联国际战略中地位的提升。不仅如此，斯大林也开始亲自主持对华事务。1949年初莫洛托夫和维辛斯基在给苏共中央驻中共中央代表科瓦廖夫的电报中指出，"从现在起，任何有关中国的事务都要直接与菲利波夫同志联系。"[③]显然，要处理与毛泽东的关系，要把中共纳入由莫斯科掌控的社会主义阵营，斯大林担心其他人难以应对。而这时斯大林迫切需要了解的是中共政权的性质、政治倾向及其与苏联的关系，从而重新确定苏联的对华政策。米高扬以政治局委员身份秘密访问西柏坡，其主要目的就在于此。

在1949年1月30日至2月7日米高扬与毛泽东、刘少奇等进行的12次谈话中，中共领导人详细而全面地介绍了自己的历史和中国的现状，以及在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等方面中共正在或即将实行的方针和政策。[④]斯大林非常重视这次访问，期间，苏共中央政治局每天都开会研究和讨论米高扬的电报。会谈结束后，

---

① 顺便说一句，关于史学界长期争论的斯大林是否阻止中共军队打过长江，提出所谓建立"南北朝"的问题，笔者倾向于认为，这不是苏联明确提出的政策，而是毛泽东的感受。鉴于直到1949年初苏联对国共和谈的态度，毛泽东有这种感受是可以理解的。

② *Адибеков, Андерсон, Роговая* Политбюро ЦК РКП (б)-ВКП (б) Повестки дня заседаний 1919-1952, Каталог, Том III, 1940-1952. 1946–1947年莫斯科对中国问题并没有特别关注的情形，从当时苏联驻华外交官的回忆中也可以看出来："显而易见，我们驻满洲军方和其他代表并没有把所有情况报告莫斯科，莫斯科也没有经常向大使馆及时通报情况，而只限于中央简要指示里所列举的情报"。"苏联大使馆对情况的掌握很有限，而且往往是自相矛盾的"。*Крутиков К. А.* В гоминьдановском Нанкине, 1946-1948 годы//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2004, №2, с.138, 147.

③ 见 Sergei N. Goncharov, John W. Lewis, and Xue Litai, *Uncertain Partner: Stalin, Mao, and the Korean War*,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20。菲利波夫是斯大林的化名。

④ 米高扬与中共领导人谈话备忘录，1949年1月30日至2月7日，АПРФ, ф.39, оп.1, д.39, л. 1-95,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Т. V, К. 2, с.33-93。以下所引西柏坡会谈内容均出自这些文件，不再出注。

斯大林要求米高扬尽快赶回莫斯科，详细汇报各种情况。[①] 需要指出的是，1995年人们看到的米高扬关于中国之行的报告，是在中苏关系开始恶化的时候提交的，其中难免有片面和责难的倾向，因而研究者在利用这一文件时大多也过于关注中苏之间的分歧和矛盾。[②] 其实，全面阅读米高扬关于这些谈话给斯大林的报告，给人最明显的感觉是，除了要求援助（主要是经济建设和国家管理方面），中共领导人在谈话中反复和明确地表现出亲苏的立场，特别是毛泽东，一再高度评价苏共对中共的领导、指导和帮助。中共领导人还反复强调要向苏共学习，并与苏共站在一起的决心。毛泽东多次声明：中国共产党还很幼稚，并坚持说自己是斯大林的学生。米高扬是第一位访华的苏共高级领导人，这次访问促进了斯大林对中共的了解和理解，大大推进了苏联与中共政权关系的发展。米高扬走后，毛泽东更加明确了中共必须向苏联靠拢的方针，并且多次在党内指出这一点。[③] 与此同时，苏联也明显加快了向中共提供援助的步伐和力度。[④] 越是临近全面掌握政权，中共就越感到对国家的管理特别在经济管理方面是个难题，也就越感到需要苏联的帮助。另一方面，中共已经表明了自己的亲苏立场，却还不知道苏共将来对中共政权究竟采取何种方针，而这决定着大规模苏联援助是否能够到来，何时到来。为此，毛泽东需要尽快派正式代表团访问苏联。

6月26日，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共代表团秘密到达莫斯科。这次历时50天出访的主要目的，就是直接向斯大林表明中共在国内外重大问题上的立场，听取苏共中央的意见；了解苏共对中共的立场和态度；详细提出请求苏联帮助和援助的事项；对苏联政府和苏共组织进行实地考察、学习。斯大林为刘少奇的来访做好了充分准备，第一天见面就几乎同意了此前中共提出的所有要求，包括贷款、专家、海军建设、开辟航线、提供战斗机等等，甚至主动提出愿意帮助中共尽快占领新疆。在后

① 米高扬给苏共中央主席团的报告，1960年9月22日，АПРФ, ф.3, оп.65, д.606, л.1-17//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1995, №2, с.109。遗憾的是俄国没有公布来自莫斯科的指示电，不过可以认为，米高扬所说都是斯大林授意或同意的内容。

② 米高扬报告列举的主要是他认为有问题的谈话内容，见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1995, №2, с.105-107。学者对此的反应见 Goncharov, Lewis, and Xue, *Uncertain Partner*, pp.41-43；*Кулик*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й раскол: причины и последствия, с.73-74；海因茨希：《中苏走向同盟的艰难历程》，第269页。

③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8册，第138–142、136–137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262页。

④ 详见苏联部长会议的命令，1949年2月6日，АПРФ, ф.3, оп.65, д.444, л.32-34；库梅金给斯大林的报告，1949年6月17日，АПРФ, ф.3, оп.65, д.363, л.12,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T. V, K. 2, с.88-89, 147, 548。

来举行的几次会谈中，斯大林多次对中共做出高度评价，特别是对苏共过去指导中共工作中的某些做法表示道歉，斯大林还把领导亚洲革命的重担交给了毛泽东。① 这表明苏共此时已确定了以中共政权为盟友的对华政策，而且必须尽早让毛泽东明白这个意向。也正是在这样判断的基础上，毛泽东在接到刘少奇第一封电报后，便不再理会留在南京、故作姿态的美国大使司徒雷登，迫不及待地公开宣布了向苏联“一边倒”的建国方针。② 毛泽东对此做出的解释是：没有国际力量的援助，任何人民革命都无法取得胜利，即使取得胜利也不可能巩固。③ 由此可以断言，到1949年夏天，中苏战略合作的构架已经形成。

从共产党人的理念出发，中苏都认为结成同盟的首要条件是意识形态的一致性——斯大林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袖自居，毛泽东则竭力表明中共愿意加盟社会主义阵营，但从上述发展过程可以看出，他们实际上注重的是双方联盟是否符合各自的眼前利益和长远目标。中苏领导人在西柏坡确认了双方意识形态的同一性，在莫斯科则进一步明确了各项方针政策的一致性，至此中苏同盟的政治基础已经确立。至于未来国家利益方面，斯大林和毛泽东首先考虑的是各自政权的安全和稳定，出于对国际形势判断的共同认识，在这方面他们是基本一致的。但国家利益还涉及主权、尊严、经济等各方面的问题，而在这些问题上，由于历史的原因，双方将要面临的分歧和冲突是十分明显的。惟其如此，在这两次中苏高层会晤中，双方都努力寻求在原则问题上达成谅解，而在有争议的问题上采取回避、搁置或暂时退让的方针。但是，斯大林和毛泽东都非常清楚，这些问题是必须解决的——双方在涉及国家和民族利益方面缺乏协调和一致，同盟也是不会稳定的。

四、中苏之间的利益冲突与同盟的建立

1950年2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标志着新中国正式加入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然而，中苏之间历经两个月的外交谈判并非一帆风

① 斯大林与中共代表团会谈纪要，1949年6月27日，АПРФ, ф.45, оп.1, д.329, л.1-7,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Т. V, К. 2, с.148-151。访问过程详见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第419–424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217–221页。

② 详见沈志华：《从西柏坡到莫斯科：毛泽东宣布向苏联“一边倒”——关于中苏同盟建立之背景和基础的再讨论（之二）》，《中共党史研究》2009年第4期，第14–33页。

③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合订一卷本，第1478–1479页。

顺，在他们之间，最核心的利益冲突就表现为如何处理1945年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毛泽东虽然在政治上尽量表现出对斯大林的顺从和依赖，但是在涉及国家和民族根本利益的重大问题上，却不敢掉以轻心。随着政权易手，中共在这方面的考虑越来越实际了。美国情报机构曾断定：尽管决定依附于莫斯科，“但中国共产党取得的胜利越大，克里姆林宫为实现‘国际主义控制’而介入中国的意向就越强烈，调和中国民族主义和反帝主义分歧的困难就越大。最终，中国的民族主义很有可能证明比国际共产主义要强烈得多”。[①] 从大体发展趋势看，这个判断是不错的。

斯大林最担心的就是新政权不承认国民政府签订的那个最令莫斯科感到满意的条约，他向北京派遣的第一任大使竟然是原来派给南京政府的大使，其用意显然在暗示苏联的看法：中国这两个政权在政治上对立，在法统上却应有继承性。[②] 毛泽东三番两次来电，直接或间接说明他访苏的主要目的就是讨论1945年条约的问题，并请求苏方给予答复，斯大林对此就是置之不理。[③] 尽管如此，毛泽东还是在与斯大林第一次会面时便直截了当地提出了这个问题。面对斯大林强硬拒绝的态度，毛泽东不为所动，既不回国，也不露面，以至西方盛传他被斯大林软禁的谣言。无可奈何的斯大林只好让步，同意重新签订中苏条约。但斯大林心思缜密，为新条约做了充分准备。在毛泽东游览冬宫、周恩来尚在路途之时，苏联便组织外交和法律专家起草了一系列条约、协定和议定书，其实质在于形式上废除旧条约，而内容上保留大部分旧条款，这主要反映在有关中长铁路、旅顺港和大连的问题上。1月26日收到苏方的草案后，毛泽东毫不犹豫地给以全盘否定，并很快提交了中方重新起草的完全对立的协定文本。斯大林最初怒不可遏，但很快就平静下来，两天后苏联外交部返回的修改本已经非常接近中方的草案了——斯大林再次做出了让步。[④]

---

① 中情局关于中国可能发展趋势的报告，1948年11月3日，沈志华、杨奎松主编：《美国对华情报解密档案（1948–1976年）》第2卷，第425–427页。

② 中国领导人对这一任命颇感失望的表现，见齐赫文斯基著：《我的一生与中国（30–90年代）》，陈之骅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年，第67页。

③ 罗申与周恩来会谈备忘录，1949年11月10日，АВПРФ, ф.07, оп.22, п.96, д.220, л.52-56,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Т. V, К.2, с.218-219; АВПРФ, ф.0100, оп.42а, п.288, д.19, л.81-85。转引自 *Кулик* Китайская Народная Республика в период становления, 1949-1952гг.//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1994, №6, с.75。

④ 笔者关于中苏条约谈判详细过程的论述，见《〈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愿望和结果——根据俄国解密的档案材料》，《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2期，第39–60页，第3期，第46–70页；《中苏条约谈判中的利益冲突及其解决》，《历史研究》2001年第2期，第39–55页；《关于中苏条约谈判研究中的几个争议问题——再谈冷战史研究中史料的解读与利用》，《史学月刊》2004年第8期，第57–68页。

通过1945年的中苏条约，苏联取得了中长铁路的经营权、旅顺海军基地的租赁权和大连行政管理的实际控制权，从而实现了自沙皇时期俄国人就一直梦寐以求的远东战略，而这一战略的基点就是获取在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冻港。这涉及苏联的在亚洲的基本安全利益和重大经济利益，所以，斯大林从一开始就对此异常警惕，始终不愿松口。对于中共而言，如果不能废除1945年条约、收回东北的主权，那么就无法向党内说明苏联共产党的国际主义情操体现在哪里，也无法实现“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的承诺，更难以对国人解释中共采取向苏联“一边倒”的政策的合理性。所以，毛泽东千方百计也要逼迫斯大林做出让步。

斯大林之所以两次被迫做出让步，固然与毛泽东毫不退让的强硬态度和周恩来机动灵活的外交手段有关，但更主要的因素不是来自中国，而是来自美国的压力。在中国内战的最后关头，美国采取了消极观望的态度，不仅陆续撤走了在青岛和上海的军事力量，而且同意司徒雷登大使留在南京与中共接触，直到1949年底，美国对华政策仍然处于“等待尘埃落定”的摇摆之中。[①] 国民党“政府”迁台和毛泽东访苏后，美国对中国问题做出明确表态已经迫在眉睫。12月29日，参谋长联席会议与国务院直接对话，辩论对华政策。参联会认为，从军事角度看，国民党在台湾的地位比过去稳固，因此只需要相对低廉的费用，台湾便可以支撑得比美国预想的要久。因此，应该按其需要增加给台湾的军事援助，并派遣军事顾问驻台。国务院认为，必须承认共产党人事实上已经控制了中国，如果此时增加对国民党的军事援助，无非是使台湾推迟一年陷落，但为此付出的代价是美国的威信在公开失败中再次降低，同时还会激起中国人民的仇恨情绪，并使苏联有借口在联合国控告美国。台湾对于美国的安全防务并无战略意义，而中国不受苏联支配才是美国“在华的一项重要资产”，美国不应“以自己代替苏联作为对中国的帝国主义威胁”。从长远的观点看，美国的立足点应该放在“中苏之间必然爆发的冲突”。[②] 争论的结果，杜鲁门总统支持了国务院的意见。12月30日通过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第48/2号文件规定，“美国应当通过适当的政治、心理和经济手段利用中共和苏联之间，以及中国斯大林主义者和其他分子之间的分歧，同时谨慎地避免给人以干涉的印象。”至于台湾，其“重要性并不足以采取军事行动”。“美国应尽一切努力以加强它在非

① 这就难怪蒋介石会私下认为：国民党的失败，不在于中共，甚至不在于苏俄，而在于美国的外交政策。蒋介石日记，1949年1月24、31日，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University of Stanford。

②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by the Secretary of State, December 29, 1949, in *FRUS,* 1949, Vol.9, pp.463-467.

律宾、琉球群岛和日本的总体地位。”[①] 1950年1月5日和12日，杜鲁门和艾奇逊分别发表了声明和演讲，公开宣布了美国刚刚确定的对华新政策。[②]

中苏结成同盟对于毛泽东和斯大林来说都是既定方针，是必须实现的目标。中共政权的稳定，特别是在经济恢复和发展方面，离开苏联的帮助是很难实现的，而苏联的远东安全则有赖于中国的加盟。在这种态势下，当中苏之间出现了分歧和矛盾时，美国的态度和立场就发挥了关键性影响。如果美国对中共采取挤压和逼迫的政策，则中国只能屈服于苏联，如果美国对中共采取宽容和拉拢的政策，则中国自然可以对苏表示强硬。华盛顿选择了后者，所以斯大林不得不做出让步。正如有些学者指出的，美国是“斯大林与毛泽东交往中无形的第三者”。[③] 将中国纳入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是斯大林控制和影响亚洲局势以对抗美国的战略安排，也是苏联与中国结成同盟关系的基本出发点。如果因为中苏之间经济利益的分歧而破坏了双方的政治关系，对于苏联的全球战略来说是得不偿失的。另一方面，如果中国是可靠的同盟，就可以保障苏联东线的安全。无论如何，斯大林都不会让美国人破坏苏联与中国建立同盟关系的计划。自然，斯大林也在考虑补偿措施。

利益冲突的存在并不影响同盟的建立，但可能会影响到同盟的稳定性。作为中苏条约前期谈判的结果，中国收回了本该属于自己的主权和利益，而苏联将在两年之内失去在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冻港，从而不得不放弃斯大林通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实现的远东战略的基点以及在东北的种种经济利益。为了弥补这些损失，苏联在后期谈判中不仅要求允许苏方在战争状态下无偿使用中长铁路运兵，而且提出不得让第三国势力进入东北和新疆地区，还在苏联专家的待遇、汇率及其他经济贸易谈判中斤斤计较。[④]

不过，斯大林为此所采取的更重要的措施不是在中苏谈判之中，而是在中苏谈判之外。为了保证苏联战后远东战略得以继续实施，斯大林试图在旅顺之外另行寻

---

① Reel 2, NSC 48/2: The Position of the U. S. with Respect to Asia, December 30, 1949, in Paul Kesaris (ed.), *Documents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1947-1977 (microform)*, Washington: University Publications of America, 1980, pp.111-119.

② 见世界知识出版社编:《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二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60年，第10–14、19–34页。

③ 见 Goncharov, Lewis, and Xue, *Uncertain Partner*, p.104。

④ 详见沈志华:《中苏同盟条约后期谈判的情况及结果》,《俄罗斯研究》2010年第1期，第11–30页。

找一个出海口和不冻港，这个地点就选择在朝鲜半岛。[①] 于是，就在1月28日苏方表示接受中方关于中长铁路、大连和旅顺港的协定方案之后两天，斯大林决定邀请金日成秘密访问莫斯科，商谈他苦苦追求已久的军事计划。此前，斯大林完全同意毛泽东的主张，即首先解决中共攻占台湾的问题，以后再帮助金日成解决朝鲜问题，还答应帮助中共建立海军和空军，并提供飞机和军舰。现在不同了，斯大林背着毛泽东在4月10—25日与金日成举行了秘密会谈，确定了在朝鲜半岛采取军事行动的基本原则，直到5月中旬才将这一决定通知毛泽东。[②]

斯大林1月30日突然作出的这个重大决定，无疑为即将签字的中苏同盟条约蒙上了一层阴影，它不仅改变了朝鲜半岛的命运，也对中共进攻台湾的计划产生了重要影响。中苏条约谈判的结果，一方面导致美国对华政策发生重大逆转——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提出的“全面遏制”原则，构成了美国重新确定对华和对台政策的理论基础。[③] 另一方面也改变了苏联对外军事援助的方向。此前，为了阻止朝鲜半岛的武装冲突，莫斯科一直限制对平壤的武器供应。现在，苏联的武器装备开始大规模地运往朝鲜半岛。与此同时，本来答应援助中共的飞机、军舰却迟迟不能到货，尽管周恩来不断发电催促，甚至讲明中共进攻舟山、金门和台湾的时间表，莫斯科仍无动于衷。[④] 可以认为，中共解放台湾战役的计划在朝鲜战争爆发之前已成泡影，这不能不说是斯大林对毛泽东的报复，也显示出莫斯科对中苏同盟条约的漠视。

毛泽东自称收回东北主权是“虎口夺食”，也知道莫斯科之行得罪了斯大林。为了维护刚刚建立的中苏同盟，也为了中共政权的巩固，他必须对斯大林有所表示。

---

① 早在1945年9月苏联外交部就建议，朝鲜半岛南方的几个港口具有战略价值，应该置于苏军的掌握之中。外交部关于日本殖民地和托管地问题的意见，1945年9月，外交部关于朝鲜问题的建议，1945年9月，АВПРФ, ф.0431I, оп.1, п.52, д.8, л.40-43, 44-45，转引自 Kathryn Weathersby, Soviet Aims in Korea and the Outbreak of the Korean War, 1945-1950: New Evidence from the Russian Archives,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Working Paper*, pp.9-11。

② 详见沈志华：《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修订版），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29–158页。

③ NSC68, Note by the Executive Secretary to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on United States Objectives and Programs for National Security, April 14, 1950, in *FRUS*, 1950, Vol.1, pp.237-292。有关NSC68文件的全面分析，见周桂银：《美国全球遏制战略：NSC68决策分析》，沈宗美主编：《理解与沟通：中美文化研究论文集》，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74–102页；Ernest R. May (ed.), *American Cold War Strategy: Interpreting NSC 68*, Boston, New York: Bedford Books of St. Martin's Press, 1993；张曙光：《美国遏制战略与冷战起源再探》，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83–247页。

④ 详见沈志华：《中共进攻台湾战役的决策变化及其制约因素（1949–1950）》，《社会科学研究》2009年第3期，第34–53页。

毛泽东本来对金日成到北京传达的信息提出怀疑和反对，5 月 14 日斯大林几行字的电文使他立即改变了态度，不仅当场宣布全力支持北朝鲜的军事行动，而且在战争开始后，一再直接或间接地要求派兵入朝助战。然而，斯大林帮助金日成所采取的行动，其本意是要为苏联在朝鲜半岛重新建立一个出海口和不冻港，如果同意几十万中国军队进入朝鲜，即使取得胜利，又如何实现莫斯科的目标？所以，对于毛泽东三番五次要求出兵的暗示和金日成的不断请求，斯大林始终置若罔闻。直到 9 月底北朝鲜军队全线崩溃，联合国军突破三八线防御阵地在即的时候，斯大林才要求中国立即出兵援朝。此时中国出兵朝鲜，已经失去了天时、地利、人和等所有有利条件，从军事上讲没有任何取胜的把握，甚至还可能引火烧身。这一点，美国人和中国人都看得很清楚，就连斯大林也是心知肚明，所以在黑海与周恩来会谈时他出尔反尔，背弃了中国出陆军、苏联出空军的诺言。但在斯大林看来，挽救北朝鲜并保障苏联的东线安全，唯有中国人站出来这一招，这是毛泽东为中苏同盟条约的签订所必须付出的代价。中国多数领导人反对出兵，主要是从军事角度考虑的，而毛泽东力排众议，一再主张出兵援朝，考虑的就是这个政治问题。从本质上讲，中国出兵要挽救的主要不是朝鲜，而是中苏同盟。毛泽东所说即使战败也要出兵就是这个道理。如果毛泽东违背斯大林的旨意，任由美国人占领整个朝鲜半岛，那么，墨迹未干的中苏同盟条约真的可能就形同一张废纸了。那时中国面对美国的军事威胁和蒋介石反攻大陆的叫嚣，就很难再得到苏联的支持和援助了，且不说刚刚建立的政权还面临着共产党难以应付的诸多经济和社会问题。正是毛泽东在危急时刻作出的中国出兵与美国孤军作战这一决定，才改变了斯大林对中共和毛泽东的看法，并在事实上巩固和发展了中苏同盟的政治基础。此后，斯大林及时派出苏联空军参战，为中国提供了大量军事和经济援助，并在涉及战争的一系列战略问题上支持了中国的主张。[①] 这就是历史上时常出现的因果转换的典型实例：中苏同盟条约签订导致了朝鲜战争的爆发，而中国被迫单独参战则反过来巩固和加强了中苏同盟。

对历史过程的逻辑梳理表明，中苏同盟的建立对于双方来说的确都是非常艰难的，这里至少经历了五次转折：由于缺乏信任，1944 年中共和苏联都没有把对方作为战后合作伙伴的首选；1945 年毛泽东在党内宣布苏联是中共的朋友，却遭到

---

① 详见沈志华：《朝鲜战争初期苏中朝三角同盟的形成》，（台北）《国立政治大学历史学报》2009 年 5 月第 31 期，第 165–198 页；沈志华：《新中国建立初期苏联对华经济援助的基本情况》，《俄罗斯研究》2001 年第 1 期，第 53–66 页；2001 年第 2 期，第 49–58 页；沈志华：《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修订版），第 159–208 页。

斯大林的白眼；1946—1948 年苏共谨慎地援助中共建立起革命政权，但只限于中国北方地区；经过激烈的争论，并在毛泽东表示政治上的顺从后，斯大林决定支持中共夺取全国政权；斯大林在中苏民族利益的冲突中被迫做出重大让步，从而对毛泽东的忠诚和中苏同盟的可靠性产生怀疑；毛泽东在极端困难和矛盾的情况下，毅然决定出兵朝鲜单独对抗美国，避免了中苏同盟条约被束之高阁的命运。所以，中苏结盟的过程并非顺理成章，一帆风顺，相反，毛泽东与斯大林之间的认知和认可，经历了重重曲折和不断选择。由此可以得出结论：

一、中共和苏联都是从各自的战略利益出发考虑结盟问题的，意识形态不是出发点，但确是必不可少的条件——斯大林以国际主义（其核心在于是否忠于莫斯科）作为评判社会主义大家庭成员的标准，而毛泽东则把崇尚国际主义和追随莫斯科作为取得苏联支持的敲门砖。

二、中共政权的建立主要依靠的是毛泽东的坚定信念、灵活策略和军事才能，苏联的援助和支持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不过对于毛泽东而言，这些援助和支持在巩固中共政权的过程中才是更加关键和必不可少的。这也是毛泽东不得不宣布“一边倒”的主要原因。

三、苏联的安全与中共政权的巩固之间存在着互补性和一致性，但在主权和经济利益方面却有严重冲突，毛泽东逼迫斯大林放弃了在中国东北的特权和利益，险些导致中苏同盟毁于初建。而毛泽东在战争的环境下为了维持这个必要的同盟，又不得不置眼前的国家利益于不顾。

四、美苏冷战对抗的国际格局对中苏同盟形成的直接影响在于客观上推动了苏联与中共的接近，并成为中苏两国领导人调整相互关系的潜在因素。反过来，中苏同盟的建立则预示着冷战格局从欧洲扩展到亚洲。

五、至于美国人经常讨论的“失去中国”的问题，如果说 1944 年确有美国与中共建立正常或友好关系的可能性，那么随着毛泽东与斯大林的逐步靠拢，这种机会到 1949 年已不复存在。

六、中苏同盟对于双方来讲在某种程度上都是一种无奈的选择，而且回旋余地越来越小。然而，毛泽东与斯大林之间的不信任始终存在，且时隐时现。就领袖个性而言，毛泽东无论如何不可能长期寄人篱下，他所承受的屈辱和压抑总有一天要爆发。所以，中苏同盟在建立的时候就埋下了分裂的隐患。

发表于《近代史研究》2010 年第 6 期

附录

关于建国前夕苏联对华经济援助的部分俄国档案文献

新中国成立以前，中共与苏联的经济关系主要体现在苏联对中共在东北及部分华北地区政权的经济技术援助，以及双方在涉及中长铁路产权和开发东北资源方面的矛盾。大体说来，一方面，这种经济关系是单向性的，是援助方与受援方的关系，另一方面，也隐含着一种可能导致双方利害冲突的摩擦，而这正是新的中苏同盟条约必须予以解决的核心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中共与苏联的经济关系即是建国初期乃至50年代中苏经济关系的缩影，同时也构成了中苏之间军事和政治同盟的经济基础。

这里刊出的是关于新中国建立前夕苏联向中共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的部分俄国档案文献。

文件 01

科马罗夫关于科瓦廖夫到中长铁路出差给莫洛托夫的报告

（1948年9月10日）

莫洛托夫同志：

遵照苏联部长会议1948年5月17日的命令（№5970），派И. В. 科瓦廖夫[①]同志为苏联交通部的全权代表到中长铁路出差，帮助落实有关恢复中长铁路运行和抽当地干部成立恢复运行组织的措施。

① 科瓦廖夫，伊万·弗位基米罗维奇（1901–1993），时任苏联交通部副部长，1949年作为苏共中央驻中共中央代表留在北平。

该命令草案是И. В. 科瓦廖夫同志起草的，于今年5月13日送交卡冈诺维奇同志，并于当天在苏联部长会议常务委员会上讨论通过。

命令草案于5月15日送斯大林同志签字。

交通部小组组长 X. M. 科马罗夫

1948年9月10日

文件 02

马里宁关于林彪请求援助给莫洛托夫的报告

（1948年9月12日）

莫斯科

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同志：

为证实我今年9月10日的№300电报，现将林彪请求我们派专家援助中国人恢复满洲工业和交通的来信原件和这一文件的俄文译文随信寄给您。

附件：上述文件和材料。

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馆总领事马里宁

1948年9月12日

附件：

林彪的电报

（1948年9月10日哈尔滨总领事馆接受）

斯大林同志：

我们高兴地告诉您，经过两年作战，在中国东北，我们已经解放4200万人口。敌人被迫缩小自己的地盘，把力量集中在长春、奉天、锦州和其他一些大城市里，这些城市已被我军包围，处于彼此隔绝之中。

我们相信，我们即将取得全部胜利，我们在解放区已经着手建设新生活：已经实行了土改，正在恢复铁路交通和工业生产。

在过去两年时间里，我们花了很大力气，恢复了几座林业、纺织、造纸和食品工业工厂，恢复了许多煤矿，采金企业也开始工作。

我们衷心感谢您在恢复遭受破坏的中国东北铁路的事业中所给予的大力援助。所派来的以科瓦廖夫同志为首的苏联铁路专家组帮助组建了恢复工作管理局和专门的铁道兵兵团。首批部队组建工作业已结束，部队正着手恢复被毁的铁路、桥梁，同时还进行专业训练。

在您派来的专家的领导下，我们对重要的遭毁坏的铁路线段进行了详细的技术勘查，确定了遭受毁坏的程度和修复的工作量，还确定了所需建材、设备和劳力数量。重点要修复的重要的被毁线路总长 1800 公里。

仅修复东北主要铁路线段就需近 1800 公里钢轨，250 万根枕木，3500 吨道钉，1000 吨电话线，3000 吨修复桥梁用钢筋，以及其他技术物资和通信仪器，信号装置，给水装置，机车—车厢库。

仅边疆区铁路所需金属总量就近 20 万吨。为完成 1948 年的修复任务，所需钢轨我们打算通过拆卸不重要的路段钢轨来弥补。道钉完全没有保障。今年所需 2500 吨，我们手中仅有 100 吨，而且我们没有组织生产。枕木和木材我们发动地方上准备。

我们深感金属、设备、复杂的交通仪表和工业仪表短缺。

所恢复的工业企业由于缺少训练有素的干部、专门设备和材料，生产能力很低，现在只能部分保障战争和居民所需。

黑色和有色冶金、炼钢、化工、机械制造和其他重要的工业部门，由于没有当地专家和设备，至今仍未恢复。

为了保障日益增长的前线、铁路交通以及居民所需，我们必须恢复和使用作为我们经济基础的集中在通化、鞍山的冶金和炼钢工业企业，安东和吉林的有色金属和化工企业。

建在松花江上的最大的吉林水电站竣工后将能够保障广泛利用其电能。

在哈尔滨市，在保存下来的原日本机车制造厂主厂房的基础上，可以迅速组织生产现在恢复交通和恢复工业所需要的工具和设备。

解决这些最重要的任务，我们至少要花两年时间。为此需要制定相应的东北国民经济恢复计划。

为了这一伟大的工作，我们缺少有经验的干部。

我们请求您派一批专家来，全面研究我们的经济并与我们共同制定统一的主要工业部门的恢复和使用计划。

为了尽快培养自己的专家干部，我们请您同意大大扩大现有的中长铁路工业学

院，并在您的帮助下扩大教师队伍。

我们为了完成上述任务，至少需要100名以上各部门专家：

1. 计划专家和整个国民经济专家10人；
2. 黑色有色冶金专家15人；
3. 煤液体燃料加工，硫酸盐、盐酸和硝酸制造专家6人；
4. 采矿工业，其中包括煤炭加工专家10人；
5. 火炮、炮弹和子弹制造专家6人；
6. 森林采伐和木材加工专家6人；
7. 纺织专家5人；
8. 采金专家4人；
9. 水泥专家4人；
10. 造纸专家4人；
11. 混凝土大坝建筑和水电站设备专家8人；
12. 财政专家4人；
13. 军事铁路学校教员6人；
14. 以校长为首的工业学院教授讲师12人。

我们再次对您表示衷心感谢，感谢您帮助解放了中国东北人民。

致以布尔什维克敬礼！

林彪

1948年9月8日

文件 03

梅尼希科夫关于中国借款给莫洛托夫的报告

（1948年9月18日）

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莫洛托夫同志：

马里宁同志从哈尔滨报告（1948年8月25日№28661电报），转达了中国人关于给予他们100万卢布借款，以支付中国儿童在苏学习和中国民主组织代表从苏过境的费用的请求。中国人同意以货物或满洲元偿还为他们提供的款项。

外贸部认为可以满足中国人的要求，即给他们提供100万卢布的借款，并同意

以元偿还为他们提供的款项。在满洲，我们支付交通部和外贸部工作人员的费用以及河运部运输和财政部的费用还需一大笔资金，1948 年共达 500 万卢布左右。

卢布 / 元折算需用苏联国家银行为支付苏联国家机关在哈尔滨的工作人员工资每月所规定的汇率（1948 年 8 月这一汇率是：1246 元 /1 卢布）。

M. 梅尼希科夫

1948 年 9 月 18 日，№2-5/27848

文件 04

莫洛托夫关于林彪请求援助给斯大林的报告

（1948 年 10 月 6 日）

斯大林同志：

林彪从哈尔滨来电，请求向中国东北解放区派不下于 100 人的苏联专家小组，人员包括计划、冶金、大炮、炮弹和子弹制造及其他工业部门，财政，教育等各方面的专家。

10 月 5 日，在 9 人小组上交换意见时承认，不应该向中国东北派这么大数量的专家小组，现在应该着重研究以下几点：

1. 令中央书记处负责准备派 10 名各个部门的苏联专家，具体部门将同林彪协商确定，同时把相应人选方案提交中央政治局批准。

2. 苏联人员不应以顾问的名义，而应以专家的身份派到哈尔滨。

3. 任命一名非常有党政—经济经验的同志为我驻哈尔滨领事，此人应同派往哈尔滨的苏联专家和林彪有联系。

4. 以后往中国东北派苏联专家的问题，应等毛泽东来苏联时同毛商量。

请批示。

B. 莫洛托夫

文件 05

波采罗夫关于林彪来信处理情况给联共（布）中央的报告

（1948年10月17日）

联共（布）中央Л.А.洛基诺夫同志：

兹随此报告给您寄去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馆通过外交邮件寄来的林彪于今年9月8日写给斯大林的信。

信的全文已由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馆总领事马里宁同志以№30433密码电报于今年9月10日传来。

对林彪信的预先答复已由莫洛托夫同志征得斯大林同志同意，于今年10月16日以电报（№20696）发往哈尔滨。

附件：1）林彪信的中文原文；2）林彪信的俄文译文。

部长高级助理B.波采罗夫

文件 06

佐林关于为南满铁路提供技术援助给莫洛托夫的报告

（1948年11月18日）

莫洛托夫同志：

据苏联交通部副部长马尔盖维奇同志报告，东北政权向中长铁路局长茹拉夫廖夫同志提出请求，请求把已经解放的中长铁路南段（石河—辽阳）的机车和车皮送大连的机车车辆厂修理，同时再拨20节[①]旅客车厢，拨10套给水机组给民主政权，以便恢复东北南部铁路的给水系统。

苏联交通部认为，为解放区铁路提供技术援助是完全可能的，无损于中长铁路大连段的工作，而且对于未来共同制定瓦房店和阳台煤矿方案也是必要的，关于此事，现在正根据苏联部长会议1948年7月21日的命令（№9868PC）同东北民主政权谈判。

① 原文如此。参照本文09号文件，此处似为200节之笔误。

客运车厢的交接条件和使用费用支付程序，以及货运车皮和机车（火车头）的交接条件和修理费支付程序可通过中长铁路大连路段段长和辽阳路段段长协商确定。

我认为，可以满足满洲民主政权的这一请求。

请您指示。

B. 佐林[①]

文件 07

葛罗米柯关于派专家帮助东北铁路恢复运行给莫洛托夫的报告

（1948 年 11 月 23 日）

莫洛托夫同志：

满洲民主政权请求向满洲派 200 名苏联铁路员工实际帮助组织铁路运营工作。

科瓦廖夫同志和中长铁路局长茹拉夫廖夫同志支持民主政权的这一请求。苏联交通部同意派上述铁路员工小组。并已把这一问题提交苏联部长会议审批，同时还征求了外交部对于这一问题的意见。

鉴于这种情况，苏联部长会议有关机构起草了苏联部长会议关于向满洲派 200 名苏联铁路员工的命令草案（附后）。

考虑到已经向满洲派出了以科瓦廖夫同志为首的苏联工作人员小组帮助民主政权修复桥梁（现在该小组已结束工作），我们认为，同意派 200 名苏联铁路员工去满洲是适宜的（派出期限一年）。

请您指示。

A. 葛罗米柯[②]

附件：

苏联部长会议关于长春铁路事宜命令（草案）

（1948 年 12 月__日）

莫斯科

---

① 佐林，时任苏联外交部副部长。

② 葛罗米柯，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1909–1989），1949–1952 年任苏联外交部第一副部长。

克里姆林宫

1. 批准中长铁路苏联管理部：

（1）从中长铁路大连段储备中抽 1500 节货运车厢，130 节客运车厢和 50 台机车给满洲民主政权以组织满洲铁路的运营；

（2）在 1949 年 5 月 1 日之前，按照同满洲民主政权签订的协议，在大连机车车辆修理厂利用工厂现有的日本半成品和原材料为满洲铁路建造 1000 节货运车厢；

（3）在大连中长铁路工厂按照协议规定为满洲铁路的机车和车辆进行大修、中修，生产信号和通信仪器，以及道岔设备；

（4）从中长铁路大连使用区派出修复车专家队和必要物资，参加条约区之外的中长铁路段的工作。

2. 批准苏联交通部：

（1）在远东铁路，从战利品和 1946 年从满洲运来的机车和车辆中抽 86 台机车和 1000 节车厢交与满洲铁路北段；

（2）另外派 170 名苏联铁路技术人员交中长铁路局长茹科夫同志指挥，帮助组织中长铁路南段的运营，时间为一年，并按照苏联部长会议 1948 年 5 月 17 日的命令（№5970-pc）和 1948 年 12 月 13 日命令（№18-593pc）之规定，给予他们所有权利和优惠。

3. 第 2 项所指人员出差的全部费用（苏联货币）500 万卢布，根据苏联部长会议 1948 年 9 月 3 日的命令（№12717）之规定，在中长铁路运营收入中报销。

4. 责成中长铁路局长茹拉夫廖夫同志保证沿满洲铁路向大连运送所有物资。条约区铁路和其他满洲铁路之间车辆交换在石河站进行。

5. 允许苏联外贸部、武装力量部和交通部沿满洲铁路往大连运送或从大连运出自己的货物。

文件 08

科瓦廖夫关于东北民主政权所赠物品给莫洛托夫的报告

（1948 年 12 月 10 日）

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

莫洛托夫同志：

我报告：中共中央东北局和部队指挥部为感谢在建立铁道兵部队、恢复铁路组织和修复铁路工作中所给予他们的援助，决定授予所有苏联专家每人一枚优秀奖章，此外还决定给我一部战利品汽车和两个花瓶。我对林彪、高岗和其他同志表示了感谢，但谢绝接受优秀奖章、汽车和花瓶。但我离开哈尔滨的这天，组织委员会主席李富春同志把装有花瓶的箱子带到了车厢里。我说不该这么做，他回答说："我是受中央局的委托把花瓶送与您，如不接受，我们认为是瞧不起我们。"请您指示，我应该把花瓶交给谁。

И. 科瓦廖夫

莫洛托夫批示：可以把花瓶留给自己。

文件 09

苏联交通部和外交部关于援助恢复满洲交通给莫洛托夫的报告

（1948 年 12 月 16 日）

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莫洛托夫同志：

中长铁路局长茹拉夫廖夫同志和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马里宁同志报告，满洲民主政权请求把大连铁路枢纽车站上所停放的中长铁路备用车辆（100 台机车、3000 节货车车厢和 200 节客车车厢）交给满洲铁路，同时把解放地区线路上的车辆和其他铁路设备送到大连中长铁路机车修理厂、道岔和信号装置厂修复。

此外，民主政权请求帮助整顿临时恢复的中长铁路南段（奉天—瓦房店）的运行——那里存放着大批被毁的通信器材、信号装置、给水设备和车站设备，为此需把修好的列车、抢修车、中长铁路仓库的物资从大连运来，同时还要派铁路专家来。

茹拉夫廖夫和马里宁同志支持中国人的上述要求，请求满足这一要求，同时请求再额外给满洲派 170 名苏联铁路专家和员工，帮助组织中长铁路南段的运营（长春—奉天—石河—条约区边界）。

现在大连枢纽有已经修理好和准备使用的货车车厢 2540 节，客车车厢 342 节，机车 114 台。它们是 1946 年春天从战区疏散到大连的。

万一恢复铁路段，那里还有修复好的火车，配有专家人员的抢修车。在大连中

长铁路仓库里有恢复通信、供水和其他铁路运行目标所需材料和设备。

考虑到在大连枢纽必须保持备用车辆以保障辽东半岛苏联部队的要求，可以把50台机车、1500节货车车厢和130节客车车厢交给满洲铁路北段。

这一措施不能满足对北满铁路车辆的总的需求，因为人民革命军正加紧在满洲南北调动，铁路上无车皮可利用。所以，往苏联运送粮食、煤炭、木材和其他货物（为此已占用956节车皮），没有充分的车皮保障。

从哈尔滨向大连运送货物，要想恢直通列车，还需增加车辆。

保障满洲铁路车辆的补充来源，除从大连中长铁路备用车辆拿出一部分外，还可：

在大连机车车辆修理厂制造1000节新车皮，办法是利用大连保存的日本人留下的半成品车厢。为此所需木材可由满洲北部提供；

把1946年从满洲疏散到苏联境内的日本车皮运回满洲。现在在远东铁路上，没有使用的日本车辆有：机车66台，货车车厢842节，客车车厢112节，此外还有20台德国机车。所有这些车辆都需要修理，可在哈尔滨进行，由民主政权出资。

运回这些车辆对远东铁路没有损失，因为把它们改成宽轨要花大笔资金和大批材料。以前改造过的机车仅作为机动机车使用，而车厢作为地方交通的专用车使用。由于没有备件，修理它们非常困难。

因此，我们认为宜于采取以下措施：

1. 从大连储备的中长铁路的车辆中抽1500节货运车厢，30台机车，130节客运车厢给满洲民主政权；利用日本留在大连的车辆半成品在大连机车车辆修理厂为满洲铁路建造1000节货运车厢。

此外，从远东铁路战利品中，抽86台机车和1000节车厢交给满洲民主政权；

2. 批准中长铁路苏联管理部：

（1）从远东区派出修理系专列到条约区界限以外的中长路段进行修复工作；

（2）在大连中长路工厂为满洲铁路修复车辆和生产设备；

（3）在石河站（条约区边界）同满洲铁路交换车辆；

（4）给满洲再派170名铁路员工。

附件：苏联部长会议命令草案。

请您同意。

Б. 贝舍夫[1]、А. 葛罗米柯

---

① 贝舍夫，时任苏联交通部部长。

文件 10

科瓦廖夫关于满洲铁路修复情况给斯大林的报告

（1948 年 12 月 16 日）

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斯大林同志：

兹报告：遵照您 1948 年 5 月 17 日的指示，派往满洲的苏联铁路专家小组组织并亲自领导了最重要的铁路线修复工作，其中包括吉林—长春，哈尔滨—长春，四平街—通辽—义县—锦州，梅河口—奉天—鞍山，锦州—山海关路段。

这一时期，共修复大、中型桥梁 62 座，其中中满的大型桥梁都进行了大修：哈尔滨至长春方向，松花江上桥梁 970 米，饮马河上桥梁 320 米，伊通河上桥梁 200 米；吉林至长春方向，吉林市附近松花江上桥梁 420 米，饮马河上桥梁 190 米。

上述铁路线的及时修复保障了人民解放军的迅速调动，首先是长春市重兵集结，然后是义县和锦州城下集结。

这些城市里的被围之敌——国民党军被歼之后，人民解放军部队又沿新恢复的铁路线调至新立屯—奉天和梅河口镇，这有力地促进了全歼满洲国民党军。

由于铁路的修复，从今年 11 月 25 日起，奥特波尔—绥芬河—旅顺之间有了直达火车。

满洲铁路的顺利修复是实施大规模组织措施的结果，这些措施是苏联专家制定经中共中央东北局批准的。

根据这些决定建立了：

1）交通部恢复工作管理局和管理局修复处。

2）铁道兵团，人员 3 万人，下编 4 个旅，12 个专业营和 6 个独立连，它们装备有相应的机械设备和工具，这些设备和工具是从满洲就地找到的，部分是从苏联运来的。

在工作过程中教会了铁道兵道路修复方法。

3）修复工作供给机关和保障基地（负责枕木、木材、金属结构、道路固定件和小工具的供应）。

4）哈尔滨机车修理厂专门桥梁基地（负责修理和制作金属桥梁构件和专门桥梁设备）。

桥梁基地在两个月的时间里按照苏联专家的设计建造了大型的80吨的悬臂吊车。所造吊车保障了许多大型桥梁的迅速恢复。

在哈尔滨修建了专门的军事仓库，为铁道兵修理和制作工具和设备。

除帮助修复铁路外，应毛泽东同志和中共中央东北局的请求，我们拟定了交通部、铁路管理局和线段机关的结构和编成，该结构和编成得到了中共中央东北局的批准并已实施。

还对满洲公路、大路和水陆交通状况进行了调查，并拟定了中共中央东北局修复和整顿这些交通的决定草案。

由于当地居民大批盗窃铁路物资，我们拟定并由中共中央东北局和部队指挥部颁发了制止盗窃和回收被盗物资的决定。

根据中央局的请求，我对以下问题提出了许多咨询意见：工业恢复和利用，制定财政计划，征收流通税，对酒类实行国家专营，国家和合作社之间实行非现金结算，不动产义务保险等。

但是，由于缺少应有的专家，在制定国民经济计划和财政计划上我们未能给予全面帮助。

由于消灭了国民党部队和全部解放了满洲，人民民主政府提出了迅速恢复东北工业和交通，把东北变成中国反对国民党的军事经济基地的任务。

因此，毛泽东同志，中共中央东北局林彪、高岗和陈云同志要求报告您，他们急需以下几方面的援助：

1. 派各种工业专家和财政计划专家来。

2. 修复满洲以外的铁路，首先是山海关—天津、天津—北平，天津—济南，济南—徐州段铁路。恢复满洲境内的给水系统，抽水设施和车站。

3. 恢复奉天和满洲境内其他军工厂并组织生产。

尽快恢复抚顺煤矿、鞍山和本溪钢铁厂的生产，建成吉林大型水电站并开始供电，奉天、长春和哈尔滨地区的工厂都将用水电站的电。

4. 在哈尔滨、长春、奉天和吉林建立学院、中等技术学校和军事学校，培养中国干部。

5. 派部队组织和训练顾问，部队后勤建设顾问。

东北局特别要求要强调指出，急需派专家来以取代一大批在满洲许多极重要企业里工作的反民主和进行间谍工作的日本、英国和其他国家的专家。

按照我们的意见，为保障中国同志提出的要求，至少给中国派500名计划专

家、工程师和各种其他工业专家来。

其中，燃料和电力工业 40 人；冶金和化学工业 30 人；机械制造和金属加工 35 人；林业和造纸 20 人；建筑材料 20 人；军事工业 35 人；轻纺工业 20 人；食品工业 20 人；地方工业和手工业 8 人；农业 15 人；交通（铁路、水运、航空、通信）116 人。

国民教育 13 人；卫生保健 55 人；财政 20 人；贸易 20 人（内贸和外贸）；预算 6 人；会计 10 人。

专业技术学校和学院教师 50 人。

上述专家将有可能利用当地资料保障一些工厂的运转，待了解了全部情况后，再帮助制定企业全部恢复和生产计划。

如果您决定满足中国同志的要求，我认为必须在苏联部长会议下成立特别组或委员会。委托该组：

1. 研究同帮助民主中国恢复和发展工业和交通有关的问题；制订统一的苏联有关机关和部门的实际措施计划，为苏联部长会议准备相应的提案。

2. 研究经济，原料来源；研究设备、材料和信贷需求。

3. 领导苏联专家的工作，帮助组织培训地方干部。

委托该小组研究同保障中苏中长铁路公司活动有关的问题。

И. 科瓦廖夫

文件 11

葛罗米柯关于林彪请求技术援助等事项给莫洛托夫的报告

（1948 年 12 月 17 日）

莫洛托夫同志：

1. 林彪在今年 9 月 10 日给斯大林同志的信中，请求往满洲派 100 名苏联专家，其中包括国民经济计划专家和其他工业部门专家，以及工业学院和军事铁路学校的教授和讲师。

我认为，对于满洲民主政权的这一要求应当给予某种程度的满足。但这一申请还不详细，有许多地方还不清楚到底需要哪些专家，我认为必须征求林彪的意见，订正上述申请，然后才好决定，在多大程度上满足中国人的这一请求。

2. 根据中长铁路局长茹拉夫廖夫同志和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馆总领事马里宁同志的报告，满洲民主政权在今年11月底，请求使用大连储备的中长铁路的车辆和设备以恢复中长铁路奉天—瓦房店段，使奉天—大连段通火车，同时还要求向大连中长铁路机车车辆修理厂、信号厂和道岔厂订货。茹拉夫廖夫同志和马里宁同志支持上述请求，因此，他们认为应再向满洲派去170名苏联铁路专家。关于这个问题，我和贝舍夫同志联名打了报告，并附上了苏联部长会议决定草案。

3. 高岗在今年10月11日给斯大林同志的信中，要求给满洲民主政权额外提供铁路设备和物资。

莫斯科于11月中旬收到这一申请并送交斯大林同志秘书处。

我认为妥善的办法是：外贸部和交通部共同研究这一申请并提出自己的意见。外交部不知道这两个部的意见，很难对这一问题提出什么意见。

4. 高岗在今年10月16日给斯大林的信中，要求为满洲纺织工业提供2万吨棉花。

根据米高扬同志的指示，这一申请已纳入对满洲的出口计划，该计划将由对外贸易部提交苏联部长会议批准。

5. 高岗于12月9日拜访了当时在奉天的雷斯科夫同志，请求保障鸭绿江上的电站（以前已交给朝鲜人）也为满洲所用。我认为，中国人的这一要求应该给予重视。但中国人应该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提出这方面的建议。什特科夫[①]同志同意这一意见。

6. 除本报告中所列举的中国民主政权的请求，还有通过科瓦廖夫同志转述的其他请求。科瓦廖夫同志在12月16日寄给您的专门报告中陈述了这些要求。

我认为应该委托贝舍夫、科瓦廖夫同志和我把中国人的请求整理成一个文件，拟定中央对这些请求的决定草案，然后送您审阅。这一工作可在2—3天时间里完成。

可以把本报告中第2条陈述的中国人的请求单列出，并拿出相应的方案提交批准，无须等其他问题的材料和决定草案拟定出来。

请您指示。

葛罗米柯（签字）

① 什特科夫，时任苏联驻朝鲜大使。

文件 12

葛罗米柯关于中共拟嘉奖科瓦廖夫等苏联专家给莫洛托夫的报告

（1948 年 12 月 18 日）

莫洛托夫同志：

中共中央东北局致信斯大林同志，说鉴于科瓦廖夫同志和中长铁路局长茹拉夫廖夫同志在建立铁道兵、修复满洲铁路和部队调动工作中所做大量工作，人民解放军指挥部打算赠送科瓦廖夫和茹拉夫廖夫两同志每人一部战利品汽车。中央局请求斯大林同志同意授予这两位同志汽车。

随信附有中共中央东北局的决定，其中高度评价了以科瓦廖夫同志为首的苏联专家组和以中长铁路局长茹拉夫廖夫同志为首的苏联铁路员工在满洲所做的工作。

我认为，应委托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馆总领事马里宁同志通过高岗通知中国人，苏联政府知悉中共中央东北局高度评价苏联专家组在满洲所做的工作。

至于打算赠予科瓦廖夫同志和茹拉夫廖夫同志汽车，最好是将汽车留给满洲民主政权使用，那里十分缺乏车辆，并把此事通知高岗。

附件：给中央信的草案。

葛罗米柯

文件 13

科瓦廖夫关于苏联专家在满洲延期工作给莫洛托夫的报告

（1948 年 12 月 20 日）

莫洛托夫同志：

根据苏联部长会议今年 11 月 1 日的决定（№16107），在满洲留下一个苏联专家小组——21 人，其期限到 1949 年 1 月 1 日。

整个专家小组都集中精力恢复满洲至华北的前线路段，撤走专家小组会给恢复工作带来不利影响。

请同意把专家小组在满洲的停留期限延长到 1949 年 3 月。

И. 科瓦廖夫，№308/1-с

文件 14

莫洛托夫关于中共拟嘉奖科瓦廖夫等苏联专家给斯大林的报告

（1948 年 12 月 25 日）

斯大林同志：

中国共产党中央东北局给您写信通知，鉴于科瓦廖夫同志和中长铁路局长茹拉夫廖夫同志在组建铁道兵部队、恢复满洲铁路运行和完成部队调运中所做的大量工作，人民解放军指挥部打算赠予他二人每人一辆战利品汽车。信中请求您同意赠与科瓦廖夫和茹拉夫廖夫上述汽车。

随信还附有中共中央东北局决议，其中对以科瓦廖夫为首的苏联专家组和以中长铁路局长茹拉夫廖夫为首的苏联铁路员工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

我认为应委托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馆负责人马里宁同志通过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高岗告诉中国人以下几点：

1. 苏联政府已知悉中共中央东北局对苏联专家组在满洲的工作给予高度评价；

2. 由于民主政权现在交通工具十分缺乏，科瓦廖夫同志和茹拉夫廖夫同志请求把所说的汽车留给满洲民主政权使用。

B. 莫洛托夫

文件 15

莫洛托夫关于苏联专家组延期在华工作给斯大林的报告

（1948 年 12 月 25 日）

斯大林同志：

按照苏联部长会议 1948 年 11 月 1 日命令（№16107pc），被派往援助中国民主政权恢复中长铁路路段进行的苏联专家小组一行 21 人（从科瓦廖夫同志小组抽的人），在满洲将停留到 1949 年 1 月 1 日之前。

由于中长铁路长春—奉天段修复尚未竣工，加之毛泽东同志多次请求科瓦廖夫同志帮助修复华北铁路，我认为苏联专家小组（21 人）在满洲的停留期限必须延

长到1949年4月1日。

随报告附苏联部长会议命令草案。

请审阅。

科瓦廖夫同志支持这一方案。

莫洛托夫

附件：

苏联部长会议命令（草案）№

（1948年12月__日）

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兹对苏联部长会议1948年11月1日命令（№16107pc）做出补充：允许苏联交通部把援助恢复满洲铁路运行的苏联专家小组（21人）在满时间延长到1949年4月1日。

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斯大林

文件 16

斯拉德科夫斯基关于中长铁路等事宜给米高扬的报告

（1948年12月31日）

阿·伊·米高扬[①]同志：

现就卡尔金和宪科夫二同志给马林科夫同志关于中长铁路和满洲苏中合资企业问题的信谈谈我的意见和看法。

一、为中长铁路培训干部问题

我们认为，卡尔金和宪科夫二同志提出的关于在运输学院、一些运输学校和东方学院培训铁路干部的问题值得重视。不仅为中长铁路培训东方学干部的情况令人不满意，而且为其他部门和团体培训东方学干部的情况也令人不满意。

似应：

---

① 米高扬，阿纳斯塔斯·伊凡诺维奇（1895–1978），时任苏联对外贸易部部长。

1. 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工学院、哈巴罗夫斯克学院以及中央的几所高等工业学校中设置研究中国和朝鲜政治经济的课程，采用研究这些国家语言的简明教学大纲。

2. 扩大莫斯科市东方学院的远东各系（首先扩大中国系和朝鲜系）。还宜恢复（1932—1933 年关闭的）最近几年以国立远东大学东方系形式存在的符拉迪沃斯托克市东方学研究所。

我们认为，苏联远东地区的青年比苏联中部地区的青年更乐意进东方学高等院校，况且远东的地理位置本身也有利于苏联远东地区的大学生研究远东各邻国。

3. 责成远东地区各党组织和苏维埃组织向中部地区的党和苏维埃组织学习，向远东地区临时外派的工作人员作指示，向他们布置任务。

二、在满洲工作的干部的物质生活状况

由于通货膨胀，国产商品匮乏和进口商品很少，我们在满洲的工作人员物质生活很困难。

似应：

1. 为在满洲的苏联工作人员制订硬通货工资（美元）（此条同样适用于在朝鲜和日本的工作人员），并按美元汇率用当地货币支付工资。

2. 按工作人员在苏联的原职务，向他们留在国内的家属支付全额的苏联工资。

3. 为在远东国家工作的人员规定按百分比增加的工龄津贴，每满一年增加 20—25%。

4. 不仅发放东方语津贴（20%），还应发放所在国知识津贴（通过专门的所在国经济、政治、历史和文化知识大纲考试）。

5. 铁路部门或领事馆为在满洲出差的苏联工作人员办学校。

三、中长铁路的法律问题

在卡尔金和宪科夫二位同志列举的最迫切的法律问题中，没有提到以下几个基本的法律问题：1. 如何看待苏联铁路管理机构在中长铁路的存在；2. 我们继续不参加铁路的管理和经营是否妥当。

由于中长铁路理事会和中长铁路管理局的官方（国民党）代表逃离满洲，铁路局只剩苏联一方。苏方绝大部分铁路员工回国，致使苏方实际上已停止参与铁路的管理。铁路现在完全由中方民主政府管理（东北铁路局）。

我们不参与铁路管理的后果是，中国人独自经营“苏联和中华民国的共同财产”（1945 年 8 月 14 日条约语），更不用说我们从铁路运营中（边境站至哈尔滨段和哈尔滨至满洲里段自 1947 年 3 月 1 日起正常运营）得不到任何好处了。我们认

为，继续推迟参与铁路管理可能导致的后果是，将来中国人（甚至包括民主政府的人）会认为自己有了本事，会反对我们参与管理。有鉴于此，尽快解决我们实际参与铁路管理的问题较为妥当，况且中长铁路全线现在已经解放。

四、中长铁路的出赁地问题

我们认为，卡尔金和宪科夫二同志提出的关于恢复俄罗斯林业主沃龙佐夫一家和斯基捷尔斯基一家租赁的林场和煤矿中原属中长铁路的股份权问题，对我们有很大的利益。

若以中长铁路的名义提出该问题为时过早，那么，应由某个苏联组织或者秋林公司获得上述原俄罗斯林业主的权利。

五、大连港的地位问题

苏中 1945 年 8 月 14 日的大连港协定明确规定了该港口的地位。由于不明确其在中长铁路中的地位，发生了某些违背该协定的情况（港口管理者未经中长铁路领导人任命，等等）。

六、“其他问题”

卡尔金和宪科夫二同志在信的“其他问题”一节中指出，对我们从满洲获得的档案和经济资料没有进行任何研究工作。

对此还可补充说，我们还没有从事满洲问题的专门科研机构。

应在大连港和哈尔滨建立由 15—20 名科学工作者组成的经济处，责成他们搜集和汇总经济资料，并将资料分类，以“满洲工作参考通报”的形式出版。

七、对在满洲的苏联企业和合营企业工作实行统一领导的问题

卡尔金和宪科夫二同志建议成立一个委员会，为政府起草与中长铁路以及在满洲的苏联企业和合营企业活动有关的决定，我们认为这一建议是正确的。

我们还认为，关于在国外资金、产业和物资管理总局内设置领导中长铁路工作的专门机构这一建议是正确的。不过，最好是在国外资金、产业和物资管理总局内成立领导东方所有苏联企业和合营企业的东方局，在东方局下设铁路处。

米·斯拉德科夫斯基[1]

① 斯拉德科夫斯基，时任苏联对外贸易部副部长。

文件 17

科瓦廖夫关于1949年帮助满洲恢复经济给斯大林的报告

（1949年1月5日）

斯大林同志：

满洲民主政权请求审阅他们制定的1949年恢复和发展满洲经济的预定计划，并请求帮助完成这一计划，提供专家、设备和物资方面的支持。

根据满洲政权计算，为制定彻底的恢复和发展满洲经济和组织生产的计划，至少需要500名苏联专家，其中：军事工业35人，燃料能源40人，冶金和化学30人，机械制造和金属加工35人，铁路和通信116人，造纸和林业20人，建材业20人，轻纺20人，食品20人，地方手工业6人，农业15人，国民教育（包括教授和学院、学校教师）65人，卫生保健55名医生，财政信贷20人，外贸和国内贸易20人，综合处和预算平衡6人，统计和会计10人。

对设备和材料大体需求如下：

军事工业。

为完成1949年各种武器装备和弹药的生产计划，必须建立山炮和野炮制造厂并保障其设备，生产能力需达到日产炮引10斤；必须提供爆炸物TNT3000吨，火药200吨，铜3600吨，特别金属1万吨，自动车床150台，炮身钢管300吨，钨100吨，钼50吨，钡700吨，电线2500米，电缆线5万米，皮线10万米，超强度线4万米和其他物资。

此外，中国同志要求满足他们1948年1月所提出的军事工业所需各种仪器和材料的要求。

冶金工业。

根据满洲民主政权提出的计划，1949年要恢复和利用42个矿山冶金企业（其中7个是铜工业企业）。首先恢复鞍山和本溪的冶金企业，到1950年生产能力要达到年产40万吨钢，12000吨纯铜。

为了完成这一明显提高的计划需要大量的设备和材料，其中需把拆除运往苏联的鞍山钢厂的第一、第二车间，大型轧钢车间和小型轧板车间运回来，而且还需运来专门材料：炸药900吨，铝100吨，工具钢300吨，润滑油500吨，绝缘线2万米，橡胶管2万米，传送带（皮的和帆布的）6万米，滚球轴承200根，钢锯5000

米，电线6000米及其他。

煤炭工业。

民主政权计划1949年恢复22座矿井，采煤10万吨，炼焦10万吨。

为了这一目的需提供某些设备和器材：电力泵60台，涂橡胶皮带46000米，电力车23台，滚球轴承60000根，钻机用的各种型号的钢管51000米，3立方米挖土机等。

交通运输。

计划1949年完成主要铁路线的修复工作，其中包括部分中长铁路，长春—四平街—奉天和义县—承德—北平线。此外，按照毛泽东同志的要求，还制定了修复中国内地铁路的计划，其中包括：山海关—北平—天津—济南—徐州，徐州—南京—上海，北平—开封—汉口，北平—张家口—太原—西安。共长90.5万公里。完成这一计划需要：

1. 另外建立3个铁道兵旅，铁道兵总人数将达到90.5万人。

我们准备了3万铁道兵部队。人民解放军指挥部又拨给了1万人，用这些人成立了两个铁道兵旅。余下的1万人在1949年1—2月间将派往铁道兵部队。

2. 为帮助领导中国东北和内地铁路修复工作和训练新编铁道兵部队，需派100多铁路修复专家来。

3. 按照中国同志提出的申请提供设备和物资。在摸清内地钢轨形势之前暂不提供钢轨。申请中所列其他物资，必须在1—2季度提供。

电力工业。

为满足1949年满洲工业需求，需要50万千瓦电力。现在满洲电站发电能力近30万千瓦。

民主政权首先要求帮助恢复吉林水电站。为此需派20名苏联工程师来，把拆下来运往苏联的两个涡轮机组（共发电能力15万千瓦）、发电机、18个不同容量的变压器、导线、灯、蓄电池等运回来。

对林业、造纸、纺织、轻工业、农业来说，也提出了类似的设备和物资申请。

由于计划和申请是中国同志拟定的，没有吸收专家（铁路运输除外）参加，也没对工业的真正情况进行调查，我认为，最好暂时不要讨论他们的计划和申请，先派一个苏联专家组来满洲调查军事、冶金、煤炭、电力、机械制造、化工和其他工业部门的情况，责成该小组到满洲后用一个月的时间向苏联部长会议提出方案。

联共（布）中央关于这一问题的决定草案附后。

至于对铁路设备和材料的申请，除钢轨一项需要核实外，这一申请是现实的，所以我认为应该给予讨论和满足。

И. 科瓦廖夫

附件 1：

联共（布）中央关于援助满洲恢复工业的决定

1. 任命____同志为苏联部长会议全权代表，负责援助中国民主政权恢复工业和铁路运输并组织工业生产等项有关事宜。

任命以下同志为苏联部长会议副全权代表：

____为冶金工业副全权代表；

____为军事工业副全权代表；

____为燃料工业副全权代表；

____为电力工业副全权代表；

____为机械制造和金属加工副全权代表；

____为造纸和森林工业副全权代表；

____为交通副全权代表。

2. 责成部长会议全权代表到位后在一个月的时间里对冶金、军事、煤炭、电力、机械制造和化学等工业部门的情况进行调查，为苏联部长会议提出有关恢复和组织生产的紧急措施方案。

3. 委托 Г. М. 马林科夫同志在两周时间里审阅部长会议副全权代表（按第一条任命）科瓦廖夫同志关于 100 名苏联专家小组（按照所附名单）的提案。该小组将被派往满洲，归苏联部长会议全权代表调遣，执行第二条所列任务。

4. 出差人员在华全部时间工资及其家属薪水支付按部长会议 1948 年 5 月 17 日命令（№5970рс），1948 年 10 月 20 日命令（№15188рс）和 1948 年 8 月 31 日命令（№12-138рс）办理。

5. 援助满洲恢复工业和铁路运输的措施通过中长铁路管理局实施。

附件2：

由部长会议全权代表调遣的派往满洲的苏联专家名单（日期）

1.冶金专家12人，其中：生产计划专家2人，高炉专家2人，炼焦专家2人，采矿专家2人，轧钢专家2人，铸铁专家1人，鼓风机械师1名（以上凡所指2人处，其中有1名技术专家，1名机械师）。

2.煤炭专家6人，其中：生产计划专家2人，露天采矿专家2人，矿井采矿专家2人。

3.电机专家4人，生产计划专家2人，水电站专家2人，火电站专家1人。

4.武器装备和弹药专家12人，[①]其中：生产计划专家2人，炮专家2人，炮弹专家1人，引信和雷管专家2人，装备专家1人，火药专家2人，火药纤维素专家1人，炸药专家1人，子弹专家2人。

5.机械制造专家5人，编制生产计划专家2人，设备专家3人。

采矿和精炼专家3人，耐火材料专家1人，校准专家1人，厂内运输专家2人。

有色冶金共8名专家，生产计划专家1人，采矿专家2人，冶铜专家2人，轧材专家1人，铅专家2人。

森林造纸业专家4人，其中生产计划专家2人。

交通运输专家12人（铁路、水路和公路运输），其中：计划专家6人（铁路运输计划专家4人，水运计划专家1人，公路运输计划专家1人），水路和公路工程师6人。

轻工业：计划专家2人；食品工业：计划专家1人；财政：2名专家；综合处和预算平衡：专家4人，统计专家6人。

卫生保健医生5人，其中计划1人，内科1人，外科医生1人，鼠疫学家1人。

翻译——精通中文者10人。

技术机构、全权代表和他的副职的工作人员12人，其中：秘书9人，速记员—打字员1人，司机2人。

发表于《党的文献》2002年第1期、第2期

---

① 此处人数疑有误，原文如此。——笔者

关于1950年中苏条约各种文本的部分俄国档案文献

新中国成立之初，经与苏联商定，中共中央决定毛泽东出访苏联，目的是参加斯大林70寿辰的庆祝活动，商谈和签订中苏之间的有关条约和协定，并就双方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1949年12月16日毛泽东到达莫斯科，通过与斯大林及其他苏联领导人的多次商谈，毛泽东终于迫使斯大林同意与中国签订一个新的中苏条约，以取代1945年8月14日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1950年1月20日，周恩来率领庞大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到达莫斯科。经过反复会谈和协商，中苏两国于1950年2月14日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关于贷款的协定》，并通过了关于废除1945年条约和外蒙古独立的《公告》。当时双方确认但未予公布的还有上述两个协定的议定书和条约的《补充协定》。2月17日，毛泽东、周恩来等离开莫斯科回国，留下中国代表团继续与苏联方面谈判贸易协定等其他问题。这次中苏领导人的会谈以及所签订的条约和协定，将中国与苏联的战略同盟关系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这无疑是新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最重大的外交活动。

关于这次外交谈判的情况，直到80年代后期，中国方面才开始公布一些有关的电报、信函，并出版了几部当事人的回忆录，使人们得以对这次中苏谈判的过程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但是，人们仍然无法依据现有的文献和材料，对中苏谈判过程进行具体的和详细的考察。不久前，人们在俄国解密的档案中发现了一批关于这次中苏条约谈判的历史文献，共有80多件，其中包括毛泽东与斯大林的会谈记录，毛泽东、周恩来与苏联其他领导人的会谈和谈判纪要，中苏双方各自拟定的有关条约或协定的最初文本和历次修改稿，以及苏联有关部门和专家呈报的对于条约、协定的建议和意见。这里发表的是经过整理的反映中苏条约产生过程的部分档案文

件。

通过对这些文献的研究和考证，人们可以对中苏外交关系中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有更加真实和准确的把握，而以前对其中有些情况，人们或者不甚清楚，或者以讹传讹。这里列举一二：[1]

毛泽东赴苏访问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签署一个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并且在行前已经通过几种渠道将这一信息传递给苏联领导人，对此，斯大林是完全了解的。斯大林最初希望在形式上保留1945年的条约，而不愿意签订新条约。只是在毛泽东的一再坚持下，斯大林才被迫同意了中国方面的意见。

苏联外交部准备的条约第一稿和第二稿草案明确提出：1945年签订的中长铁路、大连和旅顺口协定继续有效，这就是说，苏联方面同意在形式上签订一个新条约，但实际内容（相关的协定）不得有任何改动。

基于斯大林曾多次讲过苏联军队可以提前撤出旅顺口和大连港，在苏方以后几稿的草案中，确定苏军将于1950年开始撤退，并在对日和约签订后重新审议关于旅顺、大连的议定书。同时，条约的名称定为“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这是1月16日的事，此时中方尚未提出自己的草案，周恩来还在赴苏的路上。

苏方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中长铁路问题上。1月19日，苏联交通部向莫洛托夫提交了协定草案，并做了详细的说明，其核心内容是重申保留1945年协定的有效期，扩大中长铁路的资产组成，对中长铁路及其附属企业免征各种税收。在中苏双方代表谈判的前一天，即1月22日，联共（布）中央批准了这些草案。

对于《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本身，中方没有提出任何原则性的修改意见。但是，1月26日中方提出的由周恩来主持起草的《关于旅顺口、大连和中国长春铁路的协定》，除旅顺撤军问题外，几乎完全推翻了苏方的原有设想，这主要是指：否定苏方关于在签署对日和约后再重新审议有关协定的原则，而是立即一揽子解决重新审议协定的问题；苏联放弃租用旅顺口作为海军基地的权利，放弃在大连和中长铁路的一切权力和利益，同时声明将上述所有权利和义务归还中华人民共和国；目前由苏联临时代管或租用的在大连和旅顺口地区的一切财产，均由中国政府接收；对日和约签订或本协定生效三年后，苏联政府立即将中长铁路及其所属全部财产无偿地移交中国所有。

尽管斯大林最初对中方的草案感到意外和愤怒，但显然是经过慎重的考虑之

① 对于这些档案文献的研究和分析，可见沈志华、冈察洛夫：《〈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愿望和结果——根据俄国解密的档案材料》，《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2期、3期。

后，苏方于 1 月 28 日提交的协定修改稿，除了没提放弃在旅顺、大连和中长铁路的一切权力和利益外，接受了关于旅顺口的条款（不包括移交财产），也接受了大连的行政完全隶属中国管辖、立即由中国政府接收大连（不包括旅顺口）的一切财产的条款。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苏方还接受了在对日和约签订后或不迟于 1952 年末无偿地向中国移交中长铁路的权利及全部财产的条款。

针对苏方提出的议定书补充条款，即苏联军队和军用物资可以沿中长铁路自由调运，其运费按中国军队调运的现行价格计算，中方也提出增加一项条款，即中国的军队和军用物资也可以自由地沿苏联境内的铁路调运。经过反复谈判和争论，中方被迫放弃了自己的建议，而苏方同意以远东出现战争威胁为苏军使用中长铁路的条件。这是关于条约谈判中双方最激烈的一次争论。在讨论有关条约和协定的签字和公布问题时，2 月 10 日，苏方又提出一个关于第三国问题的《补充协定》。会谈中周恩来说，毛泽东同志同意这个协定的草案，只是在文字方面有几处不大的意见。周恩来还说，他和毛泽东商议的意见是，即将在莫斯科签字的所有协定都应公开发表。

当然，只有把中苏双方的有关档案文献放在一起进行对比研究，人们才能更完整、更全面地了解约半个世纪前这次中苏外交谈判的整个过程和详细内容。这也是中外各国学者的共同愿望。

（以下档案文件由张木生翻译，沈志华校对和编注）

文件 01

苏联外交部起草的苏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第一稿）

（1950 年 1 月 5 日）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友好合作互助条约（草案）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为继续发展和巩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固有的友好关系，深信加强苏联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友谊是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的，同时也是促进两国经济发展的最佳方式，深信彼此的合作有益于两国伟大人民和所

有爱好和平的民族的普遍和平与安全，决心在反侵略斗争中互相援助，为此目的，决定缔结本条约，并各派全权代表如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特派苏联外交部部长安德烈·扬努阿里耶维奇·维辛斯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特派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部长周恩来，双方全权代表互相出示全权证书，认为妥善后，同意下述各条：

第一条

缔约国双方保证共同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以期消除侵略者的任何威胁。

为此目的，缔约国双方将以忠诚合作的精神，参加所有旨在确保人民和平和安全的国际活动，并为此崇高任务的实现充分贡献自己的力量。

第二条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保证缔约国一方一旦受到军事进攻时，另一方应给予全面援助，其中包括军事援助。

第三条

缔约国双方均不缔结反对对方的任何同盟，并不参加任何反对对方的集团。

第四条

缔约国双方保证不参加同日本的单独谈判，不经双方互相协商，无论是同现日本政府，还是同在日本建立的、不放弃任何侵略打算的其他一切政府和政权机关，均不缔结和平条约。

第五条

缔约国双方对有关两国共同利益的一切重大国际问题，均将进行彼此协商。

第六条

缔约国双方坚信，苏中人民之间的安全和繁荣要求巩固和发展牢固持久的友谊，双方将依据互相尊重独立和主权，以及不干涉另一国内政的原则加强两国之间的友好合作。

第七条

缔约国双方承认，1945 年 8 月 14 日签订的中长铁路、大连和旅顺口协定继续有效。①

第八条

---

① 苏方设想只修改条约本身，而保留 1945 年签订的关于中长铁路、旅顺口和大连港的协定，所以才特意列出了第七条的内容。以后又陆续把有关中长铁路、旅顺口和大连港的问题排除在条约之外，作为单独协定处理。

本条约应在尽可能短的期限内批准。互换批准书将尽快在北京进行。

本条约一经批准立即生效，有效期为 30 年。如期满前一年缔约国的任何一方未表示愿予废除，则该条约将无限期继续生效。同时，如缔约国的任何一方将终止本条约，应在条约有效期满前一年内通知另一方。

双方全权代表签字确认条约并加盖自己的印章。

1950 年 1 月　日于莫斯科签订，共两份，每份均以中文和俄文书就，两种文字的条文均有同等效力。

文件 02

苏联外交部关于中苏谈判有关文件的定稿

（1950 年 1 月 16 日）

致维·米·莫洛托夫同志[①]

向您呈上与中国的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草案，中国长春铁路议定书和宣言草案，以及条约签字时补充说明的草案。

安·维辛斯基[②]

1950 年 1 月 16 日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草案）[③]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深信加强苏联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睦邻友好关系和友谊是符合苏联和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并确信巩固友好关系将是促进两国经济发展的最佳方式，决心遵循联合国的原则和宗旨全力促进两国人民之间的密切合作以有益于普遍和平与安全，决定缔结本条约，并各派全权代表如下：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特派……，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

---

① 莫洛托夫，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1890–1986），时任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

② 维辛斯基，安德烈·扬努阿里耶维奇（1883–1954），时任苏联外交部部长。

③ 苏方最初拟定的条约名称是“苏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直到此时，即第六稿时，将名称改为“苏中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方对此没有提出异议。

人民政府委员会特派……，双方全权代表互换全权证书，认为妥善并符合程序后，同意下述各条：

第一条

缔约国双方保证共同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以期制止日本或其他直接或间接与日本相勾结的任何国家之重新侵略的威胁。

缔约国双方均重申，他们打算将以最真诚的态度参加所有旨在确保人民和平和安全的国际活动，并为此崇高任务的实现充分贡献自己的力量。

第二条

如果缔约国中的一方，由于日本妄图恢复自己的侵略政策，而被迫与其开展军事行动，或与其他一些在侵略行为上与日本直接或间接相勾结的任何国家进行军事行动，缔约国的另一方应尽自己的全部力量立即给予处于战争状态的一方以军事和其他援助。

第三条

缔约国双方均不缔结反对对方的任何同盟，并不参加反对对方的任何集团以及任何行动和措施。

第四条

缔约国双方保证不参加同日本的谈判，不经双方互相协商，不同日本签订和平条约。

第五条

缔约国双方对有关两国共同利益的一切重大国际问题，均将进行彼此协商。

第六条

缔约国双方声明，双方将遵循互相尊重国家主权、领土完整以及不干涉对方内政的原则，巩固和发展两国之间的经济文化联系，彼此给予一切可能的经济援助。

第七条

缔约国双方同意，目前在旅顺口和大连港的苏联军队自本条约生效之日起 2—3 年期限内全部撤回苏联境内，撤军将于 1950 年开始。

缔约国双方还同意，1945 年 8 月 14 日苏联和中国签订的旅顺口和大连港协定，以及大连港协定议定书在签订对日和约后予以重新审议。[①]

---

① 在米高扬访问西柏坡、刘少奇访问莫斯科以及斯大林与毛泽东第一次会谈时，苏联方面都表示苏军可以立即撤出旅顺海军基地，故条约草案有此改动。联共（布）中央决议通过的条约草案删除了这一条，而将其内容起草了一个专门的协定议定书。

第八条

本条约自批准之时起立即生效，有效期为 30 年。如期满前一年缔约国的任何一方未表示愿予废除，则该条约将无限期继续生效。同时，如缔约国的任何一方将终止本条约，应在条约有效期满前一年内通知另一方。

本条约应在尽可能短的期限内批准。互换批准书将于近日在北京进行。

双方全权代表签字确认条约并加盖自己的印章。

1950 年 1 月　日于莫斯科签订，共两份，每份均以中文和俄文书就，两种文字的条文均有同等效力。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全权代表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全权代表

确认中国长春铁路协定有效的议定书

在签订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时，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名义签字的双方，同意下列事项：

一、完全根据 1945 年 8 月 14 日在莫斯科签订的中国长春铁路协定中指明的期限确认该协定书的有效期。

二、本议定书为两份，每份用中文和俄文书就，自签字之日起生效，并作为上述条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于莫斯科，1950 年　月　日

声　明

在签订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时，为准确确定中国长春铁路的法律地位，协议双方政府就此声明：完全根据 1945 年 8 月 14 日在莫斯科签订的中国长春铁路协定中指明的期限确认该协定书的有效期。

本声明由缔约国双方的全权代表签字确认，一式两份，以中文和俄文书就，并予以发表。

1950 年　月　日于莫斯科签字

条约签字时的补充条款（草案）

鉴于本条约的签订，缔约国双方声明，本条约的缔结不承担苏中双方在以前条约中各自的债务。

文件 03

苏联部长会议关于中国长春铁路的决议和议定书草案

（1950 年 1 月 21 日）

致维·米·莫洛托夫同志
阿·伊·米高扬同志[①]
安·扬·维辛斯基同志

受委托呈上苏联部长会议关于中国长春铁路决议草案和中长铁路两个议定书的草案。

附件：1 苏联部长会议关于中长铁路决议的草案
　　　2 关于中长铁路议定书的草案
　　　3 关于中长铁路补充议定书的草案

安·葛罗米柯（签名）
Б. 贝舍夫（签名）[②]
伊·科瓦廖夫（签名）[③]
尼·罗申（签名）[④]
伊·科兹洛夫（签名）[⑤]
伊·罗江诺夫（签名）[⑥]
1950 年 1 月 21 日

---

① 米高扬，时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对外贸易部部长。

② 贝舍夫，时任苏联交通部部长。

③ 科瓦廖夫，时任联共（布）中央驻中共中央代表。

④ 罗申，尼古拉（1901–1960），1940 年来华，任苏联大使馆陆军副武官、陆军武官，1948 年任大使。1949 年 10 月为首任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

⑤ 科兹洛夫，时任中长铁路中苏合营公司苏方理事、运输处上校经理。

⑥ 此人身份不详。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部长会议决议（草案）

（1950 年 1 月 日）

莫斯科 克里姆林宫

关于中国长春铁路

苏联部长会议作出如下决议：

一、确定将苏中关于中国长春铁路协定的议定书草案作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间谈判的基础（附件 1）。

二、关于从 1950 年 2 月 日开始恢复中国长春铁路共同经营和共同管理事宜，必须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达成协议。

三、就修改 1945 年 8 月 14 日签订的中国长春铁路协定第四、五、六、七条的问题，必须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达成协议，确定理事长、监事长、铁路局局长、总稽核及其副职和助手等职务的担任采取轮换制，分别由中苏两国人员担任，每隔三年轮换一次。

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建议，在第一个三年中，理事长、副监事长、铁路局副局长、总稽核由中国人员担任；不言而喻，副理事长、监事长、铁路局局长、副总稽核由苏联人员担任。同时规定，在双方没有协商采取其他的职务轮流方式前，上述轮流任职的方式一直保持不变。

四、在确定中国长春铁路的全部资产前，在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谈判时，应提出将铁路的固定资产列为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共同所有的建议。

为全面确定转为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共同拥有的资产，根据 1945 年 8 月 14 日签订的中国长春铁路协定的第十六条，批准成立苏中联合委员会的苏联代表团，成员有 A. Ф. 茹拉夫廖夫（主席），H. A. 格鲁尼切夫（副主席）和 A. M. 捷列尼诺夫等同志。

五、将原属于中国长春铁路以及处于铁路运营中，但未列入附件名单[①]上的资产无偿地移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六、建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中国长春铁路协定中关于护路的第九条和关于保证铁路木材供应的第十二条做某些必要的修改，具体情形如下：

---

① 见附件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负责保护从满洲里车站和绥芬河车站至苏联边境线的属苏联外贝加尔斯克和普里莫尔斯克的铁路地段。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确保该铁路与其他国有铁路在同等条件下得到木材供应。

七、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达成协议，为中国长春铁路及其企业所进口的货物应免除海关税、各种特别税以及货运税。

八、关于该协定的第二、三、四、五、六、七条，将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签订专门的议定书，议定书的草案附在本决议后（附件2）。

九、委托外交部（维辛斯基同志）和交通部（贝舍夫、叶罗戈夫同志），就本决议的第一、第八点，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进行谈判。

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约·斯大林

苏联部长会议办公厅主任 M. 波马兹涅夫

附件1：

苏中关于中国长春铁路协定的议定书（草案）

签字双方代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同意下列事项：

一、1945年8月14日于莫斯科签订的中国长春铁路协定，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并促进了两国之间经济合作的发展，重申这个协定的有效期同规定的完全一样，同时，根据签约方的任何一方的建议，都可以将有益于双方铁路商业活动的某些补充条款列入该协定中。

二、本协定一式两份，以中文和俄文书就，自签字之日起生效。

1950年 月 日于莫斯科

附件2：

补充议定书（草案）

根据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1950年 月 日签订的中国长春铁路议定书，两国政府决定签订补充议定书如下：

一、自 1950 年 2 月 日起恢复中国长春铁路的共同经营和共同管理。

二、修改 1945 年 8 月 14 日签订的中国长春铁路协定的第四、五、六、七条，确定理事长、监事长、铁路局局长、总稽核及其副职和助手等职务的担任采取轮换制，分别由中苏两国人员担任，每隔三年轮换一次。

在第一个三年中，理事长及其助理、副监事长、铁路局副局长、总稽核由中国人员担任；不言而喻，副理事长及其助理、监事长、铁路局局长、副总稽核由苏联人员担任。

在双方没有协商采取其他的职务轮流方式前，上述轮流任职的方式一直保持不变。

三、将中国长春铁路的固定资产列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共同所有。（附件 1）①

为了充分确定转交给苏联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共同所有的资产，以及根据 1945 年 8 月 14 日签订的中国长春铁路协定第十六条规定属于共同经营的资产，应不晚于 1950 年 3 月 1 日成立由缔约国双方各三位代表共同组成的委员会。

委员会的工作地点：哈尔滨市。

委员会应于 1950 年 5 月 1 日前结束工作并提交自己的方案由缔约国双方政府确认。

四、将原属于中国长春铁路并处于铁路运营中，但未列入附件名单上的资产无偿地移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附件 2）②

五、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将承担下列义务：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负责保护从满洲里车站和绥芬河车站至苏联边境线的属苏联外贝加尔斯克和普里莫尔斯克的铁路地段。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确保中国长春铁路与其他国有铁路在同等条件下得到木材供应。

六、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同意，为中国长春铁路及其企业所进口的货物应免除海关税、各种特别税以及货运税。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全权代表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全权代表

---

① 这里所说的附件 1 即本文件的附件 3。

② 在收集的档案中没有发现这个附件。

附件3：

中国长春铁路的固定资产和转交给苏中两国共同所有和共同经营的资产的清单

一、共同使用的铁路干线、支线和专用线

1. 干线：

（1）满洲里——哈尔滨

（2）哈尔滨——绥芬河

（3）哈尔滨——大连—旅顺口

2. 共同使用的铁路支线：

（1）锦州——陈家屯

（2）南关——林—甘井村

（3）大石桥——营口

（4）大方山——柳树屯

（5）苏家屯——抚顺

3. 铁路专用线：

露天采掘场的支线

二、中国长春铁路与其他中国铁路枢纽的分界线

1. 考虑到中国铁路线上火车的通行能力，昂昂溪、哈尔滨和沈阳枢纽站不在中国长春铁路的范围内。

2. 中国长春铁路枢纽站的准确分界线由1945年8月14日签订的中长铁路协定第十六条规定的苏中联合委员会确定。

三、机车车辆修理厂

1. 哈尔滨机车车辆修理厂

2. 附带扳道设备车间和铁路技术实验室的大连机车车辆修理厂

四、机务段

1. 位于下列车站的机务段：

（1）满洲里

（2）海拉尔

（3）博克图

（4）昂昂溪

（5）安达

（6）哈尔滨

……[1]

文件 04

联共（布）中央决议通过的关于中长铁路及旅顺口和大连协定议定书

（1950年1月22日）

联共（布）中央决议

批准委员会提交的有关中国问题的草案如下：[2]

1. 苏联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草案（附件1）；

2. 苏中关于旅顺口和大连港协定的议定书草案（附件2）；

3. 苏中关于中长铁路协定的议定书草案（附件3）；

4. 苏联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苏联以供给中国设备和其他货物的方式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提供贷款的协定草案（附件4）；

5. 苏联部长会议关于成立苏中航运股份公司的决议草案（附件5）；

6. 苏联部长会议关于在新疆成立苏中有色金属和稀有金属股份公司——苏新金属公司的决议草案（附件6）；

7. 苏联部长会议关于在新疆成立苏中石油股份公司——苏新石油公司的决议草案（附件7）；

8. 苏中易货和支付的议定书草案（附件8）；

9. 苏联部长会议关于苏联与新疆贸易的决议草案（附件9）；

10. 关于在中国机关、团体和企业工作的苏联专家费用支付条件的协议草案（附件10）；

11. 苏联部长会议关于苏联机构和中苏合营股份公司管理的满洲和辽东半岛地区不动产的决议草案（附件11）；

① 所收集的档案文件以下缺页。

② 我们收集的档案中只有前三个附件。

12. 苏联部长会议关于派遣苏联专家和教师组到中国工作的决议草案（附件12）。

中央委员会书记

附件1：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略。[①]

附件2：

苏中关于旅顺口和大连港协定议定书

签字双方坚信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近期内可以加强自己的国防力量，并代表苏联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同意下列事项：

1. 根据中国已经变化了的形势以及苏联政府表示的意愿，将在与日本签订和平条约后重新审议1945年8月14日签订的旅顺口和大连港协定。

2. 目前处于旅顺口和大连港的苏联军队将自本条约生效之日的2—3年期间全部撤回苏联境内，撤军将从1950年开始。

3. 本议定书一式两份，以中文和俄文书就，自签字之日起生效。

1950年 月 日于莫斯科

附件3：

苏中关于中国长春铁路协定议定书

签字双方分别代表苏联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同意下列事项：

1. 重申1945年8月14日于莫斯科签订的苏中关于中国长春铁路协定所规定的有效期，同时，根据签约双方任何一方的建议，都可以将有益于双方铁路商业活动

① 此文本除删去了第七条外，与苏联外交部的最后定稿没有多大区别。

的某些补充条款列入该协定中。

2. 本议定书一式两份，以中文和俄文书就，自签字之日起生效。

1950年　月　日于莫斯科

文件 05

苏方提出的关于大连港问题的协定草案

（1950年1月26日）

致阿·伊·米高扬同志、安·扬·维辛斯基同志

呈上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两国政府关于大连港问题的协定草案。

安·葛罗米柯

1950年1月26日

关于大连港

为发展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贸易和经济合作，缔约国双方同意以下事项：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同意，根据单独的协定，从大连港内划拨出一些码头和仓库转租给苏联。

二、从境外运进大连港和沿中国长春铁路直接运往苏联境内的货物，从苏联沿指定铁路经过大连港出口的货物，或从苏联运来的为港口设施所需的材料和设备，免征关税。上述货物应采用封闭车厢运输。

三、大连的行政管理机关隶属中华人民共和国。如果以后未经双方协商确定采用其他任职方式，则港口主任和副主任的职务由中苏两国人员轮换担任，每隔两年轮换一次。同时，在第一个两年中，港口主任由苏联人员担任，副主任由中国人员担任。

四、在同日本缔结和平条约前，大连港实行同旅顺口海军军事基地一样的军事管制。

五、本大连港协定直到与日本的和平条约生效之前一直有效，此后将重新审议。

文件 06

苏方对中方的旅顺口、大连和中长铁路协定的修改稿及增加的议定书草案

（1950年1月28日）

致卡尔斯基同志

给您送上一份由苏联修改的中苏关于旅顺口、大连和长春铁路的协定。[①]

请转交毛泽东同志和周恩来同志。

敬礼

1950年1月28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关于旅顺口、大连和中长铁路协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确认自1945年以来远东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帝国主义的日本遭受了失败；国民党蒋介石集团被粉碎了；中国已成为人民民主的共和国，并在中国成立了新的、对苏联友好的人民政府；新的人民政府统一了全中国，并证明了自己能够坚持国家的独立自主与领土完整，民族的荣誉及人民的尊严。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认为这种新的情况提供了重新处理中长铁路、旅顺口及大连诸问题的可能性。

根据这些新的情况，苏联和中国决定缔结关于中长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本协定如下：

第一条

缔约国双方同意，苏联政府将共同管理中国长春铁路的一切权利以及属于该路的全部财产无偿地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此项移交一俟对日和约缔结后立即实现，但不迟于1952年末。

---

① 这里收入的一份文件是苏方修改后提交给中方的定稿。在档案中还有三份苏方对中方这一协定的修改稿，上面删改的地方非常多，而且是出于不同人的手笔。可以看出苏方对中方提出的这一协定草案最初是有很大不同意见的，并且经过了反复讨论和修改，最后的定稿比较接近中方的草案，但与此同时，苏方又另外提出了一个议定书。

在移交前，中苏共同管理中国长春铁路的现状不变。惟中苏双方代表所担任的职务（如铁路局长、理事长等职），自本协定生效后改为按期轮换制。

关于实行移交的具体办法，将由缔约国双方政府协议定之。

第二条

缔约国双方同意，一俟对日和平条约签订后，但不迟于 1952 年末，苏联军队将撤出旅顺口海军基地。

在苏军撤退前的一段时期，中苏两国政府将派出同等人数的军事代表组成中苏联合军事委员会，双方按期轮流担任主席，管理旅顺口地区的军事事宜；其具体办法由中苏联合军事委员会于本协定生效后三个月内议定，并于双方政府批准后实施之。

该地区的民事行政，应直属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管辖。在苏军撤退前，旅顺口地区的苏军驻扎范围，按现存界线不变。

一旦缔约国任何一方受到日本或其他与日本相勾结的任何国家之侵略，而被卷入战争时，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提议及苏联政府同意，中苏两国可共同使用旅顺口海军基地，以利共同对侵略者作战。

第三条

缔约国双方同意在对日和约缔结后，必须处理大连港问题。

至于大连的行政则完全隶属中国管辖。

目前由苏联方面临时代管或苏联方面租用的在大连的一切财产，应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接收。为进行上述财产的接收事宜，中苏两国政府各派代表三人组成联合委员会，于本协定生效后三个月内议定财产移交的具体办法，并经双方政府批准联合委员会的建议后，于 1950 年内完成之。

第四条

本协定自批准之日起生效。互换批准书将在北京进行。

1950 年　月　日于莫斯科签订，协定文本一式两份，以中文和俄文书就，两种文本具有同等效力。[①]

---

① 在双方谈判中，中方原则上接受了苏方这一协定文本，只是个别措辞上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

议定书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达成协议如下：

一、对于沿中国长春铁路或沿水路经过大连由苏联运往旅顺口海军军事基地用于苏联驻军的物资和原料，以及苏联军事指挥部从旅顺口向苏联国内调拨的物资和原料，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将免征海关税和其他任何税收。

二、上述第一点中指明的物资和原料在中国领土内不属海关检查之列。沿中国长春铁路以及在中国境内运送的物资和原料应采用封闭的车厢。

三、苏联的军队和军用物资将自由地从满洲里车站到绥芬河车站以及沿中国长春铁路往返调运，其运费按中国军队调运的现行价格计算。[①]

发表于《中共党史资料》总 67 辑（1998 年 9 月）

① 1950 年 1 月 31 日，中方提出对该议定书的修改稿增加了一条，即“中国的军队和军用物资将自由地从满洲里车站经过赤塔－新西伯利亚－阿拉木图到伊宁市（新疆省）调运，并沿西伯利亚和土尔克斯坦－西伯利亚之间的铁路以及阿拉木图－新疆运输线返回，其运费按苏联军队调运的现行价格计算。”在谈判中，苏方坚决反对加入这一条。争论的结果，中方同意维持苏方的议定书条款，但在苏联军队使用中长铁路一条中必须增加“在远东地区出现反对苏联的战争威胁时”一句，以此作为前提条件。

关于1950年中苏条约谈判的部分俄国档案文献[①]

文件 01

斯大林与毛泽东会谈记录

（1949年12月16日）

出席会谈的有：莫洛托夫、马林科夫[②]、布尔加宁[③]、维辛斯基、费德林[④]等同志和师哲（卡尔斯基）[⑤]同志。

在互致问候和寒暄后，进行了下述内容的会谈。

毛泽东同志：现在，最重要的问题是保障和平。中国需要三到五年的和平喘息时间，用这段时间来恢复战前的经济水平和稳定全国的局势。解决中国最重要的问题，取决于和平的前景。因此，中共中央委托我向您，斯大林同志，了解世界和平的情况将会如何，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得以保障的问题。

斯大林同志：这么说，中国是在为和平而战。苏联也首先致力于和平问题，虽然它实现和平已有四年。至于说中国，目前并不存在对它的直接威胁：日本还没有恢复起来，因此它没有能力准备战争；美国虽然在叫嚣战争，但它最怕打仗；欧洲被战争吓破了胆。实际上，谁也不会同中国打仗，难道金日成会打中国吗？

和平取决于我们的努力。如果我们和睦相处，和平不仅可以保障5—10年或20—25年，甚至可能是更长的时间。

毛泽东同志：刘少奇回国后，中共中央讨论了中苏之间的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

① 本文刊登的是俄国解密档案中有关中苏两国领导人会谈及双方代表谈判的部分文件。
② 马林科夫，格奥尔基·马克西米亚利安诺维奇（1902–1988），时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
③ 布尔加宁，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1895–1975），时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
④ 费德林，即费奥多连科，尼古拉·特罗菲莫维奇（1912–1996），时任苏联远东司第一副司长。
⑤ 师哲是毛泽东的俄语翻译，卡尔斯基是他的俄文名字。

问题。

斯大林同志：应该讨论和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弄清，是否应该宣布保留现有的1945年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或者宣布将来进行修改，或者现在就对它进行相应的修改。

众所周知，苏中之间是根据雅尔塔协议缔结这个条约的，该协议规定了条约中最重要的几项条款（有关千岛群岛、南库页岛、旅顺问题等等）。[①] 这就意味着，上述条约的缔结应该说是得到美国和英国同意的。鉴于这一情况，我们在小范围内决定暂时不改动这项条约的任何条款，因为哪怕改动一款，都可能给美国和英国提出修改条约中涉及千岛群岛、南库页岛等等条款的问题提供法律上的借口，因此要寻求一种可行的办法，在形式上保留，而在实际上修改现行条约，即形式上保留苏联在旅顺驻军的权利，但按照中国政府的建议，撤出那里的苏联军队。最好是根据中国方面的请求采取这样的措施。

至于中长铁路，在此情况下，考虑到中方的愿望，也可以在形式上保留，而实际上对协议的有关条款做些修改。

但是，如果中国同志不满意这个设想，他们可以提出自己的建议。

毛泽东同志：中长铁路和旅顺的现有状况符合中国的利益，因为仅靠中国的力量还不足以有效地抗击帝国主义的侵略。此外，中长铁路是培养中国铁路干部和工业干部的学校。

斯大林同志：撤军并不意味着苏联拒绝援助中国，如果中国需要这种援助的话。问题在于我们作为共产党人，在别国的领土尤其是友好国家的领土上驻军，是完全不合适的。这样一来，任何人都可以说，如果苏军可以驻扎在中国领土上，那为什么英国人不能在香港驻军，美国人不能在东京驻军呢？

如果双方一致同意苏军撤出旅顺，那么在国际上我们将博得好评。同时，苏军的撤出也给中国共产党在处理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相互关系方面以重大的帮助。所有的人都将看到，蒋介石做不到的事，共产党人做到了。中国共产党人应该尊重民族资产阶级。

条约保障了苏联驻军旅顺的权利，但是，苏联可以不使用这个权利，而是应中国政府的请求撤出军队。当然，如果这样做不合适，那么，驻旅顺的军队可以留下

---

① 1945年2月11日斯大林、罗斯福和丘吉尔签署的雅尔塔协定规定：由日本1904年占领的库页岛南部及邻近一切岛屿和千岛群岛交还苏联，旅顺港由苏联租用，大连港国际化，中国长春铁路为中苏共同经营。

2 年、5 年或 10 年，就看如何做对中国有利。别让人们以为我们想从中国逃跑。我们也可以把军队留下 20 年。

毛泽东同志：在中国讨论条约时，我们没有考虑到美国和英国在雅尔塔协议中的立场。我们应该按如何对共同的事业有利来行事。对这个问题应当考虑周到。但是，现在已经清楚的是，目前不必修改条约，正如不必匆忙从旅顺撤军一样。

是否需要周恩来前来莫斯科解决条约问题呢？

斯大林同志：这个问题您必须自己决定。可能周需要来解决其他一些问题。

毛泽东同志：希望能解决苏联给中国贷款的问题，也就是说，苏联政府同中国政府之间签订一个贷款三亿美元的协议。

斯大林同志：这可以做到。如果您想现在就签订协议的话，我们同意。

毛泽东同志：是的，正是现在，因为这可能会在中国引起很好的反响。

与此同时，必须解决贸易问题，特别是苏联和新疆之间的贸易问题，虽然我们现在无法提供这一地区的准确的贸易业务计划。

斯大林同志：我们现在要知道中国需要哪些设备，因为我们没有备用设备，必须预先向工业部门提出申请。

毛泽东同志：在编制设备订单方面，我们感到有困难，因为工业情况我们还不清楚。

斯大林同志：希望尽快提出订单，因为设备订货在我国工业部门至少要提前一年安排下去。

毛泽东同志：我们非常想在建立空中航线方面得到苏联的帮助。

斯大林同志：我们已打算好给予这方面的援助。空中航线可以经过新疆和蒙古人民共和国。我们有专家。提供援助是有保证的。

毛泽东同志：在建立海军方面，我们同样希望得到您的帮助。

斯大林同志：可以在旅顺为中国海军培养干部。你们出人，我们出船。完成学业的中国海军干部，可以开着这些船返回中国。

毛泽东同志：国民党分子在台湾岛上建立了海军基地和空军基地。我们没有海军和空军，人民解放军难以攻占台湾。鉴于这一点，我们的一些将领主张呼吁苏联援助，希望苏联派遣志愿飞行员或秘密部队，以便尽快解放台湾。

斯大林同志：不会不给予援助，但援助的形式需要考虑周到。这里主要的问题是不给美国人的干预提供借口。至于参谋人员和教官，我们随时都可以提供。其他问题我们要仔细考虑。

你们有空降部队吗？

毛泽东同志：有一个原国民党的空降团，现在已转到我们方面来了。

斯大林同志：可以挑选一个空降连，把任务告诉他们，将他们空投到台湾，然后通过他们在岛上组织起义。

毛泽东同志：我们的部队已进抵中缅边境和中国与印度支那的边境。因此，英国和美国担心，我们的部队是要越过边境，还是到此为止。

斯大林同志：可以放出风去，说你们打算越过边界，吓唬一下帝国主义者。

毛泽东同志：某些国家，尤其是英国，在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事上，表现出很高的积极性。但我们认为，我们不必急于得到承认。我们必须整顿国内秩序，巩固自己的地位，尔后再同外国帝国主义者谈判这个问题。

斯大林同志：这是正确的策略。然而，不必亲自出面与英国人和美国人发生冲突。例如，如果需要对英国施加压力，那可以通过广东省与香港的冲突来做到这一点。而为了妥善解决这类冲突，毛泽东可以作为调停人出面。主要的是不要匆忙行事和避免冲突。

外国银行是否仍在上海营业呢？

毛泽东同志：仍在营业。

斯大林同志：它们为谁服务呢？

毛泽东同志：为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外国企业服务，这些企业我们暂时还未触动。至于外国人的影响，在经济和商业领域，主要是英国人的投资，在文化教育方面，美国人占主要地位。

斯大林同志：日本企业的情况如何呢？

毛泽东同志：已将它们收归国有。

斯大林同志：海关在谁的手中？

毛泽东同志：在政府手中。

斯大林同志：必须注意海关，它通常是国家巨额收入的来源。

毛泽东同志：在军事和政治领域，我们已取得完全的成功，至于文化和经济，在这方面我们还没有摆脱外国的影响。

斯大林同志：在外国企业、银行等处，你有稽查人员和情报人员吗？

毛泽东同志：有。我们在研究和监督外国企业方面（开滦矿务总局、上海的电厂和水厂等），进行了相应的工作。

斯大林同志：必须有按照法律行事的政府稽查人员。对外国人征税必须多于中

国人。

钨、钼、石油的开采权在谁的手中？

毛泽东同志：在政府手中。

斯大林同志：必须发展采矿业。尤其是石油开采，可以在兰州以西至成都铺设输油管道，然后通过管道运输燃料。

毛泽东同志：我们还没有决定，中国哪些地区必须首先发展——是沿海地区还是内陆地区，因为我们尚不清楚和平的前景。

斯大林同志：石油、煤炭、钢铁总是需要的，不论将来是否打仗。

斯大林同志：在中国南方能否栽培橡胶树呢？

毛泽东同志：到目前为止，尚未成功。

斯大林同志：中国有气象站吗？

毛泽东同志：没有，还没有建立。

斯大林同志：应该建立。

斯大林同志：我们想从您那里得到您的译成俄文的著作目录。

毛泽东同志：我正在审校自己的著作，它们是由各地的出版社印刷的，有很多错误和不准确的地方。我打算在 1950 年春季以前审校完这些著作。但我希望得到苏联同志的帮助：第一，与俄语翻译一起对文稿进行加工；第二，对中文原稿进行校订。

斯大林同志：这可以做到。但是对您的著作进行校订还需要帮助吗？

毛泽东同志：需要。请您为此指派一位适当的同志，比如说，一位联共（布）中央委员。

斯大林同志：如果需要，这也可以做到。

（费德林同志记录）

文件 02

毛泽东与罗申关于访苏安排的会谈纪要

（1950 年 1 月 1 日）

摘自罗申日记

根据苏联外交部长维辛斯基的指令，1 月 1 日拜访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

政府主席毛泽东同志。

互致新年问好和礼节性问候之后，进行了热情友好的谈话。谈话中，毛泽东同志谈到了如下问题：

最近几天，他收到北京的报告，说缅甸和印度政府表示他们愿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政府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是：通知缅甸和印度政府，如果他们确实希望改善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那么他们必须首先完全断绝与蒋介石的联系，并发表官方声明，无条件地拒绝向蒋介石政权提供任何支持和援助。在印度和缅甸政府接受中国政府的上述建议的条件下，他们可以派代表到北京进行谈判。

毛泽东同志指出，还有消息说，不久英国和其他英联邦国家也将在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问题上采取明显步骤。

谈到中国的军事形势，毛泽东同志指出，到目前为止，在中国大陆上的国民党全部主力部队都已经被消灭了。在四川和新疆，差不多有 40 万国民党军队被俘或编入人民解放军。胡宗南匪帮约 3—4 万人残余部队逃向西藏和南方的道路已经被全部切断，不久将被消灭。在云南，还有 3 万国民党的散兵游勇分散在昆明西南地区，但他们的命运已经注定了。

毛泽东要求向苏联领导人转告他的健康情况，以及他在莫斯科停留的下一步计划。毛泽东说："经过两年时间的休养，我的健康情况已经好转。最近 4 天，我每天睡 8 个小时没问题，没有吃安眠药。但外出散步时，我在冷空气中逗留不能超过一刻钟，这样我会感到头晕。鉴于这种情况，我想静养一个多星期，完全恢复正常的睡眠。"

他还提出，在以后一周的休息期间，他想会见什维尔尼克[①]、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②]、贝利亚[③]、马林科夫、华西列夫斯基[④]和维辛斯基。这些会见只能以普通会谈的方式进行。他不会提任何特别的问题，也不讨论工作问题。每天只会见一人，谈话不会长，他认为对他们来说，最好的时间是在下午 5—6 点钟以后。

在这段时间里，他想与斯大林讨论工作问题。

讨论了工作问题后，他想在停留的剩余时间里向列宁墓献花圈，看一看地铁，参观集体农庄，观看歌剧，然后结束在莫斯科的停留。

---

① 什维尔尼克，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1888–1970），时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
② 伏罗希洛夫，克里门特·叶夫列莫维奇（1881–1969），时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
③ 贝利亚，拉夫季米·巴夫洛维奇（1899–1953），时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
④ 华西列夫斯基，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1895–1977），时任苏联武装力量部部长。

毛泽东同志强调，他不参观工厂，不接见大批客人，不发表公开讲话，因为这样会影响他的健康，再次破坏他的睡眠习惯，并引起头晕复发。以前他想访问苏联其他地方，但由于健康情况，而且回国时还要进行长途跋涉，所以他现在不想在苏联旅行了。

离开北京时，他曾想在苏联逗留三个月，然而最近国内的工作需要他把停留的时间减少到两个月。考虑到乘火车回北京要11天，他想在1月底离开莫斯科，2月6日到达北京。

听完毛泽东同志的谈话后，我说，我将在第二天把他的所有要求转告给苏联政府。

我又问毛泽东同志，他是否知道苏联政府（1949年）11月提出的建议，即将几百名日本军官引渡给中国政府，以便使他们接受对他们在中国犯下的罪行进行审判。

毛泽东同志说，他在离开北京时已经知道这一情况，但他们正忙于莫斯科之行的准备，中国政府未能认真考虑这件事。他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是，中国政府原则上愿意接受这批罪犯，但是，考虑到最近中国人民正忙于消灭国民党残余力量，以及中国的司法制度还不健全，中国政府在公众没有为此做好准备之前不能开始审判，因为这样无法造成必要的政治影响。此外，中国政府必须同时准备审判国民党战犯。

考虑到毛泽东所说的所有这些情况，我估计6个月后我们可以让这些战犯离开苏联国土。我请求苏联政府在1950年上半年把这些战犯留在国内，如果可能的话，收集有关他们罪行的更多的证据。从今年下半年起，我们将引渡这批战犯，让他们接受审判。

正式讨论结束后，毛泽东邀请我与他共进晚餐，我接受了邀请。

与毛泽东同志分手后，我继续与卡尔斯基一起等汽车。卡尔斯基告诉我，毛泽东三天以来感觉非常好，他睡眠好，没有吃药，爱开玩笑，很兴奋，很健谈。但是像以前一样，他不能长时间在户外呼吸冷空气。他仍犯头晕。毛泽东同志确实决心再休息一周，不去任何地方旅行。2月2日将有医生会诊。

文件 03

毛泽东与维辛斯基谈话纪要

（1950 年 1 月 6 日）

摘自维辛斯基日记

今年 1 月 6 日，我拜访了毛泽东，简短的互致问候以后，开始了正式会谈。

一、我告诉毛泽东，鉴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要求帮助恢复吉林水电站[①]，苏联政府已经作出决定，五天之内，四名苏联专家去中国，为期一个月，他们必须写出一个关于水电站情况的报告，并拟定恢复吉林水电站的必需的方法。

毛泽东同志对苏联政府提供的所需帮助表示感谢，说苏联政府为此所提供的帮助对中国的整个民族经济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二、我告诉毛泽东，鉴于刘少奇的电报中提到为了进行航空训练要求苏联供应燃料，（我们）倾向于这样答复，根据我们专家的计算，按苏联空军的标准测定，为此目的所用的燃料是：高辛烷汽油 13400 吨，低辛烷汽油 5270 吨，航空汽油 1315 吨，P-9 型燃油 26 吨。

苏联政府将下达命令，从 1 月开始，在今年上半年向中国提供上述数量的燃料。至于中国提到的这批燃料的支付方式和条件的问题，可以在 1950 年的贸易谈判中解决。

毛泽东表示同意，并要求表达他对苏联援助的感激之情。至于燃料的数量，他说，“我们的人本来想要的更多”，但对此必须进行严格控制。他感谢苏联政府对此进行复核，他完全同意采取这种做法。毛泽东还说，燃料的使用必须经过严格的方式进行分配，因为这关系到中国自身的利益，在使用外援的商品时应该更加注意节约。毛泽东要求把电报文本留给他。

三、我问毛泽东，他是否认为发表一个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席位的声明会更有利，声明的内容是国民党代表留在联合国安理会是非法的，必须把他们驱逐出去。就苏联方面说，苏联倾向于支持这个声明，同时也要求安理会将国民党代表团驱逐出安理会。在国民党代表仍然留在安理会的情况下，苏联代表将宣布，只要有国民党代表存在，苏联代表就不参加安理会的工作。

---

① 即小丰满水电站。

毛泽东说，他百分之百同意这个建议，并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给安理会的这个声明的抄件可以同时递交给安理会成员国。

四、毛泽东说，关于苏联政府给中国人民政府的有关 971 名日本战犯的信，他愿做如下答复：

（1）总的说来，日本战犯无疑必须移交给中国，并接受审判。

（2）但是，中国政府主张对日本战犯的审判与对国民党战犯的审判同时进行。这样一个司法程序的准备大约在 1951 年上半年或下半年进行。因此，希望苏联政府同意暂时在苏联收押这些日本战犯，大致到 1950 年下半年。

我提出，既然苏联政府受到道义的约束，即到 1950 年 1 月遣返全部日本战犯，或许更有利的是考虑同意在形式上把日本战犯移交给中国，而在事实上暂时把他们留在苏联国土上。

毛泽东说，这是一个完美的方案，他认为是最有利的。

五、毛泽东称，他一直不断地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联需要签订一个两国之间新的友好同盟条约。他说，我们之间签订一个新条约，反映了在人民革命胜利后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联之间出现的完全新型的关系。对现存条约进行重新审查是完全必要的，因为这个条约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日本和国民党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日本已经不再是一种武装力量，而国民党已经垮台。此外，众所周知，中国人民当中的某些人一直对现存的中苏条约不满。所以，签订一个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对双方都是有利的。

我回答毛泽东说，在我看来，新条约似乎是一件复杂的事情，因为签订新条约或者审查现存条约，并进行任何修改，都会被美国人和英国人用来作为借口，要求审查和修改条约的其他部分，而这种改变会对苏联和中国利益造成损害。这是不希望，并且不能允许发生的。

毛泽东指出，毫无疑问，当确定签约问题的方案时，这种情况必须加以考虑。

会谈时在座的有伊·弗·科瓦廖夫[①]、尼·特·费德林，以及师哲。

会谈大约进行了 45 分钟。

---

① 科瓦廖夫，时任联共（布）中央驻中共中央代表。

文件 04

莫洛托夫、维辛斯基与毛泽东会谈记要

（1950 年 1 月 17 日）

摘自莫洛托夫日记　　绝密

相互问候并就一般话题进行简短交谈后，进行了下列内容的会谈：

一、我对毛泽东说，1 月 12 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全国新闻俱乐部做了演讲，其中涉及到了一些国际问题，包括中国、苏联和二者之间相互关系的问题。艾奇逊就这些问题的讲话是对苏联明显的中伤并指望对舆论进行欺骗。

美国对华政策失败后，艾奇逊试图为其辩解，不耻使用欺骗手段。从下面这段谈话可以看出他的谎言到了什么程度：

“下面是正在中国发生的事情：苏联正在采取新的手段将中国的北部地区从中国划分出来，并将其归入苏联。在外蒙古这一过程已经完成，在东北地区这件事也差不多完成了。所以，我相信，苏联代理人正在从内蒙和新疆向莫斯科发出最令人愉快的消息。这就是正在发生的事情，即这片居住着中国人的广阔地区正在从中国分离出去，并归入苏联。”

“我想声明，或许我会违背自己的否定教条主义的主张，但我想说，在任何情况下，苏联占领中国北部四个地区这一事实，在某个世界强国同亚洲的关系方面是最重要的和最能说明问题的。”

“这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某种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我建议毛泽东了解一下艾奇逊的这篇讲话，并将（据塔斯社的）讲话全文转给了他。

毛泽东说：众所周知，在此以前，从事这种欺骗活动的主要是以美国记者为代表的形形色色的坏人，而现在就连美国的外交部长[①]也亲自干起了这种肮脏的勾当。这就是所谓美国人的进步。

我回答说，鉴于艾奇逊的这一讲话，我们认为，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应以相应的方式做出反应。同时，我指出，据塔斯社从华盛顿的报道，1 月 14 日前美国驻沈阳总领事华德在回答记者的问题时，所表明的与艾奇逊 1 月 12 日的演讲正

① 原文如此。

好相反。在此，我援引华德讲话中相应的地方，其中说：尽管苏联根据协议中自己的权利，参与了共同管理中国长春铁路，但他没有看到任何表明苏联正在对东北地区进行监督管理或者力图将其并入苏联的迹象。

我说，我们打算以苏联外交部的声明对艾奇逊的讲话做出反应。但我们认为，最好是中国政府首先就此问题发言，然后，在我们的报刊上刊登中国人民政府的声明和华德的声明后，我们苏联外交部再发表相应的声明。

毛泽东说，他同意这一点，对此没有任何疑问。不过，他询问说，这样的声明由新华社来做不是更好吗？

我回答，既然事情关系到美国的外交部长[①]对如此重要问题的讲话，因此，声明就不应该由通讯社发表，而应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来发表。

毛泽东说，他同意这一意见，并在研究艾奇逊的讲话后，明天就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声明的文稿，再将其交给我们征求意见和修改，然后用电报发往北京，让正在行使部长职责的外交部副部长公布这一声明。同时，毛泽东还指出，在这个声明中他一定揭露艾奇逊的反苏诽谤。[②]

毛泽东还问，在我们看来，艾奇逊的这个诽谤性声明的真正目的是什么呢，这一讲话是否是美帝国主义企图借此占领台湾的一种烟幕弹?

我说，美国人在其对华政策失败后，总是力图借助于欺骗和诽谤在苏中关系方面造成误解。我还说，也不能否认他们将利用散布谣言作为某种烟幕来实现其占领的计划。与此同时，我指出，根据我们的观点，在中国人民政府关于艾奇逊讲话的声明中应该指明：美国国务卿的谣言是在侮辱中国，中国人民正在进行的斗争不是为了让某个人统治或监督管理中国的某一部分。中国人民会起来揭穿艾奇逊的谎言。

毛泽东说，他同意这些建议，并立即起草声明草案。同时，他还请求将艾奇逊的讲话文稿和华德给记者的声明转给北京新华社。我答应今天晚上就办此事，并立即和维辛斯基谈妥了此事。

随后毛泽东说，最近几天，美国人加强了其代理人的活动，以探听与中国人民政府进行谈判的可能性。例如，几天以前，美联社巴黎分社社长问毛泽东，他将如

---

① 原文如此。

② 1950 年 1 月 19 日，毛泽东将他起草的关于驳斥艾奇逊造谣的谈话发给刘少奇，并指示以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的名义发表。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1 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 年，第 245–248 页。

何对待著名的美国远东事务专家杰塞普到北京来谈判这件事。差不多与此同时，又收到了上海发来的消息，驻上海美国领事馆通过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已着手采取措施，以便得到中国人民政府的同意，派代表到香港同杰塞普谈判。毛泽东说，然而，对美国人的这种试探，我们是不会理睬的。

其次，毛泽东接着说，正如他以前对维辛斯基说的，中国人民政府要采取一些旨在把美国领事代表驱逐出中国的措施。毛泽东强调说，我们需要赢得时间在国内整顿，因此，我们将努力延缓美国承认中国的时间。美国在中国得到合法权利越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就越有益处。今年的 1 月 14 日，北京地方政府向前美国领事声明，他们因自己的需要打算收回外国军队的营房，这些营房是外国人过去凭借不平等条约而得到的。占领上述这些房屋实际上就意味着美国领事将失去他现在占用的房子，并迫使他离开北京。美国驻北京的领事在回答这个问题时，开始对中国当局进行威胁说，为了表示抗议，将不得不召回在北京、天津、上海和南京的所有领事代表。毛泽东以半开玩笑的方式说，这样，美国人对我们的威胁恰恰是我们想要得到的东西。

我指出，中国中央人民政府的政策首先是要保证国内状况的稳定，对此我们是非常清楚和理解的。

二、我接着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关于国民党代表留在安理会是不合法的，蒋廷黻应被驱除出安理会的声明，以及苏联驻安理会代表同时所采取的行动引起了混乱，并在某种程度上使我们敌人的队伍乱了阵脚。但是，为了将在联合国中已开始的斗争进行到底，我们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派出自己驻安理会的代表是适宜的。并且，理想的是这种派遣应尽可能快些进行。

毛泽东回答说，这个问题他同维辛斯基同志谈过并完全同意这种建议，但是，毛泽东强调，对我们来说，这个问题还存在着技术困难，即挑选候选人。唯一合适的候选人就是现在的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同志，尽管他在这方面稍微弱了一些。关于任命章汉夫的事，在周恩来同志到莫斯科时，我想同他商量一下。

我说，如果只是这个问题，那么，目前周恩来尚在途中，可以同他在高频电话中谈一下。

毛泽东高兴地同意利用高频电话与周恩来联系，并立即商议这个问题。

三、随后我说，根据我们掌握的消息，盟国对日管制委员会中国民党代表团团长朱世明将军似乎打算脱离国民党，转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但是我们对这些消息是否可信没有把握，此外我们对朱世明所知甚少，因此我们很难对他作出明确的

结论。所以，我们想同毛泽东讨论这个问题，并要弄清楚，是否应该等待朱世明自己声明转向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是不等到这一时刻，就要求从盟国对日管制委员会中开除国民党的代表。

毛泽东说，从他的观点看，通过盟国对日管制委员会中国民党代表团的秘书郑金兆来办这件事比较合适些。不久前这位秘书通过杰列维扬科将军[①]寄来一封信，提及了他正在进行的有关上述代表团在东京的工作人员转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的工作，毛泽东指出，应当对朱世明施加影响，推动他转到我们方面来，这将使我们能更平稳地解决派遣我们驻盟国对日管制委员会代表的问题。

毛泽东说，他将起草对郑金兆来信的复信，并将其寄给我们，转交东京的收信人。

我说，这个建议可以采纳，我们可以通过杰列维扬科将军将毛泽东的答复转给郑金兆。

会谈持续了 1 小时 20 分钟。

参加会谈的有：尼·特·费德林和师哲（卡尔斯基）同志。

维·莫洛托夫 1950 年 1 月 18 日

文件 05

斯大林与毛泽东会谈记录

（1950 年 1 月 22 日）

互相问候、简短叙谈以后，举行会谈，内容如下：

斯大林：有两类问题需要讨论，第一类问题涉及中苏现有各项协定，第二类问题涉及有关满洲、新疆等现实问题。

我想，最好不从现在的问题谈起，而是先讨论已有的协定。我们认为，这些协定必须修订，虽然以前我们曾经考虑，可以把它们保留下去。已有的协定，包括条约在内，必须修改，因为条约的基础是对日战争的原则。既然战争结束了，日本被打败了，情况变了，那么，现存的条约就落后于时代了。

请对友好同盟条约问题发表意见。

---

① 杰列维扬科当时任盟国对日管制委员会苏联代表。

毛泽东：我们还没有具体拟定好条约的草案，仅有一些设想。

斯大林：我们可以交换意见，然后起草有关草案。[1]

毛泽东：根据目前形势，我们认为，我们应当借助条约和协定把已经存在于我们之间的友好关系固定下来。这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国际关系方面都会引起积极反应。在友好同盟条约中应当把保障我们两国繁荣的内容固定下来，还应规定必须防止日本发动新的侵略。既然两国的繁荣对我们有利，那么就不能排除帝国主义国家企图阻挠这件事。

斯大林：对的。日本保留了干部，特别是在美国继续奉行他们目前政策的条件下，日本必然会重新抬头。

毛泽东：我所说的两点是要把我们未来的条约同现存的条约从根本上区别开来。过去，国民党只是口头上谈友谊。现在，情况变了，也具备了建立真正友谊与合作的一切条件。

此外，如果过去说的是在进行对日战争时的合作的话，现在说的应是防止日本侵略。新条约应当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合作的各项问题，其中最重要的问题是经济合作。

斯大林：要不要保留写入原友好条约的第三条规定呢？即“在联合国应缔约国双方的要求承担起防止日本今后侵略的责任以前，本条款继续有效”。

毛泽东：我想，这一条就不必保留了。

斯大林：我也认为不必了。在新条约中应规定哪些条款呢？

毛泽东：我们认为。在新条约中必须规定在国际问题上协商的条文。把这一条列入条约将增强我们的地位，因为在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中还存在着在国际关系上反对向苏联靠拢的意见。

斯大林：好的。在缔结友好合作条约时写上这一条是理所当然的。

毛泽东：对。

斯大林：委托谁去起草草案呢？我想，应该让维辛斯基和周恩来去做这件事。

毛泽东：同意。

斯大林：现在转入中长铁路协定。您对这个问题有何建议？

毛泽东：也许可以把在法律上保留中长铁路协定有效的原则作为基础，旅顺口协定也这样办，而实际上做一些修改。

---

① 实际上，苏方在这次会谈前已经准备了13个有关谈判的文件草案，并经过了联共（布）中央的批准。

斯大林：就是说，您同意宣布在法律上保留现有协定，但实际上进行适当的修改。

毛泽东：我们必须要考虑到双方的利益，既要考虑到中国的利益，也要考虑到苏联的利益。

斯大林：对的。我们认为，旅顺口条约是不平等的。

毛泽东：但是，改变这个协定要牵扯到雅尔塔会议的决定？！

斯大林：是的，要牵扯到——那就见它的鬼吧！既然我们已选择了修改条约的立场，那么就要走到底。当然，这对我们会有些不便，我们就要同美国人做斗争了。但是，我们已经不在乎这些了。

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只是担心，这会给苏联带来不良的后果。

斯大林：大家知道，我们是在对日战争时期签订的现有条约。我们不知道蒋介石会被推翻。我们的出发点是，我国军队驻旅顺将对苏联和中国民主事业有利。

毛泽东：这个问题是清楚的。

斯大林：在这种情况下，你们是否认为可以接受这样的方案：宣布在签订对日和约以前旅顺港协定依然有效，此后俄军撤出旅顺。或者可以提出另一种方案，宣布保留现有协定，而实际上从旅顺撤军。哪一种方案更合适，就采纳那一种方案。我们同意任何一种方案。

毛泽东：对这个问题需要考虑考虑。我们同意斯大林同志的意见，我们认为，在签订对日和约以前，旅顺口协定应继续有效，签订和约后失效，苏军撤走。但是，我们希望在旅顺我们之间进行军事合作，我们也可以训练自己的海军。

斯大林：大连问题。我们不打算在大连保留苏联的任何权利。

毛泽东：大连是否保留作为自由港?

斯大林：既然我们放弃自己的权利，那么，中国应当自己决定大连问题：它是自由港或者不是。当年罗斯福曾坚持让大连成为自由港。

毛泽东：这么说，保留自由港是符合美、英利益喽?

斯大林：当然，其结果就是门户开放。

毛泽东：我们认为，旅顺口可以作为我们军事合作的基地，而大连可以作为苏中经济合作的基地。大连有许多企业，没有苏联的帮助我们没有能力经营。我们要在当地发展经济合作。

斯大林：就是说，旅顺口协定在签订对日和约以前依然有效。签订和约以后现协定失效，俄国撤走自己的军队，我可以把说过的意思这样归纳吧?

毛泽东：核心就是这样，而且我们想写在新条约里的正是这一点。

斯大林：继续讨论中长铁路问题。请按照共产党人的态度告诉我们，你们有哪些疑问。

毛泽东：基本想法是，在新协定中要写明，共同经营和管理今后还要继续下去。但是，说到管理，那么中方在管理中应起主要作用。然后，要研究缩短协定的有效期问题和规定双方的投资规模。

莫洛托夫：在涉及两国合作和共同管理某项企业的情况下，通常规定双方平等参与以及轮流担任领导职务的办法。在旧协定里，铁路管理归苏方，但今后我们认为必须规定轮流执行管理的职能。例如，可以每隔 2—3 年轮流一次。

周恩来：我们的同志认为，现有的中长铁路理事会以及铁路局长的职务应该撤销，建立铁路管理委员会代替它，而且要规定，委员会主席和局长职务要由中方担任。但是，鉴于莫洛托夫同志的建议，这个问题必须再考虑一下。

斯大林：如果是说共同管理，那么，领导职务就必须轮换担任。这样做更合理一些。至于协定的有效期，我们不反对缩短。

周恩来：要不要修改双方的投资比例，把中方的投资比例增加到 51%，以代替现行的平均投资？

莫洛托夫：这与现行的双方均等原则相抵触。

斯大林：我们确实有同捷克和保加利亚的协定，规定了双方均衡、平等的原则。既然是共同管理，那么就要平等参与。

毛泽东：对这个问题要从保障双方利益的角度再研究一下。

斯大林：那就讨论贷款协定吧。对已经达成的一致意见，要赋予国家间协定的形式，有什么意见？

毛泽东：军事装备供货是否纳入贷款额之内？

斯大林：这可由你们自己决定：可以用贷款支付，也可以按贸易协定办理。

毛泽东：如果军事供货用贷款来支付，那么，我们为工业剩下的资金就不多了。因此，看来军事供货只能部分靠贷款来支付，部分用商品来支付。不能把工业设备和军事装备的贷款供应期限从 5 年缩短到 3—4 年吗？

斯大林：要看我们的能力如何，要看我国工业的订货情况。然而，毕竟可以把贷款协定的有效期提前到 1950 年 1 月 1 日，因为实际上现在就应开始供货。如果在协定中从 1949 年 7 月就开始提供贷款，那么，国际舆论就会不理解，当时中国

还没有自己的政府，怎么能同苏联达成协议呢？[①] 我想，你们应赶快提交工业设备订货清单。应当考虑到，这种清单提交得越早，对事情就越有利。

毛泽东：我们认为，贷款协定的条件对中国十分有利。为这笔贷款我们总共只付1%的利息。

斯大林：我们为各人民民主国家提供贷款的协定，都规定收2%的利息。（斯大林同志开玩笑说，如果你们情愿，我们可以给你们提高利率。）当然，我们注意到，中国的经济受到了很大的破坏。

从接到的电报中看到，中国政府正准备把军队用于经济建设。这很好。当时，我们也曾把军队用于我国经济建设，并取得了良好效果。

毛泽东：对的，我们正在利用苏联同志的经验。

斯大林：你们提出中国要为新疆弄到一定数量的粮食吗？

毛泽东：小麦和纺织品。

斯大林：为此，你们要提供一个相应的申请数。

毛泽东：好的，我们起草一个。我们怎样起草贸易条约？

斯大林：你们有什么意见？至今只同满洲有贸易条约。我们想要知道，今后的情况怎么样：我们是同新疆、满洲和其他省签订单独的条约还是同中央签订统一的条约？

毛泽东：我们希望同中央签订统一的条约。但同时新疆可以有单独的协定。

斯大林：只是新疆，满洲呢？

周恩来：对满洲则不签订单独的协定，因为中央的条约基本上要靠满洲供货来保证支付。

斯大林：我们希望，同新疆或满洲的协定要得到中央政府批准，并且中央政府要对这些协定负责。

毛泽东：同新疆的条约必须以中央政府的名义签。

斯大林：对，因为省政府考虑不了那么多，而中央政府总是了解得更清楚。还有什么问题？

毛泽东：目前最重要的问题是经济合作，恢复和发展满洲的经济。

斯大林：我想，我们委托米高扬、维辛斯基、周恩来和李富春同志准备一下这个问题。

---

① 在刘少奇秘密访问苏联期间，1949年7月30日，刘少奇和马林科夫已经分别代表中国和苏联签订了关于贷款的协定。

还有什么问题?

毛泽东：我想指出，您派到中国的航空团给了我们很大帮助，共运送了将近一万人。请允许我，斯大林同志，感谢您的援助，并请您把这个航空团继续留在中国，为给准备进攻西藏的刘伯承部队运送食品提供帮助。

斯大林：你们准备进攻，这很好。必须把西藏拿到手。至于航空团的事，我们同军方商量一下，再答复你们。

会谈持续了两个小时。

出席会谈的有：莫洛托夫、马林科夫、米高扬、维辛斯基、罗申、费德林和毛泽东、周恩来、李富春、王稼祥、陈伯达和师哲（卡尔斯基）。

文件 06

维辛斯基关于与周恩来谈判情况给斯大林的报告

（1950 年 2 月 1 日）

绝密

约·维·斯大林同志：

在 1 月 31 日同我们的谈话中，周恩来对我们的草案提出了下列修改意见：

一、关于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1. 在条约序言的第二段中，以“友谊和合作”代替“友好关系和合作”。

2. 在第二条，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代替“在战争期间”。

3. 在第六条，以“自批准之日起立即生效”代替“签字后立即生效”。

关于第 1 点，我们指出了我们的措词比较合适。

关于第 2、3 点我们不反对。

二、关于旅顺口、大连和中长铁路的协定。

1. 给协议书以下述措词的标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和大连的协定”。

2. 给我们草案序言的第一段加上下述文字：“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认为，自 1945 年以来远东局势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即：帝国主义的日本遭到了失败，（国民党蒋介石集团被粉碎了）反动的国民党政府被推翻了；中国已成为人民民主共和国，并在中国建立了新的人

民政府，（与苏联友好的人民政府，使中国联合成统一的国家，并证明）统一了全中国，实行同苏联友好、合作政策，并证明了自己有能力捍卫国家的独立和领土的完整，维护民族荣誉和中国人民的尊严的人民政府。”

3. 在第一条“无偿地移交”一句话后加上“政府”一词。

4. 序言的最后一句话以下列方式表述：“根据这些新的情况，（苏联和中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决定缔结关于中长铁路、旅顺口及大连港的本协定。”

5. 第二条第一段用下列方式表述：“缔约国双方代表同意，一俟对日和约缔结后，但不应迟于 1952 年末，苏联军队应撤出共同使用的旅顺口海军基地，并将该地区的军事设施移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同一条的第二段开头这样表述：“在苏军撤退及移交上述军事设施前的一段时期”。

6. 在第三条第二段，以“隶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替“隶属于中国”。

在上述第 2、4、5 点中，周恩来建议增加划有着重线的词，而去掉括号中的词。

关于上述第 1、3、4、5、6 点我们表示，从我方来讲大概不会反对，但答应以后给予答复。至于第 2 点，我们坚持我们的措词。

讨论的结果是周恩来表示，他将不坚持自己的措词，答应考虑后再来谈这个问题。

三、关于旅顺口、大连和中长铁路协定的议定书。

1. 序言以下列方式表述：“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在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及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协定的基础上，达成协议如下”。

2. 把我们草案的第三点变为第一点。

3. 补充新的第二点如下：“二、中国的军队和军用物资将自由地从满洲里车站经过赤塔—新西伯利亚—阿拉木图到伊宁市（新疆省）调运，并沿西伯利亚和土尔克斯坦—西伯利亚之间的铁路以及阿拉木图—新疆运输线返回，其运费按苏联军队调运的现行价格计算。”

以上划线部分是周恩来修改的。

我们不反对第 1 和第 2 点中的修改。至于周恩来提出的新的第二点，我们答应以后给予答复。

四、关于贷款的协定。

1. 协定的标题这样表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关于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提供贷款的协定”。

2. 在第一条的第二段中，以“鉴于中国因其领土上长期的军事行动而引起的财政困难”代替“由于中国遭到严重破坏，以及在其领土上长期的军事行动”。……以下见文本。

3. 在第三条中，在“供应原料”一词后加上“工业品”，在“原料的价格”一词中加上“工业品的”。

4. 在第五条中，加上“应经批准，互换批准书将在北京进行”。

第1、2和4点中所指出的修改我们不反对。有关第3点的修改，我们答应以后答复。

五、关于贷款协定的议定书。

在第二段用“中国不再使用的全部剩余的钨、锑、铅、锡提供给苏联政府，购买价格以国际市场价格为基础确定，期限为14年，即从1950年至1963年，按每年易货协定的方式进行”，代替“所有剩余的钨、锑、铅、锡在前10—12年间按照每年的易货协定规定的方式卖给苏联”。

划线的部分是周恩来修改的。

与此同时，周恩来提出，苏联政府是否打算买下全部剩余的钨、锑、铅和锡，中国政府是否可以将部分剩余的产品卖给其他人民民主国家。对此，周恩来又补充说，捷克斯洛伐克打算购买一定数量的钨（1600吨之内）。

米高扬同志回答说，苏联政府准备购买全部剩余的产品，这里说的是中国将不再使用的剩余产品。

我们答应对这个问题进行研究后告知我们的最后意见。

周恩来在提到航空协定的问题时说，提交给他的我们的草案是相当复杂的，应该将其简化。周恩来所关注的主要是，这个协定是否能让中国人沿北京—赤塔，北京—伊尔库茨克和北京—阿拉木图航线飞行。

米高扬同志说，他还没研究我们专家的草案，所以不能就此问题表示最后的意见，并补充说，他觉得周恩来的建议是有道理的，在审议这个草案时一定会予以考虑。

此外，周恩来还建议互换关于1945年8月14日的条约和协定已失效的照会。

附上周恩来拟定的照会草案，以及条约和协定的草案。

经与阿·伊·米高扬同志协商，由我呈上报告。

安·维辛斯基 2月1日

文件 07

维辛斯基关于与周恩来会谈情况给斯大林的报告

（1950年2月2日）

约·维·斯大林同志：

1950年2月1日同周恩来进行了例行会晤。会晤时我们交给周恩来：

1. 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草案。

2. 中长铁路、旅顺口和大连协定（及其议定书）草案。

3. 贷款协定（及其议定书）草案。

4. 互换照会草案。

文件附上。

米高扬同志说，在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草案中采纳了中方的修改意见。

接着，米高扬提请周恩来注意中长铁路、旅顺口和大连协定议定书的第一条，指出：根据中方愿望该条列为第一条，但做了如下改动，规定只有在远东地区出现反对苏联的战争威胁的情况下，才能沿中长铁路调动部队。

苏方的建议是这样的：经满洲里向海参崴调动苏军可以缩短一半的距离，并且在战时可以提供两条调动军队的路线，这一建议是非常合理和具有说服力的，无需证明，这是指在苏联在远东受到战争威胁已成为现实的情况下。

在中方关于从满洲到新疆调动军队和军用物资的权利的建议中，丝毫未提及此点。

苏方认为这个建议完全不能接受，并不是因为我们反对沿我们的铁路调动中国部队，而是因为我们认为这个建议是针对苏方关于沿中长铁路在满洲里和绥芬河之间调动苏方部队的建议的反提案，并且是隐讳地反对苏联这一建议的一种特殊方式。

这是很明显的，中方没有享有这种权利的任何必要。首先，这是因为还不清楚，新疆现在面临或者将有可能面临来自哪个方面的战争威胁，其次，众所周知，从满洲里经西伯利亚、阿拉木图，还要再步行一千公里才到乌鲁木齐的道路远比从兰州到乌鲁木齐的道路漫长，而且不方便。显然，这里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说明这个建议的合理性。

还有一点我们没有谈到，即一旦发生战争，我们的西伯利亚铁路将忙于运送军

队到远东，我们未必会同意从东北到新疆来回运送中国军队。当然，我们不可能同意这样做。

我们对这样提出问题感到很惊讶，因为周恩来本人曾确认：如果苏联将中长铁路转交给中国，那么中国政府就同意，苏联军队在事实上是可以沿中长铁路的任何线路调动的。

现在，我们同意转交中长铁路了，结果，中国人竟然改变了主意，他们反对我们的军队沿中长铁路调动，甚至在满洲里和绥芬河之间调动也不行。我还指出，列入第二条显然没有任何必要，也绝对不会被接受。

这些意见显然使周恩来感到尴尬，他开始详细地解释第二条的含义，为自己的建议辩解，并竭力想证明这完全不是反提案或搞平衡。他指出，最初中国代表团在议定书中根本就没有规定双方调动军队的条款。周恩来说，这种调动是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逻辑发展。关于这个问题，一旦有必要，随时都很容易达成协议。中方提出第二条，是因为在我们的草案中规定了苏军可沿中长铁路调动。按照周恩来的说法，如果与此同时中方没有得到可以在苏联境内调动自己军队的权利，那么，在中方看来，就不能列入这样的条款。因此，中国代表团认为必须提出自己的第二条，即在该条中规定，中国军队可以沿满洲至新疆的苏联铁路调动。

此外，周恩来说，中国政府打算利用这些铁路从满洲调运粮食和其他货物供给驻新疆的部队，这大概能节省很多开支和时间。

米高扬同志再次提请注意，中长铁路从满洲里到绥芬河的距离，较之苏联境内从赤塔到海参崴要短得多。至于说到沿苏联铁路调动中国军队到西部，米高扬同志说，这并没有实际需要。中国政府也没必要从满洲运输粮食和货物，因为这样是非常昂贵的，而粮食也可以在新疆境内买到，就像现在做的一样。

米高扬同志指出，如果中方反对苏方的建议，那么，他建议，在这种情况下，就取消苏方的这些建议，而采纳周恩来关于缩短中长铁路租赁期的建议，其方式是把已经缩短的现有协定的有效期再保留十年。[①] 周恩来声明，还是新修改的第一条要好一些，即规定一旦远东地区出现反对苏联的战争威胁时可以沿中长铁路调动苏联军队，对此他不反对，但要向毛泽东报告。他不同意米高扬同志重新讨论缩短中长铁路租赁期问题的建议。

① 1945 年中苏关于中长铁路的协定规定其有效期为 30 年，这次中苏谈判时已经按中方的意见规定，苏联将于对日和约签订后或不迟于 1952 年底无偿归还中长铁路。米高扬的建议是在这个基础上把归还中长铁路的期限再延长 10 年。

关于偿还苏联用于自 1945 年以来旅顺口修复和建设工程费用的问题，周恩来建议将有关中长铁路、旅顺口和大连议定书第二条中的“偿还苏联的费用……”一句改为“……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偿还苏联的费用……”。我们同意周恩来的这一修改。对贷款协定草案中其他的修改部分，周恩来表示同意。

接着，周恩来了解了新的贷款协定议定书草案的内容后，请求取消供应铅的条款，其理由是中国不能供应铅。中国目前每年对铅的需求量达 20000 吨，因此中国还不得不进口铅。

关于钨、锑、锡的供给数量，周恩来说，虽然全部提供这一数量是可能的，但中国担心在开始的两年是否能保证确切地履行这一职责。他建议在议定书中加一个补充说明，即中国在满足自身的需要后，将首先把多余的上述原料供给苏联，或说明在我们草案中所指定的最初两年的数量是有条件的。周恩来并未提出自己的条文，只是说这个问题必须再考虑一下。

米高扬同志问，对议定书草案还有什么意见，周恩来回答，议定书原来的草案指明是国际市场价格，修改后的文本没有说明这一点。

米高扬同志解释说，因为在这个议定书草案中讲的是按年度易货协定供货，自然，这些供货将按国际市场价格进行，两国之间的易货也将以这个价格为基础。所以在议定书草案中没有提国际市场价格的问题，因为这是不言而喻的。如果中方坚持要指明价格问题，我方也不反对。

维辛斯基同志把经苏方修改的中方的《互换照书》草案交给了周恩来。[①]

周恩来对修改的部分表示同意。

然后米高扬同志又解释说，苏联政府认为中国政府提出的应规定航空运输合营公司的飞机可以沿北京—赤塔、北京—伊尔库茨克、北京—阿拉木图航线飞行的建议是正确的。

此报告经与阿·伊·米高扬同志商议，由我呈上。

安·维辛斯基 1950 年 2 月 2 日

① 指中苏双方承认蒙古独立和同意废除 1945 年中苏条约的照会。

文件 08

维辛斯基关于与周恩来会谈情况给斯大林的报告

（1950年2月3日）

绝密

约·维·斯大林同志：

1950年2月2日同周恩来进行了例行会晤。周恩来声明，中方已分析了2月1日转交给他们的条约和协定草案，并对这些草案进行了研究，现通报如下：

赞成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对此没有任何修改。

中长铁路、旅顺口和大连协定，可以接受，不做修改。中方建议，在该协定议定书第三条中，将第1点并入第2点。

我们同意这一修改。

周恩来又说，除了与议定书草案有关的问题，他还想谈一下沿苏联铁路调运中国军队和物资的问题。周恩来问，尽管在文件中没有规定这个问题，是否有可能在必要的情况下沿西伯利亚大铁路从满洲向新疆调运中国军队。

米高扬同志说，正如他上次所表明的，中国关于经苏联领土调运中国军队的权利的建议之所以被拒绝，并不是因为我们要排除在实际必要的情况下，按照同盟国之间的条约，沿我们的铁路调运中国军队的可能性。

米高扬同志对中方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再一次表示惊讶。作为同盟者，苏联无偿地转让了巨额财产：中长铁路、大连、旅顺口以及在这些地区我们拥有的一切权利，而中国却连苏联在一条铁路上调动军队都不愿意同意。如果连这样的让步中方都不能做出，那我们还算什么同盟者呢?

然后，米高扬同志又说，苏联政府考虑了中方关于取消议定书中供应铅的条款的请求，决定满足这一请求。至于钨，我们同意开头两年将钨的供给量，从8000吨减少到7000吨。

周恩来援引从本国贸易部长那里获得的详细情况声明说，中方不反对在头两年供应8000吨钨。但他们请求将锡的供应量第一个两年从7000吨减至5000吨，第二个两年减至6000吨，以后的十年保持按每年10000吨供应。周恩来对这一请求做出的解释是，产锡的云南省刚解放不久，同时根据得到的情报，国民党反动派对这些锡矿开采区进行了破坏。他还补充说，如果苏联给予援助，他们就能较快地扩

大开采量，到时就可以按苏联需要的数量完成供应任务。

米高扬同志回答说，如果中方提出具体需要什么帮助，我们是可以帮助的。

谈到供应锑的问题，周恩来说，锑的开采地区位于湖南省，但是，无论是在日本人统治时期，还是在国民党统治时期，这些地区都遭到了破坏。因此，要完成苏方指定的订货是很困难的。有鉴于此，中方请求在第一个两年将锑供应量降至4000吨，在第二个两年减至5000吨，在以后的十年保持每年8000吨的数字。但如果苏方能在这方面也给予相应的帮助，苏方的订货是可以完成的。

米高扬同志回答说，我们坚持我们的数量并准备给予帮助，只要你们说出，在什么时候需要什么样的帮助。米高扬同志还强调，保持这些数量将刺激中方去扩大原料的开采量，这对中方本身也有利害关系。与此同时，这也是对履行协定承担一定的责任。

周恩来回答说，因为中方对这种原料的开采量还不清楚，为了弄清情况，已经给北京拍了电报加以询问，至今还没得到答复。因此，中方请求等收到答复后，可以就这个问题再讨论一次。在没收到肯定答复时，不得不缩减供货数量。

我们不反对收到答复后再来讨论这个问题。

周恩来指出，在议定书最后一段谈到偿还贷款的期限时，不写1955年，应注明为1954年，贷款协定第三条是这种更改的根据。[①]

我们不反对。

对于所有的文件，中方再没有提出其他的意见。

周恩来建议2月3日最后审定条约和协定的中、俄文两种文本。

我们同意。

接着周恩来又谈起在新疆开采石油和金属的问题。他指出中方有当年张治中同苏方讨论这些协议的草案。[②]中方希望利用这些草案，在乌鲁木齐重新开始这个问题的谈判。但是，鉴于新疆代表团已到达莫斯科，[③]他认为，最好是能在莫斯科开始预备讨论，然后在乌鲁木齐完成。

---

① 贷款协定第三条规定，中国第一期还贷于1954年12月31日前完成。

② 这里是指1946年11月4日新疆省政府主席张治中向苏联驻迪化（今乌鲁木齐）总领事萨维利耶夫递交的《中国政府关于新疆省内中苏贸易与经济合作之建议》，苏联政府对该建议迟迟未做答复，直到1949年1月24日，苏方才提出愿意就张治中的建议举行直接谈判，并提出了苏方的建议。1949年7月5日，外交部驻新疆特派员刘泽荣代表中国政府与苏方就《苏联与新疆贸易协定》达成一致意见。但协定草案上报中央政府后，外交部对其中部分条款不满，故拖延未批。

③ 以新疆人民政府副主席赛福鼎为首的新疆代表团是1950年1月30日到达莫斯科的。

周恩来补充说，按照他的意见，双方的法定资本应是均等的。合营公司的管理方式应与中长铁路一样，即轮流担任职务的原则。拟定中的合营公司的经营期限应比航空合营公司的经营期限更长。

周恩来谈到在大连的企业的问题时指出，在中长铁路、旅顺口和大连协定生效后，中苏联合委员会应该研究这样一个问题，即哪些企业将归中苏双方共同经营。

米高扬同志问，指的是哪些具体的企业，周恩来对此问题答复说，首先就是船舶修配厂的问题，毫无疑问，它应该是属共同经营的范围之内。

双方谈妥，周恩来所提及的问题将由中苏双方代表进行预备性讨论，我方将由葛罗米柯同志[①]参加。

谈到贸易条约时，周恩来建议近日应结束主要文件及其主要附件的审议工作。有关贸易条约的下一步工作（具体订货数量、价格及其他），中方将责成贸易部长[②]负责，在中国代表团离开后，他将与一组中国专家留在这里。

我们表示同意。

接着周恩来又问，在4—5天时间里能否结束贸易协议主要文件的讨论工作。

米高扬同志回答说，这一点不仅取决于苏方，也取决于中方。

周恩来又提出，是否应该把空运部队工作结算的议定书看成是航空协定的附件。对这一问题我们解释说，这个议定书应看做是单独的，是一份独立的文件，同航空协定没有任何关系。

周恩来说，关于邀请苏联专家到中国工作的问题，他有一些新的建议。因此他问，他能否会见科瓦廖夫同志。

双方商定，有关专家问题的讨论将通过外交部进行。

周恩来表示，如果这样，他将就此问题专写一封信给维辛斯基同志。

以前，毛泽东曾请求苏联政府向新疆省提供棉种和农业机具。周恩来指出，曾就这一问题给斯大林同志写过信。斯大林同志把这一请求归入第二类问题。因为在新疆3月份将开始播种，因此最好是不要迟于2月份收到上面提到的农业机具和棉种。

米高扬同志指出，必须要有关于棉种数量和农机具清单的具体申请。

周恩来问，可否以单独清单的形式递交这个申请单。

米高扬做了肯定的回答。

---

① 葛罗米柯，时任苏联外交部第一副部长。

② 当时中国的贸易部长是叶季壮，他是随同周恩来一起到达莫斯科的。

会谈结束时，周恩来转达了毛泽东同志在最近几天组织他们参观工厂、集体农庄、博物馆等的愿望，这是考虑到代表团的回国日期预定在2月8—9日。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建议问清毛泽东同志的具体愿望和他拟定参观的具体项目。

我邀请周恩来共进早餐，并建议毛泽东和周恩来观看芭蕾舞剧《红罂粟花》。

周恩来表示感谢，接受了共进早餐的邀请，至于芭蕾舞剧，他应允以后告知。

经同阿·伊·米高扬同志商议，由我呈上此报告。

安·维辛斯基 1950年2月3日

文件 09

维辛斯基关于与周恩来会谈情况给斯大林的报告

（1950年2月12日）

绝密

约·维·斯大林同志：

2月11日米高扬同志和我会见了周恩来。

一、周恩来告知，2月10日中国代表团收到了莫洛托夫转交的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在苏联远东地区和各中亚共和国的领土上以及在中国的满洲和新疆境内不得向外国人提供租让的协定草案。

毛泽东同志同意这个协定草案。只是在文字方面有以下几处不大的意见。比如，从汉语的角度来看，这个草案的标题必须这样表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关于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补充协定"。

协议草案第一段的结尾俄文是："协议如下"。按照中文必须写成："双方达成本补充协定"。

协议草案第二段俄文是："将不向外国人提供租让"。按照中文必须写成："将不向外国人提供租让权"。

我们回答，由于这些修改并没有使草案的意义和实质发生变化，大概不会遭到反对。

二、周恩来说，最好是贸易协定同所有文件一起同时签字。

我们回答，这将取决于中方。

关于申请单，米高扬同志说，现在就来看看这些申请单。同时，在申请单上有

这样一些机械和设备，比方轧钢机、蒸汽涡轮机等等，这些机械和设备中方希望在1950年得到。要做到这一点是不可能的，因为这种设备的设计和制造就需要一年到一年半的时间。现在专家们正在确定生产这种设备的时间和可能性，在近期内，我们就可以告之，在什么期限内可以提供什么设备。

关于价格问题，中方显然是不熟悉情况的。根据外贸部的资料，一些价格是不符合国际市场价格的。外贸部拥有国际市场所有价格的全部资料，并可以将这些信息提供给中方。如果中国代表团来得及了解这些材料，申请单和价格的问题就可以快得多地得到研究。

周恩来回答，如果对申请单的研究要推迟，那么最好是能先签署贸易协定。申请单和价格的问题委托贸易部长和其他专家们进行审议。

米高扬同志回答，我们对这个问题的决定，将提交中方进行审议。

三、周恩来接着说，他认为航空协定草案已经达成了协议。

四、周恩来还说，他希望确切弄清楚关于支付专家费用的协议草案的几个问题。周恩来说，我们不理解第四条的内容。该条指出，中国政府应该每月支付给每个专家2—4千卢布的补偿金，这笔钱是用于赡养专家的家庭，还是给国家或者直接付给专家以前工作的企业。

米高扬同志和我都进一步明确说，这笔钱将用做对专家以前工作的企业的补偿。自然，这是通过苏联政府进行的。

然后周恩来又说，如果规定用美元支付，那么中国政府就不得不支付一大笔钱，而如果以实物结算，对中国政府来说就要容易些。

米高扬同志回答，支付协议草案所规定的支付可以是提供实物，也可以用黄金、美元和英镑。

周恩来问，这个协议是否涉及所有各类专家（军事专家、教师和伊万诺夫专家组等）。

我回答：根据对协议的理解，它包括各类专家。

周恩来问，可不可以标明苏联专家在中国的出差期限是2—3年。

我们解释说，在同中国的协议草案中指明专家在中国的期限是一年，但有可以延长期限的补充条款。

周恩来答应将把他们对这一草案的修改稿通知我们。

五、周恩来说，中方希望准备签字的文件最好能在2月14日或者2月18日签字，因为从2月16日开始是我们中国的新年，在这期间，中国将有三天不出版报纸。

周恩来补充说，如果贸易合同草案准备好了，也应该在 2 月 18 日签署。

双方商定，日期问题通过大使再进一步协商。

六、接着，周恩来转而谈到 2 月 14 日在中国大使馆举行招待会的问题。他问，他们能否请斯大林同志出席这个招待会。同时，周恩来还说，如果斯大林同志不能出席全体招待会，那么，也希望斯大林同志在全体招待会前能参观中国大使馆，周恩来说，我们恳请将这一请求转告斯大林同志。

我们答应一定做到。

七、周恩来请求尽快开始同新疆代表团进行谈判。

米高扬同志回答，在这方面我们期待中国代表的主动性。

八、周恩来说，中方请求葛罗米柯同志明天同中方代表会面。

我们同意。

经与阿·伊·米高扬同志商议由我呈上会谈记要。

安·维辛斯基
1950 年 2 月 12 日

附件：

关于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补充协定

根据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签署的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为了保证两国的国防，苏联政府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达成<u>本补充协定</u>：

无论是在苏联的中亚共和国和远东地区的领土上，还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满洲和新疆境内，都不给外国人提供<u>租让权</u>，并不允许有第三国的资本或这些国家的公民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参与的工业的、财政的、商业的及其他的企业、机关、公司和团体的经营活动。

1950 年 2 月 日订于莫斯科，一式两份，以中文和俄文书就，两种文本具有同等效力。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全权代表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全权代表

（注：划线部分是周恩来修改的。）

文件 10

罗申与周恩来会谈纪要

（1950年2月12日）

摘自罗申日记　　　　绝密

2月12日晨4时，受葛罗米柯同志委托与周恩来进行了会晤。

一、关于会见中国新疆省代表的问题，周恩来说，中方准备2月12日19时同葛罗米柯同志会晤。中方出席的人员有：新疆省人民政府副主席赛·阿济佐夫[①]，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驻新疆全权代表邓力群[②]，中国外交部司长伍修权。

二、按照周恩来的意见，苏方移交给中国人民政府的在满洲地区的资产应按下述方式来办理：

必须起草一个两国政府间的关于苏联将资产移交给中国人民政府的简短的协议。为了移交资产应成立一个类似于中长铁路、旅顺口和大连协定规定的那种联合委员会。

协议中应规定一点，即中国政府将把部分资产以股份公司的形式交由双方共同经营。无论是苏方还是中方目前都不能确定企业的具体名单。这项工作必须责成联合委员会办理，联合委员会在该项工作结束后应向双方政府报告。

周恩来表达了这样的愿望，上述协议草案应由苏联外交部起草后，于2月12日转交中国大使馆。

三、周恩来请我向苏联外交部长报告下列事情：

在关于不允许各外国公司和团体在满洲和新疆境内从事活动的协定中没有指明，应怎样对待目前在满洲和新疆境内的外国小商人以及在新疆南部的外国牧民（印度、巴基斯坦）。周恩来说："我们认为，我们将逐步采取旨在使在满洲和新疆的商人缩减经营活动的各种措施来排挤满洲和新疆的外国商人，可疑分子要迁移，被发现搞间谍活动的人要逮捕，对于其他人要利用税收和地方政权的其他措施进行斗争。新疆南部的牧民比较难对付，对这一类人我们要逐渐驱出。我请求苏方的代表考虑这个问题，并在与我们会面时谈谈自己对这一问题的意见。"

四、周恩来还请求向米高扬和维辛斯基同志转告，与他们会谈后，他又仔细考

① 即赛福鼎·艾则孜。

② 实际上，邓力群当时是新疆人民政府外事处处长。

虑了支付专家费用协议的第四条，并同毛泽东同志进行了协商，他们得出的结论是：每月支付苏联专家 2000—4000 卢布，是作为补偿企业所蒙受的损失而赔偿给苏联政府的，如果规定这笔钱收取美元，那么对中国政府来说，这将是非常难以接受的。

周恩来强调，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来说，每个专家的费用相当于每月 10000 至 18000 斤小米，而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和副主席们每月只有 3400 斤小米，部长们只有 2800 斤小米。

周恩来说："我们认为，如果采用供给各种食品和商品的方式作为补偿金，对于中方来说，比支付美元要轻松得多。我们认为，苏方会考虑这些情况的。此外，我们要求被告知，支付给每个专家的大体数字，这一数字包括以美元核算的金额以及按照国际市场购买相应商品的卢布价格计算的各种食品的数量。"

五、接着周恩来请求转告，2 月 14 日 18 时是签署文件最合适的日期。在这一时间签署已准备好的文件，中方就可以在 14 日将简短的公报和文件等用无线电话通知北京，2 月 15 日所有的中国报纸都能刊登出来；如果做不到这一点，2 月 16 日中国将开始过春节（按阴历），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要过节，在中国北方过节要持续三天，而中原和南方过节要延续一周以上。在这些日子，中国人民将忙于过节和一些拜年活动。因此他们再一次请求苏方对他们予以协助。

罗申

文件 11

维辛斯基与周恩来的会谈纪要

（1950 年 2 月 13 日）

摘自维辛斯基日记　　　　绝密

在互致问候并就一般话题进行短暂交谈后，进行了下列内容的会谈。

周恩来说，根据他同毛泽东商议的意见，即将在莫斯科签字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联之间的所有协议都应公开发表。同时，周恩来补充说，贸易协定、航空线协定，以及在新疆加工石油和有色金属的协定不能签字，因为这些协定的文本有些尚需进一步协商和明确。

周恩来表示，即将在莫斯科签字的协定的中文本已寄给北京并将向中华人民共

和国政务院汇报。而在签字的协定中有什么不能公布的，必须向政务院成员做专门的解释。周恩来强调说，按照我们的意见，公布所有签字的协定，无论是对中苏两国，还是对其他民主国家都是有利的，因为这可以更加提高他们在全世界的威信。

我对周恩来说，尽管他表述的意见相当明确，然而双方并未就公布所有的协定和其他文件达成协议，公布这些文件或其他一些文件的问题必须加以讨论，这个问题我将向苏联政府汇报。我会立即将苏联政府的决定通知周恩来。

会谈进行了 30 分钟，参加会谈的有安·安·葛罗米柯、尼·特·费德林、王稼祥。

安·维辛斯基

发表于《党史研究资料》1998 年第 4 期

人名译名对照表

阿尔洛夫，А. Я. Орлов，化名捷列宾（Теребин）
阿里斯托夫，А. Б. Аристов
埃谢里克，Joseph W. Esherick
艾奇逊，Dean Acheson
巴特沃斯，Walter Walton Butterworth
包懋勋，Jhon H. Paxton
包瑞德，David D. Barrett
贝利亚，Л. П. Берия
贝舍夫，Б. П. Бещев
贝斯特罗夫，Ф. П. Быстров
彼得罗夫，А. А. Петров
波波夫，Попов
波采罗夫，В. Поцеров
波马兹涅夫，М. М. Помазнев
波诺马廖夫，Б. Н. Пономарев
伯恩斯，James H. Bums
布尔加宁，Н. А. Бурганин
布莱德雷（布雷德利），Omar N. Bradley
崔可夫，В. И. Чуйков
戴维斯，John Paton Davies
杜尔金涅夫斯基，В. Дурденевский
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
杜鲁门，Harry S. Truman
多勃雷宁，А. Ф. Добрынин

凯南，George Kennan
柯克，Alan G. Kirk
柯林斯，J. Lawton Collins
柯伟林，William C. Kirby
科瓦廖夫，И. В. Ковалев
克鲁季科夫，К. А. Крутиков
库尔久科夫，И. Ф. Курдюков
库梅金，П. Кумыкин
库兹涅佐夫，Ф. Ф. Кузнецов
腊斯克，Dean Rusk
莱姆尼策，Lyman L. Lemnitzer
雷斯科夫，М. Ф. Лысков
李海，William D. Leahy
列多夫斯基，А. М. Ледовский
列宁，В. И. Ленин
林肯，A. Lincoln
卢登，Raymond Ludden
罗申，Н. В. Рощин
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
洛维特，Robert A. Lovett
洛佐夫斯基，С. А. Лозовски
马丁，Edwin W. Martin
马尔盖维奇，Л. Малькевич
马康卫，Walter P. Jr. McConaughy
马里宁，М. С. Малинин
马立克，Я. А. Малик
马林科夫，Г. М. Маленксв
马卢欣，А. М. Малухин
马歇尔，George Marshall
麦卡锡，Joseph R. McCarthy
麦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

麦克法夸尔，Roderick MacFarquhar
麦钱特，Livingston T. Merchant
米高扬，А. И. Микоян
米克拉舍夫斯基，Л. М. Миклашевский
缅希科夫，М. А. Меньшиков
莫洛托夫，В. М. Молотов
默里，Brain Murray
纳尔逊，Nelson
诺兰，William F. Knowland
诺斯塔德，Lauris Nomtad
潘友新，А. С. Панюшкин
齐赫文斯基，С. Л. Тихвинский
齐米亚宁，М. В. Зимянин
契尔沃年科，С. В Червоненко
乔巴山，Horloogiyn Choybalsan
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
日丹诺夫，А. А. Жданов
茹拉夫廖夫，А. Ф. Журавлев
萨维利耶夫，А. И. Савельев
什特科夫，Т. Ф. Штыков
什维尔尼克，Н. М. Шверник
史迪威，Joseph Stilwell
史蒂文森，Adlai E. Stevenson
史密斯，H. Alexander Smith
司徒雷登，John L. Stuart
斯大林，Й. В. Сталин，化名菲利波夫（Филиппов）
斯克沃尔佐夫，Т. Скворцов
斯拉德科夫斯基，М. И. Сладковский
斯坦科维奇，Станкевич
斯特朗，Anna Louis Strong
斯特朗，Robert C. Strong

斯退丁纽斯，Edward R. Stettinius

苏斯洛夫，M. A. Суслов

索尔兹伯里，Harrison E. Salisbury

塔夫脱，Robert A. Taft

铁托，Josip Broz Tito

通金，Г. И. Тункин

托卡尔，Токar

瓦西里耶夫，Н. А. Васильев

维利尤，Spano Veliiu

维辛斯基，А. Я. Вышинский

魏德迈，Aldert C. Wedemeyer

文安立，Odd Arne Westad

文森特，John Vincent

谢伟思，John S. Service

伊夫琴科夫，А. Н. Ивченков

伊万诺夫，Иванов

尤金，П. Ф. Юдин

约翰逊，Louis A. Johnson

泽登巴尔，Yumjgiyn Tsedenbal

扎布罗金，Забродин

兹韦列夫，А. Г. Зверев

佐林，В. А. Зорин